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合作北伐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合作北伐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合作北伐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二卷　合作北伐

主　编： 孙建军　朱志敏

副主编： 王国军　张凤东

编　者： 蔡海静　高爱丽　田小雄　张艾华　黄仲红
张国华　黄仲红　罗家辉　林　海　罗　光
陆寒静　王淑芬　王海峰　王星辉　文连修
方升平　邓泽民　冯云飞　冯学海　史建斌
石小奇　石志新　田婷婷　叶扬帆　江　涛
江雪松　刘　浩　刘　铭　刘　辉　刘亚男
刘焕伟　刘燕全　刘　敏　孙　梅　孙晓超
李　明　李晓娟　李振燕　李启全　李先丽
师　伟　吴　亮　吴峥嵘　李　勇　严　实
扬　帆　杨　庆　杨　林　杨丽芳　杨怡然
张光迪　张凤东　张　峰　张　琳　程　艳

统　稿： 张志中　陈东林

目　录

第一章　建立国共合作

第二章　合作开展建军工作

第三章　二次革命的主张　党的四大



第四章　党领导的初期农民运动

第五章　工人运动高潮到来

第六章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

第七章　北伐战争的准备

第八章　北伐军挥师北伐

第九章　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工农运动

第十章　蒋汪分立与二次北伐

第十一章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



共产国际倡导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及其所采取的方式，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共产国际贯彻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及其实施“东方战略”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需要。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巨大威胁。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叛乱中，许多反革命政党，如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形成了忠实的同盟。被推翻的俄国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军官和士兵，但他们缺乏必要的金钱和军火，在得到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他们疯狂的向革命进行反扑。

俄国地主资产阶级和隐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互相策应，进行叛乱、阴谋和破坏活动。他们到处进行破坏，并组织残余势力进行武装对抗，妄图推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谢笛诺夫在英美干涉军的支持下，在苏俄远东地区组织了反革命政府。1918 年 11 月，高尔查克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夺取了鄂木斯克的政权，成为西伯利亚反革命政权的最高统治者。8 月，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在彼得格勒刺杀了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者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又在莫斯科企图谋害列宁，使列宁身负重伤。英国武装干涉军又指使反叛分子在巴库枪杀了邵武勉等 26 名布尔什维克党的巴库委员会委员。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也发生了多起暗杀破坏活动，国内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苏维埃国家被迫进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战争。

外部的国际帝国主义害怕苏维埃国家争取和平的斗争方式和俄国脱离帝国主义战争会加强各国国内的革命斗争，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出于对苏维埃政权本能的敌视，英、法、美、日等国在 1918 年 3 ~4 月间就开始派遣小规模的干涉军，先后在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

装挑衅。与此同时，在高加索、顿河一带，都有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自卫军的武装叛乱。

1918 年 5 月，在英、法、美三国政府的指使和资助下，策划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这是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武装干涉的又一突出事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十月革命前由当时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在俄国组建的。起初，协约国打算把它调往西线同德军作战。俄国退出战争后，苏俄政府允许军团中的官兵经由西伯利亚和远东到法国去。军团司令曾经应诺，交出武器，只携带少量武器作为防护之用，并保证分批乘军用列车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军团中的共产党员还成立了党组织。但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怂恿下，军团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反对苏维埃的武装叛乱。6～7 月间，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的部分地区，被帝国主义的敌意宣传所蒙骗的军团士兵变成了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先头部队。

6 月，协约国乘机扩大武装干涉，英、法、美、意四国混合部队 4 万多人在俄国北部登陆，美国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东西伯利亚，日本在远东入侵的军队扩大到 10 万人。德国也违背和约有关条款，派兵占领克里米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支持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顿河流域的反革命叛乱。外国干涉军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相勾结，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占领了苏俄 3/4 的土地，形成了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包围圈。列宁说："北方有摩尔曼，东部有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东南方有土耳其斯坦、巴库和阿斯特拉罕，英法帝国主义铸造的包围圈几乎已经合围了。"①

而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亚、非、拉广大地区先后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殖民主义者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接二连三地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就在此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它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使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看到了希望，也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促进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在国际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团结起来，使刚建立的各国共产党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有力的打击帝国主义势力，列宁领导、筹建了共产国际，并提出了国际反帝联合的口号。

共产国际成立之初，由于战略利益的需要首先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上。但是进入 20 年代初期后，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低潮，共产国际在西方国家首先是在欧洲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



失败了。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朝鲜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三・一”起义；印度也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同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运动相互支持，结成了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掀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高潮。列宁在他的《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也明确指出：“十分明显，在未来的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的多。”[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开始积极在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寻找伙伴和盟友，组织能够在俄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并与其联合的情况下参加反帝斗争的力量。

在这种危急的形式下，为了保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扩大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帮助各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1918 年 3 月列宁在联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说到：“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如果我国的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③]与苏俄紧邻的中国自然就成了重要的联合对象。正如斯大林在 1918 年曾高呼：“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东方。”[④]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处在帝国主义欺凌和奴役之下，从而在感情上为苏俄的接近提供了可能性。再者，如果说苏俄在欧洲的版图是新政权的前大门的话，那么其远东地区则恰似新政权的后大门，而中国刚好是靠近这扇大门的主要国家，后院是否失火与中国的背向有着莫大的联系。所以，从地缘上讲，更有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此外，中国态度的冷热也是防止和牵制其宿敌——日本帝国主义是否西进威胁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砝码。这样，联合中国又多了一层战略利益的意义。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急于在远东地区寻找战略突破口，特别是首先要在与苏俄紧邻的中国寻找支持力量。

于是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 1918 年 7 月 4 日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苏维埃政府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抢夺的一切物资和一切战争赔款，重新恢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⑤]这次讲话于次日在《消息报》上发表，但是中国没有公布。北京政府非但没有感到鼓舞，反而在 8 月 24 日声明，中国将联合同盟国出兵西伯利亚。[⑥]

尽管局势发展不甚乐观，但苏维埃共和国新政府并没有放弃希望，它在

等待有利时机。当凡尔赛和会拒绝中国的正当要求、把山东全部让给日本，这时，声势浩大的愤怒浪潮席卷中国，结果爆发了“五四运动”，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和骚动。[7]

这一起“澎湃的浪潮”，大学生们称它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来所具有的意义比起它发生时更为重大，因为它在后来发展成了社会和文化运动。在中国，由于对西方文化看法不一，几代人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与老代人相反，大学生是思想最活跃的代表，他们对一切新事物不持成见。中国大学生很重视舆论，他们通过自己的政治积极性对公众舆论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8]因此，共产国际的干部们在分析中国革命力量时如此高度评价大学生的作用，就不奇怪了。

在这种背景下，苏维埃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放弃沙俄时期对华特权，但是北京政府对此保持怀疑。但与北京政府的怀疑态度不同的是，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劳动工会以及全国的工人和其他团体联合会纷纷打电报和写信对苏维埃政府和俄国人民表示“无任欢喜”。[9]全国主要的报纸和杂志也发表评论，对此也表示了积极的态度。[10]

归纳起来，公众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1. 苏维埃新政府放弃全部特权、土地和战争赔款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因而认为，从此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和平的基础；2.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苏俄的诚挚态度应表示衷心的感谢；3. 中国政府应接受苏俄答应归还的一切权利，尽快在外交上承认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4. 中国人民应和苏俄人民一起在自由、平等和互相帮助的精神下，共同反对国际压迫，消灭种族和阶级差别。[11]

对苏维埃政府和十月革命的同情，还明显地反映在1923年12月17日纪念北京大学建校25周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上——这在中国当时是很不寻常的。[12]民意测验的第五个问题是：“俄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谁是中国的朋友?”被问的不同职业的824人中有497人认为俄国是中国的朋友，占到被问者的59%。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其中372人是教师和学生。其理由是：1. 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不会侵略别国；2. 中国正可以根据这个事实同俄国结成联盟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列强；3. 俄国人民过去如同中国人民现在一样也曾经是被压迫人民。[13]

中国知识界对苏俄态度的变化是基于这种信仰，即新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反帝斗争的可靠“朋友”。[14]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文章《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1922年11月7日）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人民

在近百年来，即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摧凌于它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双重及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15]

这也是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来说明。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处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以为凡尔赛会议可能会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带来不幸中的一点幸福，以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可以改变中国的地位，但是随着威尔逊的失败，中国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略、瓜分中国，国内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系林立、战火纷纷，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爆发了"五四运动"。

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当时都试图达到两个目的：对内摧毁旧势力，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看成是上天的福音。[16]当时首屈一指的文艺批评家汪淑明写道："我向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学理论告别，而专心致志于社会主义的研究"。[17]

毛泽东后来认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8]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迫切渴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赢得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虽然共产主义同中国文化有着表面的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并没有内在的亲缘关系，它是从西方经过苏俄传到中国的。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批代表固然在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是俄国新政府的积极外交活动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对激进的中国知识界，也起了重要作用。

1920 年初，第一批共产国际代表在 G. N. 维经斯基带领下到达北京。[19]接着，1920 年 5 月，帮助陈独秀成立了"临时中央"，作为中共临时领导机关，[20]并"以这种方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21]于 1920 年夏开展活动。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形势，尤其是为了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马林于 1921 年 4 月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经过一年的准备工作，由于维经斯基、马林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积极努力，于 1922 年 7 月 1 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12 名代表，代表了 57 名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

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决议和公报。

公报在代表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和他领导下的党应取何种态度。有几个代表认为，国民党的纲领，尽管有些地方观点错误，但毕竟反映了新时代的潮流；孙中山为人民造福的原则也近似社会主义的原则。其他代表则辩白说，民族主义者压迫共产党员，因此必须推翻南方政府。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党代表大会决定，对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进步运动以"党外的合作形式"给予支持。[22]

公报通过了，但公报的发表要由新当选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局决定。代表大会以后，公报非正式地传开了。人们估计，公开发表公报首先会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因为共产国际代表不同意对孙中山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23]

在讨论党纲的时候，代表们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李汉俊——此人专心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代表相比堪称"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表示了他的顾虑。他在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决定党纲和政纲以前，应先派人到俄国和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他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即未成熟，目前中国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24]

李汉俊的意见成为讨论的焦点，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主要的批评者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刘仁静反对西欧社会主义者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该对国民党的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主义的准备。[25]

被通过的党纲有四个要点：

1. 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帮助，推翻资本家阶级，依靠工人阶级建设国家；

2.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 消灭私人资本，没收一切生产资料；

4. 隶属共产国际。[26]

决议表示拒绝与其他政党发生任何联系，强调对工人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27]

由于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还没有传达到中国共产党；同时由



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创建时期，缺乏革命斗争实践；各党员的理论认识也存在差异，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是通过了党纲。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消灭阶级差别，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组织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作为党的首要政策；“要联合第三国际”[28]。

总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召开的，代表们确认中国共产党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并规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29]

此时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力量薄弱。直系军阀吴佩孚、国民党首领孙中山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是中国政坛上的三大实力派，是苏联考虑联合的对象。当时吴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孙在南方有着广泛影响；张在东北和内蒙古拥有军事优势。他们据守各自的辖区，彼此间互相争斗。共产国际一面派遣外交使节，与北京政府开展建交谈判；一面派遣共产国际代表，同孙中山、吴佩孚、陈炯明等建立联系。由于吴、陈等军阀实力派，当时附会时势，伪装进步，这使共产国际在选择统一战线盟友问题上难以抉择，经历了一段探索过程。

一、是吴佩孚。他披着“爱国将军”、“保护劳工”的外衣，令苏俄远东共和国认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30]苏俄《消息报》载文称：吴佩孚“已经在中国正在发展的局势中树起了新的旗帜”，对吴寄予“殷切的期望”[31]。

二、是陈炯明。他自我标榜“社会主义者”，与列宁有书信往来，使苏俄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称赞陈是中国最“有声望”的人物，其“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与孙中山“可以相提并论”[32]。

三、是孙中山。他同情和向往俄国革命，早在1918年夏，他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33]随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复信孙中山，呼吁俄中两国“在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伟大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34]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鉴于错综复杂的中国政局，从1920年10月~1922年8月间，莫斯科不断派使节来华，几乎在同一时期与吴、陈、孙都有接触，对他们开展工作，

以寻求建立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和苏俄在这一过程中，最初并不看好孙中山，而是更接近表面上进步的吴佩孚和陈炯明。这是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治国谋略，吴、陈都比孙略胜一筹。只是到后来陈炯明发动推翻孙中山叛变以及吴佩孚、孙中山缺乏合作的可能，莫斯科才下决心“弃吴联孙”，实行“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受共产国际的上述影响和制约，中国共产党之同吴、陈、孙的交往及寻求伙伴关系，大体上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35]

这期间，苏俄、共产国际不遗余力地加强同孙中山国民党的直接联系，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步骤：[36]

一、1920年秋，俄共（布）远东局使节维经斯基在上海首次会见孙中山，建议孙中山加强与苏俄的联系。之后，又有俄共（布）阿穆尔州中国部书记刘江、苏俄使者波达波夫和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等相继会见孙中山。双方互相转达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希望加强更密切的联系。[37]

二、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马林为执行共产国际二大决议，于1921年6月被派来华，12月同孙中山在广西桂林首次会晤，双方商讨了国民党联俄的可能性。孙中山对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兴趣，表示愿意与苏俄建立联系，并希望得到苏俄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又担心与苏俄公开接近会引起列强的干涉，表示暂时还不能马上同苏俄公开结盟。[38]

三、共产国际利用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出席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寻求同国民党建立直接联系。会上，契切林同国民党全权代表张秋白讨论有关两国关系问题时重申，苏俄“是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朋友”，“绝不会放弃对中国人民的最真切、诚挚的友情和合作。”[39]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国共两党代表时，询问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希望两党采取合作的方针。

四、1922年4月下旬，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广州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广泛的交谈，希望弄清楚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及其国内外政策。孙中山对苏俄红军组织及其政治教育很感兴趣，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中国人民只有苏俄这样一个真正的朋友和同盟者。”[40]达林向孙中山提出建立国共两党“党外联合”的建议，但遭到孙中山的拒绝。[41]

上述活动的实施，开启了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建立合作的渠道，为孙中山



确立联俄联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12]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都还没有建立两党合作的意向和准备。由上可见，在两党建立合作关系的初始阶段，无论是联合战线原则的提出，还是联合战线对象的选择，以及联合战线方式的确定，主动者是苏俄、共产国际，而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13]

注释：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科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1984 年 10 月第 2 版，第 7 页。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科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984 年 10 月第 2 版，第 469 页。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科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卷，1984 年 10 月第 2 版，第 459 页。

④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共》，北京图书馆藏，第 29 页

⑤艾伦：《苏联在中国的政策 1917 ~ 1924 年》，斯坦福 1968 年，第 28 页。

⑥《第一回中国年鉴 1923 年》，阮湘编，《1903 ~ 1922 中国大事记》，第 2035 页。

⑦沃尔夫冈·弗兰克：《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 年五四运动》，慕尼黑 1957 年，第 7 ~ 15 页。

⑧郭恒钰：《中国与“野蛮人”》，思想历史的观察，普夫林恩 1967 年，第 121 ~ 122 页。

⑨《新青年》，第 7 卷，第 6 期〔1920 年 5 月 1 日〕，附录：《公众舆论对俄国工农政权政府宣言的反应》，第 3 ~ 10 页。

⑩同上，第 10 ~ 29 页。

⑪《新青年》，第 7 卷，第 6 期〔1920 年 5 月 1 日〕，附录：《公众舆论对俄国工农政权政府宣言的反应》，第 26 页。

⑫（联邦德国）郭恒钰著，李逵六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1985 年 6 月，第 27 页。

⑬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共》第 1 卷，台北，1966 年，第 89 ~ 91 页。

⑭（联邦德国）郭恒钰著，李逵六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1985 年 6 月，第 27 页。

⑮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大钊选集》，北京，1962 年，第 401 页。

⑯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卷，香港 1971～1974 年，第 79 页。

⑰萧乾：《当代中国文学》，苏黎世，1947 年，第 22 页。

⑱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08 页。

⑲迪特尔·海因齐希：《从张国焘的回忆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汉堡，1970 年，第 11 页。

⑳《远东共产国际代表处的建立》，《学习与研究》，台北，1972 年 4 月，第 54～65 页。

㉑汝安利：《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共产国际》，第 9～11 期（1929 年 3 月 13 日），第 660 页。

㉒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北京，1962 年，第 54 页。

㉓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1 卷，台北，1969 年，第 31 页。

㉔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卷，香港 1971～1974 年，第 140 页。

㉕同上。

㉖《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陈公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威尔伯序，马丁出版公司，纽约 1966 年，第 102 页。

㉗《1921 年中国共产党关于目标的第一个决议》，陈公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威尔伯序，马丁出版公司，纽约 1966 年，第 103～105 页。

㉘《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2 册，第 197 页。

㉙《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2 册，第 201 页

㉚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2 版，第 23 页。

㉛《消息报》，1920 年 10 月 9 日。

㉜《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附录"督军"》，《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第 77 页。

㉝《孙中山全集》第 4 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00 页。

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9 页。



㉟肖甡：《论共产国际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第一期，2005 年，第 12 页。

㊱同上。

㊲同上，13 页。

㊳同上

㊴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 1、2 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1 页。

㊵（苏）C. A.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6、127 页。

㊶肖甡：《论共产国际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第一期，2005 年，第 13 页。

㊷同上。

㊸肖甡：《论共产国际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第一期，2005 年，第 13 页。

孙中山决定国共合作

在民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孙中山一直在为维护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而奋斗。从 1915 年～1922 年将进八个年头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先后投入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护国，就是维护他常说的“共和国体”，护法，就是维护被他看作“国体之保障”的《临时约法》。

这时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共和国体”是他“唯一之生命”。1918 年 3 月 28 日，他给头山满、犬养毅的信中说：“文奔走革命二十余年，迄于辛亥，始得有成。以二十余年来惨淡经营，所得者新建立之共和国体耳为国体之保障者为约法，而约法之命脉则在国会”。“共和国体若危，文视为唯一之生命，必尽其所能以拥护之”。“何也？为图中国之长治久安，实舍巩固国体外，无他道耳。”①

其实，被他看作“国体之保障”的《临时约法》他自己是很不满意的。他甚至说过：“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②再拿他于 1906 年起草的《革命方略》同这部 1912 年的《临时约法》做下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明显不同。《革命方略》中规定：在各地起义后，第一件事是建立军政府，经过“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再到“宪法之治”。也就是说，首先要把“专制之毒涤除净尽”，并“注意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然后才能进入“宪政时期”。孙中山以后说：不经过这个过程，即便挂起民国的招牌，“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他感叹道：“不幸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尔不行，于是根本错误，枝节横生，民国遂无所持以为进行，此真可谓太息痛恨之也。”他不满意的、痛恨的正是《临时约法》中没有规定具体民权，认为没有经过地方自治训练而举行的国会选举，只能“无怪国事操纵在武人及官僚之手”。③既然孙中山对这部约法如此不满，为何还要把它看作“国体之保障”

加以维护呢？孙中山对胡汉民说过："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理作方法。"[④]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十分讲求实际。而事实是这部《临时约法》在民国元年经临时参议员正式通过成为民国根本大法。在南北议和之时孙中山曾坚持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二，把它作为服从民国的证据，才接受了和议的结果。这就使这部孙中山先生自己并不满意的约法成为了"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并得到举国上下之公认。[⑤]以后，孙中山在多年斗争中一直以维护约法为号召。护国运动中，孙中山先生说："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现，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⑥]护法运动中，他同样宣告："共和国之根本在法律，在宪法未施行之前，其效力于宪法等，凡民国之人，皆当遵守，无敢或违者也。"[⑦]既然《临时约法》早被孙中山说成是共和国体的根本，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并已在国内得到普遍的承认，那么在他看来，要巩固共和国体只能从维护《临时约法》着手，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用他的话说就是："故拥护约法，既可以拥护民国，使国人对于民国无有异志也，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摇撼。"[⑧]

护法，是孙中山"奋然以一身荷护法之大任而不少挠。"[⑨]，他的信心坚定跃然纸上。

1917年夏，孙中山在上海发起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提出了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7月，他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从上海去广州，竖起了护法的旗帜。但是盘踞在两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等之所以容忍孙中山到广东召集国会非常会议、建立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只是想让它成为一块招牌，"利用护法之名，可以宣告两广自主，可以专擅军民财政，可以开赌局及贩卖鸦片。[⑩]"两广的实际权力仍然牢牢的控制在他们手中。正如有人说的："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⑪]陆荣廷所派的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甚至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得不到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⑫]这种局面当然难以长期维持、并存下去。

为了结束这样的局面，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桂系军阀陆荣廷不但不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反而与直系军阀妥协，他们相互勾结，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削弱和排挤孙中山的势力。1914年4月，他们不顾孙

中山的反对，坚持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并拉拢一部分议员提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纲修正案》，以出席60余人赞成者40余人通过了此法案，从而在法律上根本取消了孙中山担任的大元帅职务。虽然孙中山约请全体国会议员到军政府谈话，忍气吞声的说："军政府视国会为君父。国会之所决议，军政府无不服从。"接着，他就倾诉自己难以抑制的愤懑："顾如昨提议之改组军政府，为军政府本身的存亡问题，而国会事先绝未征求军政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审查，揆之事理，宁得为乎？且以法律而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今乃欲行多头制。又军政府大纲明明规定：本大纲与约法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完全行使了职权时废止，无修改之明文，今日何以自解？"他断然说："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欲以余为总裁者，亦绝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13]但是这次谈话丝毫没有效果，国会非常会议照样于1918年5月4日通过了这个修正案。

这样的打击对于宣告"视国会如君父"的孙中山先生来说太大太突然了。同一天，他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去大元帅职务，并发出了《辞大元帅通电》，沉痛地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14]这不仅表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也表明孙中山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的策略彻底的宣告失败，从而使他认识到必须彻底的铲除军阀才能真正体现"法律及民意"，同时他对于帝国主义也开始感到失望，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无情的打击。"[15]这是他在残酷打击中领悟到的教训，也是他以后思想变化的重要起点。

孙中山于1918年6月25日从广东回到上海，就闭门著书，很少过问外事。但是"国事家事天下事"对于一心想拯救中国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来说又是"事事关心"，面对中国满目疮痍，孙中山先生内心无比的悲痛只能付诸下次的爱国救国运动了。

1920年春天，国内的政治局势出现了新的动荡和变化：在北方，直皖两系军阀已在酝酿大战；在南方，滇桂两系因争夺在粤滇军的领导权，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已出现动摇的迹象。孙中山在离粤返沪时，在南方还留下他认为唯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那就是陈炯明率领的援闽粤军。它是以广东省长朱庆澜拨交的20个营军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最初，"兵额不过五千，枪支不过三千余杆"。[16]开到闽南后，已逐步发展到



两个军，不下两万人，控制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十余个县。[17]孙中山在离粤返北时，曾去军中会见陈炯明，“即以准备回粤戡乱时相慰勉”[18]，以后，一直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

桂系军阀在广东统治的动摇和援闽粤军的发展壮大，使孙中山又兴奋起来，他觉得护法似乎又出现了转机。1912年他写道：“今日救过急务，宜先平桂贼，统一西南，乃有可为。”[19]可见此时孙中山先生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广东，谋划回粤讨伐桂系军阀这方面来。[20]

当时陈炯明在闽南却“溺于安乐，颇思苟且”。孙中山“一再电促回粤，陈氏皆不置复”。[21]奉孙中山之命三度去漳州促陈炯明出师的朱执信，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甚至愤愤说：“竞存（陈炯明）处力量费尽，疲玩如故。此际感情已伤，留亦无益。”[22]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陆荣廷密电广东督军莫荣新：“直系如得胜利，时局庶有转机，我辈夙已联直，尤应乘时利用。”他命令莫荣新向福建进军，并准备“讨伐”陈炯明部。[23]而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却表示愿接济军饷，支持陈炯明部反攻广东。于是，陈炯明不得不下决心举兵回粤。8月12日，援闽粤军在漳州公园誓师出发。他们打出“粤人治粤，桂军回桂”的旗号，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24]士气大盛，尽管粤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是“驻粤的桂军因为两三年来在粤搜刮，囊中装得太满，所以无丝毫抵抗力”。[25]10月26日，莫荣新退出广州，粤中各地先后为粤军所占领。面对广州如此形势，孙中山先生在11月25日启程南下，重新在广东建立政权。

1921年1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军政府发表演说。他说：“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26]这是一篇充满着矛盾和混乱的讲话：一会儿说：“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一会儿又说：“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断章取义的加以引用，完全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来。[27]言语上的矛盾和混乱，正反映了孙中山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但是整个运动还是在“护法”的旗号下进行。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再度高举“护法”大旗，决心用武力打倒军阀，统一全国。

但是桂系军阀的失败和孙中山重新在广州建立政权是英、美帝国主义不愿看到的。为了扑灭孙中山在广东的势力，英、美定国主义除了帮助直系军

阀从军事上进行威胁外，还直接从财政上打击新生的革命政权。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列强宣布取消原已拨发给广东政府的关税余款，同时积极拉拢陈炯明，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广东政权。[28]这时桂系也伺机配合，阴谋卷土重来。而此时陈炯明由于还要借助孙中山的威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暂时还不敢公然叛变孙中山。

1921 年 6 月 27 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等，仅用 3 个月，粤军就全部占领广西。孙中山在平定广西，统一两广之后，便于 1921 年 12 月 4 日，在广西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乘胜出师北伐。这时的北方政权已落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手里。孙中山积极筹划讨伐直系军阀，以"完护法心愿"。[29]但此时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命令阳奉阴违、暗中牵制，迫使孙中山于 1922 年 4 月回师广东，改在韶关设大本营，准备由广东进攻江西。5 月初，孙中山亲赴韶关督师，发布了总攻击令。北伐军分兵三路向江西进攻，攻克了江西南部的许多城镇，革命形势发展很快。

就在这时，早已同英美、美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相互勾结的陈炯明，从暗中反对革命发展到公开叛变。[30]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企图谋害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孙中山在反击叛军近两个月后，因孤军无援，只得于 8 月 9 日离开广州，14 日到达上海。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宣告失败了。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本来在孙中山的眼中，陈炯明似乎和桂系军阀是根本不同的。陈炯明在 1909 年加入同盟会，多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31]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前夕，又向孙中山表示："革命唯有服从中山先生领导，才是正确的道路。"[32]而陈所率领的部队也是孙中山先生苦心孤诣一手扶植起来的。孙中山也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竞存（陈炯明）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为竞存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存为国民元年前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之英士（陈其美），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33]把陈炯明比作黄兴、陈其美，可见孙中山当时对陈炯明信任之深、期望之大。但孙中山完全没有想到当陈炯明借助其影响力羽翼丰满之后竟掉头反噬，几置自己于死地。孙中山先生痛心地说："文帅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34]可见，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对孙中山的打击远远超出了第一护法运动失败对他的打击，这样强烈的刺激，在他心里掀起的巨大波澜是不难想见



的。孙中山在这次南下护法时不是说过吗，“若犹是不能达到目的，则惟有进而为革命耳！”现在，旧的路子已走进死胡同，他不能不下决心做出新的选择了！[35]也不能不在痛苦的洗礼中获得新的认识！

其实早在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1919年12月，他对马伯援说：“吾人对日本无多希望，只求其不行劫可也。”[36]离上海南下前，他在国民党本部演讲时甚至说：“我们革命失败，全是日本捣鬼。”[37]而对英、美帝国主义仍抱有很大的幻想。但是随着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慢慢的认识到了封建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靠山，慢慢地看清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最切齿的几置自己于死地的陈炯明就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唆使支持之下叛变的。他对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说：“我最好的朋友陈炯明背叛了，他被吴佩孚收买了，被香港的英国人收买了。”[38]字里行间有对军阀的痛恨，也有对帝国主义的不满。

孙中山既不是亲日派，也不是亲美派。他所深切关怀的只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39]在他渴望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任何阻挠、威胁、破坏不仅是他痛恨的对象，也是将要打倒的对象。

同时孙中山对中国工人的不幸也表示同情。再到广州后颁布的《内政方针》中包括了“保护劳动”、“谋进工人生机”、“提倡工会”等主张，[40]但他的基本想法只是希望通过提高工人生计，实行民生主义来避免社会革命，而不是鼓励工人的社会革命。

真正给他很大冲击的是1922年1月～3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次史无前例的工人运动最初虽由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经济要求而引发，但是很快就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很容易与对帝国主义不满的孙中山产生共鸣。正在桂林准备北伐的孙中山给予积极支持，并要求廖仲恺在广州筹款支援。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的：“……整个罢工都有这个组织的领袖所领导，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41]接着，这年5月1日，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并举行了由广州工人数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出席大会的达林说：“孙中山掌握的南方，和军阀、外国帝国主义掌权的北方之间，有天壤之别。……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42]当马林会见孙中山时，“与孙中山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43]可见工人运动不仅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也在他的思想中逐渐占有了重要的位置。[44]

在苏联寻求外部帮助之时，孙中山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他在1903年已经说过："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45]他在醉心学习西方的同时，敏锐的观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憎恶那种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而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力图加以避免。[46]而对于社会主义，有一种朦胧的向往。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立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与列宁有了书信联系。他们互相同情，互相支持，表示要"共同进行斗争"。[47]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给孙中山以莫大的鼓舞与希望，"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权能巩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48]因而十分关心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密切注视他的发展，在中国最早发出同情俄国革命的呼声。

1918年元旦，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俄国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权；曰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农生活之改善不可；惟争民权也，故非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吾国之革命要求亦然。"[49]这篇社论认为中国和俄国的革命目标一样，虽然看法不尽科学，但是却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同俄国十月革命联系起来。[50]

1918年夏天，正当全世界反动势力一致疯狂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时候，孙中山向列宁和苏俄政府发出了贺电。这份贺电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俄人民的友谊，而且也表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孙中山的进步。列宁在收到贺电后十分高兴，委托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于1918年8月1日复函孙中山，除了对孙中山的贺电表示感谢外，还向"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51]

1919年～1920年，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言中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永久归还中国。"[52]这对极端憎恶外国帝国主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孙中山，自然有巨大的吸引力，使他对苏俄产生很多的亲近感。[53]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友好表示，受到中国各阶级人民的赞扬，也有助于孙中山实行对苏俄友好的政策。

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地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地组织。"[54]已明确地表示



要加强同苏维埃俄国的联系，并学习苏俄的经验。

1921 年 10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参加完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后，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国民党邀请马林访问孙中山。12 月 23 日，马林到达桂林。他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之下，同孙中山进行了 3 次长谈，向孙中山详细介绍了俄国的国内新经济政策等。孙中山会后对廖仲恺和汪精卫说："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已深感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马林会后的印象是："国民党的领袖多数都倾向社会主义""他们毕竟对俄国革命、对苏维埃俄国抱有很大的同情。"[55]

1922 年 4 月，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在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陪同下，同孙中山有过五六次的接触。"孙中山对红军的人数、其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然后，孙中山询问了列宁的健康情况。"并且明确地说："说明他打算与苏俄建立联系"[56]。

共产党也对孙中山以真诚帮助。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上海不久，李大钊就赶到上海，代表中国共产党于 8 月 23 日会见了他，与他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57]对孙中山表示支持和声援。同时，在陈炯明叛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严肃处分了支持陈炯明的中共广东支部的一些负责人陈公博、谭植棠、谭平山等。这些人迷信陈炯明的实力，违反党的方针政策，陈炯明发动叛乱之后，他们还继续支持陈炯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党籍，谭平山也受到处分。

1922 年 8 月间，当孙中山再次回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主张》，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了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了和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斗争的具体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详细的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状况，和当前的革命任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孙中山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这对于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是有利的帮助，使他对时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也认清了双方共同的敌人。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从不同的角度，经历了不同的探索过程，终于殊途同归地提出基本相同的结论：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这样的对手，为了拯救中国，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并肩来共同奋斗。这样实现国共两党

的大门便打开了。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陪同马林在上海再次会见孙中山。这同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相隔只有10天。孙中山告诉马林：他现在极其需要和苏联建立亲密的联系。马林劝告孙中山：不要用单纯的军事方法夺回广州，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宣传工作。李大钊又同孙中山多次会见，“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58]孙中山十分兴奋，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中国国民党。李大钊告诉他，自己是共产党员。孙中山回答：“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方面加入本党帮助我。”[59]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重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们能依靠他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60]

因为条件业已成熟，各种问题也都已做过反复的充分的思考，孙中山这次到上海，不再像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时那样陷入长期的沉思，他的心情也很开朗，很快就下定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台湾的国民党史家也这样写道：孙中山这次到上海后，“审察当时国际之局势，本党革命失败之症结，国内青年思想之变动，与民众对于政治改革之要求，八月间苏联代表越飞亦派员（指马林）来沪晋，商讨中俄新关系，遂下改组本党决心”。[61]

注释：

①孙中山：《复头山满、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421、42页。

②孙中山：《在广东教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497页。

③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足本中山全书》第4册，中国印刷局，1927年6月，第7、8页。

④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72页。

⑤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⑥孙中山：《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5月，第284页。



⑦孙中山：《通告驻华各国公使书》，《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448页。

⑧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足本中山全书》第4册，中国印刷局，1927年6月，第10/11页。

⑩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革命文献》第7辑，第19页。

⑪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第434页。

⑫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革命文献》第49辑，第392页。

⑬孙中山：《对全体国会会员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42页。

⑭孙中山：《辞大元帅通电》，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471页。

⑮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1363、1364页。

⑯《闽南粤军军实调查记》，《革命文献》第51辑，第214页。

⑰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120/121页。

⑱程启：《总理护法实录初稿》，《革命文献》第51辑，第229页。

⑲孙中山：《批葛庞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178页。

⑳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

㉑李睡仙等：《陈炯明叛国史》，《革命文献》第51辑，第229页。

㉒吴相湘：《陈炯明造反出身》，《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第29页。

㉓李培生主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76页。

㉔李培生主编：《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革命文献》第51辑，第15页。

㉕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第460页。

㉖孙中山：《在广州军政府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50、451页。

㉗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㉘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5月，第101页。

㉙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5月，第102页。

㉚同上。

㉛吴相湘：《陈炯明造反出身》，《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第26页。

㉜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105页。

㉝孙中山：《致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75页。

㉞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5页。

㉟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㊱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第9页。转引自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㊲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

㊳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第111页。

㊴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㊵孙中山：《内政方针》，《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33页。

㊶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琳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16页。

㊷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第82页。

㊸何罗生：《与斯内夫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4页。

㊹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139页。

㊺孙中山：《复某友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㊻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㊼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㊽邵元冲：《广州护法日志》，《建国月刊》第12卷，第6期，1935年6月。

㊾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㊿同上。

51孙剑晨译：《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信件》，《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原载苏联《国际生活》第11期1955年。转引自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52《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7月，第367页。

53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54孙中山：《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第504页。

55马林：《访问中国南方革命家》，《马琳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14、215页。

56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03页。

57李大钊：《狱中自述》，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6期，第7页。

58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890页。

59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

60宋庆龄：《孙中山和她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61《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改组资料》，《革命文献》第8辑，第31页。

西湖会议争论党内合作原则

1922年8月28日~30日，在距中共二大召开后仅一个月，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它实质上修正了二大提出的国共合作方式，通过了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决议，使国共合作成为了可能。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突飞猛进皆影响深远[①]。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以及基层党员在西湖会议之前基本上反对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曾旗帜鲜明地宣称党的纲领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②]。并通过决议，“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③]。

而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眼中，国民党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构成的政党，组织涣散，作风腐败，大而无当，和军阀一样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中，已经没有了号召力。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曾载文抨击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试问南北各派政党，哪一派免了鼠窃狗偷，哪一派有改造中国的诚意及能力?全国民在这彷徨歧路之中，哪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责任呢?[④]

1922年初，当马林从广州会见孙中山后返回上海，建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时，立即遭到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为向第三国际说明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陈独秀于4月6日致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处处长魏经斯基明确陈述了反对的六条理由：“（一）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大不相同。（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

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借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⑤]六条理由，反映了全党上下一致反对党内合作的鲜明态度。

6 月 30 日，陈独秀再次致信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与陈炯明分裂，“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而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孙中山）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⑥]。可见此时中共内部对于国民党的评价不高，对党内合作持怀疑态度。在中共二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代表再一次主张马上加入国民党，也因中共代表意见分歧没有通过。中共党员和团员普遍认为：第一，共产党在主义上与三民主义不合潮流；第二，国民党组织的方法不能适合新的要求；第三，国民党革命方法上倾向于军事。[⑦]甚至在 1922 年底，在共产国际召开的四大上，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中他对国民党仍持批评态度，指出“大多数国民党员，按其本质来说，都是反动的”，国民党“没有在国内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企图单纯通过军事达到目的”。陈炯明的叛变，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的军事计划完全失败了”[⑧]。

在西湖会议上，当马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时，同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刚开始讨论时，仍然是多数中央委员坚持反对加入国民党。蔡和森、张国焘等人在发言中，都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无疑是同资产阶级的混合，这种组织上的混合与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原则不相符，并且会牵制中共的独立政策的实行。陈独秀也强烈反对马林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⑨]。虽然有之前的强烈反对，会上的激烈争论，西湖会议在修正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的基础上，最终还是通过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中共对与国民党的合

作策略之所以在西湖会议上出现大的转折，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因素[10]。

1920年，共产国际召开二大，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东方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被认为不仅是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而且其胜利也是世界革命胜利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从殖民地所取得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11]。而中国由于地缘因素，越来越受到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关注。对其而言，在中国寻找可以联合的反帝同盟者，不仅是推动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助于解决苏俄的外交困境，从东方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和包围，结束苏俄的外交孤立，并消除苏俄在远东的安全隐患。为此，共产国际、苏俄纷纷派出使者，了解并接触中国有合作可能性的各派政治势力。

1921年6月，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指导工作。他在来华之前，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列宁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报告，大会制定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路线、策略方针，而马林本身有在爪哇开展统战工作的经验，他深知必须在中国联合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组织统一战线。1921年底，马林到南方与孙中山当面进行了长谈，会见了南方政府官员，实地考察了国民党。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苏俄的肯定态度，以及国民党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的影响，使马林大为振奋，他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作出了很高的评价。1922年初，马林从广州返上海，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劝中共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建议"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并"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加入国民党"[12]。此建议遭到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在回到北京后，他立即向远东共和国使团作了汇报，并写成两份书面报告，把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想法，让使团分别转交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俄外交部。通过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接触，共产国际越来越倾向与国民党结成反帝同盟，而促成国共合作则是结盟的重要一环。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均派代表参加。远东大会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指南，分析了远东各国及中国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要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国内各革命势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会议提出，在殖民地国家内部，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运动"[13]。在中国方面，孙中山和国民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由于南方政府具有实力，被视为有成功的希望。国民党在大会中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国共合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14]远东民族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重点询问了国共两党能否合作的问题。而马林在党内合作建议遭到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拒绝后，为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回到莫斯科，于 1922 年 7 月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一份反映中国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介绍是轻描淡写的，却很详细地介绍了国民党的情况，特别是他在与国民党领导人接触中所感受到的种种亲社会主义倾向，并断言："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的宣传前景暗淡"[15]。马林的报告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高度重视，经过几次讨论，马林的党内合作的建议被共产国际采纳。共产国际随即发出给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 7 月 18 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16]。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派驻中国的南方代表下达了更加明确的指令，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17]，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马林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后，立刻带共产国际的指示在 8 月初从莫斯科赶回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已经闭幕，对会上作出的同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定，马林斥之为空洞的、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认为不可能得到孙中山的赞同，要求中共中央开会重新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形式问题。为此，8 月 28 日 ~30 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为期三天的中央特别会议，专门就国共合作形式问题展开了讨论。会上，马林详述了必须实行党内合作的理由，认为是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

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18]。

由于马林的建议不能顺利地通过，他向会议说明，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此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共成立之时，尽管共产国际代表在建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但中共并没有直接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大”的纲领仅规定了“联合第三国际”，联合的方式是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也就是说，中共和共产国际是一种联合与指导的关系。而1922年的7月，中共二大已决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上述21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19]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下级服从上级，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20]。

另一方面中共能否顺利开展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因为中共主要的活动经费来源于共产国际。以1921年10月～1922年6月为例，中共中央机关共支出17 655元，其中自行募捐1 000元，国际协款16 655元，[21]也就是说，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占到了94%。陈独秀1922年6月致信维经斯基，询问“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划”[22]，希望得到共产国际资金的支持，反映出中共工作的开展有赖于国际的经费支持。共产国际的代表也经常致信共产国际，要求保障中共的经费，否则工作将无法开展。事实上，马林等早以上级代表、领导者自居，遇事则要预算与报告，几乎每周都要党中央领导人向他们做工作汇报，共产国际也要求其代表应该参加中共中央的每一次会议。对于这两点，中共的领导人是非常清楚的。陈独秀在发言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就声明，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尽管大多数的发言反对加入国民党，西湖会议的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了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23]。可见，马林的努力，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在西湖会议上接受党内合作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通过1922年初的远东大会，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改变了以往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中共过去一向认为，



"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而"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张国焘认为，"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24]，从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的确立。回到国内后，张国焘把远东大会的成就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并被中共中央"欣然接纳"[25]。他又和陈独秀做过多次长谈，对政治敏感的陈独秀在此影响下，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26]。"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对列宁所强调的国共合作，他"深表同意"[27]。1922 年 5 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借此机会考察广州的政治情况，并研究了国共合作可能的发展。[28]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如李大钊、张太雷、林伯渠等，也倾向赞成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在中共二大上，张国焘传达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于中共制定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产生了重大影响。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代表利金在 1922 年 5 月 20 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提到，中共"中央曾几次根据我们的主张作出关于在一些场合必须同国民党合作的决定"[29]。陈独秀在 1922 年 6 月提交给维经斯基的报告中，提出将来计划是"联络全国各革新党派，作普通选举制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联络全国工商界，作改正协定关税制的运动"[30]。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明确表态，准备主动与国民党、资产阶级合作了。事实上，中共二大前国共两党已经开始了局部合作，如共同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等。

中共对国民党态度变化的另一个因素还基于中共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思考。这一时期在陈独秀的文章及《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已反映出类似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及"暂时支持国民党"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 1920 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31]。当然，"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绝不是毫无意义，所以

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32]。

二大期间，中共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更明确指出："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现在"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33]

既然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相当遥远，为避免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孤军奋战，那就必然要和资产阶级携手合作。1922 年 6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但在未能获得政权以前，根据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应当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对付封建军阀。在众多党派、政治力量中，哪个党派是可以联合的民主党派？"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34]。在中共二大上，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势力，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35]，理应属于革命的同盟军。

同时，中共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联席会议，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与封建军阀进行斗争。这一主张在 1922 年 7 月 16 日 ~23 日召开的中共二大，有了更加完整的表述。中共二大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原则，确立了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即与国民党、国会议员中的左派组成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建立包括工、农、商、学、妇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这种合作的方式显然是一种两党对等的党外合作方式。

虽然中共中央作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但所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却无法实施。因为之前马林、达林先后向孙中山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建议，均遭到孙中山的严辞拒绝。孙中山不愿与中国共产党结成联盟，因为中共此时成立不过一年，党员人数不足 200 人，又是秘密团体，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不大的一个小党。而国民党党员有数十万之众，且控制着广州根据地。孙中山根本还没有把中共当成一个可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合



作的政党来看待。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36]的小组织。他曾私下里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37]。

二大召开时，党员和团员一方面对加入国民党非常不满意，但另一方面又看不清革命的道路。会后中共决定用C.P.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给国民党，请求联席会议。但中共领导人同时也清楚，这“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C.P.的党，故因此未作”[38]。此时国共合作的问题实际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领导人已意识到中共二大提出的联合其他党派的方案，基本上没有实施的可能，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采用国民党也能接受的合作形式，所以接受党内合作也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此外，加入国民党后是否会影响中共的独立性，以至牵制中共今后工作的开展，也是党内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共产国际二大时就强调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就是必须保持独立性，“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39]。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争论不休时指出，国民党人数虽多，但组织松散。孙中山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什么。他举例说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由此推断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而这样较之党外合作，更易于实现联合战线。[40]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与会者对党内合作的顾虑。

西湖会议一结束，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正式加入了国民党。西湖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确定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战线的方式上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第二，共产国际第一次以上级对下级的姿态给中共下达了指令，与会的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并不赞同的情况下，仍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并加以贯彻。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共产国际的指令，不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不论是否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认可，基本上都被中共所接受并尽力实施。国共合作也由此打破僵局，中国的革命呈现出崭新的形势。因此，西湖会议在中共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西湖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41]。

注释：

①何云庵：《试析中共在西湖会议上接受党内合作的原因》，《毛泽东思想研究》第26卷第1期，2009年，第116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页。

③同上，第9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55页。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4页。

⑦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2页。

⑨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

⑩何云庵：《试析中共在西湖会议上接受党内合作的原因》，《毛泽东思想研究》第26卷第1期，2009年，第117页。

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

⑫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31页。

⑬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⑭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

⑯同上，第321页。

⑰同上，第324页。



⑱同上，第 343 页。

⑲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第 44 页。

⑳何云庵：《试析中共在西湖会议上接受党内合作的原因》，《毛泽东思想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2009 年，第 119 页。

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304 页。

㉒同上，第 303 页。

㉓同上，第 341 页

㉔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 年，第 193～194 页。

㉕同上，第 194 页。

㉖陈独秀：《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1922 年 8 月 26 日。

㉗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 年，第 199 页。

㉘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 年，第 200～201 页。

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88 页。

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310 页。

㉛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 8 卷第 3 号，1920 年 10 月 10 日。

㉜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 月 1 日。

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313 页。

㉞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第 3 页。

㉟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 年，第 221 页。

㊱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 8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58 页。

㊲《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转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第3期，2001年，第65页。

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41～342页。

㊴同上，第143页。

㊵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㊶时光等选编：《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马林、陈独秀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早在西湖会议前，陈独秀即著文阐明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思想理论。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采取的态度》一文中说："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像共产党、无政府党的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在同一目的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①]1922年6月，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成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②]

西湖会议后，面对来自党内和国民党内的反对国共合作的因素，陈独秀先后写了《国民党是什么?》、《造国论》、《反动政局和各党派》、《怎样打倒军阀》、《北京政变与国民党》、《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方面，阐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与可能。

第一，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不发达，资产阶级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存在，因而中国革命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种特有的革命——国民革命。这个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获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革命党必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援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③]同时，国民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才能成功，因为"劳动阶级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④]所以，陈独秀指出："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独立，这是殖民

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5]

第二，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反动而强大，要战胜这强大的敌人，没有组织力很强很大的国民运动，是不行的，“必须是各个阶级各个部分争自由民权的各种势力，在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6]因而陈独秀认为，“凡属革命的分子，若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国民党，使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国民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如此做法，只有使革命势力傲慢不集中”。[7]同时，国民党也必须将自己的力量建立在民众的基础上，“国民党若不建设在国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设在敌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们能够拥戴孙中山先生做总统，其结果能比傀儡总统黎元洪高明几何?”[8]所以，“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9]陈独秀的结论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至急的需要。而这个民主战线，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进行的，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国民统一战线，是在反对目标一致之下的以国民党为领袖的全民族统一战线。

第三，陈独秀对中国社会的三大主要阶级——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的力量状况进行了交叉分析，既分析了工农阶级的优缺点，又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优缺点，从而得出国共合作必要性的结论。陈独秀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但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工人雄厚，比农民集中，“国民革命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10]但是，资产阶级分为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三部分，它们分别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应该采取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联合非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而反对反革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策略。陈独秀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最强有力的阶级，他们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特别的残酷，因而生活日益艰难，因此他们在革命中最坚决。“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若这种革命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先锋，况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11]因此，国民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参加才能成功。但是陈独秀又认为，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导致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中，只有少数工人有了政治觉悟，大多数工人“不感政治的需要”。[12]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



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13]由此陈独秀得出了结论：“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14]而这里的“妥协”一词显然是合作、联合之意。而对于农民，陈独秀则夸大了中国农民的弱点和局限性，认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难于加入革命”，但难于加入革命并非不能加入革命，陈独秀看到了蕴藏在农民中的力量，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国民革命若是没有农民阶层的加入，“难以成功一个伟大的民族革命”。[15]陈独秀的分析虽然陈述了各阶级、阶层的优缺点，但是明显对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认为他们天生的弱小，而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力量则强于前两者，是天生的领导。

第四，陈独秀通过分析中国革命的前途，认为，既然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那么，国民革命最后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16]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可以获得若干自由与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这又是“中国工人目前至急的需要”。[17]因此，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和资产阶级合作，乃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18]由此陈独秀批判了在农村中做共产主义运动的幻想，指出这种幻想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情况和革命实际，“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因此，我们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19]陈独秀此时完全把革命的希望与领导权寄望在国民党身上，而无产阶级只是为“国民革命”贡献力量的，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的统治下获得现时没有得到过的民主、自由等权利，把一切让位于了国民党，这种“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消极思想，成为日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下国共地位的理论基础。

第五，陈独秀批判了党内部分同志反对工人阶级参加联合战线的错误观念，指出，这些观念“有些幼稚懦弱了”。[20]既他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在斗争中提高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也是在斗争中锻炼壮大的，勇敢地参加国民革命，不仅可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而且可以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成长壮大，对工人阶级有百利而无一害。否则，采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闭政策”，关起门来不参加联合战线，使自己孤立起来，反而会削弱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陈独秀的主张有利于促成革命

统一战线的形成，壮大革命阵营，发展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但是也暴露了无产阶级自身，为后来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遭到镇压、屠杀埋下了伏笔。

第六，陈独秀阐明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而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不是只代表哪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在国民党中，党员分子成分复杂，“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因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参加进去，不仅可以继续举起革命的旗帜，而且可以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多革命阶级的联盟；同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希望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这与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是相一致的；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结成一个打倒一致敌人的革命的联合战线。所以，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种严酷的压迫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21]

基于对上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各阶级力量对比、动力和前途等方面的分析，也随着工人罢工的失败，陈独秀给中国革命设计了一条正轨：中国国民党应该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消灭掉一切阻碍中国实现独立富强民主的反动军阀和外帝国主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自由的目的。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甘心为资产阶级使命的“国民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下推动革命的联合战线的早日实现。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实为实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也作出了“重大贡献”。[22]“如果不是他四处奔走，国共联合战线可能推迟，或者搞不成”。[23]

马林于1921年6月来华。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了解很少，没有提供什么材料，[24]一切从调查访问入手，他先后在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桂林等地奔波，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马林通过和国共两党的领导、群众见面、座谈，和知名人士、工人谈话，翻阅各种外文报刊的方式，“从多方面了解中国情况。”[25]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分析综合，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有一个切近实际的看法：“中国人口中，广大群众是农民”，“农民很贫穷”，受着军阀战争的煎熬。“现代工人人数很少”，“产业工人只占中国人口总数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他们普遍和农村家庭保持联系”，“多数没有受过教育”[26]。而中国的政治生活“全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27]知道中国是



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想要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就必须搞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在经过大量时间的比对和现实的比较之后，确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同盟，并使国民党与共产党结成同盟，完成革命，成为保卫苏联东方安全的战略要点。为加强对国民党的联系，1921 年 10 月，马林在上海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进行接触，12 月由陈独秀介绍，张太雷陪同去广西桂林和孙中山进行三次长谈，马林重点谈了中国和苏俄结盟问题，介绍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孙中山介绍了国民党的历史与现状，谈了自己对苏俄的看法。共同“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问题。[28]孙中山对这次见面，感到“非常高兴”。[29]通过交谈，马林对国民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后来广州爆发省港海员大罢工，他特地赶到广州、汕头，访问了罢工的工人，并与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座谈讨论，在那里工作了一两个月，耳闻目睹，对国民党的基本性质、特点有了深刻的认识。给他总的印象是：第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30]它是由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侨民（是国民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南方军队的士兵、工人组成，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二，国民党与工人运动相当密切。“罢工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领袖支持这次罢工，支持民族主义运动。”[31]“民族运动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32]第三，通过国内政治势力的对比，确认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吴佩孚是假革命，是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卒。孙中山承认苏俄，对苏俄抱支持态度，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反对华盛顿会议，因此马林认为同中共合作的不是吴佩孚、陈炯明，而是孙中山，因为孙中山比“甘地更有战斗性。”在此以前，苏俄，共产国际，都是采取排斥孙中山，而执行联合吴佩孚的政策。马林确定联合孙中山，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符合苏俄外交政策的需要，使共产国际，苏俄发生重大策略的转变。

但是如何如建立国共的合作呢？他从国共两党的状况，从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中，认为国共联合的形式，必须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从两党情况看：国民党是中国最大的政党，其领袖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因而是国民革命的主力。但是它组织涣散，成分复杂。“松散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33]而共产党力量比较单薄，历史短暂，参加的人数少，斗争经验不足，而且处在秘密的不公开的地位，在群众中影

响不太大。共产党若要挑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重担，必须联合国民党，直接加入国民党，这样，既可打着它的合法旗帜进行革命斗争，又可以在他松散的组织里发展自己的力量，促进群众运动，利用国民党内左翼改变国民党的策略。同时，孙中山也欢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曾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他，就需要新鲜血液。"而他说的新鲜血液，就是指的共产党。因此，马林向中共提出："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更为方便的门径。"[34]

无可否认，马林在调查了解情况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党派林立，形势复杂，交通闭塞，再加上来华时间不长，免不了产生认识上的偏颇。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工人阶级力量估计过低，甚至对上海的工人运动感到"十分悲观"[35]。认为在上海没有"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认为中共不如称"团体""协会"好，共产党不支持罢工，也不和罢工有联系。[36]相反，到了国民党领导的南方后，"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37]他接着说：国民党的领导者们在广州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罢工的"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可是，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持罢工"[38]在马林的报告中，国民党简直就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工人运动中的主角，而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团体"，似乎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旁观者。

当时马林一方面对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估计不足，另一方面对中国国民党的作用又明显估计过高，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希望与领导权全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他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不应该面向共产党，而应该面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甚至面向宗教组织，如荷属印度的伊斯兰教同盟那样，按照他的意见在中国应该依靠国民党。"[39]

注释：

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188页。

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188页。

③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④同上。

⑤同上。



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247页。

⑦《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252页。

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20页。

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20页。

⑩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⑪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⑫同上。

⑬同上。

⑭同上。

⑮同上。

⑯同上。

⑰同上。

⑱同上。

⑲同上。

⑳同上。

㉑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㉒罗章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㉓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㉔《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㉕刘仁静：《我回忆中的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㉖《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㉗同上。

㉘伊罗生：《与斯雷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㉙尚明轩：《孙中山传》，第111页~112页。

㉚道夫·宾：《斯雷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㉛伊罗生：《与斯雷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

民出版社。

㉜同上。

㉝同上。

㉞《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㉟《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㊱《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㊲同上。

㊳同上。

㊴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台北，1963年，第61~64页。



共产党对国民党改组提出意见

1923年9月末，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负责人。

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立即受到了孙中山热情的欢迎。鲍罗廷事后曾详细地描述会见时的情景："孙中山十分热情地欢迎我，让我和他坐在一块，并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达数秒钟之久。我转达了莫斯科以及政治代表加拉罕同志对于他的问候和祝愿，我还补充说，加拉罕期待着在最近的、适当有利的时机和他会晤。然后，我简要地向他说明了我来广州的任务，并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全国、特别是广东形势的问题。……他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如果他能够在中国中部和内蒙古驻足，他就可以十分自由地和帝国主义打交道。至于中国中部的局势，一切问题都取决于他的军队北伐运动的成功。他还在等待着他派赴莫斯科的代表所取得的谈判的结果。很明显，他期待着在莫斯科的这些谈判能够取得丰硕成果。"①

10月9日~11日，鲍罗廷与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员瞿秋白、谭平山、阮啸仙等人一起研究了改组国民党的计划。

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借重他的组织经验，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说："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罗廷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通知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②

鲍罗廷到广州后，马上着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和国民党改组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看法，10月19日，在接见觉悟社记者时明确指出：国民党是中国的一种革命势力，但"该党现尚未自觉其自己之力量，及未组织完备，以完成其历史的职务"。他表示相信"其不久即能自觉，必能组织完备"。他说："孙先生之经验，将能供给彼党之所缺，其所缺者何？军事精神，及国民的组织者二是也。中国国民党主义之精神，将更为之增势。"③

鲍罗廷在倾听了国民党领导人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意见后，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在国民党改组前修改党章，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纲，力求取得必须按照党纲改组国民党的一致意见。

二、制定国民党党章。

三、在广州和在第二中心上海组织党的坚强团结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

四、尽快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派出最优秀最积极的国民党员在广州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五、在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必须使每一个代表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样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4]

鲍罗廷在中国南方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他的工作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参酌俄共的经验来帮助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第二是使国共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即促成国民党容共。第三是鼓励国民党从事'反帝'的斗争。"[5]

鲍罗廷由于工作出色，很快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国民党改组法及党纲、党章等重要文件，皆由鲍罗廷起草，孙中山审定。1923 年 12 月，鲍罗廷写道："现在我同孙中山的关系已至如此地步，我可以同他十分坦率地谈论他的种种事务。我已在国民党改组这件事情上向他证明了我们的打算，并给了他极重要的支持。"[6]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24 年 2 月 16 日，孙中山致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做出贡献的鲍罗廷同志表示深深感谢"。[7]孙中山在信中还说：鲍罗廷"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情。"[8]

鲍罗廷来中国后不久，维经斯基于 1923 年 11 月初再度来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他路过北京时，曾约张国焘在华俄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斯列帕克家里会谈。针对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思想倾向，维经斯基反复说明共产国际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左派，反对国民党中的不革命分子。

国民党的改组面临一些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进行党的组织整顿、制定党的组织原则等实际问题，而且也涉及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明确与

共产党人合作的政治基础等理论问题。可是，直到1923年下半年，国民党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果没有一个包括反帝反封建等内容的民主革命纲领，国民党的改组就必然徒具形式，国共合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制定一个能为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革命纲领，使国共两党在新的战斗纲领的指引下共同奋斗，是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也是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共产国际给了孙中山宝贵的帮助。

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⑨]它指出了国民党过去在进行反封建斗争中存在的问题，说明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必要性，号召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同朝鲜、日本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同时，它还就如何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详细阐述了共产国际的观点。

这个决议全文共8条：

决议的第一条指出：国民党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政党，他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目前正经历着建立组织和聚集力量的阶段”。1911年国民党曾“酝酿和发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但它并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而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

决议的第二条肯定了“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

在决议的三四五条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如何解释中国革命发展新阶段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这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义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全部含义是：“既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不致遭受本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最后，共产国际建议国

民党，“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

至于民权主义，则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来看待，必须看作是中国当前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它应当为中国劳动群众服务。决议提醒国民党，应当注意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绝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

关于民生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应当解释为外国商行、企业、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因为只有这样“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反响”。决议认为，民生主义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应该提出土地归劳动者所有的口号，并规定废除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同时，“国家还应当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应当大力帮助农民解决灌溉、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开发荒地等问题。”

决议的第六条提醒国民党，注意到正在革命中发展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希望国民党认识到支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它强调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必然的应该“在统一国家和争取中国独立的反帝运动中，起到自己一份重大的作用。”因此，应该“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

决议的第七条肯定了国民党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

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这个决议的第八条中建议国民党，把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利用侵华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更好地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同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时，使中国的解放运动同朝鲜及日本工人、农民的斗争发生接触，建立联系。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给了孙中山热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向导》周刊在这个时期不断发表文章，对孙中山幻想利用军阀力量，忽视民众力量，企图以联络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的错误，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同时建议他依靠民众，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



人诚恳地向孙中山指出："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在革命"，所以国民党应当"大力宣传民众，大力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万不宜苟且以上当"，"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1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蓬勃开展，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和群众基础。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出现的持续13个月之久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30万以上。特别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佩孚以沉重打击。这一形势使孙中山看到了工人力量，影响他从依靠军阀打军阀，转变为依靠民众进行国民革命。他决心改组国民党，向民众大开党门，吸收新生力量，扩大党的势力。

从孙中山筹备国民党改组时起，中国共产党就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既有对共产国际决议的支持，也有对自己意愿的表达。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负责人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孙中山委派他担任负有"辅助总理"这一责任的重要职务。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改组活动，既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帮助，也说明了孙中山实行联共政策的诚意。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建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帮助。这个决议对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阐述的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

注释：

①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186页。

②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548页。

③《文明国开化退步国》，《向导》第45期，1923年11月9日。

④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7页。

⑤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香港1954年版，第27页。

⑥卡尔图诺娃：《孙中山与俄国顾问（据 1923～1924 年文献）》，齐赫文斯基主编，《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1866～1966）纪念文集（论文、文献、回忆录）》，莫斯科 1966 年版，第 181 页。

⑦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 页。

⑧同上。

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1～83 页。

⑩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周刊第 1 期（1922 年 9 月），第 56 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国共合作作出决议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贯彻争取群众大多数的策略的经验教训，重申了争取群众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由陈独秀、刘仁静、王俊组成，陈独秀代表党组织，刘仁静代表青年团，王俊代表工人组织。瞿秋白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会。为了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作了周密的工作。陈独秀在分别通知了王俊、刘仁静之后，3人"化装成商人，穿上长袍马褂，" "先乘火车到奉天（即沈阳），再换车到哈尔滨，然后在苏联人的帮助下转车到满洲里，并在那里坐上苏联人安排好的马拉爬犁（即雪橇）越过边境"，[①]进入西伯利亚，在赤塔滞留一段时间之后乘火车前往莫斯科。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之下召开的，它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列宁在致大会的贺词中指出，共产国际当前"主要任务仍然是争取大多数工人。这个任务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②]大会期间，列宁在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报告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仁静在回忆列宁的报告时这样写道："这个报告具有特殊的感人力量，以致五六十年后的今天，听这个报告的生动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得那一天我们急切地挤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在中排，虽不算靠前，但离讲坛也不远）。当我们终于看到列宁在几个人的保护与照顾之下走进来时，会场立即沸腾起来。大家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不约而同地唱国际歌。各种语言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列宁当时是用德文报告的。我听不懂……使人感到浑身是劲。"[③]

大会讨论了团结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方针，通过了关于策略问题提纲。

这个提纲批评来自“左”、“右”两方面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歪曲，明确指出，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反对资产阶级，需要团结一切工人共同斗争。

会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从理论上和战略上深入研究了反帝民族解放运动问题。这次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二大以来在东方取得的一系列实际工作经验，研究了具体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这次大会也详尽阐述了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政策，并特别地指出到了“必须正确理解民族革命运动同工人争取社会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同国际无产阶级联盟，被帝国主义奴役的远东劳动群众才能赢得自己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这个提纲规定了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当遵循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是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历史文献。提纲指出：“一切民族革命运动共同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民族统一和取得国家独立。要想真正地彻底地解决这项任务，就要看到这个民族运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广大劳动群众吸引到自己的行列中来，为此，这个运动就要切断同反动封建分子的一切联系，并在自己的纲领中体现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要求。”[5]同时提纲也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清楚地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体现本民族要求国家独立的代表人物，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因此，它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与此同时，它也没有忽略这一点，即只有彻底的、吸收最广大群众参与斗争的革命路线，只有同一切为了保持其阶级统治而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人物无条件的决裂，才能引导被压迫群众取得胜利。”[6]提纲在谈到反帝统一战线时明确指出：“如果说在西方，在有组织地积蓄革命力量的过渡时期，曾经提出过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那么现在，在殖民地东方，就必须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口号之所以适宜，是由于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斗争，而这种情势要求把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7]同时告诫东方被压迫国家的共产党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首先在整个反帝战线中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只有承认它的这种独立的作用，并保持它在政治上的完全自主，才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8]提纲认为，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面前的双重任务是：一方面，“他们要力争最彻底地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以求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内的种种矛盾，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特殊阶级利益而斗争”。同时，共产



党和工人党还应“提出一些社会要求，借以激励和策动那些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张中找不到出路的革命力量”。[9]提纲提醒殖民地的共产党：“如果借口‘维护’独自的阶级利益，而拒绝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最坏不过的一种机会主义，这只能破坏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声誉。”[10]提纲告诉东方各国的共产党，“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其残余的要求。”[11]提纲还要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坚决依靠苏俄这个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支柱”[12]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支援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大会指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需要执行的两项任务：一、建立代表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核心——共产党。二、全力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队，并在民族运动的范围内唤起和加强社会运动。在这次会议上，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被明确地提出了，并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问题。大会对制订共产党人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战略和策略作出了新的重要的贡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决议中得到了贯彻。

共产国际当时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拉狄克在谈到中国问题时，对共产党人说：“不要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他说：“你们必须懂得，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13]

1923 年 1 月 10 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中国的情况，共产国际再次肯定了他在中国的工作。1923 年 1 月 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库西宁签署了“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成员”的“委任状”。[14]1 月 12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柯拉洛夫根据 1 月 10 日主席团会议的决定，签署了任命事项，其中第七项直接与马林有关：“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东方部海参崴局第三号人物”，主席团要求马林和维经斯基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下一次代表大会”。[15]

共产国际远东局（海参崴局）是为开展中国、日本、朝鲜的革命运动而设立的。它的任务是：向这 3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会提出建议；向共产国

际执委会提供有关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概况和运动形势的报告；在这些国家发生重要事件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决议；在出版工作和政治运动方面给予指示；在日本和中国的运动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是革命工会归于赤色职工国际的领导之下；领导这些国家的青年和妇女运动等。[16]该局由片山潜、维经斯基和马林3人组成。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使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东方问题总纲领》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条件，共产国际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共7条：

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他既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五、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

六、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7]

这个决议指出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同国民党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对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清除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是这个决议的主导方面。与此同时，这个决议还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应当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国民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勾搭行为，这对于国共合作建立后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右倾思想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个决议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表现在它一方面对国民党的估计偏高，在分析国民党的情况时，只看到国民党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没有看到其中还存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南方军阀官僚的代表人物；再强调国民党是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时，对它存在的妥协性的一面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决议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应该给予肯定。

上述两个文件，标志着共产国际经过一番探索之后采纳了马林的建议，决议联合孙中山，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最终形成了。

注释：

①刘仁静：《回忆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党史研究资料》第 3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90 页。

②列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375 页。

③刘仁静：《回忆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党史研究资料》第 3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93 ~ 194 页。

④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495/154/170。转引自索波列夫等著，《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72 ~ 173 页。

⑤《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 ~ 1928）》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67 页。

⑥同上，第 67 ~ 68 页。

⑦《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 ~ 1928）》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72 页。

⑧同上，第 72 ~ 73 页。

⑨同上，第71～72页。

⑩同上，第71页。

⑪同上，第69页。

⑫同上，第74页。

⑬《拉狄克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4页。

⑭《马林档案》，第3012号，杨云若：《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第10页。

⑮同上书，第3035号，同上。

⑯同上书，第3033号，同上。

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80页。



马林向共产国际报告国共两党合作问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贯主张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革命分子结盟，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排斥其他党派的方针是不妥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争取群众大多数的决议，促使马林进一步去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各党派的情况。为了邀请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团体国民党派代表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进一步了解国民党的基本政治倾向和阶级基础，马林亲自同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了联络和接触，并于 1921 年冬起程去华南访问。

马林在 1922 年初结束了华南之行，于 2 月 3 日离开广州，途经广东汕头等地，于 3 月 7 日抵沪。3 月 19 日，马林离沪北上，3 月 22 日到达北京。到京后，马林向苏联驻华使团团长裴克斯提交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情况；另一份是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建议派一位使者到中国南方来。这时，由于远东共和国优林使团同北京政府谈判的失败和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苏俄和共产国际加强了同孙中山的联系。

马林这次华南之行，直接了解了孙中山和陈炯明，分别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同时，他还间接了解了吴佩孚。通过这些直接和间接的考察和了解，马林对孙中山、陈炯明和吴佩孚有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

马林在华南的考察结束后，对孙中山及其他领导的国民党的印象是这样的：

第一，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的组织。它的主要成员有：1. 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大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中的一部分人在日本或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2. 华侨，他们“是国民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希望有这个党来统一中国，建立法律和秩序，消除长期军阀战争带来

的分裂，保卫国家独立，免受外国统治，他们“还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3. 南方军队中的士兵，他们生活在逆境之中，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尽管有一些将军反对士兵参加政治组织，但参加国民党的不在少数。4. 工人，孙中山长期和他们有接触，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中，国民党的领导者们在广州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①]马林认为，“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②]也就是在国民党内部有可能推行共产党的思想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

第二，国民党是在驱除清王朝之后建立的，这个党所通过的纲领只有3项主张，即：中国的完整和独立，民主的政府形式以及所有中国人应有的生存权利。[③]这样，国民党的党纲便是“使得这些各种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进去，它主要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④]

第三，孙中山及国民党部分领导人都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有好几个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的组织表示极大的兴趣。孙中山甚至宣称他“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前些时候，孙中山的三位助手，在广州出版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杂志（月刊），这件工作只是在筹办北伐时才被打断”。[⑤]

第四，孙中山反对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侵略远东弱小民族的华盛顿会议，认为这个会议使中国处于空前不幸之地位，因而他没有派代表去华盛顿。

第五，当时孙中山正在组织北伐，以进攻北方腐朽的军阀、政客。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而奋斗，是一位“着眼全国的民族主义者”。[⑥]

第六，宣传工作远不够有力，这是国民党的弱点之一。各大国对中国政治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对他们的恐惧是国民党不敢大力进行宣传的原因。此外，国民党在北方的工作很差，甚至在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没有自己的组织。[⑦]

通过对孙中山的直接接触和对国民党的全面考察，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联盟’”；[⑧]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比“甘地更有战斗力”。[⑨]

马林在广州期间还同陈炯明长谈过3次。通过多方调查和同他的接触，马林对陈炯明得出了这样的印象：

第一，陈炯明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对全国来说是不可能的；他还认为国民党的活动只应限于广东省内，并反对孙

中山当选为大元帅。马林觉得陈炯明不如孙中山，他说："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于广东"。[10]

第二，陈炯明过去在福建作为革命军队将领时虽曾表示完全站在俄国革命方面，并在口头上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并没有把任何有关社会主义的改革付诸实施，也没有任何表明社会主义政策的措施，只是热衷于在有3 000万居民的广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他渐渐向右转"了。[11]

第三，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合作，同情吴佩孚的政策。他虽然在南方拥有最强的军队，但不愿为北伐负责，拒绝与北伐有任何关系，反对孙中山北伐，孙中山的态度十分消极。

基于上述的认识和了解，马林认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对于吴佩孚，马林已认识到他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12]是孙中山的主要敌人，他并不懂多少政治。马林断言，吴佩孚"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祸害"，他"不会加入中国革命的国民运动，他决计不能对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有所贡献"。[13]

马林在中国南方访问期间，通过对中国政治局势的调查研究和对各个派系力量的考察分析，认为中国开展民族民主运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不是陈炯明，也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他说：在华南访问的这一段经历，使"我对于国民党的地位和可能性有一个十分美好的印象，海员罢工事件，对罢工的支持，对我当时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4]从华南访问回来后，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人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到国民党中去宣传革命思想，促使他们重视群众运动，并通过国民党组织接近和联系群众，和国民党人一道共同开展反帝斗争。这样，马林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可以合作对象，提出了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国民革命的主张。马林之所以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在印尼的工作经验起了重要的作用。

马林曾于1913年被派往荷兰殖民地爪哇工作。第二年，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在他的帮助下正式成立。1916年，马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成功地使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同当地的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合作。当时，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是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尽管它使用的是宗教名称，却具有阶级性，其矛头对准欧洲糖厂主对爪哇工人的剥削。[15]他们把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列入纲领，不仅直接

反对殖民政府，而且也反对爪哇的贵族。[16]这个群众组织有一个左翼，集中在三宝垄。马林领导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与伊斯兰教联盟合作。在合作过程中，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员可以不放弃自己党员的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而伊斯兰教联盟的成员也可以保留自己的联盟加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进行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强烈的支持，爪哇的社会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日益开展，影响日益扩大。同时，“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以惊人的速度渗进伊斯兰教联盟委员会的最里层。”[17]

马林在印尼采取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同伊斯兰教联盟合作的经验，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介绍，并为大会所指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驻华代表，到中国执行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同他在殖民地国家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具有一定的经验有关。

1922 年 3 月 29 日马林离京赴沪，4 月 2 日回到上海。到沪后，他分别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酝酿国共合作问题。

马林与国民党领导人谈话的结果是国民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马林在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谈中，一再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到国民党中进行政治活动”。他认为“通过这一切，会获得同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不过“同志们必须同意他们在国民党中所采取的策略”。[18]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只希望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对马林提出的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建议表示坚决反对。

1922 年 4 月 6 日，陈独秀致书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陈述了反对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的 6 点理由：

第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第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第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第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中山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第五，国民党孙中山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第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陈独秀在信中要求维经斯基当共产国际讨论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时，代为陈述上面的6点理由。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正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还没有确立自己的策略原则。在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的心目中，国民党是一个"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只不过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客集团，对这么"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的国民党，认为并不是甚么可靠的联合对象"。[19]这样，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马林同中共中央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马林感到一时难以说服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便决定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示汇报，以寻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支持。

4月24日，马林乘日轮"鹿岛丸"离开上海，绕道新加坡、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等地，于7月上旬抵达莫斯科。7月11日，马林在莫斯科完成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并于7月17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这份报告。马林在报告中根据自己对中国情况的观察和认识，详细而具体地陈述了中国政治局势，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况，明确指出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

马林在报告中指出，由于华北华中一带为军阀所统治，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和年轻的工人运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马林在报告中还说，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联系，"在今年正月海员罢工期间，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多么紧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国民党与罢工工人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在广州、香港、汕头三地竟有一万两千名海员加入国民党。"[20]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会员的报告中直率地指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他认为国民党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讲到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不要对国民党采取排斥的态度，应该同国民党人合作，而合作的途径就是"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也就是把他在印尼取得的经验拿到中国来运用。由于国民党领导人说过，"他们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马林认为，"党内合作"的办法在中国是可行的。他警告说，只要中

国共产党不愿与国民党联合，那么它的“前景是暗淡的”。[21]此外，他还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在那里公开进行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高度评价了马林的报告。在1922年7月25日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上登载了题为《来自国际：七月十七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的报导，提到了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报告。这篇报道说：“马林同志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他在那里呆了一年半，是最近才回来的），通过透彻的研究，他对这个大国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22]马林在同年9月2日给他的妻子的信中也提到他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他在信中说“我很幸运，在我抵达后不到一周，执委会就开会了。我向会议作了报告。这次会议后一天，主席团开会并对有关我的事作出决定……”[23]

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对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的这个报告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作用，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可能发挥的作用则估计不足。他在报告中说到：在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的上海，他“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24]因为在那里并没有他“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他只是到了国民党领导的南方后，“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25]他说：国民党的领导者们在广州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罢工的“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可是，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持罢工”。[26]在马林的报告中，国民党简直是工人利益的代表者，是工人运动中的主角，而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团体”，似乎是工人运动中一个多余的旁观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3年后，伊罗生于1935年8月19日在阿姆斯特丹访问了马林。马林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时，“中共领导人以北京为中心开始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陈独秀在北京的组织与汉口的铁路工人总部有密切的联系。”[27]他还承认，在他于1921年12月离开上海后的三个月中，“共产党人已经和上海工厂工人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28]可是，马林当时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却只字没提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所取得的这些“惊人成果”，却说他对“中国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感到“十分悲观”。[29]当时，马林一方面对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估计不足，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作用估计过高，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认为



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主要面向小资产阶级分子、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和中国南方的士兵。马林的这种估计显然脱离了国民党的实际情况。他虽然看到了国民党包含有工人成分，却忽视了国民党内同时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改组前的国民党虽然包含各阶层的人士，但主体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其阶级性而言，他并不是什么“各阶级联合的党”，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谈到马林时说：“他认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不应该面向共产党，而应该面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甚至面向宗教组织，如荷属印度的伊斯兰教同盟那样。按照他的意见，在中国应该依靠国民党。”[30]马林的这种看法，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注释:

①《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16 页。

②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6 页。

③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个人印象点滴》，《“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 1084 年版，第 141 页。

④《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 页。

⑤《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 页。

⑥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个人印象点滴》，《“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 1084 年版，第 143 页。

⑦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个人印象点滴》，《“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 1084 年版，第 142 页。

⑧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9 页。

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

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5 页。

⑩同上书，第 23 页。

⑪《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9 页。

⑫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 页。

⑬马林：《吴佩孚与国民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9、160 页。

⑭《马林致廖仲恺函》（1923 年 7 月 21 日），《马林档案》第 3085 号，转引自杨云若：《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通讯》1987 年第 2 期，第 6 页。

⑮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6 页。

⑯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 页。

⑰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3 页。

⑱《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 页。

⑲包惠僧：《回忆马林》，《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3 页。

⑳《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17 页。

㉑同上书，第 21 页。

㉒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答复》，《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5 页。

㉓同上书，第 64 页。

㉔《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 页。

㉕同上。

㉖同上书，第 16 页。

㉗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5 页。

㉘同上。

㉙《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 页。

㉚达林：《中国回忆录（1919～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6 页。

张国焘与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主联合战线”方针的提出，表明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思想有了重大发展。但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不同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外联合”。因此，中国共产党打算同国民党建立的这种“党外联合”方式的合作，在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

当时，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国共合作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只有采取共产党员一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因为孙中山只同意这种形式的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是松懈的，在民主主义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①因而马林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以及他自己在印尼多年工作的经验，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发出指示，认为“共产党人为完成他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③这表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马林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

1922年8月，马林从莫斯科回到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闭幕，对会上作出的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定，马林认为是空洞的、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他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

为了统一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认识，1922年8月29～30日，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和高君宇7人，这次为时两天的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对这一问题，马林是有顾虑的。

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并坚决主张中共党



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国共同一战线。在他看来，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都很小，国民党是中国一个有力量的革命政党，而孙中山又只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同意国共平行合作，因而实行国共“党内合作”是必要的。他力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要学习西欧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以实现联合战线的经验，要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李大钊等人基本上同意“党内合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加入国民党，最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既定政策，避免与马林及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

张国焘等人反对“党内合作”，认为这样做势必混合阶级组织和牵制党的独立性。

陈独秀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但必须向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本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否则，他要坚决反对。

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马林的说服，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开始将难以实现的国共“党外联合”的设想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党内合作”的政策了。

杭州西湖特别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④

早在1922年4月，马林就曾同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提出过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的问题，遭到了拒绝。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吴廷康（即维经斯基）的信就是明证。对此，马林印象深刻，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他就写到：“我曾向我们的同志建议他们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活动，……但我们的同志反对这种意见。”⑤但这次不同，马林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接受了他的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并对中共下达了最高指令。因此，马林对这次会议充满信心，他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一、中国现在是，而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为期更远。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还很小，产业工人只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二、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

久，人数很少，不过是个俱乐部，而且内部时常发生纠纷。所以，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持一种悲观的看法。三、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他说，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的党纲允许“各种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进去”。而且国民党“与罢工工人之间联系紧密”，[6]支持海员大罢工。相反，在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很少和工人接触，还只能进行秘密活动。因此，马林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可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四、他指出在爪哇的成功实践是国共党内合作的重要依据。

对此，张国焘表示强烈反对。他指出：第一，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信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不相容的。两个主义不同的政党混合在一起，要么产生纠纷，要么共产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第二，国民党封建意识很浓，党员要宣誓效忠孙中山，而且入党还需打手模，这是共产党员万不能容许的。第三，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热衷于军事运动，只知道联合这派军阀打倒那派军阀，并不注意组织和宣传工作。他还针对马林“党外合作”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7]的批评，阐述了国共两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的切实可行性，具体为：国共结成联合战线后，可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举孙中山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可比共产党的人数多一倍左右。这样既照顾到了德高望重的孙中山和他的党，又不使共产党受制于人。同时他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重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由此可见，他强烈主张党外联合战线形式，是因为这种形式一可以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二可以更易于争取国民党以外的群众来扩大自身的影响。

张国焘的主张得到了蔡和森的支持和陈独秀的赞同。西湖会议上，李大钊虽以调和的办法暂时结束了张、马间的争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两者的分歧。[8]

张、马两人争论的焦点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问题。张国焘主张党外联合的方式。这种主张基本源于中共“二大”《关于“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案》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能是联合与援助，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另一方面应该集合在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9]因此，他坚决反对马



林的党内合作形式，认为那将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混合，取消中共的独立。而马林则从其爪哇的成功经验出发，热衷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而且马林又亲临中国做了实地考察，越发坚信自己的主张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另一方面，也可透视出两者争论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上存在巨大分歧。张国焘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马林则认为它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其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对中共，马林认为在产业如此落后，连资产阶级尚未完全发展的中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为的制造物，不具备一个独立政党的资格。张国焘则不然，他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完全清楚党成长的历程。虽然党目前人数较少，但精干而团结，必将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10]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问题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

张国焘等人虽然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但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张国焘说：“中国的劳动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都还太年轻，太软弱，目前中国只能开展国民运动，国民运动是中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这些我们都同意。”但是，他接着又问道：“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吗？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存在吗？中国的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吗？”这些就是他们“所怀疑之点”。[11]张国焘认为，“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它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必须予以改组”。在他看来“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12]他主张，“在国民党还没有进行改组”、“仍然集中力量于军事行动和组织政府”时，“我们共产党一方面要作为一个独立地对我们关于中国目前时局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的组织而存在，另一方面，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的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13]由于张国焘认为“国民党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因而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任务“只能说为国民革命创立某种基础，从而为其打开新的局面，然后再把各种不同因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的国民运动”。[14]这在实际上是认为国民党不能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反对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

与上述意见相反，马林和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然是资产

阶级革命，就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不必同时进行共产党的工作。目前在中国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阶级觉悟提高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15]

张国焘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是正确的，但把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放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民主革命中来，就是一种“左”的倾向；而马林认为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进行国民革命，就要求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凡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归国民党，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则是一种右的倾向。[16]两者看似矛盾重重，实质其思想根源是一致的，都是否认无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把国民党看成是人家的，不懂得与资产阶级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历史证明，正是马林的这种错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进而贻害整个大革命时期，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17]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1927 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18]

注释：

①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8 页。

②同上书，第 26 页。

③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答复》，同上书，第 65 页。

④《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国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70 页。

⑤《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⑥同上，第 11 ~21 页。

⑦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⑧宋海琼：《根源一致的矛盾——马林与张国焘的两次争论》，《党史纵横》第3期，2001年，第13页。

⑨同上。

⑩宋海琼：《根源一致的矛盾——马林与张国焘的两次争论》，《党史纵横》第3期，2001年，第14页。

⑪《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⑫同上书，第222页。

⑬同上书，第223页。

⑭同上书，第223~224页。

⑮《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221页。

⑯宋海琼：《根源一致的矛盾——马林与张国焘的两次争论》，《党史纵横》第3期，2001年，第14页。

⑰同上。

⑱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共产国际的一月指示

1922年下半年，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各种革命势力在内的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马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后的第二天即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便作出一项这样的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菲利普同志（斯内夫利特）紧密联系下进行。"[①]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8月作出了《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南代表的指示》，表达了共产国际希望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合作，建立国共统一战线。

但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党内合作。1922年4月初，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上海与中共中央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马林建议中共党员直接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政治活动，并介绍他在爪哇经历过的使共产党人参加伊斯兰教联盟的经验。这时，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只同意国共党外合作，坚决不同意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由是：党内合作会模糊阶级界限，妨碍党的独立政策的执行。由于和马林意见不一致，陈独秀在1922年4月6日写信给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陈述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六点理由。6月30日，陈独秀再次写信给维经斯基，重申反对党内合作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自二大以后也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统一战线，而是对组成中国统一战线的方式，即参加国民党的做法，有很大的顾忌。在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上虽由马林强迫通过了决议，但是并没有根本消除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同志的顾忌。虽然陈独秀接受了党内合作的意见。但对马林的建议提出了一个修正，要求国民党取消打手模、忠于个人的誓词，共产党员得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率先加入国民党。

不久，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重新提出："国民党是什么？"陈独秀认为，从国民党的历史来看，国民党是一个革命政党，它不代表一定的阶



级，而代表民族运动。根据他的分析，国民党有一半党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华侨和广州工人占12% ~13%，小资本家和失业工人占10%。国民党为什么会是一个成分这样复杂的党派呢？按照陈氏的观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代表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不易发达；二、是国人思想进步落后，至今尚在封建时代，而外来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输入，思想界顿时呈现出复杂的状况，中国国民党正是这种复杂状况具体的表现。“我希望”，陈独秀在文章结尾说：“国民党党员和他党党员，赞成国民党和反对国民党或批评国民党的人，都不可忽视了这一点。”[②]后来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回忆此事，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③]可见当时陈独秀是很勉强的。

与此同时，1922年9月，马林在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运动》。文章说，国民党的纲领可以把中国人中的不同党派组织到这党里来。但与陈独秀的观点相反，马林认为：“中国民族革命的推动力量，不是同外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在外国殖民地流亡的中国人，他们几乎都出身于中国的南方省”。[④]马林随后说，南方的领袖在向群众宣传时，他们的宣传总是或多或少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国民党的特殊性质使它在宣传中没有收到自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阻止”。[⑤]关于中国的统一战线，马林接着说：“对于无产阶级刚刚在最低程度上发展的中国来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有通过我们对南方革命民族主义分子的真正支持才能实现。我们的任务是尽量把这些革命民族主义分子团结在一起，推动整个运动向左发展”。[⑥]

马林于1922年又再次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

这时，苏俄代表越飞同北京政府的谈判已持续4个月之久。他们在中东路等问题上分歧较大，无法达成协议，越飞深感焦虑。这个时期，越飞同马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看法基本相同。于是，他们共同起草了《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提纲。这份提纲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要开展纯粹是共产国际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内，阶级分化尚未进行，不适合开展纯粹的共产党的活动”。因此，党的活动必须无条件地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而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马林与越飞认为，如果仅从共产国际工作考虑而不同俄国的外交政策相协调，就不可能发展壮大。因此，苏俄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

明确遵循友好和反帝的原则。提纲最后强调，为帮助中国统一，必须使中国最大的和真正的政党国民党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苏俄的帮助只能给予国民党”。[7]

为了向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陈述他们对当前中国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马林于1922年12月下旬带着这份提纲再次返回莫斯科，一方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工作，“为继续执行八月策略而辩护”；[8]另方面，受越飞的嘱托同苏俄领导人讨论了中东铁路问题。

同时在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他准备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的提纲手稿内容。马林写道：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必须让共产党自由开展工作，有一种独立的政治周报，经常批评国民党并努力促进国民党加强反帝活动。马林还提出了在代表大会上同国民党讨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必要性。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在通过的《东方问题提纲》中指出：在“现有的条件下，西方所提出的口号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但在殖民地的东方，目前所必须强调的口号，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这个口号之所以有利，是东方还需要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一场长时期和持久的斗争，而这种形势则又要求将一切革命因素都动员起来。”这个提纲对于指导整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斗争，对于指导整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分子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本国内的封建残余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

1923年1月10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中国情况的报告。共产国际再次肯定了他在中国的工作。1923年1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库西宁签署了“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成员”的“委任状”。[9]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柯拉洛夫根据1月10日主席团会议的决定，签署了任命事项，其中第七项直接与马林有关：“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东方部海参崴局第三号人物”，主席团要求马林和维经斯基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下一次代表大会”。[10]

共产国际远东局（海参崴局）是为开展中国、日本、朝鲜的革命运动而设立的。它的任务是：向这3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会提出建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有关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概况和运动形势的报告；在这些国家发生重要事件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决议；在出版工作和政治运动方面给予

指示；在日本和中国的运动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是革命工会归于赤色职工国际的领导之下；领导这些国家的青年和妇女运动等。[11]该局由片山潜、维经斯基和马林3人组成。正式任命他为驻海参崴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第三把手。主席团还决定马林和维经斯基都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马林重返北京。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使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东方问题总提纲》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条件，共产国际于1923年1月12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开会，通过一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这就是共产国际的“一月指示”。

《决议》首先确定了国民党的性质：它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第二，《决议》指出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是由中国革命任务和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力量所决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在此情况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必要的，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也是适宜的。

第三，《决议》强调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共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以及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共产党有其重要而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而这一工作，应在共产党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进行，不依赖于其他政治集团。

第四，《决议》明确指示了国共合作后共产党的任务。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绝对不能在这些任务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目标是：一方面把分散的共产主义分子联合成无产阶级的政党，使刚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组织上固定起来；另方面建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反帝统一战线，以便使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共产国际的一月指示，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运用于中国，推

动了国共合作的进程。但是它过分肯定了国民党的作用，过低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这种估计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对陈独秀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林在北京期间，曾与李大钊约集中国共产党北京区的负责人，在苏俄使馆讨论国共两党联合战线问题。当时北京区委的包惠僧、安体诚、何孟雄、张昆弟等参加了会议。大家在会上对两党联合战线的根本观点和方式方法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党内大多数同志还对西湖会议的决定仍心存怀疑。

1923 年的“二七”惨案，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共产党终于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同其他民主力量合作，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胜利，国共合作势在必行。

注释：

①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答复》，《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66 页。

②陈独秀：《国民党是什么?》，《向导》周报第 2 期（1922 年 9 月 20 日），第 16 页。

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第 11 页。

④马林：《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运动》，《共产国际》第 22 期（1922 年 9 月 13 日），第 51 页。

⑤同上，第 52 页。

⑥马林：《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运动》，《共产国际》第 22 期（1922 年 9 月 13 日），第 55 页。

⑦《马林档案》，第 3116 号，杨云若，《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当时通讯》1987 年第 2 期，第 10 页。

⑧《马林档案》，第 3066 号，杨云若，《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通讯》1987 年第 2 期，第 10 页。

⑨《马林档案》，第 3012 号，杨云若，《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通讯》1987 年第 2 期，第 10 页。

⑩《马林档案》，第 3035 号，杨云若，《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通讯》1987 年第 2 期，第 10 页。

⑪《马林档案》，第 3033 号，杨云若，《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通讯》1987 年第 2 期，第 10 页。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俄立即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反扑。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绞杀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①]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生的政权，确保苏俄远东的安全，与中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就成为苏俄政府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②]

苏俄政府为此采取了积极的行动。1919 年 7 月 25 日和 1920 年 9 月 27 日，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又称“加拉罕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并表示希望与中国政府建交。[③]在此期间，虽然孙中山已与列宁、齐契林有了电信往来，并表示了对苏俄政府的友好情谊，但苏俄政府并没有十分看重孙中山及南方政府。因为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是力量雄厚的实力派，控制着北京政府。他为了收买人心，打起了“保护劳工”的旗号。由于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他反对段祺瑞及其后台日本帝国主义，于是编取了“爱国将军”的称号。据马林说，在孙中山与吴佩孚之间，苏俄领导人认为，“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因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④]

为了适应对华外交的需要，1920 年 8 月，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远东共和国派出的优林使团到达北京，同北京政府进行建交谈判。但由于吴佩孚是依靠英美支持的军阀，因而他与苏俄的接近是有限度的，又由于优林使团在谈判中坚持苏俄在中东路的权益，而且苏俄红军未经北京政府的同意就开进外蒙去消灭白匪，驻兵库伦，从而使双方关系不断恶化，优林使团只得于 1921 年 10 月返回远东共和国。1921 年 12 月底，苏俄政府派出的裴克斯使团到达北京，与北京政府继续谈判，但谈判很快又陷入僵局。1922 年 8 月 12 日，接替裴克斯来华工作的越飞抵达北京，与北京政府继续谈判建交问题。谈判持续四个月之久，由于双方在中东路等问题上分歧很大，无法达成

协议。这时，在马林的影响下，越飞开始重视孙中山及其政党，并与孙中山有了书信来往，从而增进了双方的互相了解。促使越飞转变战略，离京南下的关键是1923年初中国南方局势的重大变化：1月4日，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的通电。1月6日，由滇、桂、粤军组成的西路讨伐军进入广州，从而大大提高了孙中山的政治地位。这一变化使越飞认为，目前只有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他向莫斯科报告了自己的打算，并于1月16日动身南下上海。1月18日~26日，越飞同孙中山就互相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谈。[⑤]

在孙中山方面，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使他大为震动，大受鼓舞，他由衷地感叹和赞扬列宁领导的伟大事业是"大改革"、"大破坏大创造之事业"。他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得到苏俄的援助。对于苏俄政府只重视与北京政府的建交谈判，孙中山甚为不安和失望。他希望苏俄政府能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广州方面来。但是尽管如此，孙中山当时仍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他希望联俄，以效法其榜样，获取其援助；又惧怕列强对他的干涉与破坏。所以，当马林在1921年力促孙中山国民党与苏俄结盟时，孙中山则认为"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⑥]自马林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又与孙中山有过多次接触，孙中山虽然表示了与苏俄结盟的愿望。但却担心近在咫尺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的反对和干涉，仍然举棋不定。[⑦]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为孙中山决心联俄提供了一个契机。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十分沉重，他痛感国民党内缺乏严格的组织，忽视主义的宣传，成分复杂，人格不齐，下决心改组国民党。他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⑧]下决心学习俄国和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使孙中山迈出了联俄的决定性一步。在马林的积极促进下，孙中山与越飞在双方关系问题上通过书信进行了诚挚的探讨。孙中山对苏俄政府继续寻求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表示了自己的异议，他在给越飞的信中说："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与此同时，孙中山还于12月16日致信列宁，指出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和工具"，"同中国现政府谈判，不仅旷废时日，而且恐怕是冒风险的"，"北京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都可能使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此举乃凶多吉少"。[⑨]他热切地提出："我本人作为我国

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10]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列宁和苏俄政府的重视。越飞于1923年1月16日亲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经过双方谈判后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会谈纪要》，即后来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宣言》内容共有四条，下面就《宣言》内容逐条进行剖析：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和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此条中关于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在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越飞所表达的俄国国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援助的友谊之情，也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宣言》轻视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认为中国的国情不适合于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不符合中国国情。有人认为孙中山如此声明是为了外交上的需要，以免激起列强的疑虑。[11]从孙中山坚持要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点来看，此条并非仅仅是一种外交策略而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必然态度。如果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持否定态度尚有情可原的话，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特使的越飞公开赞同这种观点，就不能不令人费解了。其实，越飞的态度是与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一脉相承的。作为第一个系统地考查了中国南方状况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的意见和报告曾一度是共产国际制定中国政策的重要依据。而马林十分推崇孙中山与国民党。他促使国共党内合作的理由就是：中国只能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工作，中共必须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的斗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他对中共的评价甚低，直到中共"三大"时，他仍认为"至少在五年内，中国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的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12]他甚至认为中共不过是"人为的早产儿"。[13]受马林的影响，共产国际及苏俄党也是看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宣言》将此条公之于众，正是说明了这点。我们姑且承认越飞对此条的首肯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那么他在《宣言》公布后不几天到日本后对陈公博称"中国只能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肯定不能实现共产主义"，[14]这绝不可能是出于策略的需要。

因此，《宣言》第一条是孙中山拒绝共产主义在中国扎根和苏俄党轻视

中国共产党的共同产物。莫斯科在发表此《宣言》时，删去了此条中的第一句，正好说明它也承认此条中的第一句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仰和原则。[15]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因此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文中所谈“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即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在此之前，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声明废除过去沙俄时代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沙俄掠夺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地（包括中东路）全部无偿地归还中国。这份宣言在西伯利亚前线发布之时，宣言中表示要归还中国的那些土地、铁路、矿产及森林均在日本或白俄匪军的控制之下。这样，苏俄政府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不过是一种宣言性的外交文告，并不能付诸行动。由于中国政府对此宣言并未作出积极响应，一年之后，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第二次宣言称：“中俄两政府中，对于经营中东铁路办法中，关于苏俄对于该路之需用，允订专约，将来订此专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得加入”。[16]这样，中东铁路就不像第一次宣言所讲，要无条件、无报酬地归还中国，而是需要另订专门的条约来解决。实际上，第二次对华宣言发表时，苏俄已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白俄匪军的反抗，于是在崭新无私的革命外交中掺杂了利己主义的成分。

此条称孙中山要求重申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还不如说是越飞的主张更为符合实际。因为，第一次宣言是对“中国国民、西南政府和北京政府”作出的；而第二次宣言则是直接呈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排斥了南方政府，也去掉了“中国国民”这个抽象的名词。比较之下，假如孙中山提议重申宣言的话，也只能要求重申承认他的政府存在的第一次宣言。重申第二次宣言表明签署《宣言》的双方在中东路问题上为苏俄政府的讨价还价留了余地。[17]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认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中东铁路西起满洲里，东到绥芬河，自哈尔滨又有一条支线南达大连和旅顺。这条铁路是根据1896年6月沙俄政府逼迫中国政府所签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密约》而修建的。这个条约的第四条规定："为便于俄国陆军到达受威胁地点，并保证其给养供应，中国政府允许建筑一条穿过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道线。""铁路的建筑和经营权应交由华俄道胜银行办理。"[18]1896年9月8日，中国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托姆斯基及该行总办罗特斯泰因在柏林签订了《中东铁路合同》共12款。第12款规定："自该公司路成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所有铁路所得利益，全归该公司专得。如有亏折，该公司亦应自行弥补，中国政府不能作保。八十年限满之日，所有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全归中国政府，勿庸给价。又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可给价收回，按计所用本银并因此路所欠债项并利息，照数偿还。"[19]这是一个破坏中国领土及其他主权而确保沙俄在华单方面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此后，沙俄逼迫中国政府相继订立了《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滨黑铁路借款合同》等，又攫取了中东铁路各支线的路权。1904年日俄战争中，由于俄军战败，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及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将中东铁路长春以南的铁路霸为己有，称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仍由俄国占有。

十月革命后，1918年1月2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波里尼诺甫向当时中国驻俄使馆官员李世中表示，中东路问题较难解决，"拟请中国赎买，亦仿照宽城子长春一路售与日本之方法。又恐中国无此资本，再三筹思，非两方派员合办不可。"[20]同年4月，齐契林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会议上说，中东铁路可以由中国赎买回去，并说苏俄准备把南满支线卖给日本。[21]实际上，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及《孙文越飞宣言》都是秉承此种精神的。马林说过，他在1922年底受越飞所托回莫斯科与苏俄要人布哈林、斯大林等讨论中东铁路问题时，斯大林坚持认为苏俄应保持它在那儿的利益。[22]《宣言》第三条所说的"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毫无疑问，苏俄政府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利己主义立场，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原则相违背的。正是由于这种利己主义立场，才使中俄建交谈判屡次陷入僵局。而《宣言》此条中孙中山对于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权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俄相信孙中山能够履行诺言，

承认了南方政府的合法性，而只是为了用来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事实正如苏俄政府所期待的那样，1924 年 5 月，苏俄政府与北京政府最终达成了协议，双方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规定：中东铁路除商业性质以外的一切事物由中国政府处理，铁路业务由两国共同经营，中国将出资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财产。[23]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妨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24]

外蒙古大片领土毗邻苏俄，这使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苏俄国内战争和外国对苏俄武装干涉的影响。因此，苏俄十分重视外蒙的战略地位，不愿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俄国白匪的反苏基地，也不愿它回归中国[25]。

早在 1919 年 8 月，苏俄在发表告蒙古人民书中，除了宣布放弃沙俄在外蒙所有的特权外，还说"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独立的国家"。[26]同月，列宁在接见外蒙代表团时表示，希望外蒙争取"国家独立和经济自主"，"建立政治的和国家的组织"。[27]1920 年秋，恩琴白匪在外蒙实行血腥恐怖统治。11 月 2 日，外蒙革命党人向共产国际及苏俄红军第五军求助。11 月 11 日和 17 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两次照会北京政府，表示愿意派兵进入外蒙帮助中国剿灭恩琴白匪，"一俟任务完成……即撤出中国领土。"[28]北京当局因怀疑苏俄动机，予以谢绝。1921 年 2 月 20 日和 3 月 4 日，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又两次面谒北京政府外交次长刘次训，建议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出兵外蒙"助剿"，也被北京政府拒绝。

1921 年 3 月 1 日，外蒙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蒙古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与苏俄红军及远东共和国军一起进入外蒙剿灭恩琴匪帮，使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此后，优林与齐契林先后照会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声称："俟匪党削平后，远东军即行撤销"；"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 而北京政府的答复是："事关领土主权，殊难承认。"[29]

6 月 28 日，不顾对外蒙享有主权的中国政府的反对，苏俄和远东共和国擅自派兵进入外蒙剿匪。在苏俄扶持下，7 月 10 日，外蒙宣布独立，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7 月 12 日，外蒙新政府向苏俄提出请求，"在完全消除共同敌人的威胁之前，苏军不要撤离蒙古领土"。齐契林回电表示同意。11



月5日，苏俄与外蒙又签订苏蒙协定13条，规定双方在法律上互相承认为唯一合法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全权外交代表和领事等。[30]

然而，时隔一年之后，《宣言》又摆出一副“公正”的姿态，称苏俄“无意于”外蒙“与中国分立”，甚至声言为了“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这实际上是说俄国军队占领外蒙不仅合法，而且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为什么会对此作出允诺呢？因为在孙中山看来，这并不是卖国，而是为了达到一种目的的策略手段。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取得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他革命斗争的援助，曾多次提出给这些国家以优惠的条件和权利。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为了寻求帮助而采取的灵活的外交策略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有意制造外蒙独立，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则是不应该的。可见，苏俄的对华政策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31]

《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但并不意味着他赞成共产主义，而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这就是从俄国方面获得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援以帮助他进行旨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正是从这一实际需要出发．他在与苏俄接触的同时，仍在寻求英、美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在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同时，仍在寻求反直的张作霖的同情和支持．这就是孙中山——一个把“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32]完美地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宣言》表达了苏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关心和支持。[33]但苏俄并没有摆脱民族利己主义的束缚。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保卫新生的政权，苏俄不仅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而且也需要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支持，并且在极力寻求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它并不因孙中山的反对和《宣言》的签署而放弃对北京政府的争取。[34]《宣言》发表之后不久，1923年9月，苏俄政府派出以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加拉罕率领的代表团到达北京，继续与北京政府谈判，终于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事实表明，苏俄政府以支持孙中山为由使孙中山承认苏俄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有的态度。这说明，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的外交虽然是革命外交，却依然存在着民族利己主义的成分。这种不良因素后来恶性发展为大国强权外交，在中东铁路问题和外蒙问题上给中苏关系留下了不可抹去的

阴影。[35]

但是无论如何，《宣言》的发表，奠定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36]

注释：

①姚金果：《〈孙文越飞宣言〉评析》，《长白学刊》第5期，1994年，第80页。

②同上。

③同上。

④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⑤姚金果：《〈孙文越飞宣言〉评析》，《长白学刊》第5期，1994年，第80～81页。

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台北1955年，第9辑，第1411页。

⑦姚金果：《〈孙文越飞宣言〉评析》，《长白学刊》第5期，1994年，第81页。

⑧《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80～481页。

⑨《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66年第10期，转引自孙钢，《革命先行者的珍贵文献——读新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书信两封》，《人民日报》，1991年3月12日第5版。

⑩《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1922年8月～12月），中央档案馆藏。转引自《人民日报》1991年3月12日第5版。

⑪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49页。

⑫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香港明报月刊社，1971年，第209页。

⑬《斯内夫利特档案》第3065号.

⑭陈公博著，韦慕廷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4页。

⑮姚金果：《〈孙文越飞宣言〉评析》，《长白学刊》第5期，1994年，第81页。

⑯《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



235 页。

⑰姚金果：《〈孙文越飞宣言〉评析》，《长白学刊》第 5 期，1994 年，第 82 页。

⑱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 年中译版，第 103 页。

⑲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1982 年，. 第 672 页。

⑳王建均：《中国外交的序幕：从优休到越飞》，台北，1963 年，第 32 ~33 页。

㉑同上，第 48 ~49 页。

㉒《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56 页。

㉓姚金果：《〈孙文越飞宣言〉评析》，《长白学刊》第 5 期，1994 年，第 83 页。

㉔《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148 页。

㉕姚金果：《〈孙文越飞宣言〉评析》，《长白学刊》第 5 期，1994 年，第 83 页。

㉖阿·恩·赫菲茨：《国内战争年代的苏俄与东北各邻国》，莫斯科，1964 年，第 430 页。

㉗爱伦.S. 维庭：《苏维埃在中国的政策》（1917 ~1924），纽约，1954 年，第 158 ~159 页。

㉘维戈茨基等编：《外交史》中译本第 3 卷（上），三联书店，1973 年，第 311 ~312 页。

㉙《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 10 年，第 103 ~104、107、115 页。

㉚《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 43 ~45 页。

㉛姚金果：《〈孙文越飞宣言〉评析》，《长白学刊》第 5 期，1994 年，第 83 ~84 页。

㉜《近代史研究》第 3 期.，1987 年。

㉝姚金果：《〈孙文越飞宣言〉评析》，《长白学刊》第 5 期，1994 年，第 84 页。

㉞同上。

㉟同上。

㊱张胜男：《开启国共合作的〈孙文越飞宣言〉》，《党史博采》第 2 期，2003 年，第 39 页。

孙中山建立广州根据地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准备用于北伐的部队回师广东，虽被陈炯明击败，但并没被消灭。这支部队随即向东西两面撤退。朱培德率滇军数千人由湖南退到桂林，许崇智率粤军约7 000人由闽赣边界进入福建。

这时，孙中山利用他的政治威望，联络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并确定了集中力量打击陈炯明的策略。为此，许崇智联合福建驻军王永泉部共谋驱逐闽督李厚基。1922年10月中旬，他们占领了福州，接着又占领厦门和漳州。入闽部队经休整和补充，按照孙中山的命令改编为东路讨贼军，分为3个军13个旅，由许崇智任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准备从闽南回师广东，直捣陈炯明的老巢。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派人积极联络和策动在广西境内和驻西江一带的滇、桂、粤各军，组织西路讨贼军，计划从西江东下，攻占广东。国民党香港支部按照孙中山的指示成立了“驻港办事处”，专门从事军事联络工作，并致函海外侨胞和国民党员筹款支援。

1922年12月下旬，滇、桂、粤三方代表在广西藤县太湟江白马庙召开军事会议，商议联合讨伐陈炯明的策略。1923年元旦，滇军杨希闵部，桂军李易标、刘玉山部以及粤军英雄部等由江西北岸向广东进发；桂军刘震寰部、滇军范石生部沿西江南岸东进；而“桂军主力之沈鸿英则担任向北江出动”①，包抄陈炯明的侧背。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伐陈炯明的通电，历数陈炯明的种种罪恶，指出讨贼军的任务是“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②。孙中山的通电得到各路军民的响应。在各支部队的打击下，陈炯明被迫于1月15日下台，经惠州、海丰转赴香港，“陈部主干部队，一部分由广州退守惠州根本地，一部分就近退往北江韶关一带”③。

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返穗，2月21日抵达广州。3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孙中山担任大本营最高职务——海陆军大元帅。大



本营由5部（军政、财政、内政、外交、建设）、3局（法制、审计、航空）、1库（金库）、3处（参军、参谋、秘书）、工委（宣传、财政）组成。程潜为军政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杨庶堪为秘书长，朱培德为参军长，胡汉民为总参议。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成立，打破了直系军阀企图迅速"统一"全国的迷梦。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孙中山总结了两次护法运动的经验教训，决定放弃"护法"旗帜，不再使用非常大总统的名义，也不再召开非常国会。他说："今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是再拿护法问题来做功夫。现在的政府为革命政府，为军事时期的政府。"④

大元帅大本营成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企图将它扼杀。大元帅府面临财政、军事和外交上的重重困难。

这时，桂军首领沈鸿英企图勾结直系军阀夺去广东地盘。他以移防为名，将部队集中于韶关、新街、高塘一带，伺机叛变。4月15日，沈在新街宣布就任北洋军阀政府委任的"广东军务督理"。随后，桂军10 000余人在李易标等人的指挥下，向广州东门外和观音山等地进攻。孙中山宣布撤消沈鸿英的桂军总司令职务，并命令杨希闵、刘震寰等部反击叛军。4月19日，沈军沿粤汉线溃退。5月9日，沈军从韶关败退。7月，李济深部占领梧州。至此，战事以沈军的失败而告终。

讨伐盘踞在广东东江的陈炯明叛军，是孙中山在1923年进行军事斗争的重点。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后，所部仍有三四万人，以惠州为根据地，图谋伺机再起。5月间，正当平定沈鸿英叛乱的战事激烈进行的时候，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余部再度叛乱。洪兆麟、林虎等部向潮汕地区发动进攻，许崇智部受到袭击，损失惨重。叛军推叶举为总指挥，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孙中山急调西江、北江两路军队开赴东江前线，并委任程潜为东江讨贼军总指挥，统率滇、粤、桂联军分路进攻惠州。

1923年8月中旬，陈炯明余部从潮汕向罗博、惠州一带发动进攻。孙中山从8月23日起亲自督师东征，在石龙设大本营。

10月，陈炯明在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接济的大批军火、物资后，由香港潜返东江。策动部下分三路向广州进攻。11月12日，叛军占领石龙。孙中山只得返回广州，部署保卫广州的战斗。11月中旬，叛军直抵广州近郊的石牌、黄埔、瘦狗岭一带。这时，吴佩孚调来配合陈炯明进攻广州的豫军

樊钟秀部三个旅也由北方到达韶关。正当广州十分危急的时候，谭延闿奉孙山命率湘军自湖南赶来救援；而樊钟秀也在孙中山的感召下反戈，前来投奔孙中山，参加广州保卫战。叛军攻势受挫，只得退回惠州、东江一带，广州再度转危为安。

广州保卫战的胜利，使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在广东的西江、北江和珠江一带站稳了脚跟，并日益巩固和发展。广州保卫战的胜利，也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在广州顺利举行。

随着广东局势的稳定，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7月设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由孙中山任主席，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鲍罗廷为顾问。该会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代表国民党中央指导政府处理一切政务。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之初，向孙中山负责，有关政治、外交方面的决策，须经孙中山审批才能办理。孙中山逝世后，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常设机关、指挥、监督政府处理军事、财政、外交等方面的政务。

大元帅大本营在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外实行"以俄为师"，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内实行三民主义，主张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大元帅大本营的成立，为组建国民政府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共合作的创建、北伐的胜利开展创造了基础。

广州大元帅府重建以来，战争连绵不绝，军费开支巨大，财政日益困难，不仅建设事业不能开展，士兵的军饷和机关职员的薪俸也无法照常发放。为了缓和财政危机，孙中山提出提取"关余"⑤，收回关税主权。"关余"一向由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交付北京政府。1919年帝国主义者为了控制全国，策划北京政府与以桂系为首的南方军政府议和，曾将"关余"的一部分拨给南方军政府。1920年初，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策划讨桂战争，外交使团便以南方政府分裂为由停止拨付"关余"。因而到1923年2月止，广州政府应得到的"关余"及其积存达400万两。如能得到这笔"关余"款项，广州大元帅府的财政危机将得到大大的缓和。因此，1923年9月5日，大元帅府照会北京外交使团，要求交付"关余"，并拨还1920年3月以后西南应得的积存"关余"。9月28日，外交使团复电说正在考虑之中。但英美等国政府借口与广州政府未建立外交关系而置之不理。11月23日，大元帅府外交部再次照会北京外交使团，要求将粤海关"关余"拨还广州



政府，否则将自行提取。12 月 3 日，北京外交使团致电大元帅府，威胁说如自行收管广州关税，将以强硬手段对付。同时，英、日、法、美、葡、意 6 国陆续派军舰 20 艘到广州进行恫吓。5 日，大元帅府外交部复照北京外交使团并驳斥其谬论，指出“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的命令。且关税之汇交北京，不啻资助其战费，以肆其侵略政策。本政府今欲令关税官吏以后不得将此款交与北京，应截留本方之用”，“此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6]12 月 17 日，孙中山发表《致美国国民电》，说明“关余”问题完全为中国内政，而美国政府以“多于他国之军舰，合力为毁吾中华民国之谋”，是“摧残自由，蹂躏人权”。[7]19 日，又向美国政府发出抗议电。同日，大元帅府命令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保留广州及本政府所辖各地方关税，并将 1920 年 3 月以后所见之“关余”全部缴还。如不遵令，广州政府则另任海关人员，各国无干涉此举之权。24 日，孙中山又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名义发表《关于海关问题宣言》指出：列强“集军舰于省河，实无异帮助北京政府，以压制本政府。”而“北京政府系属非法，且为全国所弃，当然无权处分本政府辖境内之关税余款。”并申明：“已经飭令总税务司：（甲）在本政府辖境内各关税收，除按比例扣还付以海关作抵押之外债及赔款外，其余应妥为保管，听候本政府命令交付；（乙）并将民国 9 年 3 月以后所欠本政府应得之积存关余，照数归还。”“总税务司若不遵命，另委能干职务之人，为税务官吏。”[8]

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广州政府争取关余的斗争。12 月 12 日，《向导》发表《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书》，指出：孙中山对于收回粤海关主权的坚决表示，是起来与帝国主义奋斗的第一步，号召群众“拥护广州政府与外国帝国主义为光荣的斗争”[9]。16 日，广州各界人民，在新学生社等群众团体组织下，召开国民大会，到会者 2 万余人，决定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抵制英、美货物。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并派代表到大元帅府请愿。24 日，广东工会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 70 多个团体，1 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沿途散发对内和对外宣言，要求收回关税，收复以前国家丧失的权利，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25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指出：“吾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督促其根本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在所不惜。”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应立即尽力之所能设法联络个团体，以地方公团名义，散发传单，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发起

抵货”，[10]以支援广州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策动下，全国各地许多群众团体和进步舆论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示对广州政府的支持。

帝国主义者看到他们的炮舰政策不仅不能使广州政府和中国人民屈服，相反激起了更为坚决的反抗。他们担心中国人民抵制外货和在外国轮船上工作的中国工人发动罢工，于是开始改变态度。1924年1月3日，广州外国领事团致电北京外交使团，谓广州民情激昂，“关余”问题如不及时解决，恐将酿成民变于“排外”事变，因而要求北京外交使团尽早解决。于是“关余”问题转入外交谈判，外国军舰也陆续撤去。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到4月1日，北京外交使团被迫作出将粤汉关“关余”拨付广州政府的决定。收回“关余”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这次胜利，表明了广州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立场。也是广州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工人、农民、学生等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在国共合作史上占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讨贼军克梧后之电讯》，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4日。

②《孙大总统讨陈炯明电》，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5日。

③《西南局势的大变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1923年1月）。

④孙中山：《关于改组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2页。

⑤“关余”是当时每年关税收入在扣除以关税做抵押的各项到期应付赔款、外债、公债及海关经费等项后所剩的余额。不经北京外国公使团同意，中国政府无权动用。

⑥转引自《国父年谱初稿》下册，第632页。

⑦《中国晚报》，上海，1923年12月24日。

⑧《民国日报》，广州，1923年12月25～27日。

⑨《向导》第48期。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66～167页。

党的三大召开

1923 年 2 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北洋军阀政府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二七”惨案。工人运动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一时转入低潮。这件事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蔡和森在三年后评论这次事变对党内的影响时说：“在‘二七’以前的工人运动是在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马上成功，在这时期所有运动十分之八、九是胜利的，虽然有小部分的失败，但不能影响到全国。但‘二七’失败却不同了，马上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失望，特别是京汉路的工人，因此影响到党内的思想发生变化，发生悲观，对劳动运动怀疑，这是坏的思想。但还是好的，就是‘二七’失败后得到教训，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且军阀利用民众开会反对京汉铁路罢工，因此工人阶级应联合各阶级引导群众做自由的解放运动”[①]李立三也讲过：“党从第一次大会到‘二七’运动是一个段落，这一时期中党的政治口号是社会革命万岁，主张直接无产阶级革命，这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时期。”[②]而“‘二七’运动失败，给党一个大的转变。”[③]

事实是最好的教员，“二七”惨案的发生给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深刻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教训就是孤军奋战。此时在政治上是曹吴及英帝国主义统治之时，故政治的压迫很严重，因此第三次大会无论客观与主观上都有加入国民党找到政治上的同盟者的条件。”[④]中国共产党内经过长期对国共合作的争论之后，对参加国民党的看法已趋于一致。这就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准备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条件，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国共合作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3 年 6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在广州召开。当时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举行开幕仪式，主要由陈独秀主持。

一个多星期的会议日程被安排得十分紧凑。12 日上午，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做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主要谈了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

和党的发展状况。陈独秀在报告中说：我们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二大以后，我们没能很快地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最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共产党人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活动。

陈独秀的报告做完后，下午由马林在会上报告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运问题。第二天，代表们就陈独秀报告进行讨论。第三四天，由各地代表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瞿秋白在会上简要介绍了共产国际“四大”情况，陈潭秋报告了二七惨案的经过，孙云鹏讲述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陈海坤和毛泽东等还就农运工作发了言。

之后，大会主要议题便转入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这时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不是要不要加入，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问题，以及共产党员如何在国民党内为国民革命工作的问题。

陈独秀和马林认为，进行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目前的主要任务，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任务的党，要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都很脆弱，还没有形成独立社会力量的情况下，全体党员和产业工人都应该加入国民党，以增加国民革命的势力。马林还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归于国民党，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他说，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

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赞成马林的意见，他们认为，目前应当加入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应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了，共产党的独立也就不成问题。而共产党要进行工人运动，也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张国焘等人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但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任务，中国共产党还担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因此张国焘等人在强调工人运动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

张国焘在会上说：如果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



际工作，那么也就是说，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还必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那么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5]

因此张国焘主张：担任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担任和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没有必要加入国民党，或者加入国民党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保留组织独立”的指示，就失去意义。

蔡和森引证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后，也不能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权利。蔡和森和刘仁静赞成张国焘的意见：现在虽然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脆弱，但是它已经在斗争中显示出了相当的力量，这支力量不应被忽视，共产党没有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蔡、刘二人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不应该加入到国民党内去，否则容易混乱无产阶级思想。

争论双方的主张都有可取之处，又都存在片面性。

陈独秀和马林的看法低估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夸大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作用。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会使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这种右倾思想给后来的实际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但是陈独秀等人强调民主革命是当前党的中心任务，他们看到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集中一切革命力量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则是正确的。

张国焘等人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加强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这些观点是对的，但是脱离了建立统一战线的任务，这些意识只能导致自我孤立。后来蔡和森也认为当时他和张国焘等人的意见有三方面的缺点：一、怕加入国民党而削弱了自己的实力，没有积极地去参加国民党；二、希望孙中山左倾后再加入国民党，而忘却了支配国民党的责任；三、不能加入国民党，去促进国民党改组，因而站在了被动的地位。

会议经过讨论，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在 1923 年 1 月作出的关于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共合作的建议，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大会还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三个目的：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引到我们党内来。会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这份决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应以国民革命运动

为中心任务。按照中国社会的现状，应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是一个比较革命的党，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也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在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并努力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使全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与国民党，以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

决议还明确规定了在实现国共合作和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组织独立性原则：在政治宣传上，保存共产党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的真面目。既要大规模宣传国民革命运动，也要宣传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必须真正维护劳动阶级的利益。必须防止国民党政治上的妥协倾向，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必须保持一致。要从工人团体和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正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组织，严谨党的纪律，建立强大的共产党的群众基础。要建立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全国总工会，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

大会发表了宣言，修订了党纲、党章，通过了关于劳动运动、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宣言》表示：我们希望社会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中来，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也希望国民党抛弃依靠外国和军阀的旧观念，加强对民众的政治宣传，以造成国民革命的真正中心势力，树立国民革命中真正领袖地位。共产党在《宣言》中向全国人民宣告：鉴于国际及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的苦痛和要求，中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一刻不能忘记的；对于工人农民的宣传和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工作中心。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求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提出了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方针。这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使国共两党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影响力的民主旗帜下，通过努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民主革命的进程。国共合作，不仅改变了国民党涣散无力的状态，扩大了它的影响，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而且有利于共产党从二七惨案的工人运动低潮中走出来，投入更广



阔的天地，锻炼自己，发展自己，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三大，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

但是三大也有不足之处，它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以及革命军队问题，没有提出或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三大对国共两党及它们代表的阶级力量做了片面的估计。大会一方面正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无产阶级应最先竭尽全力参加促进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但另一方面，大会又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自然不能产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因此大会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的问题。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大会认为占中国70%以上人口的农民在国民革命中有重要地位，没有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很难成功。三大决议也认为要结合小农、佃农及雇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以保护农民利益。但是大会没有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革命军队问题上，大会指出了国民党集中全力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宣传的错误，认为得不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国民革命仅靠军事行动不可能成功。但是共产党没有注意革命军队的问题，更没有提出共产党要抓军事武装的问题，这些都是党在幼年时期的具体表现。

三大的正确决定和不足之处，对后来的革命进程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注释：

①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41页。

②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16页。

③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17页。

④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44页。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89页。

共产国际发出 13 点指示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 1923 年 1 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积极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 年 1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曾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保持自己独特的政治面貌，应该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从事工人运动。但马林于 1923 年初带着这份决议来到中国后不久，二七惨案发生了。二七惨案发生后，早就对中国工人力量估计不足的马林对在中国开展工人运动感到悲观失望，准备去中国南方开展民族运动。这时，他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工作，其中包括工会工作。甚至还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1 月决议本应阐明工会的宣传"不能打出工会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在长时间内不能用于工会宣传"。[①]马林的这种观点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了混乱，而且在共产国际内部也引起了争议。1923 年 8 月 9 日，维经斯基在通过苏联驻上海领事维利杰致马林的信中说："看来，您是想把中国共产党中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当然，您处于更好的地位，知道罢工之后最好应该做些什么。但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认为，汉口、上海以及目前在北京也绝对需要一些积极的同志。据中国报纸报导，罢工的气氛目前显然远未消散，在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也许将成为新的罢工区域"。维经斯基在信中问道："中国共产党是否应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为什么国民党对于罢工被镇压没有提出抗议？为什么它没有反对对于学生的粗暴迫害？"[②]

但是，马林并没有接受不同的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在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陈述自己意见的信中说：中国虽然确有众所周知的罢工，但"但大部分组织被破坏并在工人中造成了很大的畏惧心理"，"工会工作至今未能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开展"，"因为我们不能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到工人中去"。[③]至于中国共产党，在马林看来仍然只是



一个团体。他说："我们的团体仍是如此，不能把它称作一个政党。在这个组织中只有很少几个工人，同工人组织的联系，只存在于极少几个工会工作的中心。"④关于国民党，马林在给越飞等人的信中指出："孙中山完全被这个问题所缠绕：我能否保持自己的阵地以反对陈炯明?"马林在信中说："他只对军事形势感兴趣，我同他谈改组国民党问题，指出开展政治宣传的必要性。他回答说，待广东事务完成之后，再开始这项工作。"马林向越飞指出："我要强调改组国民党和使他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可能性，如果以同两年前过早地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人合作作为基础的话，那么，其前景是远大的!"⑤马林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会改变去年8月开始在中国实行的方针"。⑥

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中国革命，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共合作的进展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继1923年1月12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之后，又于1923年5月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作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⑦指示强调指出，"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内战的问题上，我们支持孙中山，但是，我们要求国民党通过有系统的宣传鼓动建立广泛的民族政治运动，阐明孙中山军事行动的意义，并以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为行动纲领，吸引中国最广泛的民主力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这种勾结有使国民党的运动堕落成为军阀混战的危险，从而不可避免地不仅要导致民族阵线的彻底瓦解，而且要导致工人组织和共产党的威信扫地"。这个指示认为，"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发生类似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问题，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同志对加入国民党问题仍有疑虑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重申："我们应当坚持过去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我们对民族民主主义的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要它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应当尽力找到适当的形式（如行动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等），把中国广泛的民主阶层联合在这个反帝的运动中。"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和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国民党中的领导权问题。它说，"毫无

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指示还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它郑重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指示指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无论出于任何考虑而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意义，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为了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同时，“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表大会的指示》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其内容是：

一、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二、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无论出于任何考虑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意义，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

三、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只有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到目的：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欠收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旧官僚统治；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等等。

四、……只有给反帝战线的口号找出土地问题的根据，我们才能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胜利。

五、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



人的首要任务。

六、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孙中山革命部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⑧]

但是，由于路上耽搁，中国共产党直到1923年7月18日，即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大约一个月，才收到这个指示，因而它对这次代表大会本身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团员进行思想教育，消除他们对加入国民党的疑虑。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一样都可以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后，青年团仍应保持独立的、严密的组织，并要同中国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⑨]。

1923年11月24日~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中全会。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同年5月的指示精神和国共两党当时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问题。会议听从了中央局和各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着重讨论了国民革命运动、工人运动和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会上强调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全部工作”，因为目前的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在一定的政治意义上都是国民运动。会议号召全党努力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促使国民党开展反帝宣传和从事反帝活动。会议认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首先工作”应当是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地“一并加入”；在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如北京、哈尔滨、天津、南京、湖南、湖北、浙江、福建等地，要“为之创设”。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均应“努力站在国民党国民党中心地位”，但条件不成熟时，不必强行之。会议主张用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和参加各种人民团体，并注意在农村中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在处理“我们与国民党之关系”问题时，会议决定“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即后来的党团），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这就是说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组织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际上发挥领导作用。会议主张用

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和参加各种人民团体，并注意在农村中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

12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二十四号通告。这个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

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与国民党各级党部合作，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选举"政治头脑明晰"的同志，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告还要求再选举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各级党组织"应该出力帮助"国民党"比较激进分子"当选，以扩大左派力量。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认识到实现国共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积极促进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因而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的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而后买办势力。为了推翻强大敌人的统治，无产阶级必须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必须团结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其他阶级、党派和个人，组成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国共统一战线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开始到三大为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热烈讨论，从同意和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逐渐发展为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革命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标志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政策的正式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了"党内合作"的方式：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负责人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部分省、市的国民党地方党部由共产党人主持，国民党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五月指示"是对"一月指示"的补充，同时也纠正了"一月指示"某些错误的观点。该指示对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注释：

①《马林档案》第3066号，转引自杨云若，《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第11页。

②《马林档案》第3072号，转引自杨云若，《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第12页。

③《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函》（1923年6月20日），《马林档案》第3066号，转引自杨云若，《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第12页。

④《马林关于中国形势和我们的工作致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东方部、海参崴局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1923年5月15日~31日）《马林档案》第3060号，同上。

⑤《马林给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档案》第3065号，同上。

⑥《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函》（1923年6月20日），《马林档案》第3066号，同上。

⑦这个指示的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80页。

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尤金，《苏俄与东方》，1920~1927年，《文献通观》，斯坦福1964年，第344~346页。

⑨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7月，179页。

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

辛亥革命后，一批官僚政客混进了国民党，许多投机分子凭借国民党这块招牌谋取个人的权势和私利，原先的部分党员也发生了蜕变，从而使国民党的纪律全无，组织系统如同虚设。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的："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①]因此，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这种状况十分不满。1914 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 年，他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但是，这两次改组的成效都不大。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成分依然十分复杂，多数党员仍以加入国民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若做不长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②]一些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党员，也颓废消沉，失去了原来的革命精神。"从前曾推驴车在黄河一带从事宣传的老同志"，现在竟变成臭名远扬的"猪仔"；"从前曾为民国打过江山的健儿，现在亦变成背党降北的叛徒。"[③]像陈炯明这样的国民党员，甚至逞兵作乱，预置孙中山于死地；而进攻总统府的叛军全都参加过国民党。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纪律，无一不存在严重的缺陷。

事实证明，国民党的现状不能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国民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不进行彻底改造，国民党不仅不能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甚至它自身也会因内部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而死亡。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的："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④]因此，"补救之策，厥惟重组本党，严格训练党员之思想与行动，使全体党员共负革命之责任。盖必先有健全之党员，方能组织完全之党。有完全之党，方能建完全之国家也。"[⑤]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改组。他说：民国成立以来，"大家都不注重党事，只着重政军两种进行，所以就大遭失败。现在要从党务进行，就是要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发挥十几年前吾党先烈的精神。"[⑥]



孙中山提出：这次国民党改组，目的是“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政纲）的政党”，并“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7]方法是“依俄为师”，“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8]步骤是“先有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9]任务是首先整顿思想，进一步端正奋斗目标，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订“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合民众所渴望的”奋斗纲领，使大家“皆愿为主义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10]同时，还要整顿组织，建立“上下逮通，有指擘之用”的组织，改变党员成分，“分子淘汰，去恶留良”，[11]吸收“新鲜血液”，使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立志牺牲，想做大事”。[12]

孙中山认为：“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破产之病已深”。要解救中国，就必须依靠“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13]因此，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

从1922年9月～1923年9月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准备和开始阶段。

1922年9月～12月，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三次召集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各种问题。

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改进国民党会议。商讨改组国民党问题。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53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孙洪伊、张秋白、张继、王法勤、朱霁青、李希莲、田铭璋、丁惟汾、王乐平、刘积学、刘荣棠、王用宾、于右任、焦易堂、张宗海、张凤九、杨庶堪、黄复生、赵铁桥、谢持、吕志伊、叶荃、马君武、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黄展云、宋渊源、陈曹楠、陈峰、蒋尊、杭辛斋、张人杰、叶楚伧、茅祖权、方潜、邵力子、管鹏、柏文蔚、张椿、杨赓生、徐苏中、彭素民、陈荣广、肖炳章、田桐、蒋作宾、谭延闿、程潜、覃振、周振麟、王伯群、陈独秀。孙中山即席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会上，大家一致赞成国民党改组计划。[14]

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茅祖权、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管鹏、陈树人9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5]后因丁惟汾、田桐、吕志伊、覃振四人赴北京参加国会，另增补叶楚伧、刘芷芬、孙科、彭素民为起草委员。起草委员会从七日起开始集会，历时一个半月，草拟成《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呈孙中山审核。

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再次召集有国民党各省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审核并修改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党纲和总章。参加会议的除9月4日

与会的53人外，还增加了邓泰中、伍朝枢、吕超、许绍桢、吴公干、林祖涵6人。会上，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起草国民党宣言。[16]

12月16日，孙中山再次召集会议，审查中国国民党宣言及党纲、党章。参加会议的共65人，其中除11月15日与会者59人外，还增加了李烈钧、黄大伟、陈少白、郭泰祺、张乃燕、周然6人。[17]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着重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现行计划和政策。这个宣言重申民族主义，应力图取消不平等条约；民权主义，应实行普选制度，确保人民自由权；民生主义，应由国家经营铁路、矿山等大企业，并应平均地权，改革货币，保障妇女权利。《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它明确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18]孙中山从依靠地方军阀改变为依靠广大民众，这是革命思想的一个飞跃。《中国国民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的重大转变，成为国民党改组的先声。

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党纲》阐明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基本内容及原则，《中国国民党总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经费”、“纪律”、“附则”六章。会上，孙中山发表了题为《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的演说，指出国名党今后的工作主要是：“一、政治进行；二、军事进行；三、党务进行。”他认为“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主。……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19]

1月4日，孙中山发表讨伐陈炯明通电，号召讨伐陈炯明的各部部队“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20]

1月16日，由滇、桂、粤军组成的西路讨贼军进入广州，陈炯明率部逃往惠州。

1月21日，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中国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彭素民任总务部部长，林祖涵为副部长；陈树人任党务部部长，孙镜为副部长；林业明任财务部部长，周佩箴为副部长，叶楚伧任宣传部部长，茅祖权为副部长，张秋白任交际部部长，周颂西为副部长。

1月23日，孙中山委任居正、孙洪伊、杨庶堪、吕志伊、廖仲恺、杭辛斋、张人杰、田桐、覃振、周振麟、陈独秀、刘积学、张继、谢持、王用



宾、詹大悲、丁惟汾、黄复生、朱之洪等 21 人为参议。

2 月 15 日，孙中山率陈友仁、谭延闿、杨庶堪、徐绍桢等人离沪返粤。

2 月 21 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并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职。

3 月 1 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孙中山委任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程潜为军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杨庶堪为秘书处长、朱培德为参谋处长、古应芬为法制局长、刘继文为审计局长、林云陔为金库主任。[21]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

10 月中旬，孙中山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党务讨论会上发表演说，认为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党中缺乏组织……维系之法，弃而不讲"；同时也是由于党员"革命精神"的"消失"和"本党之基础未固"。他强调指出："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首需立远大之眼光，不可斤斤于眼前之小利"。[22]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从 1923 年 10 月起，国民党的各项改组工作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

10 月 11 日，孙中山致电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令各部即行裁员——废除正副部长，各部各设主任一人，干事书记各二人——准备改组，原设于上海之总理全权代表及总理办公处，亦一并裁撤。"[23]

10 月 19 日，孙中山正式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

10 月 24 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讨国民党的改组问题。他邀请共产党这次会议对国民党的改组一事"详为审议，悉心画，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24]

10 月 25 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讨论该组计划。同时，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林森、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准备工作；[25]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并请他起草国民党党章。

10 月 28 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着手办理国民党的改组事宜。这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一、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每一省区代表六名，其中三名由总部指派，三名由当地党员推选；大会日期初定 1924 年 1 月 5 日召开（后改为 1 月 15 日，

因来不及筹备又改在1月20起举行）；地点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二、关于国民党周刊的出版，推定谢英伯为编辑主任，谭平山为撰述，林黄巷为经理主任；周刊由临时执行委员会“指挥”，“供发表会议记录及改组意见等”。三、关于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分工，议决“主席临时推定，书记谭平山，财政邓泽如”。四、关于上海执行部的组织，该部成员经深圳市指定为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伧、戴季陶，派廖仲恺赴上海召集上述五人组织之。五、关于起草国民党改组宣言，推定谢英伯、谭平山起草，杨庶堪修改。会后，开始起草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国民党分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调查工农群众及中间阶级状况；统一宣传机构，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设立讲习所，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指导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等。

中国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自1923年10月28日正式成立后，每隔三四天开会一次，截至1924年1月19日止，共计开会28次，议决要案400余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代表大会案，国民党改组宣言案，国民党党纲草案和党章草案，国民党广州区党部、区分部组织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设置案，组织义勇军案，慰劳前线军人案，筹办国民党军官学校案，筹办宣传学校案，筹办党报计划案，创办国民党周刊案，推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等。[26]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除办理改组及筹备全国大表大会事宜之外，最重要者，为广州市内各区党部各区分部之组织。”

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1月28日，孙中山加派林云陔、冯自由、徐苏中、林直勉、谢良牧五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2月，孙中山对国民党员连续发表了三次演说，重申了他改组国民党和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决心。

国民党在1923年10月召开改组会议后，在党员较多的广州、上海开始登记党员，着手进行改组工作。同时，在天津、哈尔滨、湖南、湖北、南京、山东、四川等地和旅欧学生中筹建国民党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国民党改组原定以广州、上海为试点，而在广州首先进行改组。

国民党广州市各级组织的改组工作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一、未组织之先，举行登记，确定党籍；二、举行广州市党员全体大会；三、分区组织，先成立12个区分部；四、每一区分部设一主席，分部通则；五、规定



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设置细则；六、设一总组织员，专任组织事宜，后因事务过繁，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本委员会秘书处办理；七、每区党部区分部之成立，必须秘书处之核准，或由秘书处直接组织之。"[27]

1923 年 10 月 28 日，国民党临时中央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国民党广州分部的改组试点工作，决定成立党员等级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拟定分部组织章程和党员登记表，推举邓泽如、吴铁城、谢英伯、谭平山四人为登记委员，吴铁城兼任党员等级委员会主任。由公安局负责在西濠口、天字码头、财政厅前和各火车站等十八处张贴广告，号召党员办理登记。到 1923 年 11 月 11 日止，广州市国民党总数达 3 649 人。

11 月 11 日，廖仲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广州市全体党员大会，代表孙中山向到会党员致训词，指出国民党 10 余年未取得进展，根本原因是"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今后当知所鉴。……务使以前党员活动由上而下的形成，一反为由下而上。"[28]大会通过了致正在东江前线的孙中山的电文，表示全体党员拥护改组。接着分 12 个区举行分区会议。

11 月 12 日，国民党广州市各区分部举行联席会议，汇报开会情况。各区分部主席许崇清、谢英伯、廖仲恺、孙科、陈树人、邓泽如等及组织员冯菊坡、高振汉等人，汇报了刚选出的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名单。

在区分部联系会议上，鲍罗廷建议国民党的广州市各区党部执行委员应有集中办公的地方，并应组织训练党员、研究党纲党章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的学校，3 个月为一期，凡是党员均应参加训练。此外，鲍罗廷还建议各区分部应调查本区内各社团组织及其政治态度，调查市郊农民生活状况并劝其入党。鲍罗廷的这些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

到 1924 年 1 月 12 日止，广州市成立了 9 个正式区党部，3 个代理区党部，66 个区分部，3 个特别区分部，党员登记人数达 8218 人，两个月内增加党员 4569 人，新增加的党员多数为青年学生和工人。[29]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阮啸仙、刘尔崧、杨安、周其鉴、张善铭、周文雍、杨石魂等将近 20 人分别担任了国民党广州市区分部或区党部的执行委员。

与此同时，国民党上海市各级组织的改组工作也有很大进展。1923 年 12 月 16 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成立。上海执行部成立后，便马上着手进行它管辖下的东南各省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同时，还进行了国民党上海市各级组织的改组。在改组国民党上海市各级组织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进行党员登记；二、将上海分成七区，

先成立七个分部；三、举行全体党员大会；四、依照党章草案制订全区代表大会组织法。1923年12月23日起，至1924年1月10日止，“共正式成立一个区党部，33个区分部，此外，尚有3个未编次序之区分部。”南洋烟厂、商务印书馆、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工、商、学各界中都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30]

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素民等人，同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廖仲恺是国民党改组工作中的核心人物。1923年5月，廖仲恺任广东省省长。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每天工作达十七八个小时。有一次，当何香凝告诉他有许多老国民党员反对改组时，他明确地回答说：“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说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为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他们并不为党的前途打算，只为闹意气的反对，不必管他，我决要改组”。[31]为了实现国民党改组，廖仲恺下了极大的决心，他表示：“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32]

注释：

①《总理于总章通过后演讲〈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出版，1978年10月，第45页。

②孙中山：《在广州市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第524页。

③张心诚：《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于中国革命运动》，《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2期，1923年12月30日出版，第9页。

④转引自楚伧：《介绍〈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7日。

⑤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筹备工作》，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出版，1978年10月，第70页。

⑥《总理于总章通过后演讲〈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出版，1978年10月第，45页。

⑦刘芷芬编：《孙总理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1924年2月印本，第5页。

⑧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



社，1981 年 10 月第 2 版，第 546 页。

⑨楚伧：《介绍〈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3 年 12 月 7 日。

⑩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0 月第 2 版，第 545 页。

⑪楚伧：《介绍〈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3 年 12 月 7 日。

⑫孙中山：《在广州市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0 月第 2 版，第 527 页。

⑬楚伧：《介绍〈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3 年 12 月 7 日。

⑭参见居正：《本党改进大凡》，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 8 辑，台北出版，1978 年 10 月，第 32 ~ 33 页。

⑮同上书，第 33 页。

⑯参见居正，《本党改进大凡》，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 8 辑，台北出版，1978 年 10 月，第 32 ~ 33 页。

⑰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 1 册，台北再版，1978 年 5 月，第 224 页。

⑱《中国国民党宣言》，《民国日报》1923 年 1 月 1 日增刊。

⑲孙中山：《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 8 辑，台北 1955 年出版，第 45 ~ 46 页。

⑳《民国日报》，1923 年 1 月 5 日。

㉑罗家伦编：《国父年谱初稿》下册，台北 1958 年，第 588 页。

㉒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演讲》丙，成都近芬书屋 1944 年版，第 27 ~ 29 页。

㉓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1973 年台北出版，第 175 页。

㉔《中国国民党周刊》第 1 期，1923 年 11 月 25 日出版。

㉕同年 11 月 8 日又加林云陔、冯自由、徐苏中、林直勉、谢良牧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概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事录》，广州 1924 年印本，第 53 页。

㉗同上书，第 54 页。

㉘《中国国民党周刊》第 1 期，1923 年 11 月 25 日出版。

㉙《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概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事录》，广州 1924 年印本，第 54 页。

㉚同上书，第 54～55 页。

㉛《何香凝同志报告廖仲恺先生遇害事略及其感想》，《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 13 号，1926 年 1 月 14 日出版，第 6 页。

㉜何香凝：《在粤军追悼廖仲恺二公大会演说词》，《廖仲恺先生纪念册》，1927 年版，第 17 页。



邓泽如等国民党右派提出弹劾案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员和许多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加入它的队伍，使它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而且在组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国民党曾经采取过联合某些军阀反对另一些军阀，联合某些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些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和军阀政客为自身利益，依附过或资助过孙中山，因而他们在国民党内有着传统的影响。改组以后，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和军阀政客仍然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相当的地位。虽然资产阶级仍然是国民党的主体，但是由于构成国民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国民党内也就分化成为左、右、中三派。中国国民党左派“反对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主张用民众底力量以实现国民革命。”而右派“大半直接或间接依附于帝国主义者及封建军阀以图存”，“时常利用恶势力，故作出反革命的举动来”。[①]他们是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内政治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分裂就更为严重，原先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老右派分子掀起了阵阵反共恶浪，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新右派势力也日渐形成。新老右派集团互相勾结，不断进行分裂国共统一战线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共合作的态度是十分真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民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继续“努力扶持”国民党，要求中共党员“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即使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②]党主张“采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采狭隘态度躯（驱）左为右”。[③]年青的中国共产党这时候还不懂得，仅仅依靠善良的愿望和合作的诚意并不能使国民党右派停止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国民党一大刚闭幕，刘成禺、冯自由等人便“在太平沙林森寓所，召集华侨及各省反共议员50余人秘密会议，由邓泽如主持，决议警告李大钊等共产党分

子，不得利用跨党机会攘窃国民党党统”。[4]孙中山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于2月16日连夜召见冯自由，愤怒地斥责他们：“反对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事后，冯自由被迫做了检讨。

1924年6月1日，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和黄季陆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一份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

1924年6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向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书说：“现查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团刊》第七号及其他印刷事实，经本委员会审查，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为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皆不忠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希即从速严重处分。”[5]

弹劾书所列举的事实，主要是以下三个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的摘录：

1.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摘录：[6]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

（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联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中国革命的分子集中于国

民党，以应目前中国革命之需要。……目前政治的斗争，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终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

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摘录：[7]

"本团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革命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大会指出本团尤须注意强烈的国民运动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实际行动（如示威及政治罢工等）。"

"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1）应赞成中国共产党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2）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3.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8]

"我们的同志在参与国民党每种组织每种工作时，应于该项组织或工作详加讨论办法，以为我们一致努力的根据；以免临时慌张分歧，不能改良好之效果。教育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进行组织及工作的事，如关于开会报告、议事表决、分配工作、考核成绩、进行党员教育、向外活动方法等之教育事项，应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

"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行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

"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

以上3个文件的摘录不外两方面的内容，一、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要团结一致；并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觉悟的革命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建立强大的共产党群众基础，以适应目前革命的需要。二、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努力使国

民党与前苏联接近，并重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同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的妥协倾向和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不难看到，这些内容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有利于国民革命，也有利于国共两党各自的发展的。

他们弹劾的主要根据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议决案》，以及《新青年》、《向导》等杂志刊登的一些文章。上述文件和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第一，认为国共合作很有必要，要求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努力在中国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积极发展中国国民党的组织。第二，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组织，批评中国国民党只注重军事而忽视对民众开展宣传以及在政治上妥协的不良倾向。显然，这些意见是国共合作双方在建立两党合作时都同意的原则，是有利于中国国民党的发展、是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开展的，根本不能成为“弹劾”的理由。

弹劾案一出笼，汉口、北京、上海、广州、和港澳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也纷纷上书要求中国共产党员退出中国国民党。何世桢等人甚至要求孙中山命令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党，并对倾向共产党者加以“严重制裁”。

“弹劾共产党案”的提出，反映了国共合作实现统一战线后内部的分化和斗争。围绕着“弹劾案”，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痛斥了中国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6月25日，作为中国国民党组织训练员的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同他们进行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谈话。就“弹劾案”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谢持、张继气势汹汹地质问鲍罗廷是否见过上述决议案等印刷物？“是否承认党中有党”？他们声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组织党团，“万不能允许”，扬言两党“性质不相容，不如分道扬镳”。他们露骨地以分裂相威胁，破坏刚刚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鲍罗廷义正辞严，对谢、张的无礼责难，作了旗帜鲜明的批驳。他说：“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党中分化，是不能免”；“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以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夹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团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针对谢持、张继提出所谓中国共产党组织党团，是在利用中国国民党的问题，鲍罗廷说：“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



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有更多的利益。”鲍罗廷坚持了两党继续合作的原则立场。他说：“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中国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假令将共产党分出去，……徒分离革命实力也，前途必不利”。因此两党应继续合作下去，但“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9]

1924 年 7 月 3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谢持提请讨论“弹劾案”。经讨论，会议当即决定了 3 条办法：一、发表一个表明态度的宣言，以求统一认识；二、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作认真讨论；三、呈请总理孙中山决定。会议并作如下说明：“以大会发表之政纲宣言为准，凡入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三民主义之诚意者，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以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奋斗，同时并请总理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办法”。[10]会议推定汪精卫、邵元冲起草宣言。

7 月 7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汪精卫、邵元冲支持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宣言指出：“数月以来，党内党外，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反对派得肆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而发生隔阂。”为了“避免党内外之误会及隔阂起见”，宣言重申：“本党既有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范围，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宣言还要求孙中山“在短时期内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以期讨论周详，妥筹解决。”[11]宣言重申了中国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分清了是非，为解决中国国民党内重大分歧奠定了基础。随后，孙中山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讨论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案，制定了《国民党内共产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为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作好了准备。

注释：

①陈潭秋：《国民党底分析》（1924 年 12 月 27 日）。

②《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 年 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222、223 页。

③同上，第 223 页。

④《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4年1～6月），第488～489页。

⑤《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

⑥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

⑦1923年8月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⑧1924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⑨《谢持张继与俄人鲍罗廷谈话记录》，《革命文献》第9辑，台北1978年版，第80～84页。

⑩《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1924年6月18日）。

⑪《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30页。



孙中山推行三大政策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是孙中山晚年实现历史性革命转变的一个主要标志。“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它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①]

早在陈炯明叛变以前，孙中山就同情十月革命，向往列宁领导下的苏俄。他曾多次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谈到联俄问题。孙中山告诉马林：“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待北伐胜利结束后，立即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②]孙中山对十月革命抱着欢迎的态度不是偶然的。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起初，他怀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愿望，作过多次努力，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打破了他向西方学习的迷梦，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使他感到不满和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一种在他看来比西方文明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因此，当他接触到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时，就表示了可贵的同情。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如何摆脱外国侵略者与不公平枷锁的榜样。”[③]

陈炯明叛变后，处境困难的孙中山感到有加快联俄步伐的必要。1922年9月30日，孙中山对香港《电信报》记者发表谈话，毫不讳言地表示赞成“中俄亲近”的外交政策，并理直气壮地阐述了自己要联俄的原因。他说：在“俄国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之后”，这个国家“已成为站在‘不侵略’地位的国家了”，[④]“自苏维埃俄罗斯成立之后，过去对于中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全最大危险之一，也已消除。在老农政府继续和忠于他‘非帝国主义’政策的时候，俄罗斯并没有使‘一个民主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⑤]此外，孙中山还认为革命后的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他说：苏俄的“新政策，不但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而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不但是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资本主义。”[⑥]既然苏俄是反帝的，作

为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就必须联俄反帝。正如孙中山后来在1923年9月16日致加拉罕的电报中所说的："我们两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制定一个共同的政策，这一政策可以使我们生活在和其他大国平等的条件下，并可以使我们摆脱凭借强力和以经济上的帝国主义方法而行动的国际体系所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政治与经济的奴役。"[7]因此，孙中山积极地推行联俄政策。

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第二天，越飞便从莫斯科启程来华，一方面与北京政府商谈有关外交、商务关系等问题；另方面同孙中山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8]8月12日，越飞到达北京。越飞来华后，虽然同北京政府的建交谈判进展迟缓，但与孙中山的秘密谈判却进展迅速。

8月下旬，孙中山会见了越飞派来的代表，就远东局势及解决方法等问题进行商谈。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了四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三封信。信中涉及中俄两国的国际国内各种问题。[9]1922年秋，孙中山派张继前往北京，"致书越飞"。12月，张继在北京会见越飞两次，[10]商讨了越飞与孙中山亲自会谈等问题。经过马林、张继等人的多方努力，终于促成了孙中山与越飞的直接会晤。1923年1月17日，越飞由北京南下到达上海，住汇中旅馆。1月22日，越飞到孙中山寓所首次会见孙中山，双方"倾谈颇久"。[11]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这个联合宣言共四条，第一条内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同时，宣言指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12]在宣言的第二条中，越飞应孙中山的要求重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第三条声明，双方同意中东铁路维持现状，以后协商解决。在第四条中，越飞表示"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则表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13]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充分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时，它也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



策的确立。而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又促进了联共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孙中山不仅采取了联合苏联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步伐。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奠定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基础。当然，这个宣言并非完美无缺，由于环境与历史的局限，宣言中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当的词句。

1923年1月27日，越飞离开中国去日本养病。孙中山派廖仲恺同行，以便在日本与越飞进一步商谈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合作的问题，越飞在日本热河住了大约一个月，“对廖仲恺详细说明了苏联现状、对亚洲民族态度、为何打算和中国携手等事项；并曾谈到设立军官学校问题。”[14]《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签订后，孙中山与苏联的关系“更日深一日了”。[15]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签订后，随着对俄国革命了解的逐渐加深，孙中山开始认识到俄国革命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人类历史上更为“圆满”的一场新型的革命。他说：“美国、法国、俄国都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推究他们强盛的来历，都是由于革命成功的。就这三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比较，发起最后的是俄国，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国。俄国革命的结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到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都一齐打到平等。”[16]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新型的革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是由三种人，叫做：农、工、兵。俄国现时的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届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17]他确信俄国革命的成效比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更宏大。因此，当他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便不能不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究竟走哪一条道路。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曾使孙中山为之倾倒。但是，它们所走过的这条道路，中国却始终没走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证明了这条路并不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虽然孙中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但俄国革命毕竟深深地吸引着他，使他看到了前进方向。孙中山十分向往“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的俄国革命，[18]对苏俄的革命经验非常重视。他指出：“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他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奇功伟绩”，“在于有一个坚强的党和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19]革命斗争的实践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以俄为师”。他反

复强调："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20]"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21]

"以俄为师"是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的思想基础，但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形成连俄政策。孙中山连俄政策的确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对帝国主义国家幻想的破灭和认识到苏联党、政府是中国革命的真诚朋友。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他在革命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对西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以为它们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同盟会时期，他曾寄希望于日本。但日本政府却于1900年下令禁止孙中山在当时为日本占领的台湾活动，并禁止日本军人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义军。1907年，日本政府甚至还禁止孙中山在日本居住。1908年，日本政府再次拒绝孙中山在日本居住。1911年，南洋殖民当局借口孙中山的活动"妨碍地方治安"而勒令他出境。正如他自己所说："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22]这一切给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争取外国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没有得到任何实际效果。

武昌起义后，民国临时外交代表伍廷芳以"18省中已有14省宣布独立、拥护共和"[23]的充分理由，要求列强承认民国政府。帝国主义各国却置之不理。11月18日，湖北军政府向美国驻汉口总领事提出相同要求，同样被拒绝。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于1912年1月11日、17日、19日接连三次要求帝国主义各国承认民国政府，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字的答复。美国政府还严令其驻南方各地领事，不得与南方政府有正式接触。不仅如此，帝国主义还强行截留南方革命政府控制下各口岸的海关收入，给革命政府造成极大的财政困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渴望得到美、英、法、日等国的同情和援助，日夜盼望外国的承认和贷款。他曾对一个美国人说："我们需要的是承认，你们应该承认我们。"但是，帝国主义就是不承认他领导的南京临时革命政府，就是不肯贷款给他。

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孙中山受桂系军阀排挤，被迫辞去广州护法大元帅之职，困居上海。在这艰难的逆境中，孙中山的外交视线，仍在美、日政府之间徘徊。为了重整旗鼓，打开新局面，他在离粤去沪途中，绕道日本，希望能争取到日本政府的援助。到日本后，孙中山发现"日本当局，仍决心助段，遽欲其改变方针，事恐大难"，"只得匆匆归沪"[24]但是，孙中山仍还不肯就此罢休，他对美国政府还抱有幻想。因此，当美国政府通过驻广州

领事对南方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他与北方妥协时，孙中山便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阐述南方政府护法的经过，表示唯一的和平条件是“民国国会须享有完全自由行使其正当职权”，希望威尔逊转告北方武人尊重国会。[25]但威尔逊却对孙中山的电报不屑一顾，漫不经心地批交当时的国务卿兰森办理。威尔逊在批文中说道：“我不愿与孙中山直接通信，纵然我有时同情他所宣称的主张和目的。”[26]兰森则表示他打算“令总领事非正式告以致总统电业已收到，将予以适当注意”。他说：他怀疑孙中山“对中国目前将再有任何真正影响力”，他对孙中山“此时不予作进一步之表示”。[27]结果，孙中山所做的这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这一次世界大战后，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无理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的领土竟成了强盗们进行无耻交易的牺牲品。帝国主义狰狞的嘴脸再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无情的现实终于使孙中山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幻想逐渐破灭。“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开始向社会主义的苏俄靠拢。1920年11月，孙中山返回广东，组织了护法军政府。这时，他虽然努力加强同苏俄的联系，但没有完全放弃争取西方国家对他领导的南方政府的承认。1921年底，华盛顿会在美国召开了。美国政府只对北洋军阀发出了邀请。南方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再次要求美国政府承认南方政府，但仍遭美国政府的冷遇。

事实说明，“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28]因此，在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艰苦奋斗的一生中，虽然“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遭到了无情的打击。”[29]于是，孙中山觉悟了，认识到必须抛弃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依俄为师”。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逐渐认识到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而军阀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力量，是“因为军阀背后，由帝国主义的援助。”[30]与帝国主义相反，社会主义的苏俄不但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而且“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31]孙中山从苏俄执行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看到，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因而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就应当联合苏俄，共同反帝。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

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32]

孙中山从漫长的革命中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辱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33]因此，孙中山勇敢地走上了联俄的道路。

联共实际上是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孙中山实行联共，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为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发展而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

陈炯明叛变后，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同意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同马林于 1922 年 8 月会见后不久，李大钊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最先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时，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34]从此以后，不但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相继加入国民党，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担任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

在国共合作的酝酿过程中，国民党中一部分右派分子竭力反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企图阻挠国共合作的建立。但是，孙中山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对国民党的那些右派分子说：“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我就解散国民党，加入共产党。”[35]当那些人顽固到底，宣布不改变自己的决定时，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说：“那么好，开除你们的党籍！”[36]孙中山在审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单时，勾掉了反对联俄的孙科的名字，说：“留给真正赞成改组的老同志。”[37]

与此同时，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使它成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他还邀请共产党人参加研究国民党的改组计划，草拟宣传和党纲、党章，他建立组织，开展工作。这一切说明孙中山开始坚决实行联共政策。

与联俄、联共政策相辅相成的扶助农工政策，也同样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没有蓬勃发展的工农反帝反封建运动，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过去，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虽然提出过“国民革命”、“平民革命”等口号，但并没有认清工农群众在民主解放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而在斗争中往往依靠军阀、联合帮会、策动军队，没有把革命的基础建立



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上面，从而使革命屡遭挫折。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逐渐改变了过去通过会党联系劳动群众的办法，开始注意直接发动工农群众。1921 年 4 月 18 日，他向工农群众发表演说，提出民生主义应该恢复工人人格、增进工界幸福。1922 年初，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对这次大罢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但是，这时的孙中山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工农群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表现在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一回到上海，便立即派胡汉民去福建、张继去北京、汪精卫去辽宁，四处奔走，试图与各地军阀妥协，继续走依靠各派军阀以完成中国统一的老路，而不是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因此，蔡和森曾提出善意的批评，指出："政治上的统一，显然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所以现在无论从何方面说，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至于政治上的统一，万不宜苟且将就以上当。"[38]李大钊也指出：国民党过去"不太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商人，发展普通的国民运动"，这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39]

孙中山接受了这些善意的批评和劝告，逐步看到了民众的作用，开始认识到："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40]同时，孙中山也逐渐看到了工人、农民的作用。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做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41]谈到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孙中山认为："工人既是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42]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确认："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43]

这时，孙中山不仅在思想上认识到扶助农工的重要，而且也在行动上为扶助农工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步骤，制订了扶助农工的政策。比如提出制订工人保护法，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设立领导工人、农民运动的机构等。孙中山从依靠地方军阀转到依靠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工人，这是他

的革命思想的重大发展。

注释：

①毛泽东：《新民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661 页。

②《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 页。

③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 年 11 月 12 日。

④转引自蔡和森：《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向导》周刊第 4 期。

⑤同上。

⑥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0 月第 2 版，第 624 页。

⑦《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信件》，《史学译丛》第 3 期，1958 年，第 132 页。

⑧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台北初版，1963 年 11 月，第 316 页。

⑨齐赫文斯基：《论孙中山同苏俄的关系（1917～1925）》，载苏联《历史问题》第 12 期，1963 年。

⑩《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 年版，第 243 页。

⑪《越飞之谈话》，上海《民信日报》，1923 年 1 月 23 日第 2 版。

⑫《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 9 辑，台北出版，1968 年 10 月，第 36 页。

⑬同上。

⑭《蒋总统秘录》第 5 册，台北初版，1967 年 1 月，第 260 页。

⑮《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 5 期，1926 年 3 月 7 日出版，第 20 页。

⑯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0 月第 2 版，第 730 页。

⑰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同上书，第 886 页。

⑱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同上书，第 606 页。



⑲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同上书，第546页。

⑳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第546页。

㉑孙中山：《致蒋介石函五件》，同上书，第948页。

㉒孙中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同上书，第948页。

㉓黄季陆等编：《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1975年版，第359页。

㉔《民国日报》，1918年6月18日。

㉕《民国日报》，1918年10月23日。

㉖桂崇武英文原著、沈世平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台北，1970年12月出版，第3页。

㉗同上书。

㉘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3页。

㉙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63页～1364页。

㉚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第971页。

㉛孙中山：《民族主义》，同上书，第625页。

㉜孙中山：《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同上书，第969页。

㉝孙中山：《批邓泽如弹劾中共文》，《国父全集》第四集，台北1973年版，第916页。

㉞《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五期，1926年3月7日出版，第12页。

㉟林伯渠：《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㊱同上。

㊲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三联书店，1963年4月初版，第28页。

㊳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周刊第，1期，1922年9月30日初版。

㊴李大钊：《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向导》周刊第，21 期，1923 年 4 月 18 日出版。

㊵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 版，第 540 页。

㊶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0 月第 2 版，第 935 页。

㊷孙中山：《在广州市工人代表会的演说》，同上书，第 911 页。

㊸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同上书，第 593～594 页。

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

1922年6月发生的陈炯明公开叛变，使孙中山深深体会到军人特权、党务消沉的危害。孙中山反省了国民党奋斗的历程，认为成功的次数少、失败的次数多的原因在于：过去过分注意军事武装，忽略了国民党本身的力量，也就是广大民众的力量。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把国民党重新组织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落后的国家。因此，孙中山下定决心制订新党务，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认为，要使国民党有健全的党员，就要吸收共产党人入党。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证国民党迅速实现革命化唯一可能采取的有效途径。因为当时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特别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相当一部分是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

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并经常请李大钊到家里座谈。孙中山常常说，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在斗争中，孙中山能依靠这些人“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刚成立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重要性。由于实际革命斗争的需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向中共中央提议，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以求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斗争。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逐步改变了原来坚持不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立场。在中共三大之后，中共央执委会收到了共产国际发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好准备。这就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加快国民党改组、召开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

为了贯彻中共三大的决议，1923 年 6 月，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就接到过旅欧总支部转呈周恩来等人想要加入国民党的报告。

7 月，经林伯渠与彭素民商量，他们以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的名义复函巴黎组织国民党支部的负责人王京岐。经王京岐批准，周恩来等人被接纳加入国民党。

随后，在改选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时，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主任。之后，王京岐回国述职，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周恩来等人加入国民党，对后来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南京、湖南、浙江等地相继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原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山东、四川等省以及海外一些支部，也重新进行了整顿。

当时，张国焘仍然没有放弃关门主义的错误主张。而且，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的疑虑。因此，在苏联大使馆召开的会议上，李大钊、张国焘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与会的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上层的少数党员，没有中下层党员。而且，国民党有许多腐化堕落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党的纯洁性。

李大钊在会上对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作了解释，对同志们所提出的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立场和纯洁性的重要意见表示肯定。

李大钊指出，当前革命事业的客观形势需要发动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不是现在的国民党所能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入新的血液，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而中国共产党为了进行这个革命，也需要同国民党合作。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必要和适时的了。

同时，李大钊也指出，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国民党还是大有可为的。国民党如果不改组，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两党合作，那是不成的。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就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就应该积极地去促其实现。

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准备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

同时，共产国际指派鲍罗廷担任孙中山国民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就改



组事宜进行指导。1923 年 10 月 6 日，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热情地接见了他。

早在鲍罗廷来华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向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证明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对于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原则上同意了，但实际的措施却迟迟没有决定。只是等到鲍罗廷到来后，国民党才开始真正地接受改组的建议，着手实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自 10 月 10 日起，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为期一周的恳亲会。会上，廖仲恺代表孙中山发表了演说，号召大家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会上，鲍罗廷细心地倾听了国民党领导人关于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意见。然后，鲍罗廷提出了自己的具体建议，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改组前要对党纲进行选择性的修改同时要着手制定国民党党章；国民党要在广州和上海建立一个坚强的、团结的核心组织，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应尽可能快地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应当派出最优秀最积极的国民党员，在各个地区的城市中建立国民党的分部。这些分部还应派出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纳鲍罗廷提出的关于修改党纲以及制定党章的建议。10 月 18 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党务会议结束后，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本部，裁撤设在上海的总理全权代表及各部部长，准备改组。

10 月 19 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国民党的改组事宜。

10 月 24 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

根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组任务是：同时进行工人、农民等平民的政治运动和军事革命行动；肃清军阀、官吏等腐败分子，将国民党组织成一个群众性的民主政党；率领广大劳动人民及工人阶级开展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10 月 25 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计划。

会上，孙中山委任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吴铁城、杨庶堪 9 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委任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正式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顾问。

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有时任第三届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的谭平山。他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鲍罗廷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的章程。

10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全面工作。在此之后，委员会连续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改组工作的具体问题：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分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并着手在广州进行党员登记；调查工农群众状况；统一宣传机关，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设立讲习所，训练各地分部执行委员会等。

从1923年10月28日～1924年1月19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开会28次，通过议决要案400多件，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具体准备工作。

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广州先行试点，进行改组工作。随后，广州国民党组织成立了党员登记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邓泽如、吴铁城、谢英伯、谭平山4人被推举为登记委员。

11月11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召开广州市全体党员大会。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廖仲恺代表孙中山致训词，传达了改组国民党的理由。

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致电孙中山，表示拥护改组国民党。

11月1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在开会之前，陈炯明的军队占领了广州附近的石龙城，政府军正向广州城退却，情况危急。

鲍罗廷认为，前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在农民中的工作薄弱，因而，农民的态度消极，甚至去帮助敌人。对于这种情况，鲍罗廷进而提出，政府应当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让农民来拥护国民党。

11月14日晚，廖仲恺颁布3项法令（即给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的法令）。随后，各区党部委员会以各区的报告形式将法令草案散发到各区。经查明，受法令的鼓动上前线的志愿人员总共有540人，草案所到之处受到了极热烈的欢迎。

而此时的国民党右翼反动派们污蔑孙中山“赤化”和“出卖自己”。他们声称3项法令的颁布是“使广东苏维埃化”。并且，他们还谩骂中国共产



党玩弄“阴谋”，以夺取国民党的政权。这股逆流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分子公然阻挠改组，反对国共合作。邓泽如、林直勉等声称，国民党组织法、党章、党纲等草案是受鲍罗廷的操纵制订，全都是中国共产党所议订。他们攻击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

对于右派分子倒行逆施的破坏，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正义人士都予以坚决的反击。孙中山严厉批驳了邓泽如等的不实之词，向他们说明国民党党纲、党章及组织法令都是他请鲍罗廷起草，然后他再审定的。

孙中山还重申了这次改组的重要性。孙中山说，应当进行国民党改组，这样才能在改组中取得进步。国民党如果不改组，国民革命只能一日不如一日，国民革命要想成功就更加困难了。

孙中山还严厉斥责右派分子们。孙中山告诉那些右派分子，愿意跟着他干革命就来，不愿意干就走人。

在在广州举行了委员会联席会上，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讨论了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加紧工作，坚决同国民党右翼反对派斗争的决议

11 月 18 日傍晚，广州的军队把陈炯明叛军从广州城打退了。

11 月 19 日晚，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举行。胜利的消息非常鼓舞人心。

会上，对纲领问题的研究首先被提上会议议程。鲍罗廷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建议在纲领草案中明确指出国民党新旧纲领的继承性。

随后，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提案。然后，廖仲恺书写了决议书。孙中山宣读了这个决议书。全体与会者都表示赞同这个决议书的各项条款，并表示要按决议书的规定行事。

1923 年 11 月 24 日 ~25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会议着重检查了中共三大以来执行决议的情况，进一步研究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具体办法。

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等文件。全会的决议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

为了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有力的、公开的政党，以指挥大规模的国民运动，中国共产党打算从 3 个方面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这 3 个方面包括：

一、扩大其组织：1. 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2. 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3. 新创设之组织，须遵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发之党纲章程及党证，其名称则暂随当地情形自定之。

二、矫正其政治观念，根据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有冲突时，吾人得助军阀以抗外人，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

三、我们与国民党之关系：1. 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2. 我们预（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3. 我们的同志倘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其经费受诸国民党者，应公开的支配，其帐（账）目只报告国民党；受诸本党者则对本党负责。

会议认为，国民党作为国民运动的主要力量固然是不可争辩的，但是，国民党的力量必须建立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之上。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以推动革命联合战线的壮大。

12 月 25 日，也就是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结束当天，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号召同志们全体加入国民党；当地共产党应与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

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共产国际也非常关注。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充实该党的政治纲领，1923 年 11 月 28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决议》总的指导思想是国民党要从依靠军事力量转到依靠民众上，对三民主义充实的新内容做出新的解释，使国民党真正成为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政党。

《决议》逐条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含意应当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不能把民权主义当做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把它看做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只有那



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只有将民生主义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民生主义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

共产国际所做出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成为11月29日发表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基本原则。

192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鲍罗廷等出席了会议。

与会人员在分别听取了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报告之后，通过了一些决议。

这些决议认为，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以后应该反对老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解；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中谋求职位；关于宣言问题，全体共产党员代表应当捍卫宣言中的所有条款；在组织问题上，不应用章程来束缚代表，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

1924年1月中上旬，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会见了前来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李大钊、张国焘等十多位共产党代表。孙中山将自己撰写的《建国大纲》给代表们传阅，希望他们提出意见。

中国共产党在深入研究《建国大纲》后认为，孙中山以前提出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训政”就已经表示共产党员一方面尽管参加国民党，一方面仍然可以保留共产党员的资格，因此，这个问题也不一定非要在文件上反映不可。中国共产党如果硬要提出来，将会引起国民党不必要的担心，直接导致国共两党的争论。

因此，多数同志表示可以采取妥协态度，不提出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再要求国民党接受“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的条件。虽然如此，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以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仍然被带到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

1924年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基本上赞同了国民党宣言草案，只在土地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提出了修正意见。

继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代表会议之后，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会议决定了大会会址和大会议事日程，推定说明人。

至此，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

1924年1月20日，由孙中山主持的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广州胜利召开。中共党人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等也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孙中山召集的这次大会，就是要学习列宁的组织方式，来改组国民党，恢复革命精神，以一个革命的有朝气、有力量的党去推动国家的改造。

在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强调了工人、农民的利益，决心不再与军阀官僚妥协和调和。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方针。孙中山指出："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定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

大会经过激烈的斗争，认识到不吸收年轻共产党员的参加，国民党不可能恢复朝气，因而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完成了国共合作的组织方式。从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确立。

国民党"一大"的另一项成果是制订和通过新党章。新党章明文规定以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复议之权。建立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这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也是此次国民党改组的重点。

这种基层组织的特点，一、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笼罩性，每个党员必须是某个"支部"或"区分部"的成员；二、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平等性，如在以地域划分的某个区分部里，属于同一区域的不同职业和不同级别的党员一起出席区分部会议，如孙中山住在甲区，即属于甲区的某区分部，逢区分部开会，便得以党员资格，和同一区党员中的花匠、司机一样列席；三、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凝聚性，在同一区分部里，党员之间一起开会、活动，交流思想，共同行动，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监督，使每个党员对党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四、在于它深入民间的渗透性，一方面"使国民党得尽力于民间"，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组织考察吸收新党员，以确保党组织的群众性和严密性。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对全体国民党员阐述说：“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此种办法，在能自由办党之地，固易获效；即在不能自由办党之地，亦殊有活动之可能。本党之决心改组以此。”

改组后，国民党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直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组织。在改组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由一个偏居海外的狭隘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础的动员型政党。

国民党的改组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的。国民党改组的成功，标志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完成。

国民党一大召开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具体帮助之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30日在广州举行。这是国民党通过党内改组方式实行联共的大会。①

当时，中国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并没有健全的地方组织，就是广州市的国民党组织也不够完备。因此，大会代表的产生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孙中山直接指派；有的是有共产党提名，孙中山批准；有的是由几个老国民党员联合提名，孙中山同意；有的由各省党员分别推选。在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23名共产党员。他们当中，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李永声、沈定一、谢晋由孙中山指定，林伯渠、毛泽东、李维汉、夏曦、袁达时、张国焘、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于方舟、王尽美、刘伯垂、李立三、陈镜湖分别由各省、市选出。共产党员约占代表总人数的1%。

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共产党员起了很重要作用。孙中山亲自提名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时李大钊还兼任国民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参加大会各项组织领导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还有：毛泽东任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谭平山任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于树德任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总数是200人；除此之外，还有8人享有正式代表的一切权利。②

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礼堂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共有173人。③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

大会开幕后，孙中山致开幕词。他说："今天在此开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接着，孙中山明确指出："从今天起，要把以前的革命精神恢复起来，把国民



党改组。”在讲到国民党改组的目的时，孙中山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政纲）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所以这次国民党改组，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④

孙中山讲话完毕之后，大会通过了三项议案：第一，确定大会主席团由孙中山指定的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第二，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会议规则》。第三，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秘书处组织规则》。

下午，孙中山作了关于《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孙中山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改组问题。”他说：“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此次改组，各种办法已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许久，今提出《中国国民党宣言案》，请秘书长将原文朗读。”⑤

大会秘书长刘芷芬宣读完《中国国民党宣言案》（即《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后，孙中山接着说：“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发表后，应大家同负责任。诸君系本党各省代表，宣言通过后，需要负责回各省报告宣传。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并应使之实现。此宣言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⑥

大会一致同意将代表大会宣言交付审查，并由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戴季陶、恩克巴图、叶楚伧、黄季陆、王恒、茅祖权、于树德、李大钊组成宣言审查委员会，对大会宣言进行详细审查、修改和作必要的补充。

大会在讨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时，孙中山发表谈话，再次强调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目的和任务。他说：“本总理之意，以为此次大会之目的有二：一、改组本党，二、建设国家。”⑦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

21日上午，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两项。第一项是听取谭平山代表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的关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活动情况的报告。第二项是建立党务审查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林森指定谭平山、廖仲恺、谢持、孙科、张秋白、王法勤、彭素民、邓泽如、刘芦隐组成。

下午，大会听取了戴季陶、胡汉民代表宣言审查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大会

宣言审查情况的报告。接着，孙中山在会上作了关于民生问题的说明。在发言中，他批评一些“本党旧同志骤闻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消息”，便“顿生”不必要的“怀疑”。他指出“对于此事怀疑尤甚者为海外同志。……盖华侨处于帝国主义政府管辖之下，深受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破坏俄国革命论调之毒，故发生种种怀疑不能自释”。他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在发言中，他称赞“进来俄国内政进步之神速，与前大不相同”，他重申联俄的必要，说：“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8]大会决定，宣言草案中的“民生主义尚需慎重审查，现指派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原起草委员共同再行审查，俟详细审查之后明日再付决议。”[9]此外，大会还听取了浙江代表沈定一、天津代表韩麟符所作的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工作报告。

22 日上午的大会议程主要有三项：一、听取孙科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的说明；二、成立章程审查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林森指定谢持、何世桢、谭平山、丁惟汾、廖仲恺、茅祖权、孙科、朱霁青、李守常、萧佛成、汪精卫、张知本、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毛泽东、石瑛、邓泽如、谢英伯共 19 人组成；大会决定《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交付审查。三、听取河内华侨代表陈觉醒等人所做的国民党海外工作报告。

下午，大会通过了《纪律问题决议案》和《海关问题决议案》，听取了柏文蔚所作的《军事报告》，决定由大会主席团起草慰劳前线将士电文。

23 日上午，大会听取了叶楚伧所作的关于《出版及宣传问题》的说明；决定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出版及宣传问题案》交付审查；成立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由孙中山指派戴季陶、胡汉民、叶楚伧、李大钊、冯自由、黄咏台、黄右公、刘成禺、白云梯九人组成。

下午，大会听取了胡汉民、戴季陶代表宣言审查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宣言草案审查结果的第二次报告后，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审查修改后的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之现状》。它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内军阀和“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其主子共同压榨中国人民。宣言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政治流派——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和商人政府派等错误的和反动的主张，认为只有实行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才是



中国的“唯一出路”。第二部分为《国民党之主义》。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采纳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政纲，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之反映了新时期的历史特点。新三民主义不仅是国民党改组的基本指针，在国民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第三部分为《国民党之政纲》。他阐述了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外债、确定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改善人民的生活等主张。

大会宣言通过后，孙中山在会上作了《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希望全体国民党员今后一定要贯彻大会宣言的基本精神。他说："现在本党大会宣言已经表决，这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但是我们表决宣言之后，大家必须以宣言而进行，担负此项实行责任。此次宣言不只在场代表共同负责，就是各省及海外的同志，均有负担此项革命的责任。我们从前革命均未收到好结果，……其原因大都是我们同志担负责任没有始终如一，所以不能贯彻革命主义。……大抵我们革命，在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定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相互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绝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所以今天通过宣言之后，必须大家努力前进，有始有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⑩]

24日上午的主要议程是：一、宣读苏联外交代表加拉罕给大会的贺电；并决定由大会主席团起草复电，交大会宣读，然后立即拍发。二、孙中山提出大会宣言应加入“厘定各种考试制度”一条，并委派汪精卫对此加以说明。大会通过了孙中山的这个提案。三、由汪精卫代表章程审查委员会作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的审查报告。四、中国国民党缅甸华侨支部代表黄馥生作海外工作情况的报告。

大会主席团在为孙中山代拟的复苏联外交代表加拉罕的电报中，再次提出了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彻底完成辛亥革命的事业，使中国摆脱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以“遂其再造”。复电表示相信：“中俄两国人民将共同提挈，以进于自由正义之途。”[⑪]

下午，大会通过了刘伯论提出的《制定党歌案》，并决定将韩麟符提出

的《北方军阀所辖各省区之党务进行，应否许党员对于本党章程有伸缩案》交章程审查委员会参考。

25日上午，叶楚伧代表宣传审查委员会作关于《出版及宣传问题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并通过了这个提案。

大会充满了联合苏联，学习苏联的气氛。25日上午，当孙中山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后，便立即赶到会场，中断了大会正在进行的议程，向大会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并向大会发表了纪念列宁逝世的演说。他说："现在俄国的首领列宁先生去世了，于俄国和国际上会生出什么影响来，我相信是绝没有的。因为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功夫，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此即为我们最大之教训。"[12]孙中山接着说："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担负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13]

为了悼念列宁逝世，大会作出决议：一、电唁苏联致哀；二、休会三日，以志哀悼；三、广泛宣传列宁的生平、事业，广州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在大会休会期间，孙中山每天下午给大家讲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

28日上午，汪精卫代表章程审查委员会作关于《中国国民党章程案》的审查报告。接着，到会代表就《中国国民党章程案》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有少数代表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增加一条文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14]他的意见得到黄季陆、江伟藩等少数代表的支持，但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

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共党员李大钊在会上发言，就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作了既诚恳又严肃地解释。他说："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15]在发言中，他强调指出："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吾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16]接着，他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



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17]最后，李大钊诚恳地说："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既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再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惟有猜测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除之。"[18]

李大钊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欢迎，"使大会一部分代表为之动容，会场情形几乎顿时逆转"，[19]从而挫败了少数代表的刁难与阻挠。

廖仲恺坚决支持国共两党合作，支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他说："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其意何居？彼等也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20]李大钊和廖仲恺的发言语重心长，说理精辟，产生了很大影响。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确认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这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取得的又一个重要胜利。

下午，大会听取山西、安徽、河南、福建等省的地方党务报告和西贡、神户等地的海外党务报告。

29日，大会通过了《党务审查委员会报告》，并讨论了《本党设立研究会案》、《请采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等议案。

大会在讨论这些议案时，代表中的中共党员大都坚持革命原则，积极发表意见。在讨论要不要在国民党中央设立研究会或研究部，以便对各种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意见，然后交付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执行时，毛泽东表示反对。他说："本席反对本案，因本案根本意思，把实行与研究分开，但本党为革命党，不能如此，本席意思，本案精神，可以成立，条文则不能成立。"[21]夏曦也发表意见说："本席不主张本案成立。因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党最高机关，此外不能另有所组织，致将实行与研究分开为两部。"[22]在讨论选举国民党中央机构要不要实行比例选举制[23]的提案时，毛泽东发言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

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24]接着他又说：“此制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25]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大会的赞同和重视。

30日上午，廖仲恺考虑到他参与起草并经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部分对外政策中，所阐述的反帝内容比较空洞，于是便提出动议，补充三点意见：“一、租界制度于20世纪之今日，尚任其存在于中国，实为中国人民族之耻辱，应由中国收回管理。二、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三、庚子赔款，当完全化作教育经费。”[26]孙中山听了之后，马上表示“非常赞成”。他说：“当初起草宣言之时，本总理曾嘱于对外政策，应列举事项，现在政纲中之对外政策仍将此三件事忘却，虽有概括之规定，犹嫌未能明白。本总理认为应将这三件事，大书特书。如今虽说有收回主权的话，都是空空洞洞，一无办法，未闻有说收回租界者。我们现在有了办法，实属可喜，极应加入，以补充之。……现在趁大会尚未闭会，赶紧将这个意思，加入政纲对外政策中，实为主要。”[27]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廖仲恺的提案，决定由孙中山亲自把提案内容加入大会宣言的政纲中。

30日上午大会还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大会决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前提下实行委员制。

会上，孙中山提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24名委员，“连本总理共25人”组成。[28]孙中山的这个意见得到大会的同意。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和代表的推举，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4名：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其中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是中共党员。接着，大会又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名：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伯渠、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其中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是中共党员。共产党员约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总数的1/4。

大会还选举了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月30日下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孙中山致闭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从此以后，大家分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去奋斗。……因为见到从前的奋斗尚不充分，所以这次要开大会，把全党改组。从前奋斗不充分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有了办法，就要诸君担负责任，拿这个办法，去替国人发生一个新希望！"[29]

大会一闭幕，孙中山便于第二天（1月31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于2月6日闭幕。会上，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会议推选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会议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除设秘书处外，还设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军事八个部。秘书处下设文书科主任一人，书记二人，印刷一人，录事三人，会计庶务科主任二人，干事一人。组织部部长由谭平山兼，内设秘书一人，指导员一人，统计登记各一人。宣传部部长由戴季陶兼任，暂由彭素民代理，内设秘书一人，编纂二人。农民部部长是林祖涵，内设秘书一人，助理一人。青年部部长是邹鲁，内设秘书一人，助理一人。军事部部长是许崇智，内设秘书一人，干事二人。妇女部部长是曾醒，内设秘书一人，助理一人。调查部部长暂时未定，内设秘书一人，干事二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和秘书杨匏安，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和秘书彭湃。3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决定增设海外部，推选林森为部长；并通过了组织部的提议，决定派遣各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分赴各省建立国民党组织。担任这项工作的中共党员有湖南夏曦、直隶于方舟、山西韩麟书、湖北刘芬、江苏张曙时、浙江沈定一、热河韩麟符、江西赵干和邓鹤鸣。[30]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是因为：第一，这次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操纵下的军阀政府，争取中国独立、民主、富强的奋斗目标。宣言的通过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辉煌成就，为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了国民党。这样，这次大会就成为首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标志，成为第一大会革命兴起和发展的起点。[31]

第二，这次大会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斗争30多年之后，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推动下第一次召开的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孙中山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使原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极为涣散的国民党实现了改组，获得了新生。会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进一步帮助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国民党改组后，清洗了一部分反动分子，吸收了大批新党员，使国民党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部分党员是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如广东省各县党部，"十分之八是代表农民的"，广州市党部所属党员，"十分之六都系工人，市党部的基础亦建立在工人的上面了。"[32]又如山东省党部所属党员，"学生占百分之四十，工人百分之二十五，教师百分之十五，其他百分之五。"[33]这样，国民党就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有了朝气。虽然国民党内原有的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凡表面上不反对孙中山改组政策的仍然继续留下，并占有一定地位；但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从此，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大革命的浪潮迅猛兴起，中国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革命新局面。[34]

第三，这是孙中山亲自领导和主持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不久，孙中山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了。因此，这次代表大会在反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意志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摆脱"艰难顿挫"的困境、开创革命新局面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同时也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国共合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使孙中山完成了他革命一生中的一次重大的转折。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35]国民党一大所作出的各项决策和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孙中山晚年留给广大革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新篇章。从广东掀起的革命风暴，很快就席卷了全国。"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36]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绩。[37]

注释：

①黄修荣：《第一次国共合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13页。

②同上，第114页见注释①

③同上，第118页。

④《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号，广州，1924年，第1、2、4页。

⑤孙中山：《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之演述》，刘芷芬编，《孙总理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大会秘书处，1924年2月，第7、10~11页。

⑥同上，第11页。

⑦孙中山：《对于组织国民党政府案之说明》，刘芷芬编，《孙总理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大会秘书处，1924年2月，第14页。

⑧《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4号，广州，1924年，第2、6、27页。

⑨同上，第27页。

⑩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刘芷芬编，《孙总理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大会秘书处，1924年2月，第22、23~24页。

⑪《孙总理复俄代表电》，《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1月25日。

⑫孙中山：《政党制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首领一人之演说》，刘芷芬编，《孙总理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大会秘书处，1924年2月，第24~25页。

⑬同上，第26页。

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广州，1924年，第68~69页。

⑮《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105页。

⑯同上，第105页。

⑰同上。

⑱同上，第106页。

⑲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中），《掌故》月刊第42期。

⑳《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广州，1924年，第71~72页。

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4号，广州，1924年，第77页。

㉒《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4号，广州，1924年，第78页。

㉓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选举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各政党派别依据竞选中所的选票在总票中的比例而分配享有议员之议席。

㉔《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4号，广州，1924年，第81页。

㉕同上，第82页。

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6号，广州，1924年，第95页。

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6号，广州，1924年，第96~97页。

㉘同上，第100页。

㉙孙中山：《闭会词》，刘芷芬编，《孙总理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大会秘书处，1924年2月，第32、34~35页。

㉚黄修荣：《第一次国共合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28~139页。

㉛黄修荣：《第一次国共合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39页。

㉜《谭平山先生党务总报告》，《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1926年4月10日。第44页。

㉝《山东省党部党务报告》，《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5月，第6页。

㉞黄修荣：《第一次国共合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39~140页。

㉟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㊱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335页。

㊲黄修荣：《第一次国共合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41页。

李大钊的意见书和国民党章程草案的通过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这是国民党通过党内改组的方式实行联共的大会。[①]共产党人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等出席了此次大会。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指定李大钊、胡汉民、汪精卫等5人组成主席团，帮助他负责领导大会的工作。李大钊还被指定为大会宣言的审查委员、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和宣传问题审查委员，参加大会的宣言和党章的最后审定工作。李大钊是与会者中间兼职最多的一人，也是工作量极为繁重的一人。

大会的第一天孙中山总理致开幕词。他说此次大会的目的第一，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的政党；第二，通过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他在会上还特别提到，要非常重视和学习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和他自己十多年来所经历的种种失败的教训。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反映了孙中山以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②]《宣言》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作为国民党新时期的三大政策。

国民党一大通过提案把联共案写入了国民党章程，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政策被国民党承认。但是这个联共案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才获得通过的，而反对势力主要来自国民党右派。从联共案的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共合作所遭受的阻力。

其实早在1923年11月29日，国民党右翼势力邓泽如、张继、林直勉等11人以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向孙中山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污蔑攻击共产党，反对改组国民党。他们认为共产党帮助孙中山确定反帝反

军阀的纲领，对外会使国民党与列强结下仇怨，对内会断绝军阀等实力派对国民党的协助。但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并不因此而动摇，他对邓泽如说，中国的革命是帝国主义所不乐意看到的，因此他们勾结军阀以扑灭革命势力。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同情我们的，只有俄国和其他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才会对我们表示同情。同时也指出他们攻击党章、党纲和组织法完全是“疑神疑鬼”[③]，在孙中山看来，“容共”使国民党“补充了新鲜血液”而产生了“新机”，因而免于在堕落中死亡，那些反对联共决策的人“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④]因而他对张继等反对联共感到“甚不悦”[⑤]。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对于要不要制定和通过一个联共决议案，一部分国民党元老林森、邓泽如、谢持、方瑞麟等和一些海外代表就曾在广州太平沙的一个住宅里碰头，预备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采取取缔防止措施。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在联共案没有进行讨论前，黄季陆在孙中山面前大谈联共之害，并联合一些其他代表提案反对孙中山联共，他表示国共两党就如同砂子和石头一样，不能混合。林森、谢持等人都同意黄季陆的观点。

1924 年 1 月 24 日在一大的党章审查委员会中，审查委员何世桢提议“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这就是所谓的“不许跨党案”。何世桢表面上反对国民党员加入他党，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由于许多审查委员的反对，在审查委员会上，委员们建议何世桢将原建议撤回。但汪精卫坚持要将此案提到大会全体代表会议上去讨论。

一场尖锐的矛盾看来难以避免。1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党团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参加的有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和鲍罗廷等。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俄文记录稿记载，李大钊说：“我认为需要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宣传，彼此互不了解。国民党的许多党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什么是共产党人，他们要在党内干什么等等。既然各种各样中伤我们同志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说什么我们是国民党的异教徒，或者说我们是冒险主义者等等，我们最好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表明我们的真正面目，阐明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某些最老的国民党员现在认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要利用他们的经费干自己的事情，是要抢他们的饭碗，占他们的位置。”毛泽东接着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说明，我们加入国民党是为有所贡献于国民党，而不是向他们索取什么。”李大钊说：“显然，他们是这样一种心理，他们人



党时，目的是在于靠党升官发财，或者还要得到别的什么东西。他们以自己的这种心理来揣测我们。”“汪精卫在代表会上作报告以后，我们可用共产党人名义发表一项声明，说明我们是怎么样加入国民党的。”毛泽东说：“我同意李的意见。”李立三说：“我坚持要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削弱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发表声明，那么这种办法在中派中可能会逐渐消除疑虑。”鲍罗廷也表示同意。他说：“由于汪精卫将代表委员会作主题报告，因而在该报告中也要涉及共产党员问题，那时可由一位同志发言，阐明我们的观点。同时，希望当着孙的面做这件事情。”李大钊又说：“我们应当发表一项声明，说明我们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我们不是要从国民党攘窃什么。如果国民党不需要我们的帮助，那就不要。如果有任何怀疑，那就要讲明。我们的主席清楚我们加入国民党的整个过程，清楚我们为进行斗争而结成一条战线。”最后，会议根据鲍罗廷的建议，组成一个由李大钊负责的两三人组成的小组，起草这个声明。[6]

按照会议议程，联共案在1月28日被纳入《中国国民党章程》的议案中。28日上午10点，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共有143名代表参加，胡汉民为执行主席。当汪精卫宣读章程审查经过时，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要求发言。他主张在国名党章程总章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人他党。方瑞麟的理由是一个党员只有一个党籍。这明显的是针对共产党人而言。因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仍保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籍，国民党人称这些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人为跨党分子。根据方瑞麟的提议，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要么脱离共产党党籍，要么脱离国民党党籍，二者必居其一。这个提议是跟孙中山的联共思想唱反调的。

方瑞麟的提案抛出后，有10多人附和。108号代表江伟藩发言说：既然加入了国民党，就应信仰它的主义，遵守党章，始终归服国民党，尽忠党务，不能再兼外务。黄季陆对方瑞麟的发言也“表示相对的赞成”。他认为既入此党，又入他党，这种“跨党”的行为，应该要有一个明文的适宜的规定。也有人提出，关于跨党一事，“非经总理许可不得加入他党”。

针对国民党右派反对跨党的言论，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严正申明，光明磊落、理直气壮地批驳了国民党右派的谬论，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同时大会还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这份意见书的油印件至今仍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李大钊在发言中首先申明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理由及其原委：今日的中国，若想解除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必须依靠全民族的力量进行国民革命。而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要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我们环顾中国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恢复民权、奠安民生的重任”，所以共产党才毅然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想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有所贡献，而不是为取巧讨便宜的行为。

针对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跨党”的指责和猜忌，李大钊解释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不是一个团体的加入，可以说我们跨党，但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为服从国民党主义、遵守国民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成共产党。李大钊又说：我们加入国民党是为从事国民革命，然而我们又不能因为加入了国民党而脱离了第三国际的组织。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又是国际的。因此，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实际有两重的责任：一是尽一个国民党员普通的责任，而是为国民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孙中山先生允许我们保留第三国际的组织而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李大钊在声明中最后表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几经研究慎重决定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而一旦加入进来，共产党人即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章程和纪律，如有违反，理应受到惩罚。国民党既然允许共产党参加，就应开诚布公，不必猜忌防制，否则将会成为国民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成为革命事业潜伏的危机。李大钊诚恳地说：“自今往后。我们与先辈诸同志共事之日正长，我们在本党（国民党）中的行为和态度，当能征验我们是否尽忠了国民革命的事业，即以尽忠于本党，愿我先辈诸同志提携而教导之。”

李大钊一番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与会代表，会场的情形马上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人汪精卫、廖仲恺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汪精卫反问方瑞麟等人：吴稚晖、李石曾等人都是无政府党，我们也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廖仲恺更是对对方的提案表示强烈反对，他支持李大钊的立场，诘问方瑞麟：我们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能服从我们的主



义，革命能彻底，那一切都不成问题。况且加入国民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就不必多问。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我们党的新生命、新血液。如果你们不以为然，那么请闭目静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意图吧：他们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来和我们一起进行国民革命的！请大家三思。⑦

由于联共早已成为孙中山的既定计划，反对联共不仅为孙中山所不容，也遭到了国民党左派的极力反对。因此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表示赞同李大钊的声明。最后主席团胡汉民打圆场说：刚才大家的议论，实际上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的焦点，是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这些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有专门章节，就不必在章程上增加条文了。

胡汉民话毕，毛泽东便大声说：主席！39 号要求发言，我主张本案停止讨论，请付表决。

于是胡汉民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宣布：现在付表决。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在章程中用明文进行规定。同意的，请举手！

结果大会否决了方瑞麟、黄季陆等的提案。

这样经过激烈交锋，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原则，最终被国民党一大确定，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注释：

①吴家林：《中国现代革命史人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 1 月，第 165 页。

②同上。

③《孙中山全集》第 8 卷，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458 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 541 页。

⑤张继：《回忆录》，《国史馆丛刊》第 1 卷第 2 号。

⑥李玲，戴红叶：《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的由来》，《党的文献》1989 年第 5 期。

⑦《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3 页。

廖仲恺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廖仲恺是鼎力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首次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主要助手，在国共联合战线实现后的新形势下，他又模范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忠诚地与共产党人携手合作，为巩固与捍卫两党联合战线努力奋斗，以至献出自己的生命。[①]

早在国民党酝酿改组之时，廖仲恺同共产党人的合作已经开始了，而且随着改组工作的日益进行而日趋亲密。[②]

1923年10月，孙中山将筹划国民党改组的具体工作托付给新组织起来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并由廖仲恺全力主持这一工作。当时身为中共中央驻粤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谭平山也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实际上，廖、谭是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内的两根台柱子，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到上海，廖仲恺总是与谭平山一道进行工作。他们互相信赖、互相支持，从而保证了各项改组筹备工作的预期完成。何香凝后来忆述道：当日因为反对改组的人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多数人“不肯实际的负责任，除了九个人中之一的谭平山帮忙之外，担子差不多都要廖先生肩着了”。[③]

国民党“一大”之后，廖仲恺更全力支持共产党人担负国民党的各级领导工作，并始终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24年1月31日，当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国民党领导机关分工时，廖仲恺主动将原定由自己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让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产党员谭平山兼任，而自己则担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工人部部长。[④]在他的支持下，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首届农民部部长。这次中央全会决定在上海、北京、四川、汉口、哈尔滨等地组织建立国民党执行部，以监督与指挥各地区的党务工作。会间，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负责起草了中央执、监委员分赴各地工作的分工名单。[⑤]按照这份名单的分工，共



产党员李大钊、于树德、于方舟、张国焘被派往京津组织执行部，毛泽东、瞿秋白被派往上海组织执行部。以后，两地国民党执行部正式成立，他们都担负不同的领导责任，从而开创了这两个执行部所辖地区国共合作的新局面。[6]

黄埔建军，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廖仲恺作为黄埔军校的主要筹建者和重要的政治指导者，注意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始终坚持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7]黄埔军校正式筹备工作开始，廖仲恺代行筹备委员长之职，他除请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入校工作，并紧紧依靠和团结了国共两党同志。他对经李大钊介绍到广州来拟担任广东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共产党员张申府"非常热情"。常同张"谈军校工作"，希望张"能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当张申府开列出周恩来等几个人的名单后，廖仲恺十分高兴，表示可以汇给旅费请这些人回国。廖仲恺还让张申府参加主持军校学员入学的口试等工作，并呈请孙中山任命张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军校初期的政治领导工作。[8]1924年9月，从法国留学归国的共产党员周恩来来到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廖仲恺经谭平山的介绍，很快认识了周恩来。11月中旬，因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元冲将随孙中山北上，政治部无人负责，身任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即推荐周恩来，并亲自迎接周到军校任政治部主任。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廖仲恺放手让周恩来主持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经常与周纵论天下大事，并称赞周"是共产党的大将。"[9]在廖仲恺的赞同支持下，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东征陈炯明时，周恩来担任了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同年，共产党员包惠僧、鲁易先后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等职。在此期间，还有一批共产党人在军校担负各级政治领导工作，从而使军校的政治工作搞得生气勃勃。3月，孙中山因肝病复发不治而亡后，黄埔军校内反共情绪增长，国共两党分子时有纠纷发生。在"双方争论不开时，经廖先生了解说服，双方都能听他一言以为决"。[10]他还经常劝勉共产党人以坦白的胸怀多做国民党人的工作，发挥政治部门在加强两党合作关系方面的作用。当政治部主任包惠僧表示不太想去请胡汉民来校给学生做报告时，他即对包说："我了解你是一个热情任事、勤谨工作的同志，所以我想把你的政治关系从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将来你的工作就做得更多更好。……你是政治部主任，你应该为学生多请几个老师；你是共产党员，做的是国共合作的工作也应该多同国民党的同志联系"。[11]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团结

关系，廖仲恺是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唤起工农大众，是两党合作的又一个方面。廖仲恺以工农部长的身份，始终信赖地让共产党人参与工农运动的领导及实际工作。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他长期让共产党员冯菊坡任秘书。当时中央各部均不设副部长，秘书实为部长助理。国共合作实现后，廖仲恺身任中央党、政、军、财各部门近20个职务，工作更加繁忙。工人部的事务，他多交由共产党人实际主持经办。[12]如工人部在广东油业工会内开办的工人运动讲习所，他就指派“由冯菊坡做教务主任，刘尔崧、梁景然、施卜等讲课”。并请谭平山等前来做报告。[13]1924年5月，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廖仲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4]但实际工作多由共产党员刘尔崧等主持经办。8月间，廖仲恺倡导的广州工团军正式成立，他又支持共产党员施卜出任广州工团军团长。1925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后，廖仲恺出任该会顾问，热情地支持共产党员、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及干事局长李森领导工人进行斗争。当罢工委员会提出斗争的中心策略“特许证”制度时，廖仲恺即代表政府核准施行。他还到第七次罢工代表大会上宣布：“政府方面已委任商务厅长、公安局长与罢工委员会所指定之委员一二人办理发给‘特许证’。此种‘特许证’经外交部长签名之后，即完全有效”。[15]

廖仲恺还大力支持共产党人开展农运工作。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成立后，他极力支持共产党员、该部部长林祖涵及秘书彭湃的工作。1925年5月，廖仲恺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之后，常于工作繁忙之中关心并过问农运工作。由于他大力支持彭湃提出的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于6月30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9次会上获通过。

会后他又努力帮助彭湃等筹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促成它早日开学。8月间，廖仲恺放手让共产党人组织农民自卫军，他曾对广州农民讲习所第二届主任、共产党人罗绮园说：“你们也把农讲所学生组成农民自卫军的模范队迁来省长公署驻扎，加强训练”。8月27日，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由彭湃担负主要领导职务。[16]同年11月，廖仲恺兼任农民部长后，处处信赖彭湃等共产党人，让他们分赴各地区组织农民协会，指导农民进行斗争。12月16日，他亲自代孙中山草拟命令，指派彭湃和共产党员、铁甲车队党代表廖乾五为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率领部队驰赴广宁支持农民协会的抗租反霸斗争。1926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后，廖仲恺又大力支持农民部秘书彭湃出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省农会



丰办事处主任等领导职务。正是国共两党的联合努力工作，保证了广东全省农民运动普遍有计划地蓬勃向前发展。

国共两党联合战线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随着黄埔军校和广大工农群众日益组织起来，广东革命根据地正酝酿着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巨大风暴。这一切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恐惧和仇视。[17]由买办、地主阶级代表人陈廉伯、陈恭受等把持操纵的广州商团，充当了反动势力进攻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急先锋。商团头目们就曾恶毒攻击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说什么“联共”政策是赤化广东，并进而用“实行‘公夫公妻主义’等恶言，诬诋政府”。[18]他们还散布“广东共产在即”，“孙中山要实行共产主义，商人阶级不能存在”，“非立即起而团结自卫，商界必亡”。[19]商团头目们召开联防大会后在筹划叛乱的过程中，更疯狂的以“反共产”相标榜。1924年8月，商团总部以“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名义致海外侨胞的公函中，则公然诬诋广州革命政府“查其用心，不外以实行共产为最终目的”。并叫嚣：“总之时至今日，孙氏既决心引共产党为心腹，与全粤人民为仇雠，我粤人为自救计，惟有拼为最后之牺牲，以与此祸国祸粤之共产党政府，决一死活！”[20]广州商团妄图以发动一场叛乱来颠覆革命政府、进而摧毁国共两党联合战线。

廖仲恺清楚地认识到：“阴谋叛乱的广州商团是国共联合战线的凶恶敌人。为了捍卫国共联合战线以尽革命事业”，“在广州商团事件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21]为协助孙中山扑灭商团叛乱，他在共产党人支持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在接受孙中山的委任，担任了平叛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秘书、兼军事监察后，廖仲恺在共产党人谭平山等支持下，大力协助平叛军事指挥蒋介石团结、调度政府所辖各军，进行讨平叛逆的斗争；同时他又命工人部事先派遣团军潜入西关为内应。10月15日，政府各军经数小时战斗，就一举荡平了商团叛乱。这一斗争的胜利，稳固了广州革命政府，也捍卫了国共联合战线。[22]

孙中山逝世前后，又有隐混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滇桂军总司令杨希闵、刘震寰同滇、粤军阀头目唐继尧、陈炯明相勾结，妄图以“联军”的叛乱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和葬送国共联合战线。在策动叛乱的过程中，他们公然抛出了“把广东从共产党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反动口号，[23]并诬蔑廖仲恺、谭平山等“利用俄人，私相勾结，代彼宣传，冀以少数党人专制国命”，叫嚣

"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在所不恤"[24]

当时，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对杨、刘的谋叛阴谋一味姑息养奸。廖仲恺对此十分痛心，他同加伦等人强调："我们必须搞一套计划，强迫胡汉民执行"。[25]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帮助支持下，廖仲恺承担起粉碎杨、刘叛乱决策的重任。

由于廖仲恺的周密计划与部署，才使东征军能顺利回师广州，与驻广州附近各军一道，于6月12日一举歼灭叛乱的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杨、刘的覆灭，挽救了危在旦夕的广州革命政府，也巩固了国共联合战线。为维护国共合作，廖仲恺对国民党内部企图破坏两党联合战线的言行，及时而严肃地加以揭露，并同其不断坚决地进行斗争，直到自己生命最后的一息。[26]

还在孙中山生前，廖仲恺就不断及时揭露党内右派分子危害国共联合战线之阴谋行径，协助孙中山制止他们的反共分裂活动。国民党"一大"后不久，反对跨党的元老党员冯自由等人"多以革命的老资格自傲，与新进的中共党员有点格格不入"，将"反对中共党员跨党"的调子高唱入云，树起了"反共旗帜"。[27]1924年2月上旬，冯自由又伙同刘成禺、谢英伯、徐和清等人泡制出一份危害两党联合战线的"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掠夺国民党党统案"，准备发难。廖仲恺知道后，及时向孙中山报告，指出冯自由等"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28]揭露其阴谋。孙中山闻讯后，即谕大本营秘书处转函冯自由等，传冯等四人至大本营加以训斥，谓："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29]并责令冯等写出书面检讨，使这一反共提案结果胎死腹中。

从1924年5月份开始，上海与广州等地不断出现国民党员"弹劾"共产党人的事件。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7月4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等人借共产党党团问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抛出"弹劾共产党人书"。该弹劾书骇人听闻的说什么"共产党党团在本党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并攻击共产党人的宣传活动"已摧毁合作之界线，而妨碍合作之精神"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跨党之中共党员"从速严重处分"。[30]由此引起一场冲击国共联合战线的轩然大波。为解决这场纠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7月3日集会，议决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讨论此案。8月15日，国民党一届二



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以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身份参与主持会议，及时向政治委员会和孙中山汇报情况，参与政治委员会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决策。由于廖仲恺的努力，加上共产党人瞿秋白等在会上的斗争，8月21日一届二中全会接受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的两项议案：（一）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会，由国共两党成员及苏联顾问联合组成，以沟通声气，消除误会；（二）发布《国民党内之共产党派问题》的训令，说明国共合作之必要，重申“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凡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属性如何，吾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31]从而挫败了邓泽如、张继等人破坏国共联合战线的计划。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之后，廖仲恺忠实地继承孙先生的遗志，同破坏国共合作联合战的右派势力，进行了更为坚决的斗争。

当时，冯自由等组织的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扯出了“反共、分裂”两面黑旗。这个俱乐部的反革命纲领是：“第一，反共产，反苏俄；第二，开除共产派；第三，反对罢工，破坏工人阶级组织；第四，各派老国民党大团结”。[32]不久，章太炎、唐绍仪等人也在上海组织了“辛亥俱乐部”及“反赤大同盟”，与冯自由等相呼应。对于上述京沪两地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联合战线、分裂国民党的罪恶活动，廖仲恺一开始就主张严惩。在他的推动下，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党发出通告，指出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等，“并非本党同志所组织”，乃属非法团体，其一切活动与国民党“毫无关系”。并申明对加入该“俱乐部”又不悔改之人，要按党纪给予严肃处理。[33]3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6次会议在廖仲恺主持下，决议对冯自由、江伟藩等给予除名处分。[34]4月23日，国民党中央依会议精神发出第318号通告，将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一批右派党员开除党籍。[35]这一果断处置，不仅保证了国民党自身的纯洁性，也捍卫了国共合作战线。

这期间，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的右派势力又抬头了，“原来处于中派地位的党员便逐渐地转到右派一边”，[36]而平时以“中派”面目出现的、在党内踞有高位的胡汉民，“隐然为反共之领袖”，[37]“所谓右派之‘中委，……每为胡之马首是瞻’。[38]为了遏止中央党部内的右派势力兴风作浪，廖仲恺挺身而出，为继续孙中山事业和捍卫国共两党联合战线而斗争。一方面，他从理论上揭露右派们的反动本质与手段。5月，他在共产党人主办的

《革命》周刊上发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党中，必然发生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反革命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为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或竟亲自去勾结军阀、官僚与帝国主义者以打倒革命派的势力"；"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迫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那些"自诩老革命党"的人，"何时有反革命的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39]同月21日，他在广州的一次党员大会上，又尖锐地指出："近来反对党谋破坏本党者，其手段愈演愈妙，彼等知道公然反对本党主张、必然不能得群众之信仰，故乃投身国民党，造出一'共产'、'赤化'、'亲俄'等名词，以图在党中捣乱，破坏本党，是诚谋陷本党最毒之手段也！"[40]

另一方面，廖仲恺于广州革命政府平定杨、刘叛乱之后，在左派势力与共产党人支持下，积极促成与筹划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广州国民政府，并力主统一军、民、财政，以削弱右派元老们在党内的权势。如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代帅胡汉民仅任政府外长闲职，右派势力也随之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右派的中央委员们对廖仲恺更加仇恨了，他们"污蔑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攻击廖仲恺过分袒护共产党人，阴谋驱逐、伤害仲恺。[41]胡汉民曾对黄季陆授计说："在第一届的中央委员里面，我们还是多数。你赶快到上海去见季陶、右任、惠生、子超、协和等人，叫他们赶快到广州来，我们召开一次一届四中全会，再商量出一个办法"。为此，胡汉民还亲笔写了"十几封信"，叫黄带往沪、京等地。[42]在这些阴谋一一破产后，国民党右派集团终于决定采用最卑劣的暗杀手段，于8月20日趁廖仲恺出席中央党部例会之机，将廖刺杀在党部门前，廖仲恺为捍卫国共联合战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廖仲恺始终竭诚地履行国共合作及坚决地捍卫这一联合战线。这是因为：他从世界发展大势出发，懂得中国革命离不开国际无产阶级之帮助，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深刻的认识，醒悟到："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43]；认定中国国民革命"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不可！"[44]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及革命中坚分子，他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实施两党联合共举革命的重大决策和遗愿，表现出无限忠诚，将巩固、捍卫国共联合战线，作为自己应尽的神圣职责。[45]他不愧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真正斗士，孙中山先生政策的最忠实拥护者。



注释：

①周兴樑：《廖仲恺维护国共联合战线的努力与贡献》，《贵州社会科学》第10期，1989年。

②同上。

③何香凝：《国民党改组的前后回忆》，《华商报》香港，1941年6月14日。

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集，第290页。

⑤《纪念廖仲恺、何香凝》图片集，第76图廖仲恺亲笔草拟名单照片。图片原说明误为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名单。

⑥周兴樑：《廖仲恺维护国共联合战线的努力与贡献》，《贵州社会科学》第10期，1989年。

⑦同上。

⑧张申府：《筹办黄埔军校点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98~99页。

⑨廖承志：《教诲铭记心，恩情重于山——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人民日报》1978年3月21日。

⑩方鼎英：《我在军校的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73、74页

⑪包惠僧：《大革命时代在黄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142页。

⑫周兴樑：《廖仲恺维护国共联合战线的努力与贡献》，《贵州社会科学》第10期，1989年。

⑬罗醒：《廖仲恺扶助工农运动》，《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2、6页。

⑭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03页；《工代会十六次会议决案》，《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5日。

⑮《在省港罢工工人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提案》，《双清文集》上卷，第864页。

⑯罗绮园：《回忆》，《犁头》第13期。

⑰周兴樑：《廖仲恺维护国共联合战线的努力与贡献》，《贵州社会科学》第10期，1989年。

⑱《致各属商会商团电》，《廖仲恺集》（增订本），第205页。

⑲《工商界老人回忆商团事变》，《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59页。

⑳《广州扣械潮》卷2文件，第103～104页。

㉑《关于1924～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6页。

㉒周兴樑：《廖仲恺维护国共联合战线的努力与贡献》，《贵州社会科学》第10期，1989年。

㉓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239页。

㉔《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7页。

㉕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69页。

㉖周兴樑：《廖仲恺维护国共联合战线的努力与贡献》，《贵州社会科学》第10期，1989年。

㉗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下），第237～238页。

㉘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16页。

㉙《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档案与历史》第1期，1986年。

㉚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13～415页。

㉛同上，第421～422页。

㉜蔡和森：《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剖析》，《向导》第111期。

㉝《冯自由等最近在京之叛党活动》，《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27日。

㉞《国民党第七十次会议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4日。

㉟《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通告》，《党声周刊》第62期。

㊱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60页。

㊲蔡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343页。

㊳罗翼群：《廖案感旧录》，《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109页。

㊴《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双清文集》上卷，第757～760页。

㊵《本党之集会》，《党声周刊》第65期。



㊶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第60页；同见蔡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348页。

㊷蔡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336页。

㊸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第63页。

㊹何香凝：《在省港罢工工人第七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双清文集》下卷，第12页。

㊺周兴樑：《廖仲恺维护国共联合战线的努力与贡献》，《贵州社会科学》第10期，1989年。

中共中央研究制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今广州市延安路鲁迅博物馆）隆重开幕。大会代表共有197人，出席当天会议的有165人。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积极的意义，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起来。在这次会议上规定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上海、北京、汉口三个执行部的组织机构中都有一些共产党员担任重要的职务，在各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中，共产党员也不少。在国民党“一大”以后，经过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共同努力，国民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党员人数大量增加，使国民党成为全国性的大党，而且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大量加入，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大大增强。但在国民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严重情况。有的地区和单位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不按章程办事，不是从加强教育和训练人手，而只从组织上发展，不问条件、不问其人品如何，便拉入党内；有的地区则集体入党，导致有的党员入了党还未见过国民党的纲领，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入了党。这种情况导致有些地方和单位，人员众多，而工作开展甚少。随着国民党队伍一步步地扩大，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给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中共中央开始思索如何制定和开展在国民党内的工作，进一步促成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国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地为实现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而竭尽自己的全力。马林提出了“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得到了陈独秀的赞成。

对于共产党来说，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和随之而来的大革命高潮，也跨上了新的台阶，从原来狭小的圈子里走了出来，登上了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在更大的群众斗争场面中得到了锻炼，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国民革命运动内部各种进步势



力，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于1924年召开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极其态度决议案》。针对当时一部分共产党员存在着瞧不起国民党、不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共事的错误倾向，《决议案》提出了批评，要求共产党员主动和国民党员搞好团结，共同前进。对广大国民党员，要"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已逐渐转变他们的态度"；"即对他们中间的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在国民党内，则应起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国民党开会时，我们的同志均应按期到会，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我们的同志均应努力工作"。"使其真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真成为三民主义的党"。[①]全会还决定安排一部分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任职。但"必须选择能干而且适宜于国民党某种工作的同志"。[②]全会的这些决定，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积极负责精神和同国民党合作的真诚态度。

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年幼的党，对于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没有经验。因此，三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案明显地存在着缺点和错误，表现在：第一，《决议案》虽然提出国民党员中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人，但对他们却没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而是不问其政治态度如何，都一概采取"扶持"和"联络"的方针，甚至对那些"腐败积极分子"，也只是"敬而远之"和尽量避免"冲突"的态度，不敢对他们的反动倾向进行斗争。这种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方针，不利于克服国民党内早已存在的消极倾向。第二，《决议案》提出"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活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工作。"[③]这实际是在中共"三大"批判过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一错误的翻版。这样做必将导致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模糊共产党的旗帜的严重后果。

三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执行，一方面收到了许多积极成果。即：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恢复和发展了工人运动，使一些在"二七"惨案中被摧毁的工会组织得到了恢复，农民运动也初步开展。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今沈阳）等城市已开始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右的倾向，即：由于强调帮助整个国民党和避免统一战线内部的分歧而忽视了对国民党内客观存在的右派势力的斗争，造成了妥协退让局面；由于集中力量于国民党工作而忽视共产党工作，许多

的问题都由国民党来解决，共产党的组织活动陷入了停顿的状态，以至于党员的训练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等重大的事情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集中力量于国民运动而忽视了工人运动，在有些地方出现了以国民运动取代工人运动的倾向。如广东的工人运动在这段时间内，完全纳入了国民运动的轨道，其他地区的工人运动也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停滞的局面。

面对种种的情况，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以后5个月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已经存在的右的倾向，正确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调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运动中的方针政策，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工作，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5月10日～1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三人；特邀代表张国焘和沈定一；湘区、京区和上海、汉口、山东三个地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这次大会。

会议听取了陈独秀代表中央局作的政治报告和上海、汉口、湖南、北京、山东等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着重讨论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问题。

会议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在工作中有“偏重组织，忽略宣传”的倾向。指出，我们应该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健全各种组织机构，吸收“接近国民党的分子”加入国民党，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唯一主要工作。会议强调：“一个政党的扩大，只能在经常不断的普遍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宣传及行动过程里。”“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地有规划地宣传‘宣言’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绝不能先求国民党数量上的扩大，而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④]

会议在分析国民党的状况时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社会成分比较广泛的政党，“有各阶级的分子在内”[⑤]，“绝不能同等的代表各部分的利益”[⑥]，因而存在着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和斗争。会议批评了那种为维护国民党的统一而调和两派斗争的错误。指出，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国民党内两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⑦]。“孙中山及其他目前少数左倾分子（国民党中极其重要的人物）尚有意联络我们；其余大部分右倾，即不主张和国际帝国主义反抗的分子，则极力明的或暗的排挤我们。”[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



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⑨]

根据上述分析，会议确定：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方针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势力。”会议指出，我党必须争取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利用各种机会批评右派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错误，削弱右派势力。同时，用种种方法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扩大左派。

其次，会议讨论了党的组织、宣传教育问题和党、团关系问题。

在京、沪等五个区委的汇报中，普遍反映由于忙于国共合作的工作，忽视了共产党自身的建设，致使共产党内存在着组织发展不快，党员教育训练不够和干部力量缺乏等问题。为此，会议指出，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要求我们党“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我们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里工作，而这一政党的性质——根本上便有组织形式上的浮动性，对于我们自己的党也就有大影响——因此我们自己的党更要有非常明显的组织形式。”会议还强调要在产业工人中吸收党员，以便“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唯一组织。”

为了提高党员素质，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内教育。为此，决定党校培养指导人才。

会议认为，以前由于党和团的工作未能分开，使团日渐党化，失去青年群众组织的特点，又使大量成年团员留在团内，不利于党的发展。因此决定党和团的工作应该分开，青年应以青年运动为中心工作。会议要求团组织应吸收20岁以内的青年入团，团员年龄最多不超过25岁。超过者，应由党和团的地方组织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查，把够条件者吸收入党。

会议还讨论了工会运动问题和党在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最后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决议案》、《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S. Y工作与C. P关系决议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指针。

这次会议纠正了中共在国民党工作中一度出现的右的倾向，并且根据国共合作后5个月的实践经验，具体规定了中共在国民党工作中的方针，强调在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后必须注意党的独立性以及加强中共自身的建设等等，都是正确的。和中共“三大”时期相比，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这次会议也是有不足之处的：第一，会议在指出党在国民党过去

的工作中偏重组织，忽略宣传的偏向以后，决定“以宣传工作为主要，而组织工作次之”，说“宣传更重于组织”，这是不正确的，这样会放松在国民党内争取“中心地位”的努力。第二，会议认为中共“三大”决定产业工人参加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决定今后产业工人尽可能不再加入国民党。这样就会使国民党内工人党员减少，削弱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不利于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和在国民党内起领导作用。

这次会议明确了如何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以及在工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怎么处理好各种矛盾，使工作的开展有章可循，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得到了提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会议也存在以上这些不足之处，但主流还是好的。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加强了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明确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各项工作的开展。中国共产党能够总结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从大局着眼，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注意自身的组织建设，争当全局的领导者，不断完善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将各种进步力量集中起来，搞好与国民党的合作。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 第181～184期。

②同上书，第183页。

③同上。

④《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工作问题决议案》(1924年5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 第186～188页。

⑤同上。

⑥《中央局报告》 (1924年5月)，见《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

⑦《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工作问题决议案》(1924年5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 第188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 第195～196页。

⑨同上书，第196页。



陈独秀、恽代英驳斥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

国民党“一大”实现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迅速高涨起来，国民党组织、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农运动和军事运动，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也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担心，他们频频发难，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①]。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陈独秀在党内组织力量进行反击：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特别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领导的重要性；7 月，陈致函维经斯基，要求制订新政策，“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②]；7 月 21 日，又以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名义和秘书毛泽东共同签发中央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作好与国民党分裂的准备，并制定了斗争策略：第一，不能使“分离的言论出自我方”；第二，“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委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第三，今后凡非左派分子，不应介绍人党；第四，努力争取工、农、学与市民团体的领导权，并组织由我党独立领导的“国民对外协会”。[③]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恽代英、蔡和森等对右派进行了回击。9 月，陈独秀本人发表《我们的回答》一文，直接反击。文章以国民党“一大”宣言和政策为依据，驳斥了右派“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主义单一”、“组织单一”等谬论。[④]文辞激烈辛辣、文风刚柔并济，不啻为国共合作初期，维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增进国共合作的一篇重要文献。

由于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坚决斗争，加上孙中山本人反对破裂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右派的反共分裂阴谋未能得逞。7 月，国民党中央审议了弹劾共产党案，8 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驳回此案（陈独秀甚至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无必要审议此案，他由此改变了对孙中山

的信任)。[5]10 月，张继上书孙中山，请求退党，谢持亦离粤去沪，右派失败。

北京政变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推动下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签订后，又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了空前的“五卅运动”，开始把第一次大革命推向高潮。但是，由于孙中山逝世，原来屈服在他威望下的老右派势力沉渣泛起，新右派也潜滋暗长。1925 年 8 月，廖仲恺被刺，在此前后，戴季陶主义应运而生。戴季陶主义出笼后，沪粤等地反响甚大，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把它奉为“最高理论”。戴季陶主义的出台是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壮大的标志。[6]

戴季陶闹得正凶的时候，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驳斥戴季陶主义。首先，他指出戴对共产党的态度与谢持等人并无出入，一针见血地指出戴季陶的根本错误是借口国家和民族斗争的需要而“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他警告说：此举“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到极大的损失”，并嘲讽戴“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形成阶级争斗”，否则，便是“不兑现的支票”。其次，针对戴的“共信”说法，拒绝以戴季陶主义为“共信”，认为“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共信之外，应当有别信存在。再次，针对戴对共产党“借用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的指责，陈独秀作了驳斥，用事实和数据说明戴是颠倒是非。他还指出戴对唯物史观一无所知，却“信口批评”，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7]陈独秀的批判，其理论基础正确，机会也把握得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8]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毛泽东等人也在《向导》、《新青年》、《政治周报》、《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严词批驳戴季陶主义。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斗争，戴季陶主义声名狼藉：在广州、北京、武汉等地，戴的小册子被焚烧达数万册，10 月，国民党中执委发表训令，要求党员凡关于党的主义与政策的根本原则言论，非经党部议决不能发表。

戴季陶聒噪的同时，国民党内部组织上的分化也严重加剧，先前被压制下去的老右派又猖獗起来。1925 年 11 月，邹鲁、张继等 11 名国民党老右派中央执、监委员聚集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盗用国民党中央名义，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宣言、议案和通电，



公开打出反对"三大政策"的旗号，决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委中的共产党员，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开除汪精卫（当时被视为左派）的党籍六个月和中执委职务，并决定取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形成了"西山会议派"。12月，他们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公开与广州中央对立。翌年3月，又在沪召开所谓国民党"二大"，成立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并操纵上海《民国日报》，创办《江南晚报》，大肆进行舆论鼓噪。

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和进攻，陈独秀愤然而起。首先，他主持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指出西山会议派通过开除"共派"党籍等决议"最为荒谬"，痛陈与西山会议派斗争的理由，制定了各级党组织推动各地国民党党部"一致通电痛驳"的策略。⑨同时，多次在《向导》周刊上发文回击，他认为"一个党内发生左右倾的争论或派别，这本是各国政党中恒有之事，用不着大惊小怪"，⑩左右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⑪鼓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毫不顾惜"地与右派斗争。他还揭露了西山会议派作为官僚买办阶级代表的本质，指责他们实际已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反革命派"。12月1日，恽代英和张廷瀚等联和在《申报》上刊载启事，严正指出西山会议派将"中央委员会"移设上海是非法的。并写信给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希望他发表"公正之说论，以壮我声势"。⑫同年底，恽代英与沈雁冰等奉命组织国民党的上海特别市党部，与西山会议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作为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针对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捣乱，他发表了演说，立场坚定地尖锐提出：不许什么人来妨碍我们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党"。即不许国民党右派破坏我们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党的行为。因为中国革命很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党，很需要一个有严整纪律，又能实践各种决议案为民众利益奋斗的革命党。他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了很多的议案，这些议案"不是空话，是要实行的。"怎样才能够实行呢？"要靠同志回到各地以后，把这种议案，告诉给一切党员知道，训练他们，使他们每人都能够为这种决议案去奋斗。"特别是"现在本党内、外面，都有许多人想妨害我们的决议案，我们同志应当加倍努力，要使第二次大会以后，本党比以往的两年更有力量。把应该做的事情，一一实现出来，不许什么人能妨碍我们。"他提出国民党的同志"要更加认清楚本党的主义"，认清楚"两年以来最妨碍本党的进展的

就是什么主义之争。”这里讲的主义之争，就是指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主义的言行。他列举了这种“主义之争”的表现是：他们（指国民党右派）“常说那班人是共产党员，那班人是纯粹国民党员”，有些存心破坏的人，说什么“我们只要三民主义，我们要反共产”，甚至“稍有一点意见和他不同，他马上就要说你是共产党”，甚至“常常说国民党如此下去，快就要亡党了，党给人家夺去了。”这班人对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心理，就是认为“在广东开会的党员通通都是赤化的。国民党在这一回一定给共产党拿去了。”参加西山会议的人，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针对国民党右派这些言论，恽代英在发言中，首先深刻指出这种右派言论的危害性，他说：“这种分门别户的办法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只有使党员之间发生很大的隔阂。”并针对国民党右派的所谓“国民党如此下去，就要亡党了”的说法无情地加以批驳，他说：有人讲“亡党，不错。冯自由、谢持、邹鲁的党确实是已经亡了！”“亡了冯自由之党，这有什么可惜呢?”“我们正在剧烈地反对冯自由、谢持、邹鲁的党。”为什么要剧烈地反对他们呢？因为冯自由的国民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和大多数的农工反对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孙中山总理的国民党了”，如总理之党，就是信仰而且实行三民主义的党，这个党是没有亡的。”冯自由党人“不是真正忠心于总理，忠心习三民主义，忠心于本党的。”当然应该反对。恽代英在发言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至于有相信冯自由、谢持、邹鲁的主义的人，我们请他走开。”他说：“我们希望第二次大会以后再没有这等人。各位请看，冯自由跑了，广东便好了，我们要冯自由这等人做什么呢?”“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些人开除了许多，亦只是为这原因。”这就是说，只有把这些人开除了，把冯自由的党亡了，孙中山先生的党才能真正是“实行真正三民主义的革命党。”同时针对国民党在上海成立的伪中央委员会开除了他的国民党籍问题，他在发言中有力地、毫不含糊地反驳说：他们开除，我却不承认，如果我认为是“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打倒军阀反对被压迫农工奋斗的，我承认应当被开除的。”但是，这次他们开除我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只说我共产派。”“但姑且不论我是不是共产派，我要请问共产派是违背了民族主义或民权主义或民生主义吗？如果没有违背三民主义，便是一个共产派亦没有被开除的理由。我相信我始终是站在总理的三民



主义这一边的，（不过绝对不是站在冯自由的什么主义一边）。如果各位同志发现我真正违背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因为我的入党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如果国民党将来不是孙中山总理的国民党了，“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上海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

由于陈独秀、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斗争坚决而有力，当时，“打倒右派”的呼声声震屋瓦、响遍神州。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并给予邹鲁、谢持等骨干分子严厉的组织处分。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维持三年之久，之所以曾经取得那样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英勇斗争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13]而陈独秀和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在斗争中起到了不容抹杀的作用。

注释：

①陈亚杰：《陈独秀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4期，2001年8月，第31页。

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06～507页。

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82～284页。

④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576～584页。

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28～529页。

⑥陈亚杰：《陈独秀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4期，2001年8月，第32页。

⑦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85～95页。

⑧陈亚杰：《陈独秀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4期，2001年8月，第32页。

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33～534页。

⑩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67页。

⑪同上，第124页。

⑫《致柳亚子（二）》（1925年）。转引自《来鸿去燕录》，北京出版，1981年5月，第257页。

⑬陈亚杰：《陈独秀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4期，2001年8月，第33、37页。



国民党中央颁发容纳共产分子的训令

1924年6月，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代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向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正式提出一个“弹劾共产党案”。他们根据中共三大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的文件认为：中共指使党团员在国民党内言论行动要团结一致，以便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并努力使国民党与苏维埃俄国接近，把国民党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产党方面来。这些都说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动机不纯；他们还指出，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发言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①]但现在出现了党团活动，他们要求孙中山对此进行严肃处理。在此前后，汪精卫、张继、谢持等分别拜访了陈独秀和鲍罗廷，抗议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提出“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不必另挂共产党招牌”的要求，[②]陈独秀、鲍罗廷均表示拒绝。陈独秀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疑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困境，因此他感慨地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③]

1924年7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汪精卫、邵元冲主持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宣言指出：“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反对派得肆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而发生隔阂。”为了“避免党内外之误会及隔阂”，宣言重申：“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范围，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宣言还要求孙中山“在短时期内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以期讨论周详，妥筹解决。”[④]宣言重申了作为中国国民党三大政策之一的“容共政策”，分清了是非，为解决中国国民党内重大分歧奠定

了基础。[5]随后，孙中山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讨论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案，并制定了《国民党内共产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为中国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做好了准备。

1924年8月15日，国民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广州开幕。19日～21日讨论了弹劾案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汪精卫、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图、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首先发言，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已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引起国共两党纠纷的根源。他主张为解决国共两党纠纷"最后办法""以分立为要"。覃振发言支持张继的意见。王法勤发言反对"在分立论上讨论"。瞿秋白于是起立发言，予以驳斥。他在说明两党合作的可能与必要之后，针对党团作用问题尖锐地指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他反对"分立"主张，并指出："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6]瞿秋白义正辞严的发言实际上是代表共产党人作的答辩，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攻击。孙中山最后发言，说明容共政策有其时势的需要，对张继进行了耐心的劝导："希望你让我试一试这个既定政策，如果失败了，再请你来主持党务，如何?"张继当场抗辩说："请遵总理之命，从明天起，我自动停止党权，暂时不过问党务，以免总理增加困扰。"[7]

在会外，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驳斥了右派分子责难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这种排斥共产党的论调。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仍旧保持他们的独立活动，这是不足奇异的事情。为国民党计，倘若是真心要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呢，在今天没有恐惧或者嫉忌共产党人的理由。"唯有"根本并不要革命的那一部



分国民党员，他们的思想方式完全是两样的。”[⑧]

8月20日，孙中山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之共产党问题》、《中国国民党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继续讨论弹劾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也不同意张继、覃振、谢持提出的“两党分立”的意见，他说：“两党即已合作于前，万不宜分裂于后”。[⑨]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如汪精卫、胡汉民都认为“弹劾案”难以成立。胡汉民在会议上发言说：细查党刊内容，用语不当之处固多，但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他们主张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过这个机构加强中国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协调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会议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同时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委员会提交的两个草案。

会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这两个文件，向全党颁发了《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这个训令既批评了“谓本党因为共产党人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的谬论，也批评了“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只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的看法。为了消除误会、解决矛盾，训令指出在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当有关系者之联络办法”。训令还对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意旨作了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倘使中国共产党关于此等决议不付之秘密，本会敢信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发生。而今者补救之方法，方惟对于此点而求处置。”“故中国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有守秘密之必要。而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三国际之关系亦有守秘密之必要。本会有见于此，故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其职务之一，即在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如是，则本党之最高党部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负保守其秘密之义务；一方面对于本党党员负了解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之义务。党内之共产派所被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形消释，而党员之对于共产派亦无所其猜忌。”这个训令最后指出：“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⑩]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确定的联共政策，对中国国民党右派邓泽如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由“弹劾共产党案”引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平息下来，国共统一战线得以维持。但是，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对党内右派分子的反共本质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揭露，更没有对他们进行应有的组织制裁，因此，中国国民党右派弹劾中国共产党的企图虽然宣告破产，但他们并没有停止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活动。

1925 年初，中国国民党右派分子乘孙中山病危，公开进行反共分裂活动。1 月中旬，因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国民党老右派冯自由等人，在北京组织了“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志会”，并提出了反共纲领；邹鲁、谢持等也以“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的名义，发布“弹劾共产党宣言”。3 月 8 日，这两个反共组织合并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唐绍仪领衔，发表宣言，制定章程，声称以排除共产党人为宗旨。冯自由等右派另立组织、分裂国民党的事件发生后，共产党人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陈独秀发表《悼孙中山先生》一文，明确指出，“右派分子在中山先生死后脱离国民党，这只算是国民党淘汰了一部分反革命的党员，丝毫无损于国民党之统一。”[11]蔡和森也指出，冯自由派的分裂活动，表明他们已“把国民党这块招牌完全交给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唐继尧……去做卖国罔民的勾当”。中国国民党之统一应以不违背孙中山革命纲领与政策为基础，“决不应容纳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和大地主的代理人留在党内拆坏革命的墙脚。”“若还容纳反革命派于党内，则中山先生毕生奋斗之事业与其晚年振作之伟绩，势非尽毁于彼辈之手不止。所以为忠实继承中山主义，巩固党的统一及完成国民革命计，只有肃清内部淘汰一切反革命分子是唯一的前提和担保。”[12]

在共产党人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25 年 3 月 10 日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国民党同这个“北京俱乐部”毫无关系，并采取了打击冯自由等右派、维护中国国民党的统一和国共合作的措施，将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右派 320 人开除出中国国民党。3 月 21 日，广州革命政府发表《胡汉民等继承孙中山遗志完成国民党革命宣言》，宣布以后“一惟秉承孙大元帅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遗嘱，努力继续进行”，“凡有反革命行为，以及余孽蠢动”，政府“誓当廓清！”[13]5 月 24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接受孙中山遗嘱宣言》，指出“吾人今日唯一之责任，则在完全接受我总理之遗



嘱，自今而后，同德同心，尽吾人之全力，为牺牲一切自由及权利，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以竟总理未竟之志”。并强调今后将继续以能否“接受我总理之主义政纲，以从事于国民革命之工作”，作为区分“同志”与“敌人”的准则。[14]同时，全会通过《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重申1924年8月中国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决议，肯定“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中国国民党，系为接受本党之主义与纲领，而负实行国民革命之责任者”。这个决议案声明：“本党为使国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即加入本党者，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15]对于中国国民党右派势力策划分裂中国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阴谋，中国国民党左派也纷纷发表讲话和文章，进行揭露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分裂阴谋被制止。

注释：

①《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4～705页。

②《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9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3月，第331页。

④《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第330页。

⑤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229页。

⑥《瞿秋白对于三监察委员弹劾案之答辩词》。

⑦王成圣：《中外珍闻》，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1978年，第51～52页。

⑧《中国青年》第41期，1924年7月。

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4年7～12月），第257页。

⑩《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3～75页。

⑪陈独秀：《悼孙中山先生》，《陈独秀文章选编》（下），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30页。

⑫蔡和森：《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国民党淘汰反革命分子之必要》，《向导》第111期（1925年4月19日）。

⑬《胡汉民等继承孙中山遗志完成国民革命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⑭《接受孙中山遗嘱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大表大会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⑮《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123页。



筹办黄埔军校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要政治代表北洋军阀正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西南五省则为地方军阀所控制；革命力量的根据地主要在广东，但这里也存在着许多地方军方势力。建立革命军队，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首先统一广东根据地，而后举行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这就是这个时期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黄埔军校军官学校是国民党时期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是国共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由于校址在广州黄埔，这所陆军军官学校又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它是孙中山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教训，为重整旗鼓、开创革命新局面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决策。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袁、护法旗帜，为维护辛亥革命开创的共和制度，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继续奋斗，但他们不断遭到挫折。这就不能不引起孙中山的深思：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一概打消，革命是彻底的成功；我们革命的时期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到的障碍又不及俄国大，弄到如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①孙中山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作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大告成功。”②而“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③由此，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有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成功”；否则，“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④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决心“创造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⑤于是，孙中山在着手改组中国国

民党的同时，开始筹建军官学校，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军。

孙中山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不但要有革命党的奋斗，而且要有革命军的奋斗。因此，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决定建立一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革命军队。[6]他吸取过去惨痛的教训，决心从头做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7]所谓“理想上的革命军”，就是参加这个军队的人，必须立下革命的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来革命。”[8]

孙中山认为，要建立一支“理想上的军队”没有前苏联的援助是不行的。因此，在1923年2月，当他决定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便请苏联政府派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担任顾问。同年5月，苏联政府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派出了第一批军事顾问到中国，并给予广州政府以财政援助。同年秋，苏联政府派出的第一批顾问到达广州。

为了吸取苏联的建军经验，孙中山还派遣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于9月2日到达莫斯科。蒋介石会见了苏共中央书记鲁祖坦克，双方重点讨论了军事。代表团向苏方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派去的人愈多愈好。二、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孙中山代表提供方便，以考察红军。三、代表团请求共同商讨中国作战方案。”[9]经过双方交换意见，达成了以下三条具体协议：“一、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孙中山军事代表团认为，在俄国国内为中国人开办军校是可行的……。二、关于代表团提出考察红军的请求，斯克良斯基同志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并指出，苏联各大军事院校总监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将向代表团介绍贵宾所感兴趣的红军生活的有关方面。三、代表团申明，孙中山赋予代表团以极大的权限，代表团受命就中国作战方案同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磋商。”[10]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中国派遣同志到俄国军事院校学习。但因俄国接收人数太少，代表团除要求增派以外，还曾和苏方代表讨论廖仲恺与越飞所议，由苏联红军将领帮助设立军官学校之计划。

代表团从9月2日抵达莫斯科到11月29日离开苏联止，前后逗留了近3个月。在此期间，除了和苏方代表进行深入而仔细的会谈以外，还广泛地参观了苏联红军各种类型的军事院校，听取了有关人员的介绍。苏联培养了军事干部和组织红军的经验，对于国民党创办军事学校，建立国民革命军，



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借鉴。

与代表团在前苏联谈判的同时，10 月 15 日，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研究了建立军官学校问题，通过了“建立陆军讲武堂于广州”的提案。[11]11 月 19 日晚，孙中山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了“组织中国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等问题。[12]11 月 26 日，中国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第 10 次会议，孙中山在会上提出筹建军官学校。会议决定：一、军校名称定为“国民革命军官学校”；二、蒋介石为校长；三、陈翰誉为教练长；四、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五、廖仲恺负责学校筹备工作；六、校址定为东园。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建校工作迅速开展。1 月 24 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岛上原有的广东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

5 月 5 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

为了让全校师生不忘两年前陈炯明叛变事件的惨重教训，振奋革命精神，6 月 16 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出席并发表了长篇演说。着重讲了办学宗旨和办学方针。在演说中，孙中山不仅以俄国十月革命为镜子，对照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创办黄埔军校的必要性；而且还明确指出，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孙中山希望黄埔军校的学生“牺牲一切权利，专心救国”，成为“革命的骨干”，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他号召全体学员努力养成和发扬革命党人以一当百、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完成革命事业而奋斗。从此，一所以苏联为榜样的崭新的军官学校便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造就了一批爱国的军事人才，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黄埔军校成立以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苏联的大力援助，迅速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学校。1926 年 3 月，中国国民党决定将国民革命军各军开办的军校与黄埔军校合并，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属军事委员会领导。

从 1924 年 5 月～1927 年 7 月，黄埔军校共招收了 6 期学员，总共 20 000多人。前四期学员都是在国民革命期间毕业，第五六期学员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才毕业。

从黄埔军校筹备的几个月时间内，蒋介石先后两次和孙中山国民党为难，为什么孙中山还要任命他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呢？这首先是由于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与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陈其美关系十分密切。他曾向孙中山表白，他与陈其美之间是“万古交情，虽手足之亲，未足间其盟契，骨肉之挚，不能喻其恩义，肝胆相照，可质天日。”[13]他希望孙中山也像陈其美那样信任他。这对孙中山不无影响，加以他再三向孙中山表示效忠，因而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其次，孙中山认为蒋介石是国民党“党内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由于以上原因，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虽不辞而别，但是，在口头上仍然信誓旦旦，再三表示不忘孙中山的“知遇之恩”，决心“朝夕随从左右，图报万一。”[14]他虽然在私下对联俄联共政策表示怀疑，但在公开场合，仍然唱着联俄联共的高调，故当他从上海回来后，孙中山宽大为怀，在政治上继续对他表示信任。

1924 年 5 月 9 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为陆军军官学校的中国国民党代表。这是国民党和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是孙中山国民党学习前苏联军事制度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党代表制度的设立，表明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国民党创办的学校，它必须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军校是党的学校，军队也是党的军队。从此揭开了中国军事史上新的一页。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对黄埔军校的建设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早在 1921 年 12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时，就建议孙中山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1923 年 8 月，孙中山派出了由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得到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的热情帮助。他们除了考察党务、参观工厂和农村外，还着重考察了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和装备，参观了步兵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等军事学校，会见了苏联红军的各级指挥员，商谈了双方进行军事合作等问题，学习了苏联红军的组织、制度和训练等方面的经验。

苏联政府给了黄埔军校多方面的大力援助。黄埔军校在开办时，资金困难，武器奇缺。孙中山“在开校前，批发 300 支粤造七九毛瑟枪给黄埔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并不以我们学校为重，只知道拍军阀的马屁。廖仲恺先生交涉了不少时日，开校时仅仅发下 30 支，才勉强发给卫兵守卫”。就



在这个时候，前苏联在1924年10月初派船送来了武器，这批武器有10支小手枪和“八千只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支步枪有五百发子弹”。这对于军校师生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此后，苏联连续支援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来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4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9 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 000把；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 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 000个，大炮12门，炮弹1 000发；第四批有来福枪5 000支，子弹5 0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为了帮助解决军校经费方面的困难苏联资助现金200万卢布。此外，苏联还为黄埔军校派来了顾问团。由于筹建军校急需大批有政治觉悟、有丰富经验的军事干部，鲍罗廷和加拉罕于4月16日向莫斯科发出电报：“（1）选派五十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州；（2）让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这个顾问团。”同年5月，巴甫洛夫率领苏联军事顾问团到达广东。黄埔军校开学后，陆续到军校工作的有炮兵顾问贝斯查斯特洛夫、代首席顾问沃里金、步兵顾问普里贝列夫、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罗加觉夫、卫生顾问阿赫蔑多夫、交际顾问阿利、军需顾问吉列夫、交通顾问德喇特温、政治顾问卡拉绰夫等多人。1924年7月巴甫洛夫不幸在东江牺牲，10月加伦到达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的首席顾问，领导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小组。苏联顾问帮助黄埔军校制订教学计划，修订各科教程，提供苏联红军的战斗经验，参加教课并亲自示范。

为了办好军校，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选派党团员和动员进步青年投考黄埔军校，另一方面抽调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军校从事政治、军事方面的教育工作。军校政治部基本上由共产党人主持。军校的政治工作和一整套整治工作制度，也是共产党人一手建立起来的。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长；担任过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的中共党员还有熊雄、鲁易。此外，中共党员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高语罕等任政治教官。

注释：

①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6页、917页。

②《常务讨论会议决事项》，见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6日。

③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0 页。

④蔡畅、邓颖超、区梦觉等参加了妇协工作，并聘请何香凝、鲍罗廷夫人为顾问，宋庆龄对妇协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第 293 页。

⑧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9 月第 1 版，第 20 页。

⑨同上书，第 21 页。

⑩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17 页。

⑪王柏龄：《黄埔创始之回忆》，见《黄埔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⑫贾比才：《中国改革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 页。

⑬《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 7 编，第 36 页。

⑭《孙中山全集》第 5 卷，第 379 页。



孙中山建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形成，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与地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的家乡广东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部，这里自近代以来就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曾发生过多次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早在幼年时代，太平天国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就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平天国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不仅为孙中山埋下了革命思想的种子，也为此后多次组织发动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在思想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他在 1904 年为《太平天国战史》所写"序"中，就表露出对太平天国历史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近代中国屡遭帝国主义侵略的残酷现实，以及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逐渐使孙中山放弃了走和平改良主义道路的想法，转而坚定了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决心和信念。[①]1884～1885 年的中法战争，中国虽取得了胜利，但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却与法国签订了投降卖国的《中法新约》。不胜而胜的结局令孙中山感到了莫大的耻辱，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了变革现状的决心。此后，孙中山虽然继续在香港学习，但对政治问题的关心愈发强烈。这一时期，他除致力于医科学习外，还广泛研读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和历史学等，尤喜读《法国革命史》。他经常谈起洪秀全，称他是反清第一英雄，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命。他曾想过学医救国，同时受当时国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曾对清政府抱有幻想，但这些想法最终都被无情的现实所打破。而真正促使他抛弃改良主义的原因，是 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这年夏天，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良政治，谋求国富民强。对此，李鸿章毫不理会。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逐渐感到上书请愿等和平改良方法是根本走不通的，必须用根本改造来代替局部改良。便提出了要救中国危亡，避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的结论，[②]明白了"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只有革命才是解救中国于危亡的唯一出路。[③]旋即赴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明确表示要以暴力革命推翻封建专制政府，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着手组织武装，1905 年同盟会成立，制订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提出建立中华国民军的方案，主要内容是：第一，确定了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以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建军宗旨。1908 年又将这一宗旨作为军人誓词。第二，规定了军队的任务，即“国民军起立军政府。”军政府为实现同盟会政治纲领，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第三，明确了军队与国民的关系。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上述表明，孙中山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实现政治纲领和三民主义，创立和保卫民国政权的军队，要求军队与一切旧军队忠君盲从和欺压人民不同，为国民服务。这充分反映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虽然孙中山先后发动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孙中山从失败中认识到临时招募队伍是不可能取胜的，必须有自己的军队。

有鉴于此，孙中山着手发动新军，派人打入清军内部，发展革命组织，变新军为自己的革命力量。孙中山认为，新军“若尽人吾党，则兵不刃血，而大功可成”。于是，派出许多革命党人打入新军做发动工作。广东进展甚快，1910 年 2 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发动新军 3 000 人，发动了广州起义。1911 年孙中山在广州以新军为骨干并组织敢死队 800 人，发动“3·29”黄花岗之役，给清廷以重大打击。孙中山先生后来在《黄花岗烈士事略》一文中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④]充分显示了这次起义的意义与价值，也表明了此次起义给孙中山思想留下了深刻的感受。

发动新军工作成绩最显著的是湖北。当时武汉新军中有一镇一协，约 15 000 人，是清政府直接掌握的一支反动武装，不仅装备好而且战斗力强。其中中下层士兵多属破产的农家子弟和失业手工业者及一些家境不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清政府的统治政策以及上级官员极其不满，由于旧式军队中森严的等级制度，许多士兵敢怒而不敢言。于是，革命党人采取个别谈话、讲故事、举办演讲会、散发革命书刊等多种形式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使士兵



了解革命、醉心革命；再通过发展“共进会”和“文学社”等进步组织，进一步考察、团结青年士兵。经过工作，湖北新军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达到5 000余人，约占总数的1/3，加上革命同情者，革命势力很快就在武汉占据优势。经过长期准备之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军政府，各省纷纷响应。12月2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

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误认为革命已告成功，认为铁血精神已成过去，建设时期已经到来。在帝国主义者的威逼和袁世凯的阴谋之下，孙中山以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为条件，达成南北妥协。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后，提出裁减革命军队，孙中山和黄兴等竟然照办，在南京一次就解散了十几万军队。湖南原有六师两旅，一次全部裁撤；湖北八师两旅，经过三次裁撤，仅余一师。袁世凯在裁减南方革命军的同时，公开向帝国主义银行借款，拼命扩充自己的实力，积极备战，磨刀霍霍。这时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党人仍然认为，以后战斗不是战场冲杀，而是议会斗争，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牢牢地掌握政权，大总统不过是一个元首空名，因而把军队看得可有可无，自动放弃了领导权。谁知袁世凯准备就绪之后便向革命猛扑过来，1913年3月20日，派人刺杀了正在组织责任内阁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接着又下令撤免国民党人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之职。残酷的现实使孙中山如梦方醒，立即主张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以段芝贵的第一军、冯国璋的第二军进逼赣、苏、皖，以海军控制上海。讨袁军的李烈钧、林虎等部虽英勇奋战，终因裁撤后兵力不足而失败，南方七省政权遂落入袁氏之手。1916年袁世凯公然爬上皇帝的宝座，复辟帝制，教训十分惨痛。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全国响应。袁被迫取消帝制，于6月6日在绝望中病死。但是袁世凯的消亡非但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各省、各地区相继涌现出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各霸一方，连年内战，互相争夺。这期间，皖系军阀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导演了一幕张勋复辟的闹剧。而这场“闹剧”仅上演了12天就草草收场。段祺瑞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赶跑张勋，同时以“再造共和”的元勋自命，再次当了总理，把持了北京政府的实权。1916年4月，孙中山由日本

回到上海，提出了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他把《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象征，认为“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⑤]。因而对于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海军南下，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依靠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进行护法运动，滇、桂军阀假护法运动之名，行割据西南之实，以北军不攻岳（阳）、南军不攻鄂为条件，与北洋军阀靖和。孙中山的军政府除海军外，实无一兵可用，命令不能出府门，护法运动又归失败。这时，孙中山认识到军阀不可靠，“欲争回真共和”、“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不可，[⑥]于是决心编练一支自己的武装，作为政府支柱。经过反复斗争，桂系军阀才以不驻广州为条件，将原广东省长公署的警卫军二十个营拨给孙中山。孙中山总算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称援闽粤军，开赴闽南。

1921年，孙中山依靠陈炯明的粤军，把桂系军阀赶出了广州，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权。但当他督师桂林准备北伐之际，他一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于6月发动叛乱，孙中山被迫去上海，革命再度失败。他在这次失败中认识到：不仅要建设一支强大军队，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这是孙中山建军思想的重大转折。

1923年2月，孙中山派邹鲁策动驻广西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部发动对陈炯明联合进攻，陈炯明败退东江，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他深知当时滇、桂、粤、鄂、湘、闽等军阀部队，名义上归他指挥，实际上根本不听广州政府命令，革命政权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也曾幻想联合这一派军阀去反对另一派军阀，借助军阀力量取得胜利；结果与他的愿望相反，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从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利用人家来打仗，一旦利害问题发生了，非但靠不住，而且会造起反来”[⑦]，断送革命。

苦闷中的孙中山，看到俄国革命胜利后，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扫除国内许多障碍，抗击了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就在于有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他要学苏联，欣然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于1923年8月派出代表团赴前苏学习红军经验1923年12月1日，他在《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的演说中指出：“盖以兵力战斗而成功，是不足靠的，以党员力量奋斗而成功，是足靠的。质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谓之成功，靠党员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胜仗非真成功，以党员打胜仗，方是真



成功。”[8]他对当时流传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给予坚决的批驳。同时认为，封建势力最怕的，就是革命。如果“革命军起，革命党兴”，“彼辈必不能生存”。同年11月作出了建立国民党义勇军的决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说：“要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万不可少的”，否则“中国的革命，永远是要失败”。[9]这是孙中山先生几十年建军经验最正确的总结。怎样建设革命军？他主张以三民主义武装学员，“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三民主义去牺牲”。[10]他指出“中国革命虽然有十三年”，但是“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11]为了实行以主义建军，他借鉴苏联红军经验设立党代表制度，在任命蒋介石为校长的同时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国民党代表、防止军队成为个人独裁的工具。同时设立政治部，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

孙中山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最后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革命军的正确道路。

注释：

①王凯捷：《试论孙中山的军事思想》，《“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0页。

②孙中山：《国父全集》，台北，1973年版，第63页。

③《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4页。

④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第1054页。

⑤《中山先生之乐观——东京归客述》，《民国日报》，1916年5月6日。

⑥孙中山：《国父全集》，台北，1973年版，第714页

⑦《广东前敌通讯》，《向导》第110期。

⑧《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75页。

⑨林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一册，第6~9页。

⑩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9页。

⑪《大元帅对广东军官学校开学演词》《民国日报》1934年6月28日。

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

黄埔军校建立后，共产党从全国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1924 年 2 月～5 月，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广州等地就有 3 000 多名青年报考，到 6 月 16 日开学时共正式录取第一期学生 500 名。黄埔军校从建立到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为止，共办七期。前五期实际是在共产党人领导组织下进行培训的。第二期（1924 年 8 月～1925 年 1 月）共有学生 449 名，第三期（1925 年 7 月～1926 年 1 月）共有学生 1 233 名，第四期（1926 年 3 月～1926 年 10 月）共有学生 2 654 名，第五期（1926 年 12 月～1927 年 8 月）共有学生 2 600 名。第六期、第七期是由蒋介石在广州、南京继办的。

黄埔军校从 1924 年 5 月正式成立到 1927 年 4 月，由于共产党人多方的艰苦努力，基本上是一所具有革命性质的军事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当时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直接参加黄埔军校的领导和培训教育工作。周恩来同志、熊雄同志先后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同志担任军事政治教官，徐向前、罗瑞卿、周士弟、陈赓、左权等同志在军校积极学习并参加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周恩来等同志根据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在军校建立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不仅使军校区别于中国以往一切旧式军事学校，成为新型的学校，而且为后来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改造旧军队和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于 1925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曾提出我党必须注意军校工作，在军校中建立革命群众组织。

由于共产党人在军校的努力工作以及苏联顾问的帮助，黄埔军校成了历来所没有的一所新型军事学校，有着明确的培养目标、完整的组织机构、教育计划和规章制度，确定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能做政治工作的军事干部。



军校设有总理（孙中山亲任校总理）、校长（蒋介石担任）、党代表（廖仲恺担任）以及教育长、政治总教官、军事总教官、政治学教官、军事学教官等。军校直属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教练、教授三部，军需、管理、军医三处。学校按军事编制设有总队、队、区队。1924 年 10 月 ~12 月军校建立了军官“教导团”，是仿效俄国红军的建军制度建成的，它从两个团开始扩大发展成一个军。

学生入学后分为入伍教育和正式教育。学校设有军事、政治两类课程，军事课有：战术、兵器、地形、炮台、工兵、通讯等。政治课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社会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等。上述政治课的讲授，基本由共产党人担任。学校除正式授课之外，还经常举办讲演会，专题讲授，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主张。1924 年秋周恩来同志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后，除完成学校政治工作外，还经常给全校师生作各种专题讲演，深受学生欢迎。他讲的“军队中之政治工作”，深刻论述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同时还专题讲演“武力与民众”，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阐述了军队的来源、军队的作用、军队的阶级性，指出革命武装的重要意义。其他共产党人如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等同志的专题讲授，也颇受学生欢迎，这些演讲对学生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军校学生除紧张的军事及政治学习生活外，还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组织“血花剧社”，以文艺形式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在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进步青年学生，起了骨干作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作为在军校开展活动的领导核心。同时，还组织了进步团体。1924 年底，共产党员周逸群、李劳工等同志，采用列宁主编过的《火星报》之名组织了“火星社”石作为团结同学和进步力量的组织。在周恩来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经过共产党人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徐向前等人的努力，成立了“中国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创办了《中国军人》等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青军会”成立后，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并为维护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积极斗争。但是蒋介石在军校里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其重要亲信王柏龄以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的身份，利用“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反动组织，大搞打

击陷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军人的反动活动。诬蔑“青军会”、制造事端，唆使“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林振雄殴打“青军会”的负责人。对此，共产党人蒋先云等在周恩来同志支持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揭露了王柏龄，林振雄等破坏国共合作，反对革命，陷害共产党人的罪行。

黄埔军校初期，通过五期培训，将近7 000人从军校毕业，为革命培养了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大批优秀军事干部。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军事武装，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基本队伍。在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军叛乱，一二次东征，以及削平滇桂军阀杨希闵、刘展寰势力的几次战争中，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是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在北伐战争中，黄埔军校培养出的学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埔军校的创办，也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了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并为掌握和组织革命武装积累了一定经验。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1927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埔军校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军事学校。但是，在初期参加过黄埔学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坚贞不屈，高举革命旗帜，先后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本着实现三民主义的办学宗旨，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为此，学校专门制定了《政治教育纲要》，明确实施和加强政治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学生通过学习，彻底了解产生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背景以及国内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背景；理解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明确自己在军队中的责任，使武力真正成为国民之武力。根据这个纲要，黄埔军校制定了全面系统的政治教育科目，最初规定了三民主义等政治课程，稍后增加到18门，即：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工作、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1926年1月军校改组后，又增加了苏联研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课程，总数达26门。



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批富有教学才能的政治教官，如恽代英、高语罕、萧楚女、聂荣臻、韩麟符、于树德、安体诚、张秋人、廖划平、杨其纲、李合林等，讲授上述课程。课程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范围也很广，不仅包括作为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而且兼容了其他先进的思想，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习。1925 年 10 月 27 作为军校党代表的汪精卫曾在训令中指示说："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②]黄埔军校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允许它们在校内公开传播。因此，在黄埔军校里，不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可以登台向学生做政治演讲。除军校领导人如廖仲恺、蒋介石、周恩来、熊雄等经常到校讲演外，当时的各界知名人士谭延闿、胡汉民、何香凝、吴玉章、鲁迅、张静江、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等也曾到校讲演。中共派出的政治教官由于对革命道理领会深刻，备课认真，所以他们的讲课深受学员的欢迎。萧楚女上课时，听讲者"几二三千，大礼堂亦不能容，则在操场中授课"。[③]军校政治部领导的学生宣传队和"血花剧社"，在校内外从事各种宣传活动。此外，军校还大量出版日报、期刊、文集、丛书、讲义、画报等，如《军事政治月刊》、《黄埔日刊》、《黄埔潮》和《中国军人》等刊物，加强对师生的革命教育。在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起了核心作用。

政治教育中最典型的、最具影响力的即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制度是黄埔军校仿效苏联红军建军制度而建立的，开创了中国军校史上政治工作制度的先河。黄埔军校政治教育方式以上政治课为主，辅以举办军事训练、讨论政治问题、发行各种刊物、举办政治演讲会和报告会、组织宣传活动等。政治课在全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每期上课总数在百次以上。军校"对学生除授以下干部必需的军事知识之外"，还"授以政治教育，使明了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及主义、党纲、政策等。即不仅知道枪是怎么的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④]其士气与战斗力是旧军队所无法比拟的。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与共产党人尤其是周恩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之前，政治部只是个空架子，几乎是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之后，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具体工作的落实上，提出政治

部要做好三项工作，“其一是向新成立的校军教导第一团选派党代表；其二是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出油印报《士兵之友》；其三是建立政治部正常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最后还进行了分工，制定了工作细则。”其中，政治部服务细则规定：全校官长、员生、士兵、伕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的遵守革命纪律。对外负责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自此便蓬勃开展了起来。通过各种形式，诸如政治演讲、政治讨论会，并专门设立政治问答箱有效地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养成了军校学员高昂的革命热情、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勇敢的牺牲精神。

黄埔军校在注重以三民主义建军、注重政治教育的同时，从未放松对于学员的军事教育，着力贯彻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相辅而行的原则。黄埔军校是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为宗旨。因此，黄埔军校的教育实行了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在《政治教育大纲草案》中规定，“使学生彻底了解军事学术和军事锻炼，对于革命意义上之重要”，要求学生“必须有军事知识，而且身体强健，方能担负将来军队中为革命工作之责任”。为此，黄埔军校制定了科学的教育训练科目，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黄埔军校制定的第一期军事教育科目中，学科方面，最初教学生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学识，继则教以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四大教程。术科方面，对学员施以制式教练。第二期的学生，开始有专业之别，即分为步、炮、工、辎、宪兵五科。各科学生都有特定的必修科目。如工科学生，所授学科为：式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垒教范、架桥教范、筑营教范、通信教范、交通教范、爆破教范、坑道教范、步兵教摘要、野外勤务摘要、夜间教育等。术科方面，除制式教练与步兵略同外，其他有筑垒实施、架桥实施、爆破实施、筑营实施、坑道实施等。第三期学生所授的学科，仍以四大教程为主，另外还需学习军制学、马学、经理学、卫生学等。术科分为教练、野外演习射击、夜间演习、技术、马术、工作实施、典范令等几大块，内容较前两期有了较大的进步。第四期军事学教育，又增加了兵器学、地形学、测图演习等，所学内容更符合战争需要。军校的军事教育十分强调演习课，术科差不多除了



操场基本教练之外，大多都在野外演习。演习时学生形态逼真，战斗气氛非常浓。在课堂授课的同时，黄埔军校还非常强调实战演习，做到“知行合一”。平时，军校的学生都戎装待命，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参加战斗。严格的军事教育和实战训练，使军校学生的军事素质得到迅速提高。

同时为了丰富学生的军事知识，推动军事学术的研究与教学，军校还开办了“军事知识讲座”，专题讲授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其他先进的军事知识。

总之，学校的政治和军事教育工作，有效的培育了“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的一代革命军事干部。在以后的两次东征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体现了学校政治、军事工作并重的强大威力，也为日后的北伐战争输送了大批人才。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2 页。

②《汪代表训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9 页。

③茅盾：《萧楚女与恽代英》，《茅盾散文速写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04 ~705 页。

④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日刊》，1927 年 3 月 1 日出版。

黄埔军校招生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明确指出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屡次失败的根源所在，即“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①]。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坚定了创建革命军队的主张，于是黄埔军校就在内忧外患的华夏大地上应运而生[②]。

军校诞生后，自然要有人来报考，而怎样举行考生考试，又以什么标准录取考生，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难题。于是自黄埔军校筹备始，招考学生以及审查学生资格就被排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分列第四项、第五项，仅次于订定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职员之后。1924年2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拟呈的《军官学校考选学生简章》[③]。明确提出办学宗旨为“本校希望对于军队有彻底的改良进步，故拟使全国热心有志堪以造就之青年，得有研求军事学术之机会，并教以三民主义，俾养成良好有主义之军人，以为党军之下级干部。”[④]1924年10月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即任命邓演达为筹办黄埔军校考试委员会委员并制定了《考试委员会办事规则》，针对考试题目、监考事项、考场纪律等都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说明，整个规则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体现了考试委员会的权威性，也体现了入学考试的公正性。这些举措都体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于招生考试的特别重视。而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也很快产生，内容依次如下：

一、本校为养成革命军干部军官，完成国民革命起见，特续招入伍生，施以军事预备教育。

二、入伍生期限六个月，期满后甄别及格者，升入本校为学生，修习军事学术，一年毕业。

三、投考者须于八月二十五日以前，持二寸半身相片三张，中学或与中学相当之学校毕业文凭，及党证或各地区党部之介绍书，分赴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校驻省办事处”，上海“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报名（党证报名时验发还，文凭试毕发还）。

四、投考者之资格如下：

A. 年龄：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内。

B. 学历：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

C. 身体：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害。

D. 思想：中国国民党党员，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

五、试验之种类：

A. 学历试验：按旧制中学修了之程度出题，求笔记之答案。

B. 身体试验：准陆军体格检查之规定，分身长、肺量、体重、目力、听力等项。

C. 性格试验：用口试法，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

六、在广州投考者，无论从何地来试，录取与否，均不发给川资；在上海、开封取录者，则给予川资来粤。

七、入队后，服装、书籍、食费、零用，概由本校供给。

八、本简章之外，关于试验手续、课目调制、成绩等，另有细则[5]。

这份简章对于报考者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年龄、学历、身体状况、思想、考试科目等都作了详细的说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考者资格中对于思想的要求非常明确，即为中国国民党党员，或具有接受国民党主义之可能性，不抵触国民党主义思想，并有国民党党员作为介绍者。而在考试试验种类中，不同于以往军校考试的是除了学历试验、身体试验外，还增加了一项性格试验，其考试方法为口试法，目的在于观察考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6]。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入学考试不同于其他军校招生考试的是极大地加强了对于考生思想的控制，用三民主义理论武装和控制考生，使考生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进而加入国民党。

此外，为了最大限度招揽人才，黄埔军校还针对全国各地制定了招生计划，按照省份以及军队分配招生人数[7]。全国拟定招生 324 名，其中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 50 名；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西、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省 12 名，共 168 名；湘、

粤、滇、豫、桂五省各15名，共75名；国民党先烈家属20名，尚余11名。另招备取生30名~50名[8]。

1924年3月1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试验委员。经过孙中山批准，1924年3月27日，黄埔军校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了第一期入学考试。考试科目为作文，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9]。此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参加考试的学生多达1 200余人，因考生学术较佳者比较多，所以酌量宽限录取。1924年4月28日发榜，经过严格考试，第1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00余人。这其中，有陈赓、蒋先云、蔡炳炎、蔡申熙、廖运泽、陈明仁、邓文仪、曾扩情、杜聿明、范汉杰、酆悌、桂永清、关麟征、贺衷寒、侯镜如、胡宗南、黄维、徐向前、李之龙、李默庵、郑洞国、许继慎、刘戡、宋希濂、左权、宣侠父、唐澍、王尔琢、周士第、张耀明、阎揆要等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双方的要员名将。

黄埔军校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院校教育的先河，因此国共两党都极为重视，纷纷动员有志青年报考。

当时共青团广州地委曾拟定派三四人报考，以备将来从事军人运动。粤军军长许崇智甚至对所有来找他开介绍信的部下一律照准并且保留军职，照发薪饷，而且愿意为一切报名资格不够，怕自己考不上的人说情。除此之外，包括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程潜、李济深、李福林在内的国民党元老开来的“条子”更是满天飞。在这种情况下，考试委员会为了保证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公平公正，特地在1924年4月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出启事。明确指出：“稍有徇私，不特无以示大公，亦违本会组织之本旨，与五权宪法中考试权独立之精神相抵牾，贻弊滋多”；同时“尚祈信仰主义，各守规律之各同志友好深予体谅”[10]。

其实不只是学生入黄埔军校求学需要考试，就连军官入黄埔军校工作也需要考试。黄埔军校在1924年2月19日的《民国日报》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招考下级干部布告》，除了体格强健，还特别要求品性端正。此外，投考区队长要求“曾在保定军官学校及其他相当程度学校卒业”；而投考分队长也要求“曾在军事学校卒业，或在军队服务（准尉军士）多年”[11]，而一旦考取，待遇从优。1924年8月26日的《民国日报》再次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招考军官布告》，针对所需少校以下军官的现状，决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拔。要求报考者毕业于军官学校及其他正式军事学校并提供一份详细履



历、毕业证书以及一张最近本人相片[12]。

即便是对于已经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的学员来说，招生考试也只是第一步，此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例如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分队长的选拔也需要考试，对于投考队长资格的要求除了年龄、学历、身体条件外，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国民党员，而那些对于国民党有同情而未入党者，暂时准许参加考试，一旦考取，必须后续加入国民党。考试科目也很全面，包括国文、三民主义、算术、典范令、实兵指挥（单人教练、班教练）、身体检查 6 项。而如果要参加无线电招生考试，也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才有资格。实验科目包括听力、物理、数学、英文 4 项[13]。

随着黄埔军校招生的日益增多，招生考试的种类也逐渐变化、完善。此后的黄埔军校高级班考试分为保送试验与入学试验两种方式。考试科目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政治、数学、理化、口述等等。而在《宪兵招考简章》中，则明确要求报考者体格五官端正，无不良嗜好，身体强壮，无暗疾，高小毕业（或与高小有相等之程度），文理通顺，同时要求两名中国国民党党员作为介绍人[14]。

此后的入伍生招生考试组织更为严密，程序也更加严格。要求广东省投考者，必须到长堤肇庆会馆入伍生部、黄埔军校编译处报名；其他省投考者必须向各省党部报名并由各省党部汇送中央党部，咨送黄埔军校，同时要求各省党部汇送的报考者，必须经过该部执行委员 3 人以上签名，方为有效。考试科目上，也做到了文理分科，文科生要求参加国文、政治、历史、地理考试；理科生则要求参加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考试。即使是身体检查，较之以往也更为科学，考试完毕后必须由军医处统一检验体格，并将体检结果分为甲、乙、丙、丁 4 等。其中身体强壮而无疾病者为甲等；身体本健壮而有皮肤病、容易医治者为乙等；身体羸弱或染有隐疾者为丙、丁等。甲、乙等者为合格，丙、丁等者为不合格，绝不取录[15]。

为了增强对入伍生的素质要求，黄埔军校还开展了“甄别考试”。针对各队入伍生程度不齐的现状，决定由教官、总队长会同拟定试题，通过考试成绩分出高低，另行编队。并要求“各队长官每月按照表式考查，尤须注重品格，填列考语呈报。其有品格不端者，学术虽长亦在所不取”[16]。但是，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国民党独裁统治也日益加剧。所谓的“甄别考试”也逐渐成为国民党控制学生以及各军队派系相互倾轧的工具[17]。

1924 年 5 月 ~ 1927 年 7 月，黄埔军校总共招收了 6 期学生，合计 20 000 余人。他们来自全国 26 个省，境外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进步

青年也来到黄埔军校学习。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黄埔军校也在蓬勃发展，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分校，而招生考试也随之发生了各种的变化。

20 世纪 20 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正处于暴风骤雨的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的烽火从珠江流域一直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而黄埔军校，这所诞生于风起云涌的广州城中的军事学校，其迅猛的影响力着实令人震惊，“黄埔”二字已经不仅仅代表一个地名或是一所学校，而是代表一种热爱祖国、百折不挠的崇高理想[18]。正因为如此，它成为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立志报考的军校。但是，黄埔军校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而且招生有限。为了最大限度招收有志青年，黄埔军校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多所分校，而招生考试也伴随着这些分校的创建在不断发展变化着。1925 年 3 月，黄埔军校学生军第一次东征平定潮汕之后，为了给随同出发的第二期学生补习课程，筹划设立了潮州分校，后来撤销。直到第二次东征再次平定潮汕后潮州分校才得恢复。潮州分校入伍生升学后，第一军未接受军事政治教育的 50 余名军官，又参加了补考并进入分校参加培训、训练。这批学生毕业后，潮州分校即告结束。尽管潮州分校存在时间较短，但却开创了黄埔军校创立分校的先河。招生名额的增加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如何保证生源的质量，而这些都对招生考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蒋介石以“革命势力日益膨胀，军事人才仍感缺乏”为由，于 1927 年 2 月 10 日创办了长沙分校。在湖南开始招生后，定学额为 1 000 名。其中包括皖豫两省学生各百名，分步、炮、工、政治 4 科，修业期间为一年。当长沙分校招生的消息传出之后，湘、鄂、赣、川、黔、皖、鲁、豫、粤、桂各地的青年，为向往黄埔军校的名声和投身革命的志愿，纷纷奔向长沙参加应考。报名人数之众，竟达 1 万多人。由于择优选录，所以学生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都相对较高。

长沙分校后来并入了武汉分校，而武汉分校则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又一产物，这所学校也成为了黄埔军校众多分校中极为重要的一所[19]。1926 年 11 月 1 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正式成立，邓演达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包括郭沫若、李民治、彭漪兰、王法勤、杨树松、王乐平、陈公博、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刘芬、包惠僧、纪钱、郑强等众多国共两党重要人物。招考委员会制定了包括投考资格、名额支配、各地招生人员及旅费、考试日期及科目监试、入场阅卷、取录标准、落第生之救济等多项规定。除特派员于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上海、奉天（今沈阳）等处招



考外，又承认河南、安徽、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奉天（今沈阳）、热河等处党部及韩国青年会介绍学生投考。为了更加广泛地招收有志青年同时提倡男女平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商量在即将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第一批女生，让他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武汉分校招生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考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考国文并测验党的常识及政治常识，检查身体。先后初试复试 5 次，初试生约共 6 000 余人，复试生约 4 000 人，最终录取 1 181 人，其中男生 986 人，女生 195 人。男生以四川籍为最多（207 人），女生以湖南籍为最多（61 人）。还有一部分未被录取的考生，由临时开办的政治训练班南湖学兵团录取[20]。1927 年 3 月底，南湖学兵团的 30 名女生编入军校女生队，人数扩大到 213 人。武汉分校首次招考女生是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创新之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正规的军事政治学校中接受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女兵队伍[21]。此外，从最终录取学员籍贯来看，武汉分校的招生考试明显呈现出了地缘特征，即与湖北临近的四川、湖南两省学生录取在男生学员与女生学员中分别最多。

黄埔军校的招生，当时除了广东可以公开进行外，其他各省则委托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回籍后秘密选拔考生来校应考。中共中央曾多次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动员进步青年前去报考。当时毛泽东在上海负责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送来的考生进行复试和转送工作。何叔衡回湖南动员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胡公冕被派到浙江招收黄埔一期学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和积极协助，许多有志于革命的进步青年，踊跃投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的 600 多名学生，相当大的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从各地秘密介绍和选送的进步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就有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 1/10 以上。[22]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认真负责地参加选送和录取新生工作，有效地保证了黄埔军校学员的质量。

黄埔军校创办以来，在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从 1924 年 5 月至 1927 年 7 月，黄埔军校共招了 7 期学生，从第一期的 500 学生扩大到数千人；从步兵一科扩大到步、马、炮、工、经理、政治以及无线电、航空等各科。7 期招生共培养了 15 000 多名军官，前四期约 5 000 名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毕业的。许多学生经过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和激烈的战斗洗礼，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蒋先云、宣侠父、许继慎、陈赓、徐向前、周士第、

左权、周逸群、刘志丹、王尔琢、卢德铭、段德昌、王一飞、曾中生、吴光浩、黄公略、陶铸、何长工等都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总之，黄埔军校的创立，为国民革命军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

②杨涛：《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文史精华》第11期，2010年，第60页。

③同上。

④同上。

⑤《赤心评论》第12期。

⑥杨涛：《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文史精华》第11期，2010年，第61页。

⑦同上。

⑧同上。

⑨同上。

⑩《民国日报》，1924年4月7日。

⑪《民国日报》，1924年2月19日。

⑫《民国日报》，1924年8月26日。

⑬《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6日。

⑭《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936年。

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936年。

⑯同上。

⑰杨涛：《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文史精华》第11期，2010年，第62页。

⑱同上。

⑲杨涛：《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文史精华》第11期，2010年，第63页。

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936年。

㉑杨涛：《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文史精华》第11期，2010年，第63页。

㉒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116页。



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中国国民党建军的起点，它实行的新的一套建军制度，使那时的国民革命军面目一新；它是中国共产党介入军事工作的开端，为中国共产党后来领导人民创建自己的军队积累了初步经验并准备了一部分干部；它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光辉结晶，又是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两党师生割不断的情结；它所练就的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始终激励着曾在这所军校工作、学习的共产党人和爱国的国民党人，为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族的振兴而奋斗[①]。黄埔军校所以有这等重大意义，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和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②]。

为了促进国民党和革命事业获得新生。孙中山在1922年“第三次革命”失败后，作了深刻反思，认识到革命所以再三失败，是没有一个政治上坚强的革命党，没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他看到“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拯救他就需要新的血液”[③]；注意到“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之主义完全相同”[④]；深感确实应当如共产国际来华代表马林所建议那样，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创办军官学校，创建国民党的革命军队。他决定首先吸收共产党人作为“新鲜血液”“救治”国民党，挽救革命事业。

1923年，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意向，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应孙中山的邀请，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共产党人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新形势。国民党军官学校的创办有了可能。[⑤]

1月24日，孙中山成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中正（字介石，故又称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将办校计划付诸实行。

当时，中国军校通常以所在地而别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设在广州黄埔地区的长洲岛，被别称为黄埔军校。国民党为扩大黄埔军校的影响和广集全国优秀青年，实行向全国招生。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广州地区，为此于1月30日国民党一大闭幕时，委托与会的各地代表代为秘密招生。当时，有25名共产党人出席“一大”，其中多数为外地代表，他们都把国民党中央的委托当成大事，返回各地后即布置当地两党党部，推荐党员、青年团员并动员进步青年考军校。共产党人何叔衡、董必武，分别在长沙和武汉主持秘密招生。毛泽东负责上海考区的初试。由于各地党部都普遍重视深入动员，特别是考生相对集中的两湖和上海地区，选拔严格，考生素质较高。其中，中共湖南党组织选派的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榜首。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约占1/10。[⑥]

与此同时，一些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军校的创办。

军校筹委会成立1个月后，蒋介石因为没能进中央领导班子而闹情绪，擅自离开广州不干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廖仲恺亲自主持筹委会工作。他把李大钊推荐到广东大学图书馆任馆长的共产党人张嵩年（又名张申府）请到家中，邀请他参加军校筹备工作，负责建立图书馆等事宜。此后，国民党中央任命张嵩年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共产党人茅延桢、金佛庄等人，或受党组织派遣或经考试，到校供职。茅延桢任学生队第二队队长，金佛庄任第三队队长，严凤仪任第四队副队长，曹石泉、郭俊任区队长，胡公冕任卫兵长，徐坚、徐成章任特别官佐。

11月，共产党人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调进鲁易等共产党人，并将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大部分共产党员留在军校工作，这使得教职员中有了一批进步的政治骨干。

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参加国民党军事工作的方针。1924年5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党“应当使国民党特别注意军队里的宣传”[⑦]。针对当时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军队都是依附于革命的私人军队，这次会议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又进一步指出，党在“广东政府的领域里，应当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划的宣传，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⑧]。中央所强调的“军队里的宣传”，就是稍后所说的军队的政治工作。这些，确定了中共及其党员参加国民党军事工作侧重在思想政治建设方面。

孙中山也强调政治建军。他指出，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在于以军校的



学生为根本，“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提倡革命军人应当“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⑨]。为造就这样的革命军队，孙中山决定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在黄埔军校乃至革命军队中，实行政治工作制度。

这时的政治工作制度，由国民党特别党部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组成。特别党部的职能在于保证军队“党化”，规定：凡革命军官兵皆为国民党党员，皆应受国民党组织和纪律约束，接受党的训练、指示、管辖和制裁。党代表是国民党派到军队中监督军事长官执行党的旨意的全权代表，规定军校和部（分）队凡呈请、命令、通告、行动等各种事宜，都必须经党代表签署才有效。政治部担负军校和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具体工作。后来的实践表明，政治部是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制度的重心。[⑩]

由于重视军校的政治工作，孙中山重点配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政治教官。他亲任校总理，以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和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和候补委员邵元冲任政治教官。显然，孙中山把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政治骨干多派到黄埔军校，开展思想政治建设工作。

可是，戴季陶既不懂政治部工作，更不重视政治部建设。他除以甘乃光任政治部秘书支撑门面外，别无作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只是偶尔到校作政治演讲，并没进行有计划的政治教学或抓政治工作。副主任张嵩年分管建立图书馆工作。开学两个月后，戴季陶不干了，张嵩年也因不满蒋介石等人的飞扬跋扈而辞职。不久，国民党中央任命邵元冲为政治部主任，但邵同样不懂政治部工作，也不重视政治部建设。那时，黄埔军校政治思想包容，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十分活跃，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和政治教学工作的不足，营造了政治进步氛围，但多数师生仍不满于这种状况，他们强烈要求撤换邵元冲，加强政治部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嵩年把刚从法国回来参加大革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推荐给廖仲恺。廖仲恺很慎重，先是让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周恩来一走上黄埔军校的政治讲坛，立即以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特别是以青年人的朝气和才干征服了师生，也受到廖仲恺的青睐，他立即向国民党中央推荐周恩来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1 月，主任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北京，周恩来又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不负重托。他上任后，首先是建立政治部机关，设秘书、指导、

编纂三股，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一些共产党员和一些政治上进步又乐于做政治工作的国民党员到机关工作，并将共产党员鲁易从广东建国军陈铭枢部调到政治部任秘书，成为一名得力助手。随后，周恩来着手建立政治部工作。一、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在实际上取消有名无实的政治教官高配做法，在指导股安排3名政治指导员，辅导和监督学生队政治教学，组织编纂股编写政治教材、讲义，使政治教学正规化。二、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并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三、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进而，通过校共产党支部，将平定商团军叛乱时产生的爱国军人自发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正式的爱国军人群众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号召黄埔师生乃至广州地区其他军校、部队及地方大学的爱国青年，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救民。除了上述工作外，周恩来还具体负责将党代表制度落实到“党军”之中。1924年冬，黄埔军校遵照孙中山旨意建立“党军”教导第一、第二团。周恩来按党代表廖仲恺的指示，从军校教职员和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胡公冕、蒋先云、许继慎和蔡光举等思想进步、政治活动能力强的国民党干部，充任营、连党代表。政治部兼负对教导团各级党代表的指导和官兵的政治训练。

这些，使黄埔军校和“党军”从此有了有组织的进步的政治工作，将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师生和官兵，也为此后军校政治部建设、政治教学、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党代表、政治部制度在国民革命军中推行，提供了实践依据和初步经验。[11]

1925年5月，国民党中央一方面决定扩编“党军”，一方面准备把“党军”和广州政府的其他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在国民革命军中实行政治工作制度。这就需要大批的政治工作干部。为此，周恩来组织制定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并于当年夏在黄埔军校倡导举办了一个120人的政治训练班，亲任主任，突击训练基层党代表。这个训练班不仅满足了“党军”因扩编为第一、第二师对政工干部的需要，而且也为黄埔军校培养政工干部奠定了基础。是年冬，黄埔军校决定从第四期开始，开设政治科，招收学员近500名，专门培养政治工作干部。

1925年，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加强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建设和政治教学的力量。是年春，周恩来参加率领由“党军”教导第一、第二团和第二、第三期部分学员组成的“校军”东征，鲁易留校主持政治部工作。第一次



东征后，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到“党军”担负政治建设重任，汪精卫出任校政治部主任。8月，廖仲恺遇难，汪精卫升任校党代表，9月，中共特别党员邵力子任政治部主任，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此时，“党军”与部分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10月投人第二次东征。由于部队建设、东征政治工作的需要，鲁易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党代表。黄埔军校政治部又缺乏得力的负责人。为此，中共中央先后派从苏联学习回国的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其中，熊雄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任秘书，高语罕任政治部教官。为适应黄埔军校扩办政治科的需要，中共中央又调恽代英到校任政治主任教官，调张秋人等党员到校任政治教官。不久，熊雄接替邵力子出任政治部主任，将政治部扩编到70多名教职员。其间，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吴玉章、苏兆征、彭湃等，先后应邀到校作专题讲学或政治报告。

中共中央也更重视保证黄埔军校学生的政治素质。1925年11月1日、1926年10月3日和11月3日，三次通告全党，要求各地党部动员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并强调“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12]。

随着黄埔军校的发展，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8日决定，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人们仍习惯称其为黄埔军校）。当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11月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武汉设立分校，以政治科为主。共产党人恽代英参加创建武汉分校。在此前后，黄埔军校还在潮州、南宁、长沙建立了分校，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了这些分校的创办。

1927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武汉分校改为主校。这时，学校已发展到师生员工共6 000余人。实行委员制，共产党人恽代英任委员，周恩来、李富春、蔡畅、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项英、陆沉、彭泽湘等，被聘请为兼职政治教官；陈毅任学生队共产党支部负责人。由教育长方鼎英和政治部主任熊雄主持的黄埔本校有师生约4 000人，共产党人约占1/8。至此，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发展到鼎盛时期。[13]

随着政治部机关建立和政治教学走上正轨，黄埔军校根据孙中山的“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14]的建军纲领，确立了政治教学的总纲。主要精神是：“使学生彻底了解他自己的责任，是

要能够担负责任使一切已经与国民相结合的武力，渐进而成为真正的国民之武力"；"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养成士兵确定革命观"，"保证军队的统一与为主义奋斗作战的革命精神"；"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农工群众的物质要求，革命胜利，亦必须靠农工群众的努力参加始能有所保障"[15]，等等。为了达到总纲要求，政治教学设三民主义、社会主军队政治工作等10门课。通过这样全面的政治知识教学，不仅使学生有一定的政治理论知识，而且也使许多学生确立了爱国革命的人生观。[16]

政治训练形式也发展为多样化。除课堂理论教学、请国共两党政治活动家和社会名人作政治演讲外，政治部还组织政治讨论会，相继编辑出版了《士兵之友》、《中国军人》、《黄埔潮》、《黄埔日刊》等多种刊物，制定各期入伍生誓词，谱写第二版黄埔校歌，从而使师生时时处于进步的革命的政治氛围中。

周恩来还在东征作战中开展军队的战时政治工作。在政治部建立总队至小组四级宣传队和一个"血花剧社"，专门做战时鼓动工作和对敌、对战区民众的宣传工作。战前和作战期间，他反复进行战争和作战动员，要求各级党代表要竭力开展战场思想工作，营造英勇杀敌氛围，并以自身模范作用带领官兵奋勇向前。周恩来还积极发挥政治部的职能作用。他根据孙中山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建军纲领，在政治动员中，强调军队要遵守群众纪律，以求得国民的支持援助；要求各级党代表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领官兵遵守群众纪律；宣传队和"血花剧社"，要竭力开展宣传群众工作。他指示政治部给"校军"官兵每人发一条红巾，系于颈上，以示"校军"与其他军队的区别。这既给"校军"官兵以政治荣誉感，又赋予他们以政治责任感。这样，就把政治部职能由对内担负师生和官兵政治训练任务，发展到对外担负宣传民众任务，使革命军向着军民一致的方向发展。[17]

通过全面的进步的政治知识教学，多样化的进步思想教育，强有力的战时政治工作，使黄埔军校多数师生实践了孙中山提倡的"忍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民众利益"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勇于冲锋陷阵的战斗精神等等。人们把这一切赞誉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黄埔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一个体现，是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部分，是黄埔军校意义之集成和永不泯灭之所在。[18]

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几年，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



但通过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周恩来指出："军队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19]，并且提出革命军必须置于党（当时是国共合作，故他所指的党是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遵守纪律，为国民革命而奋斗；革命军兼负宣传民众使民众革命化的使命。瞿秋白根据1925年革命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提出，中国已有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做革命战争的准备，"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20]。毛泽东、刘少奇也提出，必须武装工农，建立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21]

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提出参加国民党军事工作方针后，于1925年10月决定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后改称中央军事部），指导全党的军事工作。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作出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22]。

但在1924年～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掌握军队领导权的思想，而是真诚地指示党员帮助国民党从政治上加强军队的建设，以求实现孙中山的"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遗嘱。然而，执掌国民党领导权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并没有遵照孙中山的旨意建设国民革命军，而是坚持军队的私有制，并于1927年春夏之交，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昨天的同盟者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了大屠杀政策，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认识到在中国"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也认识到，"除去澈（彻）底的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以外，民权革命是决不能胜利的。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23]。在中央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毅然独立领导人民创建自己的军队，开展革命战争，以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注释：

①陈伙成，王建强：《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

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2004年,第41页。

②同上。

③《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109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616页。

⑤陈伙成,王建强:《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2004年,第42页。

⑥同上。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3页。

⑧同上,第249~250页。

⑨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讲》(1924年6月16日)

⑩陈伙成,王建强:《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2004年,第43页。

⑪陈伙成,王建强:《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2004年,第43~44页。

⑫《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六十二号》(1925年11月1日)

⑬陈伙成,王建强:《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2004年,第44页。

⑭孙中山:《北上宣言》(1925年11月)

⑮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1926年)

⑯陈伙成,王建强:《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2004年,第44页。

⑰同上。

⑱陈伙成,王建强:《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2004年,第45页。

⑲《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页。

⑳《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2、286页。

㉑陈伙成,王建强:《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2004年,第45页。

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27、229页。

㉓《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40页。



黄埔军校学生军平定叛乱

国共合作建立以后的广东，成了全国的革命中心。但是，盘踞在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还相当强大，它们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企图扑灭在广东燃起的革命烈火。英帝国主义一方面“从香港暗输军械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想颠覆广州革命政府。”[①]即妄图通过援助陈炯明从外部进攻广州，另一方面，又加紧勾结和利用广东买办豪绅，把他们控制的商团变成一支反革命的别动队，以便策动商团在广州内部发动叛乱，妄图一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因此，消灭盘踞广东的反动军阀，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是促使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

1924年10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镇压了广州商团叛乱，开始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广州商团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就已开始建立。广州市在1911年夏首先组织了商团，接着一些中小城镇和县城也开始出现商团。商团的宗旨，原为“保卫商场，维持治安”，“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至于“其他事项，概不干预”。[②]在“官不为民，不如民之自卫”的口号下建立的商团，曾在保护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但是到了1919年，陈廉伯继任广州商团团长后，在英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支持下，商团努力迅速扩大，成为一个买办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集团。英帝国主义者煽动陈廉伯：“如果你能够发动商团反对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③]1923年，广州商团“向加拿大购买步枪千数百支，由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窃据大权下的北京陆军部发给人口护照，海关又为英人所把持，上下一气。”[④]到叛乱前，“广州商团共有十团，计四千余人，连同后备力量，约达六千余人。”[⑤]陈廉伯羽毛渐丰之后，“北通曹吴，东连陈炯明”，[⑥]并勾结佛山商团和乡团，利用沙面租借作为反革命根据地，妄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建立所谓商人政府。

从1924年5月开始，广州商团公开与广州革命政府发生直接冲突、

对抗。

5月下旬，广州市政府公布“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陈廉伯指使商人向广东革命政府“请愿”，反对抽收铺底捐，声称如达不到目的，即行罢市。同时，他还联络广州附近的商团和乡团酝酿罢市，向政府示威。各地“商团、乡团亦即纷纷向广州集中”，为数近98团，计有常备军4 000人，后备军4 000人。[⑦]5月26日，广东省长、广州市长被迫发出布告，宣布取消“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但是第二天，广州商团擅自决定召开有108埠商团代表参加的广东省商团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为全省商团的统帅机关，推定陈廉伯任总长，邓介石（丝店老板）、陈恭绶为副总长，并呈省署备案，举行成立大会，以及筹备款项、购买军械等项。会上通过了购置武装巡舰案、筹设商团军制弹厂案、联防总部下设军事参谋案、联络各属乡团案等。这时，陈廉伯“欲步墨索里尼之后尘；期于8月14日起事，推翻政府，自卫督军”。[⑧]8月上旬，广州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的步枪、驳壳枪、大小手枪9 841支，各种子弹3 374 200发，[⑨]由悬挂丹麦国旗的轮船“哈佛”偷运到广州。事先陈廉伯曾贿买许崇灏（粤军将领许崇智之弟，任粤汉铁路局局长，商团分子），于8月4日秘密向大本营军政部骗取军械入口的护照一张，以掩护他们偷运。尽管军械的购买和运输是极为秘密的，但因数量庞大无法瞒过政府。商团护照载明枪械在40天内运到；但8月8日（即领照后4天）即以运到虎门，停泊在沙角炮台附近。所运到的枪支数目较护照多出4 000余枝。哈佛轮运械到广州未经遵章报明，是违反国际惯例的，这不能不引起广州政府的怀疑。孙中山得到消息后，以大元帅名义先令杨希闵、刘震寰查办。但杨、刘“奉令而不照行”。[⑩]孙中山遂于8月9日命令黄埔军校查缉哈佛号。8月10日清晨，发现哈佛号已开到广州市区省河白鹅潭，孙中山当即命令永丰、江固两舰将哈佛号押至黄埔，又命令黄埔军校把查获的私运械弹全部扣留，封存于黄埔军校。8月11日，孙中山令大本营军政部吊销陈廉伯蒙混骗领的护照，下令通缉商团头子陈廉伯、陈恭绶。这就是“广州扣械潮的开始”。

陈廉伯闻讯逃往香港，指使广州商团以罢市威胁广州革命政府，要求无条件发还枪械、准许商团成立联防总部、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令。12日，商团公然集中团员2 000余人列队赴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请愿”，蛮横地索要枪械，声明“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请求，便煽动广州全体商团罢市，抵制政府”。[⑪]孙中山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商团头目们的种种谰言，充分说明



了政府扣械的理由，表示非彻查不可，并宣布政府在彻究陈廉伯等策划颠覆政府的罪恶阴谋。[12]到8月25日，在商团的煽动下，广东全省有100余处罢市。商团还使用暴力阻挠商民开市。而陈恭受在石湾集中佛山和南鹤等14县的商团、乡团及土匪3 000余人，自任“攻城总司令”，准备向政府进攻。他们还大量散发反动宣传品并通电各县商团驱逐革命政府的县长，宣布“独立”。26日，大本营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讨论解决罢市问题。孙中山主张立即下令解散商团，并以武力制止罢市。在接见商界代表时，他谴责陈廉伯阴谋组织“商人政府”的罪行，并宣布“目下枪械一支亦难先发还，须明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倘仍持顽弗恤，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式。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击西关，立使之变成墨粉。”[13]当商团不听政府警告，并变本加厉地阴谋叛乱之际，孙中山决定以严厉手段对待之，准备在29日进攻西关，拔掉商团罪恶活动的据点，粉碎叛乱阴谋。

但是8月28日，英帝国主义公然出面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广州商团，9艘英舰驶入白鹅潭，炮口对准孙中山大元帅府。2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致函大元帅府，蛮横地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之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14]而且当天晚上，领事团质问广东省长廖仲恺“是否政府要开炮轰击商民，果有此事，外国决不能袖手旁观，当以实力制止”。[15]但是英帝国主义的恫吓威胁没有起到它预期的目的。9月1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强烈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广州商团叛乱。9月14日，广州商团趁孙中山率领师北伐之际，散发攻击广东革命政府的反动传单，酝酿第二次罢市。

对于商团的反革命行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力劝孙中山采取革命手段，实行武力镇压。8月29日出版的《向导》周刊揭露了商团事件的反动性质，指出：商团事件是“帝国主义主使商团，商团勾结军阀来共同宰割革命政府，所以是一个反革命的行动”[16]，因此，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决不可“姑息犹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7]同时指出，革命真正的心腹之患在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是北伐。”[18]中国共产党人还指出必须提高对国民党右派的警惕性，在商团事件中，“国民党右派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与香港广州的买办阶级，一面勾结雇佣军阀，以把持广州兵权市政财政诸权利”，他们“必然的趋于反革命”，因此，“为挽救革命的破产计”，“要毅然决然抛

弃以前不幸的错误政策，澄清党内有派反革命的法西斯蒂。”[19]也向广东革命政府和孙中山提出了忠告：“我们敢说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不在东江而在广州！我们以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团军，一旦东江或北江军事失利，第二次以枪弹‘请孙下野’的便是商团军！”[20]

广州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革命军人和学校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对商团叛乱的倒行逆施，一开始就义愤填膺，同声谴责，誓与之决一死战；对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反商团斗争的一切革命措施和主张，坚决拥护，积极贯彻。黄埔军校及各军事干校的学生纷纷表示誓与商团决一死战。新学生社发表通电指出：陈廉伯“私运军械，图谋内乱，以危害国民革命之进行”[21]。表示坚决粉碎商团的叛乱。

但是，胡汉民等人力主妥协。8 月 18 日，胡汉民同广州商团代表谈判，主张每支枪交纳 60 元捐税后发还。同时，驻在广州的滇系军阀范世石生、廖行超等竟以第三者的身份出面“调解”，与商团签约担保政府将枪械如数发还，而商团则向政府缴纳 50 万元。胡汉民代行大元帅之职后，于 9 月 18 日派代表同广州商团头目赴黄埔军校察看所扣枪械。20 日，胡汉民取消对陈廉伯、陈恭绶的通缉令，发还其被封财产。10 月 9 日晚，孙中山命令蒋介石依照胡汉民转呈的李福林所拟妥协办法发还广州商团枪械。10 日晨，李福林等赴黄埔，将枪械 4 000 支运回广州长堤发还广州商团。[22]

商团见政府步步退让，软弱可欺，越发猖狂。10 日下午，商团军开枪射击庆祝双十节游行的工团军和学生，打死打伤数十人。商团还到处张贴反革命标语，武力威胁商人罢市，妄图和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广东革命政权。英帝国主义也出动军舰为商团助威。

在这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坚决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中央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建议孙中山当机立断，“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23]这时，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和广大工农群众，也都表示要尽力帮助广东革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全体学生一致决议准备对商团军作战。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决定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商团的反革命叛乱。10 月 11 日，孙中山成立自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处理商团问题的权力机构，委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人为全权委员，命令胡汉民解散商团机关。10 月 13 日，孙中山由韶关回师广州。14 日，孙中山下



达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手令："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时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铁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堂、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介石）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24]下午9时，孙中山电令胡汉民及驻广州各军，迅速"收缴商团枪支"，"不可一误再误"，"以免后患"。[25]同日，商团军向政府军发动进攻，政府军和黄埔学生军在工农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分头迎击。15日清晨，商团军退守西关，被重重包围。经过数小时激战，革命军将商团军全部歼灭，商团军首恶分子逃往香港，其余大部分向政府缴枪投降。反革命的商团叛乱遂被平定。孙中山电示胡汉民处理善后事宜："未入商团之商店，应严令即日开市；其已入商团者，应分别处罚；为首者没收财产，附从者处以罚金，论情罪轻重，由数百元至万元，作北伐军费。"

注释：

①双林：《孙中山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功绩》，《向导》第107期。

②《粤商商团议草》，《民立报》，上海，1911年5月6日。

③孙中山1《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5页。

④李朗如等：《一九二四年的广州商团事变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5期。

⑤丁文江：《广东军事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⑥巨缘：《帝国主义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向导》第85期（1924年9月23日）。

⑦《广州总罢市的解决与商团联防》，《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号。

⑧廖仲恺：《通缉陈廉伯陈恭绥电》，《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7页。

⑨《1924年8月11日陈廉伯等致内政部呈》，《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⑩胡去非：《总理事略》，商务版，第292页。

⑪《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82页。

⑫同上，第383页。

⑬《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78页。

⑭《扣械潮》卷2，第91页。

⑮公侠：《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右派共同在各之下的广州革命政府》，《向导》第82期（1924年9月3日）。

⑯同上。

⑰陈独秀：《反革命的广州商团军》，《向导》第79期。

⑱和森：《广州反革命之再起》，《向导》第87期。

⑲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向导》第82期。

⑳陈独秀：《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向导》第79期（1924年8月20日）。

㉑《扣械潮》卷1，第59页。

㉒谭礼庭：《发还扣械的经过及其他》，《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

㉓伍豪：《最近二个月广州政象之概观》，《向导》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第773页。

㉔《孙中山平定商团手令》（1924年10月14日），《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239页。

㉕《孙中山致胡汉民等密电》（1924年10月14日），《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以下简称“青军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和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以该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核心，并遍及全国各地军队中的革命团体。它于1925年2月1日正式成立，1926年4月15日，在当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强行勒令下，由于党内陈独秀采取妥协政策，被迫宣布解散。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①，1924年5月在广州的黄埔岛建立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叶剑英参加了军校筹建工作，并担任教授部副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被派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张秋人等共产党员被派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或其他负责工作。并从全国各地选派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一方面，驻粤的滇、桂、湘、赣、川等各军，竞相争夺地盘，扩充势力，对孙中山大元帅的命令阳奉阴违。另一方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集团头目陈廉伯勾结军阀陈炯明，从英国运进十万枪支准备阴谋暴动，妄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

为联合革命军人，稳定时局，周恩来遂指派一期学生蒋先云和二期学生周逸群、王一飞等（均为共产党员），分别到驻粤各军校、机关、部队积极联系，很快成立了青年军人代表会议（会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当时，这一组织甚为简单，每星期开一次会，由每个单位派两名代表参加，并轮流担任主席。嗣后，感到这种组织有如下缺点：“（一）系一个代表的集团，而不是有实际组织的团体；（二）只限于团体的进行，多不方便，上星期的工作与下星期的工作，没有连续；（三）因上二种关系，只有开会，没有工作；（四）组织的分子以军事学校或军事机关为单位，不以军

人为单位，使个人无从加入。”[②]

鉴于上述情况，周恩来与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商定，提议将青年军人代表会议改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得到了黄埔军校广大师生的赞同，也得到了青年军人代表会议全体代表的一致通过。1925 年 2 月 1 日，以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大学正式宣布成立。到会会员两千余人：“黄埔军校六百余人，滇干校七百余人，粤武校二百七十余人，桂军校二百九十余人，甲车队百余人，海军三十余人”[③]。

中国国民党党部、广东省政府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工、农、学、妇、商等各界群众团体等 30 多个单位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各界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热烈祝贺“青军会”组织成立。

“青军会”成立后，经酝酿协商，选举了主要负责人，“学生中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傅维钰、徐向前、陈赓、王一飞、许继慎、左权、陈启科、黄鳌、李汉藩、杨其纲、袁策夷、刘云、张际春、余洒度等；教职员中有金佛庄、郭俊、唐同德、茅延祯、鲁易等”[④]。

“青军会”成立之时，“中国现役军人号称二百万”[⑤]，大多是军阀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了启发其觉悟，团结他们的大多数在革命旗帜下，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周恩来同志领导“青军会”“竭力以在军队中从事文化政治工作为己任”[⑥]。因此，该会在成立的布告中疾呼：“革命旗帜下的军人，从速站在同一的战线上！军阀铁蹄下的军人，从速跑到革命的队伍里！只有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才能解放自身与民众。”[⑦]

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和周恩来领导制定的“青军会”宣言、总章中，明确地把“联合军队中的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亲密关系，建立各军队中相互的亲密关系”[⑧]等，作为该会的宗旨。积极开拓革命军人运动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军人》、《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三月刊》、《兵友必读》等刊物及小册子。这些刊物和小册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思想和革命道路，宣传统一战线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深受广大军人的欢迎。贺龙同志曾回忆说，我在旧军队当旅长驻扎贵州铜仁时，看到周逸群从黄埔军校寄给他亲友的《中国军人》、《兵友必读》等，受益很深，



这对我是第二次思想上的推动。[9]这些刊物的发行量不断增加，《中国军人》由五千份增到一万份。《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由于读者“索阅日多，每期印三万份，尚觉不敷”[10]

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军人，周恩来指示“青军会”秘密派人到上海、青岛、烟台、北平、天津、保定、郑州、开封、洛阳等地的军队中发展会员。派往河南开封的肖仁鹄报告：“已成立了一个华北总部。会员约百五十余人。组一干部部，分为二区分部及一特别小组。”[11]与此同时，该会还设立了东北、西北、西南、中原和长江组织部。经过八个多月的活动，会员迅猛发展到二万多人。驻粤的滇、桂、湘、赣等各军都建立了该会的组织，四川还成立了分会。至1925年秋，这一组织遍及全国各地的军队中，“成为革命军人中一个具有明确的宗旨，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革命团体，成为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中心”[12]。

“青军会”为了使广大革命军人“常与政治接近，并以藉悉人民之要求”，促进工农兵大联合，十分重视组织军人参加群众运动。[13]并在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对此项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和部署，制定了七项决议案。1925年4月28日，“青军会”两千多会员在广州北校场举行讲演，到会来宾有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三十四人及各界群众组织数千人。“会场布满工农兵大联合与国际革命战线大联合之空气”。[14]该会负责人王一飞担任大会执行主席，报告了革命军人的任务及本会制定的决议案。国民党党部常委谭平山，苏俄代表史莱德，劳动大会代表刘少奇、苏兆征，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包惠僧等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是一次工农兵群众大联合的空前盛会[15]。

当时，主编《中国青年》的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张秋人都发表文章，热情赞扬“青军会”的作用，推广该会的经验。张秋人在《广州的青年革命军》一文中指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开中国军人的新纪元，是要把他们的主义精神和纪律，传到中国各军队中去，共同肩负起反帝反军阀的任务。”恽代英在为该文写的长篇按语中指出：“广州青年革命军的成绩，第一靠党的约束；第二靠主义的宣传。军队受了主义的训练，就明确了战争的目的”，“全国的军队，都需要党与主义，把党与主义公开地或秘密地输入军队中间去，全国的军队都可以变成像广州一样的青年革命军”[16]。

“青军会”是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教育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培养我军指挥员的一个基地。例如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威震中外的叶挺独立团，全团三个营长和3/4的连排干部，都是黄

埔军校的青年会员。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和毕业的学生中，有不少成为我军早期著名指挥员，如：蒋先云、周逸群、左权、王一飞、卢德铭、朱云卿、许继慎、伍中豪、王良等，也有不少成为我军高级将领，如：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赓、周士第、郭天民、张宗逊、宋时轮、陈奇涵等。[17]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青军会"是在反帝反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中诞生的，一直站在对敌斗争的最前列。该会成立的第二天（即1925年2月2日），黄埔军校的全体青军会员，就在周恩来等率领下，投入了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的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作战。为激励官兵英勇杀敌，"青军会"依靠周恩来的政治领导，印发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东征宣言》五万份和其他宣传品十万份，深刻揭露了叛逆陈炯明"谄媚北洋军阀，勾结土匪，扰乱东江，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18]的罪行。使广大官兵明确了东征作战的目的意义，每战不顾生死，不避艰难，冲锋在前。时任营长的蒋先云在《由前敌归来》一文中写道："打淡水时，同学们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同学李青，头打伤了，用自己的手巾裹着血衣，仍奋勇登城。同学蔡光举，他打穿了肚子，我去扶他，他只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们痛杀！'"[19]。

3月13日，在棉湖战斗中，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共千人，顽强地抗击了万名敌军的猖狂进攻，并乘胜追敌百里之外，俘敌团长以下五百多，为东征作战谱写了以少胜多的光辉篇章，给陈炯明以惨重打击。

1925年6月初，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叛乱，占领广州。在此危急关头，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回师东进。在战斗最激烈的6月5日，"青军会"遵照周恩来指示，命令滇、桂军中的会员脱离该部。许多官兵积极响应，接到命令当日，离队者近百人，后又逐日增多。致使滇、桂两军内部"已无斗志，士不用命，相率响义"，"故革命军能于一星期内，将其完全歼灭之"[20]。

同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黄埔军校的青军会员与第一次东征一样，跃马挥刀，奋勇杀敌。在惠州城攻坚战斗中，指战员勇敢顽强，两日之内，一举夺取该城，全歼守敌。接着连克河源、紫金、五寿等重要城镇，又大破敌军万余于河婆。在两次东征作战和平定杨刘叛乱中，该会负责人唐同德、郭俊等和一批会员英勇牺牲。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军会"立即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农



民、妇女、学生等团体的各界群众十万余人举行反帝游行大示威，并向全国、全世界通电，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得到了全国人民和43个国家工人组织的热情支持，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动全国性的反奉（军阀张作霖）倒段（军阀段祺瑞）运动。“青军会”积极响应并立即投入这一斗争。该会与广东各界群众团体发动、组织和领导了十万军民举行的反对军阀段祺瑞的大示威，同时联合制订、通过了《对北方倒段运动议决案》、《拥护罢工工人与香港交涉议决案》等七项决议，为唤起全国军民反帝反军阀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在“青军会”成立时，迫于形势，并为骗取信任，表面上同意。但当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在校内公开散发《向导》周刊，出版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蒋介石感到“青军会”已是共产党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于是他在1925年4月，即“青军会”成立两个月后，“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21]。

“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积极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孙文主义学会则以国民党反共分子为骨干，打起孙文主义的旗号，专门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提出要将共产党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开除出去”[22]。于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破坏统一战线，拥护还是反对三大政策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孙文主义学会在蒋介石的支持和操纵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千方百计地找“青军会”中的负责人寻衅肇祸，监视党团员的活动，偷窃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文件等。对此，“青军会”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和周恩来领导下，予以坚决反击。[23]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老右派林森、邹鲁等人的反共活动甚为猖獗，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三大政策和统一战线。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闻讯忘形，与“西山会议”遥相呼应，疯狂进行反共活动。[24]“青军会”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立即发电声讨，指出：“西山会议乃反革命之充分表现”。接着，蒋先云在《中国军人》第八期上发表《怎样做革命派》一文，进一步揭露“西山会议”反共反人民的实质。[25]

为了控制“青军会”的活动，1926年2月2日，蒋介石召集该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负责人联席会议，提出四条规定：“（一）两会干部准互相加入；（二）两会在党校及党军须承本军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三）团长以上

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四）两会会员彼此有不谅解时，得请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26]对于蒋介石这一阴谋诡计，“青军会”洞察其奸，概不采纳。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阴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海军局长李之龙等50多名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得悉，立即率领部分青军会员赶至出事地点，当面质询蒋介石无理扣押共产党员，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27]不久，蒋介石即以“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为借口，强行命令解散这两个组织。由于陈独秀的妥协和退让政策，“青军会”被迫于1926年4月15日宣布解散。[28]

“青军会”历时一年又两个月，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为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拓中国革命军人运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先锋队。[29]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下卷，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②《本会组织缘起》，《中国军人》创刊号，1925年2月1日。

③《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大会记》，1925年2月1日。

④异之：《黄埔建军》。

⑤《中国军人》创刊号，1925年2月1日。

⑥袁伟：《周恩来同志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历史教学》第10期，1984年。

⑦《中国军人》创刊号，1925年2月1日。

⑧《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总章》1925年2月20日。

⑨袁伟：《周恩来同志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历史教学》第10期，1984年。

⑩《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第28期，1926年3月。

⑪《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十次大会记录》，1925年7月5日。

⑫夏燕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⑬袁伟：《周恩来同志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历史教学》第10期，1984年。



⑭同上。

⑮《工农兵大联合之曙光》，《中国军人》第6号，1925年8月。

⑯《中国青年》第74期，1925年4月。

⑰袁伟：《周恩来同志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历史教学》第10期，1984年。

⑱《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三月份经过概况》，《中国军人》第2期，1925年。

⑲《中国军人》第8期，1926年。

⑳周逸群：《总理逝世后之中国青年军人运动》，《中国军人》第9期，1926年3月。

㉑《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第116页。

㉒《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㉓袁伟：《周恩来同志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历史教学》第10期，1984年。

㉔同上。

㉕同上。

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6篇，1936年。

㉗袁伟：《周恩来同志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历史教学》第10期，1984年。

㉘同上。

㉙同上。

同共产党早期军事斗争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军事斗争的主张发端于国共合作时期，就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工人武装方面：1924 年 6 月，广州组织了工团军。在平商团、消灭反动军阀陈炯明和平定滇桂军阀杨、刘叛乱的斗争中，工人武装都发挥了作用。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工人斗争的实践和深入发展，也不可避免地把武装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形势，曾提出“武装平民”口号，以及“建立真正人民的武力，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主张，以反抗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压迫和屠杀。瞿秋白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中，分析五卅运动不能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指出其中之一便是“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他呼吁要“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①]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应当“有组织地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②]为此，会议还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军事部），以加强对开展军事工作的领导。

这一时期在斗争中产生的工人武装，主要是工人纠察队。1925 年 6 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一开始就建立了一支有 2 000 多人、400 多支枪的坚强的武装纠察队。中共广东区委还从黄埔军校、铁甲车队调一些共产党员到工人纠察队担任教练。纠察队不仅在抵制英货、缉查走私、封锁香港、维持秩序等坚持省港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支援东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要提出的是，从 1926 年 10 月 ~ 1927 年 3 月，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是工人运动发展的高峰，也是工人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英勇尝试。虽然它最后被国民党



新军阀镇压而失败，但是，经过这几次起义不仅一度解放了上海，打击了反动统治势力，它同时使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对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重要意义的认识。从这期间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来看，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军事工作和武装工人问题，成为中共上海区委十分重视并经常讨论的中心课题，强调"我们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第一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主要的缺点是没有武装准备，没有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心。"并指出："一切压迫者所最凶极恶的就是武装，因此人民要乘机夺取武装。人民武装自卫是保障他的权力之唯一条件。"[③]为了确保第三次起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作了充分准备，组织了中共特别委员会和特别军事委员会，以加强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同时在先进的工人中组织了3 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并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军事政治训练，作为起义的骨干。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以武装纠察队为主力，在其他革命群众配合下，发动起义，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巷战，成功地从直鲁军阀的统治下解放了上海，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和工人武装的战斗力。北伐军进到上海后，已露出反革命面貌的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分子、官僚买办、帮会流氓相勾结，阴谋策划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所以，纠察队问题也就是工人武装问题，成为当时上海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中心。在此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和起义领导人曾反复说明保持工人武装的重要性，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3月26日，上海区委在讨论政治局势的变化与我们的工作时就指出："现在中心问题就是上海的武装纠察队的问题，上海要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右派军事力量发生战斗。"[④]直到4月6日，罗亦农还在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说："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海纠察队武装问题，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的决斗。"[⑤]并提出，党的策略仍然是坚决与蒋介石的反动企图作斗争，坚决保持工人武装，不稍退让。为此，党还及时采取措施，对纠察队进行改编、集中和整训，使其得到加强和巩固，严阵以待。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幻想以妥协的办法，拉蒋不反共，因而不仅没有坚决贯彻上述正确意见，反而在关键时刻与汪精卫发表了粉饰太平、为蒋介石反革命阴谋打掩护的《联合宣言》，其结果是麻痹了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蒋介石不仅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并以血腥屠杀把上海革命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工人武装是工人政治地位与解放的保障，是"国

民革命胜利之保证”。

其次，在农民武装方面：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势必提出农民武装的要求。因为，农民发动起来以后，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各项斗争，必然遭到具有武装力量的地主阶级和反动势力的反抗和镇压，因此，把农民武装起来，首先建立农民自卫军，成为巩固农民组织、保卫农村政权和革命果实，发展农民运动的关键。海陆丰是广东农民运动最早兴起的地区，共产党员彭湃担任海丰县总农会会长，领导农民开展斗争。他还以国民党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到农民斗争尖锐的地区，指导农民运动，并亲自参加了农民武装同地主武装的战斗。彭湃在领导海丰、广宁、花县等地的农民斗争中，深切感到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1924 年 12 月 5 日，他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补充报告》中说：“广宁、花县及其他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并说，“从我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而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⑥此后，党的会议也开始关注农民武装问题。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总结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出：“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另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⑦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的《告农民书》中指出，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在广东帮助农民组织团体，经过不到一年，农民组成了协会的，有二十多县，各处协会会员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万人，并有几千的武装自卫军和地主开了好几次战。”经过斗争，农民协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告农民书》号召农民进一步组织和武装起来：“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的困苦与逼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⑧

湖南农民运动也是开展较早的，同样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问题。1925 年春，毛泽东就在韶山地区，发动农民，成立协会，开展斗争。北伐战争开始后，出现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高潮。首先，农民普遍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接着，凡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等经济斗争，并涉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



度。而斗争，归根结底是权力的转换，就是说，推翻封建统治，一切权力归农会，这势必涉及武装问题。事实上，当时已有不少地方的农民开始把地主武装团防局接收过来，建立起来农民自己的武装。1927 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 32 天的考察。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并指出，建立农民武装，一方面要夺取地主武装；同时要发展农民的武装即梭镖队。他说，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⑨]。

再次，在革命军队建立方面：1924 年，国共合作确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黄埔军校创办和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深化了对建立革命军队的认识，并积极探索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明确提出建立革命军队的思想。这些有益的探索，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能够迅速创建人民军队在思想上奠定了良好基础。[⑩]

关于革命军队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军队是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夺取或维护政权的主要工具[⑪]。1922 年 9 月，陈独秀发表了《造国论》一文，提出要“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此文可以说是党内最早提出建立革命军队的代表作。同年 12 月，周恩来也明确提出“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侮中国的情况下”，要“真正革命”，就“非要有极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但是在实践中，党并没有把军队建设问题提上工作的议事日程。

1924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投身于黄埔军校的创办及围绕黄埔军校展开的军事实践活动。1925 年的“五卅惨案”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军队重要性的转折点。7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表了《“五卅”二周月纪念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一文，明确提出：“我们民众应当要求武装，并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8 月，瞿秋白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中也呼吁：使“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要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1926 年，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中更加明确指出：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已经造成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军事上以正式的军队为主体……而后中国的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因此，对于“赞成革命军队的必需，我

们应当真切的认识”。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接连发生，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受到残酷镇压，这使中国共产党彻底认识到军队的作用，在旧中国没有革命的军队不可能有革命的成功[12]。

革命军队的性质问题，关系到军队代表谁的利益、为谁服务和为谁打仗的问题，这涉及革命成败的关键。同时只有认清了军队的性质，才能更好地明确和落实军队的任务。因此，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军队作用认识的深入，对军队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也做了积极地探索。1925 年 2 月，周恩来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的演说中，谈到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之目的时，指出：国民革命军东征“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增加人民幸福而来”，“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不必去打”。同年 6 月，周恩来在为黄埔军校学员作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演讲中，指出：“军队是一种工具——武器。”军队掌握在压迫阶级手中的时候，这个军队是一种反动的工具；而“被压迫者本身组织起来的武力，就并不是压迫人的，而成为解放人的武力了”，可“利用武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李富春在清江市民大会上的演说中强调：“革命军是主义为奋斗，为人民谋利益的；换言之，革命军就是人民的军队。”综上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已较明确地指出了革命军队与反动军队的不同性质，阐明了革命军队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同时还指出了革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解放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为人民而战。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的论述已进人实质性阶段，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革命军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

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独立领导军队，但是他们在积极探索如何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还是逐步认识到了党的领导对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1924 年，陈独秀提出：“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周恩来也多次强调：“要使军官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后，陈独秀在《革命与武力》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每个革命党的军人，不可以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军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每一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权威在军队权威之上。”反对“以军治党”，因此“革命的武力……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



裁”，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军事独裁，保证军队为革命的军队，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恽代英则直接提出“党军”的概念，明确“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他们都突出强调了党在军队中地位和作用，并初步阐述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立革命军队的关键。这些论述后来都得到应用和发展，为科学解决后来人民军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良好基础。⑭

军队是一种工具，既可为压迫阶级服务，亦可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服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建立之初，就强调应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在军队中建立并实施政治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参与下政治工作迅速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起来。北伐时，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党员已有上千人，主要从事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军队里的全部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不仅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是也促使军队革命化，使军队有了革命的精神。⑮

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军队革命化，造就一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军队。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者，因多数军队均系前清遗留而来，即有新招兵，仍仿前清编制，此种军队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因此革命要取得成功“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革命之军队”。“然而要造就革命的军队，就必须建立革命军队的政治制度，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周恩来后来陆续发表文章强调政治工作对于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所谓革命化就是使官兵具有革命观念，明白党的理论、主张、政策，能够为党国和人民利益奋斗⑯。张太雷也同样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现在的国民革命军成为真正的党与人民的军队”。

总之，1921 年～1927 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理论的探索时期。

注释：

①《向导》第 125 期。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404 页。

③④⑤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7、135 页，第 391 页，第 446 页。

⑥《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1 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286 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437 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9 页。

⑩⑪⑫王光银，朱俊瑞，牟言波：《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思想探析》，《福建党史研究》月刊电子版，2010 年。

⑬⑭⑮⑯王光银，朱俊瑞，牟言波：《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思想探析》，《福建党史研究》月刊电子版，2010 年。



中国国民党军校部成立

黄埔军校的开办，为创立革命军奠定了基础，而组建黄埔军校教导团，则是创建革命军的开端。

黄埔军校创办以后，孙中山便准备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组织革命军。1924年9月12日，孙中山再次出师北伐，驻军韶关，更加感受到建立革命军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10月19日，他手函蒋介石："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①]蒋介石回复说：于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蒋介石、廖仲恺遂命令军事总教官何应钦着手教导团的筹备。根据孙中山要以黄埔为骨干，从广东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的同志中招募的意愿。于9月19日开始考试教导团学兵，由湘军选送曾充军官之人员中录取73名，又在投靠学生中录取27人。10月18日，派王懋功、戴任、陆福廷赴沪招募北兵，并令陆福廷招考江淮土著5 000人。20日，又在上海招考志愿兵。以后陆续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一批青年工人和农民。招考教导团是以选择年龄18岁～24岁身体强壮和精通文理的有志青年。授以军士及准尉所必需的学术，培养成为下级干部为主旨的。

教导团是用缴获的商团枪械约9 000余支以及由苏联购回的轻重武器装备起来的。教导团的编制饷章，都系一种临时制度，并且带有学兵的性质。教导团自排至团采取"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每排26名～30名战斗兵；还没有直属团部的特种部队：特务营、侦察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等。

教导团实行苏联红军的经验，实行党代表制。"总理鉴于苏俄革命之成功，实赖于采取党代表制之红军。……故欲练成为主义牺牲之军队，非采取党代表制不可，特与教导团成立之始，委派各级党代表，施以切要之政治工作，此种训练，实为党军之特色"。[②]教导团从连队到团都设有党代表，连党代表直属于营党代表；营党代表直属于团党代表。各级党代表由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筛选教官和学生中富有政治学识者，呈请国民党中央任命之。

"党代表立于监督指导之地位，必要时得直接指挥军队，其效力不仅便利于党务指导及政治训练，即于军权军令之统一，亦甚有关系"。[③]党代表的职权是：一、党代表对于部队内的行政事务，有随时监察之权；二、党代表为便于其工作的进行，有组织选举特种委员会之权；三、党代表有加入所属党部执行委员会之权；四、党代表对于党务及政府工作的处置，有单独发表命令之权，但须不妨碍部队的军事行动，并须通知其部队的同级长官；五、党代表对于部队同级主管所发的命令，认为有明显的严重错误时，有拒绝签字之权，但须即向其上级陈述自己的意见；六、党代表对其部队同级主管所发的命令，认为有危害国民革命的进行时，须设法使其不得下达；如已发出，党代表有即时单独发表命令、不许其部下实行之权，但应从速报告上级；七、在上述场合内，党代表有在最短时间弹压或将罪犯逮捕送交法庭之权；甲、官长明白表示其反叛之意者。乙、军队中有谋反及掠夺之暴动者。丙、其他个人或部队有不法行为者；八、在激战时，其部队的同级主管失去战斗力或阵亡，而新任的长官又未到场之际，党代表有指挥其部队作战或指定其部队内之资深军官暂负指挥作战之权，但须即时报告上级。

党代表和部队长官的关系是：一、党代表对于部队长官，无论何时须着重其在士兵中信用及威严；二、部队长官对于党代表，不问其是同级或非同级，如非得本军最高级党代表或法官会审之特许，不得剥夺其自由。

10 月 3 日，教导团第一营首先成立，何应钦兼团长（后为孙常钧），沈应时任营长。接着，二、三营成立，陈继承任二营营长，王俊任三营营长（后为严凤仪），旋即成立教导团，王登云为党代表（后为缪斌），团副王俊，参谋长朱荣。胡公冕为一营党代表，茅延桢为二营党代表（后为刘峙），蔡光举为三营党代表。

12 月 3 日，教导团二团成立，（改称教导团为教导第一团），王柏龄兼团长（后为沈应时），张静愚为党代表，罗为雄为团副。顾祝同为一营营长，胡公冕为党代表（后为季方），林鼎祺为二营营长，季方为党代表（后为胡公冕），金佛庄为三营营长，郑洞国为党代表（后为宋文彬）。蔡忠笏为教导团炮兵第一营营长，罗为雄为暂编独立营营长（兼），唐震为独立营党代表。

教导团的成立，为"党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5 年 4 月 6 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上，秉承孙中山遗嘱，通过了建立党军案。随即以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了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



代表。4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决议以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将教导第一、二两团编为“党军”第一旅，任命何应钦为旅长兼第一团团长，沈应时为第二团团长，王俊为第一旅参谋长，全旅仍归蒋介石节制调遣。4月14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4月21日，教导第三团成立，钱大钧为团长（兼），蔡熙盛、沈良为团副。王俊为一营营长，郭俊为二营营长，文素松为三营营长，第三团仍属第一旅建制。29日，任命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不久，组建了司令部，内设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交通处、军法处、秘书处等。

7月，教导团与军校分离，这时教导团已扩大为一个旅，下设三个团。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具体帮助下创建的这支军队，是一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奋斗目标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新军，这支新军的创立是组建革命军的开端。

至于“党军”的军制，孙中山“曾欲打破陆军学生之故习，而特创拟一规模宏大之军制”④，就步兵来说，规定6人为一“伍”（兵6，官0），6伍为一“列”（兵36，官1），3列为一“连”（兵108，官4），6连为一“营”（兵644，官21），6营为一“团”（兵3 888，官129），3团为一“旅”（兵11 664，官388），3旅为一“师”（兵38 992，官1162）。“以战略衡之，该制颇为适用。但当时蒋中正等皆不赞同，以为编制人数太大，不易指挥，致又不克实施。”⑤这支部队之所以被称之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换句话说，就是受党的指导与监督，因为这军队是完全党化的军队，所以叫做‘党军’”。⑥

1925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所属各军取消原有的部队名称，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8月1日，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首先通告粤军将领，宣布根据国民党的新政策，辞掉粤军总司令职务，将军对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制。接着，谭延闿、朱培德、程潜等也发表通告，联名宣布分别辞去湘军、滇军和攻鄂军总司令职务，所辖部队均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从此，军政趋于统一。

1925年8月28日，在黄埔军校军和其他各军的基础上组成了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为5个军的建制。

国名革命军第一军由原在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基础上建立的党军第一旅和收编的粤军第四师组成，蒋介石任军长。1925年4月23日，黄埔军校教导

团第三团成立。不久，教导团扩编为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旅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之初由3个师组成，共辖9个团。军长蒋介石，副军长何应钦，参谋长先后为王懋功、胡谦、林振雄。

1926年1月，国民政府批准蒋介石辞去第一军军长职，由何应钦继任军长。到北伐前夕，第一军拥有5个师。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由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下辖4个师及1个炮兵团。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参谋长岳森。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由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改编而成，建国第一军由驻广东的滇军演变而来。军长朱培德，参谋长黄实。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李济深任军长，陈可钰任副军长，邓演存任参谋长。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由建国第三军（福军）改编而成，李福林任军长，李朗如、刘敏先后任参谋长。

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数达12万人左右，分别驻扎在广州、汕头、粤东、西江、南粤和珠江三角洲一带。

1925年11月至北伐前夕，广州国民政府先后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六七八军。

国共合作创立的革命军，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在部队设置党代表，并建立整治工作制度，保证这支军队能为打到封建军阀而战。黄埔军校教导团建立之时，从连队到团部都设有党代表。1925年5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对于党军校辑军队之训令决议案》。《决议案》强调“本党所立之军官学校，及党的军队中，于军事训练之外，更重政治训育，所以官佐学生士兵必须一直了解政治的训育之重要”。《决议案》对党代表制定了明确的规定：“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布署，由校长或由该管长官执行。”[⑦]国民革命军成立后公布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设置党代表是为了向部队“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扬三民主义之教育”。“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关于军队中之政治情形及行为，党代表对党员负完全责任。关于党的指导，及高级军事机关之训令，相助其实行，辅助该部队长官巩固并提高革命的军纪”。“党代表为军队中党部之指导人，并履行各种政治文化工



作”。“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述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监督其所属部局中军事政治及军需之权”。“一切命令及发出之公文，凡未经党代表共同署名者，概不发生效力”。[8]《条例》还规定了党代表在战时，使军队逐步“由私人工具”，“变为党的武力”，更进而成为实现“理想的先锋”。

经过改编，广州国民政府所辖的五花八门、组织涣散、战斗力参差不齐的部队，改组成为一支具有一定实力和一定规模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并建立整治工作制度，以保证这支军队能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而战。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军的成立，十分关注。1925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要求全党要极明显地对民众解释“国民革命军的组织等口号的意义”，[9]并作出了成立军事运动委员会的决定。[10]中共选派自己的优秀党员到各军担任政治工作和某些军事工作，推动部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当时担任各军政治部主任的是：第一军周恩来（后缪斌）、第二军李富春、第三军朱克靖、第四军张善鸣（前为罗汉、后为麦朝枢、廖乾五）、第五军雷剑敖、第六军林伯渠（后李世璋代）、第七军黄日葵（后麦焕章）、第八军彭泽湘（后期）。所有各军政治部主任，几乎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还陆续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军的副党代表。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忘我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各军政治部成立后，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各部队精神生活相当活跃，军队和群众关系有很大改进”。[11]

注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第 207 页。

②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 1。

③同上。

④宁庆编，凌山著：《国民党治军档案》（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年。

⑤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下册。

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 1 篇。

⑦《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见《黄埔军校史料》，第139～142页。

⑧《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见《黄埔军校史料》，第139～142页。

⑨《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决议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8页。

⑩据《中央通告第六十号》，1925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军事部”。

⑪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期。



孙文主义学会

孙文主义学会，是北伐战争之前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组织。当时，曾出现在很多地区，其中以广州孙文主义学会最为猖獗，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①]

孙文主义学会（广州孙文主义学会通称孙文主义学会）最初发起于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以前。当东征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到廖仲恺先生被刺以前，孙文主义学会曾大力进行组织活动。廖案发生后，东征军收缴梁鸿楷的枪械，占领了粤军第一军司令部，孙文主义学会遂以此作为会所，正式开始办公。[②]1925年12月29日，孙文主义学会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成立典礼[③]，正式宣告成立。其首领是王柏龄，主要负责人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有贺衷寒、杨引之、冷欣、杜从戎、潘佑强、伍翔、曾扩情、贾伯涛、胡靖安、余程万、胡宗南、桂永清、蒋伏生等；在黄埔军校教职员中有林振雄、徐桴、王文翰、童锡坤、张叔同等；军政部门有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公安局长吴铁城等[④]。

孙文主义学会的后台老板是蒋介石，他在“孙文主义学会”内部被呼为领袖。孙文主义学会刚发起时，在蒋介石所召集的黄埔第一二期学生的聚餐会上散发了贺衷寒起草的，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名单。孙文主义学会在广州的骨干分子，大都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如他俩的首领王柏龄，和蒋介石就有着把兄弟的关系，王柏龄并自称是蒋介石的忠实的狗[⑤]。

在上海，国民党右派于1925年12月16日召开了“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宣布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正式成立[⑥]。接着在上海各区设立了分会，以至许多工厂、学会单位也成立了分会[⑦]。主要负责人有萧淑宇、陈白、彭震寰、杨剑虹、周修齐、梁栋、何天凤等。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活动范围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

北京于1925年12月12日成立了北京孙文主义学会[⑧]，主要负责人有周德润、沈定一等。此外，武汉、湖南、浙江、南京、芜湖等地大都在1925

年12月~1926年1月间先后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1926年3月间，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京、津、沪、宁、芜湖以及日本等地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联络，曾企图召开“孙文主义学会全国代表大会”[9]。

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为什么要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呢？这需要从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来了解。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于1924年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改组了国民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通过改组后的国民党这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来实现工人阶级与其他民主力量的联盟，以及对付当时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自始就反对国共合作，破坏代表大会的决议”[10]。1925年孙中山因肝病复发不治而亡以后，他们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形成了所谓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一批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新右派，步老右派的后尘，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并组成了“孙文主义学会”；而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就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思想基础[11]。

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经过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团结中间派，对右派展开尖锐的斗争，努力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变成实际[12]。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人民革命很快转入高潮，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13]

群众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国民党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当时广东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惧。孙文主义学会头子王柏龄在回忆中自供说，黄埔军校“开校三四个月，其一泻千里的进步，固足使人惊叹，而党部本身受着这种刺激，也朝气勃勃”，各种革命运动“都一时风起云涌，不可一世……，共产运动也深入各个阶层，他们把持了中央党部一部，紧握新闻舆论机关，从他们的理论到实力，无不如火如荼，……如任此以往，不必一二年，共产党就可以偷天换日的，替代国民党了”[14]。他们将革命形势的发展看作是大难临头，说“在这种大难情形下，如何是好呢?”他们“绞脑筋，悲心志”的结果，“就是以研究孙文主义为目的，来组织一个学会”。认为这个挂“孙文主义”招牌的“学会”，表面上“既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又是研究我们的孙文主义，难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会来加入吗?”这样就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者“画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15]，来进行其反共、反革命的活动了。这就是这一反动组织，为什么要以"孙文主义"作名称的"奥秘"之处。因为从当时整个形势来看，他们暂时还不敢公开背叛"三大政策"，公开挂起反共的招牌，这也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所不同于西山会议派等老右派的地方。但为了把反共分子集结起来，组成反共团体，进行反共阴谋活动，就得先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画一道鸿沟"，正像当时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所公开声明的：孙文主义学会对于"共产派均不得不拒绝其加入"[16]，他们完全是借"孙文主义"之名行反共之实，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由此可见，孙文主义学会是在当时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国民党右派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进攻的产物。[17]

孙文主义学会一开始就在研究"孙文主义"的烟幕下，进行反共反革命的活动。他们的头子王柏龄自供说，孙文主义学会在开始发展组织时期，就是"与共产党暗斗时期"[18]。在广州地区，他们分为文武两方面去迷惑和争夺群众，武的以黄埔军校为目标，文的以中山大学为目标[19]；但主要是放在军队方面。1925 年 10 月以前，孙文主义学会"会员正式登记者且达千余人，大抵皆黄埔军官学校，已毕业的学生在党军中任中下级干部，或在校学生"[20]。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开成立大会时，有着许多反动军人的代表参加，如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第四团、第六团。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二师及其他各军代表，都出席了大会[21]。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也大都是些反动军人。由于他们在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反动活动，使得"第一军军官多半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22]。他们通过"中山舰事件"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排挤出去，使蒋介石篡夺了第一军的军权，成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一步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资本。后来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一军军长时，就任命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王柏龄为副军长，以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负责人缪斌为第一军的党代表。其他的骨干分子如林振雄、刘峙、胡宗南等，以后也都窃据了军事方面的重要职位。

孙文主义学会从发起以后，就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看做他们的死对头，毒恶地攻击进步力量。"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军人的群众性组织[23]，主要负责人大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学生中有蒋先云、周逸群、左权、陈赓

等人；在教员中有金佛庄等人。由于这一革命组织在黄埔军校和滇、桂、湘、粤等各军所设的军官学校中的进步影响日益发展，被国民党右派看成眼中钉，经常遭到他们的蛮横攻击。例如“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潘佑强、杨引之两人，某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内，遇到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同学……即辱骂不休，施以毒打[24]；有一次孙文主义学会的林振雄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李汉藩发生争吵，林竟以手枪向李汉藩射击（幸未打中）”[25]；在东征时，从广州进军到潮、梅的路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沿途对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一系列挑衅；第一次东征时在梅县的集会上和第二次东征前在广东大学的集会上，孙文主义学会的贺衷寒对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李之龙竟无故挑衅格斗。类似暴行，实不胜枚举。

在其他地区也不断地制造反革命暴行。例如“他们在上海双十节即1925年群众大会中，打死了‘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卢永祥’口号的黄仁同志；在黄南捣乱总理奠墓的典礼，并殴伤同志；在常德更发动大规模的残杀”[26]。

孙文主义学会是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得力工具。1926年3月，蒋介石通过孙文主义学会的这批法西斯党徒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实现了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第一步。在这一事变中，除了孙文主义学会头子王柏龄直接参与策划外，其他的骨干分子也都参加了，如欧阳格参加了布置“圈套”和探悉情况的活动，并和陈肇英一起去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缪斌、惠东开奉了蒋介石的命令，集合第二师全体官兵讲话，当场就将第六团团党代表胡公宪以下党代表、政治工作人员，连长左派人员全行看管，拘捕于造币厂内；[27]刘峙派兵“包围东园内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枪支”[28]；潘佑强严密监视了教育长邓演达与训练部主任严重等。王柏龄关于“中山舰事件”曾经这样说：“当中详细，惟鄙人与蒋先生知之，未得蒋先生许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蒋先生对学生训话亦谓如果要知道此回事变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于此可以判断这次事件性质之重大，决不是宣传中山舰者可比。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收效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29]这段话非常清楚地供认了孙文主义学会在蒋介石的指使下，策划这一反革命阴谋的罪行。

从“中山舰事件”以后，右派反动分子又大大抬头了，孙文主义学会这一新右派集团也到处蔓延开来，并和“西山会议派”结合。他们在湖南勾结军阀赵恒惕，对当时革命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进行各种攻击和破坏，在

报纸上刊登污蔑性的启事；常德二师曾发生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左派学生的大械斗，并逮捕省党部特派员等等[30]，真是凶横一时，只是由于当时工农群众运动高涨，国民党革命派大规模发展，他们还无力也不敢进行公开的反革命活动。

全国各地区的孙文主义学会虽然都一致地标榜着所谓“信仰孙文主义、研究孙文主义、宣传孙文主义、实行孙文主义”，实际上是在“实行孙文主义”的烟幕下，图谋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在其机关刊物《国民革命》周刊的发刊词中提出：“我们相信只有孙文主义为基础的国民革命，才是今日中国唯一的救死图存的方法。”[31]

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先生的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正是以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才“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32]。而孙文主义学会公然提出了“以孙文主义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这实际上是公开地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图谋分裂统一战线，同时也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严重挑衅。

孙文主义学会的负责人之一贺衷寒曾假借“辟谣”为题，进行反对三大政策的煽动。他说：“现在外间还是传播着，‘中国国民党赤化了’，‘中国国民党是主张共产的党’，‘中国国民党不主张共产，为什么容纳共产党分子的加入，并与俄亲善。又为什么扶植农工，提倡阶级斗争’。这一类的话真是听得令人发昏。……‘天光自明，水净自清’，……止谤莫如自修’，我看中国国民党要辟谣亦莫如自修。”[33]这种借题发挥的恶毒用意，主要是号召反动分子以实际行动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文主义学会一开始就具有反共、反动的性质。他们宣称“努力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把反共说成是“党的‘组织纪律’以内的事”；他们的后台老板蒋介石也对他们训导说：“不为信徒便为叛逆，不为同志便为寇兽”[34]。他们不仅自始至终反对共产党，连一般比较进步的团体和进步人士，都被他们视为“叛逆”或“寇兽”，如把邓演达等视为攻击的对象，甚至连当时的假左派汪精卫，由于反共的步调和他们反共的步调未合拍，也为他俩所警告。

孙文主义学会为了进行反革命宣传，曾出版了《国民革命》周刊、《革命导报》等刊物，并通过这时期的《青年旬刊》、《革命青年》周刊和戴季陶主办的《独立旬刊》等刊物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甚至在国民党广州特

别党部办的《青年工作》等刊物上也进行反动宣传。以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国民革命》周刊和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革命导报》来说，除在广州、上海出版发行外，在全国各大城市以至边远地区都设有代售处，并远售国外。此外还通过向订户折价、减价、赠送书籍等手段，来拉拢读者。可见他们的反革命宣传活动是喧嚣一时的。

孙文主义学会在反动的政治宣传方面，首先是猖狂地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着重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学说。他们说什么“在今日之中国，没有大资本家和巨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使用不着”。他们以全国“都是大贫小穷”[35]的论调来抹煞阶级的存在和掩盖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以什么“孙文主义的全国民革命”的论调，来抽掉当时“国民革命”的阶级内容，企图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忽视革命统一战线中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妄图麻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放弃阶级斗争的武器，从而实现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目的。

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宣传则更为露骨。他们恶毒地谩骂：“更有一般丧失民族自信力的人，误信了第三国际的宣言，不顾我国的垂危的局势，不顾我国的经济状况高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是不能行这种不合国情的主义的。”这些恶毒的谩骂和叫嚣，反映了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学说的畏惧。

孙文主义学会还狂妄地想在国际上与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他们提出了“以孙文主义为基础，有组成民族国际的必要”。提出所谓“先建设一个孙文主义的国家，再把它扩张起来，以完成世界革命，造成大同之世”等等的谬论，提出建立一个和第三国际相对抗的所谓“新纵横国际”[36]。他们所谓“民族国际”和“世界革命”的主张，是针对当时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影响提出来的，是为了反对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提出来的。这是国际问题上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宣传，也是在国内问题上反革命主张的扩大和延长。

在中山舰事件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为了进一步夺取军队中的领导权，力图拔掉他们在军队方面的眼中钉——“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于是惯于玩弄诈骗权术的蒋介石就借口“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



“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命令两个组织同时解散，决定另组织“黄埔同学会”，把黄埔的学生和教职员的组织统一起来，由蒋介石直接领导。于是，两个对立的组织，同时通电宣布解散了。[37]

孙文主义学会宣布解散，实际上是以退为进的反革命手法。“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孙文主义学会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更加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命令”“孙文主义学会”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时解散，是一举两得的手法，一面可以拔除“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一“眼中钉”；另一方面却实际上保存了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势力。中国青年军联合会解散了，孙文主义学会却通过“黄埔同学会”的组织形式，借尸还魂，名亡实存地继续充当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工具。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一些重要反动人物，如贺衷寒、缪斌、潘佑强、曾扩情、邓悌等等，到后来都成了蒋介石特务组织的骨干分子[38]。

注释：

①郭绪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历史教学》，1964年，7月29日。

②《介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及“国民革命”周刊》，《革命青年》周刊第5期，1925年10月31日。

③《粤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会记》，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月6日。

④郭绪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历史教学》，1964年，7月29日。

⑤王柏龄：《创校回忆》，《黄埔建军史话》，拔提书店，1934年，第151页。

⑥《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7日。

⑦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31日、1926年1月3日及25、27日。

⑧《北京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30日。

⑨王柏龄：《创校回忆》，《黄埔建军史话》，拔提书店，1934年，第151页。

⑩李维汉：《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红旗》第11期，1961年。

⑪郭绪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历史教学》，1964年，7月29日。

⑫李维汉：《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红旗》第11期，1961年。

⑬郭绪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历史教学》，1964年，7月29日。

⑭王柏龄：《创校回忆》，《黄埔建军史话》，拔提书店，1934年，第174页。

⑮王柏龄：《创校回忆》，《黄埔建军史话》，拔提书店，1934年，第175页。

⑯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9日。

⑰郭绪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历史教学》，1964年，7月29日。

⑱王柏龄：《创校回忆》，《黄埔建军史话》，拔提书店，1934年，第176页。

⑲同上。

⑳《介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及"国民革命"周刊》，《革命青年》周刊第5期，1925年10月31日。

㉑《粤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会记》，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月6日。

㉒李之龙：《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㉓《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本会启事'》，《中国军人》第8号，1925年11月20日。

㉔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

㉕覃异之：《黄埔建军》。

㉖李之龙：《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㉗同上，第178页。

㉘同上。

㉙王柏龄：《创校回忆》，《黄埔建军史话》，拔提书店，1934年，第

178、182页。

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5页。

㉛《国民革命》周刊创刊号《发刊词》，1925年9月25日。

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86页

㉝贺衷寒：《革命与辟谣》，《国民革命》周刊创刊号，1925年9月25日。

㉞贺衷寒：《孙文主义学会的使命》，《国民革命》周刊，第2期，1925年10月8日。

㉟缪斌：《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周刊创刊号，1925年9月25日。

㊱缪斌：《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周刊创刊号，1925年9月25日。

㊲《政治周报》第10期，第12页，1926年5月3日。

㊳郭绪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历史教学》，1964年，7月29日。

中共在黄埔军校中的政治工作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在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援助下，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它是一所与旧军校有根本区别的新型革命军事学校。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成绩卓著。这是它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挥重大作用的根本保证。

黄埔军校从创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①]孙中山对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已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因此，在创办军校之初，他就诚恳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建议，仿效苏联的红军建制，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职权是监督行政，指导党务。军校第一任党代表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新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先生。政治部是专司政治、党务、教育、宣传等工作的，它对学生的政治教育起着领导作用。但是起初政治部并没有发挥作用，"最初政治部组织极简单，除了主任及临时教官仅能到校授课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人。"[②]不久，戴季陶离职，由邵元冲继任政治部主任。然而，"邵是一个书呆子，碌碌庸庸，无所作为。"[③]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徒有虚名，平淡得很，因此，学校师生对邵元冲很不满意。1924年11月，应孙中山、廖仲恺的邀请，我党派遣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之后，为了改变军校内思想政治工作无所作为的状况，能使政治部的工作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他参照了苏联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思想政治工作制度。首先，调整和充实政治部的组织机构。在政治部下面分设组织股、宣传股、编辑股，三股各司其职，权责分明。组织股负责掌握师生的政治思想状况，制订各种调查表，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做到针对性强，有的放



矢。宣传股负责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并出版反映士兵学习生活的壁报《士兵之友》，每月按时油印发给学生和士兵，同时还组织宣传队，演出各种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文艺节目。编辑股配合政治教育的任务，出版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书籍，主编该校的革命刊物《黄埔潮》。其次，充实政治部的力量。周恩来从一期毕业学生中抽调一部分德才兼备、品行优秀的共产党员，如蒋先云、王逸常、杨期纲、张际春等到政治部工作，政治部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这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校内的思想政治工作。再次，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和政治工作制度与条例。在政治教育计划方面，政治部先后制定了《政治训练班训练纲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政治教育各科内容提要》、《官长政治教育计划》等等，详细规定了政治训练的内容、目的。在制度与条例方面则先后制定了《政治部服务细则》、《政治问答箱办法》、《本校政治部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讨论会规则》等等，对政治部的职责、任务，工作人员的纪律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1925 年 2 月，周恩来随军东征后，军校政治部主任由邵力子接任，副主任是从法国回来的共产党人鲁易。同年 9 月，中共中央又调派刚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党员熊雄、聂荣臻到黄埔军校工作，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熊雄于翌年初接任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恽代英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也留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担任政治教官还有萧楚女、高语罕、安体诚、于树德、韩麟符、李求实、张秋人、陈启修等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仍由中国共产党人负责，并继续受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领导。

至此，“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了！”④

同时，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了一部分优秀党员参加校务领导工作，并同时组织了一部分党、团员报考黄埔军校参加受训。但是这两者的人数不多，难以开展宣传工作，这样，我党的主张就难以灌输到广泛的人员中去。基于这种情形，我党便通过组建学生团体，作为我党的外围组织，以推行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1924 年底，在中共黄埔支部的领导下，由共产党员学生周逸群、李劳工等同志，采用列宁主编过的《火星报》之名，组织了“火星社”，作为我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这一组织的人员除当时在校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学生外，还包括一部分接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左派学生。这个组织人数虽然不多，但是由于它代表着当时的革命潮流，团结了学生中最进步的骨干分子，因此，它在群众中有着异常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它的主张常常

能够反映广大学生的意见，它的号召自然也经常得到大家一致的拥护，对推动黄埔学生走革命道路起着很大的作用。

与“火星社”在黄埔军校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黄埔军校学生代表共产党员王一飞等常常在广州组织群众运动，与驻广东的粤、湘、滇、桂军讲武堂的进步学生联系，成立青年军人社。该组织是以团结各军青年军人，坚决不做军阀、政客的工具，以反帝反封建革命奋斗到底为宗旨。后来，为了进一步团结教育广大黄埔军校内部和驻广东各部队的青年军人，在周恩来的直接倡导下，1925 年 2 月 1 日，李之龙、蒋先风、王一飞、周逸群等人把“青年军人社”扩大组成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恩来经常注意同该会的联系，经常找该会的负责人蒋先云等研究情况，给他们出谋划策，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发展会员二千多人，活动范围由黄埔军校扩展到在粤的陆军和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⑤]从而，该组织成为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和政治部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重要组织。

除了上述团体之外，还有血花剧社。该社于 1925 年 1 月中旬，由李之龙、蒋先云等人成立。它通过编写和教唱革命歌曲，演出文艺节目等形式，教育和培养军校学员树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开创了黄埔军校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局面。

在组建学生组织的同时，政治部为了加强政治训练，提高政治教育的效果，大量出版日报、期刊、专刊、文集、丛书、讲义、画报等刊物，如《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黄埔日刊》等。这些刊物都是宣传革命主张、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罪恶的主要阵地，同时对消除学生入学前流俗传统的影响，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黄埔军校的教学特点是政治与军事并重，而政治训练的主要方式是上政治课。当时政治课在学生课时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每期总要上 100 多次，都是由政治部计划与安排的。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士。政治课开设课程多达 26 门，主要包括国民革命概论、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军队政治工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等。这些政治课程，主要都是由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讲授，他们授课深受学生欢迎。周恩来主讲国内外形势，他经常给学生



上大课，几乎每次都是讲《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这样的题目，“这是一门百听不厌的大课，学生们人人爱听，难得的是每次都有新的内容，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阵线分明，他的讲演博而能约，条理清楚，易于笔记，也容易背诵。他登台讲演时，带队的官长们，肃立一旁静听，一听到底，并不来来去去地走动。连孙文主义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李安定、蔡劲军之类狂徒对他也是折服的。”[6]恽代英讲授《社会科学概论》，这门课“实际上是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综合科学，是富有哲理的课程。”但他讲课“善于联系实际，善于对比，善于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有时也饶有风趣，令人一听不忘，百听不厌”，所以同学都认为这位老师“不愧为青年运动之师”[7]。于树德讲授合作社这门课程，“越讲越精辟，越听越感兴味”[8]。

同时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政治部注意多种方式方法的灵活运用。第一，举办讲演会。除了正式授课之外，政治部经常举办讲演会，专题讲授。一般每周组织一两次。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等先后都应邀来校作过政治演讲。演讲所涉及的问题很广泛，其中很多是围绕着革命形势与任务这样的专题。第二，举办政治讨论会。学生中成立政治学习小组，每周开小组会一次，专门学习由政治部发下的讨论题。在讨论中，允许百家争鸣，学生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第三，设政治问答箱。为了引起学生对政治的研究与兴趣，使讲义不致偏于注入式，政治部便设立了“政治问答箱”，凡学生关于主义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有疑问时，可投函于问答箱。每星期一开箱，检查各质问函件，由主任、教官分别以书面或口头答复质问者。后来政治部把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等共产党人的解答文稿编成《政治问答集》出版，长达十余万字，对于传播革命学说的基本知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四，政治实习。政治部在实施政治教育当中特别注意实践这一环节，强调把所学的东西用到现实中去。每逢群众活动时，都会组织宣传队参加。例如在省港罢工过程中，政治部特意派出一批政治骨干参加了各种群众集会并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进行政治讲演，开展宣传工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宣传工作能力，养成向民众宣传的习惯；另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政治素质，也调动了广大学生参加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后来，在正课时间里，规定每周到乡间实习一次，“学生也觉得与人民接触之机会，兴致勃勃，比在课堂内听讲更有益处。”[9]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与训练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使军校学生的思想面貌、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知道枪是

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⑩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黄埔军校成为当时无数青年人向往的地方，也为国民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党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诸如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周士第、黄公略、左权、刘志丹、周逸群等都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

注释：

①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期的黄埔军校》，广东人民出版社，第8页。

②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第86页。

③宋希镰：《参加黄埔军校前后》，《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59页。

④王逸常：《周恩来与军校政治部》，《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81页。

⑤王逸常：《周恩来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第343页。

⑥文强：《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第331页。

⑦文强：《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第332页。

⑧同上，第333页。

⑨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第89~90页。

⑩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第86页。



黄埔同学会

当1924年8月广州商团叛乱事件发生后，为了战胜商团军，廖仲恺和蒋介石根据孙中山的指令，命令黄埔军校学生与各军发生关系，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入者有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堂、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学堂、桂军学校、大元帅府卫士队、飞机掩护队、航空学校、铁甲车队以及永丰、午夙、飞鹰、福安四舰。他们是以团体为单位参加的，即每个团体派代表2人参加。会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军人联合起来"，"拥护革命政府"，"拥护中国国民党"，"解散商团"，"打倒帝国主义"等。

孙中山北上之后，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青年军人联合会必须加以改组。1925年1月25日，青年军人代表推举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何畏能4人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会。30日，筹备会召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2月1日，在广东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3 000余人。同日，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由临时执行委员会起草总章。2月8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总章，选举正式执行委员会，"从此全国的革命军人乃有所依归"。①

由于共产党员的积极作用，这个组织发展很快，其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黄埔军校内，也不仅仅局限于陆军，而是扩展到了全国各地的诸多兵种。在湘军讲武堂、滇军干部教导团、粤军宪兵营、鄂军讲武堂和部分海军都建立了支部。从青年军人联合会建立到1925年4月，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就发展到两千多人，成立后18个月，增加到两万多人。他们在各项革命活动中表现十分突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蒋介石开始为形势所迫，同意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但是随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飞速发展，蒋介石却对"共产党的势力必将越来越大"而"慢慢感到惴惴不安了"②。为了实现自己反革命、反共的野心，蒋介石决定采取措施，来阻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当时的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理论家戴

季陶组织了一个反对三大政策的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这个组织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干着反对孙中山的勾当[③]。蒋介石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明着假惺惺地说戴季陶是“以尊总理适以侮总理”，是“总理的不孝之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而在背里却不断唆使黄埔军校的何应钦、曾扩情、贺衷寒、王柏龄、缪斌等人在黄埔军校也成立一个孙文主义学会。在他的指使下国民党右派分子于1925年初在广州筹备孙文主义学会，4月24日宣布正式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是为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而成立的，其主要头目有：贺衷寒、缪斌、杨引之、冷欣、杨从戎、潘佑强、伍翔、曾扩情、夏伯涛、胡靖安、余程万、胡宗南、桂永清、蒋伏生等。教职员中有王柏龄、林振雄、徐桴、王文瀚、童息坤、张叔同等，以及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公安局长吴铁城等。为了进行反革命宣传，孙文主义学会出版了《国民革命》周刊、《革命导报》等刊物，并通过《青年旬报》、《革命青年》等刊物以及戴季陶主义的《独立旬报》等刊物进行革命宣传。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即千方百计向青年军人联合会寻衅闹事，制造争端。他们监视共产党员的行动，盗窃共产党员的文件，放出种种污蔑中伤共产党员的滥言，甚至挑起冲突，恶意谩骂，殴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当时正值第一次东征，周恩来随军出发，黄埔军校政治部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挂名代理政治部主任。但是卜士奇很忙很少到政治部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以至后来酿成武斗、枪斗惨剧。[④]廖仲恺“认为必须有一得力的政治部主任常在黄埔”，于是电告蒋介石，希望“周恩来同回黄埔”，蒋介石以“前方工作需要”[⑤]阻挠周恩来返回黄埔。

这时，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貌似公允，站在两会之上，仿佛对两个组织一视同仁，无所偏袒。实际上，他多方暗中支持孙文主义学会，并竭力加强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控制。1926年2月2日，蒋介石装作协调两会关系的样子，召集两会负责人开会，议定两会干部互相加入等四条办法：“（一）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方面干部互相加入；（二）两会在本党军校乃党军，须受本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挥；（三）团长以下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四）两会会员对此有不谅解，得请本校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⑥]实质上是蒋介石利用孙文主义学会加强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监视，并把联合会直接摆在他的控制之下。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两会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越来越庇护右派，打击左派。不久他操纵孙文主义学会，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其后，又以两会“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破



坏整个同学的团结"[7]为借口，于4月7日发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在这种形势下，青年军人联合会于4月15日被迫通电自行解散。孙文主义学会也在4月21日通电取消。

但是，蒋介石要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是真，而取消孙文主义学会是假。因此，当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宣布解散之后，蒋介石估计到共产党学生决不会因"青军会"的解散而中止其暗中的组织活动。蒋介石认为只有建立一个自己直接控制下的统一组织，才能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因此，乃决定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同学会）。

1926年5月24日，蒋介石派贾伯涛、李正韬、曾扩情、伍翔、余程万、杨麟、梁广烈、钟焕祥、蒋先云为筹备委员，后又增加了葛武棨、李超、胡静盦、关巩为筹备委员，拟定黄埔同学会简章。6月19日开第三次会议，在省各部队同学代表均出列席，决议决定于6月27日开同学恳亲大会，先期互相联络而产生同学会，并议定是日开会，一切筹备事宜，及推定各同学分配担任负责办理各事项。6月27日，在广东大学礼堂开恳亲大会，"同学到者有七百余人。潮汕代表胡秉铎等九人亦到会。下午一点开会，校长主持。一时本校从前开校之老师、教官等及军政学界要人，均热烈赴会庆祝，约计千余人。"蒋介石发表了演说："今日之恳亲会，乃因本校同学尚未能尽恳亲之事实所发生。今日开此极大之恳亲会，甚愿同学自今日起，凛然于本校精神已渐形涣散，长此不改，革命势力将有瓦解之虞，而总理、廖党代表及已死同学之历史，皆将为吾辈所消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可也；以后种种，不可不由今日生。过去之未能恳亲者，自此而恳亲之；过去之秘密团体自此归于公共唯一之组织。从今以后消除一切成见，改正过去错误。唯以今日恳亲会所产生之同学会为本校同学唯一之团体，期成为本党革命之中坚，誓不另立团体秘密进行，解除永远之纠纷，免蹈以往之覆辙。凡吾同学，如在本校本军范围之内，不得本会许可，而有私立团体，希图分裂者，当引为吾同学全体之公敌也。"会上宣布黄埔同学会正式成立。

蒋介石指定同学会各职员：一、暂不设主任，以曾扩情为秘书。二、总务科长李正韬，科员游步瀛、李超、金亦吾。三、组织科长杨引之，科员刘仇西、陈超、黄仲翔、张炎、杨新民、张兆尼。四、宣传科长余洒度，科员葛武棨、关巩。五、监察委员刘汉珍、伍翔、蒋友谅、杨其纲、蒋先云、贾伯涛、余程万、胡静安、曹勖、魏亮生、李联珍、黄格君。六、潮汕分会组织员吴斌、刘汉珍、牟庭芳、高明、陈泰运、彭熙、李劲夫、王吉树、胡秉

铎，以胡秉铎任秘书。七、决定军校军官一二团各营选出代表一人。八、派贾伯涛组织入伍生部分会。九、林桓为组织科员，郑峻生、周复二人为宣传科员。应该指出：曾扩情、杨引之、余洒度、李默庵、胡静安分别被蒋介石任命为秘书、组织科长、宣传科长、监察干事。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器重，有的公开坚决反共，如杨引之；有的向蒋介石声明脱离共产党，效忠国民党，如曾扩情、李默庵。而在会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蒋先云、杨其纲、胡秉铎、余洒度、刘仇西等实际上是挂名而已，没有掌握同学会的实权。

黄埔同学会的权力极大，凡属黄埔军校学生，均为当然会员，由同学会负登记考核之责。凡毕业同学的任免升迁调补等等，均须根据同学会的登记考核来决定。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之下。黄埔同学会规定，凡是会员必须效忠于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得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活动，尤其不准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如有违反，应受严厉的处分，或以叛逆论处。这表明同学会不仅对所用同学有任用罢免之权，而且操有生杀予夺之权。

黄埔同学会是一个跨校组织，既包括黄埔军校在校生，也包括毕业学员，甚至还包括非黄埔军校毕业生。这样，不仅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中有黄埔同学会的组织，即所谓的杂牌军队中，只要有黄埔同学渗入，亦无不有同样的组织活动，并进而掌握军队中的党权。蒋介石自成立黄埔同学会后，即在中央党部成立一个“军人部”，自任部长，以同学会秘书兼军人部秘书，其主要职员如组织、宣传、总务各科科长，亦无不由黄埔同学充任。凡军队中的党部组织和党代表的委派，都要通过军人部的提请，才能作出决定。如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党代表林祖涵、第八军党代表刘文岛、第九军党代表吕超，第十四军的党代表熊式辉等，都是军人部所提请委派的。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让反共更加坚决的第一期学生酆悌接任黄埔同学会秘书。“为清除黄埔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和与共产党有关的同学，特在同学会内设“纪律股”，以嗜杀成性的第三期同学刘伯龙任股长，以流氓成性的第一期同学王慧生、第五期同学柏良等任股员。他们有对共产党同学以及与共产党有关联的同学等执行逮捕、审讯、监禁和处以死刑之权。有许多革命的黄埔师生被该组织诬告和迫害。蒋介石在 1927 年 8 月被迫下野时，把所有军队和军事机构的指挥权都交给了何应钦，唯独把同学会交给了住在上海的朱绍良，派曾扩情任秘书，令他迁往杭州办公，以便就近控制。蒋介石要同学会团结在职同学，保持和发展力量，以便他复职时驱



使。同时，收容了失业的军校学生1 000余人，编成一个总队，派贺衷寒为总队长，在杭州集中起来训练，俟日后为其效劳。该会于1930年11月撤销，改为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科。

蒋介石通过黄埔同学会加强了对黄埔军校的控制，并将手伸进国民革命各个军队中。成立黄埔同学会是蒋介石为篡夺军权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孙文主义学会虽在名义上被取消了，但黄埔同学会却是孙文主义同学会的翻版。黄埔同学会在实质上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动统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注释：

①《中国军人》第9期。

②王建吾，朱继明，杨战荣：《黄埔军校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88页。

③同上。

④王建吾，朱继明，杨战荣：《黄埔军校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89～90页。

⑤同上，第90页。

⑥《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联席会议议决》，《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6页。

⑦《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924年9月，周恩来按党的指示，从法国巴黎回国。当时，国民党已改组，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因此党中央派周恩来到达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周恩来先后在党内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同时，周恩来同志进行军事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教官、主任。两次东征期间，周恩来担任了黄埔军校前方政治部主任以及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第一师党代表，参与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建设和领导工作。在两次东征中，他与被苏联顾问誉为“强大的近卫军”的黄埔军校教导团一起，直接参加了淡水、棉湖、惠州、河婆等主要战役，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又以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身份，兼管各地方的行政事务。周恩来经过血与火的斗争，深刻认识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奠定了要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基础。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军队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①]因此，中国共产党当时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工农运动和党务等方面，而忽视了军事工作。再加上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严重的右倾思想，提出“共产党人搞军队，就会变成军阀”[②]的错误论调，反对共产党直接掌握军队，反对共产党直接掌握兵权。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③]周恩来同志正确地认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因而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员能直接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并热衷于组建由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

周恩来在参加黄埔军校工作和两次东征的实践中，更加感到组建由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必要性。周恩来经过努力，征得孙中山先生的同意后，着手组建了一支由我党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以下简称铁甲车队）队成立于1924年11月。是由周恩来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骨干组成的。当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即将毕业，周恩来便从黄埔军校抽调了徐成章、赵自选和周士第，从别处抽调了廖乾五和曹汝谦，负责具体组织工作。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充当队员。在铁甲车队的成员中，还有少数来自大元帅的卫士。

铁甲车队全队编制 136 人，加上广东区委临时派来受训人员，全队人数经常保持在 150 人左右。铁甲车队队部设队长、党代表、副队长、政治教官、军事教官等，下设 3 个排，每排有 3 个班。其主要干部，如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政治教官曹汝谦、军事教官赵自选等都是共产党员。铁甲车队还建立了直属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党小组，最初有 5 名党员，廖乾五为党小组长。党小组生活会每周一次，除了讨论工作外，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铁甲车队的一切事情，如干部调动和配备等，都向区委请示。铁甲车队配有几辆铁甲车和其他车辆，驰骋在广东各条铁路战线上。铁甲车队十分重视政治军事训练，生活上实行官兵平等，队长、党代表同战士的伙食标准完全一样。这支军队坚决维护工农利益，坚定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们曾大力支援广宁、深圳等地农民运动，参加了东征和讨伐杨刘叛乱的斗争，进行了省港罢工期间封锁香港的斗争。铁甲车队名义上是属于大元帅府的管辖，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在支援工农运动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从东征胜利返回广州的途中，蒋介石要周恩来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蒋介石有排共分裂的企图。于是他回到广州就与陈延年、鲍罗廷等商量决定为中国共产党寻找新的发展道路，计划给蒋介石以打击，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周恩来认为，处于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不能完全抛开国民党，而应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取得国民党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革命军队。于是，他与国民党、国民政府负责人汪精卫商议，并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1925 年 11 月，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成立。

独立团下辖 3 个营和一个直属部队，共约 2 100 人。团中建立了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军委领导的党支部，下设 6 个党小组，共有党员 20 余人。该团团长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叶挺，副团长是罗隆，参谋长是吴济民，后为周士第，军需主任是叶荃，下辖 3 个营和一个直属部队。第一营营长是周士第，后为曹渊，第二营营长是贺声洋，后为许继慎，第三营营长是杨宁，后为张伯黄；直属队包括机关枪连、监视连、担架队、侦探队。独立团的绝大部分

干部，如叶挺、周士第、董朗、曹渊、许济慎、杨宁等都是共产党员，团部直属队和各营建立了党小组。党支部书记由吴巨严担任，成员有叶挺、周士第、董朗。党支部初期有20名党员。党支部不属第四军政治部管辖，而由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支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凡属重大问题都需开会讨论研究再报中共广东区委批准。“独立团是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连以上的干部，直接由广东区委委派，部队组织起来后，团长叶挺、书记吴季严、一营营长周士第（后任参谋长）和参谋董仲明经常到广东区委（在广州文明路75-81号）汇报请示工作。”④当时直接领导独立团的是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周恩来不在时，就直接找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后来北伐到达武汉，就直接向军委聂荣臻同志汇报请示工作。这种组织关系，使独立团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之下，独立团党支部通过党、团员的模范和骨干作用，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成为全团的领导核心。

叶挺独立团成立之后，周恩来就指示要把部队“迅速培养成一支最可靠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⑤，独立团官兵在团长叶挺的率领下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实行“四操三讲”（“四操”：早晨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体操；“三讲”：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点名训话），苦练军事技术，使部队养成铁的纪律，练出铁的作风，形成铁的战斗力。周恩来还强调“对独立团政治建军”⑥。他针对独立团初建时仍旧存在着旧军队的思想作风，指示独立团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打骂士兵、反报假姓名假籍贯的“三反”运动，并拟出教育提纲向全体官兵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教育，区分了革命军与旧军队的本质特点，使官兵们认识到独立团是革命的军队，大大提高了官兵的政治思想觉悟。在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全团官兵都过着紧张的生活，军事政治训练都得到很好的成绩。”⑦独立团的军事政治训练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支新型的革命军迅速成长起来，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在北伐战争前，毛泽东、周恩来曾主张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中都建立一支如同独立团那样的由共产党员作骨干的部队，以为各军的核心力量。由于陈独秀反对，这个主张未能得到实现。⑧所以以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前身的独立团就成为唯一一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正规军队。⑨

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勇当先锋，一路浴血奋战，所向披靡，打出

了军威，为其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誉，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叶挺独立团之所以能在建立仅半年的时间，在北伐战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除了叶挺指挥得当外，周恩来所倡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也是叶挺独立团制胜的法宝，是铁军的军风形成的基础。

叶挺独立团出师北伐途经广州时，周恩来在广州叶家祠召开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作了六点指示：一、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二、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三、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团结友军；四、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五、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六、现在有的军不愿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最后以“饮马长江”，“武汉见面”[10]勉励即将远征的将士。

在北伐中，独立团官兵发挥先锋带头作用，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屡战屡胜。安仁、攸县之役，以少胜多，仅一团之师击溃六倍于己的敌军，首先被湘南人民称誉为“铁军”。继而攻醴陵、破平江、夺汀泗、占贺胜、克武昌，杀出铁军军威，大显铁军军风。尤其是在围攻武昌之役中，独立团官兵表现出的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更为悲壮感人。当时武昌民众曾留传着“古有抬棺出阵的故事，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的佳话，为一时之盛事。在第二次攻城战斗中，当攻城总指挥部要求各团挑选敢死队作为攻城先锋时，第一营营长曹渊主动请缨，愿以全营为敢死队，“只知为主义而死，为民众利益而死，用不着挑选”，官兵们纷纷写下遗书，留下遗物，准备为革命捐躯。“虽受敌猛烈扫射，但各官兵奋不顾身，均争先登城。待敌之机枪，手榴弹及迫击炮等一齐并发，登城官兵完全击毙。各官兵再接再厉，仍多死于敌人手榴弹、机关枪之下”[11]，包括一营营长曹渊在内，全营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幸存者仅只几人。但是，叶挺独立团最早登上武昌城楼，又最先攻占制高点蛇山。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战斗力最强，牺牲最巨，建功最大”[12]，“叶团每战皆列前锋，其作战之勇，军纪之佳，牺牲之巨，为各军之冠。”[13]战后，武汉人民在武昌洪山修筑了独立团武昌攻城阵亡烈士墓，墓志铭上镌刻着“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的竖行大字。叶挺独立团为国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 年 5 月在北伐军第二次北伐之际，蒋介石在武汉方面的将领中加紧了策反阴谋活动，驻宜昌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暗中积极策应。夏曾参加了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 4 月在汉口召开的秘密反共会议，接着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共谋发动叛变。5 月 5 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川防总司

令杨森率部从四川万县东下，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5月7日，夏斗寅假称战败，将宜昌拱手让杨。并谎称为对付周围反革命势力而缩短防线，于14日率全师由沙市顺流而下。15日到达嘉鱼，夏部枪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剑若等人，并公开发表反共宣言，一直进犯到距武昌仅50里的纸坊镇。杨森部队也于5月21日开抵嘉鱼，当时武汉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此危急的局势之下，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李立三等建议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卫戍武昌的叶挺第二十四师为主力，并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编为中央独立师（师长侯连瀛，党代表恽代英）、第十一军教导营也交由叶挺指挥，坚决平息叛乱。

18日，叶挺率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及第十一军教导营向纸坊进发。当晚8时，许继慎率领的第七十二团与夏斗寅叛军先头部队遭遇，仅一击，夏部即退往纸坊以南土地堂附近。

19日拂晓，夏斗寅部分两路反扑纸坊，叶挺部队也分两路迎击。夏斗寅5个团中有2个团系新兵，两个团只有六成枪支，许多士兵不愿为夏逆叛乱卖命，士气低落，不堪一击。至上午8时许，叶部就突破夏军阵地，沿土地堂追击前进。下午2时，叶部进击山坡，夏军溃退贺胜桥。20日，叶部占领贺胜桥后直逼咸宁。21日，咸宁当地约2 000农民自卫军截击夏军，切断其与杨军会合的退路，俘敌1 000余名，伤敌600余名，缴械900余件[34]。夏军残部窜逃鄂东。6月下旬，叶挺又奉命率军前往鄂东追剿，迫使夏斗寅于6月底率其残部逃至安徽境内。当夏部再撤到江西时，被蒋介石收编为新编第十军。叶挺所指挥的部队，除第四军新兵调回武昌训练外，其余部队开到蒲圻、嘉鱼一带。独立团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注释：

①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9页。

②《在大革命的峥嵘岁月里》，《南方日报》，1977年1月8日。

③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

④《叶挺独立团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⑤周士第：《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⑥《叶挺独立团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页。

⑦周士第：《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⑧周士第：《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⑨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

⑩《周恩来传》，第136页。

⑪《叶挺独立团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0页。

⑫邓演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的回忆》，《广东文史》第22辑，第165页。

⑬《热血铸成钢铁军——记西江地区最早建立的党领导的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

⑭《平息夏斗寅叛乱》，《武汉市志（1840～1985）·军事志》

黄埔军校政治部成为党的工作堡垒

黄埔军校开办后，根据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帮助孙中山在军校中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崭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可以说，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完全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威信最高”。[①]

黄埔军校政治部于1924年5月25日成立。政治部是黄埔军校负责政治教育的唯一机关，对内“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②]由于黄埔军校最初两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和邵元冲到职时间短，没有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也没有建立必要的政治工作制度，再加上政治部机构简单，人员很少，政治部成了徒有虚名的空架子。军校总理孙中山和党代表廖仲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派遣得力干部担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周恩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到职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将政治部从广州市迁进军校，同时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并建立起正常的工作秩序，部内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为加强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分别担任各股主任。他建立和健全了中共党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它隶属于广东区委军事部领导，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任务是“一面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一面培养和吸收共产党员，团结革命师生，指导党员参加革命斗争，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巩固革命统一战线。”[③]因此它积极发展党团员，使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影响不断扩大。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学，中共党员人数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身边形成一批左派师生。

针对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中大搞曾国藩、左宗棠治兵的老一套，周恩来重新订立了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④]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并先后请来了恽代英、萧



楚女、张秋人、熊雄等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军校政治教员；请来鲁易、聂荣臻等中国共产党员任政治部秘书教官。一时间在军校形成了研读政治书刊、注意社会潮流的极其活跃的局面。[⑤]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部除向学生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外，还编写了大量生动、通俗的辅导教材，经常举行政治讨论会。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情没有不水到渠成的。"[⑥]从此，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回忆说："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⑦]周恩来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爱戴和敬重。

1924 年底，为进一步推行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以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秘密革命组织"火星社"成立，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25 年 2 月，在周恩来同志的发动下，以中国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正式成立，其主要成员有蒋先云、周逸群等。"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宣言，正确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势，号召"军人自救，即所以救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⑧]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统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用，这个组织发展很快，在各项革命活动中表现突出，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青年军人联合会"鲜明的立场和革命的活动，使一小撮右派分子感到异常恐惧。1925 年 4 月，黄埔军校中的右派学生纠合起来，正式成立了以贺衷寒、缪斌等人为首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他们发行刊物，散发传单，肆意攻击和诽谤"青年军人联合会"。周恩来支持"青年军人联合会"，针锋相对地反击"孙文主义学会"的进攻，从而打击了它的嚣张气焰。此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校外的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会员很快便遍布全国各地，达两万余人。而在此过程中，革命力量占据了上风，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25 年 1 月下旬，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刚组建起来的黄埔军校学生军投入到东江战役前线，以彻底消灭陈炯明的反叛势力。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进行，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蒋介石、加伦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这样，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

挂名代理。但是由于其工作繁忙，很少到军校来，军校内的政治思想工作便停顿下来。而此时由于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挑衅，使得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对立情绪日益严重，出现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潘佑强、杨引之两人，某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内，遇到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同学……即辱骂不休，施以毒打[9]”打架事件；甚至出现了“有一次孙文主义学会的林振雄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李汉藩发生争吵，林竞以手枪向李汉藩射击（幸未打中）”[10]的枪击事件。面对着事态的逐渐升温，中共广东区委应廖仲恺之请，派包惠僧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包惠僧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其于1921年7月曾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在其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前，曾兼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是中共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包惠僧在工作中小心谨慎，四平八稳。其到任后，首先极力与教育长钱大钧搞好关系，想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在军校内闹事。对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还是照旧[11]。包惠僧任政治部主任时，政治课程安排得很满，每天2～4次，每次两小时，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限制的很紧，使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之外，其余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12]。在包惠僧任政治部主任时期，军校既没有任何新的变化，也没有大的乱子弄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孙文主义学会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安无事，但是双方的意见越来越大，仇恨也越积越多。

随着二次东征的胜利进行，前线的政治人员的需要量大大增加，经周恩来和蒋介石商议后，调包惠僧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从此，包惠僧离开了黄埔军校。

包惠僧在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之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就由当时的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代理。邵力子，原名夙寿，子仲辉。前清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并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南社。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并担任主笔10余年，同时还兼编《觉悟》副刊。“五四”运动后，他参与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1921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也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国共合作后，其于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但是邵力子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每天只是上午到军校转转，除了一些政治演讲外，其余的工作都由当时的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处理、完成。邵力子在军校没有呆多长时间，在北伐战争兴起之后，便离开了军校。而中国共产党人熊雄就此担任黄埔军校第七任政治部



主任。

熊雄原名祖福，早年曾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东逃日本并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后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于1919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13]。1922年3月，熊雄又离法赴德国留学，并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又与周恩来、刘清扬、萧三等人发起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正式更名为共青团）。

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国。在广东革命政府举师第二次东征讨伐叛徒陈炯明时，熊雄担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东征胜利后，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1926年1月6日，共产党人熊雄接替邵力子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第七任主任。他根据军校师生不断增加、人员思想比较复杂的现实情况，与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一道，进一步充实政治部的机构，增设了政治指导员，并制定《政治指导员条例》，规定政治指导员的职责是协助政治部调查了解政治教育的影响和效果，及时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此外，熊雄还主持制订了内容详尽的《政治教育大纲》、《政治讨论会规则》、《政治宣传队条例》、《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部服务细则》等，使政治工作制度更臻于完善。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方鼎英这样称赞熊雄：“他忠于革命，始终如一。他认为国民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经之路，必须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执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由尔及远，登高自卑，是他言行的一贯信条。他态度诚恳、感人最深，诚我黄埔全校师生的良师益友。……其有功于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有劳于黄埔军校的稳步前进，事实如此，有口皆碑。”[14]在熊雄领导下，政治部规模日益扩大。“本校改组后，本部组织亦随本校改组，略有变更。主任副主任及秘书之下分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全部职员按编制已达七十余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十余人，临时政治教官亦有十余人。”[15]政治教官几乎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聂荣臻从1925年9月即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熊雄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党务工作，恽代英1926年5月到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并讲授“政治学概论”等课程，“恽代英同志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威信，与周恩来同志可以媲美，大家都亲热地称他恽老师。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读到过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有慈母一般的心肠，严师一般的智慧，在他身

上永远都存在磁石吸铁的力量。”[16]此外，在军校担任政治教官的还有萧楚女、高语罕、于树德、韩麟符、李求实、张秋人等共产党员，他们也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敬重。

在黄埔军校7位政治部主任中，周恩来、熊雄两位主任给广大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巨大的感召力、影响力。正是在他们的循循教诲和孜孜帮助下，一大批青年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政治部的组织机构，以后就保存在了国共两党军队中。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曾设立过“政训处”，而在中共军队里政治部却成为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总之，共产党人以军校政治部为堡垒，全面推行工作，为国民革命的顺利进行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注释：

①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5～116页。

②《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③《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④马广志：《黄埔军校的七位政治部主任》，《文史春秋》第4期，2005年，第54页。

⑤同上。

⑥《政治部服务细则》，《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⑦王逸常：《周恩来与军校政治部》，《黄埔军校史料》，第181页。

⑧《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1页。

⑨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

⑩覃异之：《黄埔建军》。

⑪马广志：《黄埔军校的七位政治部主任》，《文史春秋》第4期，2005年，第54页。



⑫同上。

⑬马广志：《黄埔军校的七位政治部主任》，《文史春秋》第4期，2005年，第55页。

⑭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28页。

⑮方鼎英：《我在军校的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出版社，1984年，第87页。

⑯熊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黄埔军校史料》，第180页。

第一次东征

商团被歼后，帝国主义并不死心，把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希望寄托在陈炯明身上，唆使陈炯明进攻广州。

陈炯明的军队在1922年秋天败退东江一带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支持之下，依靠潮州、汕头的财源和惠州的天险，对抗广东革命政权，成为广东革命政权的直接主要危险。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之后，陈炯明认为反扑的时机到了，蠢蠢欲动。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陈炯明迫不及待地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妄图一举攻克广州，推翻革命政权。[①]

这时，广州大元帅大本营所辖的滇、桂、湘、粤各军中，多数将领对东征讨伐陈炯明持消极、怀疑态度。刚成立不久的军事委员会，也迟疑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高等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力排众议，主张东征。他认为，尽管北伐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但只有在后方十分稳固和邻省的形势有利于北伐的情况下，北伐才能奏效。但这些条件现在一个也不具备，因此，在消灭陈炯明和完全控制广州之前，北伐的问题应暂时搁置。苏联驻华武官戈克尔在当时写的一份报道中写道：“我们的军事顾问加伦同志向广州的统帅部做了一个半月的说服工作，终于使他们明白了必须立即讨伐陈炯明，决定在1月底以前开始行动。”

1925年1月15日，广州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决定讨伐陈炯明，将所辖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谭延闿的建国湘军以及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和两个教导团组成东征联军，以杨锡闵为联军总司令。

1月下旬，陈炯明叛军向广州步步进逼，形势日益严重。这时，陈军共有6万多人，编有7个军：林虎任第一军军长，约15 000多人，驻兴宁、平远一带；刘志陆任第二军军长，约8 000人，驻五华、龙川和揭西一带；尹骥任第三军军长，约13 000人，驻丰顺、大浦和饶平一带；李易标任第四军军长，约6 000人，驻兴宁、梅县一带，熊略任第五军军长，约15 000



人，驻惠阳等地；杨坤如任第六军军长，约8 000 人，驻惠州市；黄大伟任第七军军长，约2 000人。他们从各自的驻地出发，预定在博罗地区、石龙东南地区、石龙至石滩一带集结，然后分途进攻广州。1月下旬，陈炯明叛军各部推进到虎门、石滩一线，广州局势相当危急。

1月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讨陈的部署问题。会议采纳了加仑的建议，决定先发制人，分兵三路直捣东江：杨希闵率领滇军为左路，约30 000 人，从北面东进，进攻增城、博罗、河源、龙川一带；许崇智帅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任右路，约10 000 多人，从南面沿海东进，经广九路向淡水、平山、海丰、陆丰和潮汕进发；刘震寰帅桂军任中路，约6 000 人，围攻惠州城，并策应两翼。

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在东征军中，担任左、中两路的滇军和桂军，是对广东革命政权心怀异志的部队，他们的首领杨希闵、刘震寰本是地方军阀，又自恃拥孙有功，横行广东，无法无天。杨、刘起初都不赞成东征，而主张移兵西线。其真正意图是窥测方向，趁乱夺取广州。因此，他们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虽然被迫同意东征，但是都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担任左路的滇军进至博罗便按兵不动，担任中路的桂军在占领东鹅岭之后也不再前进。

担任右路的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是广东革命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在第一次东征中起主要作用。

粤军由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先后出师东征的有张民达的第二师，许济的第七旅（后改称第四师），陈铭枢的第一旅，欧阳驹的警卫旅等。

黄埔军校教导团由黄埔军校教职员和第一期毕业生担任各级干部，周恩来、茅延桢、金佛庄、严凤仪、曹石泉、曹渊、胡公冕、蒋先云、陈赓、许继慎、刘畴西、唐同德、孙一中、郭俊、彭干臣、卢德铭、周逸群、黄锦辉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了骨干作用。这支部队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模仿苏联红军编制实行党代表制，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很强。加入第一次东征的右路军还有：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步兵总队（总队长胡树森）、第二期学生炮兵营（营长蔡忠笏，陈诚代理）、第二期学生兵工队（队长李卓元）、第二期学生辎重队（队长黄在玑）、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营长陈继承）。黄埔军校学生军在第一次东征的战斗中，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

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学生队出发东征前，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他们作了战前动员，指出东征是为了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而战，号召参展的全体人员英勇杀敌。军校政治部还规定了不扰民、不拉夫、买卖公平、不强占民房等纪律。他们在行军途中高唱国民革命歌、行军歌、杀贼歌等革命歌曲，以鼓舞士气。军校政治部还经常组织宣传队走在队伍前边，每到一地便立即召开军民联欢会，开展宣传活动。“东征开始前，黄埔军校就建立了由学校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宣传部。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准备了50万份致士兵的传单，10万份致农民的传单，5万份革命歌曲。所有这些材料都在东征时期散发了”。[②]这些措施对于争取群众的支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2月4日，右路军攻克东莞，占领石龙。这时，孙中山虽已北上，身患重病，但仍“引颈南望”，十分惦记东征战事。他打电报给胡汉民等人说：“大病少苏，闻东江将战，复添系念。望诸兄努力破敌，以安内而立威信于外。”[③]

东征的右路军占领东莞、石龙后，立即向人民群众开展政治宣传工作。2月6日，东莞商务分会召开欢迎革命军大会，蒋介石、周恩来等应邀出席。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时指出：革命军“此次系为救国救民而来”[④]在欢迎会上他还特别说明了革命军队党代表和政治部的职责，并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介绍给与会者。周恩来在演讲中强调指出，军队必须与人民合作，为人民所用。他说：这次军校东征，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无人民的援助，仍不足负担重大的责任。[⑤]

右路军在占领石龙以后，即以铁甲车队为先导，向南挺进，进攻平湖、深圳等处的敌人。2月7日，右路军占领常平，10日占领平湖，11日占领深圳，陈炯明叛军纷纷向淡水败退。14日，右路军迫近淡水。

淡水是惠阳境内的一座小城，距惠州市70里。此城虽小，但工事坚固，陈军熊略等部约4 000人据城固守，洪兆麟的部队已从惠州赶来救援，他们企图利用淡水城阻挡东征军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右路军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速战速决的方针。右路军以黄埔教导团为攻城主力，进攻淡水城东南面；粤军第二师攻城至西北，并拦截从北面增援之敌；粤军独立第七旅攻城之东北。他们互相策应，围攻淡水城。14日晚，黄埔军校教导团组织敢死队（当时称为奋勇队），担负强行登城的任务。敢死队由蔡光举、李安定、刘畴西、彭干臣、张际春、游步仁、张隐韬、赵桐、李汉藩、李奇中10名



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他们当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

15日清晨，在大炮和机枪的掩护下，敢死队前赴后继，攀登入城。上午8时，教导团攻进城内，“毙敌旅长一名，俘虏千余名，缴枪二千支，夺获军用品无算”，[6]取得了东征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

当天下午，洪兆麟增援部队赶到淡水。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没有戒备，当敌军反扑过来时惊慌失措，队伍散乱。教导第一团和粤军第一师、第七旅奋起迎击，将来援之敌打得狼狈逃窜。淡水之战振奋了革命士气，树立了黄埔军校的威望，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奠定基础。

攻克淡水后，右路军乘胜前进。2月17日击溃了洪兆麟的主力，占领平山。不久，右路军在海丰人民的支持下，长驱直入，于2月27日攻下海丰，3月初进攻潮州、汕头。至此，右路军控制了整个潮汕地区。当孙中山得知右路军胜利进军的捷报时，兴奋异常，于3月3日致电杨希闵说：“卧病兼旬，得捷音胜于良药。右翼深入，击破洪、叶；左并进，乘胜击林。”[7]

这时，陈炯明仍不甘心失败，令林虎帅其主力于3月上旬从兴宁、梅县等地南下，企图一举消灭黄埔军校教导团。而担任左、中两路的滇、桂军却故意按兵不动，企图让右路军孤军深入而被陈炯明消灭。当洪兆麟部将要溃败时，于林虎等早有勾结的滇军故意从河源、老隆撤兵，以便林虎部南下袭击黄埔军校教导团。于是，林虎部趁机由河源、老隆进攻河婆，企图一举将右路军歼灭于揭阳、潮汕之间。3月13日，双方在揭西棉湖地区展开激战，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只有12个连。但抗击了10倍以上的敌人，战斗十分激烈。当天下午，教导二团和粤军第七旅、海陆丰农民自卫军赶来增援，终于使原来处境十分险恶的教导一团转危为安，击败敌军。

棉湖之战是第一次东征最大的战斗。在激战之时，廖仲恺、蒋介石、周恩来、加仑等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黄埔军校官兵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尤其是教导1团，以千余人抵抗林虎部20 000精锐的进攻，士气高昂，不怕牺牲，虽然伤亡惨重，但终于打败了敌军。棉湖之捷，使林虎部溃退100多里，并俘虏其官兵500多人，缴获枪支700余支。

在棉湖战斗中，学兵连长曹石泉、党代表曹渊、副连长唐同德等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临危不惧，舍身奋斗，充分表现出革命军人的高贵品质。

棉湖大战后，林虎部败退到五华、兴宁一带。3 月 14 日，右路军乘胜追击；19 日，攻克五华；20 日，占领兴宁；23 日，进驻梅县县城洪兆麟、林虎部败退后，杨坤如于 4 月 4 日投诚。林虎、洪兆麟的残部分别向福建边界逃窜，陈炯明被迫率其残部龟缩于惠州。这样，东征军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英勇奋斗，打败了陈炯明的主力 20 000 多人。4 月初，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第一次东征是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对第一次东征的进行给予了大力支持，许多共产党员在东征中冲锋陷阵，立下不朽的功勋。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担负了东征部队全部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领导重任。苏联军事顾问帮助制定作战计划，组织部署各次战斗，为东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东征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打败了陈炯明主力部队 20 000 多人，基本上控制了东江地区。东征的胜利壮大了革命军的实力，是广东革命政权转危为安。第二，随着东征军的胜利进军，革命思想遍及东江地区的各个穷乡僻壤，极大地鼓舞了长期受陈炯明叛军压迫的人民群众。第三，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随着东征的胜利，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和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建立起来了。同时，东征的胜利不仅使海陆丰农会恢复了活动，而且还使紫金、玉华、兴宁等地建立了农会组织。[⑧]在东征胜利的推动下，广东的革命浪潮不断高涨。

注释：

①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179 页。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45 页。

②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89 页。

③孙中山：《复胡汉民等电》，《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中华书局，1986 年，第 581 页。

④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203页。

⑤同上。

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本部东征日记摘要》，《黄埔军校史料》，第252页。

⑦孙中山：《致杨希闵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630页。

⑧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6页。

党在军中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

黄埔军校“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①]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同志到军校担任各项负责工作。

学校设有国民党特别党部，共产党员在其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严风仪、黄锦辉、金佛庄、李之龙、周逸群、蒋先云、熊雄等还曾先后担任过特别党部的执委；肖楚女、张秋人、孙炳文等担任过特别党部的政治顾问。这对贯彻统一战线、执行三大政策、开展党的政治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扩大执委会上，要求“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的C、P组织”。据此，中共广东区委于1924年秋在校内建立了秘密的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它的建立，对指导共产党员斗争、宣传马列主义、团结左派师生、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开展并发展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②]

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主持开展的政治工作，不仅培养了国共合作的新型武装，而且为后来我党创建人民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起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黄埔军校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这是我国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次。从创办开始，军校就设置了由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担任的党代表，并建立了政治部机构。当时，军校中的军事工作和军事教学多由苏联顾问负责，而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学多为中国共产党选派到军校工作的同志主持。继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包惠僧、熊雄曾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熊雄、鲁易曾任副主任；肖楚女、聂荣臻、熊雄、恽代英、张秋人等先后任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曾任政治主任教官）。聂荣臻、李汉藩、杨其纲、李默庵（后退党）、黄鳌、袁策夷、陈启科、蒋先云、李之龙等先后在军校政治部任职。[③]

黄埔军校中的政治工作，是在共产党人的主持下才切实地开展起来的。



周恩来到职前，军校曾两易政治部主任。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一个右派政客。在他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政治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开展。政治部是作为国民党的工作机关而建立的。原政治部是个空架子，主任由国民党人担任。1924 年 11 月，周恩来担任主任后，调整了政治部人选，制定了政治工作计划，加强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政治部的主要任务是培植师生的国民革命意识。对内，要负责对全校师生进行政治训练、思想教育和指导党务活动，以使他们具有正确的政治知识，保证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对外，要负责宣传组织群众，以实现孙中山提出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在军事行动中得到人民赞助的目的。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包惠僧代理过主任，鲁易担任过副主任，聂荣臻担任过政治部秘书、政治编辑主任。政治部的科长、干事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因而，保证和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革命性。[④]

黄埔军校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是我党在革命军队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开端，它成为区别新旧军队的主要标志。后来之独立团，它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设立党代表，建立中共党组织，纪律严明，革除军阀作风，废止打骂恶习，发扬军队民主，培养了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军民团结的新风尚。[⑤]它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军校成立之初，我党曾选派部分党、团员参加军校的领导和学习，但人数较少（约占 10%），难以适应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因此，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决定由共产党员李劳工、周逸群等组织了群众社团——“火星社”，作为宣传党的主张、团结革命军人的纽带。那时，表示拥护革命政府的湘、粤、桂、滇等军阀，尚未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没有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为扩大革命影响，就以“火星社”成员出面与之联系，逐渐由这些部队派出代表组织起“青年军人代表会”，后成为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是一个以蒋先云、王一飞、周逸群、李之龙、李劳工、陈赓，曹饮谦，李汉藩等共产党员为骨干、以黄埔军校为基地的全军性组织。它本着这样的宗旨：“团结军人保障自身利益”、“联合军队中的革命分子”、“在军队和广大群众中作政治的、文化的教育工作”、“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密切关系”[⑥]，积极开展军内外的政治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宣传我党政策和革命主张，“联合会”出版《中国军人》，发行《兵友必读》等刊物，输送到南方各军中去，同时把向各个军阀部队做宣传革命思想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联合会还提出了“工农兵大联合”口号。为致力于工农兵的紧密团结工作，他们经常

开演讲大会，邀请农工商界的代表参加；同时也以革命军人的身份积极参加农工商各界的活动。

军校的教育方针是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并重，在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政治教育是政治部的主要工作，上政治课是其主要方式，同时配有专职政治教官负责讲授，共产党员萧楚女、张秋人、熊雄等就曾担任过政治教官，恽代英担任过主任政治教官。周恩来也经常讲话或作报告。反帝反封建是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主要研究的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以此来形象地传授革命理论、培植革命思想。使得学员“不仅知道枪是怎么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7]；而且要“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农工群众的物质要求，革命的胜利，亦必须靠农工群众的努力参加始能有所保障”[8]；对与革命运动有密切联系的社会科学，则要求学生了解，以便“洗刷学生在入学以前所受许多流俗传统的错误见解的影响，以养成他们确定的人生观。”[9]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既有三民主义，也有共产主义，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兼容并包。所有课程达20余门，内容十分丰富，这也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10]

为增强教育效果，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除教员在课堂上分层次、要求进行灌输革命意识的教授外，还定期邀请社会名人讲授形势、任务和政策。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人士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都曾应邀到校演讲。政治讨论会也是经常采用的方法。讨论会上，对各种问题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在校部还设有“政治问答箱”，学生可以随时将疑难问题投入箱内，每周由教官开箱，就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在课堂上或者校刊上解答。政治部还将恽代英、张秋人等解答问题的文稿，编成《政治问答集》印发，很好地传播了革命理论。

政治训练形式也发展为多样化。除课堂理论教学、请国共两党政治活动家和社会名人作政治演讲外，政治部还组织政治讨论会，相继编辑出版了《士兵之友》、《中国军人》、《黄埔潮》、《黄埔日刊》等多种刊物，制定各期入伍生誓词，谱写第二版黄埔校歌，从而使师生时时处于进步的革命的政治氛围中。

为宣传组织群众运动，黄埔军校开办期间，广东和全国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波及全国，震惊中外。广州“六二三”惨案的第二天，黄埔军校即发表《檄全国军人》文，号召“全国军人同胞，即时兴起，与日英法美葡各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接着，



又向全国发出通电，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行。在省港罢工过程中，军校政治部特派出一批政治骨干，参加了各种群众集会或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进行政治讲演，开展宣传工作。1925 年 7 月底，周恩来曾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只要广大工农群众休戚相关，守望相助，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⑪]这一报告，对广大工人争取罢工的胜利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周恩来还在东征作战中开展军队的战时政治工作。在政治部建立总队至小组四级宣传队和一个“血花剧社”，专门做战时鼓动工作和对敌、对战区民众的宣传工作。战前和作战期间，他反复进行战争和作战动员，要求各级党代表要竭力开展战场思想工作，营造英勇杀敌氛围，并以自身模范作用带领官兵奋勇向前。周恩来还积极发挥政治部的职能作用。他根据孙中山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建军纲领，在政治动员中，强调军队要遵守群众纪律，以求得国民的支持援助；要求各级党代表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带领官兵遵守群众纪律；宣传队和“血花剧社”，要竭力开展宣传群众工作。他指示政治部给“校军”官兵每人发一条红巾，系于颈上，以示“校军”与其他军队的区别。这既给“校军”官兵以政治荣誉感，又赋予他们以政治责任感。这样，就把政治部职能由对内担负师生和官兵政治训练任务，发展到对外担负宣传民众任务，使革命军向着军民一致的方向发展。[⑫]

在农民运动方面，黄埔军校也多次发表文告，支援农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并组织师生和广州各乡农民开过许多次的联欢会”，[⑬]以此联络感情，宣传群众。同时，军校政治部还派员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训练工作。还派员到东莞、宝安和东江各县，帮助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施以政治及军事之训练。”[⑭]1925 年 8 月，为了扩大反帝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广东国民政府和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广东北上“外交代表团”。黄埔军校曾派出得力的政治干部作为革命军人代表随团北上。中共广东党组织还委任一军人代表（共产党员）为北上代表团的中共党团书记。

通过全面的进步的政治知识教学，多样化的进步思想教育，强有力的战时政治工作，使黄埔军校多数师生实践了孙中山提倡的“忍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民众利益“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勇于冲锋陷阵的战斗精神等等。人们把这一切赞誉视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黄埔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

一个体现，是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部分，是黄埔军校意义之集成和永不泯灭之所在。[15]由于共产党人主持的黄埔军校中的政治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在黄埔师生参加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5年1月，盘踞在广东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病危之机，发动了向广州的进攻，阴谋推翻革命政府。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2月，革命政府组织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东征军主力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和两个教导团。这支国共合作组织的新制度的武装，出发前，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军校政治部向学生和官兵明确提出："不强拉夫役，不用军用票，付价购物，保护人民"[16]的口号，要求部队遵守革命纪律。同时，政治部还派出战时宣传队随同部队出发，向群众宣传东征的意义，号召各界群众组织起来，协助革命军共同作战。黄埔学生军从广东南部沿海东进，经广九路及海陆丰进攻潮汕。由于平时的政治教育及战时的政治工作，他们在东征中，纪律严明，作战英勇，得到沿途各界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因而连战连捷。仅一个多月时间就解放了东江潮梅地区，陈炯明残部逃往闽南，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这支年轻的革命劲旅也深得人民群众的赞誉。据当时报刊记载："此次联军进攻，……初出茅庐之黄埔学生教导团，尤出类拔萃，每战必克，每攻必取。""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蓬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夕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17]东征作战之所以取得胜利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正如后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的："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两个教导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18]1925年7月旧，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以后，所辖军队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所开创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又一起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各部队中去，对于改造当时投入革命阵营的旧军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成为国民革命军区别于过去一切旧军队的主要标志。继而成为取得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全胜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黄埔军校中创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从事革命政治工作的实践，为我们党后来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创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起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黄埔军校崭新的政治工作制度，丰富的革命政治教育，吸引着广大的革命青年。黄埔军校成为青年人向往的地方。军校内革命气氛高涨，激发起不少有志青年尽忠革命、为国奋斗的壮志。经过革命的政治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其中许多人成为工农红军的创始人和骨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由共产党人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黄埔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与宣传，在以前的中国军队史上是没有的，它也为新型的中国革命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后来我党政治思想教育、宣传的许多理论、原理和原则，都可以在此时期的黄埔军校政治思想教育、宣传的实践中找到最初的影子。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道："那时军队中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是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 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9] "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20]朱德也曾撰文对黄埔军队时期中共在军队中开创的政治工作制度予以充分肯定，指出这是我军建设史上的"老根"。[21]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556 页。

②彭未明：《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党史研究与教学》第 3 期，1994 年。

③包惠僧：《大革命时期的回忆》。

④同上。

⑤同上。

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总章》1925 年 18 日。

⑦杨其纲：《本校概况》，原载《黄埔日刊》，1927 年 3 月 1 日。

⑧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

⑨同上。

⑩彭未明：《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党史研究与教学》第 3 期，1994 年。

⑪《工人之路》特号第 37 期。

⑫陈伙成，王建强：《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

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 3 期，2004 年，第 44 页。

⑬《青年军人》第 2 期，1925 年。

⑭《黄埔军校史料》第 296 页。

⑮陈伙成，王建强：《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第 3 期，2004 年，第 45 页。

⑯张秋人：《广州的青年革命军》，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84、86 页。

⑰同上。

⑱《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93 页。

⑲《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380 页。

⑳毛泽东：《抗大三周年纪念》。

㉑《朱德选集》，第 393 页。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广东区委

1920 年秋，广州开始酝酿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但成员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有“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①之称。1921 年初，陈独秀在广州亲自帮助改组了这个组织，才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当时比较活跃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广州是我国工人比较集中，工人运动开展比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思潮传播比较早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有志之士，很早就奔走于国内外，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在这里引起强烈反响。1917 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同年十二月初就在广州传开了②。1918 年 5 月 1 日，这里举行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③。1919 年春，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工人组织，叫“共和工党”④。这是一个“为了模仿苏联工人阶级推翻反动统治制度的经验，而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其主要成员，后来大都参加了广东党的早期革命活动，有些人还加入了党⑤。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宣传新文化的进步刊物在这里广为传播。在其带动下，广东的进步知识分子也创办了很多新的刊物，如《中华新报》、《粤报》、《羊城报》、《国民报》、《大同报》、《岭海报》等十多种⑥。五四运动爆发，广东立即掀起一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风暴，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向当时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锻炼了群众，产生了一批革命人才，如彭湃、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周其鉴、张善铭、黄学增等。⑦他们组织学联和进步社团，出版进步刊物，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活动，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广州逐渐传播开来。如广州《中华新报》从 1919 年 7 月～12 月，连续发表了杨匏安写的《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十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曾亲自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这时也回到了广

州。他们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取得联系，于1920年10月创办了宣传新文化思想的广东《群报》，并逐渐把它变成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至此，在广州已经有一批具有进步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并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到工农群众去，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逐渐结合起来。1920年，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逐步结合，就体现了这一点。这年5月1日，广州工人在东园广场召开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当晚，工人、学生数千人一起举行提灯游行[8]。5月7日，在这里又召开了“国耻纪念日”大会，工人和学生都有代表在会上发言，愤怒声讨了军阀卖国的罪行，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为了反对桂系军阀莫荣新的反动统治，10月，广州各学校的学生举行了罢课，粤汉、广九两铁路的工人也同时举行了罢工，他们共同的口号就是要桂系军阀莫荣新滚出广东。在此前后，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新形势。1920年8月陈炯明在孙中山的领导和支持之下由福建漳州回师广东，10月下旬占领了广州，孙中山由上海又回到广州主持军政府。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是赞赏的，对“五四运动”也是积极支持的。对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传播，国民党的一些进步人士是赞同并宣传这一学说的。孙中山的助手之一、大元帅的代参军长林修梅（林伯渠的堂兄），1920年在广东就写过文章宣传社会主义，赞成马克思的主张[9]。陈炯明因功身居要职，集广东军政大权于一身，地位仅次于孙中山。他为了维持在广东的统治，这时也伪装开明进步，表示支持工人运动，赞同新文化运动。上述情况表明，到1920年下半年，广东和全国许多地区一样，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基本具备，而且还有一个有利于革命的良好局势。

1920年秋，来了两个俄国人到广州，一个叫米涅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代表的身份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即塔斯社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通过李大钊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带他们经上海到广州，把他们介绍给“广东革命界”，实际上是介绍给了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很活跃，苏俄代表在广东首先接触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心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以极“左”的面目高喊“革命”，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苏俄代表和他们交谈几次，就被他们“所包围”。苏俄代表向他们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道理”，要他们联合起来，开展工人运动，进行“社会革命”。他们听说俄国人帮助搞革命，“都很高兴”[10]。为了开展工作，俄国人就在广



州的固定地点和无政府主义者定期开会，主要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11]。他们当时主要在广州、河南协同和机器厂开展宣传活动，并成立了工人俱乐部[12]。同年10月3日，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在这过程中，俄国代表同他们在广州酝酿建立共产党，[13]这也就是《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中讲的那样："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党"。因为"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涅尔和别斯林是共产主义者[14]"。由于观点不一致，当时在广东的社会主义者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都没有参加。

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积极向全国各地发展和扩大组织。1920年11月接到陈炯明约他到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聘请书后，陈独秀便和共产国际代表商议，认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应当去开展工作。又和北京的李大钊商议，决定接受这一聘请。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起到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15]于是，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把上海党的工作交给李汉俊代理，由上海启程赴粤。和他同行到广州的有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中称他作B先生[16]。到达广州后，陈独秀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就同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谭祖荫等一起开会研究党的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拿出来让与会者讨论，其中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表示不愿接受。[17]经过两次讨论，意见针锋相对，没有调和余地。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意见不同，终究是要分的，各走各的路。梁冰弦等也同意分，[18]这样无政府主义者便于1921年退出了共产党[19]。在此前后，上海、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了共产党组织。

与此同时，陈独秀找到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称赞了他们创办的《群报》，并和他们商谈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大约在1921年的3、4月间[20]，他们重新组织了广州共产党，谭平山任书记[21]，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个区，在1922年7月以前，发展党员至30名，成立区执行委员会。根据这一指示，在党的二大召开前，中共广东支部扩大成为中共广东区委。1923年11月后，党中央决定撤销广东区委，只保留广州地委。

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广东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中共中央决定

恢复中共广东区委，管辖范围除广东外，还有广西、香港等地，故亦称两广区委。1924 年 9 月，周恩来从欧洲归国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925 年春，周恩来随军东征，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党的四大后，党中央及地方机构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书记）。广东区委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军事部、青年部（后为学生运动委员会）以及监察委员会等机构，还创办了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为了加强集体领导，成立了区委主席团（即常委会），成员有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阮啸仙、罗绮园、邓中夏、穆青、蔡畅和谭植棠等。1925 年冬，广东区委大力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在广州，先后在黄埔军校、铁路、工厂、船舶、码头、商店、手工业、人力车、广东大学、郊区农村等单位和行业中建立了支部。还派人深入各县，建立了海陆丰地委、南路特委、琼崖地委、汕头地委等组织。此外，还领导香港特别支部、云南特委、梧州地委、广西区筹备委员会以及南宁地委等。广东区委的党员人数，由 1922 年 6 月的 32 人[22]发展到 1926 年 9 月的 5039 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 27.1%[23]，广东区委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个地方组织。

在周恩来、陈延年的领导下，广东区委在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第一次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广东区委非常重视革命武装的建设，派遣许多得力干部如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等，到黄埔军校工作，并建立了黄埔军校的中央党组织。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黄埔军校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作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区委还领导建立了工农武装。早在 1924 年 8 月，广州建立了工团军和农团军，他们协助革命政府，镇压了商团叛乱。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党在各地组织农民协会的同时，进一步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到 1926 年 5 月，广东全省农民自卫军达 3 万余人。工人武装也不断扩大，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达到 3 000 人左右。为了中共能够直接掌握革命军队，1924 年 11 月周恩来、陈延年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组建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建立了党小组，直属广东区委领导。1925 年 11 月，在周恩来、陈延年的努力下，以铁甲车队为基础，成立了叶挺独立团，全团约 2 000 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直接掌握的一支正规武装部队。

广东区委还积极领导了工农群众运动。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举



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该所的第一至第五届的领导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第五届仍为彭湃）都是广东区委委员。在广东区委农委（亦称农民部）的领导下，广东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五卅惨案发生后，广东区委于5月31日召开了广州市党团员大会，会议决定由党区委和团区委联合成立临时委员会，领导全市人民投入反帝斗争。区委领导发动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并通过廖仲恺，争得了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使这次罢工坚持达16个月之久，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成为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一次大罢工。

广东区委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又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区委认为，应该在大会上严惩西山会议派，并计划争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选举中向国民党右派作了让步。中山舰事件后，区委主张坚决回击蒋介石的进攻。整理党务案公布后，区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要求抵制。但这些主张也由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而未能实现。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出师和国民政府北迁后，在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加紧限制和破坏工农运动。区委领导工农群众，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3月，区委书记陈延年离开广州。5月20日，中共中央常委讨论决定，陈延年不再回广东，由彭湃、穆青、黄平、赖玉润、阮啸仙等组成广东省委。

注释：

①《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7月。

②《中华新报》，广东，1917年12月。

③《工人万岁》、《中华新报》，广东，1918年5月2日。

④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叫郑荅生，总部设在广州，佛山、江门、顺德等地设有分部，出版《共和工党》月刊（出了一、二期），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也有工人。约在1921年秋停止活动。

⑤梁复然：《“一大”前后》（二），第444页。

⑥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

⑦同上。

⑧《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5月6日；《时报》，1920年5月7日。

⑨《林修梅遗著》，1921年印，亲属藏本。

⑩1981年谭祖荫的回忆和1981年刘石心的回忆。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1919～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月，第399页。

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1919～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月，第399页。

⑫同上。

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1919～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月，第399页注释2。

⑭《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7月。

⑮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香港，1971年版，第128页。

⑯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1919～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月，第400页。

⑰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党史资料》第7期，1953年。

⑱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1919～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月，第400页注释5。

⑲梁复然:《“一大”前后》(二)，第486页。

⑳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1919～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月，第401页注释1。

㉑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上海地方行政出版社，1944年，第203页。

㉒《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

㉓《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年12月5日。



周恩来的早期军事思想

周恩来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者。在其55年的辉煌革命生涯中，就有30年的时间直接任军事领导职务，从事军事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先驱和军队革命政治工作的开拓者。他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发端于旅欧时期，大革命前后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①]他的理论和实践丰富了军事科学理论的宝库。

周恩来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研究军事问题。他在天津和同学们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国防演讲会，请人讲“军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②]。周恩来有超乎一般同龄人的政治洞察力和敏锐的军事眼光，常常在会刊、校刊上发表文章，或在“国防演说会”上发表演讲，表达自己对时势和战局的独特看法，抒发救国和抗争的一腔热忱与激情。1916年6月，张勋复辟。周恩来愤怒无比，撰文强调，帝制与民主共和是“新旧不并力，冰炭不同炉”，提出了要用革命的武力，消灭拥护帝制的复辟分子，保卫民主共和[③]。由于周恩来能够把军事观察与现实政治分析相结合，因而具有比一般人更为深刻、敏锐的政治和军事洞察力。他在《中国现实之危机》这篇重要政论中，总结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历次起义、战斗失败的教训，并指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虎头蛇尾，不能坚持到底。表现出高超的政治见解和超常的军事才智。1917年秋，周恩来东渡日本，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期，他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了极大启发，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暴力革命的思想上。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欧洲学习，继续探索救国真理。在这期间，周恩来一方面结合中国近百年来农民运动屡遭失败的教训，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和工人运动情况，特别是苏联

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经过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进行反复的比较，他认为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造中国的出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用暴力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也为自己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暴力革命思想最早见诸1922年12月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他针对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的错误观点，鲜明地指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④]。1923年春在致邓颖超的信中，他引述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的话"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赞赏这是"见到之语"。[⑤]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军队是阶级压迫的一个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到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造成他本身的武力，达到世界革命的成功。"因此，"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⑥]认识了真理就全力为之奋斗。周恩来认识了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就积极投入和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运动。基于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周恩来当时在其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就设立了国内各政党所没有的军事机构——军事部，并选派党团员去苏联学习军事。

1924年8月，周恩来途经莫斯科回国后，到达广州，任职极为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委员长兼军事部长。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周恩来即参加了在广州镇压商团叛乱的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开始了他军事工作的生涯。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924年12月初到黄埔军校工作，先后担任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与周恩来一起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熊雄、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这样，周恩来就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开始了培养革命的军事政治干部和创建革命军队的伟大创造性活动。他根据列宁创建苏联红军的经验，首先着手加强军校政治部的各项建设工作。一、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以加强党对军校的领导。同时在师生中组织革命青年先进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团结教育广大师生。二、建立健全政治部的各级组织，设立了指导、秘书和编纂三个股，从第一期毕业生中连选共产党员担任各股主任。三、改革了教学内容，规定军事课程和政治课程并重。除军事课程外，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制定了



《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增加的政治教育内容有《社会进化史》、《苏联研究》、《三民主义》、《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各国革命史》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等。主要是使学员明了"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7]还建立了周会制度，每周邀请党政要人和知名学者到校演讲。毛泽东、廖仲恺、张太雷、苏兆征、吴玉章、宋庆龄、汪精卫等，都曾到学校作过专题报告。

周恩来更是常常向学员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主要有：《军队中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和《武力与民众》等，对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划清与旧军队的界限起了很大作用。第一期在军校学习的学生共645人，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从各地动员来的进步青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仅第一期就有80多名共产党员，第四期政治班有99名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人成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骨干。从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革命骨干，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1927年有力地回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骨干，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取得后来的胜利。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对援助省港罢工工人以及东征，镇压反动地方武装起了很大作用。周恩来同志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以叶挺为团长，这是在周恩来直接有效指挥下的一支精锐部队。周恩来亲自从黄埔军校调共产党员到独立团任营、连长和各级领导。独立团成立党支部，直接由两广区委军事部领导，各连建党小组。周恩来强调要把独立团培养成为一支最可靠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特地制定新兵训练计划和干部训练计划，编写了政治教育提纲，向广大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还充分利用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重大影响，积极为共产党培养军事骨干，如林彪、陈庚、罗瑞卿等。在他的影响下，还有许多军校教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先后有80多人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在以后漫长的革命战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他还花费大量精力在旧军队的军官中进行引导、教育工作，用马克思主义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如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人才财富。

1925年，为统一广东革命基地，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作为政治部的领导人而参与指挥。周恩来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

军队建设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对改造国民革命军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大胆地探索，制定了一套政治工作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一、结合部队在行军作战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对部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二、给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三、打破旧军队的传统观念，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四、组织战地宣传队；五、开展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各种组织。这套政治工作制度不仅对取得两次东征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保证作用，而且也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制定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后来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对此曾给予很高评价："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 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⑧。

周恩来具体负责在当地的农民中进行宣传，说服他们支援这一战役。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下，3 月底便打垮了陈炯明主力。周恩来等革命家的政治宣传工作相当成功，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广大农民被充分发动并自觉组织起来，他们排列在革命军经过的城镇和乡村的道路两旁，敲锣打鼓，并向革命军送吃的东西和酒。广大农民群众还积极参加革命军，当部队到达前线时，革命军的人数翻了一番。革命军还教农民如何建立民兵、如何分发武器、如何使用游击战术和如何起来造军阀的反。周恩来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军纪。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族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均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察等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业绩。"周恩来在这之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军事管制法办公室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影响下，第一军的五个师中有四个师的政治工作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1926 年 7 月，革命军开始北伐，周恩来是第一军团的政治官员，在部队推进过程中，他组织宣传工作，把农民和工人武装起来支援革命士兵，保证了北伐的胜利。

1927 年春，北伐军先后占领了湘、鄂、赣、闽、皖、浙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个军阀的主力。此时，北伐军前锋已从南、西两面进入江苏，对盘踞在上海的军阀部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为配



合北伐军，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在组织领导这次武装起义中，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超常的军事才智和卓绝的组织领导才能，对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发动一次成功的起义，首要的是切实做好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特别是群众的发动和必要的武器准备。起义前，他认真地分析研究了前二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第一，建立各级领导机构，以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第二，制定了闸北、南市、沪东和沪西区的作战计划，包括进攻的主要目标，各路的人力和武器配备，进攻的方式、时间，通讯联络及注意事项等；第三，加强对工人纠察队的训练，讲授巷战的打法等；第四，加强敌军工作；第五，准备了必要的武器；第六，对群众进行深入的动员教育。由于部署周密，战略应用得当，再加上周恩来始终亲临现场指挥战斗，掌握战斗进展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制定新的作战方案和作战原则。起义从 3 月 21 日开始，经连续 30 小时的激战，便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领导武装斗争之前，独立成功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伟大创举，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原则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注释：

①杜魏华：《周恩来在大革命前后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漳州职业大学学报》第 1 期，2000 年，第 5 页。

②李锦玉：《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对革命军队建设的贡献》，《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24 卷第 2 期，2006 年 3 月，第 84 页。

③同上。

④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 6 号，1922 年 12 月 15 日。

⑤《德法问题与革命》，《觉邮》第 1 期，1923 年 4 月 6 日。

⑥《军队中政治工作》（第一讲），1925 年 6 月 2 日

⑦《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1925 年 2 月 6 日。

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370 页。人民出版社，1964 年 4 月版。

共产党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0年春，共产国际东方部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专为东方各国，如中国、朝鲜、日本、印度、伊朗等培养革命干部的训练班，不久扩大建立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史称“莫斯科东方大学”。经由俄共（布）创办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来自于十几个国家，其中以中国班、印度班人数最多。从1921年10月到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遣四批学员入该校学习。

中国班第一批学员是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派的。1920年9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刚成立不久，开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又称“俄文专修馆”），招收一批进步青年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著作，为赴俄留学作准备[①]。1921年夏，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派遣20多人，分组由上海乘船到苏联海参崴，后经远东、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同年10月，当东方大学开学时，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等，作为第一批学员进入中国班学习。[②]

中国班第二批学员大部分是由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转来的。1922年12月，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等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期间，曾看望了中国班第一批学员，同时又了解到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处境困难，认为有必要抽调他们赴苏学习。1923年3月，中共旅欧支部派遣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熊雄等12人，由巴黎赴莫斯科学习。同年11月，该支部又派遣刘伯坚、袁子贞、马玉夫、李合林等10余人赴苏学习。1924年初，再次派遣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李林、熊味根等20余人赴苏留学。[③]与此同时，国内党组织也选派了吴丽石、李求实、张浩等数十人，赴苏学习。

中国班第三批学员大部分是1925年秋由国内派遣的，如彭干臣、罗世文、向苦予、赵毅予、施益生、涂作潮等，其中工农分子居多。小部分是由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转来的，如朱德、刘鼎、邢西屏、武兆镐、熊正心、林修



杰、乔培成、王士嘉、潘锡光、任竹光等，[4]他们按文化程度的不同，分班上课，但有几门课是合上的.

中国班第四批学员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共中央从国内派遣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保护大批革命干部和聚积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有计划地委派了三四百人赴苏学习。后来，因学员过多中国班被一分为三：一、政治班，主要学习革命理论；二、军事班，专门学习军事指导；三、预备班，侧重补习文化。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初期的课程设置虽几经变动，但从中可以凸显出其党校性质和特点：第一，注重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第二，注重学习俄国革命斗争实践及其建设经验；第三，兼顾学习基础自然科学、外语（特别是俄语）。其目的在于帮助学员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掌握马列主义学说方法论，用于指导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同时输出俄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其1921~1924年的课程[5]设置如下：

1921年教学计划中包括12门课：自然科学（物理和化学、天文学和地质学、生物学）、人类社会史和历史进程的本质、俄罗斯史、西方阶级斗争史、政治经济学、东方学、俄国和俄共革命斗争史、经济地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苏维埃建设、俄语、数学。1922~1923年教学大纲中包括4个系列30门课程：第一系列包括9门课：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社会形态发展史（文化史）、物理、化学、生物学、（初级）地质学、数学、俄语、绘图与绘画。第二系列包括10门课：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说史）、俄国史（包括俄共（布）历史）、西方历史、统计学、物理和化学、技术史、生物学、天体物理（组合地质学）、数学、外语。第三系列包括10门课：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生物学（高级神经活动）、哲学史、社会学说史、马克思主义政权与国家理论、西方史、工人运动史、外语。第四系列课程：苏联经济政策（包括土地关系）

1924年教学大纲中包括16门课：第一年包括6门课：俄共（布）历史、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自然科学和数学（含自然地理与绘图）、俄语、本族语。第二年包括6门课：政治经济学、俄罗斯史、西方史、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发展纲领、实践与组织建设）、自然科学与数学、外语。第三年包括4门课：俄共（布）与共产国际（目前的任务与工作）、苏联经济政策、苏维埃国家与政权；实践课程，按照2条线路（城市与农村）进行课堂辅助教学。

第一届中国学员在俄国学习期间，其物质生活相当艰苦。当时正值俄国革命胜利不久，国内经济形势严峻，物资奇缺，粮食紧张。当时俄国待遇最好的是前苏联红军，其首领列宁同志也只是享受到红军的待遇，每天也只有一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但中国学生颇受优待，享受到了和苏联红军一样的待遇。学员穿的衣服、鞋子等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不管脚大脚小，一人只有一双；冬天穿的是一种麻布做的衣服，很薄，黄颜色；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上面有颗五角星的帽子。他们白天紧张学习，晚上还要站岗放哨，生活艰苦可见一斑。但是学员们精神生活却无比愉悦。他们除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外，还要参加中国班的党团活动。1921年冬，中共旅莫支部成立，罗亦农任书记，第一届学员在中共旅莫支部的指导下，开始有组织、有信仰、有目的的活动。例如，中共旅莫支部经常组织学员上街站岗，参加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义务劳动。1922 年暑假，一部分学员还走访了乌克兰的农民家庭。同时他们还十分关切中国国内的革命斗争，1923 年，“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学员们组织开展专题讨论、办墙报，还编排了反映罢工斗争的节目，在校内和街头进行演出。此外，他们还常常为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性会议服务。如 1922 年 1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做会议秘书，瞿秋白、李宗武等做会议翻译。

到 1924 年，莫斯科东方大学已成为苏联国内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有 160 多名教师和 60 多个民族的 1 000 多名学生。在外国部中，中国学员约占 1/3[⑥]。截止此时，赴苏学习的中国学员主要是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

1925 年，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将中国班学员分班施教：第一类是知识分子班，吸收具有较高学历或文化水平较高的共产党员，以提高为主，兼及研究；第二类是工人班，工人班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学校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开设政治常识、经济地理、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列宁主义定义和俄语等课程；第三类是军事速成班，这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开设的培训班，为培养进行武装斗争的骨干，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送数百人进入这个班学习，教官都是清一色的苏联人，已毕业的中国班学院担任翻译，下设几十个小班，冬天主要在课堂上学习理论，春、夏主要在野外实习[⑦]。同年，业已发展壮大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并创建了历史科学系。该系不仅组织教师从事科研工作，而且还吸收大量经过训练的学生参加工作，从而使该大学渐

渐成为苏联东方大学的科研中心之一。

1925年，随着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东方大学的部分教员和中国学生转到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以中国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

孙中山逝世以后，鲍罗廷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共产国际和苏联已决定建立中山大学。会上，鲍罗廷还建议国民党派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获得通过。并且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顾问。会后，选拔委员会立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地选拔学生赴苏学习。经考核，选拔了300多名学生，其中广州180人，黄埔军校10人，湖南和云南的军校各10人，上海50人，京津50人，鲍罗廷推荐50人。广州学生中90%是国民党，上海和京津地区选拔的学生则多是共产党员，而鲍罗廷推荐的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8]

京、津、汉等地的学生先赴上海集中，自上海出发的首批学生100人，其中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吴亮平、孙冶方、伍修权、李培之、沈泽民等，于1925年10月下旬乘苏联煤船去海参崴，11月底到达莫斯科。其他几批学生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分别是1925年12月、1926年2月和稍晚一些时候。后来，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转来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其中有邓小平、付钟、徐冰、陈延年、陈乔年等人。[9]

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他给学生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每周讲两、三次，每次讲三小时。1927年拉狄克被免职，不久由米夫接任校长职务。1929年米夫辞掉校长职务后，由老布尔什维克威格尔继任中山大学校长。[10]

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三个附属机构：中国问题研究室、翻译局、中文印刷所。学生的衣、食、住、行、图书、文具、寒暑假费用和回国路费等，全部由校方负担。

这所学校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需要，学制为两年；并强调理论和实践并重，培养学员既具备群众工作的能力，又具备军事指挥才干。[11]

为了达到上述的培养目标，学校设置的课程主要有：俄语、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列宁学、军事学、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和工人运动等。担任讲课的教师都是从苏联各大学请来的有声望的党员教授。如马丁诺夫、利

浦曼等。此外，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经常到学校做重要报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等曾到中山大学做过报告。

学校十分重视对学员进行军事教育，由高级军官担任教官，他们当中有师长、大校；中山大学军事研究室主任阿基莫夫是空军联队的一名指挥官。在军事研究室里陈列着各种普通武器。此外还有各种地形沙盘，作为正规课堂教学补充。在这个研究室讲解各种武器的结构和使用。校方组织学生去莫斯科附近的军事院校参观和到附近兵营打靶。暑假期间，所有男生都要穿上军装，住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兵营接受野营训练。

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造就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建立，又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而撤销。[12]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由国民党派去的学生基本上都被送回国内，学校主要招收中国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斗争而又很难在国内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革命理论，以保存和培养中国的革命力量。[13]

1930 年中山大学停办之后，东方大学重新开设中国班。1937 年，东方大学分成两个独立的单位，一个是只收苏联学生的东方大学；另一个是只收外国学生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1938 年，东方大学停办。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提供了一大批领导骨干。众所周知，在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些同志是从留苏开始投身革命的，其中有不少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如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刘伯坚、向警予、熊雄、瞿秋白、王若飞、叶挺、李求实、罗世文等。他们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与当年在苏联留学时期所学的理论知识以及所确定的奋斗目标分不开的。同时他们还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这些在前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除努力学好所规定的课程外，有的还兼做了一些翻译马列原著和其他理论书刊的工作，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撰写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如 1924 年暑假期间，罗亦农等人翻译了《共产主义 ABC》和其他理论著作；蒋光慈在留学期间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重要文章，后来陆续刊登在《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上；还有的留苏学生将所学讲义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译成中文，带回国内出版，纠正了早期译本中的一些偏差错误。这对中共党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提高其思想理论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华林：《渔阳里6号和赴俄学习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第1期，1980年。

②《肖劲光回忆录》，第18～28页。

③张允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1册，第56～57页。

④《东方大学中国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作用》，《中国留学史萃》，第170～181页。

⑤参见王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志士的摇篮》，《“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8月，第283页。

⑥王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志士的摇篮》，《“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8月，第285页。

⑦黄新宪：《莫斯科“中大”、“东大”与国共两党留苏学生》，《理论学习月刊》第3期，1989年。

⑧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7月，第255页。

⑨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7月，第255页。

⑩同上。

⑪同上。

⑫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7月，第256页。

⑬同上。

朱德投身革命学习军事

朱德，原名代珍，字玉阶，1886 年 12 月 1 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西麓的仪陇县。朱家世代租佃，生活贫苦，从诞生的那天开始，朱德就承受着痛苦的煎熬，“每每觉得肚子还饿，就奉命离开饭桌了。”[①]朱德自幼参加劳动，四五岁帮助母亲干活，八九岁已会种地[②]。在众多亲人中，母亲是朱德最崇敬的人，她不仅勤劳俭朴，而且宽厚善良，时时不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还穷苦的乡亲。母亲的品性和品格对朱德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打从懂事起，朱德就耳闻了有钱人的为富不仁，目睹了地主官吏对穷苦人的欺诈打压。他记得一家人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用汗水换来的稻谷，大部分要送进地主的粮仓；也记得荒年时成群结队的“吃大户”饥民遭到地主豪绅和官吏的镇压，几十里内血迹斑斑，尸横遍野；更记得家乡遭受旱灾时，地主豪绅趁火打劫，强行提高佃租，逼得全家骨肉分离的惨景[③]·……这一桩桩、一幕幕在朱德幼小心灵深处种下仇恨的种子，他深切地感到这个人世“有欠公平”，希望走到外界广阔的天地中“寻找新的生活。”[④]

朱德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中度过的。那时候，朱德的家里很穷，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但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朱德的父亲和母亲决心即使节衣缩食也要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⑤]，所以“东挪西凑”才借到二百多块钱做学费，直到后来朱德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了当初的借款。

1892 年，朱德被送到私塾读书。他先后在朱先生、丁先生及席聘三先生处就读，打下了深厚的历史和旧学的基础。此间，以师从席先生的收获为大。席先生“是一个很懂人情世故，很有情趣有骨气的”[⑥]、“对外部世界颇有卓识眼见的学者”，又是一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⑦]从 1896 年～1904 后，朱德在席先生那里一共上了八九年学。这段时间，正是国家内忧外患时期。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都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席先生经常向朱德讲述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外国侵略者的贪得无厌，甲午战



后中国面临的瓜分危机，维新志士的变法主张，谭嗣同英勇献身的事迹等等。启发朱德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勉励他立志报国。并从“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这一事实出发，“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学，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⑧]席先生的思想，对青少年的朱德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萌发了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意识。1900 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在席先生的指导下，他经常和同学们议论义和团能否打赢列强军队等问题。在席先生的启蒙和引导下，少年时代的朱德就“已经懂得问国家事”，并萌发出有意识地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⑨]

1905 年，经席先生说情，朱家终于同意借钱供朱德到顺庆（今南充市）新学堂读书。在读完六个月的高等小学堂，他又到顺庆府中学堂就读。那里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学堂监督（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先生。朱德在学堂学习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新知识。听教员们经常以反对“旧制度”为名抨击清政府。还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刊，也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并从亲身体验中逐步体悟它的含意。顺庆府中学堂使来自山乡的朱德眼界大开。

1906 年考入顺庆官立中学堂学习后，进一步萌发了“读书不忘救国、强国、治国、卫国”的思想。1907 年抱着操练武艺，挽救国家危亡的思想，徒步赴成都报考武备学堂，被录取，后因家人反对而未入学。在“教育救国”、“强身救国”思潮的影响之下，朱德到成都报考了体育学堂。在那里，朱德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各门课程，同时“听戴假辫子的教师提倡‘自由平等’、批评‘旧制度’的讲课。”并且阅读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此时的朱德眼界更加开阔，产生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的认识[⑩]。同时他多方探听同盟会的消息，希望自己也成为同盟会员[⑪]。

1908 年朱德从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后，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曾想通过教育以救国，但经过与新旧势力的几次较量，残酷的事实使朱德深感“教书不是一条生路”[⑫]，从此朱德决心投身军界，以武力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

1909 年初春，他在去云南报考陆军讲武堂前，撰写了“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的《赠诸友》一诗，表明自己已立下投笔从戎以求拯救国家的宏伟志愿[⑬]。后几经曲折，他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的教学大都是仿照日本军事学校的模式进行的，每天上课六

小时，下操两小时，功课比较繁重，要求特别严格。朱德这时确信自己已找到了一条可以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他把学习和训练看作实现救国目标的必要条件，因而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努力掌每个训练动作的要领，得到了教员和同学的一致好评。1910 年 7 月，因成绩优异被选拔进特别班。在第一学期后的一天，朱德就歃血宣誓，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旗帜下的一名战士。从此，他走上了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

1911 年 8 月，朱德从讲武堂特别班毕业，分配在新军 19 镇（师）37 协（旅）74 标（团）2 营见习。期满任左队司务长、排长等职。此间，遵照同盟会的安排，在新军士兵中开展武装起义的舆论宣传工作。当时的士兵，“一辈子过着最困苦、最原始的生活。”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渴于寻求知识和新思想”。[14]朱德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对这些士兵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经常深入他们之中代其写家信、看家书，和他们摆“龙门阵”。“课堂上，他耐心地给士兵们讲解学科。操场上，他模范地带着士兵们练习术科”。朱德还在“新军中提倡上下一致，废除打骂体罚制度，受到士兵们的爱戴”。[15]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同士兵搞好关系，向他们介绍同盟会的政纲，讲述清政府无耻卖国的罪恶行径以及清朝统治者残酷欺压穷苦老百姓的事实等，朱德用具体事例，来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朱德的宣传鼓动工作，为日后昆明“重九起义”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11 年 10 月 10 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就此开始。消息传到云南后，朱德立即和事先约好的同盟会、哥老会会员及倾向革命的积极分子共 20 多人在西山脚下秘密集会。会上朱德向大家介绍了同盟会政纲，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武昌起义给云南革命带来的有利条件，提出严密侦察云贵总督李经羲等人的行动，策动同盟会员及哥老会弟兄作好起义准备等建议。

10 月 30 日（即农历 9 月初 9 日），在蔡锷、李根源等人的领导下，昆明爆发了“重九起义”。当天晚上朱德被指定为 74 标 2 营的连长，带队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由于清军的战斗力有限，也由于朱德“曾经奉命在卫队营中间进行过一些革命活动，”[16]“有些哥老会成员早就同朱德同志有过秘密联系，所以并不真心为李经羲卖力。”[17]朱德率前锋区队首先冲破守敌防线，进入总督衙门，巧妙地活捉李经羲。由于朱德英勇善战，表现出色，蔡锷当面嘉奖他：“才华出众，智勇双全，军政兼通。”[18]云南光复后，朱德被派率



一梯队援助四川。1912年4月，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四川宣告统一，朱德随军撤回云南。5月，云南省军政府在昆明举行援川军庆功大会，会上蔡锷赞扬朱德："在云南辛亥革命和援川战斗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授予朱德"光复"、"援川"勋章各一枚，并晋升为少校营长。[19]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由此才看到了一线希望和光明。朱德此时也感到无比欣慰，他热切地期待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进步的国家。然而他梦寐以求的境况却不曾在中国大地出现，"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转眼之间已经落到反革命的手中。"[20]四年后，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朱德又高举护国、护法大旗，投身到维护共和制度的战斗之中。

1913年夏，朱德任步2团1营营长。接着随部奉调迤南，驻防蒙自、临安等地。此间，他多次击溃掠害人民的地方土匪，粉碎了法帝国主义妄图利用土匪骚扰边境，乘机侵占中国的阴谋。朱德因功渐次升团副、团长、授上校军衔。在与土匪交战的过程中，朱德逐渐摸索出一系列游击战术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21]大大提高了他的作战指挥能力，为其后来成为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12月，蔡锷抵达昆明与唐继尧等人秘密策划反袁斗争，决定于25日在昆明发动武装起义，组织讨袁护国军进军四川。接到命令后，朱德于25日黎明率领革命士兵宣布起义，并征用了蒙自所有火车皮把队伍全部开往昆明。到昆后，朱德被任为补充队第四队队长，负责组训新兵。随后又调任护国第一军第三梯队第六支队任支队长（相当于团长），准备开赴四川，参加讨袁护国战斗。因其在护国战争中，凭着强烈的使命感，"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战，结果能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22]打出了威名，赢得"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他所率领的三支队受到总司令部的嘉奖，朱德因战功晋升为少将旅长。

袁世凯绝望而死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家权利仍旧掌握在争权夺利的军阀政客手中，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操纵下，他们进行着激烈的争斗。1917年因对德参战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府院之争"，结果，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的段祺瑞重新上台并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对外卖国对内实行独裁。段的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7月孙中山联合陆荣廷、唐继尧，揭起"护法"运动的旗帜。唐继尧任护法军政府元帅，在云南组织靖国军征讨北洋军阀，并电令在川滇军先平川乱然后北

伐，任命驻防沪州一带的朱德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后由于军阀的阻挠北伐不成，朱德于1918年3月奉命率部进驻沪州，担任旅长兼沪州城防司令。面对不断的军阀之间的混战，国家的满目疮痍，朱德满怀激奋，提笔写道："汹汹天下尽为烽，八载衅开百二重。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中央老朽能谁主，各省英雄岂自供。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意在商农。"[23]朱德陷入了救国无门，报国无路的境地。正值此时，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为全世界的先进分子送来马列主义，使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4]"五四运动"兴起后，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书刊开始涌入沪州，朱德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开始从别人的文章中了解马列主义，并经常和朋友谈论所得。每每讨论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中国为什么屡遭挫折？感到"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问题上出了毛病。"[25]毛病在哪里？他们无法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但已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26]"无论如何也要到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是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的。"[27]在黑暗、腐朽的社会氛围中，朱德没有放弃对光明未来的追求，他努力从苦闷和彷徨中挣脱出来，不倦地探求着中国的出路和自己的前途。

1922年，朱德毅然抛弃官职来到德国并在周恩来等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为此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后，立即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当时"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28]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决议。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于广州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从而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后来的革命大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此时在德国留学的朱德，也积极拥护国共合作。1924年12月21日他由哥廷根返回柏林，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重新加入国民党，从事革命统一战

线的工作。1925年1月，朱德在国民党驻德国柏林支部召开的大会上，当选为该支部的执行委员，[29]为了在留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朱德主办了国民党驻德国柏林支部的机关刊物《明星》（油印）。他一人负责撰稿、组稿、自刻蜡纸、自己印刷和发行。刊物受到了好评。在1925年2月25日出版的国民党驻德国总支部机关报《国民》第十二期上，刊登了《旅德的明星》一文，称赞《明星》杂志是在“黑沉沉的旅德界中，陡然出现了一颗明星”，“足以开读者之胸襟而鼓舞人们勇敢奋发的精神”，“特表欢迎，并向旅欧华人介绍。”[30]

由于朱德的积极活动和《明星》杂志所产生的影响，很快在留德学生中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少数右派，壮大了左派的力量。不久，朱德以国民党支部负责组织工作的执委之身份，兼管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会的工作。当少数右派分子反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占据中国留德学生会会址（柏林康德大街122号），不许进步学生去那里活动时，朱德就率领进步留学生对他们进行斗争，把由右派把持的中国留德学生会改造成了真正群众性的组织，这才使进步学生有可能去学生会开展活动和学习。

1925年7月，朱德由德国赴苏联学习军事。翌年7月朱德由苏联回到上海。此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朱德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并以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决代表的身份，到四川万县川军杨森部做统战工作。

当时，北伐军已进逼武汉，而盘踞武汉的北洋军阀主将吴佩孚则密令早就投靠他的杨森率4个师从万县、宜昌一带东下，侧击北伐军。形势对北伐军十分不利。朱德到万县后同稍后到万县的陈毅一起，说服杨森不出兵支持吴佩孚，从而为北伐军迅速攻占武汉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朱德在万县期间，发生了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震惊全国的“九·五”惨案。朱德和陈毅帮助杨森出谋划策，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坚决的还击，并联系地方党组织，领导万县军民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反英爱国运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31]

由于朱德积极致力于国共合作的事业，耐心做争取杨森的工作，杨森终于率所部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被编为第二十军，杨森任军长，朱德任党代表，并兼该军政治部主任。朱德这个党代表同时又是共产党的党代表。[32]

为了把杨森这支军阀部队改造成为革命的队伍，朱德请求武汉国民政府调来30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其中除少数国民党左派外，大都是加入国民党

的共产党员。朱德把他们分派到军、师、旅、团里工作，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发展党员；同时又筹办军事政治学校，培训革命干部，对整个部队普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教唱革命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这首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在20军军营里到处传唱，激发了官兵的革命热情。这是当时四川军阀部队中最先开始出现的新气象。[33]

1927年1月，朱德转到南昌工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第5方面军总参议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在此期间，朱德亲自主办军官教育团，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并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注释：

①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9页。

②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第110页。

③汤明珠：《辛亥革命前后的朱德》，《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4年，第70页。

④《朱德回忆录》，第112页。

⑤刘学民：《朱德和他的老师们》，《传承风范》第1期（上），2008年，第19页。

⑥同上。

⑦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53页。

⑧同上，第54页。

⑨《朱德回忆录》。

⑩《朱德自传》。

⑪汤明珠：《辛亥革命前后的朱德》，《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4年，第71页。

⑫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92页。

⑬虞平：《朱德早期诗词及其思想历程》，《党的文献》第3期，2003年，第8页。

⑭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04页。

⑮《朱德同志与辛亥革命》，《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20页。

⑯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第380页。

⑰《朱德同志与辛亥革命》，《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24页。



⑱《朱德同志与辛亥革命》,《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25页。

⑲《朱德同志与辛亥革命》,《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28页。

⑳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第382页。

㉑宁漠·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119页。

㉒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第383页。

㉓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朱德年谱》第29页。

㉔《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㉕《传大的道路》，第150页。

㉖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第385页。

㉗《传大的道路》，第172页。

㉘《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

㉙《朱德年谱》，第38页。

㉚龙显昭等编:《朱德研究》，第159页。

㉛温贤美:《朱德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活动述论》,《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1991年，第27页。

㉜同上。

㉝温贤美:《朱德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活动述论》,《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1991年，第27页。

广东工团军、农民自卫军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工人运动就更加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起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并规定了开展工人运动的具体部署。一大结束后不久，党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随后，在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设立了分部，使工人运动在各地有组织地开展起来。接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进一步提出了党在工会运动中必须遵循的方针。在此前后，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劳动大会，提出劳动法大纲，推动劳动立法。

党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工作。国共合作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扶助农工是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之一，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说："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①]国民党一大后，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专理农民事宜"，指导农民各地运动。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扶助农民工作。共产党员林伯渠任农民部部长和中央农委主任。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决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决定派出农民特派员到广东省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县及广州郊区开展农民运动。这样，农民运动在广东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经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考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实际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共产党员彭湃、罗琦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担任所长。从 1924 年 7 月 ~ 1926 年 9 月共办 6 期，培养近 800 名毕业生。他们分赴各地，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有力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支援了北伐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通过改组后的国民党进行农运工作的同时，还单独开展了



大量工作，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当农民运动迅速发展之际，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到1925年5月，广东省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达21万多人。

1925年5月1日，阮啸仙、彭湃主持召开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通过了《经济问题决议案》、《农民协会今后进行方针决议案》、《农民自卫军与民团问题决议案》，以及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等多项决议案。会上，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均为共产党员），彭湃任委员长。执行委员会下设秘书、宣传、组织、经济、军事五个部，作为广东省农民运动的领导机关。广东省农民协会的诞生，统一了广东农民运动的领导，为广东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好了准备。它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把农民武装起来，建立农民自卫军，是巩固农会组织、保卫农村政权，发展农民运动的关键。第一支农民自卫军，是奉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的命令，于1924年8月由广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组建的。这支农民武装奉命移驻省署。担任警戒任务，成为“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始”。[2]到1925年春，广宁、海丰、花县、东莞、顺德、高要、普宁、曲江等县也都先后成立了农民武装组织。各地农军积极参加了镇压商团、讨伐陈炯明的斗争。农民协会的成立和农民武装的出现，把广东农民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到1926年5月，广东已建立农民协会的县达66个，拥有62万会员，农会领导的农民群众在300万人以上。

为了更好地领导农民运动，广东省农民协会于1926年1月决定将全省划为西江、南路、海陆丰、北江、中路、琼崖、惠州共7个区，除中路直属省农协领导外，各地分别设立办事处，具体领导所属各县的农民运动。这一措施促进了全省农民运动的普遍发展。在全省农会的领导下，广东农民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起来的农民，响亮地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口号。高鹤县农民在秋收季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运动；汕头市郊、海丰、陆丰等地农会开始实行二五减租。农民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五卅惨案后，广东农村有50多万农民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广东各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还有力地支援了省港大罢工。他们在沿海各港口协助严密封锁香港船只、截留英货日货。东江农民自卫军封锁汕头、平山、淡水等地，南路农民自卫军封锁虎门、澳门、深圳一带，断绝对香港的粮食供应，拒绝同英商贸易。广大农民

群众还自动捐款救济罢工工人，在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在《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决议案》中，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纲，提出："中国农民运动在南部及中部诸省也逐渐发展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的要求，应当列成一种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农民。""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因为"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同时，决议也指出：为了使农民革命化，把农民组织起来，当前提出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回收盐税管理权、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最为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决议还指出："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巩固我们党的组织。"[③]接着，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告农民书》，进一步明确指出："解决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主缴纳租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打倒军阀政府，革命的工农等得了政权，才能实行耕地农有的政策。在这之前，"为农民目前自救计"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农民应提出几项最低限度的要求，其中包括："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通选举法直接选举之，不得由绅士包办"；"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由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等等。文告还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奋斗，来解除自己所遭受的压迫和痛苦。[④]1926 年 2 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着重研究了即将开始的北伐与农民运动的关系，确定了党在这方面的方针，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构建工农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会议特别强调"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为此，会议还强调，"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⑤]

根据上述方针，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积极在农民中开展工作，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情况，也不断提出一些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主张和办

法。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工作，农民运动首先在广东，接着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旁及广西、江西、湖北等省的农村大革命。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注意对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发动与组织领导，把青年工作、妇女工作作为党的整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会议上予以讨论并作出决议。通过党的一系列工作，青年团、妇女会的组织和活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与工农运动一起汇成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洪流。

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势必提出农民武装的要求。因为，农民发动起来以后，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各项斗争，必然遭到具有武装力量的地主阶级和反动势力的反抗和镇压，因此，把农民武装起来，首先建立农民自卫军，成为巩固农民组织、包围农村政权和革命果实，发展农民运动的关键。海陆丰是广东农民运动最早兴起的地区，共产党员彭湃担任海陆丰县总农会会长，领导农民开展斗争。他还以为国民党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到农民斗争尖锐的地区，指导农民运动，并亲自参加了农民武装同地主武装的战斗。彭湃在领导海丰、广宁、花县等地的农民斗争中，深切感到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1924 年 12 月 5 日，他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补充报告》中说："广宁、花县及其他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并说，"从我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而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⑥此后，党的会议也开始关注农民武装问题。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中，总结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出："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另一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⑦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的《告农民书》中指出，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在广东帮助农民组织团体，经过不到一年，农民组成了协会的，有 20 多县，各处协会会员现在已经有 40 多万人，并有几千的武装自卫军和地主开了好几次战。"经过斗争，农民协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告农民书》号召农民进一步组织和武装起来："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的困苦与逼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

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8]

1924 年 7 月，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广州沙面工人为了反对沙面租界英国领事颁布的限制华人出入沙面的"新警律十二条"举行为时一个多月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成为中国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一个转折。沙面大罢工胜利后，1924 年 8 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州工人代表会决定成立工团军，从各工会中遴选出 300 名青壮年工人成立工团军。8 月 27 日，广东工团军在刘尔崧、冯菊坡等组织下正式成立，组成 30 多个分队，共产党员施卜为团长，刘公素为副团长，其任务是"辅助革命政府镇压反革命行动，尤其注重保护工人，防御海盗之侵略"，"各区团负责保护该区各工会之责，总队负责保护全市总工会之责"。[9]这是我党领导的历史上第一支工人武装。广州工团军在平商团、消灭反动军阀陈炯明和平定滇桂军阀杨、刘叛乱的斗争中，工人武装都发挥了作用。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工人斗争的实践和深入发展，也不可避免地把武装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形势，曾提出"武装平民"口号，以及"建立真正人民的武力，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主张，以反抗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压迫和屠杀。瞿秋白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中，分析五卅运动不能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指出其中之一便是"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他呼吁要"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10]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应当"有组织地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11]为此，会议还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军事部），以加强对开展军事工作的领导。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27 页。

②罗绮园：《本部一年来报告概要》，《中国农民》第 2 期（1926 年 2 月 1 日）。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398～399 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435～437 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47 页。



⑥《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86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37页。
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9日。
⑩《向导》第125期。
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04页。

全国学生总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学生运动日趋发展。

早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青年运动决议》中指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又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对于青年学生“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①]这个决议为青年运动指明了方向。

为了贯彻三大决议，部署团的工作，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会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之决议，本团愿努力协同中国共产党诚实执行。”[②]会议决定，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一样，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申明，团员加入国民党应仍然服从共产党和青年团各级组织的领导，在国民党中应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党在行动上保持一致。据此，一批团员和革命青年加入了国民党。通过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

在广东，青年学生运动比较其他省份的发展更为迅速和广泛。早在1923年6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为了广泛团结、教育青年、学生投入国民革命，正式成立了广东新学生社，成为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团组织负责人刘尔崧、周其鉴等任执行委员。广东新学生社，是广东青年、学生运动的主力军。它按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法规把革命青年组织起来，从事学校的革新和学生自治运动，为学生本身的利益而奋斗。该社设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白话剧社、旅行团、阅书报社等群众文化娱乐团体，还出版《新学生》，诱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和关心政治问题，诱导学生走革命道路，积极跻身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前列。新学生社在组织上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不仅扩展到广东省各县，而且扩展到省外。福建的厦门、



福州、广西的容县，都有了“新学生社”的组织。

在国民党改造期间，青年团和共产党员混合组成国民运动委员会，决定行动方针。他们深入到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去，采取不出风头，不争名列，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小事忍让，原则问题决不退让的方针，与国民党员合作共事，也取得了那些明了大事的国民党员的信任和赞扬。

为了统一学生运动，1924 年 2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之学生党员合作，集中努力于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社要极力扩充到各县镇地方。”[③]3 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改组“广州学生联合会”[④]，选举了学生联合会新的执行委员会，其中新学生社社员蒋世明、杨石魂、周文雍等 10 多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组成了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力量。同时执委会也选举了各派组织和教会学校的学生代表，使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会发表了改组宣言。指出：“处在今日双重压迫底下的同胞们，唯有全体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设真正民主完全独立国家，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⑤]从而使广州学生运动树起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旗帜，实现了广东学生运动的统一，广东学生运动出现了新局面。

在广州学生运动发展的同时，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也开始复苏。在全国性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运动中，广大青年学生成了各地反帝大联盟组织的先锋和积极成员。

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生运动的发展，1924 年 8 月 4 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北京、广州、上海、湖南、山东等 17 个省市的代表出席了大会。恽代英、施存统等人在会上作了演讲。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收回关税权、司法权和教育权的要求。并指出，为此目的必须努力于打倒国内的反动军阀，联合世界革命的势力，跟随国民革命先锋队之后，为民族的独立而奋斗。此外还提出反对反动的和专制的教育；要求一切学生的活动都归学生会办理；学生会要干预一切与学生有关的问题，要引导学生做各种社会活动等等。这些主张表明，青年学生已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把青年的利益和要求与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联系起来，青年学生运动已纳入了国民革命的轨道。

10 月 10 日，上海市民召开国民大会，全国学生总会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高呼“我们当反对一切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遭到国民党右派的阻止。上海大学学生则赞成这个口号，纷纷上台据理力争，受到流氓殴

打。许多学生在7尺高台上被推下来，致使受伤者10余人。其中上海大学学生黄仁因伤势过重，次日去世。上海大学学生会于10月15日通电全国，指出："黄君之死，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为反对军阀而死，为党义而死，为谋全国人民之利益而死。"呼吁："我同胞从速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作猛烈之总攻击"。[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黄仁同志之死》一文，痛斥国民党右派的暴行，指出：黄仁之死，是死于他拥护对于时局的政治主张，是死于国民党反革命的右派党员童理璋、喻育之之手。号召全国青年"替这位模范青年伸冤复仇"，"继续这位模范青年的未竟之事业。"[⑦]

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要求收回教育权，是这段时间青年、学生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早就利用基督教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调查会的报告："耶稣教设立小学、中学，全国合计约6 890所，学生19.9694万人。更加专门以上及其他学校，计7 000余所（以南京、广州、上海最多），学生共20.5万余人。"此外，天主教会所办学校学生总数约14.43万余人，合计约35万人。[⑧]

帝国主义者无视中国教育主权，在华所办的学校既不向中国政府注册，也不许中国教育机关过问，一概由他们自行规定教育宗旨和课程，推行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他们打着"不过问政治"的幌子，对学生的活动严加控制，引导学生"闭门读书"，漠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如南岭大学的美国人说："此是教会学校，只可宣传宗教，不许谈论国事。"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也对学生说："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⑨]他们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极力灌输崇洋媚外的思想，妄图培养一支为其侵略政策效劳的奴才队伍，做他们统治、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国共合作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越发加紧了。因此，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地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高涨起来。1924年4月间，广州"圣三一"学校首先掀起了反对教会教育的怒潮。"圣三一"学校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学校对学生行动的控制和思想的麻醉很厉害。该校一些进步学生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学校当局的反动措施十分不满。为了同学校当局作斗争，他们酝酿串联组织学生会。但是，学生的行动遭到学校当局的阻止。校方肆意剥夺中国学生



的集会结社自由，激起了学生的义愤。4月初，学生宣布罢课。

中共广东区委得知“圣三一”风潮后，认为这次风潮的目的不仅在于组织学生会，更主要的是推动其他教会学校学生一致行动起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斗争，发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国民党积极支持学生群众的斗争。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长廖仲恺、组织部长谭平山亲自接见了学生代表，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和鼓励。廖仲恺说：“帝国主义好比强盗，不平等条约好比是绳索，强盗抢了我们的东西，又用绳索把我们四肢缚住，使我们动弹不得。”“我们想得到自由，就要把象绳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尤其是要把帝国主义强盗打倒；打倒帝国主义，然后祸根乃除。你们所做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做得很对，做得很好。你们要坚持下去，一定得到胜利。”[10]

4月9日，学校当局不但不肯接受学生的正义要求，反而采取高压政策，无理开除了3个学生，从而引起了更大的愤怒。学生先后2次发表宣言，揭露当局的阴谋和罪恶。第一次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学校的目的，是要把中华民族变成“头脑简单、奴隶成性的民族，任他们宰割。”宣言最后提出“争回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教育，争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等战斗口号。[11]第二次宣言，向学校当局提出三个要求：“一、收回被开除同学；二、校长污辱中国，须向学生谢罪；三、不得干涉学生集会结社。”[12]4月26日，学生还派出代表赴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政府“对于此种奴隶教育严加取缔。”[13]接着部分学生发表了退学宣言，宣布脱离“圣三一”，誓死不愿多受一日的奴隶教育。他们在广东区委和革命政府的帮助下，纷纷转学于广东大学、广大附中和执信中学。在青年学生的坚决抵制下，“圣三一”学校也不得不停办了。在“圣三一”学校学生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广州另一所教会学校“圣心”中学也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斗争。

广州教会学校学生反对奴化教育的斗争引起了全国各地教会学校学生的共鸣，他们也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同学校当局作斗争。例如，徐州教会学校培心中学学生进行了对该校校长玷污中国人的斗争。南京的明德、福建的协和、长沙的雅礼、醴陵的遵道、汉口的博学、重庆的广益、开封的汴济等学校学生都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要求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为了指导全国蓬勃发展的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的活

动，同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大同盟"，并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关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出版"非基督教特刊"指导和联络各地的运动。随后，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山东、江西、甘肃等省也相继成立了同样的组织。同年 12 月"圣诞节"前，为了进行反对基督教的宣传，《中国青年》社与上海反基督教同盟会合编出版了《反基督教运动》小册子，里面刊登了蔡和森、朱执信、杨贤江、恽代英、李春香、梅电龙等人的文章，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基督教会的种种罪恶，指出帝国主义者的传教活动只不过是他们侵略中国的一种手段，各种传教士则是征服殖民地的"先驱"。《中国青年》还提出，要在圣诞节前后，作为全国反基督教运动日，号召广大青年在各种地方，借各种机会，公开宣传，努力扩大反基督教运动。

在各地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空前的、规模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广州市参加运动的青年群众达数万人，他们组织示威游行，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者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从事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除广州外，上海、长沙、武汉、济南、苏州、九江、徐州、绍兴、太原、宁波等地也都进行了类似的活动。

为了使这场斗争能够深入持久的进行下去，共青团[14]第三次代表大会还专门做了《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提出共青团应设法发展非基督教同盟与全国各地，规定每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前后一周为"反基督教周"。每值此周和每个基督教节日都要深入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揭露教会、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开展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引导教会学校学生进行革新校务和收回教育权，取消教会学校的斗争。

这次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要求收回教育权的斗争，由于帝国主义者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仇恨，以及缺乏斗争经验，未能把正常的宗教宣传活动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区别开来，因而提出了一些不恰当的口号。但这次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猖狂气焰，揭露了他们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提高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觉悟，发扬了团结战斗的精神，为以后投入更大的斗争做了思想准备。

注释：

①《反帝国主义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运动》，《东方杂志》第 21 卷，第



16 号，140 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 119 页。

③《1924 年 2 月 22 日～4 月 1 日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 88 页。

④广州学生联合会的前身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广州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在五四运动时期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但当时组织很涣散，一些领袖人物标榜“不问政治，只管外交”，以“联络感情，切磋学问”为宗旨。而且教会在其中占有很大的势力。这种情况显然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⑤《粤学生改组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4 年 5 月 4 日。

⑥《国民日报》1924 年 10 月 17 日。

⑦《中国青年》第 50 期，1924 年 10 月 18 日出版。

⑧梅电龙：《基督教与中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一）第 526 页。

⑨《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向导》第 72 期。

⑩《广州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76～177 页。

⑪《广州“圣三一”学生宣言》，《向导》第 62 期。

⑫《“圣三一”学生第二次宣言》，《向导》第 67 期。

⑬《粤“圣三一”学生呈大元帅文》，上海《国民日报》1924 年 5 月 4 日。

⑭1925 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4年前后，国际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稳定局面。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终于度过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困难，取得了经济建设和外交战线的重大胜利，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的国际地位更加巩固，从而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与此同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却遭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镇压，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在暂时摆脱战后经济、政治危机之后也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社会主义苏联的稳定，为中国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暂时稳定，增加了中国革命的困难。

这时，在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北洋军阀继续混战，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更加深重。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进一步迫使中国人民团结自救，英勇斗争，中国革命正处于新高潮的前夜。

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罗文虎、彭述之、刘清扬等人出席了大会。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从资本主义世界有可能出现暂时稳定这一情况出发，提出了共产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化”问题，要求在共产党活动的一切方面体现布尔什维克原则，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大会要求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大力发动群众，使统一战线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同上层谈判时，共产党必须坚持彻底而绝对的独立性。

曼努伊尔斯基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共产国际有关国共合作的政策，明确指出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并告诫中国共产党人既要防止“左”的又要防止右的倾向。他说：“最近，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有一种倾向，希望建立带有比较激进的反帝纲领的工农党，特别是在爪哇；在中国建立了国民党”。他指出：共产国际“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而且我们知道，这批党员在这个党内的活动推动了它走上更加坚决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道路。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最近一次在中国共产党中央



全会上，参加革命党的那些同志的活动，因‘阶级合作’而受到严厉批判。这样，我们各支部就要遇到双重危险：一种危险是虚无主义地忽视东方革命化这类的新现象；另一种危险是丧失独立的阶级面貌。离开无产阶级立场而滑到同小资产阶级庸俗合作的道路上去。”①

李大钊在会上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政策。他说：“在帝国主义列强无耻行径不断出现的同时，以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民族运动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同志正在领导这一运动。……我们党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密切联系群众。”②最后，李大钊明确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反动势力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而遇到一些困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③

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工人运动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以及孙中山的患病与逝世，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不断加剧，国民党右翼势力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内部对新形势下所应采取的国共合作策略进行了讨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向共产国际陈述自己对国共合作策略的看法，斯大林也在多次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25 年 2 月 14 日，鲍罗廷在写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孙中山患病，国民党内部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党的前途的争论。他认为国民党左右两派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报告中提出：“我们认为不分裂是不行的。我们甚至准备在共产党员问题上向他们作出让步，譬如说，既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或政治委员里惹麻烦，我们准备召回这些党员，中央机关里没有共产党员，我们照样可以生活得更好。”④

维经斯基也有同鲍罗廷相似的看法，他在《中国革命运动的趋势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也主张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左派“作某些让步”，以消除国民党右派反共宣传的影响，并从国民党内部清洗一些声名狼藉的右派。同时，他希望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让步，“在即将召开的国

民党中央全会上左派领导人将决心与国民党右派决裂，而不是和共产党人决裂”。[⑤]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此时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工农群众和年轻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转到中国劳动群众方面来，一起反对大商人和封建地主。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虽然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绝不能认为是好的，但我们仍不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全面地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利于尽量广泛地推动反帝运动”，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深入城市工人群众”，以加强工人运动，取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

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此时已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分歧日趋尖锐，右派对国民革命的危害日益增大。他说，在广州地区，“由于农民反对地主和富农，国民党右派日益同农民发生直接冲突，与此同时，由国民党左派组成的政府却主要依靠农民群众进行反对陈炯明将军的斗争。”当国民党从整体上说还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就已公开采取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路线，指责共产党和一些国民党左派把人民运动纳入了布尔什维克和苏联的影响之下，把斗争的重点指向了他们。”因此，维经斯基认为，“国民党内在社会关系上同反民族主义分子有联系的纯资产阶级派别正逐步形成”，右派的目的，就是要把国民党变成“纯资产阶级政党”。[⑥]这时，维经斯基已隐约看到国民党内斗争的结局。他告诫说，国民党右派的力量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反对革命运动方面“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一旦分裂”，整个反动势力都会站到他们一边。所以，他认为对右派应有所提防，并建议采取措施使右派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

可见，这个时期维经斯基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掌握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联合国民党左派，从而形成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强大势力，促使国民党中派左倾，独立国民党右派，并使右派分裂出去，通过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的办法来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

斯大林在1925年5月9日向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所做的关于第14次党的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报告，以及同年5月18日在庆祝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庆四周年大会上所作的《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报告中提出，当时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有3种类型：第一类是摩洛哥这样的国家，在这类国家中工业落后，没有或几乎没有资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设法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第二类是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发



达，只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第三类是印度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有人数较多的无产阶级。他说："在埃及和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而执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接着，斯大林进一步指出，"这个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像国民党这样的工农党的形式"，而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⑦在斯大林看来，国民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形式，国民党同时又是"工农党"。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在一起，因此，斯大林认为对他的方针是揭穿其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在他看来，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由于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共产党应当通过国民党对革命运动进行实际领导。

为了总结五大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事国民革命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中共中央继1925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同年10月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半年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基本方针是巩固和扩大左派，打击右派。在这次扩大执委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决议案》、《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肯定了无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动力，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分化已日益明显，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吸收农民参加革命；确定了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同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大力支持左派同右派斗争。会议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制定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从而为发展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策略。1925年12月《共产国际》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的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扩大执委会"对全国政治形势所作的分析，正好说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开始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另外，对军阀作用的认真估计，以及所应采取策略的确定，都表示这个党越来越成熟了"。关于国民党，这篇社论说："今天，共产党的组织问题之一是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紧密的联盟。并且利用这个联盟的发展加强同广泛的民主阶层的团结。"⑧

在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之前的东方革命问题》的另一

篇社论中，共产国际描绘了“一幅异常复杂的中国画面：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伴随着激烈的内部斗争和各阶层结构的改变”。在这篇社论中，共产国际具体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了这样的策略路线：

“在长期的政治交往中，共产党应该通过经常性的影响把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同盟者引到民族自决的道路上来。”

“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人民党，为了取得革命民主政权，他必须容纳城市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主要阶层。”

“在国民党右派不可避免地组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时，一定要把小资产阶级留在革命阵营里。”

“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在各方面支持国民党的行动，但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宣传和独立行动的自由。”⑨

这篇反映了共产国际观点的社论还指出：

“面对着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必须一方面通过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以对付这种危险；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利用资产阶级的各阶层，以进行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斗争。”⑩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斗争，孤立国民党右派，揭穿它们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直至把他们清除出国民党。

第二，为了孤立右派，清除右派反共宣传的影响，共产党要作“某些让步”。

第三，目前，共产党可以通过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形式领导中国革命，但必须加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国民党由于有共产党的参加，将来可以发展成为“工农党”。

共产国际提出的打击右派、扩大左派、团结中派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国际试图改造国民党，改变它的成分和性质，使之发展成为“工农党”，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这种设想对国民党内部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能量估计不足，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国民党这块阵地；另一方面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把国民党中派也当成左派，作为依靠对象。这种盲目乐观的看法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1925年12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第137期发表了《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把胡汉民、蒋介石、吴稚晖等人都看成国民党左派领袖。其实，胡汉民、吴稚晖这时已成了右派，蒋介石只能算是中派。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提出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中国共产党可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临时联盟，而共产国际关于"工农党"的提法不仅认为共产党可以同国民党合作，而且认为这种合作有可能改变国民党的阶级属性。这种提法显然是出于对国民党内左派和中派的过高的估计。除此之外，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等人提出的放弃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决策机关中的地位来换取国民党左派同右派斗争的策略，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时共产国际实际上并不是向左派让步，而是向国民党实权派，即所谓的的中派让步。共产国际试图通过让步来取得国民党实权人物的支持并换取他们对右派的斗争，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注释：

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②同上书，第90～91页。

③同上书，第92页。

④乌里扬诺夫斯基：《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俄文版，第281页。

⑤维经斯基：《中国革命的趋势与国民党》，《共产国际》第3期，1925年，第154、155页。

⑥贾比才：《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⑦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4页。

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共产国际》杂志1925年12月，第8页。

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之前的东方革命问题》，《共产国际》杂志1925年12月，第1243～1244页。

⑩同上书，第1241页。

第一次中央执委扩大会议

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国民革命运动内部各种进步势力，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于1924年2月召开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其态度决议案》。针对当时一部分共产党员存在着瞧不起国民党、不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共事的错误倾向，《决议案》提出了批评，要求共产党员主动和国民党员搞好团结，共同前进。对广大国民党员要"要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逐渐转变他们的态度"；"即对他们中间的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在国民党内，则应起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国民党开会时，我们的同志均应按期到会，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我们的同志均应努力工作"。"使其真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真成为三民主义的党"。[①]全会还决定安排一部分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任职。但"必须选择能干而且适宜于国民党某种工作的同志"。[②]全会的这些决定，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积极负责精神和同国民党合作的真诚态度。

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年幼的党，对于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没有经验。因此，三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案明显地存在着缺点和错误，表现在：第一，《决议案》虽然指出国民党员中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人，但对他们却没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而是不问其政治态度如何，都一概采取"扶持"和"联络"的方针，甚至对那些"极腐败分子"，也只是"敬而远之"和尽量避免"冲突"的态度，不敢对他们的反动倾向进行斗争。这种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方针，无助于克服国民党内早已存在的消极因素。第二，《决议案》提出"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活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③]这也实际上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错误观念的翻版，这样导致了放弃共产党



的独立性，模糊了共产党的旗帜的严重后果。

但是三届二中全会的执行，也收到了许多积极的成果。例如，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恢复和发展了工人运动，使一些在“二七”惨案中被摧残的工会组织得到了恢复，农民运动也得到了发展。全国各地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也表现出一些右的倾向。由于强调帮助整个国民党和避免统一战线内部的分歧而忽视了对国民党内客观存在的右派势力的斗争，造成了妥协退让局面；由于集中力量于国民党工作而忽视共产党工作，许多的问题都由国民党来解决，共产党的组织活动陷入了停顿的状态，以至于党员的训练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等重大的事情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集中力量于国民运动而忽视了工人运动，在有些地方出现了以国民运动取代工人运动的倾向。如广东的工人运动在这段时间内，完全纳入了国民运动的轨道，其他地区的工人运动也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停滞的局面。

国民党一大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继国民党中央党部改组之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使国民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渐渐形成起来，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黄埔开办了国共合作的军官学校，开始为革命培训大批军事骨干，这些都预示着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实现5个月来的工作，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克服三届二中全会以来党内日益普遍的右倾思想，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1924年5月10日~15日，党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10人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陈独秀代表中央局作的工作报告。中央局的报告分组织、宣传、政治运动、劳动运动4个部分。报告首先提出了党对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一、向左倾分子宣传，使他们左倾观念坚固不至动摇；二、向国民党员中的工人学生宣传，使之左化；三、努力介绍革命分子进国民党，以增加左派的势力；四、向社会广泛的宣传反帝国主义，以迫使国民党全体左倾。接着，上海、汉口、湖南、北京、山东等地委或区委在会上分别报告本区党务、国民运动、劳动运动、学生运动等方面的情况。此外，湖南区报告还附有安源地方报告。会议通过了《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及《共

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S. Y. 工作与 C. P. 关系议决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等文件。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和确定的问题如下：

一、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本身不能集中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检讨了过去党在国民党的工作偏重于组织，甚至于大部分中央执委都到国民党中去工作，而党的会议停止，有许多问题拿到国民党中去解决的错误，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组织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之危险。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指出，国民党内的一大部分党员的阶级利益与劳动平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国民党内必然会出现左右派之争，而中国共产党又是国民党左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党当前一方面要"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另一方面，"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为达到上述目的，党规定了如下指导方针：1. 经常不断地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当前"宣传更重要于组织。""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的有规划的宣传，'宣言'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决不能先要求国民党数量上的扩大，而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为此，"必须我们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宣传部"。2. 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产业工人要赞助国民党左翼，同时反对国民党右派思想对工人的影响。3. 应当使"国民党的宣传政策注重反对帝国主义"。4. 应当使"国民党特别注意军队里的宣传。"5. 使国民党注意去调查国民党势力与北部及中部的地方势力相结合的问题。6. 应当要求"国民党实行废除额外苛税并禁止大地主对于贫苦佃农之过分的剥削。"

二、工人运动新的责任问题。会议认为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虽少，但这些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只有联络这些工人，党才能发展政治上的势力。《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指出："党的最重要的责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因此，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应当注意铁路工人、矿工及海员。"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最好的帮助是，"先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必要时"指挥这些工会赞助国民党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为开展工会运动，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委员会的工农部内均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同时"党应当竭力介绍同志到国民党的工人里去工作，以便通



过对国民党的工人部影响从而使阶级斗争的发展筑成统一的工人战线。”

三、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和党与团的关系问题。由于忙于国共合作，忽略了党的自身建设，如组织发展不快，领导力量缺乏，党员训练不够，国共两党区分模糊等。《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在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内工作，“党更要有非常之明显的组织形式。”“我们的职任，便在于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使党不但成为“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唯一组织。”并且决定在中央、区、地方各级委员会，都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认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还要设一个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会议认为，过去不清楚党与团的关系，检讨了团的工作和党的工作未能分开的缺点及其原因，并从年龄、职责、工作范围等方面的政策规定，明确了青年团的责任。

四、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会议重申了党的三大决议中指出的农民群众是国民革命最有力的动力。但由于党缺乏经验，只确定了许多口号，如组织农民自卫军，反对苛税杂役、反对预征钱粮、反对土豪劣绅及苛租等。同时强调：“中央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并要求“国民党做经常的有规划的农民宣传。”会议要求在兵士中宣传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在中国北部及中部的军官学校中建立党的组织。

会议要求全党同志即刻努力执行各项议决案，同时如有疑义及实施方法，亦可向中央局充分讨论。

这次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对国民党的工作有了正确的答复，就是应以宣传工作为主，组织工作次之。同时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分开，也就是把共产党的组织独立起来。这就使党认识到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性。第二，明确认识到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党的根本工作。所以，“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第三，纠正了党和团的关系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到青年运动也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此外，开始注意农民运动。

总之。这次会议通过对三大决议案的审查，使党对三大决议中的偏差与不足有了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相应的纠正措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全党对国民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国民党左派力量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为党的四大的召开做了必要的准备。但是，这次会议

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如限制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没有提出“耕地农有”问题等，这反映了党的认识幼稚和经验不足。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81～184页。

②同上书，第183页。

③同上。



关于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问题的讨论

气势磅礴的国民革命，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课堂，使他们学到了许多新鲜的经验；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摆到面前，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的广泛传播，党的理论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明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来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迅速掀起全国革命高潮。在这场全国大革命风暴中，各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势力都在革命历史舞台上，进一步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各自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统一战线中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主义出现，说明了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尖锐化。在这各种思潮极其尖锐的斗争中，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投身到批判各种反动思潮的伟大斗争中。在斗争中，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索，要求他们在理论上对国民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领导权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等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

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做出了初步阐明。在四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上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和进一步阐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四大之前，1923 年 2 月，瞿秋白即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并且指出，“落后的国家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须无产阶

级领导方能胜利”。[①]1924 年 2 月，李大钊指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②]同年 7 月 1 日，李大钊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介绍中国情况时说：“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反动势力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而遇到一些困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③]这表明，李大钊已经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必须在实际斗争中争取革命的领导权。

依据国共合作后从事实际斗争的经验，从 1924 年 10 月以后，党的主要刊物连续刊登了一系列探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文章，专门论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邓中夏在 1924 年 11 月发表的文章中就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因为“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④]值得注意的是，邓中夏认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争夺领导权不能只局限于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他明确提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全部的取得。”他强调指出：“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参加政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之中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权“欲为准备”。[⑤]这种认识，在当时来说很可贵的。

1925 年 12 月，毛泽东在首次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逐一作了分析。他在文章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却能成为革命运动主力的原因何在？毛泽东写道：“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希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⑥]

当然，从主要倾向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此时心目中的“领导权”还只是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⑦]对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具体目标还缺乏



清醒的认识。

1925年2月，邓中夏明确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无产阶级要取得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加强对农民斗争的领导。他说："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积极参加，哪有希望?"他认为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系统地帮助并且联合各地农民逐渐地从事经济和政治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⑧

五卅运动中，上海等地由于农民没有大规模起来斗争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和广东因有农民的支持而使工人罢工斗争得以长期坚持的事实，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地位的重要和工农联盟的意义，开始改变党的"三大"把无产阶级政党在群众运动中的独立性仅限于工人运动的认识，提出了在农民中独立地进行宣传和开展支部工作的任务。

毛泽东从1925年起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他在总结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精辟地指出：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解决贫农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他高度评价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说："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革命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⑨

在中国无产阶级中，买办资产阶级是反革命势力，而小资产阶级基本上属于革命动力的范畴，只有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态度最为复杂。在党的"二大"、"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初步指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但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复杂问题。

在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最初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并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它又妥协动摇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这场运动中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它的阶级特性进行较深入的剖析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五卅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

停留在理论上的阐述，还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五卅运动后，以工农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逐步走向高潮，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大大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认识。

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中国资产阶级所作的精辟分析，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杰出典范。毛泽东指出，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还敏锐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有右翼和左翼之分，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这些分析表明：中国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同盟军。国民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必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但也要时常提防可能发生的事态，提防它扰乱我们的阵线。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这时已认识到，当时进行的国民革命，已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与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与中国“辛亥年的革命”的“性质也不相同”。[⑩]毛泽东明确指出，欧美各国及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是建设资本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⑪]在中国，企图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只能是一种幻想。

关于国民革命的对象，早在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肯定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军阀是我国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



号。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广泛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后，“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时期——实行国民革命时期”[12]，各反动阶级的嘴脸已暴露无遗，也使人们对他们的面目有更明确认识。

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阶级的“领袖”[13]，为灭亡中国，扶植封建军阀“无所不用其极”[14]。五卅运动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进入“革命行动时期”[15]，共产党人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进攻的既统一又矛盾的特点和策略，指出：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为维护他们在华的共同利益，常常联合起来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现出“侵略中国和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致的，无论他们是先进的帝国主义（如英国），或后起的帝国主义（如日本）”[16]；另一方面，又为各自的利益“冲突得非常厉害”[17]，表露出他们之间的矛盾。但，不管其面孔如何，不要为其“假仁假义”所迷惑。帝国主义采取：“一、以炮舰威吓广州——香港沙面罢工的策源地；二、传播谣言，使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隔离；三、勾结奉系军阀，压迫上海、青岛、天津罢工运动和上海禁止学生检查英日货……”[18]等恶毒政策，以实现扑灭中国革命运动，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不打倒它，“共管亡国之祸，即在眼前”为增强反帝斗争的信心，还告诫人民说：帝国主义并不可怕，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这只纸老虎，已被“我们看穿了”，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罢工实力的宏大”；也是因为“各处的殖民地，亦迭起革命了”[19]。这是十分杰出的反帝斗争的战略思想。

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工具，又是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20]。他们“比满清贵族更加丧失了好几倍的独立性；他们的存在和统治已经不能不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21]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肆无忌惮地禁止检查敌货、封闭工会、破坏罢工、镇压群众反帝运动，甚至屠杀爱国者。“国内军阀和国外强盗互相勾结”，“使中国人民永远陷于两重压迫之下，莫由自拔”。[22]

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反革命私生子。这些大商、买办，既和“军阀有深厚关系”；又“受外国资本的操纵”[23]。毛泽东指出：“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属，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即附属于帝国主义”。[24]买办阶级专赖“吃外国饭而生存”，靠“帮助帝国主义侵略，方能发展自己阶级的利益，牺牲中国

平民的血汗而自利。”[25]“帝国主义者，于满清遗孽的封建军阀之外，便又多了一种侵略中国的工具。”[26]

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是帝国主义之“附属”，是帝国主义榨取和掠夺中国财富之“唯一坚实的基础”[27]，帝国主义和军阀对广大农民的统治和剥削，“全靠那些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因此，乡村宗法封建阶级是“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

反动的知识分子是上述反动阶级的“附属物”，“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是“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国民党右派，“一方面勾结军阀，一方面依附帝国主义”，是反动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是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提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因为“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这是对中国革命对象精辟的论断。

中国共产党四大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已初步形成。这个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向前发展。

但是，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政治上还不成熟。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的阐发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明确、不完善的地方。随着历史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不断被认识，后来终于由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提炼概括，形成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注释：

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第55页。

②李大钊：《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8页。

③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同上书，第780~781页。

④邓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

 

⑤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25年5月），《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0页。

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见《革命半月谈》1925年12月。

⑦瞿秋白：《论中国革命之三大问题》，见《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

⑧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见《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⑨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8页。

⑩毛泽东（子任），《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见《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0页。

⑪瞿秋白：《五卅运动后反帝联合战线的前途》，见《向导》第125期。

⑫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见《政治周报》第4期。

⑬邓中夏：《外舰压迫粤海关事件》，见《新建设》第1卷，第2期。

⑭瞿秋白：《五卅运动后反帝联合战线的前途》，见《向导》第125期。

⑮《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野蛮残杀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见《向导》第117期。

⑯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见《向导》第128期。

⑰陈独秀：《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见《向导》第126期。

⑱邓中夏：《北京政府最近一打借款卖国案》，见《新民国》第1卷，第3号，1924年1月。

⑲邓中夏：《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各界联席大会上的讲话》，《工人之路》第101期，1925年10月。

⑳毛泽东：《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丛刊》，1926年9月。

㉑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见《向导》第128期。

㉒瞿秋白：《五卅运动中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见《向导》第129期。

㉓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见《中国农民》第1集，第2期。

㉔同上。
㉕双林：《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个功绩》，见《向导》第107期。
㉖毛泽东：《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丛刊》，1926年9月。
㉗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的主张

早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前，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就已开始萌芽。[①]1922 年 6 月，陈独秀从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出发，断定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族主义的斗争；第二段是兴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斗争。而第一阶段的斗争，是中国人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上至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劳苦群众也都应该加入，因为这一段民族主义的斗争，乃是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取得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不但能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由幼稚到强壮的唯一道路。[②]要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③]可见，在这里陈独秀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强调了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号召人民积极参加这一斗争，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后来党的“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基础。但是他又认为此时无产阶级还处于萌芽时代，为他们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时期还未到来，所以第一阶段只能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斗争的前途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党取得成功，这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最早表露[④]。

党的“二大”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二大”制定的《工会运动和共产党的决议案》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决议案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工人运动，要使最进步和最能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伴随着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从资产阶级掠夺中解放自己的奋斗同时进行，从而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并影响到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促成部分军阀的“左倾”，他们高唱要“优待劳工”。对此，我们党抱有

乐观的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马上成功”。[5]陈独秀从中也受到鼓舞，改变了他过去对资产阶级的看法和“二次革命论”的提法。在1922年9月20日他发表的《造国论》一文中说：“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扰乱以后，无产阶级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发展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6]当时他满怀信心地号召：工人阶级应该站起来做打倒军阀官僚改良政治的急先锋，要比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要加倍勇敢地前进！中国共产党应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因风造雨，组织国民军，进行有系统、有计划、有训练、有纪律的暴动，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立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然后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7]陈独秀的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在当时能认识到这种水平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必将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很遗憾，他经受不住挫折的考验，“二七”罢工失败后，他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重新回到对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上来了。[8]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使陈独秀认识到依靠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是不能打倒封建军阀的，打倒军阀必须做到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9]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国民运动统一于谁？是统一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陈独秀此时认为后者是进行革命的领袖。他说：“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如此做法只有使革命势力分散不能集中，只有使北洋军阀延长生命。”[10]这时的国民党还没有改组，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革命势力集中于国民党，就是主张国民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此时他虽然也



强调在国民运动中，劳动阶级不但是重要部分，而且已经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但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工商阶级更应该站在指导地位。1924 年 3 月 25 日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使之理论化、具体化、公式化和明确化。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其结果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11]并由此得出民主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来参加和领导，无产阶级虽然具有革命的实力，在民主革命中占重要部分，但他并不是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只是民主革命中联合的对象，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才是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所以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2]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陈独秀更进一步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贬低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都很幼稚，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更是不用说了。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小，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虽然也很幼小，但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13]既然资产阶级的力量大过无产阶级，国民革命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站在革命的领导地位，而无产阶级是被领导地位，国民革命的成功，自然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到那时无产阶级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至此，"二次革命论"开始形成。但此时还是一种不定型的理论，并没有贯之于国民革命过程。[14]

随着 1924 年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恢复和发展了它的三民主义，在全国各省市帮助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并把国民党和新三民主义的影响扩大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中去，力争使国民党向"群众性的人民政党转化"，[15]从而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在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发展组织的同时，共产党的力量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国民党各省的党部都是共产党帮助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各省党部的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我们有 10 人担任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并担任了几个重要部的部长，掌握了国民党内很大一部分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站在了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不仅如此，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也获得长足的发展，工人运动由沙面大罢工发展到全国范

围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农民运动由广东一省发展到江西、湖南等多省，并且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农民武装和农民革命政权，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高潮。我党力量的壮大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且也直接危及到国民党内一部分地主买办和军阀官僚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于是他们群起而攻之，反对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执行三大政策，甚至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背叛革命。先是商团叛乱，继则是刘杨谋反，最后是国民党右派的公开分裂。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陈独秀也改变了对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看法，但他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924 年 5 月 18 日，陈独秀在《国民党与劳动运动》一文指出："就国民党革命的战斗力上讲，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情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于革命性，这些情形在各国都没有例外，中国劳资两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更是眼前的明证。因此，国民革命若没有最具有革命战斗力阶级起来奋斗，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运动，中国国民之解放运动是不能成功的"。[16]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分析了各阶级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次国民运动的政治表现之后得出："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中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地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17]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时，虽没有使用"领导者"这个词，而是用的"主力军"、"督战者"。如果不是死抠字眼的话，那么所谓"督战者"显然就是领导者的意思。但是陈独秀在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却过于贬低了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是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同站在一条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上。为了支持他这种观点，他把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独唱的舞



台。”[18]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革命过，现在也不会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文中，他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有些是帮助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地参加奋斗，绝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五卅运动后，中国资产阶级就被看成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了。“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其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19]陈独秀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他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过分夸大了其不革命性的一面，结果把整个资产阶级都看成是反革命的和不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是唯一天然领导者。这种观点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极其不利的。事实上，资产阶级虽有妥协性，但这时并没有从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而且正在极力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不去斗争，不去争夺，领导权是不会获得的。随着五卅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威胁，便和军阀反动势力相勾结，组成反赤大联盟，压制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中国工人运动暂时陷于低潮。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及其后的“整理党务案”，用政变的形式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可是陈独秀认为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右派大部分还未加入帝国主义的反赤运动，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已经分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民族运动的反赤运动两大联合战线的营垒，孰胜孰败，乃关系到中国的盛衰存亡。在这紧急关头，他提出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用民族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放弃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认为“统一革命的势力，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原则。国民政府及国民军，虽然有了一些右倾的错误，在客观上终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及破坏军阀势力的力量，他们若能得着苏俄及全世界赤党、赤色工会更有力的援助，他们是能够为各阶级革命的民众扩张地盘的。”[20]但是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并不是没有一点预防，在《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新右派，无论和左派在同一个组织与否，都是中国民族革命之障碍，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是他的阶级性，不独中国如此，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中国民族革命所需要的国民党，以富有这个阶级性的成分越少越

好。”[21]在一定程度上他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但是这时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已经复活，牢牢束缚着他的头脑，使他无法冲出这一禁区。在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他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乃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我们应该明了现时中国革命，毫无疑义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做中国革命运动的社会力量中，不是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在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为民族运动中之重要部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不过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暴露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与敌人合作，他们不能革命到底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因此，我们此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应该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以防其将来之妥协；一方面极力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促进资产阶级之革命化，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22]陈独秀看到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预见到和资产阶级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并提出了要和资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但他所采取的策略不对头，不是用努力扩大和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去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而是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地位，并且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群众（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使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23]来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争夺革命的领导权，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并且为了拉住小资产阶级，不吓跑民族资产阶级，他甚至放弃和否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说什么“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24]至此，“二次革命论”最后得到完善。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又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实践，放弃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农民群众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由上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是他导向“二次革命论”、导向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本原因。1925 年 9 月，陈独秀虽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固然需要民主政治，“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绝没有欧洲 18 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25]由此可以看出，他已经朦朦胧胧地观察到 18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差异，但是他没有深入地研究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他不了解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陈独秀的认识水平在当时共产党里有相当代表性，它是党的幼稚性在革命理论上的一个主要表现。[26]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研究这一问题，绝不是求全责备于先人，而是为了正视历史，正确认识革命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辛道路之曲折。时下新一代领导集体正在建设一个能顺应时代要求、能最大限度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宏图的过程中正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尤其需要新的、科学的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导[27]。因此，党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应成为必不可少的借鉴。

注释：

①李永旷：《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探析》，《探讨与争鸣》理论导刊第 1 期，2006 年，第 39 页。

②同上。

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 年。

④李永旷：《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探析》，《探讨与争鸣》理论导刊第 1 期，2006 年，第 39 页。

⑤《中共中央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

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 年。

⑦同上。

⑧李永旷：《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探析》，《探讨与争鸣》理论导刊第 1 期，2006 年，第 39 页。

⑨李永旷：《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探析》，《探讨与争鸣》理论导刊第 1 期，2006 年，第 40 页。

⑩《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 年。

⑪同上。

⑫同上。

⑬同上。

⑭李永旷:《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探析》,《探讨与争鸣》理论导刊第1期,2006年,第40页。

⑮《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⑯《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

⑰同上。

⑱同上。

⑲《中共中央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㉑《中共中央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㉓同上。

㉔《中共中央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㉕《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

㉖李永旷:《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探析》,《探讨与争鸣》理论导刊第1期,2006年,第41页。

㉗同上。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建立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迎接革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11日~22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陈潭秋、朱锦堂、彭述之、李立三、李启汉、李维汉、罗章龙、王荷波、项英、尹宽、杨殷、何今亮（汪寿华）、向警予等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陈独秀主持，并由他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中央的工作报告，完全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中国政局的分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生活接近而有可能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基本表示满意；同时对中央在组织技术工作上的失误以及执行中央决议的迟延，提出了批评与建议。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

出席1924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

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何今亮等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情况。

大会集中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进行准备等问题。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11个决议案，即：《对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决议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决议案》、《对于同志托洛斯基态度之决议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决议案》、《对于民族革命之决议案》、《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对于

农民运动之决议案》、《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对于妇女运动之决议案》、《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后八个决议案的内容，主要阐明如何为革命斗争的新高潮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关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的规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 9 人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等人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 5 人组成中央局，并决定中央领导机构的具体分工：陈独秀任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主要是所属的职工委员会），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并负责编辑《向导》，向警予负责妇女部，罗章龙、王荷波为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太雷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分别派驻各地的有：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李维汉驻长沙、项英驻汉口、邓培驻唐山、朱锦堂驻安源。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当时中国的政局是处在军阀统治加速崩溃、人民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时期。大会分析了各个阶级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态度，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大会初步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确定了党在国民党中工作的政策。大会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无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发展，又注意同国民党中的妥协倾向斗争。大会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

大会讨论和决议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正确地分析了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

大会阐明了世界革命形势以及与民族革命运动的关系，指出了当时世界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欧洲反动浪潮昂进，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的侵略更加猛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转人强暴一途”。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全世界革命运动是整体的。欧美物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两者都是要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



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因此，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参加本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就是将民族革命与整个世界革命联合起来。由于世界反动潮流猖獗，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决议还强调统一世界的职工运动，“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抗资本家的进攻”。[①]

大会分析了国内革命形势，认为全国政局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增加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势力之时期”。[②]而英美日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更加使他们有利用中国军阀战争以扩充他们在华势力的趋势。在这种军阀势力动摇和帝国主义在华的冲突加剧之时，中国的被压迫民众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这表现在：全国各城市纷纷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各地组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广大群众高呼反对军阀阴谋，反对段祺瑞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因此，“阶级斗争足以促进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亦足以增进阶级斗争”。[③]大会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于中国革命的破坏也会愈来愈厉害，“他们正在那里预备最严酷的反动，我们应该明白现在时机之迫切”。[④]大会还指出，直系军阀倾覆后，反直系军阀一时控制着北京政权，他们不但不能统一中国、消灭军阀战争，而且还要重施故伎，争权夺利，使人民群众遭受更大的苦难。善后会议就段祺瑞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利用军阀制度，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⑤]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巩固自己的组织，极力赞助国民会议，制止善后会议，痛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阴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找得一条出路”。[⑥]

第二，大会分析了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和趋向，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大会在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界的现状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表现时指出：1. 大商买办阶级，大部分依赖外国资本，令部分勾结军阀，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尤其在广东，他们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没有利害冲突，且往往联合一致来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2. 中国革命需要“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之普遍的参加”。中国的新型工业资产阶级主要经营纺织、面粉、火柴业等民族工业。不过，大会认为它“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3. 农民在地主重租、官厅苛税等压榨下参加了反抗运动，表明它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总要成分”。4. 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定的知识分子，都希望出现一个民族民

主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在革命中亦能起相当的作用。5. 无产阶级是“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决议赞扬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和决战心理，指出它“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

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运动之决议案》特别集中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目的和作用。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是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7]以前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都妥协或流产了，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运动，不但使这一运动加了新的力量，而且使这一运动有了“新的意义”。决议指出：“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取得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以孤立地位”。[8]“四大”第一次向全党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9]

与阐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应处于领导地位的同时，“四次大会说中国革命前途是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个思想“原来决议草稿上有，讨论后删掉了”。[10]之所以删掉，可能是认为当时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适当时候。关于这个问题，四大的决议是这样说的：“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11]

第三，大会强调了农民问题在农民革命中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

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高度评价并阐明了列宁关于农民同盟军的思想，认为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民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什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决议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指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分，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显得特别重要。由于与



工人阶级有基本相同的利害关系，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就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使他们参加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并把它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责任”；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党的“四大”不仅把解放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功的关键，而且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看作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要标志。

大会强调中国共产党应真正保护农民利益，批评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的错误政策；即只想利用农民，却不保护农民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他们要农民为民族革命战斗，对于农民协会遭受压迫或捣毁却不闻不问；同时也检查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即在宣传上太使农民依赖国民政府的势力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等。“四大”提出中国共产党应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

在论证农民问题重要性的同时，“四大”对党的反封建的纲领也作出了进一步的阐明。如果说“二大”主要提出了反军阀的问题，那么“四大”已经明确指出反封建革命的“内容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

不过，“四大”也还没有提出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问题。

第四，大会总结了与国民党合作一年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中应注意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党的“四大”回顾了中共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历史过程。指出，由于实现了国共合作，党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到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能够公开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也指出，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的错误主要表现是：1. 以为应集中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共产党的工作；2. 以为既参加国民党做国民运动，就不应主张阶级斗争；3. 以为应帮助整个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党的“四大”特别强调指出，右倾错误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

大会根据国民党改组以来形成左、中、右三派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基本方针：1. 国民党包括社会各阶级的成分，因此不免有造成阶级妥协的危险，故须在运动中努力保持阶级斗争的成分。2. 国民党是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工具，但并非民族革命的全部，在宣传上应处处反对军阀

的帝国主义，保护工农利益，攻击右派，阻止中派右倾。3. 在思想上组织上要巩固左派，扩大左派，攻击右派并且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阶级斗争理论。4. 在国民党势力所及之地，共产党应做公开活动；倘国民党妨害工农利益，应极力反对。5. 要求国民党保护工农利益，要使工农群众有强固的组织。6. 要使在共产党领导下国民党左派从思想上巩固起来。对国民党外的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倘他们有民族革命的政纲和行动，我们也应与之有相当的合作。这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核心就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

第五，大会指出了加强党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领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规定了各项方针政策。

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发展革命力量，党的“四大”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都作了认真的总结，并明确地规定了各项方针政策。

党的“四大”对中国职工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大会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而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职工运动往往容易产生失去独立性的危险。因此决议要求党特别注意：工人阶级要真能达到领导的地位，带领其他阶级前进，就必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对于那些“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也应尽量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四大”还指出在工会运动中党应当力争工会公开，主张工会统一，警惕反动派影响。“四大”还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工农部内分设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党的“四大”阐明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以及宣传组织农民的方法，并指出：提口号须切合农民实际情况，并于行动前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应结合中农以反对大地主；应特别宣传取消苛捐杂税，加征殷富捐所得税；应使农民向国民党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此外农民自卫军也应在党的政治指导之下。对于南方农民运动的经验，还应将它利用于各地的工作。

大会阐明了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关系，指出：青年团“在政治上要绝对接受党的指导”，但在青年工作范围内也“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而当前团“不免仍呈第二党的形式”，这种情况要根本改变。大会制定了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青年学生运动的工作计划，并强调学生运动的重要地



位，指出应“使学生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国妇女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党对妇女运动坚持“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对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特别是女学生，应切实指导，“使之日趋革命化”，对劳动妇女运动应“有系统地有组织性地加以指导”，对于上层妇女运动应指出其错误并予以同情和赞助，对教会妇女运动应予以“严重而又诚恳的批评”。决议还要求各地党组织应注意吸收妇女党员，加强对妇女工作的指导。[12]

第六，大会强调必须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认为，组织问题是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不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党决不能前进”。“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加强党的组织，除上海和广东之外，要特别注意在工人数量集中的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无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和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等地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为了吸收工农革命分子入党以尽快扩大党组织，“四大”对“党章”作了两条修改：第一，把旧党章规定的“有5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3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第二，把有些地方规定青年必须先入团而后才能入党的吸收党员的办法，改为可以“直接加入本党”。“四大”还决定在国民党及其他重要政治团体中，组织党团，并决定正式成立中央组织部。为健全和加强党的领导机关，“四大”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将“委员长”的职务分别改为“总书记”、“书记”。

党的“四大”肯定了几年来党的宣传工作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起的指导作用，也指出党的“三大”以后在宣传工作中过分地着重资产阶级的力量忘记自己阶级的宣传，滋长了右倾错误，同时也存在“左”倾观念。大会着重批评了党的宣传工作中的缺点：第一，政治教育少，以至有的党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奇谈怪论；第二，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为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第三，在知识分子中很少注意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大会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指导各地宣传部并与之发生有系统的关系。要集中力量办好《新青年》，同时加强《向导》、《中国工人》、《党报》的工作，使其成为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宣传阵地。在可能条件下，还应设立党校以便有系统地教育党员，“增进党员相互

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大会明确指出："殖民地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要求各地设立马列主义研究会、讨论讲演会，扩大共产主义宣传和党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各项正确决定，为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大会以后，革命形势在全国迅速发展。大会闭幕不久，便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

在国民革命的暴风骤雨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1925 年 10 月～1926 年 1 月，中共党员人数增加了 1 倍多，达到 8 000 人。到 1926 年 4 月，党员人数发展到 11 000 人。全国各省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或有了党员。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指出："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全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从国民会议、追悼中山、五卅运动、刘杨之役，以及最近反奉的宣传，均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在每个政治运动中，中局不曾失去事前指导的机会，尤其是关于五卅运动，能够有发动并扩大的决心与努力，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13]

随着党组织的壮大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发行量增加到了 30 000 份。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地方组织也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如北方区委的《政治生活》，广东区委的《人民周报》，湖南区委的《战士》周报。此外，还有湖北的《武汉评论》，河南的《中州评论》等。

注释：

①《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集》第 1 册，第 322、323 页。

②《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决议案》，同上书，第 326 页。

③同上书，第 327 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同上书，第 395 页，第 394 页，第 395 页。

⑤《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333 页。

⑥同上书，第 333 页，第 330 页，第 337～338 页，第 333 页。



⑦《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7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3页，第330页，第337～338页，第333页，第337页。

⑨《李维汉谈维经斯基》(1979年11月)，《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8页。

⑩《对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8页。

⑪《对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62、364页。

⑫《中局报告决议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94页。

⑬同上。

党的新党章确立了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总结、确立起来的一条科学的、民主的原则，它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减少重大决策的失误，在组织上和纪律上提供了有力的保证①。

从认识论上看，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②

唯心主义者鼓吹“先知先觉”，宣扬“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都是骗人的鬼话，都是违反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而任何个人的思想、认识、观点和意见，由于受到年龄、教育、环境、经验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他对客观外界的认识总是不够全面的，总会或多或少的带有局限性。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弥补个人在认识上的这种缺陷呢？正确答案只有一个：用集体的智慧可以弥补。也许有人要问：当一个集体内部围绕某个问题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听谁的？这也好办，就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处理。在此，很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实践中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出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从人类认识的宏观上看，这种情况毕竟很少，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看法还是正确的成分居多。因为集体的思想、观点、智慧和经验一旦融合在一起，便能从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达成认识上的交流和互补。正是这种交流和互补，大大减少了人类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增强了全面性和科学性，使得人们的主观认识更加合乎客观外界的实际。常言道：星多夜空亮，人多智慧广；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讲的就是这个道理③

从实践上看，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④。



历史唯心主义鼓吹：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而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一班无足轻重、供人驱使的愚民。其结果必然导致破坏民主，压制不同意见，推行家长制，一言堂，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发生严重失误。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那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无视集体领导，无视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和作用的人才是真正幼稚可笑的。诚然，群众也会有缺点，党的一级组织或一个领导集体内的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也难免有失误，但这些失误和缺点最终是可以也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来决定修正和取舍。那种以为自己手里握有“真理”就可以践踏民主，无视集体领导，破坏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人，其结果只会损害党的事业，使党在困难面前形不成合力，握不紧拳头，客观上帮了敌人的忙[5]。

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是至今社会公认的民主原则。[6]在党内生活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党的纪律依据和支柱。“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7]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表决制是实现这一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我们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基本的立足点就是组织、上级、中央是代表多数的，是代表党的全局利益的。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其他“三个服从”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8]

少数服从多数在党的民主集中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行党章第10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基本原则，包括“四个服从”的原则、选举的原则、上下级关系的原则、集体领导原则以及禁止个人崇拜原则，基础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认为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具体化和延伸。有人认为，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实质，这在理论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民主集中制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虽然不能说，有了少数服从多数就有了民主集中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没有民主集中制。[9]

民主集中制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组织建设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10]

从1921年7月党的创立到1925年2月党的四大的召开，即从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到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这一时期属于党章中民主集中制思想的萌芽时期。其萌芽的历史条件主要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建党思想的研究，是民主集中制思想萌芽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建立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不仅在组织上酝酿、准备建党，而且在思想上也酝酿、准备建党，积极探讨建党思想，运用不同的形式，就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蔡和森和毛泽东的建党通信，是目前所见最早开始探讨建党思想的文献。蔡和森在通信中提出要"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1]的主张。他还强调，建立共产党要以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12]"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13]蔡和森还指出，"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为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又极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年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14]毛泽东在复信中说，来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5]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探讨进一步深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着重宣传党的建设的理论，尤其是列宁的建党学说，还大量介绍了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建党经验。《共产党》月刊第3号上发表的《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的译文中，介绍了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规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其中明确提到"属于万国共产党的党派，须行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原则组织"。[16]《共产党》月刊关于建党思想的探讨，初步阐述了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陈独秀在托陈公博带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信中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和纪律的重要性。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希望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注意四点：一、发展党员；二、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注意纪律；四、争取群众。[17]

第二，民主集中制的产生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有关。

辛亥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就在中国蔓延发展。五四以后，在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共产主义者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时刻，无政府主义者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对立和分歧也尖锐起来。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论战[18]。

早期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争论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而自由问题——是宣扬“绝对自由”，还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是这次争论的焦点[19]。黄凌霜直言不讳地说：“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20]区声白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以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21]

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这种“绝对自由”论进行了批驳。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22]“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个人无法自由退出社会不同意见时，如何才能解决意见相左的问题呢？陈独秀说：“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23]提出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盘和不同意见，用大多数人的意见来说服少数人，用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事情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不致因意见相左而分崩离析。

蔡和森后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伴随着与无政府主义派力量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了以民主集中制建党的决心和信念。这种决心和信念战胜这些“暂时的同盟者，使他们退出了党的组织”[24]，从而为党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本的组织基础。

第三，对“家长制”的反思

1. 共产国际的高度集权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民主生活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大”时决定加入第三国际的，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第16条明确规定：“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它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这些规定显然表明共产国际高度集权的体制。陈独秀基本上

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办事的。马林、维经斯基、罗易以及俄国顾问鲍罗廷把国际指示以及斯大林意见变为中共的政策强迫发号施令，布威于国共两党。“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主张和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并向共产国际写了报告。共产国际根本不予理睬。马林一面在《真理报》对陈独秀严厉批评，一面派吴廷康来华制止，陈独秀也无法坚持。“四一二”政变以后，陈独秀的右倾远没有鲍罗廷严重，陈独秀说话又不完全算数，所以大革命失败实不可免。实际上，大革命后期中央决策大权基本掌握在国际代表和俄国顾问手里。

除此之外，国际代表、俄国顾问的专断作风也影响了中共一些领导人。如陈独秀、张国焘，动辄个人拍板，遇事不讨论，不征求下级意见，甚至不表决等等。

2. 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干扰了党内民主生活

陈独秀出身于传统封建家庭，家庭的优越以及五四时期形成独一无二的地位，使得他形成刚强、自负、暴躁，缺乏领袖人物那种谦和、大度品格的性格。这种性格上的弱点一旦和集权制度结合起来，特别是在身边有国际代表专横武断作风的示范，以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陈独秀表现出家长制的作风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李达等人曾回忆过陈独秀的几段往事，说陈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摔茶碗，骂人训人，暴跳如雷，使同志们感到较难接近。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一文中回忆说：“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记得当时派赴郑州做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摔破了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在另一篇《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中，李达又说：“陈独秀是个资产阶级左派，他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又懂得很多古文，所以一些老古董很怕他，胡适也推崇他，青年人很崇拜他。他的威望很高，党内叫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那时候我搞宣传工作，下边的文件都集中到我这里。我自己租了一间房，陈独秀不跟我一起住，他的住处根本不许我们去，他弄了个女人在那里。有一次，他到我那里去，看到一个同志来信谈工作困难问题，一看就大骂，一下子把个茶碗拿起摔碎，等信看完了又冷静下来。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



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李达夫人王会悟也有类似内容的回忆，那是她从李达口中得知的："陈独秀家长作风严重，常拍桌子骂人，对各省支部来信所提的建议很少采纳。如两人为了国共合作的问题，李达主张实行'党外合作'，'为了这问题，陈独秀和李达争吵起来，陈大发雷霆，摔茶碗，拍桌子，骂李达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达也倔强地说：'为保住无产者的革命政党，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决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从此李达就不和中央往来了，他也未参加不久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王会悟还称：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发展到极点时，"独断专行竟演变到有意避开不见第三国际的人"，而"这时李达已不能忍受陈独秀的恶劣作风，曾多次对我说：'这草莽英雄怎可领导中国革命的大事业？'"

李达后来由于不愿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一言堂"而退出了共产党。此时期退党的还有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固然退党有当事人个人的原因，如后来李达在重新入党时曾在自传中检查了自己当年"脱离组织的动机"，原因有"不愿意参加示威行列"、"不愿意做国民党员"、"要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他务"、"自己当时患有肺病"、"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负担颇重"、"在主观上，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等主观原因，但是"不满意于陈独秀的鲁莽暴烈的草寇式作风"，以及认为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研究，即陈在党的二大前发表的文章"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的水平"。如在与张东荪的论战中，陈反驳张东荪目前中国只能发展资本主义，即中国的发展首先要有资本，陈说："我们反对的是资本家，不是反对资本。"李达认为："说这样话的人配做共产党的领袖吗？"这一结论是中肯的。但是陈独秀比后来的王明、博古要强得多，他没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没有制造冤案。包惠僧回忆陈独秀曾指出："不要攻击别人，反对谩骂"[25]。这在当时确是一种党内好风气。所以党内的同志敢于和陈独秀争论。如马日事变后，蔡和森和陈独秀都住汉口。有一次陈独秀到蔡和森住处拜访，谈话中涉及到革命问题，两人谈着谈着就争吵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争论得面红耳赤。当陈独秀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面色很不好看，两人不欢而散[26]。这种没有打击报复、冤假错案的政治争论，有利于党员从中反思、发现、批评"家长制"。后来在总结大革命的经验中，蔡和森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错不在共产国际，而在党自身，在政治局，在党内的家长制："素来党的指导即未建筑在群众

上面，以致中央完全成了普通的政治团体，非阶级的指导，直到以后，政治局的指导简直与国民党一样，并且还以小资产阶级几个上层领袖的意志为转移，这当然不是国际的错误，我们应承认过去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正过去的错误。”[27]这不能不说明问题。

由于建党前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建党思想的系统研究，也由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中得到的启示，早期共产党人开始朝着把马列主义建党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上前进。从此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开始逐步确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已有关于集体领导制度、选举制和监督制以及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28]这种委员会体制从组织上确立了集体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规定了“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29]这项规定已体现出监督制和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还规定了“本纲领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始得修改”，[30]这项规定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一次以党纲的形式加以确定。

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31]第十八条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32]第十九条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33]《章程》还特别强调了党的宣传纪律，凡属重大问题，“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34]以上这几条规定，明确体现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一大纲领和二大党章中有关党员个人和党的组织活动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标志着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已经在这一时期开始确立。

中共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修改后的党章基本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结构和内容，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内容更加丰富完备，使之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修正后的党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观念和组织路线，反映了我党在探索时期完善党组织建设上



的功绩，为后来党章的进一步修正与完善打下良好的基础。

党的四大对党章进行了局部的修改，条文由30条增加到31条。在“党员”一章中规定：“党员入党时，经支部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35]在组织一章中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36]在会议一章中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或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三分一区代表全党三分一之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37]第十四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百人以上者得派二人，二百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百人得加派代表一人。”[38]等民主原则。此外在纪律一章中，第二十五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39]没有做任何修改，至此，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民主制度正式在党章中确立，成为指导党内生活的方针、原则。

注释：

①曾政武：《浅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及其应用》，《邵阳学务学报（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2002年，第16页。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⑥牛安生：《论党内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中州学刊》第2期，2006年3月，第6页。

⑦《列宁全集》第25卷，第141页。

⑧牛安生：《论党内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中州学刊》第2期，2006年3月，第6页。

⑨牛安生：《论党内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中州学刊》第2期，2006年3月，第6页。

⑩魏聚刚：《从中共党纲看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发展》，《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⑪《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

人民出版社，第115页。

⑫《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13页。

⑬《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第88页。

⑭《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14页。

⑮《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⑯《共产党》第3号短言，1921年4月7日。

⑰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⑱魏聚刚：《从中共党纲看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发展》，《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⑲同上。

⑳黄凌霜：《评"评潮杂志"所谓今日之新潮》，《进化》第2号。

㉑《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

㉒《讨论无政府主义——给区声白的三封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39页。

㉓《讨论无政府主义——给区声白的三封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43页。

㉔《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㉕《包惠僧回忆录》，第367页

㉖《红旗飘飘》19集，第18、19页

㉗《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71页。

㉘《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㉙同上。

㉚同上。

㉛《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㉜《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㉝《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㉞《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㉟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 8 月第 1 版，第 383 页。

㊱同上，第 385 页。

㊲同上，第 386 页

㊳同上。

㊴同上，第 388 页。

国民党农民部成立并开展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期起，就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为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工人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特别是国民党“一大”闭幕后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指导和开展。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纲领，对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但是，由于孙中山并不了解广大农民之中究竟蕴藏着多大的革命潜力与历史首创精神，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实现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中国广大的农民仍然处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将中国的无产阶级推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富有朝气，与广大的农民群众有着极其广泛的密切联系。随后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运动的兴起，对孙中山触动极大，他开始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与教训。

在革命斗争屡遭挫折后，并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人民群众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对于农民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重新估计，继而重新确定了对工农的政策，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真诚地欢迎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对于农民运动的宣言及政纲里也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民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民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其增进

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民工人之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不断之努力，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在从事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即为农民工人而奋斗，亦即为农民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对此他进一步补充发展了民生主义，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在政治上，孙中山对农民的地位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明确规定，“国家权力必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成为农民、工人、商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不给卖国贼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以自由及权利的人民民主政权。”对于怎样实现农民的政权及斗争方式，孙中山公开号召农民结成团体，挑选各家的壮丁来练农团军。孙中山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决定改组国民党，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代表农民利益。

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孙中山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专门设立了农民部（简称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由中国共产党人林伯渠、彭湃、阮啸仙、罗绮园、周其鉴等人组成，成为改组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八个重要部门之一。共产党员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首任部长，彭湃担任农民部秘书。国共合作初期，中央农民部部长的更换非常频繁。林伯渠任职不久，因往汉口办理国民党党务于1924年4月底辞职，5月第二任部长彭素民上任，9月间因病去世；第三任代理部长李章达与第四任代理部长黄居素均任职时间极短，农民部的工作实际上由秘书彭湃主持；11月11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第五任农民部部长，由于廖任职期间兼职太多，无法顾及部务，部里的工作实际上由接任彭湃的农民部秘书罗绮园主持。

农民部设立后，接着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以辅助农民部工作。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林伯渠、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肖楚女、陈公博、阮啸仙、罗绮园等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席。

广东革命政府在第一次发表的关于农民运动的宣言中指出，农民欲结束种种之压迫，应即时组织农民协会，为防御土匪兵灾起见，特许其在一定计划之下，组织农民自卫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3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初步确定农民运动计划，决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也制订了一些具体的有关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组建农民团体，在农民中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同时决定在中共中央和各省（区）委中，设立领导农民运动的机构，选派干部去乡村领导农民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6月30日召开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内容有：“（一）择定广州市交通较便在政治上军事上重要之县地，及农民运动有根据者如广宁、顺德、鹤山、东莞、佛山、香山及本市郊外各乡村（为重点开展农运地区）。（二）组织农民运动特派员20人，向各县地实际运动。（三）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个月为讲习期间；讲习完毕后，选充为农民运动特派队员”等。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措施，为农民运动的开展铺平了道路。

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制定了《农民协会章程》，章程共15章83条，对乡、区、县、省、全国各级农民协会的组织程序和职能作了详细规定。本章程经孙中山签署，由广东革命政府颁布，是各地农民组织起来的法律依据。其后，广东革命政府又两次发表对农民运动的宣言，宣布农会受法律保护，有请求罢免横征官吏和参与各级政府商讨有关农民问题的会议权。广东省长公署还发布命令，责成各县政府帮助各地农民按章程组织农民协会。

这时开展农民运动，最迫切要求解决的是农运干部的缺乏问题。同年7月，农民部根据彭湃的建议，在广州创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任主任。创办农讲所的宗旨是“养成农民运动的指导人才”，“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在教学方面，农讲所除了课堂教学外，还注意到农村开展实地调查与宣传活动，使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在第一届农讲所办学期间，孙中山和廖仲恺还曾为学员作了题为《耕者有其田》和《农民运动所应注意之要点》的讲演，强调农民对国民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到1925年12月，农讲所共举办了5届，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先后任主任。从第一届至第五届总计培养了454人，其中1/3受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担任农运特派员，2/3回原地从事农民运动，多数都成为农村开展农运的骨干。

1924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正式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广东农民运动就



直接在区农委的领导下进行。区农委负责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均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较长时间的兼任重要职务（彭湃、罗绮园担任农民部秘书；阮啸仙担任农民部组织干事，负责组织农会等）。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便可以通过农民部的各级组织更好地得以贯彻执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在中共广东区农委的指挥下进行的。

国民党农民部成立后，选定广州市郊及顺德、广宁、香山、佛山、东莞、鹤山、花县等地区，作为计划开展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了彭湃、阮啸仙等大批农民运动特派员，深入各地农村宣传和发动农民，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领导下，作为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农民运动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其中，广东中部、西江、东江和北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声势更为浩大，发展更为迅速。

以广州为中心包括花县、顺德、番禺、南海等县的广东中部地区，亦是开展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派遣了大批农民运动特派员前去开展工作。1924年上半年，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曾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前往顺德、花县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宣传指导农运工作。1925 年上半年，在农运干部们的努力工作下，广州市郊、中山、花县、顺德、番禺、东莞、南海、宝安等县相继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它们是广东省较早成立的一批县级农民协会，直接推动和促成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的成立。广东省中部地区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后，便积极参加政治斗争，还踊跃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

以广宁为重点的西江地区，农民运动得到很大发展，声势尤为浩大。农民受军阀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极端贫困，他们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意识较为强烈。1924 年 4 月，共产党员周其鉴以农运特派员身份带领一批有志于农运的骨干来到广宁，他们通过演说、谈心等方法，启发农民的觉悟，宣传和发动农民，使农民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谋求解放。于是，便纷纷组织农民协会。5 月中旬，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身份到广宁，和周其鉴等人一起教育、启发农民积极分子，并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广东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以党支部为核心进一步地发动和组织农民。到 6 月中旬，已成立了 8 个区的农会，入会农民达 6 万余人。10 月，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同时组建了农民自卫军，有 300 多人。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展开了斗争。根据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广宁县农会决定在成立农会的地方减租

四成，发布了《减租宣言》和《给田主的一封信》。11 月下旬，在彭湃、周其鉴等人的指导下，广宁农会坚决反击地主武装的进攻，广东省革命政府也派铁甲车队等武装支持农会。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击败了地主武装，迫使地主接受了农会提出的减租条件等。

以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地区，农民运动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海陆丰是广东农民运动最早兴起的地区。1925 年 3 月，东征军收复海陆丰后，成立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彭湃为书记。自此海陆丰的农民斗争有了领导核心。不久，海丰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处，宣布正式恢复全县各级农民组织。同时，又组建了海丰县农民自卫军，李劳工任总队长，吴振民、卢德铭任教官。1925 年 5 月，在海丰农民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恢复海丰县总农会，选举彭湃为会长。农民运动在海丰顺利得开展。随着东征军收复东江，东江各县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

在广东中部、东江和西江地区农民运动迅速开展的同时，北江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国共合作的领导与推动下，到 1925 年 5 月前，广东全省已有 22 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达 21 万之多，开展农民运动的区域逐渐扩大。广东农民运动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在军阀统治的一些省区也兴起了农民运动。1924 年 7 月，南昌市郊扬子洲农民组建了江西第一个农会。11 月，吉安延福一带的农民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石安农民也秘密组织农会。1925 年 2 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发动农民建立了 20 多个乡农民协会，并领导农民与地主奸商展开斗争，农民运动不断发展。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农民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风暴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配合了工人运动的进行。使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中国的农村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动，深刻地改造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也使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农村的革命。但是，它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对此应该给予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如农民部没有及时制定一个当前最低限度的行动纲领；农民自卫军的力量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农民协会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内部的整顿还不够，在统一组织、加强训练方面还有待加强；后期国民党左派存在忽视农民运动的思想，致使北伐时后方的广东农民运动缺乏经费；国民党右派仇视农民运动，在后期叛变革命，导致运动出现了低潮等。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公开组织和领导工农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农民运动的复兴，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使农民运动进一步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从1924年7月～1926年9月，由共产党人提议并主持，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大量的农民运动人才。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民大革命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国共两党根据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关于“以本党权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的决定，努力实施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促进了工农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南方各省的蓬勃高涨”。在孙中山的关怀和支持下，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彭湃倡议，经中国国民党同意的。国共合作建立初期，彭湃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他在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到开展国民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农运干部。于是，他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的身份主动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提议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924年6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计划每期一个月，学习完毕，学员作为农民运动特派员，派赴各地，开展农民运动。于是，1924年7月，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始创办。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后一共创办了六届，每届时间最短一个多月，最长四个多月。它的全称是：第一至第五届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既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办、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管，同时也是由中国共产党倡办和领导的。各界农讲所的主办人均为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后叛变）都是共产党员，大部

分教员也都是共产党员，大多数学员也是由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选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农讲所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机构。

根据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规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宗旨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

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于 1924 年 7 月 3 日开学，8 月 21 日结业。招收学员 38 名，"其中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觉悟到要'入民间去'之分子为多，次则为农民已接受本党政纲而做农民运动于前者，次则工人曾参加工会组织运动者，有女生 2 名"。他们当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20 人，毕业 33 人，全是广东学员。国民党中央任命彭湃为此届农讲所主任，教员有彭湃（兼）、谭平山、阮啸仙、罗绮园、鲍罗廷、加伦、佛朗克等。此届学员除正式授课外，"最注意于所外活动，凡星期日须有农村运动实习，步行至训练，马术之训练，又有农民党员联欢大会之组织，市郊农民协会之成立，及东西南北四郊之实际调查与宣传组织。故此期学生实为本党农民运动之推进机，现在亦为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之战斗员。"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学员们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曾到本届农讲所作过题为《农民运动应当注意之要点》的讲演。在第一届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时，孙中山也出席了大会，并作了"耕者有其田"的训词。他指出，国民革命必须发动农民起来参加，才能取得胜利。勉励学员们肩负起历史重任，深入到农村，宣传和发动农民起来革命。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十分重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这届学员毕业后有 24 人被委任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分赴广东各县领导农民运动，其余的人也到广东各县从事农运工作。他们被称为"本党农民运动之推进机，亦为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之战斗员"。此届学员黄学增毕业后成为广东农运四大领袖之一。他们为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广东 94 县之广，农民有 2 400 万之多，第一届农讲所毕业的学员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因此，第一届农讲所结束后，中央农民部立即决定继续举办第二届，并扩充学员名额为 225 人。第二届农讲所于 1924 年 8 月 21 日开学，10 月 30 日毕业，学习期限延长至两个月。学员仍来自广东各地，大多数是由本党同志在各县介绍来的，故此工人农民占有多



数，其中尚有十三名女子。共产党员罗绮园担任该届农讲所主任，教员有罗绮园（兼）、彭湃、谭平山、阮啸仙、谭植棠等。

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之际，正逢广州商团阴谋发动武装叛乱，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商团向外商订购的大批枪械。为了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保卫革命政府，这届农讲所把学员组成农民自卫军，彭湃兼任团长。农民自卫军组成之后，移驻省属，进行军事训练。随后于广州工团军一起赴韶关训练，担任北伐后方宣传工作，效果显著，各地农民纷纷前来接洽，要求成立农会。9 月 30 日，农民自卫军返回广州，即停止军事训练，着重政治学习。声讨反动商团的“双十”流血事件发生后，除部分学生因伤未愈或请假回乡外，其余都到黄埔军校进行为期 10 天的军事训练。10 月 28 日，全体学员从黄埔回到广州，进行两天政治讲演，将以前功课作一总结。10 月 30 日，第二届农讲所学员毕业。最终毕业 142 人。这届毕业学员大多数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被派往广东各县从事农运工作。如黄克、关仲、李华照等分别在各地领导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对广东的农民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 1925 年 1 月 1 日开学，所址在东皋大道一号，招收学员 128 人，其中除广东籍学院外，还有 2 名广西学员，1 名四川学员，共产党员阮啸仙为主任，教员有阮啸仙（兼），廖仲恺、彭湃、陈延年、谭植棠、鲍罗廷、加伦等。此届农讲所仍很重视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强调：“为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学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还注重对学员进行组织训练，主要训练如何组织各级农民协会的问题。他们依照农民协会章程，组织建设农民协会，名曰模范县，依学生地理上关系及语言不同，而分为若干区和乡，组织各级农民协会，使学生实习团体生活，并讨论各自地方的农民问题。此外，农讲所还设有各种讨论会、音乐会、技击团、园艺部、新闻社、学生俱乐部及农民运动或革命殉难之人物画等陈列，加以多方面的培养训练，丰富学员的课外活动。同样，本届学员也学习了革命理论课程和到农村实习。

4 月 1 日结束，经过三个多月的培养，学员获益不小。学生已经知道：“社会之进化及其制度特征，革命之所由发生及其趋势，明了阶级的意义。最能使他们得到实际学问的，就是他们承认广东农民运动经过得失之批评，及调查农民生活状况与宣传方法。”这届学员毕业 114 人，其中 15 名军事训练成绩较好的学员留下继续接受军事训练，预备派往各乡训练农民自卫军，

或做下一届学员的军事助教。另外，有 20 人在农民部做见习者，被派到各乡进行宣传活动。其余的大多回家乡帮助农会办事，许多人成了农民运动的骨干，如韦拔群成为了广西农民运动的领袖。

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 1925 年 5 月 1 日开学，所址仍在东皋大道一号，录取学员 98 人，其中广东籍学员 85 人，还有广西和湖南籍学员，分别为 2 人和 11 人。共产党员谭植棠为本届主任，教员有谭植棠（兼）、阮啸仙、彭湃、唐澍等。农讲所开学时，正逢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所务会议决定，讲习所学生一律参加旁听。会议闭幕后，5 月 17 日农讲所正式上课。为使学生熟习军事动作，以备毕业后派往各地指导农民组织自卫军，特别注重军事训练，每日上午 3 小时，专做军事训练。下午 5 时教授其他各种科学。其他训练内容与前届大致相同。学习期间，曾发生杨刘叛乱，农讲所被强行占驻。所务会议决定，暂将全体学生分别派遣回乡，指导农民工作。6 月 4 日学员离所，7 月 4 日才恢复上课。但由于海员罢工，交通不便等，很多学生一时不能回校。讲习所学生人数过少，便又续招 25 名旁听生。继续授课两个月，9 月 1 日结业。正式毕业生 51 人，旁听生 25 人。其中，有 16 名学员留所见习，其余均回原籍从事农民运动。

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 1925 年 9 月 14 日开学，所址仍在东皋大道一号，共有学员 114 人，分别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东、福建等地。并将学员分为甲、乙两班，甲班为外省学员，共 64 人，乙班为广东本省学员，共 50 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能文能武的农运人才，所以从本届开始，强调了学员的文化程度，招生时规定，必须具备中学毕业及有相当程度者，经过考试合格才能录取。彭湃担任本届农讲所主任。教员有彭湃（兼）、毛泽东、罗绮园、阮啸仙、谭平山、鲍罗廷等。谭平山、罗绮园等曾为学员作过演说。第五届农讲所加强了对学员基础理论的教育，开设了关于国民党主义、中国国民革命之基础知识、农民运动之理论及其实施方略、实习宣传训练、军事训练、农民运动见习等的课程。除了教授基础理论和军事训练以外，还极为重视学员的实际锻炼，积极组织学员外出旅行参观和参加群众活动。学员在学习期间，对“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怎样才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什么是三民主义”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表现已具有较高的觉悟。本届农讲所还很注意对学员自治能力的培养，在学员中组织自治会。“本会为学生训练自治之能力及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最革命的战斗员为宗旨。”自治会下设管理部和俱乐部，还设有 5 人



组成的主席团作为本会的执行机关，组织领导学生开展各项活动。12 月 8 日结业，甲乙两班共毕业 114 人。学员毕业后，甲班分配到河南、湖南、安徽、山东、广西、福建各省工作，乙班分配到广东东江及南路为多，从事革命运动。他们的工作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如湖南的毛泽东、贺尔康，江西的曾文甫，安徽的薛卓汉等，都是本届农讲所的学生。

1926 年 2 月 6 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向各省农民部发出通告，指出：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议，为了发展全国农民运动，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招生范围至全国。据此，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进一步扩大了规模。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之后，第六届农讲所于 1926 年 5 月 3 日开学，所址在番禺学宫（原广州惠爱东路，现广州市中山四路 42 号）。招收学员 327 名，他们来自我国的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陕西、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奉天、浙江、绥远等 20 个省区。他们是经过严格考试后录取的，都具备了四项条件：1. 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并无他项异想；2. 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 年龄 18 岁以上 28 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 富勇敢奋斗精神。毛泽东担任本届农讲所所长。教员有毛泽东（兼）、萧楚女、彭湃、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阮啸仙、张秋人、安体成、周其鉴、于树德、李一纯等 20 多人。他们多是有较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萧楚女是专任教员。

第六届农讲所开学之际，正值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全体学员参加旁听。直到 5 月 15 日，才开始正式上课。农讲所很重视革命基础理论的教学，开设了 25 们课程，讲授国民革命基础知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等。农讲所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员中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农民运动领袖，如彭湃、阮啸仙等，在讲授中还给学生系统地传授了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使学生深受教育。除讲堂授课外，还指导学员进行课外的理论研究，重视培养学员的自学能力。农讲所除了政治理论课程外，还安排了军事训练课程，设立了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占了全部学习时间的 1/3。另外，本届农讲所也同样组织学员去农村实习，增强了学员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除以上学习内容外，尤其注重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农民问题的研究。将学生按不同的省区组成了 13 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并拟出 36 个调查项目，结果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具有全国

性的宝贵调查资料，而且提高了学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农讲所还非常注意党团组织建设，建立了中国农讲所支部。许多学生在学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党组织者在党旗下宣誓："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9月11日结束，毕业300余人。学员毕业后，服从革命的需要，立即奔赴全国各地，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大多数人担任了农民运动的特派员，在各地宣传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还有的学生在各地创办地方性的农讲所、农训班，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从第一届到至第六届，共计培养出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从事和领导各地农民运动，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农讲所的许多教员和学生，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高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大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



党的四大讨论和领导农民运动

1924年下半年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这种形势表明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为了迎接和准备这一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曾准备在当年就召开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党成立后，每年都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但因为这一年是党成立后比较繁忙的一年，于是时间推后，到第二年一月使得大会在上海召开。

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1925年1月11日~22日，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闸北的横滨路六号召开。此处属于华界，又靠近租界，华界和租界警探都不甚注意。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其中工人占20%，知识分子占80%，代表全国950名党员，有表决权者1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由陈独秀主持，彭述之任秘书长，郑超麟、张伯简为记录。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中央的工作报告，完全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中国政局的分析，基本满意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同时对中央在组织技术工作上的失误以及迟延执行中央决议，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共产国代表维经斯基作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这一报告的决议。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何今亮等先后在大会上作了讲话。周恩来主要讲了广东的军事情况。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当地的工作情况。

大会集中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如何进行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的准备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及11个决议案，即：《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同志托洛斯基态度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

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后 8 个决议案的内容，主要围绕着为革命斗争的新高潮这一中心，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会议分析了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趋向，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大会在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表现时指出，自国际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连年混战，官吏横征暴敛，地主豪绅加重地租等，使得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加速了大批农民的破产和失业，于是到处流浪为土匪，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在地主重租、官厅苛税等剥削压迫下，"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党的"四大"进一步强调了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决议高度评价并阐明了列宁关于农民同盟军的思想，指出"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的根本不同之要点"。因为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忽视了农民阶级，以为他们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一个因素。根据列宁的这一基本原则，决议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指出虽然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遭受国际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而崩溃，但是农民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 80%。所以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农民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并且由于农民与工人阶级着基本相同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就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使他们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并把它当作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责任。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四大"对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不仅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且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看作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要标志。

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发展革命力量，党的"四大"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都作了认真的总结，会议上明确了加强党



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领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规定了各项方针和政策。关于农民运动，“四大”决议除了阐明农民运动在民族革命中的的重要性以及宣传组织农民的方法外，还提出应该注意事项：一、提口号须切合农民实际情况，并于行动前做好充分的宣传与准备，不要轻率地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二、根据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应注意结合中农以反对大地主，但还要特别保障贫农和雇农的利益。三、应特别宣传取消苛捐杂税，加征殷富捐所得税。这样一来，可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支持；孤立打击富有阶级大地主；可使国民党的政策左倾；如国民党政府不能满足农民这种要求，可使农民加以深切地认识国民党。四、应使农民向国民党要求以官地分给贫民。此外，农会应多做些公益的事情以增高其地位，或免除地痞劣绅借此敛钱。求国民党给以物质的帮助，在农村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提高乡村文化。

决议提出应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宣传和组织农民的方法。关于农民的问题，上次扩大会议上曾经采用下列的决定：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额税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税。

同时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的实际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

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

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该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贷之苦”。

今后这些方法，依然适用，但应随时随地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加以斟酌和运用。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可能共同组织反对大地主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利用每次军阀战争中农民所受的种种战祸之苦，进行上述的宣传和组织。在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等，引导农民反对帝国主义。

决议指出最近一年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由于国民党的农民

政策，农民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此后，国内客观条件日益增多，不但在南方，而且在北方，也有可能引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地主的斗争。国共合作后，本党对于农民，便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应当反对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于农民的错误政策：（一）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还想要农民拥护国民党，这种政策是得不到农民的赞助和拥护的；（二）国民党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但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欺压农民、危害农民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

另一方面，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已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但国民党并不知道怎样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革命，常任农民协会为右派官僚、军阀、地主所摧残。同时，在这一年的经验中我们也发现自己的错误：（一）在宣传上有时使农民太过于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使农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治势力保护不到时，便对我们失望；（二）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时机未到便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倒促进了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不易于我们支持斗争；（三）有时把农民经济斗争的责任，完全放在主持农会的几个同志身上，使农民群众反处于第三者的地位，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

我们须在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尽管我们可以在国民党的名义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同时应注意利用每个具体斗争的机会，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并使农民觉悟虽然可以利用国民党及其政治势力保护农民利益，但必须农民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并使国民革命在工农势力的影响之下向前发展。因此，我们还须独立地进行本党的宣传和工作。要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特派员放由本党地委指导；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的斗争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支持并指导他们的斗争。在农民运动，我们还要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当农民对于国民党怀疑时，我们应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派别关系，并举出实例证明各种派别的表现。同时须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策略等，使农民逐渐认识到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



奋斗的党。

决议还指出，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我们今后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另一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地主劣绅，加入农民自卫军，并应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并指出土匪与农民之关系亦是一个重要问题，就广东而言：对于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这类土匪，应予以适当的联络；对于被地主利用压迫农民的这类土匪，我们只能用反对地主压迫之口号去对付他，但不宜专门攻击土匪，以免造成农民与失业农民（即土匪）互相屠杀互相积怨，而中土豪之奸计，尤其紧要者当土匪被利用来攻农民时，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露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对于拥戴土豪，专以欺压农民为业的土匪，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决议并提出全世界农民的真正解放，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相连接，我们还应在可能的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并助长全世界革命的进步。

大会最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的规定，选举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 9 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 5 人组成中央局，并决定中央领导机构的具体分工：陈独秀任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主要是所属的职工委员会），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并负责编辑《向导》，向警予负责妇女部，罗章龙、王荷波任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太雷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人。

党的“四大”对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认识，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发展。“四大”正确地估量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及政治势力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提出了以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没有正式提出过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这也说明了党在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四大”召开后中共中央为贯彻

大会决议作了巨大的努力，各方面都不断取得成效。但党的“四大”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在农民问题上虽然指出了农民同盟军的重要性，但是没有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且还错误地规定：“不宜由农会决定实行减租运动”。同时，对农民问题还主要是从租佃关系去区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各种农民，而不是从阶级关系划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佃农中有这三种人），这样，就难以解决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



海丰农民运动恢复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并且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国民党中央还设立了农民部，很快就改变了自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以来工农运动的低沉状态，通过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推动了广东农民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其中广东中部、东江、西江和北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发展更加迅速。

以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地区，在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期间，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农民运动转为公开，支援东征，东江农民运动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海陆丰是广东农民运动最早兴起的地区。1923 年元旦，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会员有 10 万人，彭湃任会长。第一次东征前夕，东江海陆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东江人民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军阀地主的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重租、苛利、军饷、捐税等剥削与压榨，又常受天灾兵祸之苦，人民苦不堪言。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后，退蛰东江一带，为维持其统治更加变本加厉地用人民的膏血来充实军队的饷源、官吏的私人腰包。而且越到穷途末日，越加紧对人民的劫掠与压榨。两年多来，税收一增再增。凡是能够榨取的，便巧立名目，什么都不忌讳。过去陈炯明在广州曾主张禁烟赌，因而有个好名声。但到了这时便不顾一切地增加税收，纵容种植鸦片，按亩收烟税，总其名曰："特别田亩捐"。开烟赌，卖官爵，到处成风，因罗掘俱穷，又特设"神庙坟墓捐"，在死人身上做文章，榨取油水。

陈炯明向来有家乡主义，但这时在他的家乡海丰以及陆丰也不例外。他的军队也是一次再次得向人民摊派军需费用，军队过境必到处拉夫，每派一筹饷专员到达，必封屋抓人，搞得鸡飞狗跳，直至专员腰包装满金银，变成富翁才离去。陈炯明部署对地方的搜刮过深，当时海丰当局所控制的报纸——《陆安日刊》也多有报导。陈炯明的统治对地方上各阶层的剥削压榨十分惊人，人民不堪其苦，对此恨之入骨，普遍都有反抗要求。特别是经历

了1922~1923年农民运动的广大农民，面对这种黑暗统治和自身的艰难处境，更激发了摧毁军阀统治，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精神。东征的炮声，也就自然成为号召广大农民普遍响应革命军的集合令。

广东革命政府为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进行东征，讨伐陈炯明。将所辖之许崇智建国粤军、杨希闵之建国滇军、刘震寰之建国桂军及谭延凯的建国湘军等组成东征联军，发布东征动员令，加紧进行各项准备。此时，彭湃根据国民党和共产党广东区委的有关指示，与在广州的东江海陆丰同志对如何配合和支援东征军进行了研究与部署，并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组织东征军先遣队，为东征军作向导。李劳工被委任为先遣队队长，在广州的人力车工人俱乐部中，挑选革命分子组成先遣队。这个人力车工人俱乐部，它的成员绝大多数为海陆丰籍的破产农民，其中不少是因为陈炯明解散农会后，生活无着，被逼来广州拉车谋生的。1924年彭湃到广州后便与李劳工、林务农等把这些人力车工人组织起来，通过俱乐部的活动，提高了工人们的觉悟，还培养了一批革命分子和骨干，许多人在以后的东征、海陆丰革命斗争和广州起义中，为革命作了重大贡献。先遣队由50多位精干分子组成，随即奉令“合同党军，分海陆两路进攻海丰”。由李劳工率领的先遣队，于2月4日从广州出发。先遣队利用熟悉地形与路径的优势和易于了解民情和接应群众等有利条件，绕道从崎岖小路翻越云峰，占据制高点，使敌处于受制境地，不能借此进行顽抗，而继续后退。革命军在神速进军追击中，先遣队也参加追击与截击。这支武装队伍为东征作了向导，后来又成为海陆丰农民自卫军的基础。它的组成，实际上是海陆丰农民自卫军的开端。

事先派遣干部回海陆丰，发动农民接应。1924年先后从海陆丰来了一大批人到广州参加革命工作，或参加各种学习。东征前夕，革命政府通过彭湃物色了一些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影响的人，事先派回海陆丰。做组织、宣传、情报及其他方面的策应工作。联系农民秘密组织，为革命军收集情报，准备内应。东征之前，为使进军顺利，急需得到东江方面的情报。在着手建立海陆丰情报网时，彭湃通知了在海陆丰坚持秘密斗争的“十人团”收集情报，还特地通知了陈修秘密到广州，布置任务，交给电报密码。

在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援下，东征军很快收复潮州、汕头，陈炯明主力被打垮。

革命军东征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



于国共合作，贯彻三大政策，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焕发了广大军民的革命精神。其中还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得到了经过前期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全力支持。东征的胜利，击溃陈炯明的反革命军队并将其逐出粤东，改变了整个粤东的局势。海陆丰农民运动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恢复农会，重兴农民运动。

国共合作建立一年多来，在广东首先开展起来的国民革命，对农民运动既有明确的政纲，又在实际工作中，号召和支持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开展农民斗争。经过各地农民运动干部的努力，广州郊区及附近的许多县先后掀起了农民斗争，相继成立农民协会和组织农民武装。1925 年 5 月 1 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此时全省已有 22 个县成立了县级农会，有组织的会员 20 余万。东征以后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得到彭湃、阮啸仙等人为领导的省农民协会的领导，再不像以前那样孤悬于全省的局部地区，而能与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相呼应。

在革命政府统辖下，农会成了受政府保护的合法组织。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府）根据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广东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采取了许多措施支持农民运动。特别是针对各地的地主、反对官吏压制和摧残农民运动的状况，从 1924 年 7 月起至东征前，先后发表过两次宣言向公众表明了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与立场。国民革命发展到东江地区，农会组织再不是陈炯明统治时期到处都是乌云压顶，而为革命政权所“督促”、保护、禁止各种仇视势力的侵犯。海陆丰农民运动在这一崭新的革命形势下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起来。

东征军与周恩来对复兴海陆丰农民运动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农民运动在政治上、组织上获得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领导。东征军到达海陆丰，第一件大事便是恢复农会。3 月 3 日海丰全县农民在“农旗蔽野欢声雷动之中”，开欢迎东征军大会，同时宣布恢复农会。随军东征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彭湃、谭平山等到达海丰作了立即恢复农会等几项重要决定。3 月间，海丰各区农会先后恢复。中旬，海丰县召开各区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恢复县农会，改海丰县总农会为海丰县农民协会。选举彭湃、杨其珊、李国珍、林甦、郑志云、吴振民、林朝宗、万维新、张学、余创之、李劳工、叶子新为执行委员，彭湃为执行委员长。大会通过恢复县以下各级农会，实行“二五减租”，建立和训练农民自卫军，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委任各区农会特派员，清算和惩罚反动地主等决议。陆丰农会也于 3 月初宣布恢复，4 月初召

开各区农民代表大会，12 日成立农民协会，由庄梦祥、郑重、张威、黄振新、林水奇、陈谷勋、黄一农、吴祖荣等 9 人担任执行委员，以庄梦祥为委员长。

海陆丰两县农民协会为恢复和发展基层组织采取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针，在"县农会实力已固，当力及各区乡，以期区农会乡农会次第成立"时，着力领导各区乡建立农会组织。县农民协会首先集中了前期的农运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吸收了进步的知识青年，经过短期训练，作为县农民协会的特派员、宣传组织员，派到各区乡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农民协会的章程按照省的制定，农会名称改为农民协会，设执行委员会。又改为以"区"为单位区以"乡"为单位。在各乡农民协会成立的基础上，各区先后召开农民代表会，成立区农民协会。彭湃及其他领导人分别前往各区农代会表示祝贺与演说。海丰县至 7 月初已有 447 个乡农会，会员 35 100 人（户）。

国民党中央和广州的革命政府也十分重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恢复和组织农民自卫军。早在 1922 年，彭湃开始组织农会时，已把农民需要自卫列入农会纲领，但未组织农民武装。在他奔走营救在狱农民的过程中，与农民交谈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农民要求武装自卫甚迫切"。经过前期农运挫折的农民群众，大都从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也懂得了需要有农民武装自卫，迫切要求组织自己的武装。"我一入海丰境，农民向我表示减租，取消苛捐，发给武装。以上三项由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这是澎湃随军入海丰后，了解到农民最迫切的要求。而他本人于此时更强调："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亦非农民武装不成"。1925 年 3 月 15 日，革命政府派出了由林甦率领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武装考察团 10 余人到海丰进行考察。他们带来 3 000 发子弹供应农民自卫军使用，同时又带来大量的宣传品，在沿途经过的区、乡进行宣传。3 月 16 日，海丰正式恢复农会的同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农会把建立农民武装作为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的首要任务。随后革命政府又陆续派遣了不少干部来充实农民运动和其他工作的领导工作。

海丰农民自卫军以李劳工率领的东征军先遣队为基础，扩充成立县农民自卫军，设总队。总队部设于海丰县城东林氏祖祠，委李劳工为总队长（后徐成章、吴振民），委林甦为党代表（后为余创之）。全队官兵 200 余人，设 2 个中队，其成分为一半农民，40% 为失业农民，10% 为工人和外县



人。5 月初中共海陆丰特地调李劳工到陆丰负责组建农军，成立了陆丰农军总队，李劳工任总队长（李牺牲后，黄埔军校毕业生颜国潘继任）。根据农会决定，两县农会先后在各区设立常备农军小队。其人数根据各区大小，从几个人至十几人不等。他们拥有武器，执行维持乡村革命秩序、指导乡农军。各乡农会成立时，都建立起当时叫做农民自卫军后备队的不脱产的农民武装队伍。随着 1926 年农民运动走向高潮，这种武装的数量很大。除县、区、乡脱产与不脱产的农民武装外，其他各界也有组织武装和进行军事训练的，如县总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学校组织学生军。此外，海丰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为防止敌人利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机，破坏和捣乱后方社会秩序，摧残民众，强调“农民应起而武装自卫”，通过《扩充农军决议案》，决定除农民自卫军以外，“应新增各区勇敢农民 200 人，组织农民义务队”，由农军总队部编练。县常备农军由县农民协会农军部指挥，其供给基本上靠当地筹集，初期主要缴获和没收反动分子的财物，或是对不法分子的罚款及农会的经费，还有一部分在县政府税收项下拨给。海陆丰农民武装从无到有，组成了县常备武装、区常备武装和乡村不脱产的武装队伍。这些武装的武器装备，有多方面的来源：由革命政府直接调拨给自卫军；由东征军从缴获敌人的武器中分发一部分给自卫军；由农会组织农民和农军，收缴当地反动分子与敌军散落各地的武器；农会通过发动群众，从农民内部收集各种比较低劣的武器来武装区乡农军；有些区、乡农会，还用土法制造若干武器等。海陆丰两县脱产常备的农军武器装备是比较好的，两县西北山区的不脱产乡农军的武器也稍好。

周恩来、彭湃总结了 1924 年在广东部分县建立农民自卫军的经验，不但十分重视组建常备的和非常备的农军，不断扩展数量，改善武器装备，同时十分重视对他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不断提高素质，使之成为保卫农民协会的支柱，成为参加国民革命斗争的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队伍。因此，中共海陆丰领导下的两县农民协会在组建农军的同时成立了农军教练所。

为适应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海陆丰两县的农民协会还决定自己培养农民运动的干部。海丰《陆安日刊》报导说：“农民协会，现以农民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缺少指导人才，以资训练，特在准提阁创办一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君为所长，兼收男女学生 40 余名，一切膳宿费概由协会供应，闻已于 4 月 20 日开课云”。彭湃在百忙之中，亲自为学生讲课。这些学员绝大多数

是20岁左右的进步知识青年，经过学习和训练，大都在农民运动和其他工作中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们中不少人成了优秀的农民运动的干部，在以后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中，不但担负了重要的工作，有的甚至为革命献出了热血和生命。陆丰县农民协会根据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的指示，也于5月间举办了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基层农民协会培训了一批干部。

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建立了海陆丰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运动。一年多来，由于国共合作，国民革命有广大的工农群众响应和参加，已使广东革命政府在风雨飘摇中保住了广州根据地，进而跃马东征。广东的农民也逐渐觉悟和组织起来反抗土豪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然而国民党里面的右派势力却“常任农民协会为右派官僚、军阀、地主所摧残”。鉴于此，中共“四大”在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中，进一步强调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同时应注意利用每个具体争斗的机会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作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并使农民觉悟国民党及其政治的势力，可以利用保护农民利益的；但必须农人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才能以工农阶级势力影响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在工农势力的影响之下向前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主义成功的前提，农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我们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争斗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

党的“四大”决议，对即将建立地方组织的海陆丰，健全党的组织，发挥党独立自主地领导农民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1925年3月，以彭湃为书记的中共海陆丰特支成立，海陆丰的农民斗争有了领导核心。接着，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也在海陆丰建立起来。青年团员分别担任着各个群众团体或地方工作机构的任务，成为党的得力助



手，通过各种活动联系了各阶层的广大青年，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把他们团结在党、团组织的周围，并使团的队伍逐步扩大，加强和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海陆丰农民运动得到迅速恢复发展。不仅成立了海陆丰特支，使海陆丰的农民斗争从此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且恢复了全县各级农民组织和农会组织，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广大群众欢欣鼓舞，群众性的活动很多，各种工作都呈朝气蓬勃的势头。各地农会带领广大农民积极支援革命军东征，使得东征军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够打垮陈炯明，保卫了广州革命根据地。

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经过一年多的奋斗，广东农民在政治经济斗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在斗争中，农会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至1925年5月初，广东全省已有22个县建立了各级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21万人之多。其中，广宁、花县、顺德、番禺、东莞、海丰、陆丰、中山等县都已建立了县一级农民协会。根据农民协会章程中关于"五个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即组织省农民协会"的规定，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总结一年来广东农民运动恢复发展的经验、教训及成立省农民协会，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大会开幕的同一天，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等4个团体也发起召集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时值"五一"国际劳动节，两会代表联合广州工人、郊区农民和青年革命军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者达20余万人。他们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实行全国工农兵大联合的决议，一致认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并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攻，显示了工农兵大联合的精神。

自5月3日起，两个大会分开举行。出席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17人。大会由阮啸仙、彭湃主持召开，由于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会议进行得异常顺利。大会共进行了15天。会上认真总结了一年多来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政策。大会通过了7个决议案，主要有《经济问题决议案》、《农民协会今后进行方针决议案》、《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决议案》以及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等决议案。

在大会通过的《经济问题议决案》中，制定了广东农民当时在经济方面的斗争目标和具体的经济政策。《议决案》指出，自80年前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我们在经济上所受痛苦的原因，完全是番鬼佬（帝国主义）及其扶植之下的带兵老爷（军阀）、官僚政客、豪绅。但除此之外，大



地主、高利债主、奸商（买办阶级）的掠夺剥削，也是我们在经济上所受痛苦的一个大原因。

中国在80年前，自从被红须绿眼的番鬼佬（帝国主义）打入以来，中国所有海关和铁路航道一概就被他们管理，关税同他们协定，他们的火车货船可以自由通行中国都市乡镇。他们将用机器生产出来的在自己国家不能销售而剩余的无数货品，无限量地搬入中国，销售于中国的都市乡镇。同时又用最低的价钱尽量购买中国所有一切原料搬到自己国家制成货品，又以较高的价格尽量销售于中国各都市乡镇，以掠夺中国大批农工阶级的现金。不但如此，他们直接在中国投资，在中国境内设立无数工厂，就近吸收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制成货品以更多的掠夺中国农工阶级之现金。他们用机器生产的货品，通通走入中国农村，打败我们的农业，破坏了农民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而一概用了他们祖国的货品。

番鬼佬（帝国主义）还有两个最狠毒的计谋，第一个就是每年向中国输入无数量的鸦片烟，销售于全中国各都市乡镇，不仅直接从中国赚取无数白银，而且使我们因身体削弱自己不能做工生产，不能自给自足，必须购买外国货品以满足需求，以此赚取更多的银两。第二个就是在中国境内行使他们的纸币，操纵我们的金融。无论在都市还是在农村方面，亦多数行使这种纸币，无形之中掠夺了我们无数量的钱财。我们现今在经济上所受最厉害而且最共同的痛苦，第一是高利债。计债主放银，通是加一九扣，九出十三归。第二是当押店东之重利盘剥，计各县当押，通是每月每两纳利三分。第三是一班奸商（买办阶级）之居奇垄断。第四是一切苛捐杂税及额外征收。除此之外，雇农、佃农、自耕农尚各有特别的痛苦状况。

农民协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必须引导全阶级农民做经济斗争，以期达到真正的解放。这种真正的解放，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才可以得到。若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这种解放，是不能轻易得到的。”提出了当前广东农民经济斗争的共同目标是：反对高利债（并父债子还）与高利押，创办农民银行（或叫做信用合作社）；反对奸商（买办阶级），创办购买合作社、贩卖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反对一切苛细杂捐及额外征收，尤其是田土业佃保证费。此外，应该将农村中民团、保卫团、乡局等掠夺的一切公款一概收归农民协会，自己管理与支配。

为此，它提出应该全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具体的经济斗争策略，努力奋斗。在雇农方面：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待遇等；佃农方面：打倒包农

制，规定最高限度租额和公用度量衡，取消押租额和一切附加送品，禁止地主无故换田等；自耕农方面：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一切额外征收，反对预征钱粮等。但我们应该注意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联，若要达到经济斗争之目的，切不可忽略了政治斗争等。

为了引导农民运动更加健康正确的发展，大会通过的《农民协会今后进行方针议决案》中，在充分肯定广东农民运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着重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并对基层一些农民协会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检查纠正。

第一，农民协会的一些基层组织和会员存在依赖思想。他们或者过分依赖政府势力，忽视自身力量。若不革除这种依赖性，不仅协会永无发达希望，而且一旦政治势力转移，协会亦会因之而沦于消灭。多数农民亦怀疑协会为政府机关，同深疑惧，相互观望而不敢加入，协会势力会更加孤立无助；他们或者只依靠协会的个别负责人或农民运动者而蔑视自己，并不积极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对于领袖固然要信服，但同时不能放弃监督的责任。若协会无广大群众为基础，结果造成农民协会为几个人的会，而且容易为桀骜不驯者利用，藉协会名义图谋私利，为拥护个人的工具等。《议决案》指出："农民解放能否成功，全视农民自己有无能力为断。"

第二，农民协会的部分基层组织和会员不注意斗争的策略。他们不观察客观的形势，及检阅自己的实力，以为农民协会一旦建立，以前一切压迫痛苦均可以立刻解除，提出一些当前尚不能实行的要求和口号，反倒促使反动势力之团结，向协会联合进攻。故此后提出口号，须结合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在行动之前有充分的宣传与准备。他们或是忽视对中间力量的争取与团结，致使一般自耕农及半自耕农有时竟站在地主方面，与协会为敌。为纠正这种错误，《决议案》指出："农民阶级为扩大自己实力起见，应结合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贫农、雇农各阶层，集中于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在政治的斗争中，足以壮声援，在经济的斗争中，又足以孤立大地主之势。""同时对乡间的小商人，亦不宜取一律攻击的态度。"

第三，因土豪劣绅加紧进攻，协会忽略了对会员的宣传和训练工作，致使会员组织观念薄弱。一年来对于我们自己阶级的最大仇敌——国际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仍未能深入人心。此后应努力在农民群众中竭力宣传，帝国主义是农民一切仇敌的指挥者。而且竟有会员不明白协会是自己阶级斗争机关，是自己的大本营，而自己是这队伍中的其中一员。同时协会亦不会利用



机会训练会员，各级协会执行委员会及会员大会均未依照章程举行。“会员入会之初，虽怀热诚，惟不久即发生隔阂，结果农民协会成为一块空站牌。嗣后须按章开练，注意普遍宣传与训练。”为使协会与会员关系密切起见，今后要加强会务，不容放弃征收会费。督促会员每月缴纳会费，不仅使协会经济赖以维持，而且加强了会员与协会的联系，感情不至浅薄。今后希望各级协会均能按照定章征收会员会费。农民协会为整个之组织，须统一一切政策及主张。大会督促各级协会应注意下级协会对上级协会应有定期报告，并将上级协会之命令传达于一般会员，这是每一个组织缜密、有战斗能力的团体所不可或缺之要件。

第四，部分农民没有从根本上认清农民协会的性质和地位。农民协会代表农民，是农民阶级的大本营，与压迫阶级对抗，为农民的利益而奋斗。它没有姓氏之分，没有乡届村届之别，也没有县界省界甚至于国界之差，不论肤色、男女，只要是农民，利害总是一致的。虽协会的会员较未入会的农民更觉悟更先进，但协会是为农民阶级谋利益，协会的所作所为，于协会和其他农民都是有利而无害的。农民协会与旧式的农民会、或农务会，为绅士的团体，大有分别。我们须从根本上认清农民协会是代表农民的利益，没有姓、族、乡、区、县、省、国的界限，也绝不容许妄生界限的争议。

第五，有些农民群众对革命的对象还没有认识清楚，对敌人不敢进行阶级的斗争。为此，《议决案》对国内外敌人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深刻揭露，引导农民认清革命的对象。《决议案》指出：“帝国主义是我们一切仇敌之发号施令者，不打倒它，农民便永远无解放之日。”今后注意应该以取消不平等条约、增加关税等口号，列举事实，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与罪恶，使每一个会员都明白何者为帝国主义，应如何打倒它。并且在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人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引导农民反对帝国主义。“除了第一个敌人帝国主义而外，便数到军阀。凡是压迫农民鱼肉良善之军队，不论是属于那一边，均以军阀名之。至于一般的贪官污吏，又无不与军阀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一年来失败之经验，告诫我们不能徒然哀求政府。固然可以根据国民党政府保护农民利益之宣言及政纲，以反抗军阀官僚的压迫，但同时须用具体的事实让农民明白这些假借国民党名义而违背党纲的是反革命派，证明他们的反动行为。并告诉农民国民党的政纲现在已因这种反动势力充斥了各县，而无从实施，除非工农联合起来才有肃清之可能，农民阶级的利益才可获得真正的保障。然

"农民近在眼前的敌人，便是土豪劣绅。"我们须扩大反抗劣绅之运动，使每个人都深切明白劣绅是农民之死敌，靠吮吸农民之膏血生存，务将这般寄生废物剔除乡党。

因此，农民的敌人，"并不是单个的，而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之联合压迫。他们虽然形式上没有一种联络的团体，而在阶级的利益上是一致的。"对此，农民"欲打倒敌人解放自己，亦急需与我们在同一地位上的工人阶级互相联络，密切的结合，向我们共同的敌人反攻。"亦"须纠正以往之过失，向前奋斗，以求达到最后之胜利。"以上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宝贵财富，对以后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

大会还在通过的《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议决案》中指出，现在农民自卫与民团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查民团的经济来源，完全来自乡村公产公款，或苛抽农民血汗，而且多是容纳游民土匪，事实上纵不专为压迫农民，也不能维持乡村治安。而自农民协会建立以来，农民有了自己的团体，在自己阶级组织之下反抗地主阶级。农民协会是农民阶级自身组织的职业团体，应有自己的武装，为农民唯一之保障。地主阶级不能强迫农民加入利益相冲突之民团，同时不能向农民抽捐养活有害农民之团体，如有抽捐时，农民可以武装反抗。但是，由于民团分子大多是农民，或失业的农友，因此我们应注意采取下列两种方法：一、宣传、扩充农会会员，训练农民自卫军及扩大其组织。这样一来，民团中的农民，以自己有农会及武装之保障，必会与土豪及地主脱离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二、反抗地主阶级抽捐办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如地主阶级不能抽捐，他的民团就办不成，他是决不肯拿自己的钱来招土匪游民保护自己等。

最后，大会号召全省农民联合起来，选举产生了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等被选为委员会委员，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并发布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

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省农民协会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加强了对广东农民运动的领导，促进农民运动健康迅速的发展，而且对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风暴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四大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中国南部，1925 年二三月间，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帮助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打垮了军阀陈炯明的主力；5 月初，在广州同时举行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在农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加强了对广东工农运动的领导；5 月下旬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叛乱，使广州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7 月，广东革命政府改为国民政府，并将所属各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北部，1925 年三四月间，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3 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全国规模的哀悼活动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群众示威运动；反奉运动也逐渐扩大。尤其是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爆发，更把全国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随着“五卅”运动以来革命形势的日趋迅速高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引起资产阶级的极大惊恐。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也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在中国共产党内，对革命领导权问题也存在分歧。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对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已有进一步的认识，而陈独秀等人仍然持消极态度。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也愈加猖獗。六七月间，戴季陶主义作为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基础正式出笼，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反对国共合作和阶级斗争，开始形成了国民党内的新右派。8 月间，国民党右派在广州策划谋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成为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公开信号。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廖案的发生，使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愈加尖锐，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危机。

为了总结“五卅”运动以来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壮大共产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并确定今后革命运动的斗

争方针，1925 年 9 月 28 日 ~ 10 月 2 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也称“十月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目前的形势仍然是革命的和革命化的形势，由此明确我们党的主要任务；二、我们党的群众性问题和从组织上巩固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影响问题；三、关于吸引农民参加革命运动问题和关于农民运动的形式和要求问题；四、关于全党从基层支部到省委、地委和中央的组织设置和积极性问题；五、关于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六、关于把工人群众集中和组织到工会中去的问题以及党在工会中有组织的影响问题；七、关于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参加革命解放运动的问题。

会议听取了陈独秀所作的中央局报告，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运动的方针，并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宣传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蒙古问题议决案》、《中局报告议决案》等。会议还听取了京区、粤区、湘区、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京区报告议决案》、《粤区报告议决案》、《湘区报告议决案》、《河南报告议决案》、《山东报告议决案》、《湖北报告议决案》、《救济问题议决案》等，并于 10 月 10 日发表了《告农民书》。

会议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的革命发展形势和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即对革命的态度。在《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指出：五卅运动后，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好时机，四个月来膨胀的革命潮流，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五卅运动真正是由各个革命阶级广泛参加的民众运动，中国革命运动现时所处的是革命潮流在群众中日益高涨的时期。会议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指出通过五卅运动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中已明显地站在领袖地位。史无前例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而资产阶级表现出极大的两面性，当他们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时，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联合，可是处处只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只要无产阶级在这与资产阶级共同斗争的时候，同时对国内资本家要求自己在



经济上的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时，国内资产阶级就立刻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会议认为，随着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将日益分化，这种分化的结果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仅反对无产阶级，而且会背叛民族革命。因此，会议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必须要格外集中积累自己的力量，与城市里民主派的一般民众结成联合战线，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能给帝国主义和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对于小资产阶级，会议指出他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同时还指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国际意义，认为中国革命斗争开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新战线，同时也就增加了世界无产阶级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

会议确定了继续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政策。会议在讨论戴季陶主义出现后，国民党进一步分化问题时，陈独秀提议“我们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会议指出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感觉到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另一方面，假使看不到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这时如果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将严重削弱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右派则会乘机夺取对国民党的控制权。因此，会议不同意陈独秀的提议。会议决定继续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但由于受陈独秀的影响，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分离称为共产派，提出我们不要去代替国民党左派；并对国民党左中右三派作了重新认识，指出：从前的右派已公然反动，脱离国民党而成为反动派；从前的中派产生了分化，一部分是现在的左派，一部分变成了新右派，所以现在的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新右派”的概念。而且还具体提出了划分左派、右派及反动派的政治标准。根据国民党改组后党内阶级分化日渐明显的情况，在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中规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竭力支持左派和右派斗争。同时还决定，非必要时新党员不再加入国民党，不在国民党中担任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虽然这些决定否认了退出国民党，但显然没有准备在国民党内争取领导权。

会议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农民与革命的关系，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会议明确指出：只有引导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运

动，才能给帝国主义和军阀以重大的打击。会议提出了党对农民问题的基本主张：一、没收地主土地，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指出：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倘若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会议认为如果不满足农民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10 月 10 日发表的《告农民书》中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但这须革命的工农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文件。二、巩固工农联盟。会议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在南部和中部省份逐渐发展起来，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责。三、组织农民，在乡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会议提出当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应是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由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要实行农民的乡村自治，直接参加乡村自治机关的普选工作；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等。指出：“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要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

会议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工人运动的趋向，确定了党在职工运动中应采取的方针。会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不会因为被压迫而消沉的。因为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的奋斗中已经获得了一些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并且较五卅以前有了更深刻的阶级觉悟及群众的组织和行动，而且已经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开始接触。但是，需要积聚更加雄厚的力量，准备更加剧烈的斗争。因而，这一时期，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方针主要是：要努力工会的发展及巩固，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同时不能忘了经济要求；要力争工会组织公开的自由，但同时必须长时期做秘密组织之准备；要通过党在工会中的组织，做宣传，使工会和党在事实上愈益接触，使工会在党的指导下行动等等。

会议分析了党组织的现状，强调了扩大党组织的重要性，扩大中国共产党为群众的党。会议重申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党组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措施。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应当指引群众前进的道路，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阶级——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实现国内革命民众政权及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为此，要扩大和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并决定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



协会及革命知识阶级团体里，组织共产党的支部和党团，要求组织自己的同志发展巩固党的组织，设法使革命分子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以后的斗争形势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重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指导和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党在民族革命运动高潮面前，首要任务就是要扩大自己的党，要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中特别注意形成党的组织，扩大联合战线，巩固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会议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变成真正的群众政党的组织，这样才能巩固党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和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会议还决定中央之下设立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后改为军事部）等机构，同时决定加强中央对北方工作的指导。这也表明了党已经开始重视军事工作。

1925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通告第六十八号》，对此次扩大会议决案作了若干解释。中央指出各种决案都十分重要，要求各地党支部组织党员认真阅读。通告指出这次扩大会议有两个重点：一、应尽量扩大本党组织，使之群众化；二、应尽量扩大本党的政治宣传深入群众，使本党成为事实上公开的党。

中国共产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有着重要的意义。此次会议党员数量增加了三倍，党已成为坚固的站在革命指导地位的群众的党了。这次会议在总结五卅运动以来，党领导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的方针；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决定壮大党的组织，设立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为发展党的组织和壮大党的队伍，为迎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一定的实际准备。会议作出了继续同国民党合作的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但却提出将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截然分开，不要去代替国民党左派，这是放弃领导权的错误策略，说明了党对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以及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后来共产国际也批评说：“这次全会主张放弃在整个国民党组织内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转而采取与国民党结盟的策略。显然，这种观点只不过是退出国民党的建议的另一种形式，是建议坚持退出方针。”

毛泽东在党内倡导农民运动

在全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运动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除了广东外，毛泽东领导湖南韶山农民运动，也开始了新的斗争。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长沙时，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交换了情况，对于国民运动和农民运动，作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随后，偕妻儿到长沙东乡板仓过春节。1925年2月6日（正月十四），毛泽东偕全家回到家乡韶山，同行者还有毛泽民。在此前后，还有一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进步知识分子如毛福轩、谭熙春、柳季刚、贺尔康、毛新梅等陆续回到或调来韶山。

毛泽东回到家乡，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韶山农民受尽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和压迫，过着极其悲苦的生活。毛泽东从小就了解和同情农民的痛苦和要求，积极支持他们进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这次回到韶山后，前来探望的乡亲络绎不绝。又正值春节，农民常三五一群地聚在一起搓麻将、玩骨牌等。毛泽东亦参与玩乐，借此与乡亲们交谈，了解情况。并利用农村中结婚、丧葬、寿宴等机会向群众作宣传。有一次，松树滩办丧事，毛泽东就借吊唁的机会，向群众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还时常邀毛福轩、贺尔康等一同走亲探友，深入到农民家中，与贫苦农民促膝而谈，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农民的革命要求，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毛泽东根据农民们亲身体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向农民们讲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他用算账的办法，说明农民劳动的成果大部分被贪官污吏和地主财东剥夺去了，剩下一小部分不够养家糊口；只有打倒地主阶级，废除剥削，贫苦农民才能有富裕的生活。他还联系世界形势，揭露了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蹂躏中国人民，指出帝国主义是封建军阀的后台，要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必须反对帝国主义。说明了农民遭受贫苦并非命定，而是洋财东（帝国主义）和土财东（地主阶级）互相勾结剥削和压迫农民所致，动员大家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当时，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锡，为了装饰门面，推行《湖南省宪法》，大搞"平民教育"。而毛泽东为了使广大农民能够学到文化知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便利用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依靠杨开慧、庞叔侃、柳季刚、李耿侯等贫苦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师，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设备，帮助农民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夜校开设政治、识字、地理、历史、珠算等课程，用学文化的形式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教育。他们利用农民所经历的现实情况，以农民习惯的表达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如教"手"和"脚两个字时，他们对农民解释说：每个人都有手和脚，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可是到头来还是落得两手空空，仍旧吃不饱，穿不暖；而地主有手不劳动，可是吃的却是鱼和肉，穿的是绫和绸，他们有脚不走路，出门还要坐轿子。这原因在哪里？合理么？这就是剥削和压迫。这样不仅使农民学到了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心灵深处激起了一团团反抗怒火，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

经过深入细致地宣传、发动和组织，毛泽东发现农民中有很多人具有很强的革命斗争性，团结了一批赤贫农民和贫苦的知识分子。韶山地区农民所受压迫日益加重，于是毛泽东就将他们秘密地组织起来。于1925年春，即开始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很快建立了29个乡秘密农会。

上海五卅惨案以后，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韶山地区20多个乡建立了公开的援助青沪惨案的群众革命组织——雪耻会，吸收农民中有反帝反封建要求的人加入雪耻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他们组织宣传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鼓动、宣传工作，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毛泽东以秘密农协为中心，在建立了雪耻会的基础上，于7月10日又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在成立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讲述了五卅惨案的真相，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罪行，号召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雪耻会成为领导农民斗争的公开团体。它还组织部分进步教师和从长沙、湘潭等地回乡休假的学生及有觉悟的农民，成立宣传队，开讲演会，编演文明戏，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举行示威游行，并派出纠察队守在一些关卡上，检查洋货，禁止销售。

在组织农民的过程中，韶山地区涌现出一批农运骨干。毛泽东十分注重在农村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他在初步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毛泽东经常找他们谈话，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对党对革命的认识，最后吸收了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第一批党员。并于1925年6月中旬，在毛泽东同志卧室的一个阁楼上，秘密地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当时的誓词是：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接着又成立了韶山党支部，指派安源工人党员毛福轩同志为支部书记，这是我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

在韶山，毛泽东还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并选择一些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开明绅士、小学教师参加，建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毛泽东在韶山地区建立的国民党区分部，有7处之多。由于当时湖南尚处在赵恒锡的残暴统治之下，这些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也都是秘密的。

当时毛泽东在韶山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十分艰苦。在韶山党支部建立后，韶山地区农民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领导农民向土豪劣绅开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初步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示韶山党支部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成立农民自卫队、女子联合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伪团防局长汤峻岩，公审了“保产党”头子张茂卿，铲除了这两个地头蛇。为贫苦农民长了志气，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威风。

1925年7月间，韶山一带久旱不雨，田地龟裂，青黄不接，饥民遍野。而地主豪绅却囤积居奇，高抬谷价。大土豪成胥生、何乔八乘机闭粜，把谷米偷运去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中共韶山支部研究，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一面派人与成胥生商议平粜，一面组织农民奔赴银田寺一带阻止地主谷米出境。在农民们的团结和巧妙斗争下，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纷纷开仓，不敢闭粜。这就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阻禁平粜”斗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韶山农民又开展了平抑物价、阻止运粮出境、增加雇工工资以及减轻租额等经济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与此同时，韶山还开展了夺取教育权的斗争。当时，韶山地区的教育权掌握在绅士唐默斋等人手中。他们坚持旧学，反对新学，贪污学款，克扣薪饷，还暗中破坏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准办农民夜校，甚至不准雪耻会向农民和学校师生宣传爱国。毛泽东和党支部的同志们几次秘密开会，决定利用赵



恒锡颁布的教育法令关于地方教育机构负责人任职年限的规定，发动师生改选教委会和学委会，以夺取教育权。经过激烈的辩论、斗争，终于夺取了教育行政管理权和财政权，共产党员庞叔侃、李耿侯、蒋梯空等分别当选为教委会和学委会成员。随后，韶山地区各公立学校和族校校长，都改由进步教师担任。

毛泽东身在山村，却心系全党全国。为了加强与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联系，他派遣中国共产党员钟志申在湘潭银田寺办起“合作书店”，作为秘密联络点。书报、文件通过“合作书店”源源不断地传递到毛泽东手里。中共湘区委遵照中央通知，选派由毛泽东推荐的贺尔康、庞叔侃等人去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湖南区委自1925年冬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抽调大批农运干部充实基层工作。年底，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五届湖南籍学生结业返回湖南，和其他农运干部一起，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分赴湘南、湘中沿铁路各县积极开展农运工作，推动了农运的发展。不久又成立了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共产党员发展到110余人，并建立了总支委员会。从此，湖南农民运动进入了有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但仍然处于秘密状态。在韶山从事农运期间，毛泽东还到过安化、梅城等处，会见曾在一师的同学贺仙阶和当地的共产党员卢天放、姚炳南、刘肇经等，了解情况，指导他们建立国民党组织，并把农民秘密地组织起来。

湖南农民运动的不断发展，引起了统治的反动军阀政府赵恒锡和地主豪绅的恐慌和仇恨。他们在帝国主义扶持下，纠集反动势力疯狂屠杀革命者，镇压农民运动。污蔑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并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捉拿毛泽东。幸得开明绅士、县议员郭麓宾探悉和及时通报，毛泽东在韶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安然离开。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群众的愤慨，他们纷纷行动起来抗议赵恒锡政府的暴行。各地农运特派员和农运干部深入农村，组织发动农民，和全省人民一道掀起了反英讨吴驱赵运动。大规模的群众性驱赵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韶山农民运动为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供了宝贵素材，为尔后党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摸索了经验。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

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但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为了反对这两种倾向，解决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于 1925 年 12 月 1 日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必须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为了加强领导和加快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迎接北伐，中共湖南党组织制定了《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强调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就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革命，如果农民不起来，党不积极的从事农民运动，便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根基，国民革命就始终不能成功。因此，领导农民运动是党的"第一重大工作"。纲要分析了农村各阶级，规定了党的策略，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进行一场农村革命。

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开展艰苦细致工作的成果，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斗争、坚持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尝试。在韶山农民运动中，毛泽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号召群众，公开组织雪耻会，秘密组织国民党，将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先吸收在国民党内，经过考验，再将中坚分子吸收到共产党或青年团内。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表明，党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搭起了一道桥梁。由于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有了初步的实践，又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无论党内党外，都请他出任指导农运的职务，起草农民问题的决议案，讲授农民问题方面的课程，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广州沙面罢工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为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特别是工农运动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南方各省工人运动更因条件有利而得到了发展。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沙面工人大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消沉的局面，成为工人运动重新走向新高潮的起点。

自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沉的状态。广州沙面罢工之前，“简直没有工人运动可言”，这之前，“中国工人遭受三大惨剧：第一是上海祥经丝厂烧死女工100余人；第二是山东坊子煤矿，淹死工人75名；第三是唐山煤矿压死工人53名。这些惨案，应该激起工人的奋起，但当时工人竟无丝毫表示，这可见当时消沉到如何程度了”。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大会闭幕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工人部，各地执行部和地方党部也都设有工人部。不少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各级工部中担任要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除了直接发动和组织工人，还可以利用革命统一战线形式，利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通过中国国民党工人部深入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也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从此，工农运动在国民党管辖地区有了合法地位，广东工人运动便在新形势下蓬勃发展起来。

国共合作建立以前，广东虽然也有一些工会组织，但情况十分复杂。广州地区工人不到20万人，却有160个工会。其中，有些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有些是黄色工会。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广东区委认识到，要领导和开展广东工人运动，必须建立统一的革命工会组织。为此，中共广东区委派出区委有经验的工运委员冯菊坡、刘尔崧、施卜等，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以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部长的工人部成立后，原负责广东工运的冯菊坡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秘书。刘尔崧、施卜、梁憬然、梁九等为干事，刘尔

崧还兼任了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部长。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发起了“劳工统一运动”，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从此，广东工人运动便在新的形势下发展起来。

1924 年 5 月 1 日上午，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代表 70 多个进步工团的 1 000 多名代表聚集在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聆听孙中山关于《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的著名演说。孙中山指出，中国和中国工人阶级贫困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要像英国、俄国的工人，担负国家的大责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自由。

5 月 1 日下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推动和廖仲恺的支持下，为了解决广东工人运动面临的迫切任务，广州工人代表会在西瓜园太平戏院开幕。与会代表 160 多人，代表 70 多个工会的 10 万余工人。大会开幕之日，正值国际劳动节，代表大会开幕式与庆祝会同时举行。除大会代表外，还有 2 000 多工人参加。大会由廖仲恺主持，廖仲恺报告开会后，孙中山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工人“立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工人大团体”。他说：工人既然有了团体，就要为提高工人的地位，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摆脱奴隶地位而奋斗。他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要“作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勇敢地担负起“把中国变成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抬高国家地位”的责任。孙中山的这次演讲，对工人群众起了很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当天开幕式后，他们就举行示威游行，参加的工人、学生达 1.5 万人。他们沿途高呼：“一致联合去干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压迫!”“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等口号，表达了广大工人团结战斗的共同要求。在会上，各代表报告各地工会情况和各厂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情况；组成交通工人、工厂工人、杂务工人等部委员会，分组讨论各种问题；讨论并通过了 20 多个决议案，诸如电报局内工人联合及组织、电话局内工人联合及组织、海员及轮渡工人司机工人结合、交通工人联合问题、工头及包工问题、学徒不开夜工、同业划一工价及同业搀夺问题、工会组织采用下级组织、组织职业介绍所、商团问题、工人教育、设立工人医院、组织工人委员会、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选举条例、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和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之组织及职权等议决案；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选举刘尔崧、鲍武、周祯等 5 人为常委，杨殷为顾问，孙律西为秘书，铁路、海员、轮渡、建筑、邮务、洋务、起落货、车衣、印务、理发、酒楼



茶室、手车等17个工会代表为执行委员，并决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担任会长。关于商团问题，大会议决案严正指出："凡商团不得干涉工会事情及有侵犯工人自由之事"；"凡属工人不得充当商团军，一经查出，即行驱逐出境"；"如商团压迫工人时，凡加入工人代表会之工会及工人，须一致对付及援助"；"工人得组织工团军自卫"。这充分表明工人组织对于国民党右派、广州大买办阶级豢养的反革命武装的鲜明态度。从此，广州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广州工人阶级从分散走向联合，广州工人运动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从而为广州和广东全省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以后，便在工人中积极开展活动，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工运骨干；建立工人自己的武装——工团军，以对付反动势力的镇压；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广东工人代表会半年内发展到15万人。

广东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声势不断壮大。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此十分恼怒，千方百计找借口进行破坏。夏秋之际，帝国主义支持买办陈廉伯组织商团军，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组织所谓"商人政府"。帝国主义一面威胁孙中山不得"压迫"商团，一面对中国人民施加压力。1924年6月，广东工团军正式成立，发表宣言，揭露商团横行无忌、勾结帝国主义私运军械入口、阴谋颠覆革命政府的叛变勾当，并宣布工团军将于各种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工团军以施卜（共产党员）为团长，刘公素、胡超为副团长，以10人为一分队，（以三分队为一小队，以三小队为一中队）共30余分队，300多人。工团军的成员是从各工会挑选的思想进步、身强力壮、自愿参加的青年人组成，工资由原单位发给或由所在工会津贴。工团军内党团员仍回原单位过组织生活。平定商团叛变后，工团军及农讲所学员与农军集中到黄埔训练，教官有李之龙等。工团军受训练后，各人均回原来岗位。工团军训练只办过这一期。至1925年12月，工人武装即以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形式出现了。

1924年6月19日，沙面商人在当地域多利酒店欢宴安南总督梅兰，安南革命志士范鸿泰向餐室投掷炸弹，梅兰无恙，2法国人被炸死，6人受伤。英法等领事团便借口向广州政府提出抗议，认为广州有各国"危险人物"容留，要求"取缔"此种人；同时颁布规定出入沙面办法的"新警律"。新警律规定：从8月1日起，沙面华仆出入，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粘主任照片，每晚9时后，华人非携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凡欧美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等，均可自由出入。这明显是对中国人民的无理歧视和极大侮

辱，是对广东革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公开挑战。这种歧视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做法，不能不激起沙面同胞和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这时，国民党右派主张妥协退让；国民党左派主张用强硬态度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必须靠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来解决。广州政府对此进行抗议，对方根本不予考虑。7 月 15 日，在充分组织和发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领导沙面洋务工人宣布罢工，英、法租界的中国巡捕也参加了罢工斗争，坚决反对“新警律”，强烈要求沙面当局取消“新警律”。接着，全市各进步工会纷纷起来响应，用罢工支持沙面洋务工人的反帝斗争。一时间，沙面这个往日的闹区变得十分萧条冷落。罢工工人和各银行职员均离开沙面到长堤沙巷一带住宿。此时沙面无人服务，水电两项亦无人照料，领事团大起恐慌，当时急调各外舰水兵上陆勉力维持水电工作，但因不谙机器，竟将水厂总机弄坏，一致不能发动，用水中断，外人餐食已处于无人供应状态。英人无法，便张贴紧急通告，要求广州政府疏通解释，希望各华工复业。但到 16 日，英国领事忽然改变态度，无意接受调停，调陆战队义勇队巡守东西桥，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华工愈加愤激，罢工风潮益形扩大。工人们多次召开反对沙面“新警律”大会，并通电全国：“新警律不完全取消，誓不复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幸全国同胞，共赐援助。”

罢工初期，帝国主义气焰仍然十分嚣张，沙面英领事态度顽固，拒不收回所谓“新警律”。工人代表大会号召广州各界人民团结起来，组织沙面罢工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从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给罢工以大力支援。广州各工团和军政两界人员纷纷向沙面罢工团慰问，募集捐款，援助沙面工友。北京、湖南、香港等地均通电响应，并筹款表示支援。这次罢工使沙面一切商务陷于停顿，帝国主义经济受到很大打击。英、法帝国主义者害怕罢工继续扩大，局势更加难以收拾，当罢工坚持到 8 月 17 日，帝国主义被迫屈服，不得不向罢工工人让步，沙面英法领事和洋商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其解决的条件是：“一、新警律取消，修改旧通行证，华人外人一律平等。二、通行证一年者附相片。三、临时通行证不附相片。四、每晚十时以前通行无证。五、私家雇役一律复工，补发薪水。六、公役一律复之补薪，惟巡捕许其自动的辞职。七、双方不得借故报复”。8 月 13 日，广州万余工人“持旗燃炮，游行各街”，庆祝沙面事件交涉胜利。翌日，英法领事忽又推翻原议，全体工友愤激异常，风潮较前更烈。这时，英法领事见工潮转剧，工界团结极坚，只得推说是出于误会，非有意毁约。反苛例大会要求英法当局须有切



实保障始行复工。在国共两党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8 月 19 日，沙面工人在经过这样反复的斗争，坚持了 22 天，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条件如前，工人、巡捕回沙面复职，工人在欢呼声中复工了。巡捕抵沙面，即向工部局辞职，欢送者在桥燃竹，历 1 小时而返。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英、法帝国主义的气焰，而且震动了广州和港、澳，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沙面罢工是中国工人为中华民族争自由、争平等的政治大罢工，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的精神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沙面罢工打破了京汉铁路罢工以来工人运动消沉的局面，推动和影响了全国的革命运动，成为我国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沙面罢工后，各地罢工事件不断发生，逐渐形成了高涨局面。从此，“整个的工人运动是由守势转到进攻的形式了”。

上海青岛日商纱厂的罢工斗争

在革命运动逐渐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下，在中共“四大”为全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作了思想及组织上的准备后，1925年2月和4月，上海、青岛两地的日商纱厂工人先后罢工，揭开了五卅运动的序幕，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全面高涨的前奏。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实行经济侵略，在纺织业中最为突出。日本纱业在中国拥有庞大的势力，到1925年，日本在中国境内的纱厂有41家，雇佣中国工人达8.8万多人，占中国境内全部纱厂数和工人数各1/3。其中上海是日资纺纱厂的集中地区，青岛次之。实力最大的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是具有雄厚国家资本的企业，19家工厂在中国就有16家，其中11家设在上海。1925年在上海的中外纱厂、纱锭中，日本纱厂占55.2%，纱锭占52%。而华资纱厂只占37.9%，纱锭占37.2%。由此可见，日本在上海的纺织业不但在其他国家资本之上，而且远比中国资本多。

日本在华大举设厂，目的就是要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占领中国市场，使自己国家过剩资本获得更大的超额利润。中国工人在日本开设的工厂里遭受残酷的压榨与折磨。工人的工资很少，一般每天只有两三角，极少数工人才在三角以上；如此微薄的工资，本已难养家糊口，日本厂主还利用各种罚款克扣工资，许多工人只好常年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工人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实行六进六出，即日班早6点进厂，晚6点出厂；夜班晚6点进厂，第二天早6点出厂。到了周末晚班工人另要加工6小时，从星期六晚上直到第二天中午，一连做18个小时。工人还经常遭到打骂，出厂要被抄身，大小便没有自由，种种非人的待遇不胜枚举。日本厂主还实行所谓养成工的办法，对训练的女童工施以奴隶教育，等其长大后，成批替换成年男工。如此既节约了大笔工资的支出，也有利于控制工厂秩序。青岛日商纱厂的条件，与上海不相上下。在这种情况下，日商纱厂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日益强烈。



1925年2月2日晨5时许，上海小沙渡的日本纱厂内外棉八厂日本领班在粗纱间殴打一打瞌睡的女童工，将其腿部踢伤，这个女童的姐姐与日本领班交涉，也被打了耳光。这激起了全车间男女工人的愤慨，遂与日人争理，引起工人反抗；日本厂主遂以此事为借口，将粗纱间甲班50余名男工一律“削除工籍”，并将工资扣留不发。日本资本家这样做，正是借机用养成工代替成年男工。当日，乙班工人自动停工抗议，以示与甲班男工共进退。2月4日，被开除的甲班男工要求厂方结算存工，日本人不但不发给，还将6名工人代表送入公廨：1人判刑，5人被训斥。日本内外棉八厂领班毒打并虐待工人的消息传出后，工人群情激愤，酝酿罢工。

八厂工人的自发罢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组织了专门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指定邓中夏、李立三负总责，在上海的100多名党员全体动员，并以沪西工友俱乐部为公开指挥机关，全力组织这次罢工。为了便于活动和指导罢工，沪西工友俱乐部从租界搬到苏州河北岸的潭子湾。这里不仅属于华界，而且与内外棉东、西五厂，七、八、十二厂隔河相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沪西工人俱乐部发出号召工人罢工的传单，提出了以后不准外国人打人；增加工资二成；八厂辞退工人复工；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罢工期间工钱照发；以后不得随意开除职工等6项要求，号召工人一致罢工。“反对东洋人打人”成了拨动工人心弦的战斗口号和正义呼声，罢工风潮很快波及上海其他日商纱厂。

9日下午4时，内外棉第五（东西两厂）、七、八、十二厂全体工人9 000余人同时退出工厂，到苏州河北岸的潭子湾荒地上开会。当场宣告内外棉纱厂工会正式成立，成立工人纠察队，宣布同盟罢工。当即议决罢工办法10条，在宣言中提出7项要求：以后不准打人；工资增加1/10，不得无故克扣；恢复第八厂被开除工友的工作，释放被拘押的工友；工资每两周发放一次，不得延期；储蓄金发还工友，储蓄赏算为工钱按期发给；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罢工期间工资照发。10日，罢工工人200余人到九、十三、十四厂实行“打厂”，在厂工人蜂拥而出。同日，八厂全体养成工也参加进来。至12日，由内外棉5个厂扩大到内外棉全部11个厂，1.7万余人全部罢工。2月14日，日华内外棉第三、四两厂3 500余人罢工声援，工会提出8条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日，杨树浦大康纱厂第一、二厂4 000余人罢工，提出7项要求。东亚麻袋厂1 500余工人也投入了罢工。15日，丰田纱厂第一、二厂6 000余人罢工，提出9项要求。16日，同兴纱厂2 000余人罢

工，提出 8 项要求。18 日，裕丰纱厂第一、二厂 4 000 余人罢工，提出 8 项要求。各厂所提要求内容大致相同。这样日本在沪的 6 个会社共计 21 家工厂，3 万余人参加了这次罢工。

中国共产党领导罢工的专门委员会，为了保持原始状态罢工的活力和秩序，李立三、邓中夏等几乎每日在潭子湾组织一次群众大会，每日发出几种新闻式、俚歌式的传单，或是通报罢工动向，指示罢工办法，各厂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等。同时，尽量扩大罢工规模，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援助。上海各业工人积极支援纱厂工人罢工。机器工人俱乐部等除尽量实力援助外，还发表通启，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内外棉工友等 7 项要求。恒丰纱厂等厂的工人们踊跃捐款。杭州、绍兴工界团体通电支持。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组织了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发表宣言声援，并募捐救济。中国纱业资本家也以工人名义捐款 1 000 元等。这样使本来就规模浩大的同盟罢工更加雄劲有力。

这样大规模的罢工，在上海日商纱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日本侵华势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震动了日本政府和日本资本家。日本外务当局认为"罢工性质已非专对资本家之单独劳资争议，而带有排外之性质"。日本资产阶级团体惊呼上海罢工是"整个日本纺织业之生死问题"。日本政府和日本资本家百般设法破坏罢工。日本驻沪领事要求中国官方对罢工工人以"严重之取缔"，并指令日本驻华公使向北京军阀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赔偿罢工时期的各厂损失，并转令沪官厅制止工人的暴动"。20 日，日本政府公然指令日本驻华公使，向北京军阀政府和上海地方官厅交涉，要求取缔罢工。日使馆照会中外交部，驻沪总领事致函淞沪警察厅，一直要求取缔罢工。23 日前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军舰"对马号"、"伏见号"均调来上海，实行武力恫吓。

上海日本资本家还举行日商代表会议，各厂相约共同策划对付罢工的办法。有的以开除工人相威胁，有的则采取"红薄子赏"的办法利诱工人上工，但工人无一去领。上海日本商业会议勾结工部局派出副巡带领巡捕，先后逮捕工人领袖、罢工工人及援助工人之学生，共计 60 余人。浙、沪警察厅也完全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积极参与镇压工人的活动，布告严禁罢工，封闭工会，逮捕工人领袖及罢工工人。沪西工人俱乐部等工人团体被搜查，领导罢工的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邓中夏、孙良惠、杨之华及许多工人被拘捕。上海工团联合会等工贼组织则进行种种破坏活动，诸如向日本提供工



运情报，分化罢工工人队伍等，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镇压罢工的别动队。

但是，中外反动派的种种破坏阴谋活动并未得逞，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及上海各业工人和各群众团体的援助下，继续坚持英勇的斗争。由于当时棉纱价格很贵，生意发达，使日本纱厂在这次罢工中遭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据上海日本商业会议估计，罢工各厂每日损失计约1.46万两。仅内外棉11个厂，损失即达150万元以上。日本资本家无法坐视这样巨大的损失，被迫让步，不得不与工人进行谈判，以求结束罢工。同时，在工人方面，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这次罢工已经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相当沉重地打击，而且工人生活已经有相当困难，在一定条件下应该将罢工结束。

2月25日，资方代表内外棉株式会社董事长武居绫藏、该社上海支店经理冈田源太郎及大班元木被迫与工人代表进行会谈。参加谈判的工人代表是同兴厂刘贯之、大康厂张佐臣、日华厂李瑞清、裕丰厂万金福、内外棉朱国平、丰田厂张应龙及工会雇请的英国律师克威。代表工人提出8项最低要求，资方代表对工人提出的要求进行多方狡辩和抵赖，经华商纱厂联合会、沪西四路商界联合会、五马路商界联合会以及浙沪警察厅长、上海交涉署交涉员多方出面调停，最后又经上海总商会斡旋，终于在次日达成复工协议："一、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二、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三、储蓄奖金照章满五年发还，未满五年被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给；四、工资两星期发一次。"并决定由总商会、工人律师出面向警厅、捕房设法释放被捕工人。这个协议虽未完全满足工人的要求，但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取得了部分的胜利，这就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自信心，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

3月1日下午，沪东、沪西分别在引翔港工会和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后面空场召开了工人大会，报告谈判经过，宣告复工。3月2日，各厂工人开始复工，警察厅陆续释放被捕工人，后来邓中夏、杨之华亦被释放。复工后，李立三召集俱乐部和各纱厂工会20余人，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决定各纱厂已宣布成立工会的，一律组织工厂委员会，未成立的，设法成立。

上海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除了使工人在经济上得到一些收获，还加强了工人的团结，迫使当局和厂主实际上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存在，争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通过这次罢工，工人群众也增强了对工会的信仰，积极入会。至3月下旬，小沙渡、杨树浦、曹家渡三个地区，登记工会会员2万多人，

声势为之大振，迅速扩大和健全了工会组织，并且加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成为五卅运动的预演。

上海日商纱厂罢工的胜利，直接影响到与上海同一系统的青岛日本纱厂。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后，青岛的共产党组织加强了在沙厂的活动，在大康厂运动300多个小头目加入秘密小组。大康厂从济南招募的练习生，暗中联络工人组织工会。在司铭章、苏美一等带领下，秘密成立大康工会，会员有2 000多名。日本资本家发觉后，大约在4月14日，搜走工会名册，逮捕活动分子，开除工会发起人。青岛当局亦派警布岗协助日方。群情激愤，于4月19日下午9时，大康纱厂首先爆发罢工。

大康纱厂5 000余工人全体罢工，其中女工占1/10，童工占6/10，剩余3/10为成年工人和熟练工人，整体力量相对比较大。工会名册被搜走后，工会迅速重新编制了会员名册，会员增加到300多名。罢工后，组织罢工委员会、纠察队、调查队、宣传队等抗议日本厂主破坏成立工会和私刑拘禁工人代表，并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一角、改善福利待遇、减少工时、保护女工童工等21条要求。厂方不仅置之不理，并且日夜调动保安警力频频示威。罢工委员会起草了《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在4月26日出版的《向导》周报上全文刊登。21日下午，全体罢工工人结队游行，中共山东地位的主要成员尹宽、王翔千、王尽美、刘俊才、邓恩铭等齐集青岛，坐镇指挥。

接着大康纱厂附近的日内外棉、隆兴纱厂，市内的铃木纱厂，沧口的钟渊、富士、宝来等厂亦相继罢工，同情援助，罢工人数已逾万名。日本资本家不得已，向工人代表答复3条：公司廉价供给面粉，增加15分钟休息，增加日币一钱补助金。工人不满意，坚持罢工。在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的领导下，青岛工人利用上海工人的经验进行斗争，并得到上海以及全国工人的汇款和派人直接支援，迫使日本工厂主不得不作出让步。鉴于罢工已达18天，工人的生活十分困难，党的领导者也认为在迫使资本家让步的条件下，应早日结束罢工。5月7日，由日本驻青岛领事和中国商会出面调停，日本资本家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承认工会为工人代表机关；工友出勤15日以上给一袋白面，扣洋三元，如面价增高不另加钱，面价跌落则少扣；饭钱加洋一分；取消押薪制度；工人因公致伤工资照发，医疗费在外；降低房费，改纳原价1/4；吃饭时间延长20分钟；日人不得打骂华人；公司所收罚款交工会作补习教育之用；罢工期间的工资发放1/2；双方



签字立约。

5 月 10 日晚 6 时，罢工工人复工。罢工也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是资本家对工人代表在此次罢工中发挥核心作用怀恨在心，迫使各代表自动辞职，其中大康 25 人，内外棉、隆兴 26 人。代表们表示："牺牲个人不足为惜，唯望工会能持久存在，谋工界同仁幸福，是所愿耳。"这一闻名全国的青岛纱厂工人罢工，历经 22 日，显示了青岛及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和勇敢坚强的巨大力量。

上海和青岛的罢工斗争迅猛开展，都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是，日本资本家并不甘心，特别对于工会必欲速之而后快。这也预示着更大的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即将到来。结果，调停签字的墨迹未干，便制造了血案。

邓中夏发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自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已经三年了。开第一次大会时，正是中国劳动运动发生第一次高潮的时候，影响甚大，震撼一世。京汉“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阶级几乎全取纯粹的退守态度，工人运动陷入低潮。1924年北京政变以后，直系军阀势力颠覆，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帝国主义者亦因政局之变化，而相互间发生冲突的现象。在这时，劳动运动确已进入一个复兴的时期，又有开始第二次高潮的可能。所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集之不容缓。

邓中夏在会前发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对工人组织、经济斗争、争自由运动、参加国民革命、工农联合、国际联合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阐述，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阐明了基本原则和策略。这篇重要文章，实际上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各项决议案的基础。

文中提出大会第一个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组织问题。由于我们没有组织，或组织不好，尽管资本家是最少数，工人是最大多数，但是工人向资本家的反抗奋斗总是以失败告终。工人首先要明白组织的性质与作用，我们的组织是一个阶级的组织，并且是一个斗争的组织，它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向资本家作战的组织。组织法有两种原则：“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把同一产业和同一职业的所有人都组合起来。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产业组合可以使工人团体的势力扩大而统一，可以致资本家的死命，可以消除工人间之等级。但是在目前一些小工厂及手工业可以酌情采用职业组合。工会组织的系统应是：“支部”设一“干事会”；干事会之上有“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之上有“工会执行委员会”，便成为某个产业机关的工会。再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支

部为基本组织，依工作部分而分。“支部”在组织上有严重意义。支部是工会的基础。只有支部组织好，然后上层构造的工会才不至于发生动摇；支部是训练工友的养成所；支部是便于战斗的武器。发生大罢工，固然要靠各支部羁勒部伍以听工会之指挥。所以“支部”在组织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工会公开的地方应该进行，在严重压迫的地方亦极其适用。

关于组织系统，工人阶级要有地方组合和全国组合。“团结即力”是我们唯一的信条。我们团结，不能存狭隘的眼光，以为只团结某一个产业机关的工友，要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并且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因为资产阶级是整个的，我们工人阶级亦是整个的，我们如要推翻整个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必须有整个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才有可能。并且大会要讨论组织“全国总工会”，成立全国总工会是这次大会的主要成绩。

其次，大会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经济斗争问题”。提出了经济斗争的几大目标：一、八小时工作制。二、最低度的工资。要各地斟酌生活程度，规定一个最低的工资率来，资本家雇用工人，工资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此数。三、反对一切虐待，务必要将厂中不合理之管理苛章与无人道之管工人员，尽行撤废及驱除。四、改善女工童工生活。他们做同样的工作，必加至同样的工资，其厂中并应为女工童工设置特别之设备与教育娱乐等机关。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只能作六小时工作，工资依旧。五、劳动保险——劳动保险的范围，有健康保险、残废保险、失业保险、老年恤金、死亡恤金及遗族恤金等种种，限令资本家对于工人因工作上及其他故障，不能做工的时候，给以经济上的补助，以维持工人本身的治疗和生活，并减少工人家属生活的困难。要达到这些要求，准有靠工人的组织力，利用时机实行罢工或怠工的手段，才能强制资本家屈服承认而执行。

关于互相援助的方法，则参考第一次大会“罢工援助案”。兹撮录于后：

“（一）凡遇某地某工会发生罢工时，应设法通知全国各工会；或即以现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通讯义务（按此项条文现在当然要全改）。（二）凡某地某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事情发生时，即通知各会员干下列各事：甲、一处罢工，所有工人均不受该处东家之雇请；乙、派人慰问或通讯慰问；丙、派人帮忙办理事务；丁、捐助经费以维持罢工伙食；戊、如东家势力强大，不易压服，则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

同时，应注意经济斗争也是政治斗争，切不可专为经济斗争的狭隘意义所囿，而忘记了政治斗争。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绝对之关联，如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也绝不可能解决。所以必须把经济斗争接连着政治斗争乃有意义。大会还应讨论的是争自由运动问题。提出了争自由的三大目标：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言论的自由；同盟罢工的自由。欲争得这些自由，大会应该明确的作出如下规定：一、定“二七”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二七”之役虽是京汉路为成立它的总工会而起，然而它确是争自由的开始，确是为全国工人争自由的壮举。应规定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每年在这一天全国各地应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一方面追悼为我们争自由的死者，一方面提出争得自由的呼声向政府严重警告。二、要求政府废除罢工刑律及治安警察法。可以联合各界表同情的人士共做。北京曾发生过“废止治安警察法运动”，要联络各地各界做此项运动，同时并举。三、参加废止出版法这一类的运动。上海租界还有印刷附律，华人全体反对，我们亦应表同情并参加之。这些东西虽不为工人而定，然而于工人自由的剥夺，是与各界一样的。四、反对政府制定什么工会条例工人协会法以及工会规程（湖南有）这一类束缚工人自由的法律。因为政府制定对于工人的法律，不出两个大原则：一、根本不愿意纯粹工人的团体成立（如会员要劳资合组或工人与高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合组之条款）。二、成立的可以随意由政府取缔和解散。所以这种法律有不如无。三、政府如制定劳动法或保护劳工法时，须准全国各地总工会代表出席，共同订定，否则，绝对无效。四、如政府制定何项选举法时，工人应发起争选举的运动。争得选举可以使我们的代表出席，可以将我们取得自由及改善劳动条件的议案提出，可以揭破压迫阶级的黑幕并监督其行动。

大会还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参加国民革命问题”，确定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态度，以为工人阶级之指导。

“国民革命”亦叫“民族革命”。各阶级对于国民革命之目的各不相同：封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因为外族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由于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然而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却是为了要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之压迫。故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因为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我们必得参加国民革命先打倒这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得到初步



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是以自己阶级的目的而参加；所以我们在国民革命中应以自己阶级的利益为前提。

因为无产阶级参加奋斗，目前国民革命确有左倾趋向。殖民地半殖民地里国民运动如不顾及工人的利益要求，那便是假国民革命，不是真国民革命。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是为了阶级利益而参加的。中国目前的政治争斗就是国民革命。无产阶级从事国民革命：一、固可使我们目前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得到若干的自由与机会，能够更使之格外发展，格外稳固；二、并可使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而巩固。消极方面，得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积极方面，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政权需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争取，我们若不取，资产阶级也会去取。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还是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

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国民革命：一、可对帝国主义施以最大的打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是维持帝国主义生命的源泉，国民革命把此源泉断绝了，帝国主义的江山去了一大半，不倒而自倒。二、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势力更加扩大。各国无产阶级虽有国籍的不同，而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则一致。须得全世界联合起来，准对资本帝国主义进攻，并根本推翻之，然后才能得到全部的解放。三、即从消极方面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他们的老板就是帝国主义，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老板打倒，擒贼擒王，那么国内的资产阶级亦容易连带的推翻了。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又是为的实行世界革命得到全部解放而参加的。

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它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它自己阶级的目的，推翻目前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时它并不放弃阶级斗争，而且必要阶级斗争，打倒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从此把国民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完成它历史的使命。

大会还要讨论的“工农联合问题”。中国自从资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驱之于反抗动乱

之一途。近年来如湖南、陕西、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已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运动而进入于经济组织与政治斗争，已表示他们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重要成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广东已有组织之16万农民群众中可以看得出来。

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和利害关系，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工人固然不能忽略了团结城市劳动者，然而为增厚援军以打倒共同敌人，亦不能忽视了与乡村中农民之紧紧的联合，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80%，其数量远超过工人数百倍以上。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地系统地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广东全省农民协会，本年（1925年）5月1日与本会同在广州省城举行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本会应与开一联席会议，讨论共同奋斗的目标，以及彼此间结合之方法与互助之计划。

大会最后要讨论“国际联合问题”。无论从经济斗争上还是从政治斗争上说，国际联合都非常之必要。我们不仅是此一国与彼一国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而且扩而大之，全世界各国间的无产阶级要有总联合。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们掠夺无产阶级的方法国际化了。帝国主义间联合共同对付工人阶级，假使工人阶级不越过国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资本家，便真会死无葬身之地。

现在世界的工人国际有两个：一个在俄国之莫斯科，叫做“赤色职工国际”；一个在荷兰之阿姆斯特丹，叫做“国际职工协会”。阿姆斯特丹的“国际职工协会”，现在尚在社会民主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是主张改良的，主张维持资本制度，要工人忍耐着吃苦，好好替资本家作工，不要说话。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却不然了，刚刚与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反，只主张工人统一的联合战线，根本推翻资本制度，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加入的标准，是看它们那一个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因此，我们主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固要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且对于与国际结成亲密的关系之种种方法，亦要有具体的规定。

邓中夏在文中认真总结了几年来全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深刻地分析和阐述了工人组织、经济斗争、参加公民革命及工农联合等问题，制定了基本目标和原则策略，为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了深入细致的准备，是二次劳大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案的基础。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

中共四大结束后，全国革命和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预示着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指导和推动全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实现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扩展并巩固工人阶级的力量，准备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落到实处；同时，粉碎国民党右派网罗各种工贼、流氓建立所谓全国各省区工团联合会，窃取工运领导权，分裂、破坏各地工运的企图，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根据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规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应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于1923年5月1日在武汉举行。但由于“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低潮形势，大会未能如期召开。

原来中国的劳动运动在三年前曾发生过一次高潮，发生的罢工，大小不下二三百次；组织在工会中的会员，共计已超过27万余人，在中国历史上绽放了万丈光芒的异彩。那时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于5月1日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50余人，通过议案九件，并由大会决议翌年五一节仍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大会，不幸翌年二月京汉铁路发生争集会结社自由的大罢工，被直系军阀及驻汉帝国主义联合破坏了。是役被杀者40余人，被捕者30余人，被开除失业者千余人，影响所及，不仅北方所有铁路工会皆遭封禁，武汉、上海及其他各埠工会亦遭波及，幸免者，只有湖南、广东、香港几处工会而已。工人阶级在此种严重压迫与摧残之下，不能不改攻为守，于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不得不停顿了。直到1925年4月，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迅速发展。党根据形势的发展，为了扩大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决定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决定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广州

工人代表会这四大工会的名义，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党中央决定不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而用四大工会的名义发起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是有缘故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2年8月迁往北京，在“二七”惨案后被查封，其上海分部因负责人袁大时被捕叛变，工作也一度停止。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成立了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管工人运动。中执委书记邓中夏实际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另一方面，中央不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当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消息传开后，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他们污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过激派”，并收买一些工贼，组织“劳工反共产救国同盟”，并准备以工贼控制的工会名义，召开“全国工会大会”，成立“全国工团联合会”，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唱对台戏。为了对付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打消有些工会的疑虑，决定不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召集大会，并派人尽可能劝说一切有影响的工会参加大会。

1925年4月8日，四大工会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敝会等以中国各工团，应即本阶级互助精神，谋全国一致之团结，特发起于本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业由敝会等各派代表在广州设立筹备处，望全国各工团派遣正式代表出席”。

通告发表后，国民党右派操纵上海工团联合会，以上海纺织工会、船务栈房工会、车磨工业联合会、参战华工会、印刷职工联合会、沪杭铁路工人同德会、油漆业工会、安徽驻沪劳工会、履业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粤侨工界联合会、同德工友联益会、绸缎染业工会、华洋馆业伙友会、丝厂女工协会、理发业工会、制墨工会、洗衣业工会、机器工会、电机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水木工会、茶房工会、煤业同德会、装订职工会、船帮伙友工会、茶房同志会、浙江驻沪劳工会、温台驻沪木业工会、安徽驻沪工业协会、江苏驻沪劳工会、江西驻沪劳工协进会，江北旅沪工人联合会等33个工团名义，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通电，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用心险恶”，“不能令其代表全中国之无产阶级”。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广东总工会和广东机器工会，以及武汉、长沙、天津及北方铁路由工贼把持的一些工会，都拒绝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但国民党右派破坏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企图抵消共产党对工会运动影响的阴谋未能得逞。



大会开幕的同一天，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值“五·一”国际劳动节，两会代表联合广州工人、郊区农民和青年革命军人举行10余万人的示威游行。他们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一致认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显示了工农兵大联合的精神。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如期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78人，代表164个工会，54万余会员。所有重要产业，如铁路、海员、矿山、纺织等，都加入了；所有重要城市，如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香港、长沙、青岛、济南、大连、北京、太原、郑州、九江、潮汕等，也都加入了，总而言之，所有真正的工人团体，几乎全体加入。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斯托洛夫斯基出席了大会。中共中央向大会发了贺信。中共中央在给大会的来信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末运来了，此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向帝国主义举起反叛之旗，中国的革命运动就是全世界的大运动之一。……有明了的政治观念，有集合的战斗力，在国民运动中能够给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由于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大会进行得异常顺利。开会前后大约十天，预备会议二次，正式会议九次，工农联合会议一次，五一大示威一次，五七工农兵联合大示威一次，行俄民授旗礼一次，公祭黄花岗一次，其余赴各界欢迎会十余次。共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通过正式议案13件，其余临时案如援助罢工等约20余件，其中主要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大会在选举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成员后，于5月6日胜利闭幕。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决议，根据中共四大关于工人运动决议的精神，明确规定了在国民革命中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组织原则。

在政治斗争方面，大会指出：工人阶级应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在斗争中必须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特别要团结广大农民，“必须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取得领导地位”。大会通过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是说明“工人阶级何以必须作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工人阶级目前争自由运动的必要”。其中指出：每个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工人阶级不根本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不能完全解放自己，因此，工人阶

级要参加到目前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去，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目前政治斗争的具体目标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罢工自由，普选和加资减时运动。

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大会对工农联盟有了明确的认识。5月1日晚，工农联欢大会上通过了《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一致认定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劳动大会还专门作出《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断定“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提出龚睿那应帮助农民组织农会，工会、农会应当互派代表，工会应对农民的斗争给予切实的援助。

开展经济斗争，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生活水平，是工人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大会通过了《经济斗争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了经济斗争的意义，指明了目前经济斗争的具体要求。大会指出：劳动者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而目前工人运动中最迫切要求是，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规定8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虐待，改善女工、童工之生活，实行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

在《组织问题的决议案》里，强调工会的阶级性，“无论工会的组织形式有何不同，但工会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的工作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所以，工会会员不宜包括雇主、高级职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工会是阶级的，但工会的组织形式要灵活多样，要适合本国工业发展的程度、政治环境和文化程度等特点。该决议案是说明哪一种组织法好，产业组织是最好的，所有铁路、海员、矿山、纺织以及其他新式工业，皆绝对宜采用产业组织法。职业组织是不大好的，新式工业绝对不宜采用，只小工厂和手工业可以相当酌量采用。行会组织是最坏的，应该改造，才能真为工人利益而奋斗。此外关于工会之基本组织，以及政治压迫的地方之变相组织，亦有规定。

为了巩固工会的组织，提高工人的战斗力，必须加强工人教育。《工人教育决议案》说明工人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指出了实施工人教育的意义，第一是促进工人觉悟，第二是训练斗争能力。决议规定无论何种形势，均应开办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阅书报社，从事化装演讲、公开游艺，以达到教育工人的目的。

第二次劳动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对国民党右派、工贼和流氓分子破坏本次大会的卑劣行径群起痛击，纷纷揭露这些反动势力破坏工运的真相。大会

通过了《铲除工贼决议案》，主要说明为什么出现工贼、工贼对于工人阶级前途发展的障碍，以及铲除工贼的方法，并列举了马超俊等 19 名“罪恶最著”的工贼姓名以昭告全国。其中指出：资产阶级破坏工人势力的手段，一方面是利用他们的政权、军警、法庭监狱，以摧残我们；再一方面是豢养一班走狗，即所谓工贼，从我们工会中，以陷害我们。现在工贼几乎全国皆是，这几年我们工人的事业，如罢工，如工会，给他们破坏不少。此次大会，各省代表皆言各地深受工贼之痛苦，于万众愤怒中通过一铲除工贼决议案，其办法，一面将工贼姓名事实宣布全国；一面由各工团会组织“工人自卫团”以武力对待之。《铲除工贼决议案》以前不太引起人们的重视，事实上，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决议案，不仅仅表现了与会代表对各地工贼破坏工人团结和工人斗争的恶劣行径的极大愤慨，而且大会再三强调工会是“阶级的”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反映了党在统一战线中要独立领导工人运动的思想。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斯托洛夫斯基在大会期间多次发表讲话，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他指出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一个，没有两个，与世界无产阶级一致结合，才是打胜仗的保障。5 月 3 日，大会在听了奥斯托洛夫斯基的报告后，全场代表举手拥护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定，鼓掌欢呼，经久不息。当日，大会致电莫斯科，正式加入赤色职工国际。本次大会还分别对香港、广东、上海等地的工人运动，作出了决议，对发展这些地区的工运，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组织上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机关，实现了中国工会运动的统一和工人阶级的团结。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并宣布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结束，今后全国工会统一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总章》全文共 5 章 25 条，包括总纲、组织、公约、经费和附则。第一章《总纲》明确规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及其 10 项职责。第二章“组织”，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执行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最高机关职权。执行委员会下设干事局，驻会办理事务。必要时，可在地方设办事处，可在会内设特别委员会或特设机关。第三章“公约”规定：各工会必须实行本会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和命

令；各工会接到本会通知，须对已发生的工人斗争一致进行声势上、经济上或实力上的援助；实行工会统一，各工会间的争端必须听候本会仲裁，不得互相攻击；各工会对本会有不满意之处，可向本会抗议或向代表大会控告，但不得有破坏本会言论和行动。第四章规定了经费来源，第五章为附则。

大会按照这个章程的规定，选举了由25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他们是：林伟民、苏兆征、戴卓民、邓培、刘文松、孙云鹏、刘少奇、李森、谭影竹、刘和森、曾思盛、刘公素、梁桂华、吕棠、何耀全、李铃、郑泽生、孙良惠、邓中夏、李成（即李立三）、袁告成、高秀炳、刘俊才（即刘子久）、钟伯兰、赵悟尘。5月7日，全体执行委员召开第一次会议，互选林伟民为执行委员长，刘少奇、邓培和郑泽生为执行副委员长，并设干事局，林伟民兼总干事，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中共中央委派邓中夏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总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设办事处。大会还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大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标志着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4年来的英勇斗争和流血牺牲，不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的屠杀、镇压所屈服，战胜了国民党右派和各种反动势力的捣乱、破坏，正式实现了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的篇章。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统一的组织，有了指挥工人斗争的总机关。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通过的各项决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作了重要的准备，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次大会“的确开了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光荣的新纪录”，如邓中夏所说，对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等问题的认识“虽然还不能说已很深刻，但至少可说已有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萌芽。”在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全国地区性总工会和全国性产业工会在第二次全国工运高潮中纷纷建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就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



枪杀顾正红事件

1925 年，上海日华纱厂的二月罢工和青岛的四月罢工斗争胜利结束后，纱厂工会组织日益发展，工会常常出面代表工人利益向厂家交涉。工人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和仇视。一家日本报纸称：中国劳工运动的复兴，“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故英、美、法、日等国，对有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咸认此风一盛，则各国在华工业，将受绝大之影响”。因此，帝国主义加紧暗中策划，决定采用高压手段来打击中国工人运动。

四五月间，日本资本家就借口棉价升高、纱市清淡压缩生产。同时，复工后撕毁了二月罢工所订的协议，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开除工人，变本加厉。各厂工人的抵制和抗议，连绵不止。5 月 7 日，上海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以工会系在共产主义“指挥下”为由，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宣称他们的同业会与“此类工会一无关系”，扬言工会如组织工人罢工，就“采取强硬态度”“关闭工厂”，并决定“与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官宪交涉，以求充分取缔煽动者及工会的活动”。

根据当时原棉价格高，棉制品价廉的情况，担心罢工斗争对工人自身不利，中共组织指示工会采用轮流怠工的方法，来对付日本资本家。于是，从 5 月初起，在工会的统一部署下，内外棉、同兴、日华等厂纷纷展开怠工斗争，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各工会酝酿罢工。

日本资本家为了打击工人的斗争，疯狂破害工会积极分子。在 5 月 10 日以后，3 天之内就借故开除工人代表 30 余人。5 月 14 日，日本资本家又突然宣布开除内外棉十二厂工人两名，工人推选 5 名代表向厂方交涉，日本大班竟通知巡捕房将 5 名代表抓走，工人等据理质问，日本人竟蛮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打工人，受重伤倒地者 5 人。工人忍无可忍，再次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的镇压。因为七厂织布是靠十二厂提供棉纱，日本资本家便以十二厂停工无原料为借口，迫使七厂工人停工，企图制造工人之间的矛盾。七厂工

人根据中共组织关于轮流罢工的指示，决定用上工来支持十二厂工人的罢工；倘若不开工也要照领工资，以粉碎日本资本家“关厂”的阴谋。5 月 15 日清晨，中共党员刘华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集各厂工人代表会议，提出建议：七厂是织布厂，要靠十二厂供纱、在十二厂罢工时，七厂坚持上工，迫使日本资本家做“无米之炊”，可以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打击。

5 月 15 日，下午 5 时左右，内外棉七厂夜班工人五六百名照常上班，日本厂主不准工人进厂，工人群起质问日本厂主：工人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此时工人越聚越多，一致坚决要求发给工资。愤怒的工人猛力撞开大门，冲进工厂。日本领班和包打听一见工人进厂，就拿起木棍铁棒对手无寸铁的工人们行凶，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青年工人顾正红，他站在队伍的前面，看见已有好几个阶级兄弟被打伤，更是满腔怒火，高喊：“东洋人打人了！”并带领大家冲入物料间，每人拿一根“打梭棒”，用作反击的自卫武器。这时，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副总经理）元木和七厂大班（经理）川村，带着手枪，率领一群流氓打手，杀气腾腾地向门口走来。大班川村看见领头的正是注意已久的工会活跃分子顾正红，恶狠狠地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击中了顾正红的小腿，顿时鲜血直流。顾正红没有畏怯，忍着疼痛，抱住身边的小树，继续号召工人斗争，坚持战斗。他向工友们高呼“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啊！”杀人犯川村又接连向他的头部、腹部放了两枪，并以腰中的毒刀猛刺顾正红的头部。英勇无畏的战士顾正红，终于倒在了血泊中。顾正红身负重伤，被工友们送往愚园路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所办同仁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延至 5 月 17 日晨 7 时不治身亡，年仅 20 岁，为反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在这次血案中，被殴打成重伤的还有黄福全、周阿大、徐阿炳、李小龙、吴阿四等 7 人，轻伤有数十人之多。

顾正红，（1905 年～1925 年 5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积极分子。

1905 年，顾正红出生在苏北阜宁县獐沟区篆河乡小顾庄（今滨海县正红镇正红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6 年，因家境贫困，父亲顾宝苏去上海做工。顾正红 11 岁便给地主家放牛。1921 年 10 月，家乡遭水灾，母子 8 人一路讨饭到达上海。父亲在一家油厂做工，靠挣工钱无法养活一家人，顾正红便同弟妹拾煤渣、拾破烂，勉强度日。17 岁那年，父亲托人说情，让顾正红进了日本资本家办的内外棉九厂（今上海市第四棉织厂）当



扫地工。劳动几个月，工资分文未发。顾正红听说车间“拿摩温”（即工头）克扣工人工资，就同几个伙伴约好，在一天放工后，等在“拿摩温”回家的路上，将他痛打了一顿，结果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开除。后来，在穷工友的帮助下，他又进了日商内外棉七厂（今上海第二棉织厂）布机车间做工。当他看到日本资本家经常殴打工人、欺凌工人的罪行，心里便燃起了难以扑灭的仇恨烈火。

1922年夏，中共地下党在沪西开办工人补习夜校，并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顾正红积极参加夜校学习和俱乐部活动，明白了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坚持斗争，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他很快成了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有时趁工头不在车间，顾正红便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大家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他还教工人唱“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歌曲。1925年2月2日，内外棉八厂发生了日本监工殴打女工、开除50名男工的事件。八厂工人自动关车罢工。中共抓住时机，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战斗口号，发动上海22家日商纱厂工人先后举行罢工。顾正红参加了罢工鼓动队和工人纠察队，积极向工人宣传罢工的意义，揭露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中国工人的种种罪行。经受了斗争锻炼的顾正红，不久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5月17日，在工潮中牺牲。

顾正红被杀害的事件发生后，内外棉纱厂工人义愤填膺。当晚，内外棉各厂工人立即召开会议，连夜起草抗议宣言，提出承办凶手、赔偿伤亡工友损失、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8项条款。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第三十二号通告，向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指示，“应立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发布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共工人同胞”；筹募捐款，援助日商内外棉厂罢工工人。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连同昨日罢工的十二厂共8 000多工人，一致举行罢工，强烈抗议日本人残杀顾正红，呼吁各方援助。当日各厂罢工工人2万余人在潭子湾集会，组成罢工委员会，并成立了纠察、交际、救济、演讲四个工作队。下午，上海工商学界33个团体立即成立“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作为罢工工人的后盾。17日，各厂工会代表又在潭子口三德里集会，决议加强组织，联合办公，推选刘华等为总主任。18日，内外棉工会把顾正红灵柩从租界运动闸北，男女工人结队往迎，沿途一致高呼“誓死坚持到底！”“要行凶的偿命”等口号。下午，中共又组织4 000多人在烈士灵前集会，工人轮流演说，控诉日本资本家的罪恶。每天前来吊唁或慰问的各厂工人、学生、各界代表络

绎不绝。

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三十三号通告，进一步指出："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工作上，在反对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为此，各地党组织"应即邀当地C.Y.（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组织演讲队时，应设法使国民党各区分部"和我们合作"。通告还特别指出，演讲的内容应"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为限。"同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宣传联席会议，地委负责人庄文恭在会上指出要协助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指导各种援助公认的运动；发动各团体作露天演讲；由全国学联通告各地学生会募捐和抵制日货等等。李立三提出公祭顾正红作一大示威运动。

对于工人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竭力加以扼杀。日本驻沪总领事迫使军阀当局取缔工会，镇压罢工，军阀当局无不从命。工部局（公共租界的行政机构）派出马巡多骑，四处巡逻，逮捕和审讯被日本人盯上的工人；工人代表往领顾正红遗体也被拘押。淞沪警察厅还派出爪牙，到各区查禁工人的反帝活动。尤有甚者，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工部局，警告各中国报纸，不准刊登工人斗争的消息，违者则予以封闭。因此，对顾正红被害和工人罢工的消息，都得不到如实的报道。

上海部分学生首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上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援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中共为了扩大罢工斗争的影响，宣传顾正红被枪杀的真相，于5月24日，在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组织了全市规模的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到会的有工人、学生和各团体代表8千多人。潭子湾的公祭会场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会场四周挂满挽联、挽幛和各工会的唁匾，会场正中白色帷幕上挂着顾正红的遗像，两旁的挽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额是"工人先锋"四个大字。帷幕后面停放着烈士的灵柩，上面覆盖着一块洁白的绸子，写着"东洋人打死中国人！"八个大字。整个会场庄严肃穆，充满着一片庄严悲壮的气氛，"为顾正红烈士报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大会由共产党员刘华任总指挥，孙良惠为主席。工会代表郭尘侠报告顾正红生平及惨死经过。接着各校、团体轮流演说，诉说惨案的经过，控诉日人的罪行。工人演说时痛哭流涕，群情激昂。在大会进行中，工人们一再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顾正红报仇！"群众的悲



愤情绪达到极点。这是一次反帝的宣传大会，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心和民族尊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新的觉醒和坚强的斗争意志。

工人的罢工斗争推动了上海各阶层人民，纷纷起来投入反帝斗争的行列。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大示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燃遍整个上海，席卷全中国。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学生首先起来援助工人。学联动员了上海大学和文治、复旦、交通、持志、法政、美专、同德产专等大专院校以及部分中学学生，组成30个小队，每对5人，从5月18日开始，每天分头到南京路、新世界、东新桥、大世界、静安寺、北站、十六铺码头等闹市区，向行人募捐。一周内，中共得款3 100余元，出一部分给顾正红的亲属，大部分交后援会，援助罢工中生活较苦难的工人。

上海学生的这一正义行动，引起帝国主义者的仇恨。公共租界当局对进行宣传、募捐的学生大肆逮捕：23日，文治大学学生（该校校址邻近七厂，学生曾耳闻目睹顾正红被害情况）2人因上街募捐在东京路被巡捕房逮捕；24日，上海大学学生因参加公祭顾正红大会又有4名在租借被捕去。总计顾正红惨案以后，被拘捕的学生、工人竟达19名之多。公共租界当局对这些无辜被捕者，均诬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定于5月30日在日本领事值堂时，在“会审公堂”审讯。学生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追悼会的次日即结队到会审公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无理拒绝。26日，全国学生总会发表宣言，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宣言指出：学生募捐援助工人和学生追悼被杀工人，本属法律范围的事，为什么竟触犯了什么“特别刑律”，要受捕房的拘捕呢？谁都知道这是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因此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人民永无自由之余地。同时，上海学联亦召开常务委员会决定继续募捐援助工人并援救被捕学生。27日，负责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联工作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同德医专（麦根路22号）召集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文治大学、群治大学、同德医专等校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和通过决议：一、向公众说明罢工实情；二、募捐援助因罢工急需救济的工人；三、设法营救被捕的学生。于是，这时的反帝运动，渐渐由工人发展到学生，由反对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发展到反对租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了。

同时，在上海帝国主义者提出的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四提案（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消童工法案），激起上海学生、市民及工商业者的强烈反对。“增订印刷附律”限定一切印刷品包括报纸、小

册、传单、小招贴甚至油印品都必须经过工部局的审定才准传印，否则便要处以罚金甚至3个月以下的监禁。工部局企图用这种办法钳制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禁止中国人民的爱国宣传。“码头捐”系1888年工部局呈请领事团向上海道商定，照货值抽1%。后拟照税率抽收3%，这次又改为收5%，加重商民的负担，压制中国工商业。“交易所注册”是规定中国交易所要到工部局去注册。交易所无论外国或中国所办，均应按中国或该国法律到中国政府注册立案。现外国交易所非但不在中国政府注册，工部局反强令中国交易所要到外国工部局注册。况且中国法律规定，每一区域内仅准设同一性质的交易所一家。现在工部局这样做，实为工部局对租界内商业的无理干涉。“取缔童工案”名义上实行所谓人道主义，实则童工入工厂都是生活所迫，无力生活，无力受教育，因此不惜戕害身体到工厂工作。如果取缔童工，童工的生活变很难解决。比较好的办法，“唯有特许以一部分轻易无危险的工作，在某种限制下，许厂主雇佣童工，一面普设义务公学，使不入工厂及受雇之儿童得受普通教育”，但这难以做到。5月下旬，工部局一再扬言，准备在6月2日再召开纳税外人特别会议，力求通过四提案。此消息在报端刊载，不能不引起各商业团体的强烈反对。

于是，以顾正红为先声，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运动正在上海和全国兴起。



五卅惨案和三罢斗争

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上海反帝怒潮的势头急剧向前发展。中共中央自此之后就多次开会，提出指导斗争的方针、策略和口号，并进行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推动运动的发展。

1925年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地方执行委员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郭景仁、梅电龙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学生上街宣传和发动各阶层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会议分析了上海的政治形势后，接受了李立三、蔡和森提出的建议，及时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全民族的政治斗争，以便争取一切反帝群众的支援，并作出决议。会议经过反复讨论，认为30日是租借会审公廨预定非法审讯被捕学生的日子，6月2日又值工部局纳税外人会要讨论通过所谓交易注册、增加码头捐和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利用这个时机，发动学生上街，则可能把工人的罢工扩大为国民革命运动。李立三就罢工情况作了报告，指出："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工人，要国民党命令各区分部"组成演讲队"；雪耻会要"发动同乡会，多注重宣传方面。"蔡和森强调干群众运动要有明确的统计，应"向各方面发动""向各方面发传单"，引起同情。"学生连同工人出发"。恽代英提出"到各学校演讲，恐只是学生接洽还不够，以为勇敢者先行出发，而后能引起一部分之同情。"陈独秀认为在上海的党团员一共不到200人，不成气候，况且党团单独干，也不像国民革命名。他提出这次宣传要和交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四提案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广泛发动各阶层。会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并立即进行紧张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这次会议为即将爆发的五卅运动制定了战略方针以及为此而应采取的步骤。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3 000多人，按预定计划纷纷进入租界，打着"演讲队"的旗子，喊着口号到公共租界和闹市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讲，进行

反帝宣传，开展演讲示威活动。演讲示威是由党组织指定专人坐镇指挥的。指挥部设在二马路（今九江路；一说在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孟渊旅社内。有30名学生用自行车担任交通，传达命令和消息。原定演讲从当日下午1时开始，但因传话的人说成是上午，所以30日上午已有徐家汇方面的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等3个学校的同学出发了。他们进入租界，前往指定的地区演讲，并在闸北景贤女中设立分指挥部。总指挥部当即研究决定：一面令南洋等校同学下午继续演讲，一面令其他各校提前出发。整个上午，南京路附近演讲队伍尚不密集，学生演讲和散发传单时遇到英捕干涉和华捕的劝阻，便易地进行，未发生正面冲突。及至正午，老闸捕房开始以“扰乱治安”为名，拘捕演讲学生十多名。学生纷纷拥向捕房质问，义正言辞，弄得捕头无话可说，就暂时释放被捕学生。午时以后，演讲的学生越聚越多，仅在北火车站附近就集结学生2 000多人，学生们随即向租界行进，加入队伍的尚有内外棉罢工工人、南市邮局工人、铁厂工人、手工业工人、洋行职员、中小学教员数十人，其中不少人为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

下午1时许，五卅演讲示威的主要地区英租界大马路（南京路）上涌满学生、工人的宣传队。浙江路、厦门路、北京路、天津路一带都有学生演讲，听众十分激愤。许多同胞理直气壮地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学生们遂结队游行，手执三角旗，上书“反对越界筑路”、“实行经济绝交”、“反对印刷附律、反对码头捐”、“抵制日货”、“援助被捕学生”等字样，沿途分发，并将上项字条贴于道旁的电杆木上。其中有一份传单这样写道：

“我们忍无可忍了！我们已经联合各校学生及一切爱国的市民工人，从今日下午起，分队到公共租界各大马路演讲，唤醒全部中国人，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

我们已经预备牺牲一切，冒犯各种困难与危险，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作前驱。”

这时南京路上每隔一二十家店面就有一组学生演讲。行人道上各处围满了听众。身高虬髯的印捕前来驱赶群众，学生与之冲突，马路上一时人生嘈杂，反帝呼声更趋高涨。捕房捕头慑于群众声势，疯狂地下令逮捕学生。于是不仅学生，连听讲的行人也都成了他们逮捕的对象。在场学生和听众目睹此惨状，各个义愤填膺，尾随不散。尽管英帝国主义捕头爱活生（Everson，E. W.）又调集一排英捕、一排华捕，用注铅的警棍殴打群众，群众依然聚集不走，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2时许，南京路老闸捕房和附近宣传队的



学生已有百余人被捕，后来被捕者愈来愈多，帝国主义巡捕不得不把一部分被捕的学生先行释放。但是学生们拒绝出去，说要出去大家一起出去。同时，演讲示威指挥部为了援救被捕学生，正不断地把分散在各点的演讲队调来向老闸捕房门前集结，迫使它释放全部被捕学生。至3时许，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响彻云霄，传单飘飞，满蔽天日，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顶峰。3时3刻，爱活生召集通班巡捕22人排在捕房门口，成半月形，巡捕离群众约距丈许。爱活生一面举起手枪向群众示威，一面下令巡捕开枪。副捕头枭威尔（Shellswell，R.）首先向人丛射击，发出一弹，于是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计发44响，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当时的报纸记载说：“西捕和印捕借维持秩序，举棍向站在前面的学生乱打，头破血流者无数。”“西部命令开枪，华捕向空放一排，印捕平放一排。”南京路上顿时染上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死伤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此次惨案中，帝国主义者杀害了站在斗争前线的革命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轻伤更是无法统计（有的受伤者在屠杀后立即乘黄包车回家去了）。共产党员、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在中弹倒下后仍然连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共青团员、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见同队同学受伤，急忙向前为他包扎，这时英国巡捕立即向前对准尹景伊连开两枪，尹景伊壮烈牺牲。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电话接线生唐良生临终时念念不忘反帝爱国。他说：“学生是国民，我也是国民，不得不表爱国的同情。我因爱国而死，何痛之有?”除这3位烈士外，殉难的尚有南洋附中学生陈虞钦、厨工陈兆长、洋务职工朱和尚、食品商店职工谭金福、职工邬金华、石松盛、车匠陈兴发、裁缝王纪福、油漆工人姚顺庆、洋货商人徐落逢等。总计13名烈士中，有3名学生、9名工人、1名商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也只有36岁，其余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帝国主义者很快用自来水龙头冲洗掉烈士们的血迹，但是帝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是永远也冲洗不掉的。

帝国主义的枪弹，激起上海人民更大的反帝怒火。当日4时以后直至晚上，工人、学生、商界等团体纷纷集会，研究对策，制定进一步反帝的方案。4时许，潭子湾三德里工友俱乐部内百人集会，刘华到工会将发动工人罢工，支援学生；学生已为工人而牺牲，陶静轩号召工人奋起报仇。当晚各校学生召开临时代表会议，要求交涉署向领袖领事严重交涉，立刻释放被捕

学生和工人，凶手必须抵命等。各路商界联合会亦于晚上召集紧急会议，要求总商会举行非常会议，筹谋对付。所有这些都表现各阶层群众同仇敌忾一致反对帝国主义血腥屠杀的激愤心情。

5月30日当晚，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王一飞、罗一农等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刘少奇汇报了工运情况，王一飞、罗一农汇报了学运情况。会议决定结成广泛的各阶级反帝联合战线，号召全上海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此外，会议决定成立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次斗争。会议还决定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出版《热血日报》，以便进一步组织和宣传群众，推动反帝斗争的发展。中共上海地委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还派出大批干部到各群众团体开展工作，迅速掀起三罢斗争，以实现全上海人民联合的反帝运动。

5月31日，大雨滂沱，租界当局在南京路上实行戒严，但1 000余名学生和工人冒雨继续上街发传单，奔走呼号，逐一向各商店讲述五卅惨案经过，动员店员们罢市。当天下午3时，上海总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及纳税华人会常委会都分头在天后宫开会，讨论对南京路惨案的态度，是否罢市。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主要为中小商人组织，五卅惨案中，被害者当中亦有小商人和店伙，被害学生家长很多也是中小商人。于是，中小商人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纷纷表示愿意牺牲，愿意罢市为学生做后盾。纳税华人会见大势所趋，民气不可侮，也表示赞成罢市。而调拨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对罢市则顾虑重重。正当罢市问题相持不下时，游行队伍来到天后宫。工人、学生、市民数万人赶到天后宫召开市民大会，由学生代表林钧主持。与会群众和烈士家属纷纷登台演说。登台演说者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坚决要求实行罢市。最后推选向警予、沈泽民、郭侠尘等为代表向总商会交涉，要求他们赞成罢市。在群众的包围、逼迫下，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会长虞洽卿已离沪赴京）不得不签署了6月1日总罢市的命令。

31日晚，上海各工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推选李立三、刘华为正、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成立以后，号召“全埠工友全体一致罢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上海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宣布6月2日实行总罢工。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

上海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激发，



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6月1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各工厂相继罢工，其中最主要的是纱厂、电力、海员、码头工人的罢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电话电报工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及各洋行的华人职员也转入罢工。连租界华捕也有半数以上相继罢岗。至6日，罢工工人数达20余万。

在“三罢”斗争中，上海学生是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5月31日，总商会签发罢市令后，上海学联即连夜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决定上海中等以上各学校全体罢课。6月1日，上海大、中学生在上海学联发动下，纷纷举行罢课。上海大学率先通电罢课，其余各校紧随其后，一些帝国主义创办的学校，如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校学生也纷纷加入罢课行列，有5万多学生罢课。上海学生罢课后，纷纷走向街头向市民进行宣传，开展抵货运动。有的还应工会邀请深入工厂办墙报，做演讲，向工人进行宣传；或是到市郊和军队中间向向农民和兵士进行反帝宣传。在“三罢”期间，上海学生还进行大量的反帝活动。他们向劝说商店不进英、日货，查禁奸商私售粮食，扣留送往租界的食品，责令米行用私售白米的利润救济工人，还踊跃捐款，接济罢工工人。

在商人方面，总商会的罢市令下达以后，广大的商店店员在上海商店店员联合会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与学生密切配合积极推动店主罢市。上海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接着华界、法租界的商人均起响应，这次罢市的规模范围之广、声势之大为上海开埠以来所未有。仅公共租界，30多条马路就有2万家商铺、20多万人参加罢市。在罢市期间，各业资产阶级还进行了提倡国货、开展经济绝交等活动，沉重地打击了英、日等帝国主义。

为了加强对各阶层人民斗争的统一领导，4日，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4大团体各派6名代表，组成统一战线性质的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上海总工会是其中心支柱。同日，《热血日报》创刊，该刊宣传报道“三罢”斗争，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激发民族精神，推动了反帝运动的发展。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解决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其主要条款是：“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海军”、“撤销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制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撤销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案”、“惩凶、赔偿、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收回会审公堂”

等。这些条件，反映了反帝联合战线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成为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具体纲领。17 条公布后，得到各界群众的拥护。11 日，召开了市民大会，约有 10 万人参加，坚决要求实现 17 条。

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标志着上海各阶层群众，在反帝旗帜下团结起来，形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中国共产党这时又确定了领导斗争的新策略：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反帝运动的总领导机关，同时将这次运动扩大至全国。从实现三罢斗争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始终站在反帝爱国斗争的最前面，青年学生热情奔放，坚决拥护三罢斗争的主张，中小商人在迅速兴起的革命高潮面前也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在受到革命潮流的裹挟以后，才加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来。



上海总工会成立并领导大罢工

上海总工会在五卅风暴中诞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新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总工会。它不仅是上海工运的指挥中枢，也是全国工运的坚强支柱。

五卅惨案发生以前，上海总工会已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筹备和秘密组织。1925 年 5 月 2 日，中共召集中华海员工业总会上海支部、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工会、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大康、裕丰、日华、内外棉、同兴纱厂工会等 24 个工会代表，发起组织上海总工会筹备会。其时，正值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通过了《上海问题决议案》，决定由出席本次大会的上海各工会，联络其余各真正工会，共同组织上海工会的总联合机关。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回到上海后，即着手开始筹备上海总工会。

1925 年 5 月 15 日，日本资本家枪杀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的血案发生后，党领导上海工人开展了“反对东洋人屠杀中国人”的运动。为了更好的组织工人群众，把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引导为民族斗争上来，5 月 18 日，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 2 号成立了上海总工会筹备会。出席大会的各工会代表有 100 多人，通过了总工会暂行章程，选举李立三为会长，陈杏林为副会长，张佐臣、刘贯之、郑福宁、何量澄、孙杰三、郭尘侠、徐金珊、顾凤鸣、高雨田为董事。

五卅惨案发生后，5 月 30 日，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全上海工人、商人、学生实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中共中央的决定正确的驾驭了形势，及时指导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使工人阶级成为“三罢”斗争的中流砥柱。5 月 31 日晚，上海总工会筹备会在李立三主持下举行工会联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会议推选李立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伟为副委员长（兼组织主任），刘少奇为总务主任（即秘书长），刘贯之为总务副主任，孙良惠为宣传主任，杨剑虹为交际主任，杨之华为妇女主任。6 月 1 日午后，上海总工会正式挂牌，会址设在宝山路宝山里 2 号，后迁至共和新路。上海

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

上海总工会成立时制定了《上海总工会简章》，简章共4章23条。规定了上海总工会以“团结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包括10项职权：（1）工人组织之发展；（2）统一工会行动；（3）整理各工会之组织系统；（4）指挥各工会之行动；（5）仲裁各工会之间或各工会内部之争端；（6）指示上海工人共同奋斗之目的；（7）代表上海工人与全国工人密切结合；（8）提高工人知识，联络互相感情；（9）促进各工会间的有效互助；（10）保障工人利益，设法解决救济及职业介绍等事项。并在简章中明确规定，各工会必须执行总工会及其执委会的决议和命令；发生阶级斗争时，各工会接到本会通告以后，必须立即一致在声势、经济或实力上给予援助；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内，必须统一为一个工会；各工会间如有纠纷可向总工会申请仲裁解决，不得相互攻击；各工会对总工会如有不满意，可直接提出抗议，或向代表大会提出控诉、控告，但不得有破坏的言论和行动。这些内容与去全国总工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充分反映了上海总工会的阶级性、革命性和战斗性，是上海各业工人唯一可以信赖的总指挥部。

上海总工会一成立，发表了《告全体工友书》，号召“全埠工友全体一致罢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上海总工会设置了组织体制。总工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分设总务、交际、会计、宣传、组织等科，并于必要时设立特种委员会。总务科掌管秘书、庶务等事项，设庶务、文牍、印刷、交通、杂务、传达等股，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谢文锦、孙良惠为副主任。交际科掌管对外联络交往，内设若干交际员，陈杏林为交际科主任，赵子敬、郭尘侠为副主任。会计科掌管经济，傅冠雄任会计科主任，陶静轩、杨建华为副主任。组织科掌管所属各工会的组织事项和发展新工会，内设组织员若干，吴敏任组织科主任，郑福宁、顾凤鸣任副主任。宣传科掌管本会的宣传和教育事项，设若干宣传员，刘贯之任宣传科主任，严敦哲、张佐臣为副主任。不久，又增设救济和码头工人两个专门委员会。救济委员会负责办理罢工中的救济事项，码头工人委员会负责办理码头工人事宜等。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后发表了第一道命令，宣布于6月2日起全市开始总罢工；同时发表《上海总工会宣言》，公开提出七项条件：“一、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二、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



之权利；三、禁止殴打工人；四、改良工厂卫生；五、禁止虐待童工及女工；六、不得雇佣外国巡捕；七、反对印刷附律。”并宣布：“上海全埠工人，不达到以上条件，决不上工！”

上海各业工人积极响应上海总工会的号召，纺织工人打头，纺织、公用事业、海员、码头工人一齐上阵。四大主力带动着洋务、印刷、烟草、手工、服务等行业工人参加罢工，罢工队伍与日俱增，形成了强大的罢工洪流。首先罢工的是日商所有内外棉纱厂和英商工厂、企业的工人，自顾正红事件以来已经罢工半个月，并继续罢工。5 月 31 日，公共租界华洋德律风（电话）公司职工，得知同事唐良生在五卅中殉难，全体接线生非常愤慨。在共产党员、监督王西庚的领导和发动下，31 日首先在西行爆发了罢工，次日该公司总行、北行等局一致罢工。6 月 1 日上午，日商内外棉三厂、四厂、九厂，成华玻璃厂，老公茂、恒丰纱厂、马灯厂、美艺木器厂等万余人相继罢工。除恒丰外，均为外商企业。6 月 2 日，各厂工人纷纷响应总工会的号召，罢工的声势迅速高涨。参加罢工的又有内外棉十三、十四、十五厂等 23 处，不但英、日商主要纱厂均已罢工，一些公益事业工部局工程处、总铁厂、杨树浦电灯厂、英商电车公司也相继罢工。3 日，浦东英美烟厂万余工人同盟罢工，公司招来巡捕开放排枪进行镇压，造成 2 人死亡，4 人被捕，伤者甚众。4 日，浦东日华一、二厂罢工，日本厂主拦阻，致工人多名受伤。随后，罢工浪潮便席卷各个行业，西报印刷工厂工人、市政工人、外人雇佣的厨师、奶妈，各饭店的侍者，洗衣工人，以至领属的西崽，公共租界中的大部分华捕，都先后参加了同盟罢工。罢工以后，工人曾多次举行游行示威，开展反帝宣传。闸北的一次游行，声势尤为浩大，参与者有 3 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特别是 8 日开始的海员罢工，更把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海员罢工，影响所及，各外轮货栈工人、驳船工人、各外商码头工人等均行罢工，使日轮难以进港，英轮停止来沪。参加五卅反帝大罢工的，除外商企业职工外，还有一部分华商印刷所的工人。但华商企业工人罢工的目的是为反帝爱国。正如上海总工会的发言人谈华厂罢工指出：“此次工人罢工并非对于资本家为难，实由于外人压迫太甚，不得不起而抗争”，故“设法使国人所经营工厂中的罢工者先行上工”。

据上海总工会调查，到 6 月 13 日，英厂参加罢工者共 26 处，3.6 万余人；日厂参加罢工者共 39 处，6.3 万余人；工部局所属系统参加罢工者共 8 处，3 600 余人。在外资企业中参加总罢工的总计 107 处，13 万余人。中国

工厂工人亦有 11 处参加罢工，共 2.6 万余人。另据统计，截至 7 月 21 日，中外各业工人参加总罢工的达 206 起，罢工人数共计 20 余万人。其中，日商系统 46 处，6.6 万余人；英商系统 42 处，4.7 万余人；工部局系统 13 处，5 500 余人；美商系统 5 处，1 400 余人；德商系统 5 处，300 余人；丹麦 1 处，80 余人；英美日中合资系统 21 处，2.7 万余人；国籍不明者 38 处，1.9 万余人；华商系统 35 处，3.3 万余人。当时有些工厂没有数字记载，因而实际罢工人数远不止于此。

反帝罢工的深入和持久，首先依靠工会组织的广泛和严密。上海总工会在领导工人进行总同盟罢工的同时，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各行各业工人从速组织起来，大力在罢工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上海总工会预先配备担任组织工作的人员，随着罢工的进展，进行各工会的组织工作，有些部门的工人没有总工会派人去指导督促，就自觉自动地组织了工会。上海各厂工会的组织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每天都有新的工会宣告成立。据统计，到 6 月 7 日，上海总工会所属基层工会已由五卅前的 20 个增加到 44 个，6 月 10 日，增加到 67 个，到 7 月 28 日，猛增到 117 个，会员人数达 22 万多人。当各行各业工人组织起来后，上海总工会又组织各种产业和行业联合会，把它们统一起来。这一时期，有纱厂总工会、机器制造业总工会、海员和码头工会、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印刷工会、洋务工会、英美烟草公司及烟厂工会等隶属于上海总工会的旗帜之下。国民党右派控制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在迅速发展壮大的上海总工会面前，显得“相形见绌，黯然无光”，失去了对上海工会运动的控制力。罢工的实现与工会的建立相互促进，反帝联合战线作为后盾，使得大罢工来势猛烈，规模浩大，组织有序，目标明确，开创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和政治罢工的新纪元。

为了方便工会和工人办事，同时加强对各工会的指导，上海总工会在主要工人区域下还设了办事处。6 月 19 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布告，第一办事处设在杨树浦，主任蔡之华；第二办事处设在引翔港，主任郭景仁；第三办事处设在浦东，主任张佐臣；第四办事处设在沪西，主任刘华；第五办事处设在虹镇，主任董兴吾。总工会指派专人和各办事处所属工会选派三人，共同办理各办事处事务。

总罢工之初，各业工会组织罢工工人上街集会游行，散发传单。罢工进入相持阶段，上海总工会通告各办事处，各直属工会，组织演讲团，分至各工会、城乡各地演讲，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抵制洋货。总工会还组织工人



到工商学联合会主办的夏令讲学会听讲，偕同剧社到各工人区实行化装演讲。第二办事处引翔港在辖区内成立了五支演讲队，还创办了工人学校，招收工人学生160多个，分四班教学。浦东地区运输工人也着手兴办工人教育事业，借此罢工期内提高工人的知识文化水平。

7月中旬，上海总工会发表通告，指出罢工以后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严守纪律，举动出处都要文明，使人无可借口"。"假设有少数的工友，不守秩序，有法外行动，弄到官厅来干涉，就要连累大家，连累工会，甚至罢工因此失败"。并特别提请工友注意，"我们的工会，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并没有拿人、截货、打人的权柄"，"无论是工贼，是汉奸，是买卖英、日货的奸商，我们都要文明对付，切不可拿他打他，扣留他们的货物"。严守纪律，约束自己，是总工会坚持罢工，争取同情，避免节外生枝的有效办法。在工会内加强纪律，也是大罢工能坚持到主动收缩的一个重要条件。工人罢工后，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参加了各种反帝活动。他们劝告未参加罢市的商人、未参加罢工的工人参加"三罢"；组织纠察队维持罢工地区治安；组织募捐队携带钱筒和捐条为罢工工人募捐；为罢工的华厂工人则以加班加点或以工资部分提成来支助罢工。

帝国主义者面对中国人民和广大群众的反帝风暴，是又怕又恨，叫嚷要"扑灭"反帝运动。他们一方面，向上海增派大批军队，在公共租界宣布戒严，武装巡捕不断向手无寸铁的上海民众开枪，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从6月1日～10日，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他们还指使军阀政府实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他们采取分化反帝联合阵线的策略。对资产阶级以"司法调查"、"召开关税会议"相利诱；同时，又以停止借款、停止通汇、供电等进行威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运动一开始就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以第三者的"调停地位"自居。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于6月3日回到上海后，组织"五卅委员会"，并修改了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交涉条件，删去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等最重要的内容，使之成为13条。当13条也被帝国主义者拒绝后，他们终于妥协以至屈服，于26日无条件结束罢市。上海总商会后来不仅毁弃了原来许诺开市后在经济上继续援助罢工工人的诺言，而且扣压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使罢工工人生活陷于绝境，以迫其复工。

资产阶级上层妥协、屈服，学生也因暑假到来纷纷离校，工人陷于孤军

奋战。这时，军阀政府加紧镇压罢工。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为保存已得的成果，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实行逐步退却，将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的政治要求。“这绝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上海工人罢工一直坚持了3个月之久，直到8、9月间，为了保存力量，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工人阶级孤军奋战，上海总工会决定停止同盟罢工，发表《为“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指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等9项条款为最低复工条件，以解决工人经济要求和地方性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有条件的复工，工人们才陆续复工。这时，由于奉系军阀查封了上海总工会，通缉李立三等工运领袖，迫使工运领袖转入地下，继续领导上海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在这场反帝斗争中，从全国各地各爱国阶级、阶层参加运动的广泛性、自觉性和组织性来看，都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所没有的。它冲破了原来长期笼罩全国的那种沉闷的政治空气，显示了各阶层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上海总工会是五卅运动的指挥者和组织者，是“三罢”斗争的核心和旗帜。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先锋和主力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

“三罢”斗争特别是大罢工，使帝国主义者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外资企业至少因此损失1 200万个劳动日，每天损失达几百万元。《字林西报》记载，在三罢期间仅“就开销与盈利而论，当有一万万两”。英国海外贸易部则认为，罢工对英国工商业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外文《大陆报》的社论提出：“就规模而论，必须把中国这次罢工认为是工界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之一，弄得人们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如果这么说并不是夸大其词，在整个欧洲近代历史过程中，我们找不到与当前危局相类似的事例”。



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指香港的中国工人和广州沙面租界洋务工人的罢工。因为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广东人简称其为省，所以这次罢工斗争被称作省港大罢工。它是为声援上海人民五卅爱国斗争而掀起的全国反帝怒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罢工运动。

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广州，引起各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应。6月1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由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代会、省农协、商协、学联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六团体发起，正式成立了“工农兵学商援助上海遇难同胞联合会”，并通过了于次日举行群众示威集会和游行的决定。当日晚，广东大学全体学生还举行了纪念上海遇难同胞大会，一致通过了援助五卅惨案的议案。

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1万多人在广东大学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援助沪案示威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森（启汉）主持了大会，罗觉（亦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通过了组织“工农兵学商大同盟”和开展抵制英、日货活动等决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广东各地的学生、工人和农民先后投入到声援斗争中，纷纷举行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在这次声援上海人民的示威运动中，广东各地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达50万人。

广东这时正发生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事件，广州陷于危急之中。因而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广东区委还不能作出立即发动省港罢工的决定，平定叛乱、挽救广州成为当务之急。但对省港罢工的问题，这时已开始酝酿与准备。

6月上旬，当平定杨刘战争正在进行之际，就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以全国总工会的名义，派邓中夏、杨殷为代表赴香港，联络香港各工会组织，发动罢工。同时，由李森、刘尔松等负责组织沙面洋务工人罢工，造成省港大罢工的强大声势。

邓中夏、杨殷来港后，会同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苏兆征等，召开党团员会议。会上充分分析了发动罢工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很快统一了党团员的思想。决定把发动工人群众和争取工会上层分子的工作结合起来，特别要争取在港影响较大、所属工会最多的工团总会。在邓中夏、苏兆征等的努力下，海员工会会长谭华泽、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等都表示愿意参加罢工从而减少了发动工作的阻力，铺平了实现联合罢工的道路。在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成立了“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挥机构，各大工会的领袖被吸收为这个指挥机构的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罢工的酝酿日臻成熟，邓中夏、杨殷遂返回广州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情况，并研究决定总罢工的日期及具体组织工作。

6 月 15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来了《为“五卅”惨案致香港各工团的信》，号召立即举行全体罢工。这时，香港殖民当局为防范罢工的发生，密探四出，水兵登陆，缉拿组织罢工的领袖，并张贴布告，威胁工人不得轻举妄动。为了击败他们破坏罢工的阴谋，邓中夏在 6 月 18 日接到全国总工会的来信后，立即向各工团代表作了传达，并通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向工人群众广泛宣传，为罢工作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6 月 19 日晚，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英商省港澳轮船公司行使省港之间的轮船抵港后，海员当即宣布罢工离船，打响了全港罢工的第一炮。电车、印务工会当晚也宣布罢工，所有中文和西文报馆的排字工人都离开报馆。翌日，市内电车停驶，报纸停刊，市民争相传阅传单，消息迅速传遍全港，全市轰动。接着，洋务、起落货、煤炭、邮务、医务、汽车等其他工会随即起来响应，先后罢工。这次全港罢工前后约 15 天，参加罢工的人数达 25 万人。这次罢工一开始就声明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 17 条要求，并向港英当局提出六项条件：“（一）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中国新闻报》立即恢复，被捕记者立即释放，并赔偿其损失。（二）香港居民，不论中籍西籍，应受同一法律之待遇，务要立时取消对华人之驱逐出境条例，笞刑、私刑等之法律及行为。（三）华工占香港全人口 4/5 以上，香港定例局应准华工有选举代表参与之权，其定例局之选举法，应本普通选举之精神以人数为比例。（四）应制定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废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劳动保险之强制施行等；制定此项劳动法时，应有工团代表出席。（五）政府公布 7 月 1 日之新屋租例，应立时取消，并从 7 月 1 日起减租二



成五。（六）华人应有居住自由权，其山顶应准华人居住，以消灭民族不平等之污点。”随后，全港工团代表大会又议决增加四项要求条件，即：“（甲）罢工工人及皇家服务人皆应恢复原有工作及职务，其原有之工作牌照营业牌照皆应继续有效。（乙）罢工期内工资照给。（丙）罢工解决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人工作及驱逐工会职员离境。（丁）所有罢工期内被捕及监禁者一律省释。”这些条件具有鲜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性质。

香港罢工开始后，6 月 21 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广州的沙面租界洋务工人宣布总罢工，并成立了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随后，广州市内的英、日、美洋行及其私宅雇佣的中国洋务工人，也纷纷响应，参加罢工。省港大罢工爆发后，港英政府大为恐慌，立即宣布戒严令，命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同时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令和禁止金银圆纸币出口令。但是，罢工工人无所畏惧，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和阻挠，纷纷返回广州，坚持罢工斗争。

香港、沙面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受到全国总工会的热烈欢迎和安置，也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进一步扩大影响，把罢工斗争推向高潮。6 月 22 日，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举行执行委员会议，由全国总工会代表郭素正主持，决定次日召开各界援助沪案示威运动大会，会后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并确定游行路线。

6 月 23 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 10 万人，在广州东校场召开各界援沪示威运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对沪案要求条件十六项，在通过的决议案中，提出了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工厂等项要求。会后下午 1 时半，群众示威游行开始。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等亲自领导五六万群众游行。游行队伍按工人、农民、学生、商民顺序排列，最后是军界队伍。示威者均手执纸旗，按预定路线行进，沿途高呼“援助上海五卅惨案”、“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航空局飞机凌空散放传单，群情激昂，秩序井然。

23 日下午 2 时 40 分，当密集的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等国的军舰也开炮助击。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猝不及防，纷纷倒地。帝国主义的屠杀一直延续到下午 4 时许。据不完全统计，这次事件中有 50 多人被打死，170 多人受重伤，轻伤无数。这便是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更加激起了省港人民的无比愤慨。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指出："此次华人惨被害者，实属灭绝人道，为世界公理所不容。"照会严重提出五项要求："一、此案各有关国，应派人员向广东政府谢罪；二、惩办有关长官；三、所有驻粤各有关国兵舰一律撤退；四、将沙面租界交回广东政府接管；五、赔偿此次被毙及受伤之华人。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还照会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苏联的加拉罕大使，请他转致各国公使，进行交涉。"

惨案发生的当晚，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通电全国，公祭死难烈士，请政府准备陆海军，组织学生军、工人军、农民军等 14 项。27 日，该会就经济封锁及援助省港罢工工人的办法，通过决议。对经济封锁：一、请政府通令各海口，禁止粮食出口；二、通电各海口岸人民团体，联合制止粮食去香港；三、请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沙面海面纠察，派船巡缉私运粮食供敌者；四、请政府筹备粮食来源以便接济广州同胞；五、禁绝英、法、日等国货币。援助省港罢工工人，将该会募得的捐款，以 1/4 接济上海各处罢工，以 3/4 接济省港罢工。

自沙基惨案发生后，省港罢工斗争日益高涨。自省港罢工发动后，短短半个多月，参加罢工的人数已约达 25 万人。因而，这时如何进一步把罢工工人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成为当时罢工斗争面临的首要问题。

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6 月 26 日，中国共产党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选出代表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选举苏兆征、林伟民、李森等 13 人为委员，由苏兆征担任委员长，何耀全、曾子严为副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黄平等为顾问。委员会下设武装、纠察、审判、法制等各种办事机构，各司其职，各具特点，体现了工人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首创精神。为了抵制英货、缉查走私、封锁香港、维持秩序、维护工人权益，委员会成立了 2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革命武装、纠察队在执行封锁香港、截留粮食、查缉洋货等任务中，风纪严明，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尊敬。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担负起一部分政权组织的任务。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产生后，在斗争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成为组织严密、规模具备、制度健全、具有极大权威的战斗指挥部。这是省港罢工工人的一项伟大创举。



省港罢工从它的组织发动到建立领导机构的过程中，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省港罢工委员会建立后，中共广东区委便在委员会中建立了严密的党团组织，作为罢工指挥机构的核心力量。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成为维护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制定和贯彻正确地战略和策略，坚持长期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力保证。为了提高工人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知识水平，培养工人干部，中共党团组织曾先后开设了劳动学院、宣传学校、劳动妇女学校、工人补习学校等十多所学校。邓中夏兼任劳动学院院长，冯菊坡、彭月生等先后担任宣传学校校长。

组织起来的罢工工人采取罢工与抵制、封锁相结合的方法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1925 年 7 月 9 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发布封锁香港的通电。起初只在珠江口一带，以后逐渐扩大到汕头、北海、海南岛的广阔海面，全长数千里。在封锁过程中，罢工委员会采取了“单独对英”、“特许证”和“善后条例”等正确策略。“特许证”制度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样不仅及时拆散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反对省港大罢工的联合战线，并且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解除了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了广东商人的中立，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

实行“特许证”制度以后，部分商人借口“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高”起来反对。为了联合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避免工人与商界之间的分裂，罢工委员会主动取消了“特许证”制度，代之以“工商联合”的政策，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得到巩固。

港英当局曾经使用各种手段，来扼杀和破坏省港罢工，但均遭失败。于是，被迫表示要与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罢工委员会提出要求取消种族歧视，确立民主自由，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等项条件时，港英当局断然拒绝。北伐前夕，广东革命政府与港英当局再次谈判，进行五轮，由于英方一再无理拒绝中方关于解决罢工的合理的、有限度的要求，终于导致谈判实际的破裂。

1926 年 10 月上旬，北伐军胜利攻占武汉三镇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势力已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一带，各地工农群众运动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随着形势的变化，省港罢工必须相应地改变斗争策略。1926 年 9 月 30 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自动停止封锁香港。10 月 10 日又宣布：“将各

属驻防纠察队一律撤回”。同日，广州各界30万人举行盛大集会，一致拥护罢工工人自动停止武装封锁香港，扩大反帝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发布宣言，指出：“革命的形势已需要从广东的单独反英斗争扩大为全国的反帝斗争。但是，全国除广东外，反帝运动还未能采取直接的形式，假使广东孤军前进太远，后无援兵，恐有被敌截击与消灭的危险，是以尚须准备全国一致行动。在全国准备向帝国主义总攻击时期中，广东应对英退让，从事巩固内部，故特将这久经战争的革命先锋队——省港罢工工友从前线调回休养，暂时停止封锁。”至此，历时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便宣告结束。

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广东革命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内外的广泛声援下，历史16个月之久，就其时间之长，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其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健全、规模之巨大、策略之灵活和影响之深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工运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省港大罢工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省港罢工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大罢工。罢工使香港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市场萧条、商品货源奇缺、物价飞涨，街上粪便垃圾堆积如山，加以炎日蒸炙，臭气熏天，使原来被称为“英国女王王冠上一颗辉煌的明珠”的香港，顿时变成一片荒凉景象，故群呼香港为‘臭港’。罢工使香港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据省港罢工委员会估计，香港经济一年损失达15亿元。随着贸易和税收的减少，香港当局的财政出现赤字，过去英国政府每年从香港获得大量财政补助，现在不得不暂时提供数百万英镑借款使香港当局渡过难关。过去，根据不平等条约，外国货物在海关征税以后便可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但是，罢工以后，在广东，广州政府可以征收外货捐税，而且财政部可以派人到外商公司监督和查账；明令禁止英国船只进入广东内河，其他国家船只只要进入广州，一定要按照罢工委员会的规定，办理手续，纠察队可派人上船检查，如违反条例，则扣船查办。这是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一次沉重打击。

其次，省港大罢工为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稳定广东政局，并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广东内部各派军阀拥兵自重，盘踞东江和南路的军阀也虎视眈眈，广东革命政府处境十分险恶。省港罢工后，经常留居广州的工人，形成为一支有严明纪律、富有战斗力的社会政治力量，一致表示拥护广东革命政府，这就大大增强了革命阵营。在国民



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南讨邓本殷时，以及后来的北伐时，他们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和救护队等随军出发。留守后方的工人纠察队也加强维持治安，使前方军队奋勇杀敌，免却后顾之忧。可以说，罢工工人在统一广东和北伐战争中，都起到了革命先锋和生力军的作用，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再次，省港大罢工进一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的一次具有鲜明反帝色彩的爱国运动。在罢工过程中，创造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这样严密的高效率的组织，采取最广泛地团结一切爱国群众，分化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策略，并成功地组建了像工人纠察队这样的革命武装等等，这些经验，都为中共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积累了经验。

广州政府面对的内外环境

1922年底，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部在孙中山的策动下，组成联军，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他们与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凯、参谋长李济深、独立旅旅长莫雄等秘密联系，迅速占领了梧州、肇庆，直逼广州，陈部粤军纷纷倒戈。陈炯明见大势已去，遂于1923年1月5日通电下野，残部退往东江惠州一带，接着，滇桂军便争相开往广州，抢占机关和公共场所，把持行政和税收大权，广州实际上成为滇桂军的天下。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命他们暂时主持粤局，但滇桂军根本不听号令。桂军头目沈鸿英尤为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广东总司令，控制全省。他集中兵力于观音山、白云山等地，企图消灭粤军势力。1月26日，沈鸿英以讨论广东军事善后问题为名，与杨希闵、刘震寰联名邀请胡汉民、邹鲁、魏邦平等到江防司令部（滇军杨如轩旅驻地）开会。沈鸿英指示其部将李易标、刘达庆等在会场上向胡汉民、邹鲁、魏邦平等进行突然袭击。由于刘震寰、杨如轩的干预，胡汉民、邹鲁等得以脱险，魏邦平却被俘押至滇军司令部。

江防事变后，胡汉民避往香港，电辞省长职。孙中山改命徐绍桢为广东省长（后改任廖仲恺为省长），并致函刘震寰，要他迅速进剿沈鸿英。同时致电杨希闵，要他释放魏邦平。这时，广州粤军在程潜主持下，集中江门；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由福建回师广东；朱培德部滇军也开抵梧州，他们都准备进剿叛军沈鸿英。杨希闵、刘震寰等也与沈鸿英有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沈鸿英遂将自己驻广州的部队撤往北江，并派人赴沪，请孙中山回粤主政。孙中山复函沈鸿英，令他悔过自新，同时于2月中由沪启程，重返广东。

孙中山到达广州后，不再回任大总统，而在广州农林试验场（4月迁往广州河南士敏土厂）设立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他说："今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是再拿护法问题来做功夫。现在的政府为军事时期的政府。"他抛弃了护法的旗帜，宣布今后转入"讨贼时期"。他所谓的贼包括当时的南北



军阀都在内，而首先是指陈炯明的叛军。

3月初，孙中山正式设立大元帅大本营，以谭延闿、伍朝枢、廖仲恺、邓泽如分别担任内政、外交、财政、建设等部部长，杨树堪为秘书长，张继、谢良牧为参议，程潜为军政部长，张开儒为总参谋长（后为李烈钧），朱培德为参军长，朱部滇军改编为大本营拱卫军。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统帅大本营及陆海各军。他制订梧州、肇庆及西江北岸为桂军总司令沈鸿英部防地，所遗北江防务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接收，并任命杨希闵为广州卫戍司令；刘震寰改任西路讨贼军总司令，以石龙、东莞、虎门为防地，孙中山宣布以后各军非有大元帅令，不得擅自移动。

沈鸿英表面表示遵命，把部队撤出广州，实际以移防为名，将部队集中于韶关、新街、高塘一带，伺机叛变。4月15日，沈鸿英在新街宣布就任北洋政府所委的“广东军务督理”，通电要求孙中山“撤销帅府，回沪筹备兵工”，并由白云山向广州市进攻。孙中山遂宣布撤销沈鸿英的桂军总司令职务，命杨希闵、刘震寰等部反击叛军。双方在粤汉路上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拉锯战，最后，沈军失败，退出韶关，广州才转危为安。

5月间，正当沈鸿英叛变之际，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余部起而相应，这时陈的余部分别驻在潮汕、惠州和龙川一带。还在这年2月，原驻闽粤军许崇智部奉孙中山之命，改称东路讨贼军，由闽回粤，计划与西路讨贼军配合，收复东江地区。陈炯明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便指使部下洪兆麟等伪装输城，陈则避走香港。孙中山派李烈钧、姚雨平等分赴潮汕、惠州收抚叛军。许崇智部也进驻潮汕。当沈鸿英部发动叛乱时，这些伪降部队又于5月8日再度叛变，赶走李烈钧，许崇智部也受到袭击，损失惨重。叛军推叶举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广州。孙中山急调西江、北江两路军队开往东江，并任命程潜为东江讨贼军总指挥，统帅滇、粤、桂联军分路进攻惠州。孙中山在石龙设行营，亲赴前线督战。叛军进行顽抗，双方相持不下。

6月，逃往江西的沈鸿英残部，乘广州政府用兵东江之际，又联合北军，向北江发动反攻，占领了韶关、英德、南雄等地。西江沈军也由梧州进至德庆、禄步、悦城等地，广州又受到威胁，孙中山急调滇军和粤军分别击退北江、西江之敌，收复韶关、梧州等地，广州局势才又缓和下来。

10月，陈炯明在得到直系军阀接济的大批饷械后，由香港潜返东江，策划发动部下全面反攻，分三路向广州进击。孙中山亲赴前线督战，也未能组织叛军前进。11月中旬，叛军直抵广州近郊石牌、瘦狗岭、黄埔一带，

广州市区已闻枪声，市民呈现恐慌。

11 月 3 日，刚刚成立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新建立的广州 12 个区的区党部委员债开紧急会议，廖仲恺担任会议主席。他报告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后，请鲍罗廷讲话。鲍罗廷在讲话中指出，前线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至今“仍然悬在空中，而没有依靠某一个阶段或某些阶级。主要由农民构成的广东省居民，对待前线发生的斗争是消极的。最近在一些地方不时发生农民暴动，很遗憾，这帮了敌人的忙。”“有一半农民在前所未闻的艰难条件下，耕种极少的土地。他们不得不向地主交纳很高的地租，并向政府交纳重税，以便进行某种对于农民来说完全是莫名其妙的、在他们看来是不需要的战争。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做任何一点帮助农民的事。这样，贵党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你们的第二个支柱是广州的三十万有组织的男女工人。”“自有贵政府以来，你们没有向工人们发过一份传单，你们没有举行过一次工人的会议。”“因此，本来可能成为你们政权——掌握这种政权有利于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支柱的工人们，现在却从你们身边溜掉了。”“目前小资产阶级不积极支持你们，主要是因为它从贵政权中得不到任何利益”。为了取得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鲍罗廷建议，政府应当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立即为工人制定劳工法令，规定最低限度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最低纲领；必须马上向小资产阶级发出宣言，提出一些将使他们从中得到好处社会法令。最后，鲍罗廷还建议立即动员国民党员，组成志愿部队，由国民党军官领导，开赴前线作战，以消除威胁广州的战争危险。鲍罗廷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特别是其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热烈欢迎。廖仲恺代表政府宣布要颁布这类法令。会后立即起草了有关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三个法令草案，提交各区党部委员会讨论，并向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孙中山报告。

在各区党部的讨论中，上述法令草案得到热烈欢迎，只有第十一区和十二区的国民党区党部领导人表示反对。其理由是，似乎这些法令意味着“使广东苏维埃化”。孙中山接到草案时，起初也犹豫不决。“原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在头天面见了他，并试图劝他放弃法令。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法令将给侨居海外的国民党员的工作造成极困难的条件。不仅如此，他们借口说‘党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侨居海外的国民党人因而可能被赶出党去”。



11 月 16 日早晨，孙中山派人把鲍罗廷请到大本营，对他说："我依然同意实行劳工法和关于改善小资产阶级状况的社会法令，至于土地法，我建议先与农民进行联系，弄清他们的需要。"

同一天，廖仲恺在各区党部委员会议上宣读了上述三个法令草案，并建议选举一个委员会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土地法令，审查关于农民状况的材料，弄清农民的需要，以便在这些工作之后，把最终文本提交政府批准。而一些右派却建议把三个法令草案都交给专门委员会进行深入研究，并在该委员会中成立三个相应的组，他们企图利用这种程序把三个法令的通过长期拖延下去。廖仲恺没有识破他们的意图，因而同意了这种意见。结果，这些法令迟迟没有通过。但是关于这些法令的讨论，对于鼓舞工农群众的情绪，挽救广州的大局，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在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召开的各区党部委员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支援前线工作的决议，决定每个区党部支援前线一支部队。与此同时，广州的共产党员也通过一项决议，"委托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区组织去支援滇军某部和湘军某部"。据国民党各区党部的统计，短短几天内，报名上前线的人员总共有 540 人。他们被分配到大本营，立即开始军事训练，准备开赴前线。国民党党部还决定立即募集大批现金、粮食和衣服等，支援前线部队的供应，由不适宜当兵打仗的党员承担这一任务。各区党员按规定打着各自的旗帜，把所有募集到的东西送到前线各部队，并在以后与被援助的部队继续保持经常的联系。

当时广州的局势十分危急，叛军已攻破观音山，直逼广州市郊白云山下，子弹已经落在广州市区。孙中山乘火车退回广州时，叛军就在后面边打边追。广州江防司令杨天培，吓慌了手脚，仓惶逃往香港。广州的军政机关纷纷准备撤退到北江，这时吴佩孚调来配合陈炯明攻占广州的豫军樊钟秀部三个旅也由北方到达韶关。正在情况万分紧张之时，在孙中山的争取下，樊钟秀毅然率领豫军倒戈，宣布拥护广州革命政府。孙中山急调豫军乘火车南下增援。樊部赶到黄沙车站，"匆忙下火车，饭也顾不上吃，每人只领几个馍，两块银洋，就边吃边跑步冲向前线，打得非常出色，一举驱散白云山附近之敌，直捣观音山阵地"。孙中山也亲自指挥滇军、桂军、湘军，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奋勇杀敌。经过 11 月 18 日 ~ 19 日两天的艰苦战斗，将围城叛军击溃。讨贼军乘势分途追击，将叛军赶回石滩、石牌和增城以东。广州因此得以解围，革命形势再度转危为安。

12月，广州革命政府又面临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这次是由关余问题引起的。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海关税收被作为向帝国主义赔款及所借外债的抵押。除按期偿还赔款债务外，所余之关税收入成为关余，由历来受英国人控制的税务公司上交中国政府。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政府以后，曾取得外国驻华公使团的同意，从1919年起，将关税总额的13.7%，由广州税官按月交给护法政府，已先后交款6次，共计银300余万两。1920年3月，由于护法军政府分裂，此款遂停止交付，1923年孙中山重返广州，于9月5日令外交部照会北京公使团，要求将广州税官所欠关余，全部交还广州政府。北京公使团以广州革命政府未经各国承认为理由，对此事置之不理。11月23日，广州政府外交部再次警告北京外交使团，要他们如数交还关余，否则，革命政府将自行提取。12月3日，北京外交使团致电广州政府，声称如径行收官广州关税，当以强硬手段对付，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随即派遣军舰20余艘驶入广州省河，对革命政府进行恫吓。12月12日，广州各界人民召开国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并向孙中山请愿，要求收回关税主权。孙中山接见代表时表示："我自有办法，决定三日后用正当手续提取关税。"随后即派罗桂芳为粤海关监督，令他率兵10名，前往就职，接收海关。这时，沙面外国领事团竟以炮轰大元帅府相威胁，指使停泊沙面珠江的外国军舰卸去炮衣，将炮口指向帅府。孙中山面对威胁，毫不动摇，令人传语沙面使团："如外舰胆敢开炮，我即命陆军占领沙面，收回主权，使逞强者无立足之地。"帝国主义者无计可施，终于被迫屈服，答应将关余如数交给广州政府。

在打退陈炯明叛军的猖狂进攻，粉碎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后，1924年上半年，孙中山一面致力于改组国民党；一面多次调兵遣将，围攻陈炯明老巢惠州。但因陈勾结北洋军阀，进行顽抗，惠州长期未能攻下，叛军也无力进行反扑，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1924年下半年，北洋军阀内部又趋于激化。9月初爆发了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反对皖系军阀卢永祥的江浙战争。第二次直奉大战也迫在眉睫。在此情势下，孙中山除分兵一部继续围困惠州外，决定集中兵力，准备北伐。9月4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集会议，部署北伐。他宣布："两星期内，所有滇、桂、湘、豫、赣、山、陕各军一律出师北伐"，"本省治安及东江方面统由中央直辖粤军（许崇智军）布防留守"，还决定"（一）组织北伐筹备处，特任粤、桂、滇、湘、豫及中央直辖各军军长为筹备委员。关



于筹备出师北伐之作战计划，由各委员筹备起草，限五日内成立。（二）大本营移设韶关。（三）省垣设立留守府。”9月5日，孙中山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令》，指出：“今者烽燧虽未靖于江东，而大战之机已发于东南，渐及东北，不能不权其缓急轻重。”古人有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故遂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同日，在《告广东民众书》中又说：“以全国言，一切变乱之原动力，在于曹、吴。其他小丑，不过依附以求生存。苟能锄去曹、吴，则乱源自息。”当此全国鼎沸之日，吾父老子弟尤当蹈力奋发，为民前驱，扫除军阀，实现民治，在此一举”。9月12日，孙中山正式移大本营于韶关，同时下令特派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东，代行大元帅职权，广东战事遂暂告一段落。

《北伐宣言》发表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出现了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自曹锟贿选总统、窃取北京政权后，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在全国迅速地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反直运动。同时，由于曹、吴穷兵黩武，企图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迷梦，加剧了直系军阀与其他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在全国人民反直运动的高潮中，反直系的各派军阀也趁机打出反贿选的旗号，纷纷通电声讨曹、吴。

这一时期，孙中山为了实现其讨伐曹、吴，统一全国的事业，加强了与各派反直势力的联系。他认为，要打倒军阀应自窃据中枢最有力之直系始，因此很早就同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有过反直的同盟联系。早在 1922 年 2 月，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誓师举行第一次北伐时，张作霖派李梦庚为代表，赴粤与孙中山接洽，联合反直（曹锟）。3 月，孙中山又派伍朝枢、汪精卫赴奉（天）与张作霖商洽，经入闽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联合入闽皖系徐树铮同皖系首领段祺瑞密洽，三方结成反直“三角同盟”。1923 年 10 月曹锟贿选总统时，孙中山并曾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一致行动。而段祺瑞、张作霖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想利用孙中山的力量，共同对付直系势力，因此他们之间曾函件往来，互派代表，磋商联合反直事宜。1924 年春，孙中山派孙科联络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浙江皖系军阀督办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三人于奉天（沈阳）会议，签订了“三公子三角同盟”，加强了这种反直的“三角同盟”，约定共同讨伐直系军阀总统曹锟和直鲁豫巡史吴佩孚。

这时直系首领吴佩孚的“武力统一”计划，主要用来破坏反直的三角同盟。除了在北方加派重兵严防奉军南下外，在南方则派孙传芳进攻福建，企图由孙传芳与陈炯明相勾结以征服广东；以直系地方军阀苏督齐燮元联合闽、皖、赣等省督军，形成对浙江的包围，订立围攻浙江计划，以解决卢永



祥。到1924年5月间，孙传芳已将皖系军人臧致平、杨化昭等部驱出福建，占据了福建全省，从而实现了从四面包围浙江的计划。卢永祥组织联军对抗，并致电张作霖、孙中山请出师。1924年9月3日，在曹吴的指使下，直系军阀孙传芳和齐燮元以卢永祥收容由福建退出的臧、杨残部为借口，从福建、江西两面发动了对浙江卢永祥的进攻，“江浙战争”爆发。当天，浙江卢永祥电请孙中山等“分道出师，兼程并进”，共同讨伐“乱国之曹锟”。奉系张作霖也致电孙中山，指出“曹吴包藏祸心，益张毒焰”，“罪恶山积”，“倾接杭州卢总司令今日通电，是戎首之责，已有所归，即声讨之师，不容或缓”，应允将誓师入关作战策应，望广东方面取一致之行动。同日，中央政治会议召开第七次会议，孙中山、伍朝枢、瞿秋白、鲍罗廷出席，议决：发表北伐宣言，及大本营移驻韶关宣言，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方军阀”为号召，进行北伐，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共抗直系”。

在这种情势下，早与皖、奉有三角反直军事同盟的孙中山，决计北伐，攻击江西。从8月31日起，每日召开军事会议，决策北伐。9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北伐军。当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第五次军事会议，宣布：“两星期内，所有滇、桂、湘、豫、赣、山、陕各军一律出师北伐，以为浙卢声助。本省治安及东江方面统由中央直辖粤军（许崇智军）布防留守”，“届时各界须一致先行出发，决不容缓”。当日会议议定：“一、迁大本营于韶关，广州设留守府，由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廖仲恺为北伐军需总监兼政府财政部长。三、各师前锋限三日集中韶关。四、北伐军为豫军、桂军、赣军全部，湘军、滇军一部，粤军张民达、许济两部，共45 000人。编为三路，以南昌、九江为目标。”9月5日，孙中山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宣言，指斥曹、吴诸逆“穷凶极戾，诚邦家之大憝，国民之公仇。比年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烈矣，探其乱本，皆由此辈狐鼠凭借乘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邱圩”，申明“尅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并发表《告广东民众书》，宣布此次北伐为“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与诸军会师长江，饮马黄河，以定中原”。10日，孙中山致电卢永祥，告以“文以宣布国人，一致声讨，躬率师旅，以为前驱”。13日，孙中山亲率湘军、赣军、豫军及滇、粤军之一部分进驻韶关，设大本营于南华寺。9月18日，他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了《北伐宣言》。宣言申明，北伐的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

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宣言反映了孙中山坚持反帝反军阀的正确立场。这时，北洋政府以赣督蔡成勋、赣粤边防督办方本仁率邓如琢、冯绍闵、蒋镇臣、杨如轩等部，分布于大余、新城、南康（中路），信丰、古坡圩（右路），崇义、上犹（左路）等地，以赣州为中心。20日，北伐军各部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22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各军改称建国军：湘军为建国湘军，谭延闿任总司令；滇军改称建国滇军，杨希闵任总司令；粤军为建国粤子，许崇智任总司令；豫军改称建国豫军，樊钟秀任总司令。25日，北伐军樊钟秀、朱培德、李明杨、吴铁成，滇军赵成梁等部约万人，进抵赣边之仙人岭、石将军、大人岭一带。28、29两日，豫军前锋占领崇义、遂川、万安、泰和、吉安附近一带。当地民军纷纷起而响应，永新、莲花、宁冈等处敌军望风而靡。蔡成勋闻报，令冯绍闵旅赴吉安应援，并增兵宁都、广昌、抚州等处防守。樊部与之作战，遇伏受挫，遂于10月26日退至湘境之桂东，守险待援。时北伐军主力已集中韶关待命。

正在北伐军进占顺利之际，广州商团再次暴乱，骤然举行第二次总罢市，并枪杀游行示威群众。在广州政权处于严重危机之际，孙中山估计到形势严重，但因受到客观形势压力，对坚守广州失望，最初不愿回师镇叛。孙中山曾在蒋介石的回电中说：“以我推测，或不至如此危急。然我来韶之开始，便有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送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当机立断。切勿迟疑”。而中国共产党态度十分坚定，主张以可靠之军队向商团发起总攻。孙中山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兵大众坚强的战斗意志中吸取了力量，决心回师广州，武装讨平商团叛乱。在国共合作的努力下，孙中山及其革命政府取得了平定商团叛乱的彻底胜利。

商团叛乱平定后，北伐军继续北伐。这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形势有利。大本营令北伐军积极行动。11月14日，孙中山致电谭延闿，令他全权办理北伐事宜，指出：“本大元帅现因统一、建设等要务，启行北上。除仍由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外，所有大本营关于北伐事宜，着由建国北伐总司令谭延闿全权代理，北伐各军概归节制调遣”。谭延闿决定北伐军以占领南昌、与东南各义军会师长江为目的，



第一步先行歼灭赣南之敌，进占赣州。根据北方军赣粤边防督办方本仁所部分为左、中、右三路分置于崇义、南康、信奉等地的敌情，将北伐军编为四队。中央军，总指挥宋鹤庚，指挥建国湘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向南康之线进攻，占赣州。左翼军，总指挥陈嘉佑，指挥建国湘军第四、第五军，建国豫军第一部，向崇义、上犹、遂川之线攻击。右翼军，总指挥朱培德，指挥中央直辖第一军，赣军和鄂军全部，向信奉、古坡圩之线攻击，会攻赣州。占领赣州后，第二部计划攻占吉安、抚州，会攻樟树、南昌。预备队，总指挥谭延闿，指挥建国湘军第一、第二纵队，及湘军一、二、三、四各路。谭延闿为整个北伐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前敌总指挥。各军于11月1日以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正欲下令总攻，适方本仁向北伐军输诚，谭延闿纳之使为内应，委以赣南督办，令其同北伐军合力攻击赣督蔡成勋。方本仁于11月初通电讨蔡，分兵北进，所向皆捷。6日，蔡成勋溃败逃沪，孙中山委方本仁为湖北总司令，令谭延闿将大本营移赣州。是日，北伐军乘胜前进，向赣南总攻，当日占领大余、新城、南康，9日占领赣州。13日，北伐军总司令迁赣州。赣南遂定。之后，北伐军兵分两路继续北进，21日占吉安。正当北伐军拟攻南昌、出师武汉时，方本仁勾结广东陈炯明、湖南赵恒锡，南北合击北伐军，阻止北伐。方本仁本部，集结于峡江、阜田之线，构筑工事，抵抗北伐军前进。

方本仁与赣督蔡成勋原来有隙，日思图蔡，恐北伐军攻其后背，乃暂靠北伐军。及至赶走蔡成勋，目的达到，又投段祺瑞，以重款与段，以求赣督。段祺瑞电孙中山予以缓处，孙派李烈钧入赣斡旋。方本仁怕李烈钧入赣对他不利，乃西联湘省赵恒锡，使夏斗寅部助方作战，自修水进至万载。南联广东东江陈炯明，使林虎部调往赣粤边之龙南、定南、全南地区，扰北伐军后方，一部在河源集结，相机进犯。方部主力于25日向北伐军发起总攻，双方在吉水、峡江地区展开激战。因南线林虎部已进至赣南地区，北线夏斗寅部正由万载南进，北伐军腹背受敌，弹药粮饷缺乏，于1925年1月3日~6日间，由赣州、南康以次退去，集中于大余岭、南雄一带。第二次北伐军事行动暂告结束。是役，北伐军共损失兵力一个团，枪3 000支，湘军阵亡团长2人。这次北伐，历时几个月，最后功败垂成。

孙中山当时匆匆督师韶关，举行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践“粤、皖、奉三角反直军事同盟”之约，策应皖系军阀开始的江浙战争，应段祺瑞、张作霖之敦促，共倒曹吴。此外，尚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趁北伐

之机将各路骄兵悍将调遣出粤，给广东人民以休养生息。出师前夕，孙中山在帅令中承认近年来“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加上“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生计日艰”。申明现广东革命政府为广东人民计，“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决定“在最短期间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二是面对广东内部难以解决的严重局势，拟借北伐之机摆脱广东危局，另辟生路，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9 月 9 日，孙中山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称：“英国之压迫”与商团作乱、“东江敌人之反攻”与“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现在奉军入关，浙可支持，人心悉欲倒曹、吴，……乘此决心奋斗，长驱直进”，“必有好果也”。在北伐进程中，孙中山一再电示蒋介石舍弃黄埔孤岛，将枪弹和学生一并送来韶关，甚至提出“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这是孙中山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估计与放弃广州全力北伐，建立新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设想。他不惜舍粤图赣、湘，对于北伐的结局估计过于乐观。三是通过北伐来实现推倒曹、吴势力，建立自由独立之国家。在北伐出师前后，孙中山多次强调：“这次革命政府提出北伐，便要将西南军队连接奉、浙军队，扫除旧屋砖瓦垃圾之北洋军阀官僚，以建设新国家”。孙中山这次韶关北伐，体现了他在艰难顿挫之中，敢于讨伐直系军阀的战斗精神，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但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孙中山举行北伐有良好的愿望与动机，但在客观上广州商团反对革命政府、准备叛乱之际出师北伐是不利的；特别是孙中山为了全力北伐，曾作出放弃广东革命根据地、将广东还诸广东人民的决定，这更是失当的妥协做法。幸而在中国共产党和广东工农兵大众的坚强意志下，孙中山改变做法，决心回师广州，领导革命政府取得了平定商团叛乱的彻底胜利，初步稳定了广东革命政权，为广东革命根据地大好形势的发展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创造了良好条件。



广州政府镇压商团叛乱

在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广东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但是，盘踞在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还相当强大，他们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企图扑灭在广东燃起的革命烈火。帝国主义一方面援助陈炯明，暗中输送军械，积极策划陈炯明从外部进攻广州，另一方面收买广州商团，策动商团在广州内部发生叛乱，妄想一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因此，消灭盘踞广东的反动军阀，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是促使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

1924 年 10 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下，镇压了广州商团叛乱，开始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广州商团成立于 1912 年，原是广州商人为了防备盗匪抢劫、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建立的自卫组织。团址设在广州珠巷会馆内。在成立初期，他们“向来都是很自爱的，对于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广州政府，无论是民党，或是非民党，同商团相处，都是安然无事”。1919 年陈廉伯继任广州商团团长后，在英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支持下，商团势力迅速扩大，成为一个买办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集团。英帝国主义者煽动陈廉伯：“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1923 年，广州商团“向加拿大购买步枪千数百支，由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窃取大权下的北京陆军部发给入口护照，海关又为英人所把持，上下一气”。到叛乱前，“广州商团共有十团，计四千余人，连同后备力量，约达六千余人”。在广州商团的带动和影响下，广东省内的许多镇、县，也都成立了商团，各地商团奉广州商团为首领，与地主豪绅、封建军阀势力相勾结，组成了一支敌视广州孙中山大本营政府的力量。陈廉伯羽毛渐丰后，“北通曹吴，东连陈炯明”，并勾结佛山商团和乡团，利用沙面租界作为反革命根据地，妄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建立所谓商人政府。

从 1924 年 5 月开始，广州商团公开与广州革命政府对抗。5 月下旬，广州市政府公布“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陈廉伯指使商人向广东革命

政府“请愿”，反对抽收铺底捐，声称如达不到目的地，即行罢市。同时，他还联络广州附近的商团和乡团酝酿罢市。5月26日，广东省长、广州市长被迫发出布告，宣布取消“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27日，广州商团擅自决定召开有108埠商团代表参加的广东省商团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陈廉伯任总长。会上通过了购置武装巡舰案、筹设商团军制弹厂案、联防总部下设军事参谋案、联络各属乡团案等。这时，陈廉伯“欲步墨索里尼之后尘；期于8月14日起事，推翻政府，自为督军”。

孙中山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8月9日，广州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的大批枪械（步枪、驳壳枪、大小手枪9841支，各种子弹33.752发），由悬挂丹麦国旗的轮船哈佛号秘密运进广州时，孙中山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派舰扣留枪械，并下令通缉商团头子陈廉伯、陈恭绶。8月10日，永丰、江固两舰奉令将偷运枪械的外轮哈佛号截获，将它从白鹅潭押至黄埔，并将其所运枪械，全数提出，储存于黄埔军校。

陈廉伯闻讯军械被扣，立即逃往香港，指使广州商团以罢市威胁广州革命政府，要求无条件发还枪械、准许商团成立联防总部、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令。8月12日，广东省廖仲恺发出训令，禁止商团联防总部成立。当天，商团1000多人列队到孙中山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扣留枪械，并以罢市相威胁。接着，各县商团也纷纷到大元帅府请愿。8月18日，全广州银钱业罢市，反对使用广州革命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19日，孙中山派出大本营秘书和副官携函赴商团总部，答复商团说：“商人确向商团缴价购枪者，政府允许将所购枪械发还。其冒名商团所购之枪，不能发还”，并揭露了陈廉伯商团运动策划叛乱的阴谋，要求商团自行检举陈廉伯的罪行。商团竟不服从，于20日，把总部迁往佛山，在佛山大地主陈恭绶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省一致对付政府，一面渐次集中全省团军，一面准备各属总罢市”。22日，罢市由佛山开始，渐次蔓延到20多个市镇。23日，商团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无条件发还被扣全数枪械；二、准许商团成立全省联防总部；三、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令。同时，还以“粤省商团全体团军”名义，致电大本营及广东省政府，对孙中山和廖仲恺极尽恫吓讹诈之能事。到8月25日，在商团的煽动下，广东全省有100多处罢市，广州各大商号挂出英法国旗，反革命的商团军还大量散发反动宣传品，并通电各县商团，驱逐县长，宣布独立。8月28日，英帝国主义公然出面干涉中



国内政，支持广州商团，9 艘英舰驶入白鹅潭，炮口对准孙中山大元帅府。当天晚上，领事团质问广东省长廖仲恺："是否政府要开炮轰击商民，果有此事，外国决不能袖手旁观，当以实力制止。"9 月 14 日，广州商团趁孙中山率师北伐之际，散发攻击广东革命政府的反动传单，酝酿第二次罢市。

对于商团的反革命行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力劝孙中山采取革命手段，坚决实行武力镇压。1924 年 8 月 20 日，陈独秀在出版的《向导》周刊上发表评论，向广东革命政府和孙中山提出了忠告："现在这种发革命的商团军势力日渐膨胀，竟至抗违政府命令，自设联防总部，竟至私运大批军火，我们敢说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不在东江而在广州！我们以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部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是北伐。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团军，一旦东江或北江军事失利，第二次以枪弹'请孙下野'的便是商团军!"国民党左派也"极端主张严厉对付，要在政府方面，趁商团预备未周，后援尚无确实担保时，先行挑战"。他们还提议由国民党发一宣言，公开宣告："商团军纯粹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一切国民的最正当的主张便是不但扣械不能发还，而且要解除商团现有的武装。凡是罢市赞助陈廉伯买办的，国民都认为民贼"。

中国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建议孙中山当机立断，"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学生军和广大工农群众，纷纷到孙中山大元帅府请愿游行，反对商团罢市，要求孙中山下令讨伐，表示要尽力帮助广东革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全体学生一致决议准备对商团军作战。

但是，来自国民党右派妥协活动的内部压力，使孙中山一度迷惘，发生过动摇，以致几乎陷入了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困境。胡汉民等人力主妥协。8 月 18 日，胡汉民同广州商团代表谈判，主张每支枪交纳 60 元捐税后发还。同时，驻在广州的滇系军阀范石生、廖行超等竟以第三者的身份出面"调解"，与商团签约担保政府将枪械如数发还，而商团则向政府交纳 50 万元，胡汉民代行大元帅之职后，于 9 月 18 日派代表同广州商团头目赴黄埔军校查看所扣枪械。20 日，胡汉民取消了对陈廉伯、陈恭绶的通缉令，发还其被封财产。10 月 9 日晚，孙中山命令蒋介石依照胡汉民转呈的李福林所拟妥协办法发还广州商团枪械。10 日晨，李福林等赴黄埔，将枪械 4 000 支运回广州长堤发还广州商团。商团见政府步步退让，软弱可欺，越发猖

狂。10下午，商团军开枪射击庆祝双十节游行的工团军和学生，打死打伤数十人。商团还到处张贴反革命标语，武力威胁商人罢市。这时，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配合商团叛乱，进攻广州。商团妄图和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一时形势危急，达到了顶点。

这时，孙中山由于督师韶关，并不能及时知道广州一日数变的形势，因而还没有下定决心立即回师平乱。但是，他对商团有可能发生叛乱，是有所察觉和准备的。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同时孙中山也看出了局势的严重性和姑息养奸的危险，于是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回师广州，镇压商团的反革命叛乱。10月11日，孙中山成立以自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处理商团问题的权力机构，委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人为全权委员会，命令胡汉民解散商团机关。10月13日，孙中山由韶关回师广州，参加北伐的全部警卫军和部分湘军、粤军，星夜兼程，回到广州。14日，孙中山发布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手令："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时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铁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堂、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介石）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此令"孙中山限令在24小时内，务必解除商团武装。他指示："收缴商团枪支，刻不容缓，务于二十四点钟内，办理完竣，以免后患"。当日黄昏时分，政府军向商团军发动进攻，商团军在西关一带架设天桥、炮台、构筑街垒，厚建竹木栅，进行顽抗。孙中山下令驻防西关的滇军廖行超部负责进剿，廖部拒不执行，坐视不动。于是，孙中山改派警卫军和黄埔学生军进行清剿。政府军和黄埔学生军在工农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分头迎击。针对商团军在西关一带的街垒木栅，政府军决定采用火攻，由消防队救火车载煤油喷射连接各马路的竹木栅，引火燃烧。顿时，烈火冲天，西关一带化为火海，街垒路堡化成灰烬，有100多家商店悉数被毁。经过数小时激战，革命军将商团军全部歼灭，商团军首恶分子逃往香港，其余大部分向政府缴枪投械。这场反革命的商团叛乱遂被平定。

叛乱平定后，孙中山很注意对善后工作的处理。他指示："商团既用武力以抗政府，则罪无可逭。善后处分，必将商团店户货物房屋，悉行充公，其为首之团匪，严行拿办，万务再事姑息，除贻后患，其在省外之商团，当限期自首悔罪，永远脱离商团，否则，亦照在省匪团，一律承办"。他在电示胡汉民处理善后事宜中，指出："未入商团之商店，应严令即日开市；其已入商团者，应分别处罚；为首者没收财产，附从者处以罚金，论情罪轻



重，由数百元至万元，作北伐军费。”这样区分了首恶和附从，区分了已加入店户和未加入店户，贯彻了分别对待的政策，就使得打击面缩小，团结了广东的广大商界，从而起到了安定人心、稳定局势的效果。

商团叛乱是英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联合发动的一次反革命事件。商团叛乱事件充分表明，帝国主义是仇视中国革命的，买办、军阀、国民党右派则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是帝国主义赖以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它们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商团叛乱事件还表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革命统一战线，其内部成分十分复杂，国民党各派的政治态度都有比较明显的表现。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是买办阶级的思想，在革命中是妥协动摇的，蒋介石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可否认他还具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蒋介石在平定商团叛乱中是很积极的。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他们更多的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在广州商团事件上，他们开始就主张坚决镇压。孙中山是国民党各派公认的领袖，有时他不免也会受到右派的一些影响，但总的来说，他反对帝国主义、买办、军阀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鲜明的。在这次商团事件中，孙中山在关键时刻，以果断有力的措施领导了镇压了这次叛乱，这是他在晚年为革命建立的一大功劳。

商团叛乱是首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孙中山广州政府所遇到的最严重的事件，这一事件对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孙中山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次叛乱很快得以平定。这也表明了在国共两党合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广州革命政府，是有力量的。商团叛乱的解决，向帝国主义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威力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清除了革命的一个“心腹之患”，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广东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稳定，革命有了一个比较牢靠的基点，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

商团叛乱的平定，使广东革命政府得到了初步的巩固。但是，这时广东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陈炯明盘踞东江，邓本殷窃占南路，广东革命政府实际还只能控制全省1/3的地区；而且在内部的滇桂军阀势力，暗中和帝国主义及陈炯明相勾结，伺机推翻革命政权，企图取而代之。商团叛乱平定后，港英当局转而大力支持陈炯明，积极唆使陈炯明部队进攻广州，把颠覆广东革命政权的希望寄托在陈炯明身上。因而，征讨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成为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

陈炯明自1922年冬战败以后，退居东江一带，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继续负隅顽抗，成为广东革命政权的直接的主要威胁。1923年以来，孙中山曾数次督师征讨，但依靠的仍然是滇桂等军阀部队，都因没有坚强的革命军队，因而一直未能奏效。

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认为反扑的时机已到，蠢蠢欲动。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陈炯明迫不及待地趁孙中山离粤北上的时机，自称“救粤军总司令”，联络江西军阀方本仁部，准备进犯广州，推翻革命政权。陈炯明所属的林虎、洪兆麟、叶举、刘志陆、熊略、尹骥等部，总兵力约5.6万人，而以林、洪、叶三部为主力，约3万余人。这时，陈炯明以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叶举为副总指挥，分兵三路，谋取广州。其中，林虎率领的右路纵队，集结于河源以北地区，企图由博罗一线进攻广州；洪兆麟、叶举率领的中路纵队，集结于惠州地区，作为进攻广州的主力，企图首先攻占石龙至石滩地区；由刘志陆率领的左路纵队，集结于石龙东南地区，企图切断广州同其他地区的联系，并掩护其进攻广州主力部队的侧翼及后方。1925年1月7日，陈炯明下达了总动员令。

1925年1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讨伐陈炯明，颁布东征宣言。广州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决定将所辖许崇智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谭延凯的建国湘军及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和两个教导团组成



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是日，杨希闵以联军总司令名义颁布动员东征命令。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对陈炯明的征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著文指出：陈炯明此次进攻确实得有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帮助，“国人须知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这种阴谋不仅是拆孙中山个人国民党一党的台，而是要根本剿灭中国革命解放运动”。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广东工农群众，立即起来保卫革命，文章强调指出：“我们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柱石，在沙面罢工、商团事件以及最近广宁农民反抗大地主的争斗中皆足证明我们工农是南方革命运动之唯一保卫者。现在帝国主义与北方军阀协同广东买办阶级和大地主怂恿他们的走狗陈炯明向广州进攻，为的是要剿灭中国的革命和我们工农的势力，我们现在更应无条件的帮助广州政府打倒这不知羞耻的叛贼陈炯明”。《向导》周报认为，“这次东征战争的意义，不仅打倒了一个恶劣的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爪牙，不仅挽回了革命运动的危机，而且开辟了一个革命军事行动的新纪元，使国民党和广州政府今后得逐渐离开雇佣军阀的旧关系而确立于真正的革命的武力之上”。

中共两广区委十分重视东征的工作，力主讨伐陈炯明，并发表了檄告广东工农群众的檄文，号召工农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在东征军出师之前，根据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当时任区委军事部长）的指示，由曹汝谦、高超率领的铁甲车队一部，即活动于广州至石龙之间的铁路线上，执行对石滩方面警戒，进行威力侦察，掩护东征军集中、开进，并沿铁路线发动群众等任务；东征开始后，这支部队又按照区委和周恩来的指示，参加东征，编入校军的序列。周恩来在东征中，还十分重视校军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工作。

1925 年 1 月下旬，东征联军陆续开赴前线。1 月 26 日，陈炯明部进攻联军驻地虎门、石滩，分别被桂军谭启秀旅和滇军范石生部击退，于是东江战事开始。

1 月 30 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讨陈的部署问题。会议采纳了军事顾问加伦的建议，东征联军的兵力部署分左、中、右三路直捣东江。右路军：由许崇智统率粤军和黄埔校军组成，约 10 000 人，其任务是广九铁路沿线的敌军，然后向淡水、平山、海丰、汕头一线进攻；左路军：由杨希闵率领滇军担任，约 30 000 人，其任务是向河源、五华、兴华一线推进；中路军：由刘震寰率桂军担任，约 6 000 多人，其任务是围

攻惠州城，并策应两翼。

2月1日，黄埔军校教导第一、第二两团出师东征，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等随队出发，加入右路作战。2月3日，校军按预定计划集结虎门附近。同日，粤军王若周旅首先进攻东莞，校军协同作战。4日，王旅攻克东莞，粤军张民达师同日占领石龙。右路军占领东莞、石龙后，立即向人民群众开展政治宣传工作。6日，东莞商务分会召开欢迎革命军大会，蒋介石、周恩来等应邀出席。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讲指出，列强、军阀的压迫，给工农商各界带来极大痛苦，东征出师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革命军要有人民的援助，才能肩负起自己的重大责任，他要求“为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军之关系。”[146]右路军在占领石龙以后，即以铁甲车队为先导，向南挺进，进攻平湖、深圳等处的敌人。在东征军的进逼下，陈炯民部沿广九线节节败退。2月7日，右路军占领常平，10日右路军进占平湖，11日占领深圳，陈军纷纷向淡水败退。至此，广九路沿线地区完全由东征军控制。14日，右路军迫近淡水。

攻取淡水，是东征的一次大战役。淡水城虽小，但工事坚固，并靠近惠州城，淡水守敌为陈军熊略等部约3 000人，加上广九线溃退下来的部队，共约4 000余人，援军随时可至，故敌企图固守待援，利用淡水城阻挡东征军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右路军决心采取集中兵力、速战速决的战法，争取在惠州敌援军尚未赶到之前占领淡水；并决定以黄埔教导团为攻城主力，攻淡水之东南，粤军第二师攻城之西北，并拦截从北面增援之敌，粤军独立七旅攻城之东北。他们相互策应，围攻淡水城。2月14日，三路直逼淡水城下，陈军闭城困守，相持至夜。这时陈军洪兆麟部已由潮汕开抵惠州。当其得悉淡水被围后，急移兵救援，情势紧迫，黄埔教导团遂组织奋勇队（即敢死队），由张际春、彭干臣、蔡光举、李安定、刘筹西、游步仁、张隐韬、赵枬、李汉藩、李奇中10名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担负强行登城任务，他们当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15日清晨，在炮兵及步机枪猛烈火力掩护下，奋勇队前仆后继，首先接近城根，用云梯攀登入城。经过巷战肉搏，全歼守敌，攻克淡水，取得了东征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在攻城战斗中，教导第一团第三营党代表蔡光举身负重伤后牺牲，排长刁步云、江世麟等牺牲在战场上。

当日下午，洪兆麟部队赶到，在淡水东北与粤军第七独立旅及教导团一部展开激战。教导第二团团长王伯龄没有防备，当敌军反扑过来时惊慌失

 

措，队伍散乱。形势紧急，共产党员陈赓等主动率领学生军迎击敌人，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率粤军第二师及第七独立旅配合作战，激战至傍晚，敌始向惠州方向退去。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免去王伯龄的团长职务，由沈应时接替（沈负伤，由钱大钧代理）。淡水之战，振奋了士气，树立了黄埔学生军的威望，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攻克淡水后，右路军决定继续向潮汕地区推进。这时，担任攻取惠州任务的桂军，畏缩不前，左路军的滇军则在增城、博罗之间徘徊观望。杨希闵、刘震寰都希望右路军归于失败，以实现其谋取广州的反革命阴谋。而这时，广西军阀唐继尧也正在觊觎广州，准备发动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右路军决定积极向东江推进。2 月 20 日，右路军各部向平山合击，集结于平山地区的敌军洪兆麟、叶举等部 7 000 多人，是时出动占领白芒花，兵分三路反攻淡水。两军在淡水城北羊塘围遭遇，激战半日，敌军向平山退却，右路军乘胜追击至白芒花。经过这次战斗，击溃了洪兆麟的主力，使其失去了战斗力。21 日，粤军第二师进占平山。

2 月 22 日，右路军在白芒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两路进攻海陆丰，直驱潮汕。由许崇智率粤军张民达师、许济旅为右翼，由三多祝进攻海丰，蒋介石率教导团为左翼，由梅陇进攻海丰。24 日，左右两路分别出发。这时，洪兆麟残部已成惊弓之鸟，闻风遁走。当东征军逼近海丰时，海陆丰农民群起响应，勇猛截击敌残兵，缴获枪支弹药，有力地配合了东征的行动。东征军所到之处，广大群众壶浆箪食，热烈欢迎。2 月 27 日，右路军在海陆丰农民的支持下，攻下海丰。3 月 1 日，海丰各界群众代表 1 000 多人，在县城林祖祠前举行联欢大会，谭平山、周恩来、彭湃等出席并发表了演说。3 月 3 日，海丰召开全县农民欢迎革命军大会，到会 3 万多人，农会旗帜蔽野，群众欢声雷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前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都先后发表了演说。大会宣布恢复县农会，澎湃任委员长，为答谢各界群众对东征讨逆的大力支援，东征军宣布：将没收全县的逆产，半数归农民协会，3/10 归工会，2/10 归学生会，并主张取消苛捐杂税。

右路军攻占海丰后，决定分兵三路收复潮汕。右翼由粤军第七独立旅和校军教导团担任，由海丰、棉湖、普宁一线前进；中路由粤军第二师主力部队担任，由海丰、陆丰、揭阳一线前进；左翼由粤军第二师一部担任，由海丰海路直攻潮安。3 月 6 日，占领普宁、揭阳。7 日，进占潮州、汕头。至此，右路军控制了整个潮汕地区。

由于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同陈炯明、林虎早有密约，东征联军之左路军和中路军始终按兵不动，致使林虎得以从容集中其主力2万多人，从兴宁、梅县等地南下，企图从兴宁、五华一线抄袭东征联军右路军后路，阴谋一举将右路军歼灭于揭阳、潮汕之间。林虎所部是陈炯明的主力，以强悍著称，这次反扑，气势汹汹。3月12日，林军刘志陆、黄任寰、王定华等部由五华、河婆出发，分为鲤湖、棉湖两路进击右路军。13日拂晓，双方在棉湖遭遇，于是展开了一场激战。右路军参战的，除了粤军许济旅、黄埔教导团外，还有陈铭枢旅、吴铁成旅（警卫军）从侧后配合，张民达师留守潮汕。棉湖之战，是第一次东征期间的最大的战斗，是决定胜负的一次战役。

林虎部主力在棉湖溃败后，退回到五华、兴宁。五华、兴宁一带为林虎之巢穴，陈炯明的根据地。林虎总部就设在兴宁。林虎率部退回后，企图固守顽抗。东征右路军取得棉湖战役胜利后，即转入追击战。这时，苏联顾问建议采取奇袭战术，以教导第一团取捷径奇袭五华。3月18日，深夜发起袭击，击败五华城守军王德庆师，次日占领五华。19日，教导二团及陈铭枢旅经五华冒雨进攻兴宁，首先击败城外守敌，然后发起攻城。教导一团亦从五华赶到，协同作战。经过激烈战斗，重创敌军，林虎率残部向东逃窜。20日晚，占领兴宁。右路军乘胜向梅县追击。23日，梅县林军弃城而逃，粤军张民达师遂占领梅县。陈炯明残部先后退出东江地区，向闽赣边境逃窜，困守惠州的陈军杨坤如部，经廖仲恺派员劝降，杨坤如于4月4日投诚，随后，滇军胡思舜部进驻惠州，并将杨坤如部改编为滇军第八、九两师。至此，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在东征联军中，以滇军兵力较为雄厚，但杨希闵与陈炯明早有暗中勾结，在战役开始前，他就借口办事到香港去了。滇桂军都按兵不动，其他部队战斗力都较弱。在东征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和两个教导团，当时统称为校军，共约3 000人。这两个教导团都是新建制不久，由黄埔军校教职员和第一期毕业生充任各级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教员为骨干，仿效苏联红军编制并实行党代表制度。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经过严格的训练，有很强的战斗力。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苏联顾问为别夏斯特诺夫、尼库林；教导第二团团长王伯龄（后由沈应时继任、钱大钧代理），党代表张静愚（顾祝同代理），前苏联顾问为帕洛、瓦西列耶夫。同时还有：军校第二期学生步兵总队（总队长胡树森）、第二期学生



炮兵营（营长蔡忠笏，陈诚代理）、第二期学生工兵队（队长李卓元）、第二期学生辎重队（队长黄在玑）、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营长陈继承）。此外，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及第一旅（旅长许济），亦纳入校军编组。校军由蒋介石以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的名义统率，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苏联顾问为斯捷潘诺夫、什涅伊杰尔。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此时，由陈延年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以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在东征战斗中，以勇于冲锋陷阵、奋不顾身而著称，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当时，社会舆论认为，在联军的进攻中，“初出茅庐之黄埔学生教导团，尤为出类拔萃，每战必取”。“这次战事，滇军可说没有参加，许（崇智）军虽然出力，然并不是决胜的要素；真正的生力军还是学生军，洪兆麟的军队看见学生军的旗帜便逃走，然而没有东江农民的起事，也不会这样大胜，陈军之所以大溃而特溃，便因农民纷起扰乱他的后方”。

由共产党员澎湃领导的东江地区农民运动，也给了东征军以极大的支持。在东征军出发之前，彭湃就派共产党员林务农等回到东江地区，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准备从内部配合东征军。海陆丰农民有着革命斗争的传统，得知东征的消息后，立即将过去埋藏在地下的土枪、土炮等武器挖出来加以修理，做好战斗的准备，并收集陈炯明在海陆丰等地的军事力量分布情况。当东征军进入东江地区后，广大农民踊跃担任运输、向导、侦探，以至帮助挖筑战壕，袭击小股敌军，直接参战。这时，周恩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指导发展东江地区国民党组织；与此同时，周恩来派杨汉魂等以特派员身份，到各地发展工农运动，建立中共组织。原来潮州、汕头、海丰、陆丰等地几乎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这时也都在东征中先后建立起来。党组织的作用和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援，保证了东征军事的顺利进行。

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东征军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英勇奋斗，打败了陈炯明的主力 20 000 多人，基本控制了东江地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壮大了革命军的力量，使广东革命政权转危为安；第二，随着东征军的胜利进军，革命思想影响到东江各个地区，极大地鼓舞了东江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第三，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随着东征的胜利，一批共产党、共青团和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建立起来。在东征胜利的推动下，广东的革命浪潮不断高涨。

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当东江战事甫告结束，陈炯明势力已基本肃清之际，在广州发生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事件。

杨希闵、刘震寰原为滇（云南）、桂（广西）地方军阀。由于处境不利，力图向外扩展。1922 年 6 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驱赶孙中山，进而自称“粤军总司令”，盘踞广东。这时，粤军军官中具有革命思想的邓演达、李济深、张发奎等，不满陈炯明的所作所为，暗中联络孙中山，接受指示。其时，孙中山继续从事组织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运动，他计划一方面组织许崇智率领的入闽北伐军为东路讨贼军，另一方面准备联络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部为西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夺回广东根据地。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经邓演达等的努力，1922 年 12 月 25 日，粤、滇、桂三方在广西大黄江白马地方举行军事会议。作出合作驱陈的决定。滇桂军阀这时正谋向外发展，扩充实力，因而附和了孙中山的讨逆计划。原来，孙中山应允滇桂部队到达三水后，即转道北江出韶关，广州由粤军进驻。但是，1923 年 1 月 15 日，陈炯明被迫宣布下野，退出广州后，滇桂部队即乘机进入广州，并抢占了市内繁华地区。在国民党“一大”上，杨希闵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刘震寰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他们占驻广州以后和陈炯明占驻广州时一样，赌场、鸦片烟馆、娼寮星罗棋布，军人横行，盗匪充斥，杀人越货时有所闻”，“滇桂军盘踞广州两三年，搜刮民财，无恶不作，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是腰缠万贯，姬妾成群。”他们自恃驱陈有功，依仗权势，日渐骄横，把持财政，发展个人势力。由于滇桂军阀横行，不但使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号令在广州难以通行，而且他们霸占税收机关，使革命政府财政极度困难。何香凝曾回忆说，当时为拨付黄埔军校经费，身为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款到黄埔军校。”他们对于革命事业既不关心，也不服从孙中山的调遣。孙中山对滇桂军阀的所作所为，极为愤慨。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当着



杨希闵、刘震寰的面，沉痛地说："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的。当时我在上海没有一点实力，原本不想回到广州，只是想用心著书，把我的政见，向广东父老兄弟宣传。后来你们都派人来到上海，要求我即时回到广州，自誓要实心拥护我，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因此我才决意回来。谁知你们都是带着我的帽子来糟蹋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是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糟蹋，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当时杨希闵、刘震寰表示愿意服从领导，于是孙中山提出了财政统一的办法，这个议案虽经会议一致通过，但在实际上仍然是无法执行。孙中山还多次主张严肃纲纪，但也由于当时革命政府实力有限，难以实现。孙中山后来只得命令滇桂军大部开赴东江，担任对陈炯明叛军的警戒任务，以减少对广州的祸害。

十月商团叛乱，他们就竭力主张妥协。到 1925 年东征陈炯明时，更是阳奉阴违。自东征出师后，杨希闵名义上是联军总司令，实际上从不到职视事，而且担负东征左路和中路的滇桂部队，始终按兵不动。后来，当右路军攻破林虎巢穴兴宁时，蒋先云等从林虎总部搜获得文电中，发现了杨希闵、刘震寰通敌谋叛的阴谋。后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的军事报告中，指出："杨希闵总滇军、刘震寰总桂军，借革命之名，行军阀之实，养寇自重，既不戮力于东江，复北联段贼，南联滇唐，谋叛之心，蓄积已久。到我军克复兴宁，搜得林逆与他们密电底本，反革命的阴谋越发暴露了。"

孙中山逝世后，云南军阀唐继尧图谋乘机进据广东，于 3 月 18 日在云南宣布就任副元帅职。唐继尧并派代表经香港刘震寰司令部，与杨、刘秘密勾结。刘震寰则频繁往返于香港和广西，与唐继尧及其代表谈判，密谋共同推翻广州政府。刘震寰部并发表宣言，指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讨唐。1925 年 4 月，杨、刘眼见东江即为革命军占领，革命势力日渐壮大，便将出征部队陆续调回广州。4 月 28 日，杨希闵密令东征前线的曾万钟师及 4 个独立旅撤回广州。在广州，杨希闵的总司令部设在市区中心的八旗会馆，市内驻有六个主力团，装备比较齐全，控制了市内为防御陈炯明而设防的地区，铁路及通讯设备也为其掌握。同日，刘震寰统率的 13 000 多人也从东江撤回广州。刘震寰部占领东关，廖行超部占领西关，杨希闵部分布在市中心永汉路和广州东路等交通要地。他们总共拥有 30 000 多人，杨希闵

自封为滇桂联军总司令。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们企图乘革命军主力远征东江未归之际，发动叛乱。

5月6日，杨希闵乘夜轮潜赴香港，在香港皇后酒店六十号，与段祺瑞代表密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随后，刘震寰亦秘密赴云南与唐继尧面商一切。5月中旬，各派反动头目在香港皇后酒店六十号举行会议，杨希闵、刘震寰、马素、陈廉伯等均出席，唐继尧、段祺瑞、林虎、陈炯明、邓本殷和港英政府均派代表参加。议决马素担任外交，与港英政府接洽一切，并决定军火由港英政府负责接济。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密谋推翻广东革命政权。

对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行动，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等却还主张用妥协的方法来挽救危局。5月中旬，胡汉民派邹鲁赴香港请杨、刘回省，共同商量改组大本营，采用委员制，杨、刘担任委员，企图以容纳杨刘反动势力的办法阻止叛乱。但是这种办法不仅不能阻止杨、刘叛乱，反而使他们认为革命政府软弱，野心更加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以及谭延闿、程潜、朱培德等人，主张对杨、刘实行武力讨伐。汪精卫等经说服后，也同意讨伐杨、刘。5月13日，廖仲恺等赴汕头与东征军会商讨伐杨、刘作战计划。当晚在粤军总部举行会议，与会者有廖仲恺、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朱培德、谭延闿及前苏联顾问加伦。会议一致决定讨伐杨、刘，并研究讨论了由加伦提出的讨伐杨刘的计划，推举蒋介石为讨逆军总指挥，克日率粤军、党军回师平叛。

广东革命政府讨伐杨、刘的作战部署是：以谭延凯、程潜等指挥的部队为北路军，沿广韶铁路从北面进攻广州，朱培德部予以协助；李福林所部为南路军，守卫广州的南面各岛，并准备配合西路军，及进击广州；东江联军为东路军，作为进攻敌人的主力部队，从东面回击广州。在4月初，经廖仲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成立党军，原教导一、二团合编为党军第一旅，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兼任旅长，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廖仲恺为党代表。这时，东路军包括党军第一旅、粤军第四师许济部（原第七独立旅扩充）、粤军第一旅陈铭枢部以及警卫军吴铁城旅。东征军的其余部队由许崇智统率留守原地。5月21日，蒋介石率黄埔军何应钦部由潮梅地区出发，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还大力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平叛斗争。5月中旬，广州兵工厂工人为反对滇军派夏声为该厂委员长，举行罢



工，迫使夏声去职。广九、广三、粤汉三铁路工人响应革命政府和总工会的号召，从6月2日期，一致罢工，拒绝运送滇桂军队和武器弹药，使省城东西北三江之交通，完全断绝，3 000多只民船和机动船船工也宣布罢工，使滇桂军阀调遣失灵，一筹莫展。工人罢工对评定杨、刘叛乱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当时也承认，“杨刘谋叛，东征军回师靖难，广九等三条铁路工人，同时对杨刘宣告罢工，无论杨刘用什么威胁利诱的办法，工人均不为所动。海员又在各河道及海口截留杨刘的军官及其援兵。其他工人也给革命军很多帮助，竟使杨刘坐困一隅。他虽有十万兵卒，不能自由调度，以致败逃”。各地农民在省农民协会的号召下，踊跃参战。“海陆丰一带的农友，西江、广宁、佛山一带的农友，统一在省农民协会的指挥底下，一致行动起来。或武装来省预备参战，或出农军截断滇桂军逃窜之后路，或收缴广三路线滇军枪械，或为党军侦探、运输、向导，皆不惜牺牲生命，站在革命的联合战线上，一鼓而荡平刘杨。”广东农民热诚拥护革命政府，不少农会会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周恩来曾指出：“扫除杨刘之役，从东江而来的军队与农民联成一气，三条铁路的工人，同时罢工起来，与革命军人好似兄弟互助一样。”他认为打平东江和打倒杨刘，都“不是军队的能力”，而“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周恩来进而指出：工农和革命军人“所受是同一种苦”，所以“他们就有联合的需要与可能，他们形式上所受的痛苦不同，而他们永远是联合为同一的阶级”。他强调实行“工农兵大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周恩来对实际经验的总结，它蕴含着革命武力必须与民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

5月中旬以来，滇桂军阀已调集大军驻扎广州及其附近，并大量散布广州被“赤化”、“共产”的谣言，蛊惑人心，形势骤然紧张。5月19日，广东革命政府迁到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办公，一部分机关转移到黄埔岛，并实行特别戒严。23日，广州大本营发出通令，称现时谣言繁兴，人心未定，河南为政府暂时驻地，不论何项军队，非奉本帅府命令者，概不准渡河。从这时起，广州市内实际已被滇桂军阀完全控制。

当杨刘叛乱阴谋日益暴露的时候，在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下，共产党人领导的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大沙头的桥头堆放了沙包，加强了警戒，随时准备迎击杨刘叛乱阴谋。当形势危急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及时地掩护各机关和苏联顾问团向河南撤退，随后又转移到河南

士敏土厂一带，担任保卫政府各机关的任务。

这时，杨希闵、刘震寰等滇桂军将领，一面发表通电，诡称“竭诚拥护吾党政府”，一面调集大军，进行武装叛变的军事部署。6月2日，滇军第三军军长胡思舜由佛山调滇军千余人进驻广州，向河南方向架设大炮，对准革命政府的驻地。而蒋介石率领的党军先头部队千余人，于5月下旬抵省时，就为滇军所拒，不能进驻市内，只得驻扎在东校场一带。北路方面，谭延闿的湘军和程潜的攻鄂军一部共两千多人，由韶关返省至新街附近时，也为桂军所阻，被迫折回，滇军胡思舜并调所部赴东江防阻东征军返省。

6月4日，胡汉民以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的名义，发表辟共产谣宣言，称“依附本国军阀之走狗，奔走帝国主义之汉奸，妄肆谣言，造作蜚语，不曰本政府已经赤化，即曰共产即实行，浸且勾托外报，四出宣传，阴设机关，淆乱观听，揣其作用，无非欲破坏政府。遂其绳苟捣乱之私，阻挠革命，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宣言声明：“本政府为造产之政府，而非共产之政府”。并针对所谓“政府亲俄即为赤化”的谣言，说：“吾党主义首在完成国家之独立，举凡不以侵略为目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皆在可亲，此不独对俄为然，即英美法日以及其他友邦果以平等待我国民，无一而非挚友，若谓以平等待我者当远之若仇，而压迫我者奉之如神明，此则甘心卖国者所优为，而非革命政府所当闻命。”同时，广州革命政府向杨希闵提出三项要求：一、服从政府；二、所占防地一律交出，由政府指定驻军；三、交出财政所占各机关。当晚，滇桂军将领举行联席会议，表示拒绝接受政府要求。

6月5日，广州革命政府下令免去杨希闵的建国滇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建国桂军总司令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任命朱培德为建国滇军总司令。这时，叛军遂公开向政府采取敌对行为，派兵占领广东省长公署、粤军总司令部、财政厅、市公安局及电报局、电话局等广州市各机关。杨希闵仍自称滇桂联军总司令，6日发布告声称：“此次不服从政府命令，是反对共产，为防止共产党作乱及广东赤化起见，不得不反对此命令。”这是杨、刘等在反对“共产”的烟幕下，公开武装叛变的宣言。这时，滇桂军除驻守东江、新街等地外，已将主力集中于广州及其附近，并以重兵在龙眼洞、瘦狗岭及广九路一线设防，企图固守广州，等待东江方面陈炯明残部反攻后，再采取攻势作战以夺取广东全省。

6月6日，河南政府军开始炮击东堤滇军总部及河西口一带之滇桂部



队，滇桂军在堤上开枪反击。平定叛乱战事正式开始。翌日深夜及7日凌晨，滇军先后从猎德乡和西壕口渡河袭击河南，均被政府军击退。

6月7日，胡汉民以代行大元帅之职的名义发表政府严重处分叛军通电，揭露杨希闵、刘震寰通敌，勾结唐继尧、段祺瑞密谋推翻革命政府，发动叛乱罪状。国民党中央总部也发表告滇桂军士兵书，号召滇桂军士兵反对叛乱的长官，服从革命政府的领导。各军将领谭延凯、程潜、许崇智、朱培德等也纷纷联衔通电声讨杨、刘叛乱。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滇桂军中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分化瓦解敌军。由周恩来领导的、以黄埔军校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就十分注意在滇桂军中的工作。对杨刘叛乱的阴谋，联合会的一些领导人早有觉察，自5月7日起，即在滇桂军中进行宣传，发行《兵友必读》等通俗小册子，感化下层士兵。滇桂军中的一些青年官兵，特别是滇桂军事学校学员，大多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6月5日，当形势最为紧迫的这一天，联合会当即下令所有滇桂军军事学校的学员，全部一律脱离滇桂军。6月6日上午，滇军干部学校（廖仲恺兼任党代表，包惠僧任政治部主任）宣布脱离者20余人，桂军军官学校宣布脱离者60余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政治宣传工作，对于降低敌人士气，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同时，由于滇桂军将领内部之间相互争权夺利，各欲扩张势力，怨气不断，矛盾重重，而且杨刘叛变革命，不得人心，这些都加速了滇桂军分化瓦解。战事开始后不久，桂军第五师师长林树巍即宣布脱离刘震寰，改编为建国桂军第一师；随后，滇军第四师师长朱世贵率部也脱离杨希闵，改编为建国滇军第二师。

6月8日，东江联军担任东路由潮梅方面回师后，前锋抵达石龙，进入预定攻击地区，时敌企图收缩兵力，将部队退往石滩。9日，党军第一旅向石滩发起进攻，双方激战数小时后，叛军即向增城撤退。于是，东江联军主力直捣龙眼洞、瘦狗岭附近。其时，西江方面，李济深之粤军一部沿广三路南下，准备会攻广州；北江方面，谭延闿之湘军和朱培德之建国军，正沿粤汉铁路及其以西地区南下；河南的李福林军和黄埔军校学生总队（学校第三期入伍生，由张治中率领），准备强渡珠江，分向瘦狗岭等高地及河北失去进攻，

6月11日，革命部队向广州发起总攻。拂晓，河南李福林军及黄埔军校学生总队，由渡河攻城总指挥魏邦平统率，用炮舰掩护火轮拖带的民船，强行渡河。在石碑登岸后，与东江联军齐攻沙河，滇军节节败退，联军遂占

领沙河。而后，联军即分三路进攻瘦狗岭。

当平叛战事开始时，中共两广区委即指示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配合主力军作战，强调此次征讨杨刘关系着革命前途，要坚决执行命令，勇敢作战，完成战斗任务，并决定铁甲车队与飞机掩护队统归徐成章、廖乾五指挥。这两支部队在徐成章和廖乾五的统领下，从猎德附近渡河，迅速插入敌人纵深，向石碑、瘦狗岭方面的敌人背后发起攻击，切断了石碑、瘦狗岭、龙眼洞的敌人与广州方面之间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东路军作战。

这时，滇军大部已被压缩在广九路车站、瘦狗岭及白云山一带。12 日，总指挥部下令向退至白云山、观音山、瘦狗岭一带的滇军发起总攻。经过三小时激战，东江联军占领了滇军重要阵地瘦狗岭。同时，黄埔学生总队亦占领了广九车站，并用炮火击毙了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最后，在白云山与观音山一带，联军与滇军鏖战，至中午时分，滇军纷纷向市内溃退。“由于滇桂两部逆军，平时纪律很坏，盘踞市区两年，胡作非为，恣意掠取，居民早已恨之入骨。闻其败也，市民奋起，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将其击毙，为数颇多。”当滇桂军向市内溃退时，黄埔军校政治部即组织一支精干的全副武装的宣传队，其成员大多都是共产党员，由李之龙任队长，率先进入市区。宣传队在市区主要进行布告安民、救济难民，防止散兵游勇害民，维持市面秩序，并配合部队收容俘虏。粤军、党军等部进入市区后，迅速消灭滇军残部，于当日下午 2 时许收复全城。北江方面，刘震寰的桂军连日来也节节失利，最后亦于是日被西江、北江联军击败。杨希闵、刘震寰等部分滇桂将领，逃匿沙面租界，在帝国主义保护下随即逃往香港。15 日，杨、刘残余全部被消灭。不久，国民党中央公告开除杨、刘党籍。

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东征军及其他各路联军配合作战，终于平定了杨刘叛乱，歼敌 2 万余人。至此，盘踞广州两年之久的滇桂军阀迅速瓦解，使广州局势转危为安，为广东革命政府清除了一大隐患，也为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军的组成创造了条件。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后，广东革命政权趋向稳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以黄埔学生军为基础的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广东工农群众的势力也迅速增长起来，特别是数万省港罢工工人集聚广州，成为革命政权的有力支柱。这一切表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和财政的条件已日臻成熟。

1925 年 6 月 14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其发布的第十一号训令中，提出了整顿军队，统一财政、民政等问题。训令称：杨刘叛乱已经迅速荡平，“本党日前整顿军队议决案，认为当及此实行，所有各军应将向来所分割之财政机关、民政机关、交通机关等一切交回政府，以资统筹整理。”随即，广州大本营在河南士敏土厂召集各军将领会议，讨论执行十一号训令，统一军民两政等问题。汪精卫、廖仲恺、谭延闿、程潜、蒋介石、朱培德等在发言中都表示，赞成凡民财两政落入军队手者，一律交还政府。会议决定：一、将民政、财政、交通等机关交还政府；二、改建国军为国民革命军，一律废除原有的湘、粤、滇、豫、福等地方军的名称。同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接受鲍罗廷的建议，决定改组大元帅府，成立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并且议决政府组织法大纲六项，即：一、设置国民政府，掌理全国之政务；二、设置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务；三、设置监察院，监察政府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款项之收支状况；四、设置惩吏院，惩治官吏之贪污不法及不服从政府命令者；五、设置省政府，掌管全省政务；六、设置市政委员会，管理全市政务。6 月 24 日，胡汉民发表施行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通电，宣布本年 7 月 1 日成立国民政府。

1925 年 7 月 1 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徐谦、许崇智、伍朝枢、于右任、张静江、张继、程潜、朱培德、林森、戴季陶、孙科、古应芬等 16 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等 5 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被推举为主席。国民政府设

财政、外交、军事、司法、内政、教育等部。以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未到任前由林翔代理），李文范为国民政府秘书长，聘任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同时，国民政府还任命了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古应芬为民政厅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许崇智为军事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长，孙科为建设厅长，宋子文为商务厅长，陈公博为农工厅长。广东省公署随即进行了改组，废除省长制，推举许崇智为省政府主席。接着，广州市政厅也宣布成立，废除市长制，伍朝枢任委员长。按照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市政委员会成员，由现在职业团体、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自由职业团体等六种团体中各委任三人担任，并准备以后采用选举制产生。国民政府还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和省、市政府组织法，确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并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政府实行委员制，即对各种重大问题“采用合议制”，由委员会议执行，这样以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避免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7 月 1 日这一天，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广州各界约 10 万群众集会，高呼“拥护国民政府”、“实现孙先生遗嘱”、“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政府委员在会上作了宣誓，誓词是：“余等诚敬宣誓，恪守总理遗训，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尽忠本职，决不营私舞弊，授受贿赂，谨守誓言，决不违背。”汪精卫在代表政府委员的致辞中，讲到：“国民为中华民国之主人，有监督政府之权能，今日诸君赴会者，非为观礼，实为监督政府各委员。如国民政府有不忠厥职，违背民意者，应予以严重之惩罚”。国民政府的成立，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群众也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希望。省港罢工工人提出：“中国被压迫的人民需要一个真正与帝国主义奋斗到底，谋中国民族解放之国民政府。现在国民政府已经宣告成立了，我们很诚恳的希望国民政府能担负这个历史使命，更希望国民政府即在事实上表示给全中国的民众看：国民政府确系代表全中国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与英、美、日、法、葡各野蛮帝国主义者奋斗，立即宣布实行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沙面，在物质上帮助省港罢工工人。”

当天，国民政府还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告世界各国人民书。在成立宣言中，申明了广州国民政府的职责及对外、对内的政策。它的职责：宣布“国民政府之唯一职责，即在履行先大元帅之遗嘱”，致力于实现中国的独立、平等、自由；对外政策：当前国民革命之任务，即着手废除不平等条



约，号召国民一致督责北京政府，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仿照中俄协定之例，另与其他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之条约；对内则，召集国民会议，继续进行国民会议运动，宣称“自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手中，收已失之主权，而还之国民，以符主权在民之旨”，表示国民若能自动集会行使国民会议职权，国民政府则“必尽其力所能至，以为种种之保障”，从而实现“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的“国民革命的最大目的”，宣言相信国民革命目的必定能够实现；告诫“凡倚赖帝国主义以龁龁国民革命者，虽暂时得跳梁于一时，终必为国民革命之势力所摧锄以去。”

在告世界各国人民书中，列举不平等条约给中国造成的深重危害，指出近代中国社会混乱的原因，“是由中国不平等的国际地位所致，不平等条约存在一天，中国决不能使国内澄清”。表示中国人民决心废除包括治外法权和经济特权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要求收回我们自己房屋的钥匙”，在与其他各国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国际间关系。呼吁各国人民主持正义，“决不让你们的政府在中国的万恶的政策继续一天”，“赞助我们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恶魔之行动”。

国民政府成立后，7 月 6 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谭延闿、朱培德、许崇智、蒋介石等 8 人为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军事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它“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委员会下设政治训练部、参谋团、海军局、航空局、军需局、秘书厅、兵工厂等机构。委员会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议决事项须经出席委员 2/3 通过方为有效，如多数委员不在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时，主席与委员一人有决定处置之权。”军事委员会告诸将士文中，指出：“吾同志军人须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一致团结，反对帝国主义，而同时须击破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唯吾同志之军人若欲担当此大任，则不可不深念先大元帅去岁北上宣言所谓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人民之武力，盖革命之意义不外为人民求幸福，故能为人民求幸福者，谓之革命，反之则为反革命。凡我将士必能与人民结合之旨，身体而力行之，然后能立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而无愧也。”

军事委员会成立后，8 月 4 日，许崇智、谭延闿、程潜、朱培德等联衔发出通电，都表示遵照统一军政计划，即日解除粤、湘、滇及攻鄂军总司令职务，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8 月 26 日，军事委员会

为统一军政，消除军令不统一的状态，议决改编国民革命军，取消原有地方军的名称。先后将黄埔军校学生军和驻地在广东的粤、湘、滇等各系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将第一军党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第二次东征后，攻鄂军改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到年底，共有8.5万人，6万支枪，加上各军校学生6 000人，成为一支相当有规模的军队。国民革命军还采取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在各军中先后建立了各级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证这支军队能为打倒封建军阀而战。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担任。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分别担任一、二、三、四、六等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在军中所做的政治工作卓有成效，使得这支军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是它的军事指挥权仍然掌握在旧军人手里，并且有些部队还带有浓厚的旧式雇佣军队的封建色彩，国民革命军的这种状况，使革命的发展蕴藏着危机。

军事委员会的设立和国民革命军的改组，基本上实现了广东的军政统一，改变了过去各军自成体系、形成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着手实现民政和财政的统一。

虽然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了大元帅府，但由于军阀势力仍然存在，地方官吏各自为政，民政极不统一，使得元帅府命令不能跨出广州一步。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整顿民政，统一政令，提高政府效能。7月22日，成立了惩吏院，以徐谦、邓泽如、林翔、邹鲁、林云陔为委员；8月1日，成立了监察院，以林祖涵、黄昌谷、陈秋霖、甘乃光为监察委员。惩吏院和监察院的设立，对于清除积弊，整顿吏治，起了很大作用。为发展教育事业，政府宣布教育经费独立，并设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广东省政府建立后，在其宣言中提出了省政方针："一、靖匪保民；二、废除一切苛旧杂税；三、禁绝烟赌；四、整顿吏治，实行国民党考试、监察之制；五、扶植地方自治；六、整理交通；七、发展工业；八、保护农工；九、实现教育经费独立。"为整顿吏治，广东省政府省务会议还通过了《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县长甄别试规程》等条例，决定对县长等实行考试制度。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和南征军事的顺利发展，广东全境基本实现统一。

11月间，国民政府将广东94县划为广州、东江、西江、北江、南路、



海南等6个行政区，每区各设行政委员一人。周恩来、甘乃光、宋子文、古应芬等被派任东江、南路、广州、西江等区行政委员，为该区最高行政长官。由各区行政委员组成广东省行政委员会，代替现有之民政厅，在省政府的指导下，主持全省民政。县一级的行政制度，除设县长外，加派党代表一人，财政厅代表一人，三人合组成县行政委员会，负责对全县的治理。这样，广东的民政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广西方面，李宗仁、黄绍竑的桂军由于得到粤军的帮助，将沈鸿英部予以歼灭，并把侵占百色、南宁等地的唐继尧军驱逐出境，统一了广西全省。8月6日，国民政府下令裁撤广西省长、广西总司令职位，并决定在筹备改组之前，所有广西全省军政、民政、财政由李宗仁、黄绍竑暂以广西全省绥靖处名义负责。9月5日，广西省政府改组，李宗仁任省军务督办，黄绍竑任省军务会办兼民政长。翌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省务会议主席，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下设秘书处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四厅。广东、广西两省遂告统一。

在统一民政的同时，国民政府还进行了财政治理。主要举措有：统一国家财政收支，规定各地财政收支集中于政府财政部，政府专门设立监督委员会，强制各地执行；建立国家预算制度，在不减少军费支出的前提下，增加建设费用支出，并争取国家财政收支保持平衡；统一税项，改变税项名目混杂、多种机关征收的状态，废除一切扰伤害民的苛捐杂税，谋财政关税的自主权；改善信贷及专制制度，增设专卖机关，增加政府收入；建设国家银行，统一币制，发行公债。在统一财政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努力发展实业，开展市政建设和修筑公路等等。为开发实业，提出发展实业的计划，专门成立了实业投资委员会，以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宋子文、陈公博等为委员。经过治理，虽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全部实现，但明显改善了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据1926年初，国民政府的财政报告称："民国十二年（1923年）全省之收入为1 000万，其每月之平均收入为858 000元，民国十三年（1924年）全省之收入为7 986 000元，其每月之平均收入为66 5000元，十四年（1925年）起始之各月政府每月之收入约为150万元，然10月之收入已达至3 616 529元，而11月收入则为3 832 838元，10月及11月政府之收入较诸往年政府之收入已增加六倍有奇。至十四年（1925年）国库收入之比较，则十四年8月之收入较诸7月其增加率为70%，10月增加率为90%。……此国库收入之数目足以证明统一广东财政的成功，此种成功足为将来改

善国家之财政树立良好之基础。”

广东国民政府较之原来的大元帅府，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它基本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采用了委员制。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广东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对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促进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这时广东的统一还是初步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反动的政治势力及其经济基础，特别是这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处于幼年时期，不懂得共产党人和工农分子参加政府的重要性。因而，国民政府的成员不但都是原来的国民党人，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军阀官僚和国民党右派掺杂其间。这些对于以后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



国民党内的右派进攻，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随着国民革命的迅猛发展，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激烈起来。早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国民党正式改组之前，邓泽如、林直勉等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就曾进行反共分裂活动，反对国共两党的正式合作。1923 年 11 月，邓泽如等 11 人秘密上书孙中山，污蔑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隐阴谋”，“谋毁吾党”。当时，由于孙中山采取了明确严正的立场，坚决批驳了邓泽如等人的谬论，才使国民党改组的工作没有停顿下来而得以继续完成。

1924 年 1 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国民党在改组后虽然成为各革命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但其内部的组织成分依然十分复杂。由于历史原因，原国民党中一部分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仍然留在党内。因此，从阶级成分上看，它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他们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对于国民党的革命化，对于国民革命，特别是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态度也就不同，从而形成了左、中、右三派的分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三民主义者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势力，他们代表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珍惜国民党的进步，真诚地维护和发展已经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笃信新三民主义，拥护三大政策，坚定地实行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纲领，是革命的中坚力量。

中派代表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革命中表现出极大的动摇性，处于急剧的分化中。

右派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右派之中又包括老右派与新右派。老右派有冯自由、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他们多为国民党的元老。他们反对国民党的改组，特别是由于孙中山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触动了他们的阶级利益，阻碍了他们企图凭借国民党获得高官厚禄的政治野心的实现，也打破了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的幻想。因此，他们就寻找机会破坏国共合作，分裂革命统一战线。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国民党中出现了一批新右派，这就是资产阶级代表戴季陶以及曾经一度是中派的蒋介石等人。他们恐惧工农的革命斗争，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感到非常忌恨，极力想夺取革命的领导权。新、老右派在分裂国民党，反共、反革命的策略上有所不同，公开反动有先有后：老右派邓泽如等在国民党内每每制造事端，张继、谢持等公开从国民党中分列出去，另立叛旗；新右派戴季陶等留在国民党内抛出反动理论，力夺“正统”，蒋介石则以阴谋手段步步篡权。但是，新、老右派的心是相通的，为了一个反动的政治目标，制造一起又一起打击共产党、分列国民党的事件。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日益感受到了革命的威胁，于是又加紧其反共分裂活动。这种活动到 1924 年夏天，以所谓“弹劾共产党案”的形式公开爆发出来。

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邓泽如、张继、谢持等，第一个利用组织手段攻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1924 年 6 月 18 日，他们上书孙中山，指控共产党，同时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中，宣称：“现查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团刊》第七号及其他印刷事实，经本委员会审查，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章，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不敢忽视，特列举事实，加具意见，提出贵会，希即从速严重处分。”邓泽如等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弹劾的依据，即所谓“查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团刊》第七号及其他印刷事实”。为了要说明“弹劾”的依据和理由，邓泽如等摘引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登的两个决议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的部分内容。



"弹劾共产党案"的提出，反映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实现后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围绕着"弹劾案"，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4年6月25日，张继、谢持在提出"弹劾案"之后，同当时作为国民党训练员的鲍罗廷在其寓所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就"弹劾案"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争辩。

在谈话中，谢持、张继质问鲍罗廷是否见过上述决议案等印刷物？"是否承认党中有党"？他们污蔑共产党对国民党进步所起的促进作用是"致死之道"。声称，要解决国民党"组织问题"，即所谓"党中有党"问题，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这种"党团作用万不能容许"，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性质不相容，不如分道扬镳"，"分作两起"，这样"更佳"，露骨地以分裂相威胁，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统一战线。对于谢、张的无理责问，鲍罗廷义正言辞地作了旗帜鲜明的批驳。他简述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原委、经过，坚持两党继续合作的原则立场，他说："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中国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假令将共产党分出去，……徒分离革命实力也，前途必不利"。因此，两党应该继续合作下去，但"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已的组织"。"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夹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这次谈话由孙科翻译，谈话记录，当即公布。

鉴于"弹劾共产党案"的发生及其他右派的反共活动，1924年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讨论了邓泽如等人纠举共产党的提案报告书。会议当即决定了三条办法：一、发表一个表示态度的宣言，以求统一认识；二、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作认真的讨论；三、呈请总理孙中山作决定。同时会议针对当时国民党内外对此问题的混乱认识，明确指出，要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政纲宣言为准，"凡入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信仰三民主义之诚意者，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其违背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奋斗"。会议推定汪精卫、邵元冲起草宣言。

7月7日，发表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的由汪、邵两人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重申了国民党容纳共产党这一原则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宣言》郑重声明，“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为了扩大革命之基础，联合大多数人民，为了改善国民党的组织，“俾革命事业，得以早成”，“故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宣言》还针对“弹劾共产党案”等反共事件指出，“惟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反对派得肆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而发生隔阂”。对于这种情状，必须予以矫正及补救，解除党内外误会与隔阂。

共产党人对邓泽如等制造的反共事件也表明了态度，恽代英在他撰写的《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中，郑重指出，现在有些人责难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占据了国民党的重要地位，这是排斥共产党的论调。文中陈述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以及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光明磊落的立场，之后说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仍旧保持他们的独立活动，这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为国民党计，倘若是真心要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呢，在今天没有惧怕或者嫉忌共产党人的理由”，只有“根本并不要革命的那一部分国民党员，他们的思想方式完全是两样的”。

8 月 15 日 ~9 月 10 日，国民党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届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邹鲁、谭振、谭平山、于树德、丁惟汾、李烈钧、博文蔚、恩克巴图、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等人。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张继首先就提出“弹劾案”的旨趣发言，他对于右派的分裂破坏行为避而不谈，而认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保持自己的纪律，是在国民党内发挥一种秘密党团的作用，国民党内的种种纠纷即由此而来，因而应由共产党负责。他认为“名义上跨党，徒滋纷扰”，为免除这种纷扰，提出“最后办法”，“以分立而要”，公开亮出了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旗号。

张继的发言得到了覃振等少数右派的附和，但遭到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瞿秋白，其时兼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代表共产党人作了答辩。针对“弹劾案”提出的所谓“党团作用的嫌疑”这一核心问题，瞿秋白尖锐地指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



"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次会议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瞿秋白的答辩，义正言辞，一针见血，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当时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等也都认为"弹劾案"难以成立。胡汉民在会上发言说："这次党内纠纷的主要原因，即在发现团刊之后，情感愈形险恶，但细查团刊内容，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为了解决对此问题的争议，会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以加强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协调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

会上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的《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及《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这两个文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的材料，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原因及理由，作了具体说明。《训令》指出，在帝国主义列强与军阀双重压迫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摆脱这双重压迫，非依靠全国各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运动不可，国民党容纳共产党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是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双方的基本理论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完成伟大的国民革命事业，因此那种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有变更者"，是"匡谬极戾，无待于辩"；那种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是杞人忧天。《训令》还指出，国民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特别注意占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因此，"与本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训令》在最后郑重宣告："自经此次决议之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凡我党员当知所负革命责任之重大，与同志间之感情固结，为团体生命所不可缺之条件，前此争议，付之澹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这样，由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一小撮右派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喧嚣一时，最后以他们的失败而结束了。

"弹劾案"提出的前后，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地的一小批右派也掀起了一阵反共鼓噪。他们向所在地的国民党党部，或上书，或请愿，并散发传单，要求开除跨党分子，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叶楚伧

等人的怂恿下，国民党右派分子周颂西、喻育之等纠集暴徒，挑起事端，制造反共摩擦，他们公然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黄仁殴打致死，把当时是共产党员的邵力子打伤，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由于共产党员和革命派的坚决反击，随着"弹劾共产党案"的流产，他们的反共鼓噪暂时平息下来。

在处理邓泽如等制造的"弹劾共产党案"的过程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坚持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联共政策，使这一事件最终得以平息，从而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但是，也应看到，国民党中央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组织上也没有作必要的制裁，反而在会上通过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主张，这对于共产党员的活动是个限制，也是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邓泽如等右派窥测时机，准备着制造更大的分裂活动。



廖仲恺被刺事件

国民党右派在革命的进程中不断地挑起“反共”争端，进行分裂统一战线的破坏活动。这种活动，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时表现为缓和，有时又趋向于紧张。1924 年夏，“弹劾共产党案”流产后，右派迫于形势，暂时收敛。但等到 1925 年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权利中枢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领导软弱，纪律松弛，失去了对党员的控制。而且当时南方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工农运动迅速恢复，广东境内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右派势力本能地日益感受到了革命的威胁；另一方面，又鉴于有机可乘，于是就加强了他们的破坏活动。

1925 年 8 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被刺杀，就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进一步反对三大革命政策，打击国民党左派，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乘机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严重事件。

廖仲恺（1877～1925），广东省惠阳县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为旅美华侨。他 1893 年回国，1899 年与何香凝结婚，1902 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及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1905 年加入同盟会，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和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他一贯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立场，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孙中山去世前，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重视，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拥戴，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和黄埔军校党代表；在政府工作中，他还先后担任财政部部长，军需总监，广东省省长，省财政厅长，中央银行董事和广东筹饷总办等要职。由于他的革命思想和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使他成为国民党中央的核心人物，影响遍及广东革命政府的各个部门。

孙中山去世后，他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恪守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积极支持工农运动，在东征陈炯明反动势力、平定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统一

广东全省政权、军权和财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廖仲恺在这些斗争中，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共同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他是共产党人的亲密朋友，和许多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其夫人何香凝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在广东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彭湃、苏兆征、杨匏安、周恩来、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林伯渠、吴玉章、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熊锐等，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谭平山当时也是中共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仲恺关系是很密切的。"

"反共"是国民党右派的职责。由于廖仲恺始终不渝地采取联共立场，因此他就成为右派的眼中钉，成为右派阴谋刺杀的对象。

在廖仲恺遇害前一个多星期，社会上有许多谣传，谋刺的消息已经传开。说某人对某人如何的不满，某派对某派如何如何的批评，某某人已被列名与杀害之列等等。当时，何香凝曾对廖仲恺说："既然有人阴谋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廖仲恺听了很不以为然，回答到："增加卫兵，只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想要谋杀我，很可以装扮着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处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在他遇害前两天，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廖仲恺曾接到坐在他身边的汪精卫写的条子，告诉他听到有人将对他不利，让他注意。廖仲恺当时耸耸肩笑着说："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显现了廖仲恺无私无畏、一心为革命的英雄气概。

1925 年 8 月 19 日晚，为了给黄埔军校筹集军费，廖仲恺忙到深夜。8 月 20 日上午 8 时，廖仲恺偕同何香凝自东山寓所驱车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惠州会馆旧址），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06 次会议。途中遇到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便邀他上车同行。当汽车开到中央党部大门前时，廖仲恺和陈秋霖先下车举步往前走，刚踏上门前的石台阶，突然从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的石柱后面跳出两个暴徒，举枪向他们射击，大门铁栅后边也有人射击，连响 20 余发。廖仲恺身中四枪，均是要害部位，仰面倒地，同行的陈秋霖也中一枪。何香凝见此情景，大呼救人，捉拿凶手，可是平时警卫森严的党部门前这时却不见一个警卫人员。随行卫士闻枪声赶来，



向暴徒还击，击中一人，其余暴徒夺门而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这时正蹲在党部大楼上，听见枪声，却没有下来。随即何香凝连同随身卫士把廖仲恺、陈秋霖架上汽车，送往东门外百子路公立医院治疗，廖仲恺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途中即与世长辞，终年48岁。陈秋霖在两日后也因不治身死。

廖仲恺的被刺杀，震动了广东，震动了革命阵营，引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悲痛。各界群众纷纷集合，要求缉拿凶手，严厉惩办，以各种形式表示对他的哀悼和怀念。黄埔军校学生和革命军人要求"为廖党代表报仇"。

中国共产党对廖仲恺的遇难，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关切。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指出国民党右派刺杀廖仲恺先生的目的，是要推翻国民政府，颠覆为民族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府，而不单单是要刺死廖一个人而已。"廖仲恺先生几十年来为国民革命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牺牲，"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彻底查明案情，对右派予以严厉的制裁。

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当日下午，就赶到医院探望，对廖仲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周恩来亲自撰写《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文表示悼念。在题为《勿忘党仇》的文章中，指出："廖先生一生为党为国，现在又在秉承孙先生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财政，以便进一步发展国民革命的时候不幸牺牲，可以说，廖先生是为承继孙先生的遗志而牺牲的。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的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件伟大事业的做成，大部分的功绩要属于廖先生，廖先生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分子。而且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当然会招致帝国主义之忌，尤其是招致香港政府之忌。廖先生一向为反革命分子所忌视，为帝国主义者所忌视，现在又终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为推动革命运动，为推动工农运动而被暗杀牺牲，我们一定要为廖先生报仇。"高度评价了廖仲恺的功绩，赞扬他是反帝斗争的"急先锋"。

在鲍罗廷的支持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中央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蒋介石和许崇智三人组成，"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同时，为查明暗杀廖仲恺事件的真相，国民政府指派朱培德、李福林、陈公博、吴铁成、陈树人、甘乃光、周恩来、杨匏安等九人

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并成立由杨匏安、李章达、谭桂萼等三人组成“廖案审判委员会”，负责对案犯的侦缉与审讯工作。

因为当凶手行刺时，其中一人被廖仲恺的卫士还击受伤，当场被逮捕。经过审讯，案情很快被查清。暗杀廖仲恺的是国民党右派反动集团。这名暴徒供认行刺系朱卓文等主使，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朱卓文所用的手枪、执照及其他多种证件。由此扩大案情线索，很快查明参与策划刺杀的右派人物主要有：邓泽如、林直勉、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梁鸿楷、梅光培等，其中胡毅生、朱卓文是直接的主持者。同谋犯和幕后策划者是邓泽如、林直勉、梅光培等一伙右派和几个反动粤军将领梁鸿楷、魏邦平、张国桢、杨锦龙等。

为了打倒廖仲恺，1925 年 7 月初，这伙右派就多次在胡汉民家中开会，进行策划。他们污蔑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挑拨各方恶感”；他们商讨打倒廖仲恺的办法，包括用刺杀的办法。同时，胡毅生、朱卓文等组织了“文化堂”、“南堤小憩”等俱乐部式的反动组织，以“反共产”相标榜，“随处劝人参加，说你反共产吗？如反共产，请加入来”。他们收罗了国民党的一些老朽、顽固派，经常会餐聚赌，专造反共舆论。他们计划把鲍罗廷、加伦、廖仲恺等都暗杀掉。可见，朱卓文这伙右派原来不只是策划要刺杀廖仲恺，还要刺杀鲍罗廷顾问和加伦将军。实际上这伙右派是在酝酿一场宫廷式的血腥政变。

十几年后朱卓文关于他们策划的内情，曾有坦率的自供，他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包藏祸心，在粤省到处鼓动风潮，煽惑农民暴动，杀害地方士绅，尤以东江海陆丰一带情形更为残酷。……维时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曰‘南堤小憩’，余僦居其间，大家对此赤炎甚为切齿，酒酣耳热之际，骂座不已。后来诸人为抽薪止沸计，决议其渠魁司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伦与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击之，务使群雄同归于尽。下手前日，余诫赴义诸死士，当熟堪地形，以利进退，讵此辈血气之俦，于东山茶寮中，竟将此谋，闻于卫戍部某侦缉员，某急上闻。时吴铁成任卫戍司令，闻讯大惊，急以电话向余诘询，严责顾全大局，切勿使伊为难，反复以公私情谊相劝止，余以事既如此，知不可为，遂亦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怨，迄未稍消，而一时对鲍罗廷、加伦将军诸俄寇又无可奈何，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廖诸人，大骂还是自家人不好，引狼入室，但亦止于口头之谩骂，初无若何锄奸计划



可言也。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瑞同志匆匆自外归来，言杀廖事，神态自若。余知事非寻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取港纸二百元与之，促其离穗。世人所谓朱某杀廖，如是而已。”在这里，除了对共产党的污蔑之词以外，其他的话都是事实，虽然汪精卫这个“左”派后来证明是假的。

参与策划廖案的右派人物很多，当时共产党人曾指出：“参加此次暗杀的人实在太多，假若国民政府负责办理廖案的人没有决心，不将他们最后的根本肃清，国民政府的前途，还免不了危险。”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要求“特别委员会”立即逮捕涉嫌的胡汉民、谢持、邓泽如等，但遭到了拒绝。汪精卫指出，胡展堂只是负有政治上的责任，而不负法律上的责任，不予逮捕。蒋介石等人认为毫无证据，不能拿办。而且，蒋介石对时任广州公安局长、负有防范责任的吴铁成百般庇护。何香凝回忆说：“有一天，蒋介石来看我，我说：‘廖案吴铁成是有责任的，因我在廖案发生之前，到公安局找过吴铁成，我说过‘有人要暗杀廖先生，请你注意’。中央党部本来应有警察守卫的，但是那天却恰恰没有。而且这次朱卓文漏网没有捉到，显然是有人放走了朱卓文。放走朱卓文，吴铁成是有份的”。何香凝当时质问蒋介石：“吴铁成那么优待凶手，你又为何这样优待吴铁成呀！”

案情查清后，国民政府决定派军队搜查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汉清和梁鸿楷、林直勉、梅光培、张国桢、杨锦龙等几名案犯。由于汪精卫、蒋介石采取了庇护凶犯的立场，未能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因此在缉拿凶犯的命令发出之前，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等早已潜逃香港。被牵连的胡汉民在广东也不能立足，最后不得不离开广州，去了苏俄；许崇智作为粤军总司令，由于部将谋叛，遭到指责，而且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辞去总司令职务，离开广州，去了上海。蒋介石出于消灭异己的目的，随即密令黄埔学生军及其直辖部队将粤军武装解除并加以改编，从而大大扩充了党军势力。这样，廖案处理的结果，胡汉民、许崇智等一批国民党的老右派，或潜逃，或被缉拿，或被迫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反动集团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同时，蒋介石却乘机扩充了自己的力量，在鲍罗廷的扶植下，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蒋介石俨然成为政治、军事领袖。

9 月 3 日，广州国民政府为廖仲恺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各界群众参加送殡的有 20 多万人。在队伍的前头写着“精神不死”四个大字的白布横幅作前导，以示抗议右派的暗杀，整个队伍充满了热烈、严肃、悲壮的气氛，黄埔军校的官佐学生沿途护送。这是一次对反动派的示威，显示了革命

的团结和力量。廖仲恺的遗体暂时安放在广州驷马岗朱执信的墓侧，1935年，始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的墓侧。

廖仲恺被刺杀，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举动。国民党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给右派势力以一定的打击，但同时也让蒋介石利用特别委员会，乘机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实权。



第二次东征和广东的统一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被打败的，逃窜闽赣边境和已被收编的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大部从前线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的机会，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下，又死灰复燃，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向导》周刊揭露了中外反动派的这一阴谋："香港政府公开的送三百万（发）子弹到汕头，港商资助陈炯明百多万现金，内中有一部分也是英人拿出来的。段政府帮助陈军三十万元，又派遣海筹、永绩两舰助战；福建派张毅的军队到潮州助战也是公开的；江西和湖南也正在准备援助陈军向粤进攻"。

陈炯明重占东江，再次对广东革命政府造成威胁。1925 年 9 月 11 日，由刘志陆指挥，林虎、洪兆麟、叶举三部分兵三路向普宁、惠来、揭阳、朝阳四县进攻。12 日，林虎部进入汕头。15 日，刘志陆率部分三路向东江移动：左路指挥谢文炳部进击海陆丰，右路指挥林烈部进犯老隆、河源，中路指挥黎生、前敌总指挥李易标由五华、紫金出击三多祝。16 日，陈炯明由沪抵港，筹划进攻广州事宜。18 日，刘志陆下达总进攻令。同日，刘志陆、李易标、熊略等通电声讨蒋介石，并派专人赴港请陈炯明回汕头指挥叛军。驻守东江的粤军由于兵力不足，纷纷向淡水一线退却。自 9 月 18 日～24 日，陈军占领了紫金、惠来、河婆、海陆丰等地。陈军"一路抢掠人民，在汕头更尽力压迫罢工工友，强迫海员复工，解散工会和爱国团体。陈军所过之处，常有一二百里内的居民逃避一空"。陈军的屠杀行径，引起各地农民的奋起反抗，共产党员、海陆丰农军领袖李劳工等 500 余人被杀害而牺牲。

彻底肃清陈炯明等军阀势力，统一广东全境，已成为东江和全省人民的迫切要求。为督促政府早日肃清东江和南路的陈炯明、邓本殷叛军，统一广东，8 月 11 日，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召开了统一广东全省示威运动大会。与会者有 5 万多人，一致议决：一、反对人民公敌及帝国主义之工具；二、拥护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实行国民党对内对外的一切政策。会后，群众举行示

威游行，并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请愿统一广东全省议决案。9月24日，国民党为促进各界与国民政府合作统一广东，召集了广东军、政、学、农、工、商各界大会，到会群众达10万余人。大会由林祖涵主持。国民政府代表汪精卫、省政府代表陈公博、总商会代表冯芝荪、广东对外协会代表谭植棠等发表讲演。大会以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广东省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党政军和各团体名义发表宣言。宣言指出："广东的统一就是广东民政、财政及军政的统一。"阻碍广东统一的主要是帝国主义、买办、军阀，以及"失意政客及反革命的党员卖党卖国，造谣中伤"。要"使人民与军队结合起来，以全力做革命政府及国民后盾，方能打退反革命派的进攻！方能扫除一切障碍！方能达到广东的统一！"

为了统一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面对这种形势，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动下，特别是在共产党人的促进和帮助下，国民政府特别委员会于9月1日作出了出兵东江的决定。东征军设总指挥部。9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担任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罗加觉夫担任军事顾问。全军编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以何应钦任纵队长，辖第一、二、三师，总共约15 000人，任中路，由博罗向惠州前进，是这次东征军的主力；第二纵队以李济深为纵队长，辖第四军陈济棠师、张发奎独立旅等部，约12 000人，任右路，由平山、淡水向海陆丰前进；第三纵队以程潜为纵队长，辖攻鄂军、豫军、赣军及潮梅军等，约6 000人，任左路，由龙门、河源前进。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叶剑英率领的队伍参加了第三纵队。东征军总兵力约3万余人。苏联顾问罗加觉夫、切列潘诺夫、帕纽科夫、舍瓦尔金、萨赫诺夫、捷斯连科、康奇茨等，分别随总指挥部和各纵队出发。

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及第一师党代表。这次东征吸取第一次东征的经验，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出发前夕，总政治部组织了强大的政治宣传队，包括总队和3个支队，下设分队和小组，共有队员237人，以随军出发。队员主要是从政治训练班、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大多数都受过一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且懂得一些地方语言。在周恩来领导下，总政治部制订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拟定了《政治设施方案》，决定东征军所到之处，实行轻徭薄赋，禁止烟赌，整顿财政，澄清吏治。还成立了社会运动科，以大力扶助工农运动，并提出发展党务工作的规划。



东征开始前夕，中共广东区委制定杨石魂、刘锦汉、廖其清等共产党人，率领岭东革命同志会部分人士进入潮汕地区，与当地党团组织一道发动当地群众开展敌后斗争，以配合、支援东征军。共产党员古大存也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五华县组织群众武装策应东征军。

1925年10月1日起，东征军各部相继出发，预计1个月内结束战事。10月5日，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发表东征军出兵布告。次日，各纵队分途出发，直奔惠州城。出发前，国民革命军发表了《告东江各界人民书》、《告农民书》、《告东征将士书》等。广东省政府为东征发表了宣言，宣布了东征的目的和意义。

东征得到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省港罢工工人揭露了香港政府企图利用陈炯明颠覆国民政府、破坏罢工的罪恶计划，认为“省港罢工之能否胜利，要视我们能否收复东江打倒陈炯明”。提出“东江的胜利，就是我们罢工的胜利”。10月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总部召开专门会议，通过决议：一、本部全体请缨出发东江，协同各军扫清陈炯明逆党；二、本部队员出发后应联络东江各界民众与政府合作，使反革命派无所施其伎俩。省港罢工委员会还给国民政府致函，为纠察队请缨东征。在罢工委员会的号召下，还组织了一支由3456名罢工工人组成的运输队，以随军东征，支援东征军。收复东江的军事，还得到了农民和其他阶层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东江地区农民纷纷派出代表前来广州，多次请求政府收复东江。

第二次东征主要经历了四个战事：

惠州之役。惠州是东征军攻击的第一个目标，这是收复东江的一个关键性战役。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巢，是东江的门户，地势险要，城防坚固，易守难攻。这时惠州守城司令是陈炯明的一个师长杨坤如，他是敌军的著名猛将，是第一次东征时唯一未受损的部队，防守严密。他们企图利用天险将革命军阻于惠州城下，然后反守为攻，歼灭革命军。

10月11日，东征军抵惠州城郊，形成对惠州的包围。13日上午，指挥部下达总攻击令，开始攻城。由第一纵队第二师刘尧宸的四团担任主攻，重点攻击北门，连续发起几次冲锋，皆未成功。由于蒋介石急于求胜，违背步兵与炮兵协同作战的原则，在炮兵尚未摧毁敌防御阵地为步兵攻城造成有利条件之前，就贸然令步兵发起出击。结果在敌人密集火力的封锁下，冲锋兵士一排排倒下，第四团团长刘尧宸不幸牺牲，全军伤亡惨重。蒋介石灰心丧气地提出放弃进攻惠州的主张。但周恩来不同意蒋介石的主张，认为攻下惠

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影响极大；放弃惠州不打，对战争全局极为不利。他提议调动广州飞机到惠州侦察敌情，为炮兵指引目标。

14日，总指挥部接受了周恩来同志和苏联顾问的建议，随即命令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等共产党员带头组织敢死队爬城。东征军调整兵力后，集中炮兵火力向北门发起总攻，摧毁敌机枪阵地及炮台大半，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攻破北门进入城内。这时，以蒋先云为团长的第七团及第一补充团，也攻破西门。经过激烈战斗，革命军终于攻占了天险惠州城。杨坤如负伤狼狈败逃，所部来不及逃走了尽被俘获。由于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以及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战的牺牲精神，革命军才能在两日内攻破天险坚城惠州。亲历这一战役的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围墙还要坚硬"。

攻占惠州，为消灭陈炯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为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场战役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官兵伤亡400余人。为了激励将士，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在惠州举行了追悼阵亡烈士大会。大会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罗加觉夫等军发表讲话，周恩来宣读了祭文，并发表演说。他在讲演中激励将士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统一广东，统一中国，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会后，政治宣传员肖鹏魂被周恩来派为惠州留守主任，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惠州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便很快迅速发展起来。

占领海丰、陆丰、紫金、老隆。惠州既下，东征军军威大振，从此各纵队分路前进，长驱直入。17日，第一纵队第一师由何应钦、周恩来带领，从惠州沿途追剿溃兵，先后占领永湖、白云布、吉隆、平政等处。20日，到达赤石。时陈军洪兆麟部2 000余人，布防在东都岭、宋公岭一带。何应钦、周恩来亲往侦察地形后，决定以主力进击东都岭，以一小部分兵力牵制宋公岭之敌。22日，各部按计划分途进攻，一举击溃敌军，占领梅陇。敌军溃逃，在海丰农民自卫军的策应、支援下，第一师是日占领海丰。23日，进占公平。24日，陈军谢文炳纠集3 000多人偷袭海丰，未成反被击溃。26日，革命军乘势又攻占陆丰。

17日，第二纵队在李济深率领下从永湖出发，18日到达平山，20日占领三多祝。21日，第十一师陈济棠部在双金与敌激战，击败敌军。22日，第二纵队先锋第一独立旅张发奎部与陈炯明部林虎、刘志陆主力万余人遭遇，激战于热汤附近。时张旅仅1 000多人，战斗异常激烈，张旅损失颇

 

重。后陈济棠率第一独立团和第三十四团赶来增援，至次日凌晨，终将陈炯明部击退。23日，占领兰塘。该纵队又乘胜追击，26日克紫金。

第三纵队程潜部奉命从惠州出发。22日下午，第三团与陈修爵部激战于河源。23日，将其击退，攻克河源。26日，程潜部经义和、蓝口，又攻占老隆。

华阳、河婆之役。时陈军林虎主力集中在华阳地区，当东征军从惠州分途进军时，东征军总指挥部与谭曙卿所率第三师与林虎部遭遇。由于三师轻敌冒进和蒋介石判断失误，在敌强大火力攻击下，第三师损失惨重，全线崩溃。1名团长，1名代理团长，8名连长，8名党代表和1 000多名士兵相继牺牲。在这极端危急的时候，幸亏共产党员陈赓冒险致信给周恩来，取得增援，才使蒋介石得以摆脱险境。华阳之役失利后，五华县有组织的农民积极帮助东征军脱险。26日，何应钦、周恩来率第一师占领河婆。

林虎部在华阳取得胜利后，乘势南下，同退守棉湖、鲤湖一带的洪兆麟部共万余人，分三路夹攻何应钦、周恩来所率领的第一师。10月29日，林虎部黄任寰率兵与东征军第一纵队，激战终日，退至罗甘坝一带。第一师第一团留驻河婆，第二、三团与赶来的陈济棠第二纵队相配合，一道夹击退至罗甘坝的林军。经过激战，将黄任寰部歼灭，并全部缴械。至此，林虎部全部瓦解。第一团停驻河婆时，遭到洪兆麟、谢文炳部袭击。洪、谢部是陈军的主力之一，约有七八千人，第一团奋勇抵抗。激战数日，终于将敌军击退。经过华阳、河婆之役，大破林虎和洪兆麟部，扭转了蒋介石等轻敌冒进造成的失利，这对于取得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占领潮梅，歼敌闽边。当第一、二纵队激战于华阳、河婆时，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不战而取五华县城。31日，攻克兴宁。第一纵队第一师在河婆取胜后，于11月1日进占普宁。3日，又克揭阳、梅县。4日下午，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6日，东征军总指挥部进驻汕头。第二纵队张发奎部攻占紫金后，奉命参加南讨邓本殷之战。陈济棠师继续东征，于11月7日攻占饶平。11月中旬，何应钦、谭曙卿、程潜三路入闽，追剿陈炯明残敌，分别在永定、平和等地全歼逃敌刘志陆部。至此，第二次东征取得完全胜利。

东征中，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共产党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两次东征的胜利，不仅为东江人民铲除了祸害，而且为其后南定邓本殷叛军、统一广东全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25年初，邓本殷部改称为广东八属军，盘踞在高雷、钦廉、琼崖一带。10月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邓部倾力向阳江、四邑进犯，以策应陈军。因此，国民政府在举行第二次东征的同时，也决定举行南征，讨伐邓本殷。

中共广东区委积极准备南征，派出大批的党团干部潜赴南路、琼崖等地，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共产党的宣传组织下，邓本殷控制的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广大群众热烈拥护、支援革命军南征。

10月31日，国民政府任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南征军总指挥，陈铭枢为第一路军指挥，王钧为第二路军指挥，戴岳为第三路军指挥，俞作柏为第四路军指挥，陈章甫部为右侧支队，进行南征。经过两个多月作战，南征军相继攻克交州、雷州、钦州、廉州。第二年初，又追歼了海南岛的残敌。至此，南讨邓本殷取得了完全胜利。

东征陈炯明和南征邓本殷的胜利，完成了统一广东全省的任务，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孙中山长期奋斗统一广东的夙愿。这也同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争取解放的斗志，锻炼了正在成长中的党和革命军，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广东统一战争的胜利，并为以后国民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奠定了巩固的后方基础，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国民党二大

改组后的国民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和宣言精神的指导下，表现出革命的战斗精神。但是，国民党新老右派恣意践踏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进行分裂国民党的罪恶活动，也给国民党带来危机。

1925 年 11 月下旬，国民党内以林森、邹鲁、谢持等为首的一批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进行分裂活动。会议炮制了《取消共产党员在本党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党派谭平山李大钊案》、《鲍罗廷顾问解雇案》等一系列反共决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随后，他们还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以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对抗。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为了维护自己的原则立场，坚持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对西山会议表示绝不承认的态度。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致电各级党部，严正宣布西山会议为非法，“盖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时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之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使军阀与反动分子得遂其破坏革命之阴谋”。中国共产党中央也于十二月发出六十七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

1925 年 12 月，为了制裁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第一届第四次中央全会。会议继续指出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以个人名义召开的所谓四中全会的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还指出：取消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党籍及其他一系列决议案，是分裂革命的反动行为，都是不能成立的。会议决定，近期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

准备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是一次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重要会议，因此遭到右派的阻挠。这时，戴季陶之流的所谓“理论家”，正在大肆贩卖其“纯正的三民主义”；广州黄埔军校中的一部分反动军官和学生，在蒋介石的卵翼下也建立起“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组织。12月31日，蒋介石还扬言“左派、右派都是我们的同志”，反对党内有左派、右派之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虽然还未暴露他的反革命身份，但是在左派力量日益增长、右派势力进攻面前，显得畏手畏脚，迟迟不研究“二大”的筹备工作。

共产党人吴玉章就在这时率领四川代表团经上海到达广州，看到大会一切准备工作还没开始，非常着急，便立即去找汪精卫。汪精卫愁眉苦脸地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吴玉章说：“现在邹鲁等人这样猖狂，他们不但排斥共产党，也排斥广东的国民党，不跟他们斗一斗，怎么成？否则，许多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这块根据地就要垮台，只怕你这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也坐不住了！”，催促汪精卫赶快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以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不几天，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推举吴玉章做大会的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

那时，陈延年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肖楚女等都在广东工作，和吴玉章经常往来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吴玉章和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筹备工作进展的非常迅速。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7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168人，中派代表65人，右派代表45人。著名共产党人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杨匏安、谭平山、李富春、范鸿劼、侯邵裘、宣中华、苏兆征、叶挺、董必武、缪伯英、邓颖超、刘尔松、邓恩铭、于方舟、于树德、蒋先云、高语罕、刘伯垂、朱季恂、朱克靖、夏曦、易礼容等都是大会的代表。周恩来当选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出席大会的代表，但因第一军政治工作离不开，没有参加大会。国民党左派代表的著名人物有宋庆龄、何香凝、朱蕴山、陈其瑗、邵力子、彭泽民、经亨颐、程潜、谭延闿、朱培德、路友于、詹大悲、朱剑凡等；中派和左派代表中，著名人物有蒋介石、何应钦、吴铁成、邓泽如、孙科、伍朝枢等。情况表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占有很大优势。

大会主席团由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谭平山、恩克巴图、丁惟汾、经亨颐（后经亨颐未到，由宋庆龄补替）等7人组成。老同盟会员、当时



已是中共党员的吴玉章担任这次大会秘书长。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多数，他们参加了大会的各个主要机构，承担了主要的工作，吴玉章以秘书长资格，实际筹备和主持了这次大会。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密切合作下，这次大会开得比较成功，取得了很大成就，自始至终充满革命气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集中革命势力以统一全国”，是大会的主要口号。

在大会上，汪精卫作了政治报告，林祖涵作了代表大会筹备经过报告，谭平山作了党务和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毛泽东作了宣传工作报告，邓颖超受何香凝委托作了妇女运动报告，蒋介石作了军事报告，国民政府顾问作了大会发言。此外，宣中华、夏曦、吴玉章、侯邵裘、董必武等分别代表浙江、湖南、四川、江苏、湖北各省国民党党部，于树德、刘伯垂、刘重民等分别代表北京、汉口、上海各市国民党党部，作了各地党务工作的专题发言。大会出版了日刊，由高语罕、朱季恂编辑，向全国作了报告和宣传。

大会通过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都采取了革命的立场。大会宣言重申了国民党在一大确立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方针，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罪恶。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仍然是：“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住其发展”。

大会遵照孙中山遗嘱和“一大”政纲，重申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大会通过了吴玉章、陈公博等人联名提出的《对外政策决议案》，明确规定要与苏俄“切实联合”，对“联俄政策”作了公开的声明，强调要“继承总理联俄的政策，应该更进一步”。大会发出了致苏联政府的友好电文，电文说：“本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一致决议，谨以至诚之意与贵国携手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贵国为世界革命先锋。向以扶助被压迫民族为职志，深望继续与以助力。本会更当率领全体同志努力奋勉，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而促全世界革命之成功，谨祝中俄大联合万岁”。大会还通过决议，继续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顾问，为了表

示友谊与奖励，大会决定赠送鲍罗廷一座银鼎，上面镌刻“共同奋斗”四字。大会决定进一步执行扶助农工政策，提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主力军，已于过去两年事实中证实。本党基于扶植农工之政策，以后应多致力于农工组织，扩大吾党基础的势力。”对于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要给以伟大的帮助；对于农民运动，要把它视作国民革命的基础，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给予支持。

大会再次就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出席会议的黄埔军校代表认为：要根本解决两派纠纷，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下列三点：“一、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针对这三点，出席大会代表、共产党人毛泽东、范鸿劼、张国焘、高语罕、方维夏等都作了发言。他们表示不能同意把共产党员身份公开，并就不能公开的理由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说明。毛泽东提出：“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绝不是真正共产党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也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努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的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大会经过深入讨论，认为公开共产党是不能允许的。“两年来由帝国主义发出‘反共产’与‘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之工具——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及各种无聊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努力作其破坏污蔑之宣传。其目的为欲拆散本党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向民众揭露其污蔑及错误，同时指示民众，使之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大会在所通过的《中央党务报告决议草案》中，作了如下规定：“革命的势力集中，为促进国民革命成功之不二原则，所以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共同努力。”这就再一次肯定了孙中山同意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有力地打击了妄图分共、反共，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右派。

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



制裁。蒋介石、孙科原拟阻挠大会讨论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置，秘密策划把这个问题保留到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去解决，后看到这个企图不能得逞，乃商量如何减轻对西山会议派处置的办法。但是，这种意见遭到了许多大会代表的反对和批驳。大会代表共产党人高语罕、侯邵裘、朱季恂、方维夏、谭平山、江董琴等都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大会秘书处共收到弹劾西山会议案六十多件，经提案委员会审核后，针对其分裂活动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两个议案，认为西山会议派的行为“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严重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大会决定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的党籍；对于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张知本等十二人，由大会书面警告，责其改正，并限于两月内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国民党，而与谢持、邹鲁同趋开除其党籍；对于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擅自以个人名义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大会予以恳切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这个决议案基本是好的，永远开除邹鲁、谢持这两个带头闹分裂的首要分子，对其他参加西山会议活动的人，也分别酌情给予惩处，这就给了西山会议派以必要的打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严明了革命纪律，伸张了正气。但是，它还存在着对戴季陶等一些人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处分偏轻的缺点。

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对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进行了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胡汉民、谭平山、宋庆龄等36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白云梯、毛泽东、许甦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等24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12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由于中共中央陈独秀、张国焘等和共产国际的妥协退让，在选出的36个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人，即林祖涵、李大钊、于树德、杨匏安、恽代英、吴玉章、朱季恂；左派只占14人；右派、中派则占了15人，孙科、戴季陶、伍朝枢、肖佛成等右派都当选了。在选出的12个监察委员中，右派占了绝大多数，被选人的共产党员只有高语罕一人。当时，国民党的中执委和中监委经常合在一起开会，如此以来，右派势力就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了优势。

在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蒋介石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伪

装左派，赢得不少声誉；此外这时他作为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握有一部分军权，取得了东征陈炯明的胜利，在这次大会上因而备受礼遇。在会上，蒋介石也以军事领袖自居，作了各种引人注目的演讲。最后在大会选举时，原来他这个在国民党中央地位不高的新右派头目，竟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他的亲信何应钦和陈果夫也分别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与中央监察委员。这样，大大抬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为以他为首的新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二大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方向和三大政策，这次大会所发表的宣言和通过的决议，继承和发扬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维护了国民党的团结，维护了国共合作，对于国民革命的继续发展和随后不久开始的北伐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会议选举时，由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分裂活动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主张实行妥协退让政策，结果不少右派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壮大了右派声势。特别是蒋介石在大会上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之后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等要职，大大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为尔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夺去革命领导权，敞开了方便之门。右派和中派在组织上的力量增长，使得国民革命的发展逐渐艰难起来。



西山会议派

自从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制造的“弹劾共产党案”被平息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不断出现，特别是孙中山逝世以后，右派的分裂活动变本加厉，更加猖獗。国民党老右派先后建立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反动小团体，进行反革命的分裂破坏活动，这些还是个别的或小组织的活动。

到 1925 年 11 月，出现了另立国民党中央，造成国民党分裂的右派集团——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是从革命统一战线内公开分裂出去的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极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府。随着西山会议派的出现，国民党内右派分子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达到一个顶点。

1925 年 8 月，广州国民政府为了声援五卅运动后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及加强对外宣传，遂决定组织“外交代表团”，指派林森、邹鲁二人率领，准备北上。廖仲恺被刺后，广州的政治形势对一些国民党右派极为不利，林森、邹鲁慑于广东境内浓烈的革命气氛，而邹鲁又涉嫌“廖案”，身不安位，他们亟想离开广州去他处，便于进行阴谋活动。于是，他们借代表团北上之机逃出广州。

9 月离开广东，先到上海，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一伙右派会晤，共同商议到北京去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进行反共。他们商定，由谢持先乘津浦路车早到北京，准备一切；林森、邹鲁则溯江而上，经南京、九江到汉口，一路联络各地右派分子，而后从汉口乘京汉路车直到北京。他们原拟到北京后，即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名义，邀请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开会，但结果却遭到了以李大钊、于树德为首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抵制。

1925 年 10 月 25 日和 26 日，邹鲁、林森、谢持等纠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一小撮反动分子，手持铁棍，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翠花胡同八号）寻衅闹事。他们“一面派人将大门把守，一面派人把持电

话，人内翻箱倒柜，墙角厕所等处搜查，一若强盗人室”；结果挑起双方武斗，抢去执行部“小印一方，簿册若干种”。

在北京开会不成，他们又拟改在冯玉祥国民军驻地张家口举行，但又遭到冯玉祥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这伙右派走投无路，骑虎难下，遂决定仍在北京召开中央执监委会议。11 月 16 日，林森、邹鲁等发出“铣”电：“……现委员等已于本月铣日在总理灵前集会，决定于本月梗日（二十三）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除分电外，特此电知，务希到会”电末署名为：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稚晖、傅汝霖等。

11 月 18 日，这伙右派举行预备会议，推举吴稚晖为主席。后来戴季陶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曾透露关于这次预备会的情形。他说：“到京后，弟与楚伧、元冲、剑侯（即沈定一）数次访稚晖先生。弟以此次之会议，如欲有成，必须以稚晖先生之意为从违，且以之为中心，故决定绝对不发表意见。及预备会开，稚晖到会后，细数其意见者数小时。弟等四人皆决定以此为标准。稚晖所主张，对精卫为劝告，而勿为弹劾。对共产党之同志，宜邀守常等为切实之协商，而勿使为片面分裂之行动。弟等四人皆承认之矣。……”可见，当时吴稚晖是不赞成立即与共产党分裂，主张此事从缓进行，这个意见也得到了戴季陶、邵元冲、沈定一等的承认，但受到了邹鲁、谢持等的反对。当预备会议关于暂缓反共的消息传出后，在北京的国民党右派团伙中，随即引起大哗。以冯自由、马素为首的一小撮右派，竟误认为这次会议是共产党的会议，是戴季陶、沈定一（二人在“五四”之后曾参与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一度混迹于进步行列，其后不久即转向国民党，并日益反动）在为共产党活动。于是，他们雇佣了一伙流氓，涌向西山香云旅社，绑架了戴季陶、沈定一，对他们进行凌辱。11 月 21 日，戴季陶受此“奇冤”后，羞愤不已，离京南下。这也就是为什么戴季陶签名发起，而又没有参加西山会议的原因。但是，他们原来是一丘之貉，他对邹鲁、谢持等要将召开的西山会议是寄予希望的，他在行前曾发表一个声明，说：“在一定的主张下，可以同意会议的决议”。

经过一段准备，1925 年 11 月 23 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第一届 24 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实际上只有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沈定一、



叶楚伧等8人；5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只有张继、谢持2人；候补执行委员出席的只有茅祖权、傅汝霖2人。监委吴稚晖只列席了第一次会议，后即离去。因此，总共出席会议的人数实际上为12人，还不足中央执监委总数的一半，仅这一点就很明显地暴露了这次会议分裂和非法的性质。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举行，故人们就把它称做西山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伙国民党右派集团亦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开了43天，共开会22次，于1926年1月4日结束。西山会议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表明了这次会议的分裂和反共性质。宣言中说："向者，本党总理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加入也，因其声明系以个人资格而信仰本党主义，愿于国民革命进程中努力于本党主义之宣传与工作，非以共产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乃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本党党部及党员，曾再三以至诚之意，纠正劝告，冀其勿负加入之初衷，迄无效果，且益进行其妨碍本党之行为。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势力，且借以维持苏联，此不徒事实昭然，抑且文字证据俱在。……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崭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且于革命进程中有合作之机会，转得商洽并行，实为革命团体恒有之事实。用是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善意的决定，凡共产党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党籍，免使两革命团体内部问题而相消其革命力，益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可见，这个宣言不过是一年多以前邓泽如、张继、谢持等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那些滥调的翻版，依然是那一套所谓"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共产党是在利用国民党以发展其势力"等无理谰言。这也表明了，尽管谢持等"弹劾共产党案"早已被国民党中央决议所批驳否决了，但是谢持、邹鲁等反共之心不死，一有机会就又跳了出来。

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等议案。这些决议，彻底破坏了孙中山所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完全违反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精神，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它充分暴露了邹鲁、谢持等一伙右派反共、分裂的丑恶行径。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把矛头集中指向了中国共产

党和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11 月 23 日的第一次会议，就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通过的《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议案中，说：“本党总理允许共产分子之加入，谓其能以个人资格而信仰本党主义，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努力于本党主义之宣传与工作也，共产党员当时亦屡次声明系以个人资格加入，为本党主义而奋斗，非以共产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乃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在共产党忠于共产党主义，原无足责，然既加入本党，则其于本党主义与本党党务，亦应尽忠实之努力，此乃党中纪律与夫为党员者之德性、义务责任等，绝对不容宽假之事。今共产党员则一切不顾，惟彼党之是谋，本党有维持发达本党之义务，自不容党中有党。为此，决议将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一律使其退出本党。……”12 月 2 日的第四次会议，又分别开除了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了他们的党籍。

西山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案》等，狂妄地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上海，并推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部长：组织部长居正，宣传部长戴季陶，青年部长叶楚伧，妇女部长茅祖权，工人部长沈定一，农人部长覃振，商人部长孙科，海外部长林森，调查部长石青阳；通过了《修正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案》，并拟定“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民国十五年（1926 年）3 月 29 日在上海或北京、广州召开。

此外，西山会议还以“汪精卫违反总理容纳共产派归化本党之本意，与顾问鲍罗廷朋比为奸，扰乱本党组织，破坏本党纪律，以致客卿专政，共产党人揽大权”，“罪浮叛党，行同卖国”之罪名，通过决议：“一、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二、开除汪精卫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不得在本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这个决议，也反映了当时汪精卫和邹鲁、谢持之间的确存在矛盾，他们并不是一致的。

西山会议结束后，这一伙国民党右派除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地方党部外，又集合在上海环龙路 44 号设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为右派活动的大本营。他们操纵了上海《民国日报》，并创办了《江南晚报》，以此为宣传阵地，大力进行反动宣传和活动。



为了篡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经过积极活动，1926年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建国中学召开了非法的所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西山会议派继西山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分裂国民党、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肃清共产分子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全面篡改了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宣言》中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就是被征服民族抵抗战胜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实际上放弃了民族主义的反帝原则；把民权主义解释为“全民政治”，抛弃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主张的民权主义是有阶级性的观点；在解释民生主义时，取消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口号，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办法是“移民“和给农民贷款，办合作社。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是“制定有益于工人之劳动法规”，等待雇主觉悟是“解决民生之途”。该《宣言》是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相对抗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西山会议派非法召开的“国民党二大”，选举产生了所谓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25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樊钟秀等7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时决定了各部的部长。此外还拟定建立地方党部。至此，西山会议派就从政治上、组织上完成了反共分裂的行径，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动政治集团，作为从国民党中分列出去的一个派别，而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公开对抗。

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由林森、邹鲁、谢持等签署、发起召开西山会议的“铣电”发出后，11月20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即致电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右任、李大钊、于树德等人，严正指出林森、邹鲁、谢持等的行为是非法的。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一伙右派不顾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多数中央执行委员的反对，一意孤行，悍然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这激起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广大革命分子的强烈反对。11月27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各级党部，进一步指出西山会议的非法性质。“盖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时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之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使军阀与反动分子得遂其破坏革

命之阴谋”。1925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也发出第 67 号通告，动员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反击西山会议派。全国各地国民党党部和革命分子群起反对，形成了声讨西山会议的强大声势，给林森、邹鲁、谢持等一伙右派以沉重的打击，他们是日益孤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了对西山会议派的批驳，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都写了文章揭露和批判西山会议派的反动、分裂行径。

为了制裁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广州国民党中央于 1925 年 12 月，召开了第一届第四次中央全会。会议继续指出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以个人名义召开的所谓四中全会的西山会议是非法的，并决定近期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

1926 年 1 月 1 日至 20 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大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方向和三大政策，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制裁。针对其分裂活动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两个议案，认为西山会议派的行为“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严重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会议决定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的党籍；对于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邵元冲、叶楚伧、林森、张继、张知本等十二人，进行书面警告，限其改正，并于两月内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国民党，而与谢持、邹鲁同趋开除其党籍；对于戴季陶擅自以个人名义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大会予以恳切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这就给了西山会议派以必要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严明了革命纪律，伸张了正气。

针对西山会议派拟定于 1926 年 3 月 29 日在上海召开伪代表大会的行动，广州国民政府与 3 月 18 日发出通令，对右派提出严厉警告。当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刚刚开过第二次全国伪会之后，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等省市的国民党党部，纷纷发表通电，或刊出启事，痛加申斥伪会，强烈要求广州国民党中央对参加伪会的首要分子，缉拿归案，严厉处置。这进一步沉重打击了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在全国人民中、在国民党内已是臭名远扬、日益孤立了。

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东征军前敌总指挥，发表了



《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一封信，表示要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面上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尽可能严厉的谴责。蒋介石这种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蒙蔽了很多人的耳目，使他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捞取了一笔不小的资本，在国民党“二大”上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之后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等要职，大大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为夺取更多的领导权力作了准备。

西山会议派被打下去了，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正在形成。

反共的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的反动思想体系。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的要求，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种反动政治思想，给革命统一战线造成极坏的影响。

1890年戴季陶出生于四川广汉，又名传贤、天仇，字选堂，祖籍浙江吴兴。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之后回到上海，受资产阶级思潮影响，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1910年任上海《天锋报》总编辑，1911年因在该报发表反满文章，鼓吹排满斗争而被捕。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孙中山身旁任孙中山记室（即秘书），随同亡命日本。袁世凯垮台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任军政府秘书长。1918年，孙中山受滇桂军阀之排挤，离粤赴沪，戴亦随同回到上海。1919年6月，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戴与沈玄庐一起主办《星期评论》，介绍社会主义思潮和劳工运动，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这时他还参与了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但旋即退出了。20年代初，戴和蒋介石、张静初、陈果夫等在上海经营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买卖活动，于是改命季陶（取效法古时陶朱公范蠡弃政经商之意）。后又投奔孙中山。

1923年冬，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派廖仲恺到上海向在沪的国民党本部诸人说明决定改组的缘由以及征求他们的同意时，戴季陶即表示了反对之意。他向廖仲恺提出了三条："一、绝不能借款作党费，即借款亦须如旧日吾人借款之办法，绝对自由，不因借款而受牵制；二、共产党人加入，必须造成单纯之党籍，而不能存留两党籍，以启他日之纠纷；三、我自己绝不任中央执行委员，并不出席于代表大会，而原以全权担任一出版所或报馆"。戴季陶这时已认为改组国民党"殊非适当，盖一党有一党之中心，亦有一党之历史地位，若失却独立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必召他日无穷之纷



扰，此乃集团之原则，绝不能违背者也”。戴季陶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一贯持反对的态度，也明确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反对联共政策。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戴季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孙中山在世时，由于孙中山的权威与坚持，戴季陶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国共两党合作，也不敢公开反对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但是他反共之心不死，一有机会就活动。

1924年3月29日，在祭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后回广州城的途中，戴季陶在汽车上与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的共产党人谭平山谈话。谈话中，戴季陶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放弃共产党党籍，以便完全做成一纯粹之国民党。这就是他的反动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后来进一步发展完成的所谓戴季陶主义的一个根本点。但是，这一要求当即遭到了谭平山的批驳。谭平山回答，此事现在绝对做不到，很难预料两党的合作能至何时，将来总有分离之日，今日共产党绝不可能抛弃党籍。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戴季陶对国民党内一部分老朽分子的腐败行为是不满的；另一方面，他对国民党内共产党人锐志改革又是害怕的。他感到进退维谷，左右为难，陷入了悲观的境地，这也正好反映了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代表的两面性。1924年6月，戴季陶辞去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离粤赴沪，隐遁起来，待机而动。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国民党领导中枢受到震动，失去了对党内的控制，这就给右派活动提供了机会；此外，工农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特别是五卅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不断扩大，更加引起了戴季陶等的忌恨和仇视。戴季陶便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积极进行反对新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活动，破坏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篡夺革命领导权，大肆兜售他的反动思想，决议要建立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和一个纯正的三民主义国家，乃谋把他擅自解释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指导原则而确定下来。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就成为反对新三民主义的头目。

1925年5月18日至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由戴季陶主持草拟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即第十号训令），他向全会正式提出了建立以所谓“纯正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强调总理遗教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俨然以孙中山思想的唯一正确解释者自居。这一建议，实际上是一个反对新三

民主义、恢复旧三民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抛弃三大政策的宣言书。他要用他所谓的三民主义作为最高原则，来范篱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人的行动，为谋求建立一个在所谓纯正三民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纯粹国民党作准备。这也表现了戴季陶的反动思想对于国民党开始取得某种指导作用，这是“戴季陶主义”出现的开端。

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戴季陶又回到上海，在薛坡赛路慈安里设立“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反革命的理论著述工作。1925 年 6 月和 7 月，戴季陶在蒋介石的支持和资助下，先后写成并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反动小册子，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套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理论。这两本小册子，连同他同年 5 月在广州发表的《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构成了一套理论体系，标志着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已经完全形成。

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右派，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进行反共活动的主要思想武器。戴季陶主义，打着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旗号，阉割其革命内容，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为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制造舆论。

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打着恢复“纯正三民主义”的幌子，鼓吹封建道统说，宣扬孙中山的所谓正统思想，宣称孙中山是孔子以后继往开来的大圣，阉割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

戴季陶没有去宣传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而是大讲特讲三民主义的所谓道德基础、思想基础，大讲特讲孙中山的所谓正统思想。只有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的三民主义才是“纯正的三民主义”，才是“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他说：“三民主义所以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缘故，并不是要妥协、要调和，也不是故意的排斥共产主义，而实在是三民主义本身，具备有更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基础”，三民主义的更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基础，就是他所谓的“继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就是所谓“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就是智、仁、勇三德和贯穿这三者的所谓“诚”。戴季陶认为，共产主义是很单纯的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其理论基础，而民生主义则是以中国固有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又说：“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抓住孙中山思想中对封建伦理道德肯定的历史

 

局限性，大加发挥，把孙中山立足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曲解为儒家的伦理思想，置于中国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之中，从而篡改了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的性质，从根本上阉割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阶级调和。他宣称中国目前只有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中国国民党是在进行适应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国民革命，这个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而不是劳工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中国还没有阶级对立，因此不需要进行阶级斗争。

戴季陶利用孙中山说过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话，否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与不觉悟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既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既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没有阶级的对立，也就无所谓阶级斗争。他宣称中国目前只有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中国国民党是目前进行的国民革命，"在事实上是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但是，这一个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一方面要治者阶级的觉悟了，为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在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使得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那就是要促使治者阶级觉悟，诱发他们仁爱的性能。他认为"仁爱是人类的生性"，"爱人利他的仁心，更不是一定要同阶级才能够具备"，革命就是行"仁"，革命"是从仁爱的道德律产生出来，不是从阶级的道德律产生出来的"。因此，"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因为人类是具有仁爱性能的，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

戴季陶还强烈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因此，反对在国民革命中提阶级斗争，攻击中国共产党"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认清楚"，"绝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一个国民革命，绝不是革命者所应取的途径。"

在组织问题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主张建立一个所谓纯粹的或单纯的国民党，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

员都退出去，分裂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戴季陶认为国共两党合作是国民党内产生混乱和纠纷的根源，因为团体都有排拒性，国民党内加入了共产党人，就是一个党内有了两个中心，这就会“同性相拒”，难以存在和发展。

他利用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制造破坏国共合作的“理论根据”。他说，生存是人类的目的，生存逢着一种障碍的时候，就引导着人们发生一种生存的希望，“无论是那一种希望，都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因为要独占，所以要排他，因为要统一，所以要支配”。他认为这都是为了求生存的必要。“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更是如此，假使这一个团体，没有具备独占性和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一定这个团体，是没有主义的团体，是没有生存欲望的团体，一定是随时可集随时可散的一群乌合之众”。又说，国共两党没有“共信”，因此就不可能“互信”，也不可能团结。即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因此，“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一定要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把三民主义作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去作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否则，共产党员就必须退出国民党。

戴季陶主义，其内容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家，代表资产阶级右翼从思想理论战线发动对革命的进攻，对革命造成极坏的影响，必须予以坚决反击。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和斗争。共产党人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毛泽东等都写了文章，展开对戴季陶



主义的批判。

中共北方区委还专门作了《关于反对戴季陶主义的决议》。1925 年 9 月，瞿秋白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系统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的谬论，揭露了戴季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所作的唯心论曲，之后又明确阐释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具体内涵，指出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说明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开辟了《反攻》专栏，组织对右派的批判。他还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批判戴季陶反对三大政策的谬论，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想在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独裁国家的企图完全是一种幻想。

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了国共合作，从理论上击中了戴季陶主义的要害，大大缩小了这种反动思潮的影响。后来连戴季陶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小册子一出版，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在批判的攻势下，他的同伙，"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不能收圆满的效果"。革命舆论压倒了反革命叫器。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中共中央在对待戴季陶主义的态度上，并没有表现出批判的彻底性。

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以阐述三民主义为名，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反对容共政策的理论。他这套反动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把国民党变为一个资产阶级垄断的反动党派，进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戴季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位臭名昭著的理论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戴季陶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具有反帝和反共的两面性。"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这类人的阶级性格。他的反动思想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喝彩，成了国民党右派的精神武器。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集中反映了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资产阶级右翼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妄图打击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愿望。它不仅促使国民党新右派形成，为其反共夺权作了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而且助长了国民党老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并从思想上把国民党的新老右派联合起来，对革命统一战线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同时，还对反革命的政治派别——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

国家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表现。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它对于形成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国内统一的市场等，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以后，仇视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就成了国家主义的特征，而发展成为一种极端反动的思潮了。

中国的国家主义萌芽于“五四”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急剧泛滥，并形成为一个极端反革命的政治派别——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由一些反动政客和反动的知识分子组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人。国家主义一开始就是一股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潮。

“五四”时期，曾琦曾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一起，共同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人也都是该会的会员。当时他们都积极参加一些爱国活动，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然而，“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琦等这些代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人，感觉受到了威胁，便很快采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的立场。而“少年中国学会”中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拥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曾琦与李大钊等人在思想上的分歧与对抗不断加深。“五四”爆发之前，李璜在《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信中，攻击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同盟罢工和暴力革命“不知连累了多少平民”；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攻击社会主义“是一种假道德”，要中国“不再蹈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覆辙与今日俄国社会革命现象”。五

 

四运动后，他们更加紧对社会主义的反对。1921 年 7 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年会上，他们竭力反对共产主义者邓中夏、高君宇等人把学会改变为信奉社会主义的组织的倡议。此后，他们又召集上海和南京两地的会员积极活动，加强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控制，并最终窃取了学会的领导权，由陈启天担任总会的执行部主任。陈启天在《何谓新国家主义》的草拟中声称："就中国目前之现状与其在世界之地位，中华民族之将来，各方面从长计议，则采行国家主义实为目前之急务"。

1923 年 12 月 2 日，曾琦、李璜等人在法国巴黎的玫瑰城共和街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党。中国青年党的成立，标志着这个政治派别的形成。由于青年党的名称长期保密，对外活动则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出现，并标榜所谓国家主义，所以人们称其为国家主义派。后来曾琦曾坦率地供认这次建党的动机，他说："时中国共产党已成立，得俄之援助，大事活动于国内外，而国民党孙中山又有联俄容共之议。余深知大乱将作，国命或为之斩，图决意另组新革命党，于是中国青年党乃于是年十二月二日成立于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街。"

国家主义派初期，其活动中心在法国，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等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少年》、《赤光》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批评、驳斥了他们谬论，"使国家主义派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完全孤立。进步分子都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1924 年国共合作成立以后，曾琦一伙预料国内的共产活动定会日益增强，于是决心回国与国际共产党奋斗到底，对付国际共产党在中国的动乱。

1924 年秋，曾琦、李璜等陆续回国。他们把活动中心从国外转移到国内，开始在国内建立组织，创办刊物。先后在许多省和大城市建立了 30 多个国家主义小团体，出版了 30 多种报刊和小册子。在上海，他们以中华书局、东南大学、法政大学为据点，从事反革命活动。又因他们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喉舌，开展所谓醒狮运动，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作"醒狮派"。

1925 年 12 月 23 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并在北京、南京、武汉三地成立了分会，扩大其反革命活动。1925 年底和 1926 年初，其反动气焰达到顶点。他们勾结军阀孙传芳、张宗昌、吴佩孚、张作霖等，破坏北伐战争和国共合作，攻击革命群众运动，同时大量宣扬其国家主义的反动理论。

国家主义派的谬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在国家问题上，他们鼓吹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观，否认国家的阶级性，提出全民政治，全民福利国家，反对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

李璜将国家定义为：国家是“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有一定的主权，而此人民，本其自爱的心情和其生活的条件，此土地也，不容人侵夺，此主权也，不容人干犯”。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国家的典型解释，所谓国家三要素（人民、领土、主权）说。从所谓共同的情感、共有的精神出发，国家主义派得出结论：“国家者，全国人之国家，不是几个人或一阶级的人所能私有的”，“国家主义者主张全民政治，而反对独裁或一阶级的专制”。他们认为，国家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或阶级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个总体。国家是保卫种群最善的一种制度，其作用就在于用实力拥护道德，谋群众的生活，防止阶级斗争。国家无限期的存在，是永恒的。只有全民政治，才能实现国民政治机会和经济生活的均等。主张维护打着共和招牌的北洋军阀政权，以奠国基。

他们不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而且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鼓吹自然起源论，强调国家的产生是自然的。认为国家最根本的要求是组织，而由于人性的要求等，人类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

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否认我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鼓吹全民革命，宣扬阶级合作。

他们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发生阶级分化及对抗的可能。因为中国旧式的封建阶级早已因政治的平民化而消灭，新式的资产阶级又因产业落后而无从发达。中国近代实业不发达，还没有形成劳资两阶级，因而讲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他们把对内开展阶级斗争与对外开展反侵略的民族斗争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开展阶级斗争会削弱对外反侵略的力量。李璜说：“在今日这种强邻思逞、国贼专横的时代，国家主义者更要极力团结全民之力以共抗恶魔，因此他主张阶级合作，而反对阶级战争，阶级战争是非，我们在此估不具论，而在处境如斯的中国内，国家主义者认为主张阶级战争者，算是药不对症，于国事有损无益”。

他们还竭力反对国共合作，认为既要合作，就不能讲阶级斗争。污蔑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阶级斗争是“削足适履”，由此挑动国民党右派争端、破坏合作，使社会秩序混乱动荡，减少对外反侵略的战斗力。主张在国家主义的



旗帜下，协力进行全民革命。

在革命的目标问题上，盗用“五四”爱国运动中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内除国贼”不是反对卖国军阀，他们所谓国贼，是指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他们胡说段祺瑞有满心爱国赤诚，凡反赤的军队都是爱国的军队。把共产党作为“国贼”的主体，骂共产党是吃人者，鼓动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外抗强权”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所谓强权，是指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们声称在中国没有帝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张照旧遵守对外国一切既成条约。但对于苏联却极力反对和咒骂，并污蔑苏联友好者为“苏联之走狗”。

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宣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岂得为友”的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不赞成依人为活的国际主义。污蔑社会主义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把孙中山的联俄政策说成是“引狼入室”。他们反对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认为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只能表示国民肤浅无知，对于国事没有相当的步骤，反会引起外国列强共同谋我们。

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并以全民革命、全民政治相标榜，以醒狮运动相号召，大造舆论，在一段时间内，欺骗和蒙蔽了很多无知与落后的青年。为了肃清国家主义派的流毒，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刊物发表大量文章，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阐明了国家的本质，批判了超阶级的国家观，驳斥了国家主义派鼓吹“全民国家”，反对无产阶级的谬论。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者压服被统治者的工具。肖楚女在 1925 年 10 月发表的《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中指出：“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亡；国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阶级——得胜阶级用为工具。有产阶级专政，是用国家这个东西保持自己的地位，役使他人，使阶级继续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是使生产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将一切生产工具归之于社会共有——使阶级消灭”。国家主义派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宣扬所谓均平利益的全民国家，纯属欺人之谈，在现实阶级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恽代英明确指出：“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

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国家主义派真正所爱的“国”，乃是北洋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这样的国家，不但不爱，并非把它推翻不可。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领导人民，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批判了国家主义派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肖楚女在《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文中指出：只要“私有财产制不废除，资本生产制不改变——一切生产机关不公之于社会而为私人所占有时，阶级是自然要生产出来，而且要分化发展得愈明显的”。他列举了“二·七”惨案、顾正红被杀等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以及工人反抗斗争的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不但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且劳资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以及他们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揭穿了国家主义派否认我国社会存在阶级分化和对立的谬论。共产党人还深刻地揭露了国家主义派宣扬阶级合作、“全民革命”的反动实质，指出这是国家主义派企图使无产阶级甘受资产阶级压迫，成为很驯服的甘被剥削者，不再为谋求自己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这也足以表明他们完全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对于国家主义所标榜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人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揭露。共产党指出：他们主张“‘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之后，再来收回一切主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原来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和段祺瑞的‘外国崇信’一样的，‘照旧遵守一切既成条约’”！国家主义派如此疯狂地反对共产党，充当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鹰犬。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说：“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政治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为的是“维持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统治”。中国共产党人还进一步揭露了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本质。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大地主资产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朋友，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国民党左派也参加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1926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反对国家主义派命令》，指出国家主义派"甘受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官僚豢养，对于本党主义及国民政府之设施，日事污蔑破坏"，要求各级党部、党报一致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揭露和斗争，经过多年论战，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了，广大青年和革命人民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也日益认清了他们的反动面目。到 1926 年下半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许多国家主义派小团体便纷纷瓦解了。从此国家主义派的影响便日益缩小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斗争，对于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这场斗争使中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就必须分清敌友，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场斗争不仅彻底孤立了国家主义派，还打击了国民党右派进行分裂革命的阴谋篡权活动，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保证了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在斗争中进一步广泛深入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锻炼、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等。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在同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发展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观点。气势磅礴的国民大革命，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课堂，从中他们学到了许多新鲜的经验。但是，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还把许多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要求他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在马列主义进一步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党的理论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阐明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来的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作了初步的阐明。五卅运动后，在迅速掀起的全国大革命风暴中，各个阶级、阶层和各派政治势力都在革命的历史舞台上，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统一战线中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等的出现，表明了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尖锐化。在这种革命以及各种反动思潮极其尖锐的斗争中，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要求他们从理论上对国民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领导权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等问题，给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到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前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及时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实际经验，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对国民革命的对象、任



务、领导权及动力等问题作出广泛的论述，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是大革命时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

在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谁能担任革命的领导者？对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四大”之前，中共的少数杰出领导者已有所论述和认识。1923 年 2 月，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权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于指导权”。1924 年 2 月，李大钊指出：“现在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同年 7 月，李大钊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介绍中国情况时说：“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及运动的领导权，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这表明李大钊已经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必须在实际斗争中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权。

国共合作后，依据实际斗争经验，党的主要刊物连续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专门论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共早期职工运动的著名领袖和理论家邓中夏，根据亲身参加工人运动的经验，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认识更为明确，发表了不少论述。1924 年 11 月，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民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所以“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中共“四大”上，比较集中地总结了党领导工农运动的经验，提出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当时的斗争经验，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在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邓中夏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争夺领导权不仅局限于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

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一点一滴以至全部的取得”。他特别强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参加政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之中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权“预为准备”。周恩来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达到帝国主义”。

毛泽东是党内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人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也应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1925 年 12 月，毛泽东在首次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逐一进行分析。他在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理由：“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希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还仅限于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具体目标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共“四大”通过的《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认为“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1925 年 2 月，邓中夏明确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无产阶级要取得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加强对农民斗争的领导。他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说：“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积极参加，哪有希望?”“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五卅运动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和支持，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探索农民问题。李大钊指出：“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中国共产党内最早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家彭湃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好朋友”；工人



与农民“互相联合、互相团结，然后彻底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农民的重要地位以及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开始改变党的三大把无产阶级政党在群众运动中的独立性仅限于工人运动的认识，提出了在农民运动中独立进行宣传和开展支部工作的任务。

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对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在总结湖南、广东等地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对各个阶级以及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用阶级的观点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部分，并指出由于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也不同。精辟地指出，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贫农问题，特别强调了贫农的革命作用。他还高度评价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伟大作用。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号召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开始研究农民问题，组织农民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很不确定的。在中国资产阶级中，买办资产阶级是反革命势力，小资产阶级基本上属于革命的动力，而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中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

在党的二大、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中国实际出发，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妥协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上的阐述，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

在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后却又妥协动摇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性在实际斗争中比较充分地表露出来了，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较为深入地剖析这个阶级的特性提供了客观条件。五卅运动后，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大大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认识。

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剖析，作出了重大贡献。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中国资产阶级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和中国革

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科学分析，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为党后来深入地认识和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及时地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等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民主革命，与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以及辛亥革命相比较，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性质上有无变化等问题，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明确的认识。1926 年 1 月，毛泽东总结与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经验，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在认识上有所突破，较为深刻地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特点和在性质上的新变化。毛泽东指出：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国家。……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认识到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已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国民革命同过去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都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表现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清了革命的首要问题——敌友问题。他们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阶级的“领袖”；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和帮凶；北洋军阀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



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些反动派都是我们的敌人，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因此，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而要实现国民革命的任务，就必须组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

中共“二大”和“四大”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都曾涉及到。“四大”之后，共产党人继续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指出：“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在中国，企图建立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只能是一种幻想。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论述，初步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设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推翻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争取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时的党也处于幼年时期，政治上还不成熟，有些问题还不明确、不完善。尽管如此，这些光辉的思想都代表党内的正确主张，表明他们已提出了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吴佩孚为了稳定其统治，一方面口称民主，鼓吹“法统重光”，另一方面却极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自 1923 年起就不断发动对湖南、福建、四川等省的战争，又勾结广东的陈炯明、邓本殷等，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同时还加紧对广大工农群众的压迫。1923 年 2 月，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这就彻底撕下了他“保护劳工”的假民主面具。6 月，直系军阀便演出了“逼宫”丑剧，随后曹锟以每票五千元当上了贿选总统。

自曹锟贿选总统、僭窃北京政权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下，在全国迅速地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反直运动。同时，由于曹、吴穷兵黩武，妄想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迷梦，因而也加剧了直系军阀与其他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在全国人民反贿选的高潮中，反直系的各派军阀也乘机打起反贿选的旗帜，纷纷通电声讨曹、吴。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发出了不承认曹锟总统的通电，东北的奉系张作霖起而相应。在这种情势下，加之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影响，直系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变化。

直系将领冯玉祥，由于不满曹、吴的所作所为，并且受到吴佩孚的排挤，开始表示倾向革命。辛亥革命时，冯玉祥曾参加过滦州起义，1915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和 1917 年张勋复辟帝制的时候，他也曾参加了当时的反复辟活动。他受到过孙中山的革命影响，并且同孙中山有过往来。1920 年，直皖军阀为了争夺湖南而开战时，冯玉祥部原驻扎湘西，奉命移往湖北，北上时被皖系阻于堪家矶，处境困难。这时，冯玉祥曾作书给孙中山表达敬慕之情。9 月间，孙中山在征得冯玉祥同意后，即密遣徐谦、钮永建持信到堪



家矶慰劳冯部，并赠送革命刊物，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对此十分感激，曾派秘书任佑民赴广东看望孙中山，并表示“只要他用得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率部攻打河南奉军，为直系击败奉系立有战功。奉系失败后，北京政权为直系军阀所完全控制，冯玉祥受任为河南督军。但是，由于受到吴佩孚的猜忌，使得吴、冯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吴佩孚排挤打击冯的势力，并企图吞并他的部队，不到半年，冯玉祥即被排挤出河南，调任为有职无权的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乘机将所属陆军十一师开进北京，驻扎南苑、通州一带。自此以后，冯玉祥对曹锟的贿选和吴佩孚的专横跋扈日益愤慨。

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中央局报告中，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特别分析了直系军阀内部的分化，指出：“在直系方面，因本系胜利及曹锟左右亲信忌妒吴佩孚的缘故，也形成冯王齐（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联合和吴佩孚之对抗”，报告在具体分析了直系军阀所面临的种种内外矛盾之后，认为：“直系首领曹锟当然没有久握政权之可能”。会议还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应使国民党的宣传政策注重反对帝国主义，指斥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尤其要注意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的部队等。这些分析和决议，对于分化直系、推动冯玉祥倾向革命，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也十分重视争取冯玉祥的工作。早在滦州起义时，李大钊和冯玉祥就曾一起共过事，有过革命的友谊。当冯玉祥受到吴佩孚的排挤，部队陷入粮饷匮乏的困境时，李大钊就曾亲往南苑陆军检阅，同冯玉祥一起商谈摆脱困境的对策，争取冯玉祥倾向革命。结合当时北京政界注意的问题，李大钊热情地向冯介绍了十月革命，还谈了南方的革命形势，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当前的策略。冯玉祥十分敬慕李大钊的人品、学问，这次谈话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对冯玉祥的思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孙中山出于一种斗争策略，为了实现其讨伐曹、吴，统一全国的事业，加强了与各派反直势力的联系。在通电声讨曹锟贿选的同时，与张作霖、卢永祥形成了反直三角同盟，以便打击全国最大最反动的军事集团。同时，孙中山还注意在北方寻求反直的革命力量，特别是主要争取冯玉祥。冯玉祥对此曾有记述：“在此时期，国民党中的朋友亦往返颇密。一次孔庸之（祥熙）先生来看我，带有一份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给我，说

总理把手写的这书送给你，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此后，孙中山还曾多次派代表会访，共商反直大计。

这时，直系首领吴佩孚的“武力统一”计划，主要是用来打破反直的三角同盟。在北方，派重兵把守赤峰、朝阳、山海关一线，防备奉军南下入关；在南方，派孙传芳攻占福建，企图一面与陈炯明勾结攻击广东，一面形成由福建、江苏、安徽到江西的对浙江的包围圈，以围攻卢永祥。到1924年5月间，孙传芳已将皖系军人臧致平、杨华昭等部驱出福建，占据了福建全省，从而实现了从四面包围浙江的计划。9月3日，在曹、吴的指示下，直系军阀孙传芳和齐燮元以卢永祥收容由福建退出的藏、杨残部为借口，从福建、江西两面发动了对浙江卢永祥的进攻，于是爆发了江浙战争。

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奉系张作霖即利用这一时机通电谴责曹吴兴兵攻卢，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出兵讨伐曹吴。直系方面吴佩孚也于洛阳召集部队参谋长会议，决定对奉作战方略，第二次直奉战争一触即发。

因和奉、浙两方有反直同盟的关系，在江浙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即于9月4日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北伐，组织北伐军。5日，发布大元帅令，宣布“尅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孙中山将大本营移往韶关，亲赴督师。广州设留守府，由胡汉民以广东省长兼代大元帅职务。9月18日，以国民党名义发表了《北伐宣言》，反映了孙中山坚持反帝反军阀的正确立场。但是，广东这时正面临商团叛乱事件，根据地尚未统一，北伐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广东革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商团叛乱，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所以，这次北伐的决策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也没有能够实现。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直系内部又形成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反吴的三角同盟。冯、胡、孙的结合不是偶然的，他们都遭受曹、吴的排挤和打击，都是直系内部倾向民主革命的势力。1923年冯玉祥曾通过马伯援回复孙中山，表示时机一到，定会采取举动反直。江浙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认为时机已到，为了增强反直的力量，便加紧与孙岳、胡景翼联系。

孙岳、胡景翼均系直系将领。孙岳，时任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与冯共谋滦州起义，从此与冯往来不断，两人不但私交深厚，在革命的主张上亦志同道合。曹、吴一直把孙看成“洪水猛兽”，百般排挤，使之不能立足，孙对吴的骄横专断早已十分不满。1924年



9月10日，冯玉祥在南苑举行昭忠祠（亦称劝忠祠）落成典礼。孙岳前来致祭时，冯、孙在昭忠祠坟地举行了“草亭密议”，商定共同视机倒吴，并决定由孙岳负责联络胡景翼。胡景翼，时任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于陕西起义，护法战争时在三原独立，组织靖国军。1921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胡景翼率靖国军改编为陕西第一师，自此与冯交往甚密。第一次直奉战争，胡景翼随冯玉祥进入河南，冯离豫进京，胡驻章得（现为安阳）、顺德（现为邢台）。吴佩孚拟调胡景翼部南下进攻广东，胡不愿与南方作战，迟迟不肯开拔，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便在粮饷等问题上处处与胡为难，胡陷于困境中，正欲有所举动。这时孙岳来见，密商与冯联合反直，经过孙岳的洽谈，胡景翼立即赞同合作，并派代表孙维俊入京见冯。冯玉祥向孙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吴佩孚为排除打倒异己，为所欲为，对奉战事目前一触即发，这种战事我们要誓死反对。第二，我们需利用形势，视机而动，将来如果成功，必须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第三，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此后即当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并能帮助民众。对此孙维俊表示完全接受，即返回复命。随后，胡景翼以就医为名，入京与冯会谈，再次表示接受冯提出的三点意见。这样，胡随与冯、孙结成了相机倒直的反吴三角联盟。因此，不待战争爆发，直系内部已是分崩离析的局面。

1924年9月15日，奉军趁江浙战争相持之时，分向热河和山海关方面出动。由于当时热河方面的直军较为空虚，而且为了预防直军以重兵出朝阳断奉军后路，奉军采取“集结主力的极大部分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准备在此给予直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为了适应这一战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将所部奉军编为6个军，总兵力约25万人，向山海关前线进发。

在奉军发动进攻后，直系方面曹锟急电吴佩孚入京主持作战任务，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将所部编为3个军及十路援军，向奉军进攻。这样，沿着热河到冀东的路线上，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10月12日，浙江卢永祥在孙传芳和齐燮元的进攻下失败，宣布下野。江浙战争失败虽使反直方面受到挫折，但是直奉战争仍在山海关一线激烈进行。

从9月16日起，战斗首先在热河地区揭开。奉军先从热河方面发起进攻，奉军第二军李景林、张宗昌进入热河后，进军迅速，先后占领了开鲁、

朝阳、凌源等地，其前头部队直逼冷口附近。同时，骑兵团亦先后占领阜新、建平，直驱赤峰，直系第二路王怀庆部溃不成军。

直系担任防守热河的另一部是冯玉祥部，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热河方面的军事指挥。胡景翼任援军二路军司令，驻通州待命。冯玉祥借直军集结前线，北京防务空虚之机，向曹锟推荐由孙岳率部人京担任北京警务副司令，曹锟欣然同意。

吴佩孚对冯部存有戒心，指定其行军路线由古北口经滦平、承德、赤峰向开鲁前进，以迎击奉军热河北部。此路遥远险阻，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给养也无法解决，部队前进愈远，危险愈大。曹、吴这种处置，居心叵测，企图以此使冯部陷于绝境。此外，吴佩孚还派王承斌、胡景翼等随行监视冯军，"如有何异动，即就近解决"。这就更加坚定了冯玉祥最后倒戈的决心。

冯玉祥受命后，故意行动迟缓。9 月 21 日，其先头部队才开始出发，24 日司令部离北京。开拔各部每日行军二三十里，28 日到密云，10 月 1 日抵古北口，又以筹措给养为名停下来。在古北口，冯玉祥一面注意战局变化，一面加紧与各方联系，暗中布置倒直事宜。在此期间，张作霖曾派代表马炳南前来与冯秘谈合作反直办法。双方约定：第一，推倒曹、吴后，奉军不得人关；第二，请孙中山北来支持大计。奉军与冯玉祥取得谅解后，确定以平泉为缓冲地带。奉军遂将其进攻赤峰的兵力大部分抽出加强山海关一线，向吴佩孚的主力进攻，从而使直军在整个战局方面日益陷于不利地位

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是直奉争夺的主要战场。由于双方均配以嫡系精锐部队，因此战斗十分激烈。10 月初，奉军开始以猛烈炮火向直军发起全线进攻，直军因事先占领有利地形，使奉军急攻不下，双方伤亡惨重。激战多日后，奉军乘直军不备，首先突破黄土岭口，随后攻破九门口。得知九门口失守，吴佩孚甚为震惊，遂于 10 月 19 日，亲自率领直辖劲旅第三师到山海关督战指挥。吴到山海关后，影响全局的战略要地石门寨又失守，直军日趋被动。吴遂改变敌后登陆计划，将海运直系精锐部队于秦皇岛登陆，投人山海关战场。

正当山海关两军激战，冯玉祥于滦平接到直系总部参谋长张方严打来急电，大意是："此间形势紧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催促冯部迅速前进，电中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之语。这时，冯军留守北京司令兼兵站总监蒋鸿遇亦电告冯："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



台一带所驻之第3师悉数调往前方增援。”根据这些情况，冯认为这是举事的有利时机，遂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会议，决定回师北京，推倒曹、吴。吴佩孚派到冯部的监军王承斌，也甚为不满吴的所作所为，因而对冯玉祥的行动采取中立的态度。10月21日，当冯玉祥进一步证实直军主力前方失利的消息后，开始行动，即命鹿钟麟率部向北京进发，会同留守北苑的部队一同入城；同时命胡景翼部南下攻占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止吴佩孚率部西向。10月23日，在孙岳的配合下，一枪未放，迅速占领北京城，接管了北京全城防务，解除了曹锟的总统府卫队及其亲信曹世杰所部的武装，并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发动了北京政变。至此，控制北京的中央军阀政权迅速瓦解。

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政治军事会议，胡景翼、孙岳、王承斌、刘骥、鹿钟麟、李鸣钟等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讨论改革政治问题，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来主持大计，又主张先请段祺瑞入京暂时维持政局，会议还决定停止曹锟的总统职权，成立摄政内阁，并向曹锟提出三项要求：一、下停战令；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自动退位。在讨论军事问题时，会议决定将各部暂编为三个军，正式定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在发动北京政变当日，冯玉祥就连续发出三个通电，提出“休战言和”、“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以及“五条建国大纲”等主张。10月28日，冯、胡、孙等又联名发出通电，提出召集和平会议的主张。冯提出的建国大纲的主要内容是：一、打破雇佣体制，建设廉洁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般设施，务求民稳；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掠夺欺诈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这个建国大纲否定了军阀政府误国伤民的反动政策，是一个进步，但是它提出的一些主张过于笼统和模糊，缺乏鲜明的革命内容，没有号召力。

吴佩孚于10月23日接到冯玉祥主和通电后，立即在秦皇岛车站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亲往天津主持讨冯。随即率第三师和二十六师各一部，约万人自山海关乘车回救北京。奉军则乘机向山海关直军主力发起猛攻，先后占领了秦皇岛、滦州、塘沽等地。至10月31日，直军主力除少数败退天津外，大部为奉军所灭。这时，吴佩孚将残部集中于天津附近的北

仓、杨村、军粮城等处，并电苏、浙、鄂、豫等省求援，以便挽回局面。但是，各省直系援军未及出动，冯玉祥部已先机部署廊坊一线。11 月 3 日，在国民军的攻击下，吴佩孚走投无路，只得率残部 2 000 余人乘货甲运输舰南下，到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所在的长江流域，图谋东山再起。至此，历时五十余天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失败而告终。

当冯玉祥指挥对吴作战时，11 月 2 日，成立了摄政内阁。同日，曹锟被迫宣布辞职，令内阁行使总统职权。摄政内阁成立后，根据冯玉祥的提议，首先修改《关于清帝逊位后之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

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和对吴作战过程中，使国民军得到了迅速发展，否定了军阀政府的一些误国伤民的反动政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他作为一个旧军人，发动这次政变的主要目的还只是推翻曹吴的统治，对于国民革命的意义理解不深，对军阀本质认识不清，为了一时权宜之计，又邀请段祺瑞暂时维持政局，这就使北京政变后的形势更加复杂化了。张作霖在推倒曹、吴之后，背弃“奉军不得入关”的诺言，不但派大军入关，而且与段祺瑞互相勾结起来控制北京政权，排挤冯玉祥和国民军，继续压迫人民，迫使冯玉祥不得不于 11 月 25 日、12 月 3 日、12 月 5 日连续提出辞职。1925 年 1 月，冯玉祥赴张家口就职，北京政权完全为皖系和奉系势力所控制。至此，轰动一时的北京政变，以皖系和奉系军阀的卷土重来而结束。



孙中山北上

孙中山在获悉北京政变成功的消息后，十分兴奋。他认为，虽然这次北京政变“余孽未靖，固当悉予扫除，而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孙中山经过“权衡轻重”，毅然决定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

由于冯玉祥曾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北京政变后表示倾向革命。他曾说：“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名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举行的政治军事会议上，主张立即电邀孙中山北上，但未取得一致意见，会议仅作出“公请段芝泉（即段祺瑞）出山，以资过渡”的决定。

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当天，连续发出三个通电，提出“休战言和”、“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以及“五条建国大纲”等主张。在以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联名发出的主张和平通电中，邀请包括孙中山、段祺瑞、梁士诒、岑春煊、章太炎等在内的朝野知名人士，以及各省督军、督办、省长、护军使、各军司令、镇守使、师旅长等，会商一切政治善后问题。

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在收到冯玉祥等向所谓“全国贤达”发出的通电后，即致电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王承斌等，祝贺北京政变成功，并表示拟即日北上共商大计。电文称：“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当冯玉祥接到孙中山的贺电后，即于11月1日复电，热诚欢迎孙中山北上指导一切。冯玉祥在电报中，正式提出了邀请孙中山北上。随后，冯玉祥又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冯玉祥在信中再次表示：这次回师北京，“联合所属各部，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为国为民效用。先生

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希即日北上，指导一切”。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等的邀请电后，即于11月4日复电，允即北上。此间，冯玉祥还多次电促孙中山早日北上。张作霖、段祺瑞因在反直战争中与孙中山联合，也为了欺骗人民，企图笼络和软化孙中山，表面上也不得不分别致电孙中山，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

10月30日，孙中山决定北上谋求国内和平统一后，由韶关大本营返回广州，部署北上事宜。由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负责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孙中山为了在北京召集会议，与北方人民接近“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北上谋求国内和平统一，这是孙中山晚年政治生活中最后一次的重大考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这次北上，孙中山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性。

11月3日，孙中山在同黄埔军校师生的话别中，论述了北上的原因和目的。他认为，北京政治浑浊，应当彻底洗涤，必须坚持解散救国会，改定宪法，革除弊政等，他到北京后并不能马上发起一个中央革命，但是借这个机会可以做宣传，联络各省同志，成立一个国民党部，从党部之内成立革命基础。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孙中山在离粤北上之前进行了北伐的军事部署。孙中山要求北伐军前进到武汉，与北方的运动相呼应。孙中山在11月12日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中，指出北京政变“有许多复杂的分子在里头，革命党虽然是原动力，但其中大部分都不是革命党”。表示这次北上，是要“去宣传主义，组织团体，扩充党务”。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孙中山把重点放在发展革命力量上面，而不再是对军阀势力抱有幻想了。

孙中山在离粤北上前，于11月10日，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即《对于时局之宣言》）。在宣言中，孙中山谈了国民革命的目的、政纲，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的政治主张，特别指明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装，结束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宣言明确宣布北上的目的是：对内要“推倒军阀”，使“曹吴复灭之后，永无继起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写道：“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孙中山在对当前时局的主张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提出的召开国



民会议的口号，主张召集有各人民团体，反对曹吴的各军及各政党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以共同解决中国之统一和建设问题。宣言在最后指出："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到达。凡我国民，盍兴乎来。"这里，孙中山着重强调了人民直接参与政治，深信国民的自决是国民革命的要道。"北上宣言"坚持和发展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思想，表现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晚年有了重大进步：由主张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人民民主共和国；由对帝国主义军阀抱有幻想发展到相信人民，主张武力与人民结合，就一定才能打败帝国主义与军阀。孙中山的北上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热烈欢迎。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上和"北上宣言"。在孙中山北上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进一步发起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普及的阶层极为广泛，工农商学都参加了运动。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对内成立人民政权，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11 月 13 日，孙中山偕宋庆龄及随行人员汪精卫、邵元冲、李烈钧、陈友仁等 30 余人乘永丰舰离粤北上。次日抵香港，改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号赴上海。11 月 17 日，孙中山一行到达上海，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帝国主义者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仇恨和畏惧，竭力反对孙中山，妄想阻止他在上海登岸和进行政治活动，声言要驱逐他出上海。当上海群众涌上街头欢迎孙中山时，法租界当局竟出动巡捕驱散群众，并捕去指挥者数人。在孙中山抵沪的前一天，上海的英国《字林西报》和美国《大陆报》写文章骂他，要快将他赶出上海，不许他在上海过冬等。英国的《字林西报》曾发表一篇短论，声称："上海不需要孙中山，应阻止他登岸"，并叫嚷，"孙中山是广州大本营的元帅，一举一动，都负有政治上的任务。上海租界之内，完全是商务性质，负有政治任务的大元帅，住在这样的地方，是不是相宜?"美国的《大陆报》则更加恶毒地叫嚣："留他在上海过冬，无论如何将是我们的错误"，并发表《条约神圣》的专论，绝不理会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主张，不能废除中国不平等条约，公然为不平等条约辩护。对此，孙中山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他痛斥帝国主义这是"太不自量"，严正指出："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住在上海的那些外国人，都是客

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无论干什么，客人完全不能干涉"，"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吾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之飞扬跋扈"，表示要不惜一切努力收回租界。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卑鄙的挑衅，这种无耻的谩骂，不仅没有动摇孙中山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反帝意志。

孙中山不顾帝国主义的种种破坏，于11月19日，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坚定地宣告："我这次北上，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还说："我负着这种责任，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他希望全国人民做他的后盾。这次谈话，表现了孙中山坚强的原则性，表现了他坚定的、毫不妥协的政治立场。

11月21日，孙中山离开上海。因津浦路受战争影响不通车，上海至天津的轮船头等舱位客票又已售完，于是决定取道日本乘日轮赴天津。途中经过日本的长崎、神户、门司等地；广泛地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旅日华侨和中国留学生，孙中山多次作了演说和谈话，宣传对于时局的主张。23日，在长崎孙中山接见日本新闻记者，针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谬说，指出这是外国人在做梦，绝不可能成为事实，因为"中国国民更有强硬之抵抗"，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24日，他在神户会见神户、东京、大阪各报记者，强调"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不排除扰乱中国的外国势力，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就绝不可能实现。翌日，在神户、东京、大阪三埠国民党联合组织举行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又具体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强调解决中国问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12月1日，孙中山在与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够赞成南方的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于中国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调和。若是北方没有这个胆量来赞成南方的主张，中国不能脱离奴隶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时调和，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孙中山在途经日本期间发表的言论，表现了不妥协的立场，号召大家支持他北上的革命主张。

这时，北方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北京成立了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受到排挤，因而孙中山北上面临的对手，已是奉系张作霖与段祺瑞军阀势力了。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后，张、段又派代表又打电报，催促北上。他们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欺骗全国人民，并企图软化孙中山



以分裂革命营垒。孙中山在途经日本期间，就已敏锐地觉察到对北方政局的变化。在日本发表的演说和谈话中，曾指出："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到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

12 月 4 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这时法帝国主义的领事不许他通过法租界，更不准许他住在法租界。"中山先生到达天津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更甚了。……天津的欢迎群众在租界上游行不得自由；国民党发传单的同志，被法捕房拘捕；国民饭店的宴会，中山被法捕房禁止出席，以后出席者还只准有欢迎词与答词，不准有演说，大舞台的演讲未得举行；国民党的直隶省党部与天津市党部被法捕房查抄"。但是天津人民热诚欢迎孙中山的来临。中共北方党组织特派赵世炎专程赴天津迎接。中共天津地委曾联络天津各团体，发起成立了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先生筹备会，当孙中山等抵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今营口道东口）时，天津各界五十多个团体 2 万余群众前来欢迎。当晚，举行了欢迎孙中山的茶会，孙中山因肝病发作未能赴会，派代表出席。12 月 6 日，邓颖超、马千里等数十人代表天津人民赴张园慰问孙中山，祝"愿孙中山先生早日痊愈，而能与全体人士相晤见"。孙中山在津治疗期间，中共天津地委还组织党员、团员和活动分子，到学校、工厂和繁华市区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北上的意义，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2 月 8 日，孙中山在津发表宣言，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乃在为人民之利益而谋中国之自由而独立，帝国主义者陷我国为半殖民地，吾人起而反抗之，则抱负此种志愿，实属必须也"。革命要获得成功，"毒蛾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须毁灭而无疑"。

段祺瑞为了讨好帝国主义，于 12 月 7 日发表了"外国崇信"的卖国声明，并提出召开"善后会议"，对外尊重不平等条约，对内召开军阀官僚政客的第二个"筹安会"，这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愤慨。孙中山坚持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主张，使一心想讨好帝国主义的段祺瑞政府十分尴尬和恐慌。孙中山抵津后，段祺瑞派叶恭绰、许世英为代表赴天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叶恭绰等人，厉声质问："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 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表示入京后要反对段祺瑞的所作所为，这次震怒也加剧了孙中山的肝病。

12 月 31 日，孙中山在数十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入京。在孙中山下

榻的北京饭店门前，中共北京地委组织群众举行了欢迎集会，表达了北京人民对孙中山的欢迎和热忱爱戴。这时，孙中山由于病情沉重，已无法向群众直接讲演。他先后向北京人民发表了书面谈话和《入京宣言》，昭示此次北上的目的。

孙中山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已身患肝癌。在重病中，他仍然领导国民党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在病榻上还亲自拟定了对段祺瑞的复电，指责其包办“善后会议”的谬误。2 月 24 日，孙中山口授遗嘱及家事遗嘱，由汪精卫笔记，并以英语口授《致苏联遗书》，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笔记。3 月 11 日，孙中山在遗嘱及遗书上签字，并激励周围的人要革命到底。1925 年 3 月 12 日，这位为改造中国耗尽了毕生精力的伟大革命先行者，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行辕与世长辞，终年 59 岁。

孙中山的《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体现了他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这两个历史文献，是孙中山留给后世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宝贵财富，成为中国人民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痛击孙中山革命事业背叛者的有力武器。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深切哀悼。北京各界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先后到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的孙中山灵堂致祭。中国共产党唁电国民党中央，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李大钊、林祖涵等参加了守灵和执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孙中山的逝世也发表了致中国人民大众书，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在莫斯科、东京、巴黎、伦敦、纽约、旧金山以及东南亚等地，也都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

孙中山的一生是伟大的、战斗的一生，真正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他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尤其是在晚年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他的思想和实践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国民会议促成会及反帝废约运动

孙中山北上途中，多次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谋求全国真正统一的重要言论，一再强调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号召民众赞成并支持国民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号召与推动下，从1924年10月到1925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全国很多省区普遍地组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在1923年7月发表的《对于时局之主张》（即中共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针对曹锟贿选，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强调“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由此国民会议所产生之新政府，须以真正国民革命的势力，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然后才不愧为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这个国民会议的主张当时尚未被国民党接受，因而还没有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使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旧军阀被推翻，新军阀政权尚未巩固。在这种有利情势下，1924年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次对于时局之主张》中，再次指出：挽救目前危机之方法，应当是本党“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北上和他所提出的主张给予坚决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发起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在全国人民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推动下，国民会议运动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1924年11、12月间，广州、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徐州、济南、张家口和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的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发

表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民众团体首先热烈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1924 年 11 月 23 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市民协会、上海工界联合会、上海店员联合会、天潼福德两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大学等 62 个团体发表通电，指出：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系救济中国的良药，希望全国各工团一致赞助。上海总商会也通电表示，此为全国公意，呼吁全国商界“务祈群起要求”。25 日，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发出通告：“上海为全国舆论中心，民意总纽”，对于召开国民会议，“应首有表示为全国倡”。随即成立了上海各工团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12 月 14 日，上海各界 143 个团体联合举行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推举邵力子、郭景仁、刘清扬、向警予等 21 人为委员。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表了许多带有指导性的政见，并发起组织全国性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继上海之后，各地群众团体也开始行动起来，纷纷致电孙中山，表示：此次对时局之宣言，尤得广大民众的同情，希望贯彻初衷，根据国民党宣言及政纲努力进行，全国同胞誓为后盾。12 月下旬以后，国民会议运动开始进入高潮，遍及全国 20 多个省区的大中城市及许多县份纷纷响应，都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许多共产党员都参加或领导了当地的国民会议运动，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农商学各界和妇女、青年等也都积极参加，运动普及的阶层极为广泛。

1925 年 1 月 4 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农会、全国大学联合会、北京教育会等 300 余团体先后加入。促成会选出顾孟余等 40 人为干事，并推举顾孟余、朱务善为总务主任，李一鸿、路友于为文书主任，赵世炎、吴时英为宣传主任，杨理恒、胡南湖为交际主任，于国珍为会计主任。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以后，发行大量特刊与各地促成会交换意见，组织国民俱乐部与各界群众联络，还开展了大规模的通俗讲演活动，揭示了国民会议运动的深刻意义，极受民众的欢迎。

各地国民会议成立以后，大多通过宣言、通电等形式，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当时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宣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促成会对国民会议的共同要求，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强烈愿望。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与军阀的独裁统治根本对立，因而必然遭到军阀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段祺瑞为了抵制和破坏国民会议运动，并使其独裁统治合



法化，提出召开善后会议的主张，并于 12 月 24 日正式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根据会议条例规定，能参加会议者根本没有人民团体的代表，除孙中山外，几乎全是各地的军阀头目、官僚买办、土豪劣绅和土匪头子。善后会议人员的组成，充分说明了这是一个完全维护军阀官僚利益的反动主张，是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关于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的主张背道而驰的。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揭露了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反对。孙中山在北京抱病发表了《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指出会议必须有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在善后会议将要召开的前夕，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对善后会议所做的决定中指出：力争人民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应占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人民代表须由人民团体直接选派；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亦应选派代表参加。广州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举行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对善后会议，拥护国民会议。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和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国民党中央因此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1925 年 2 月 1 日，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正式召开了御用的善后会议。为了反对这个会议，贯彻国民会议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倡导下，3 月 1 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北河沿）举行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到会正式代表 80 余人，来宾及听讲者数百人。公推顾孟余为主席，宣布开会宗旨，指出现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三种意义。接着汪精卫、林森、徐谦、李大钊等以来宾身份相继讲演。孙中山在重病中得悉大会开幕，极表欣慰。开幕式最后在全体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万岁”、“国民会议万岁”等口号中结束。

3 月 10 日，由于各地代表已经到京者计 59 处，凡 130 余人足开会法定人，遂在北长街北京教育会举行正式会议。大会选举顾孟余、王乐平、朱务善、江著文、赵世炎、胡南湖、曾醒、李天和、刘候武等九人组成主席团，安体诚、郭景仁为正副秘书长。出席这次大会的成员，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包括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商人、实业家、新闻记者和律师等。“这样从民间产出的会议，在我国实不易见，或者竟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先声”。

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聚集的机会，应当详细讨论中国衰弱祸乱之真正原因，并提出具体的救济方案，以告知于民众，

促进国民运动的继续发展，争取真正的国民会议得以召开。"因此，大会决定讨论各种国际与国内的问题，而定出下列的范围：（一）国际问题。其中包含：（1）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2）不平等条约及特权；（3）租借地与租界问题；（4）关税问题；（5）外人在华驻兵问题；（6）外人在华航行权问题；（7）外人在华传教及教育问题；（8）外资与其势力问题；（9）华盛顿会议；（10）临城案件；（11）金佛朗案；（12）鸦片会议；（13）无线电问题；（14）外国银行团；（15）上海租界焚书问题；（16）沪西日本纱厂罢工问题。（二）国内问题。其中包括：（1）军阀军队与内乱；（2）联省自治问题；（3）人民自由问题；（4）实业问题；（5）教育问题；（6）商业问题；（7）工人问题；（8）农民问题；（9）妇女问题。（三）财政问题。其中包括内外债务问题，并详细审查中国的财政与提出救济方法。（四）国民会议运动之方针。其中包括：（1）批评并否认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2）国民会议组织大纲；（3）促成国民会议与厉行民众组织。"大会并就上述讨论的各种问题，组织了四个相应的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在详尽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向大会提出报告。

代表大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讨论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通过了关于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各项决议，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在关于国民会议问题的决议案中，对国民会议的主张进行了系统阐述：一、国民会议为规定国家根本大计解决时局纠纷之机关，其直接关系国家人民福利至巨，故议定国民会议组织条例，须有人民代表参加，将来国民会议亦须由各省区人民各种创业团体直接所选出之代表组织而成，绝不能由政府及军阀包办。二、国民会议当以产生国民政府，废除国际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决定其他一切对内对外政策，为其职权。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然后根据国民利益与需要，制定国宪与其附则。三、国民会议之代表，其选举与被选举之资格，不分性别，不限智识，不论信仰，不拘地位，一律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四、筹办国民会议选举时，应以各地人民团体或各地促成会为监督机关，其所选出之代表，在国民会议中如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且发生受贿情弊时，应即由该地人民直接撤回。五、为促成国民会议之早日实现，实现后为能代表人民利益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归权于人民计，各地促成会必须努力发展自身之工作，无者应即设法组织，以资宣传。六、如北京临时政府不顾民意，悍然召集由善后会议所产生之国民会议，违反人民之利益，则本会



将唤醒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再由本会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图国民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为国民自身之利益而奋斗。

全国代表大会还着重揭露了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否认了段祺瑞向善后会议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在大会通过的《否认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宣言》中，指出："盖国民会议为解决国家一切问题之最高机关，其组织法应含有极端拥护民权之精神。善后会议乃军民长官代表及钦派之会员所集合而成，其用意全为拥护军阀权利而设，以此等机关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圆凿方枘根本不能相容，此国民会议条例吾人根本不能承认其有益"。最后提出应当经全体议决，一致否认并议定由代表大会从速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以期保障民权，维护国本。

代表大会开了一个多月，于4月15日闭幕。大会决定成立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执行委员会，继续推进国民会议运动。在大会闭幕的时候，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也收场了。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善后会议所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没有能够实施。当然，段祺瑞也不可能按照全国人民的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是，以国民会议为口号而掀起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因为国民会议未能召开而停止，相反由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各项宣传组织活动，使这一次运动更为广泛和深入了。这次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的一次空前聚会，散步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对引导人民群众进一步参加革命的政治斗争，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孙中山北上途中还一再强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主张人们发起反帝废约运动。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掀起于1924年5月31日，苏联政府和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政府在历次宣言中，已声明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了表达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建议与北京政府签订中苏协定。1923年9月，苏联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发表对华宣言，愿意本着完全尊重中国主权和完全抛弃帝俄侵略所得的特权，同中国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北京军阀政府表现得反复无常，使谈判陷入僵局，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由于中国人民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坚决的斗争和苏联的坚定态度，北京政府又怕苏联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才不得不打破谈判的僵局，于1914年5月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一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凡帝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立的一切有损害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一概无效。二、苏联政府放弃

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一切租界地。三、苏联政府放弃庚子赔款。四、苏联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五、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有关该铁路的其他事务，全由中国政府办理。协定还规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外国列强压迫之下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只有这一协定，才是第一个平等条约。中苏协定发表后，受到中国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团体开了各种形式的庆祝会，报纸杂志都发表文章进行庆贺，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决心和热情。

中苏协定的签订，大大推动了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运动。中共《向导》周报不断发表文章，指出："废约运动，即是民族独立运动"，"中国受到列强逼迫欺骗所订成之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不废除，中国永无解放的希望。"6月28日，上海闸北市民在发出庆祝中苏协定签订的通电中说："我们当此中俄邦交恢复之时……一致的向列强收回治外法权及庚子赔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7月13日，北京五十余团体联合组成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提出了"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小民族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任务。7月18日，北京国立专科以上八校教职员联合会，也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以后上海、武汉、湖南、天津、山东等地纷纷起来组织反帝同盟。8月，上海学生联合会等三十多个团体组成反帝大同盟，广泛开展废约运动。9月3日~9日，反帝大同盟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周。许多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太原等地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深入人心，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广大群众纷纷响应。

这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指导下，使得规模如此之大，反帝性质如此鲜明。到10月间，废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汇合在一起，声势更加浩大。



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关税会议

在孙中山北上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起了一个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群众性的国民会议运动更加高涨。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军阀官僚极为恐慌。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勾结张作霖，共同排挤倾向革命的冯玉祥与国民军，抵制人民革命运动。

1924年11月21日，段祺瑞急忙由天津入京，并于24日成立临时执政府，就临时执政职。张作霖亦于同时进了北京，北京政权随落于段、张之手。12月7日，段祺瑞便发表了“外国崇信”的卖国声明，以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对内为了抵制和破坏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巩固其统治，又主张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以使其独裁统治合法化。1924年12月24日，正式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企图以此抵制国民会议的召开。按照条例规定，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如下：“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者，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但不得逾三十人。”会议的内容规定为：一、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二、改革军制；三、整理财政；四、临时执政交议事项。根据上诉规定，段祺瑞邀请了166人充任会员，其中除孙中山以外，绝大多数是全国各地的军阀头目、官僚买办、反动政客、封建遗老和御用学者。既包括有祸国殃民的罪魁王士珍，广东军阀陈炯明、政治掮客江亢虎等，也网罗了胡适等帝国主义的走卒，而作为国民党员加入的彭养光，实际上是国民党改组时即拒绝登记的冒牌货。从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员来看，会议的反动性质是很明显的，充分表明了善后会议是一个被少数军阀官僚所操纵的会议，是一个继续维护军阀统治的会议。

对于这样一个反动的善后会议，全国人民都是极力反对的。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揭露了善后会议的反动性。早在1924年12月3日，《向导》周刊尖锐地指出，段祺瑞想要召集的善后会议，完全是想制造一个御用的会议，再

由这个会议产生出一个更大的御用会议，挂一个国民会议的招牌，以便选举他作正式总统。这与袁世凯的筹安会、曹锟的“猪仔国会”，完全是一样的把戏，完全是第二次“筹安会”。当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后，中共立即指出其反人民的性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1925 年 1 月 17 日，孙中山在重病中发表了《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严正指出：“善后会议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电文特别指出：“曹吴祸国，挟持势力，压制人民，诚所谓冠履倒置”。警告段祺瑞必须“改弦更张”。主张善后会议必须做出如下更改：第一，加入人民团体的代表；第二，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但最后决定权却应归之于国民会议。为了改变会议的性质，孙中山在电文中还表示：“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

1925 年 1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又进一步强调：“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划”，“反对段祺瑞所要召集的军阀善后会议”。宣言同时又指出：“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的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因此，全国人民要“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赶快要求在善后会议中参加最大多数的国民代表，赶快努力国民会议之召集”。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国民会议纷纷发表函电，要求段祺瑞立即“中止召开”善后会议，并强烈表示：“所有一切包办行为，及分赃之协定，概不承认”。1925 年 1 月 31 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就善后会议决定：第一，力争人民代表参加；第二，人民代表数应占全体代表 2/3 以上；第三，人民代表由人民团体直接选派；第四，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应选代表参加。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还致电段祺瑞指出：“善后会议须有各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等人民团体之代表占出席代表 2/3 以上，方有讨论国是之权”，“否则，善后会议如擅自议决国家根本大法、政府组织及外交财政等案，人民誓不承认”。在善后会议前夕，广州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对善后会议，拥护国民会议。各地民众团体的抗议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



但是，段祺瑞一意孤行，拒绝孙中山和各地人民团体的合理要求。他在给孙中山的复电中借口“时机已晚，只能变通办理”，拒绝修改条例。而为敷衍孙中山，段祺瑞又继续玩弄骗局，提出在专门委员会中，增聘各省议会议长，总商会、农会、教育会以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会长各一人为专门委员，以示“会议公开，民意具在”。实际上，这不仅排斥了工会、学生会和政党的代表，而且按照善后会议条例规定，专门委员参加善后会议仅有对议案提供意见的权利，这和人民团体代表加入的主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人民拒绝参加这个会议，中国国民党于 1925 年 1 月 31 日，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西南各省代表则滞留上海，拒绝北上赴会。一些正直人士也拒绝参加段祺瑞的御用会议，如马寅初、邵飘萍等拒不接受专门委员和顾问的聘任。胡适参加了几次，后来也退出了。

1925 年 2 月 1 日，段祺瑞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开了善后会议，13 日举行正式会议，到 4 月 21 日闭幕。孙中山决定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参加会议的都是大小军阀和官僚政客，代表不同的帝国主义利益，在会议上争权夺利，吵闹不休。50 多天的会，除了开过 22 次大会，几次座谈会，制订了“国民代表大会议”等三个条例外，对任何一方也没有约束作用，什么问题也未解决，就收场了。

为了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贯彻国民会议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于 3 月 1 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 20 余省 120 多个地方国民会议促进会的 200 多名代表。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不少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向人民举出了具体的斗争目标，起着宣传和组织广大群众的作用，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

五卅运动后，北方地区群众的革命浪潮继续高涨，中国共产党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1925 年下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关税自主运动。

所谓关税自主问题，实际上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自从近代中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就开了中国与外国协定关税的恶例。从此以后，我国的关税税率自主权和行政管理权完全为帝国主义者控制。1922 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的要求，但九国公约规定中国关税应照实价采取值百抽五的原则，只是在九国公约生

效后，中国政府得召集有关各国举行关税会议，商讨筹备裁厘，并在裁厘前加征值百抽2.5的附加税作为过渡的办法。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用这种微小的让步，来抵制中国人民对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并用这种让步把自己装扮成“尊重中国主权完整”的样子，以掩盖他们共同分割中国的罪恶目的。尽管这样，帝国主义各国也尽量拖延，不愿兑现。1924年4月，北京政府曾向有关各国正式提出要求召开关税会议的照会。各国以九国公约签字国尚未全部批准公约，不同意召开此项会议。

到了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中国人民强大的反帝怒潮的震撼下，迫使帝国主义迅速改变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把拖延了三年之久的关税会议重新提了出来。有关各国为了缓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怒潮，维持关税协定制度，打消中国人民关税自主的要求，也需要召开这项会议。段祺瑞政府为了加征2.5的附加税以解决财政问题，急需召开关税会议。段祺瑞上台后，为了急于给关税会议的召开铺平道路，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了金法郎案，金法郎案解决后，法国批准了九国公约。8月5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九国代表，匆忙地在华盛顿交换了1922年所签各约的批准书。8月10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正式照会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外交部，要中国政府择定日期、地点，召集关税会议。接着，英、日等国政府表示同意。8月19日，段祺瑞政府外交部向华盛顿会议与会国发出举行关税特别会议的正式邀请。与此同时，段祺瑞政府还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加紧了对民众运动的压迫。

1925年10月26日，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正式开幕。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荷兰、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等12个国家全权代表出席。段祺瑞政府的代表是沈瑞麟、王正廷、施肇基、蔡廷干、颜惠庆、陈锦涛、黄郛等。沈瑞麟被推为会议主席。段祺瑞兴高采烈地亲自到会致欢迎词，说：“我国本为世界一大好市场，一旦经济复苏，富力增进，实业发展，不独我国家之幸，即我各友邦同盟之利益，宁属浅鲜”。这无异于向各国摇尾乞怜，乞求帝国主义的施舍。会议一开始，中国代表就提出了以下建议：“一、与议各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并承认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二、中国政府允将裁废厘金与国定关税定率条例同时实行，但至迟不过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三、在未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以前，中国海关则除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



加税。四、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后，即开始征收。五、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但是，操纵会议的英、美、法、日等国代表拒绝接受以上建议，认为这次会议只能讨论华盛顿会议规定的裁撤厘金和附加税，至于关税自主问题，须以后才能解决。会议期间，北京爱国学生开展了强大的关税自主运动，迫使帝国主义各国代表不得不改变态度，表示可以承认关税自主，但必须以裁撤厘金（即商品输往内地的一种通过税）为条件，同时他们采取延宕手段，主张中国关税自主应在三年或五年后实行。会议对中国关税自主问题未多讨论即转入讨论裁厘办法和附加税税率和用途。美、日两国代表坚持附加税不得超过二五，并须对附加税指定用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种有条件的关税自主，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则向帝国主义屈服，由代表王正廷于11月3日发表了裁撤厘金宣言，表示同意。各国代表遂于11月19日通过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其中规定：各国“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国国定关税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同时规定：“中华民国政府声明：裁撤厘金与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须同时施行，并声明于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即1929年1月1日须将裁厘切实办竣。”但是，这种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完全是一个骗局。因为厘金是各省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源，军阀割据局面不改变，裁厘就不可能实现。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议案也就只是一纸空文。

此后因时局混乱，段政府岌岌可危，关税会议时断时续，没有具体结果。至1926年4月段政府垮台，出席关税会议的中国代表随之逃亡，关税会议也就开不成了。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声称“决定暂时停止会议”。至此，关税会议毫无结果而告终。

关税会议与中国人民要求的真正的关税自主，南辕北辙，它一提出就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会议之前，1925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了《告工农学生军士书》，提出了“关税自主”的口号。《向导》和《政治生活》发表了《关税会议与司法调查》、《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关税会议与段祺瑞政府》、《关税会议与民众政权》、《帝国主义与关税会议》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引导群众认识关税会议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关税自主。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组织下，以北京为中心，掀起了强大的争取关税自主

运动。

10月25日，即关税会议在北京开幕前一天，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雪耻会、工人雪耻会、爱国运动大同盟等各团体学校数万人在天安门召开了国民关税自主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散发传单20余种。关税会议开张这一天，各校各团体齐集新华门，举行关税自主大示威运动，发生了新华门流血事件的惨剧。

11月19日，关税会议通过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对关税自主的真实意图。当这一消息传出后，北京各团体联合组织的关税自主运动筹备会决定发起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力争无条件的关税自主。自此由北京发起的关税自主运动，迅速地推向了全国各地。11月22日，北京30余团体，发起在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会上一致决议：一、绝对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解散关税会议；二、坚决否认关税会议以裁厘为交换条件的决议，要求解除一切有关关税的条约；三、谴责军阀政府摧残民众爱国运动，严重警告政府绝对尊重人民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人民群众的关税自主运动，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阴谋诡计，打击了正在举行的关税会议，充分显示中国人民的力量。同时，这些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也极大地教育了人民，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促进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支持国民军发动反奉运动

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以后，虽成立了奉、皖、国民军三方同意的段祺瑞临时政府，但由于这时皖系势力已经瓦解，只剩下一些官僚政客，冯玉祥已受排挤，北方反动势力的实际首脑实则是张作霖。段祺瑞政府只能在奉系的卵翼下维持反动的政局。由于西北的国民军倾向革命，故与奉系暗斗甚烈。

奉系军阀入关后，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派军沿津浦线向南伸张势力，一直伸展到上海。而国民军则沿京汉线及豫、陕、甘三省发展。“五卅”运动后，冯玉祥及其所部国民军，因受群众革命影响，更进一步倾向革命。

以段祺瑞、张作霖为头子的北京政府，同以前历届军阀政府一样，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事事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在他们的统治下，军阀战争的灾害仍然遍于各地；对内破坏国民会议运动，镇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屠杀罢工工人，使得人民的痛苦有增无已。这样，奉系及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便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敌人。

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奉系军阀对长江下游的控制，损害了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使受英帝支持的原属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受到威胁。孙于是积极联络反奉势力以对抗。他一面派员与冯玉祥、岳维峻联络，达成共同对付奉系的协议；一面与江苏、安徽地方部队陈调元、王普等联络，从苏皖内部进行分化活动。1925 年 10 月，孙与省长夏超、闽督周荫人发出反奉通电，10 月 10 日发动了反奉战争。孙传芳组织了所谓浙、闽、苏、皖、豫的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战争的结果奉军败退到山东，孙传芳占领了南京，11 月占领了徐州。在这种情势下，段祺瑞的执政府命令孙传芳督苏，但孙不理睬这个命令，而以东南五省领袖自居，控制着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和上海市。吴佩孚乘有利局势，图谋再起，在武汉通电自称受 14 省拥戴，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拟由河南进攻徐州，与孙传芳会师。不久，他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及陕西、河北各一部。

反奉战争的爆发，再一次反映了各派军阀之间的剧烈争夺。奉系是革命的首要敌人，对革命危害最大，参加反奉运动对人民是有利的。反奉战争初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共青团中央于10月20日发表了《对反奉战争宣言》，指出："现在的奉系军阀不但代表中国军阀阶级的利益，并且代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利益，所以此次反奉战争虽掺和了一些军阀势力，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爱国的民众是反奉大潮中之主流，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参加战争。"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告全国民众书中，提出了"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作为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总口号，号召人民为推翻军阀政权，实现革命的民主政府而奋斗，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分析了当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在北京采取联合国民军以反对奉系军阀的策略。10月30日，中共北方区委、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的致中国国民党党员公开信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策略：必须促成打倒奉系军阀的胜利，以至于最后完全消灭奉系军阀。但在同时无论如何又不能让直系军阀，在奉系军阀失败之后，恢复他们原有的势力"。认为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只有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里各种民主主义的群众使他们参加战斗，并促成反奉力量的大联合，号召他们成立反奉势力联合的临时机关。在京汉路北段就有开封、郑州等地工人和学生组织宣传队赴战地慰劳国民军。在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帮助下，国民军在反奉战争中取得了京、津、河北、内蒙、河南等地。在这些地区，因国民军倾向革命，革命运动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京、津与张家口的工人运动此时也在蓬勃展开，河南各地的农民运动亦大有发展。

1925年10月，帝国主义为缓和"五卅"以来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运动，同意北京政府邀请各国驻华外交官举行关税会议。帝国主义口称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以中国不能实行的废除厘金为先决条件。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会议，在北京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段祺瑞政府下台。11月28日的"首都革命"使斗争达到高潮，各学校、各工厂的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和广大群众共五万多人齐集神武门前，举行示威大会。会后，群众高呼着"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等口号，包围了执政府，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实现推翻段祺瑞政府的目的，但却掀起了从"五四"以来北京革命斗争的又一次高潮。它



的影响很大，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上海、南京、开封、长沙、汉口等地都举行了示威运动，声援首都人民斗争。

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高涨和奉军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奉系内部起了分化，奉军将领郭松龄秘密和国民军取得联系，议定协同反奉，于1925年11月23日在滦州倒戈。郭松龄是奉系军阀中一位爱国将领，他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潮影响下倒戈反奉，给予当时国内最大最反动的奉系军阀势力以沉重打击，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16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任奉天讲武堂教官时，受到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的佩服和敬重。张学良便"荐之乃父"，重用郭松龄。1920年张学良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郭被推荐为该旅参谋长，不久任第二团团长。从此郭辅佐张学良练兵打仗，深得张学良信任，也渐为张作霖赏识，成为奉军举足轻重的重要将领。郭松龄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地位的迅速提高，引起奉军内部一些人的不满和妒嫉。当时奉军中派系分立，以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的士官派与以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李景林为领袖的大学派互相倾轧。郭松龄既得张作霖不断提拔，即遭到杨宇霆等人的妒嫉，幸赖张学良庇护得免于被排挤出奉军。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曾拟以郭松龄为安徽督办，为杨宇霆所阻，改由姜登选督皖。同时以杨宇霆督苏，张宗昌督鲁，李景林督直，杨宇霆等皆有一省之地盘，而郭松龄战功卓著却一无所得，郭对此十分不满。郭与士官派的矛盾日益加深。

这时全国反奉运动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的影响下，郭松龄对张作霖、杨宇霆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感不满。李大钊看到郭有从奉系分化出来的可能，亲自作郭的工作，并派共产党员任国桢、国民党员钱公来、朱霁青到奉天，策动郭倒戈反奉。

1925年10月，浙奉战争爆发后，奉军惨遭失败。当杨宇霆、姜登选仓惶北撤时，郭松龄代表奉军正在日本应邀参观"秋操"，之后又留日本研究军事。这时郭得知张作霖将派代表来日本签订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供给奉张大量军火以进攻国民军的密约。郭对张作霖的卖国行为十分义愤，当即将此情况告知来日一同观操的国民军将领韩复榘，并说："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不顾一切，出卖国家。这种割肉饲虎、引狼入室的干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命令。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韩复榘回国后，将

以上情况报告了冯玉祥。此时郭面对国内反奉的大好形势，为了铲除卖过军阀，决定立即返国准备反奉。

郭松龄回国后即受命代表张学良改组奉军第三方面军。该方面军下辖第八、九、十军，郭任第十军军长，并亲自挑选三个军的高级军官，从而掌握了第三方面军的实权。郭上书张作霖力陈内战之害，建议停战撤兵，遭到拒绝。于是他在天津积极向部将宣传反对奉军打内战的思想，进行反奉战争的准备。

11 月 19 日，郭松龄派亲信赴包头与冯玉祥商谈联合反奉问题。经过协商于 22 日与冯签订了反奉密约，规定了双方共同革命的目的是：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开发边疆，保存国土。双方约定不得为争夺权利向内地各省发动战争；不得订立卖国条约和向外国借款；不得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否则本约无效。为了拉李景林共同反奉，并划定势力范围：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治理；保定、大名和京汉线冯军可随意驻扎，但直隶全部收入均归李景林；冯军可自由出入天津海口；冯玉祥赞助郭改造东三省政府，开发东三省，经营东部内外蒙古，并牵制反对方面；郭松龄赞助冯开发西北，必要时以实力相助。

11 月 22 日，正当郭与冯签订密约时，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奉。郭认定其暗中的活动已被张作霖察觉，便与李景林密议提前行动。同日深夜，郭松龄发出三电：要求张作霖下野，推张学良继承大任；宣布杨宇霆罪行，要求杨即日去职；声言国内应即日停止军事行动。23 日，郭至滦州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班师出关，主和罢兵的通电，与会者大都赞同郭的主张。

郭将所部 7 万人分编为 4 个军，以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向关外进发。同时，冯派兵进驻丰台，集结部队于多伦，并向热河进军，声援郭军。李景林也发出通电，重申主和罢兵的主张，指责张作霖好争喜战，但言辞委婉，为自己留下了退路。郭军向关外进兵顺利。26 日占领秦皇岛，27 日攻占山海关，29 日进驻绥中，30 日通电改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郭为总司令，从此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以示与奉系彻底决裂。郭军全线发动总攻击，占领沟帮子后，沿京奉铁路向沈阳逼近，攻到离沈阳只有 30 公里的巨流河附近，在张作霖准备逃亡之际，日本出动飞机和地面部队援奉。张作霖由于日本的支援，获得了喘息时间，得以搜集兵力，重整部队。从 12 月 22 日开始，郭、奉两军展开决战，郭军在日、奉两军联合进攻下陷入包围中，虽再三冲杀，最终大败。24 日，郭松龄逃亡途中被捕身死。



东北国民军反奉战争实际上是当时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一部分。这次反奉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削弱了奉军的实力，对奉张的统治给以沉重的打击，进一步暴露了张作霖祸国殃民、卖国求援的反动面目，有利于推动全国人民的反奉运动的发展。

当东北国民军与奉军激战时，原来与郭松龄、冯玉祥联合反奉的奉系李景林与国民军在关内打起来，背盟倒向张作霖。

李景林同意参加反奉同盟，目的在于保有直隶地盘并进而取得热河为其势力范围。而国民军第二、三军占领保定、大名之后，有继续北进夺取直隶的趋势。当奉系热河都统阚朝玺率部退出热河增援锦州时，冯玉祥即派宋哲元率部开赴承德，占领了热河。李景林因此对国民军极为不满。12 月 2 日，国民军以军沿京津线，要求假道出兵援助郭松龄。李景林不许国民军通过，宣布保境安民，并将郭松龄交他看管的奉系军官全部释放，国民军不听阻止继续前进。12 月 4 日，李景林遂发出通电，宣布讨伐冯玉祥，爆发了国奉战争。

国民军分南北两路进攻李景林军。南路以邓宝珊、徐永昌为正副司令，由保定进攻津浦路上的马厂。北路以张之江、郑金声为正副司令，进攻杨村。12 月 9 日发起攻击，次日占领杨村，11 日攻克马厂。李景林全力组织反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伤亡惨重。李景林一度夺回了杨村、马厂。冯玉祥从北京、热河等地派来增援部队，20 日发起总攻击。22 日，北路攻克北仓，南路攻克马厂。前此，驻滦州的国民军唐之道师已于 14 日进占塘沽，19 日占领新河，从东面迫近天津。于是天津处于国民军的包围之中。24 日，李景林被迫放弃天津，所部向沧州、德州撤退。李景林乘轮经大连至青岛转赴济南与张宗昌会合，组织直鲁联军。国民军各部于 24 日在天津会师，受到天津市民的欢迎。

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郭松龄打倒张作霖的目的尽管未能实现，但在郭军反奉过程中，国民军在天津打败了奉系李景林，占有了直隶全境，与河南的国民军连成一片。这样，国民军便占有直隶、河南、甘肃、陕西等地和北京、天津等重要城市及京奉、津浦、京汉等交通干线的一部分，人数也达到 40 多万。由于国民军倾向革命，它的扩张有利于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利于反革命。

北方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军势力的扩大，使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极为恐慌。于是，他们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的同时，又在“反赤”的口号下，进攻进步势力，积极支援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

北京发动推翻段祺瑞政府的国民运动

1925年10月，帝国主义同意北京政府邀请各国驻华外交官举行关税会议。帝国主义口头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以中国废除厘金为先决条件。关税会议与中国人民要求的真正的关税自主，南辕北辙，所以一经提出，就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关税自主促成会，发表宣言、通电，斥责这种关税会议，要求实现无条件的实现关税自主。

11月10日，全国学生总会和广州外交代表团等团体在北京组织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在北京举行一次示威运动，并发出通电，要求段祺瑞政府下台。群众的爱国运动不断遭到反动军阀的摧残，这些事实进一步表明，这时段祺瑞政府已与广大人民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因而，随着反对关税会议斗争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要求反奉倒段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

这一时期，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北京政变后，奉系军阀不断向南伸张，加剧了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矛盾。1925年10月间，爆发了浙奉战争，奉军迅速从上海及津浦线溃败，退守山东。从此孙传芳控制了东南五省，成为独树一帜的军阀势力。接着，吴佩孚也立即通电响应，并在汉口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妄图利用反奉战争时机东山再起。而这时奉系内部的重要将领郭松龄，也因受到全国反奉革命的影响，不久于滦州率部倒戈，联合国民军共同反奉。反奉战争沉重打击了奉系统治，尤其是郭松龄的倒戈，严重削弱了奉系军阀的势力，这也使得在奉系军阀卵翼下的段祺瑞政府更加动摇。这种形势，客观上为人民群众的反奉倒段斗争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中共北方区委遂决定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在关税自主运动的基础上，将已经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旨在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就是当时所称作的“首都革命”。

中共北方区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对这次首都革命的酝酿和发动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发动和组织民众，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逼迫



段祺瑞下野，“还政于民”；另一方面，区委派同志与国民军联系，争取国民军的支持，除取得国民军将领、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应允届时不以军队保护段政府外，并计划在市区换防时，由准备接防的国民军三军孙岳部的三旅（共产党员张兆丰系该旅主要负责人之一），配合革命群众夺取政权。李大钊曾派于树德同鹿钟麟接洽合作事宜，后来于树德在国民党“二大”报告中曾对此讲道：“我们既与国民军有相当关系，所以在这次运动发动以前，不能不和他们接洽一切，并说明这次运动的意义。于是27日我和朱家骅同志到鹿钟麟那边接洽。他的回答很好，他说：这件事我很赞成。不过我们要赶走段祺瑞，不要使他随便地走，必须使他交出十数颗总统印才好放他走。这十数颗印，还要我来检过，防他拿假的来。至于段府卫队由我来负责，必不至于开枪。”

为了加强对首都革命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成立一个行动委员会，由赵世炎、陈乔年、陈为人、邓鹤皋、邓洁5人组成，负责筹备和组织工作，赵世炎负总责。行动委员会通过各团体学校、秘密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在工人中组织工人保卫团、农民中组织自卫队、学生中组织学生军和敢死队。11月27日，关税自主运动委员会决定28日举行示威运动。这次运动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积极配合。同日，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也作出决定：一、28日开群众大会；二、迫使段祺瑞辞职；三、组织“国民行政委员会”。

1925年11月28日，“首都革命”按计划爆发，北京革命群众开始了一次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

28日上午，各学校、各工厂的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就开始活动，到处散发以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团体名义印发的传单，如《建国宣言》、《告国民军书》等，四城市民互相争看。上午11时，各学校墙壁间同时张贴出很多布告，“其大意：政局突变，现政府根本动摇，北京已属吾侪民众（学生、工人、兵士），吾侪应乘此机会，为大规模之民众运动。即日下午1时齐集神武门（南城各校集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迫段祺瑞辞职，拿办朱深、章士钊、姚震、李思浩等祸首。望诸同学严守秘密，服从指挥，届时踊跃参加云云。”是时各校呈现异常紧张的气氛。

下午2时许，学生、工人和广大市民群众共五万多人齐集神武门前，“人山人海，旌旗蔽天”，举行国民示威大会，推选北大教授朱家骅为总指挥兼主席。主席台旁高树两面大旗，上书：“打倒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

府”，并且高悬号召国民军与民众一致奋斗的大幅标语。大会主席朱家骅宣布开会宗旨，提出：“我们今日的运动，就是革命运动，就是要将卖国的段政府推翻，实在的建设一个国民政府起来。”大会发出通电称：“本日大会决议，除立行驱逐卖国政府当局段祺瑞外，并决定下列条件，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一切武力智力大生产力团结力为民族的国家所有，三、人民取得一切自由，四、开国民会议，建设国民政府。”大会还作出决定：一、即日在京组织国民委员会政府；二、国民委员会政府之任务，对内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对外国际平等，召开国民会议；三、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大会口号为：“一、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三、人民要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四、驱逐关税会议的各国代表；五、释放一切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被捕战士；六、建设民众的武力；七、把反奉的战争促成为人民争自由的战争；八、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九、拥护广东革命政府；十、驱逐段祺瑞、枪毙朱深；十一、召集真正代表国民的国民会议。”

大会结束后，举行国民示威游行。这次大规模的示威，组织极为严密。大队以一面书有“首都革命”的大旗为先导，着军服军帽的学生军、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走在前面。学生敢死队按团队编制，十个为团，十团为队，设全队总部，王一飞任司令。数千工人皆臂缠红布，并有工人保卫队近千人。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均手执尖头木棍，游行群众则各执“杀卖国贼”、“扫除安福余孽”、“解散关税会议”、“民众大暴动”等旗帜，浩浩荡荡。朱家骅任总指挥，刘清扬、杨理恒、朱我农、于树德、韦青云等任副指挥。大队从神武门出发，经汉花园，东皇城根，直趋铁狮子胡同执政府。京畿警卫司令部派出手枪大刀队两连，随大队游行，维持秩序。由于执政府已停止办公，双门紧闭，群众遂转赴吉兆胡同段祺瑞宅。原准备捉住段祺瑞之后，宣布罪状，逼他辞职，交出政权。但由于右派的告密，段祺瑞早有准备。27 日深夜，他就故作姿态，免去群众痛恨的警务总监朱深的职务，企图平息群众情绪，安福系的中坚人物也已纷纷逃匿。

正当人民群众开始行动的时候，国民军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其时冯玉祥坐镇张家口，他虽同情国民革命，但仍缺乏推倒段祺瑞政府的决心。11 月 26 日，段祺瑞致电冯玉祥，假意询问所谓段政府的去留问题，冯玉祥回电表示“拥护钧座，始终不渝”。并电鹿钟麟，要其负保拥段政府之责。28 日，鹿钟麟即派暂编陆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门致中率部守卫段宅。这种情



形，正如于树德在国民党“二大”报告中所述：鹿钟麟“态度忽然变了。他说这事断断不可做了，因为张家口冯玉祥方面已有电报，而且派专人来，不要如此做。如你们一定要做，有什么意外，我是不负责的。我们对他说：我们的这事一定要做的。你们负责保护，是你们对于民众的一种表示；不负责保护，是你们对于民众的一种表示。我们是管不到的。”

当示威群众到达段宅时，段宅警备森严，门内布满杀气腾腾的卫队，国民军也出动大队阻止群众入内。“是时，革命敢死队大呼冲锋，群众鼓噪而前，群拥至段邸门前，时铁栅栏已紧闭，群众奋勇进攻，卒不得通过。是时门内卫队皆全赴武装，登墙守卫，戒备极严，国民军方面也劝群众不可迳冲入内。群众高呼：‘请段祺瑞下野’、‘请段祺瑞缴出印信来’、‘迫段祺瑞签字即日离京’呼声震天”。双方相持了三小时之久，终因军警严密把守，群众未能进入段宅。在此情况下，示威群众当即在段宅门前召开大会，议决：“一、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二、组织国民委员会的政府执行政权。国民委员会之责任：（甲）对外极力谋国际平等地位。（乙）对内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及言论集会之自由。（丙）召集真正代表国民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产生正式政府。”同时提出三项要求：一、段祺瑞必须于29日午前辞职；二、解除执政府卫队武装；三、组织国民委员会执行中央职务，要鹿钟麟将议案转交段祺瑞。并决定29日下午2时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要鹿钟麟出席答复前两项要求。随后，群众分头前往朱深、章士钊（教育总长）、李思浩（财政总长）、刘伯昭等人住宅搜捉，捣毁了宅内杂物，另外一部分群众至深夜还未散。

29日下午，5万多群众再次齐集天安门召开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大会主席朱家骅做报告，讲述开会宗旨。陈启修、马叙伦、顾孟余、蒋希曾、王法勤及北京总工会代表相继做演讲。大会通过了七项议决案：一、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由国民裁判；二、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三、在国民政府未成立以前，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四、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议决案；五、惩办卖国贼，先行查封其所有财产，并追究其卖过赃款；六、通缉卖国贼，听候国民公判；七、查办金佛朗案。并通过致国民军通电，致全国各地电，警告段祺瑞书及段祺瑞十大罪状等。会后，又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

大会致全国各地通电的全文是：

通电一：“本日北京市民一致议决，以革命之手段，打倒北京卖过政

府，实行取得政权。要求与民众接近之国民军，保障人民一切自由，予一切卖国贼以严厉的惩创；立即停止关税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与任何反动军阀妥协。再由民众公举委员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组织正式国民政府，共筹关会，本为国民自救之唯一要图。大好时机，稍纵即逝。万望各地同胞，一致奋起，共成此国民革命之伟业。"

通电二："……北京市民对此最反动之军阀势力，自不能不一致团结，倾其全力，与全国同胞，共谋扑灭，务使奉军之反动势力，一扫而清，政归吾民。本大会深信民众势力之愈益发展，必足以打倒一切反动势力而有余。今后民众更当本武装革命之志，与革命之武力结合，扫除一切媚外卖国之反动军阀，打倒安福政府，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产生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政府，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历来压迫民众之一切法令。时机紧迫，望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奠国是。"

28、29日的国民大会，都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破坏。他们雇佣流氓，打出所谓工团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工人自觉社的旗号，捣乱会场，破坏游行。"流氓手中皆有油印领款纸条，上书'每人凭条到神武门前领大洋五毛'。"当28日革命群众开始行动时，"当日早晨邹鲁、林森等亲至鹿钟麟处造谣，说此次运动纯系共产党指挥，说共产党即刻要在北京成立工农政府，赤化中国"。这使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发生了动摇，违背了与民众合作的诺言，用武力保护段祺瑞政府。并且原定的国民军换防计划，也被临时改变。在此情况下，行动委员会只得改变行动计划，只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冲击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活动。29日群众游行时，他们又大打出手，抢夺北京总工会旗帜，殴打工人群众，致使十余人受伤。并有少数人纵火烧毁了《晨报》馆。"事后遂又到处宣传，凡打家劫舍，烧晨报，皆共产党所为"，"共产党打人，五毛钱的人为共产党所雇"等等。

这次首都革命，虽然没有实现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预期目的，但它却掀起了从"五四"以来北京革命斗争的又一次高潮，有力地显示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军阀势力，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如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告民众书》中所指出的："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它的影响很大，此后上海、南京、开封、长沙、汉口、广州等地，都举行了反奉倒段的示威运动。

这次首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



统治的一次尝试。当时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赵世炎曾连续发表文章，分析和总结这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认为这次革命未能取得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即三角形式武力尚操纵政局）；二、民众组织尚不完备（工人组织较整齐，但缺乏训练，且遭流氓与工贼之扰乱；学生组织既欠严密，又遭右派之分裂；市民更无组织，只是临时参加）；三、国民党右派对群众运动之背叛且告密。他认为，这次“北京民众代表全国民众夺取政权的试探，已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表示极大的进步的变化了。”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积累了经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到来。

中共中央北京二月特别会议

1925年到1926年春，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出现了革命的高潮。1925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以及北京民众发动推翻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活动。但是，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国民革命军势力的扩大，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恐慌。

受英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受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重新联合起来进攻南北革命力量。他们先击败了奉系郭松龄部的倒戈；接着，又于1926年1月把矛头首先指向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并计划向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形势极为严峻：如果直、奉军阀进攻北方国民军取得胜利，那么全国局势将急剧逆转，广州政府将处于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如果国民军能支持数月之久，那么广州政府经过对北伐的相当准备，可以达到南北革命势力会师武汉联合创造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北洋军阀十多年的统治。对于广东国民政府来说，只有先发制人，按照孙中山的遗志，及早出师北伐，才能粉碎北洋军阀“讨伐二赤”的计划，才能将革命推向全国。

与此同时，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剧烈。继戴季陶主义出现之后，一些知名的国民党新老右派分子纠合在一起形成西山会议派以及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挑起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反动派之间的重大纠纷，给广州国民政府造成新的威胁。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1926年1月成功地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胜利的大会。通过这次大会继续国共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竭力扩大国民党左派组织，支持左派对右派的斗争。这一时期，党组织虽然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党对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尚缺乏有力的政治指导。

这时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因病已有月余与中央不通消息，同时，帝国



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国民党右派、醒狮派、工贼、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以全力搜索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共产国际来电主张党中央迁移驻地。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紧急困难情况下，党中央需要迅速认定我党目前在政治上主要职任以及如何支持北方的危局和巩固广州国民革命根据地。

为了推动和发动北伐，1926 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此时正处在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决战的时机，若不急起向吴佩孚行总攻击，则任这局面发展下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所受的打击将不堪设想了。”“我们应该积极的行动，向吴佩孚行总攻击”，“打倒吴佩孚，援助国民军”。因此，“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不犹豫的、不妥协的对付吴佩孚并肃清吴系在长江的势力”。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党对革命斗争的领导，作好北伐的准备，1926 年 2 月 21 日 ~24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7 人，青年团代表 1 人，北方区代表 2 人，粤区代表 2 人，共 12 人。其中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等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因病重在上海未能参加这次会议。当会议开始时，即接到陈独秀由上海来电，告知他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减轻了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中央迁址问题的严重分量。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北方的直奉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开始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并准备南伐广东的危机形势下，如何认识这种形势并明确中国共产党此时的重要任务。会议遂集中注意于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重要职任一案。

会议的议程共有 11 项：“一、现时的政局与党的重要职任；二、中央会址问题；三、国民党问题；四、北方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五、广东问题；六、三特区工作问题；七、河南问题；八、铁路总工会问题；九、五一节在广州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劳动代表大会问题；十、设立长期党校问题；十一、反吴佩孚宣传问题。”经过代表们的反复讨论，就目前形势和和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段的任务，通过了《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案》。对于会议的其他几项内容，也都通过了相应的议案。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北伐战争问题，要求解决“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问题。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革命势力进攻时期，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北伐准备问题；二是农民问题。这是当时党的战略总方针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点。

会议明确提出了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职任是要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北伐。这时，国民军正在河北、河南同奉军、直军交战。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反国民军的联合战线如果取得胜利，必然要继续进攻并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会议强调，面对重重危机，北方国民军的存亡对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将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与北方革命势力会师武汉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所以党必须加强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使之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以接应广州政府的北伐。国民革命"固然应该在北方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如果广州的国民革命势力和潮流不能发展于全国"，则"必然陷于孤立地位，必致于不得不妥协而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特别努力于各方面的工作，以求推广这种政权于各省，以此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而使工农联合战线有真正的可能。在现时时局之下——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差不多是孤立的——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因此，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向北发展，也就是要加紧在农民之中的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中，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今河北）等省加紧开展群众工作，发动民众奋起接应，特别是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和支持北伐战争。

会后发出的通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革命，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促进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威势，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定会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为执行这项工作，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建立了军事部。

会议再次重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会议分析了五卅运动结束后的形势，阐述了联合农民，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必要性。指出"'五卅'反帝国主义的



国民运动，本是阶级的极大联合战线，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久便分裂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被向来所没有的无产阶级运动所恐吓，别方面受帝国主义者假意的亲善所贿买，渐渐的脱离民众的革命运动，以致于工人阶级单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而流血”。并且指出：“‘五卅’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所以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农民一贯都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的同盟军。所以，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会议强调指出，准备北伐的过程就是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的过程，二者互为条件，同步进行。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在农民中的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还指出在北伐中，要特别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迅速发展农民运动。强调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

关于中央地址问题。会议认为，须视何地能更便利的执行党在最近将来之重要使命，能顾及党的全部工作，能建立党的中央完密强固的组织。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因为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不能有完备的技术机关以指挥日益发展的群众大党；如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决移北京，而上海设交通局，广州设临委；如国民军在北方失败，中央决移广州。

关于国民党工作问题。会议认为，过去国民党的工作只做成立国民党机关的工作，而没有使这机关去集聚广大民众，以后应极力注意改正。会议提出，应努力宣传国民党二大的成功，宣传广东政府，极力发展左派的群众，去争取右派影响下的左倾分子和群众，去揭露右派首领的罪恶。最近将来国民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要从各方面准备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的工作，用国民党的名义在各地迅速发展农民运动。并决定加强国民军工作，在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发展中国国民党和农民协会，在河南建立党和农民的秘密组织，注意军事工作，以迎接北伐。

关于召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于本年“五一”节在广州召集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农民大会的意义更为重大，要求各地迅速发展或成立省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并努力搜集有关农民问题的一切材料，以提供党决

策农运问题时参考。会议并决定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指出过去全国特别是北方对于反吴的宣传做的太少，没有充分的煽动群众，国民党应速成立一宣传委员会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动员国民军守住北方，等待广东政府北伐等。

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等决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局，抓住了时局的中心，确定了党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和北伐中的政纲应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的两大重要任务，把军事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为中共动员多方面力量，特别是动员农民力量，迎接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作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次会议没有提出建立和扩大我党领导的正规军任务。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北伐上来。



三一八惨案

1925年冬掀起的反奉倒段运动，使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势力得到了较大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恐慌。直奉军阀联合后，首先进攻北方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当冯奉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冯玉祥为了转移对方进攻的目标，缓解国民军内部矛盾以及争取苏联的援助，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由张之江署理西北边防督办职务，统率部队。但事实上，这并不能阻止直奉军阀的联合攻击。帝国主义在进攻国民军中，给予了军阀势力以极大的支持。英、日帝国主义在北京为直奉军阀制定了进攻国民军的计划，在直奉军队中都有日本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日本帝国主义供给奉系军阀军械军需，英帝国主义又供给直系军阀吴佩孚1.5万支枪。帝国主义为直奉军阀进攻国民军提供了充分的军事援助。在反动军阀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国民军很快陷于被动，处境愈加艰难。

后来，张之江为了使国民军摆脱危困的境地，又采取了迎合段祺瑞政府的政策，妄图镇压学生运动需要。于3月6日分别致电段祺瑞、贾德耀，污蔑学生爱国运动是“学风日靡士习日偷”，新思潮“邃腾狂瞽，喜为荒唐恣意之说”，甚至攻击男女同校是“复欲共妻，鹑奔狐绥”，声称：“中国之可虑者，不在内忧，不在外患，唯此邪说横行，甚于洪水猛兽。”要段政府“设法抑制，维风化而奠邦本”。3月9日，段政府复电“嘉许”，并提出“维持秩序，转移风纪，亦为地方军警之责。”随即，段政府又命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切实“整顿学风”，并出动大批便衣侦探监视学生行动。段祺瑞计划酝酿一场血腥镇压日渐高涨的革命运动。

这时正好发生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成为三一八惨案的直接导火线。1926年3月初，奉鲁军逼近天津。奉系军阀的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舰只多艘协助张宗昌运送陆战队6 000多人，从青岛出发，企图配合马厂的李景林部袭击天津。3月7日，张宗昌的陆战队在炮火掩护下由北塘登陆，与国民军展开激战，结果被国民军击退。其时，大沽口海面常有奉军舰

只游弋，并多悬挂日本的军旗作掩护，窥伺机会袭击大沽炮台。针对奉军的不断骚扰，国民军为自卫计，加紧防守港口，设置炮台，布置阵地；并在大沽口海面设电发水雷，封锁塘港以防止奉鲁军舰驶入海河。国民军的这一防卫措施，是完全正当的，也是纯属于中国的内政。但是，这却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蛮横干涉。

10 日，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W. j. Oudendijk）代表辛丑条约关系国驻京使节向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最急切的抗议”，诬蔑国民军的行动，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和国奉交战将天津秦皇岛铁路阻断，以致“北京与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折断，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要求“迅速制止中国之交战军队停止阻断经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动”，并威胁“设中国政府未能进行完成此种目的以符辛丑条约之规定，则各代表保留保护外国船只及维护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特权”。在帝国主义压力下，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向驻津的外国使团说明情况，同时提出外轮出入办法：“一、外轮通过海口时必须有引水船为之前驱，此引水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二、外轮出入必须悬挂其本国国旗，不可混乱；三、入口外轮中之华人经国民军一度检查方许通过。”但是，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接受这个条件，日本领事对无领港船不许通过的条款，提出了异议。国民军对此又做了让步，鹿钟麟于 12 日急电北京政府同意开放大沽口，但要求外交团确实担保：外轮不得再为敌军运兵运械，外舰入口不得使敌舰尾随混入。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竟然违犯外轮入口不得使敌舰尾随混入的条件，蓄意制造事端。11 日晚，日驻津总领事馆派员至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称日方藤字十五号军舰一艘定于 12 日上午入口，请予免验放行。总指挥部同意其入口，并约定了入港时间（上午 10 时）、旗号、停泊地点等项。但 12 日下午 3 时，有两艘日舰入港，其时间、舰只数均与约定不符，且至港口不停泊以待大沽炮台守军查看。大沽炮台国民军守军发现这一非常情况，当即以旗语令其停止前进候查，日舰置之不理，炮台守军遂发空炮警告。日舰竟以机关枪射击炮台守军，守军猝不及防，死伤十余人，国民军被迫以步枪还击，将日舰驱出大沽口。这就是大沽口事件。

事件发生后，国民军当日就向天津日总领事有田提出严重抗议。日领事也到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抗议。鹿钟麟将经过情况电告北京临时政府，13 日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即派员向日使芳泽提出口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竟颠倒黑白，反诬国民军首先开炮打伤日舰官兵，并随即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



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严饬前方军警，遏止此种不祥事件之再发”。

3月14日下午，北京各界群众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了大规模的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大会对于最近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及日陆军参加滦州战事，作出严重抗议：“一、立即撤退津沽一带日本军舰；二、日舰非得中国允许，永不准在中国境内停泊和行驶；三、立刻撤退在中国境内一切军警，永不准复设；四、日本政府须向中国国民政府和人民道歉，并撤换中国公使；五、严厉惩办轰击大沽口军舰官佐士兵，并以后绝对不准扶助奉天胡匪张作霖，扰乱中国，不准借给军火和参加奉军作战；六、赔偿中国大沽此次所受损失；七、如不容纳以上最正当之要求，国民则立刻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将日本公使驱逐出境，即与宣战，亦所不恤。”继又提出五则办法：“一、提出国民抗议书；二、向全国民众通电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行为，并厉行抵制日货；三、通电国民军，以武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四、通电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五、要求外交当局根据国民抗议书严厉执行。”在场群众高呼着“反对日本炮击大沽”、“反对日本侵略直隶”、“反对日本帮助奉系军阀”、“驱逐日舰出境”、“驱逐日本军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奉系军阀”、“国民革命万岁”、“反帝国主义胜利万岁”、“中国自由平等万岁！”等口号，这次大会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

次日，天津市总工会、国民会议促成会、国民讨张反日大会等天津各界70多个团体4万余人召开国民反日紧急大会，通电全国要求严惩侵略者，议决请政府严重抗议和抵制日货等项。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广东外交代表团、留日学生讨张反日归国代表团等团体，也纷纷发出抗议通电。但日本不顾中国人民的抗议，联合英、美、法、意等国，向中国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就范。

16日上午，英、美、日、法、意五国公使召开紧急会议，根据辛丑条约，抗议封锁大沽海口，由辛丑条约有关国英、美、法、日、意、荷、西、比等八国公使，联名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援引“辛丑和约所定首都与海滨间关于自由交通之特殊权利”。当日下午，首席公使欧登科代表八国向外交总长颜惠庆致最后通牒，提出五项要求：“（甲）由大沽砂州到天津之航道，须全行停止战斗行为。（乙）应除却水雷地雷及其他一切障碍物。（丙）恢复所有航路标识，且须保证将来不再发生任何妨碍行为。（丁）一

切兵船须停泊于大沽砂州之外，且须对外国船舶不加以任何干涉。（戊）除海关官吏外，应停止对于外国船舶之一切检查。对上述各项，若于3月18日（星期四）正午止，不得满足的保障时，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道自由及安全上之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压迫。”同日，日本外务省训令其驻华公使芳泽，单独就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严惩大沽口守军军官，向日本政府谢罪，并索取5万元赔偿费。同时，英、美、法、日、意等国纷纷向大沽口海面增调军舰，炫耀武力进行威胁，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势，侵略气焰极为嚣张。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下，段祺瑞政府外交部于17日复函荷使，表示“该通牒所开条款，除饬由地方军事长官妥酌办理外”，要求“有海军在天津之各国公使，迅速转行驻津海军司令官与地方军事当局形容妥商，维持至海通道之稳妥交通办法”，企图由地方当局与之妥协了事。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军被迫承认八国最后通牒的五项要求，直鲁军也接受了这五项要求。

帝国主义者根据八国联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辛丑条约”，对中国进行明目张胆的干涉并发出最后通牒，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最后通牒的当天，中共北京地委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会议，李大钊号召发动各界群众，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进行坚决斗争。当晚，李大钊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长陈毅召集教育宣传委员会会议，决定在18日八国通牒满期之前，举行群众大示威，督促政府驳回通牒，并发起召开各团体联席会议。

3月17日，为抗议帝国主义各国的最后通牒，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发表了《反对八国通牒通告》和《告民众书》，同时通知全体党员动员起来，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由各区分部组织演讲队，在全城举行废除辛丑条约的讲演。随后就组织了80多个讲演队上街讲演。当天下午，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等团体发起，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了联席会议。有200多个团体代表参加，会议当场议决：一、即日严重驳复最后通牒；二、不许日舰携带奉舰入口；三、驱逐八国公使出京；四、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即系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五、决定于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会上推举李大钊、徐谦等人及学生总会、总工会、总商会代表共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各团体联席会议散会后，除部分代表筹办国民大会外，其余代表由陈毅和安体诚、



王一飞分别率领分赴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要求执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绝对不能让步。赴国务院请愿的100多人遭到执政府卫队殴击，重伤6人，轻伤数十人。赴外交部的请愿代表，在外交大楼坚持至深夜也未得到满意结果，不得已转赴净土寺贾宅，见到国务院总理贾德耀，向当局陈述国民对驳复八国通牒的意见，并质问国务院府卫队行凶事件。贾德耀对代表意见虚与委蛇，假意表示明日即撤换府卫队，并要派员向国民大会致歉，以此麻痹群众。两路代表分别返回后，一致认为段祺瑞政府毫无诚意接纳人民群众的意见，决定全力开好国民大会，并选出徐谦、陈资一、陈日新为游行总指挥。

3月18日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主持下召开会议，对大会的布置、口号、标语和游行路线均作了相应部署。当日，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等180多个团体发出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紧急启事：

“英日等八国，为大沽航行问题，竟向我国提出极无理之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即今日正午）答复；而国贼段祺瑞，复于昨日枪伤我力争外交之爱国同胞，演成流血惨剧，有二人且有生命危险。

本日（18）上午10时，北京各界特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誓死反对此帝国主义第二次八国联军之暴行。爱国同胞，亡国在即，其速奋起，齐来参加。”

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等140余团体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80余大中学校学生，2万多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主席台前悬挂“悬挂驳复列强最后通牒”、“废除辛丑条约”、“撤退外国兵舰”、“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各国公使”等大幅标语和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血衣上书有“段祺瑞铁蹄下血”八个大字。大会由徐谦、顾孟余、陈启修、黄昌谷、丁惟汾、李大钊、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的代表八人组成主席团。会上徐谦、顾孟余等作了演说。在万众同仇敌忾的激烈气氛中，一致通过了《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独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最后，大会通过了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一致反对八国政府进攻中国；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八国公使处境；宣布辛丑条约无效；驳复八国通牒最后之要求；严惩昨日执政府卫队枪伤各团体代表之祸首；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等八项决议案。

中午12时大会结束后，举行游行示威。由2 000多群众组成游行队伍，在李大钊、赵世炎、王一飞、陈毅、陈延年等率领下，按原定计划，沿东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进发。游行群众一路高呼"打倒勾结张吴的英日帝国主义"、"驳回列强的无理通牒"、"废除辛丑条约"、"驳逐八国公使处境"等口号，并高唱《国民革命歌》。下午1时许，群众队伍到达段政府国务院门前，群众代表安体诚、丁惟汾、王乐平等5人入内交涉，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传达国民大会议决案，结果遭到卫队拒绝，即出来向群众报告。群众纷纷要求到吉兆胡同找段祺瑞。正当北京学生总会游行队伍总指挥李芳园（平民大学学生）整理队伍之际，执政府门楼内响起了信号枪，在一名卫队旅长的指挥下，一时警笛狂鸣，大门外卫队同时举枪向群众队伍平射，开始了一场空前的血腥大屠杀。凶残的卫队官兵到处追击追杀，一批批手无寸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身负重伤，仍然顽强地挺起身，但终遭刽子手的毒手而壮烈牺牲。这次惨案持续了半小时之久，共死难47人，伤者200余人，李大钊、陈乔年也在斗争中负伤。在死难中，绝大多数是大中学生，也有工人、商人、职员和市民等。

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6时，段祺瑞为了掩人耳目，开脱罪责，竟签发了一项颠倒黑白的通缉令，诬指徐谦、李大钊等人"假借共产党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军阀孙传芳等一小撮反动势力也乘机攻击共产党人"驱人就死，而自策安全，居心狡毒，实属罪不容诛"。一时反动叫嚣乌烟瘴气。

惨案发生的当晚，中共北方区委和青年团北方区委召开联席会议，议决一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并决定次日北京各校一律停课，召开追悼会，慰问受伤同学和死难者的家属。与此同时，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等150余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一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由陈毅负总责。19日，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召开紧急会议。惨案发生后，北京各校各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电、举行会议，控诉段祺瑞政府的血腥暴行。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揭露了段祺瑞政府迎合帝国主义需要，屠杀民众的罪行，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打倒惨杀爱国同胞的段祺瑞！肃清一切卖过军阀！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建立人民政府谋全国真正和平！"同时，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向全党、全团秘密发出《为段政府惨杀



爱国学生紧急通告》，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策略、原则。同日，中国国民党发表了《对北京惨案宣言》，国民政府发表了《对时局宣言》，揭露段祺瑞政府惨杀爱国民众的罪行，声援人民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以至偏远地区，都开展了声援北京人民的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北京各界群众不顾军阀政府的白色恐怖，于3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3月18日殉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高悬“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大幅标语，公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陈毅为主席，邵飘萍、王一飞等相继讲演。大会议决通电全国定3月18日伪废约纪念节；在天安门建立三一八殉难烈士纪念碑；筹备三一八烈士国葬典礼。25日，女子师范大学和北京各界人民又隆重追悼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29日，在北大一院召开更大规模的国民追悼大会，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前来致祭的达10万人。此后，北京学生总会派代表分赴各地宣传三一八惨案真相，唤起民众一致声讨军阀。

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中，北京政局动荡，段祺瑞企图以非常手段将鹿钟麟的国民军驱出北京。鹿钟麟采取断然措施，于4月9日发动政变。20日，段祺瑞决定下野离京，执政府至此也就垮台了。但是，在直奉联合进攻下，国民军陷入危困，革命势力迭遭摧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被迫转入地下，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遂转入低潮。

三一八示威请愿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共同领导的又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爱国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进攻中国的企图。这次运动虽然遭到了残酷镇压，但是它教育了广大人民，使人们认识到必须“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也进一步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作了思想准备。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有效地打击了西山会议的老右派，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却乘机扩大了它的反革命势力，并在这以后不久，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及其一伙阴谋制造了一个旨在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夺取第一军军权的“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蒋介石原本是不赞成国共合作的。孙中山很信任蒋介石，于 1923 年下半年派其赴苏俄进行实地学习和考察，但对于孙中山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他却暗含反对之意。他从苏联考察回国后，在 1924 年 3 月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就明白透露了他的意见。他在信中说道：“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既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他认为“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所以回国以后，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的问题，曾对总理表示异议。”但由于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态度坚定明确，并且蒋介石为了表示对孙中山个人的服从与忠顺，于是隐忍下来并假装完全拥护。

蒋介石从开办黄埔军校开始，唱着联俄联共的高调，玩弄两面手法，利用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支持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使他的地位在 1925 年前后迭迭上升，权力不断扩大。“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以后，大革命的高潮在全国兴起，群众起来，他对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壮大



感到非常恐惧，尤其害怕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中的发展。他便采取联合右派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方针，以篡夺革命领导权。1925 年 8 月，廖仲恺被刺杀，蒋介石利用这一事件，将在他地位之上的国民党实权人物、右派元老胡汉民和许崇智排挤出广东，乘机扩大了一部分权力。在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蒋介石伪装左派，耍尽两面派手法。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发表了《为西山会议告同志》的讲演，极力地抨击西山会议派，竭力表示要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使得蒋介石在大会上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之后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等要职，进一步扩大了手中的权利，为其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了有利条件。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这时，他身兼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职务。在军事方面，与广东的国民党领袖相比，蒋介石比汪精卫强，拥有汪精卫所不具有的军事地位和实力；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比李济深、程潜等人强，享有他们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于是蒋介石以他既得的权利为杠杆，谋求更大更多权力的野心，就急剧地增长了。

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的矛盾也促使他进一步加紧篡夺革命领导权。1926 年 2 月，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偕谭平山离粤去了北方，由另一名苏联顾问季山嘉代表鲍的职务。对于蒋介石的阴谋反共，季山嘉有所察觉，而且他甚为不满蒋介石的独裁擅权行为。于是，他竭力拉拢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对蒋介石进行抑制，这就加深了蒋介石的疑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关系越来越不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和右派骨干伍朝枢、王伯龄等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联顾问和中共要“倒蒋”，广州市面上出现了蒋介石为“新军阀”的传单。本来蒋介石早有反共之心，加上这些右派分子的挑拨煽动，他以为有了可以利用来发动政变的借口。

蒋介石要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击，除了玩弄阴谋，蒙蔽群众，骗取支持以外，事先还做了各种相应的准备。戴季陶的反共理论为他进行分裂排共做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与此同时，他利用职权，作了各种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他在国民党控制的各个要害部门，安插亲信，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在黄埔军校学生中，他支持成立了反动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以与当时革命军人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等。蒋介石在作好了这些相应的准备后，寻机发动了以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目标的“中山舰事件”。

1926 年 3 月 18 日晚，蒋介石派遣黄埔军校办事处主任、孙文主义学会

骨干欧阳忠等3人，以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广州文德路李之龙（共产党员，时任代理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的住宅，向李传达一个所谓的命令，全文如下：“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三月十八日。”李之龙在接到这个“命令”后，随即通知了“中山”、“宝壁”二舰于3月19日早晨开往黄埔。19日下午，中山舰开到黄埔，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回答说，不知道有此事。中山舰在黄埔没有任务，当天下午就返回广州。这时，蒋介石故作“惊诧”，否认曾经发出调舰命令，声称中山舰开往黄埔是“矫令”行动。蒋介石的爪牙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大放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共产派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20日晨3时，蒋介石密令陈肇英、欧阳格到文德路逮捕了李之龙，派兵占领中山舰并解除其武装；命令刘峙率部队包围东园内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命令吴铁成率公安部队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的共产党机关；命令缪斌将第二师各级左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共40多人全部扣押，拘留于广州造币厂内。周恩来被软禁一天，蒋介石还派人严密监视邓演达；同时宣布广州城内断绝交通，全市戒严。

这次事变的结果，中山舰的军权被蒋介石夺取，舰长换成了欧阳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被驱逐，党代表制度被取消；由黄埔军校革命军人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解散，所有会员被迫退出黄埔学生军；以季山嘉为首的三名坚决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苏联顾问被解聘回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打击，而蒋介石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广东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地位。此外，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排挤，当时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被迫于5月初离开广州，去了法国。汪精卫的出走，在客观上给蒋介石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控制提供了机会。蒋介石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从这时起，蒋介石的立场，就公开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

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变，受到共产党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与谴责。中山舰事变刚发生时，毛泽东到苏俄军事顾问团驻地，会见了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商讨对蒋介石制造事变的对策。毛泽东当即提出了正确的意见。毛泽东极力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团结一切真诚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采取强硬的方针，



给他予以坚决的回击，以巩固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指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对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一是试探。“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我们示弱，他就得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毛泽东并提出，首先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撤到叶挺独立团的驻地肇庆一带去，依靠驻防当地的力量争取第二、三、四、五、六各军的力量；然后开会通电声讨蒋介石，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予以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

中共广东区委的一贯态度和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广东区委的同志们也认为：“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3月20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变。”中山舰事变发生后，陈延年、恽代英、张太雷等召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说明事件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要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周恩来刚从东江前线回到广州，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就赶到广东造币厂，当面质询蒋介石，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

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件，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当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何香凝立即冒着很大风险去见住在广州造币厂内的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解除包围并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指责他制造事变是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邓演达斥责蒋介石镇压中山舰及对俄顾问卫队缴械，疑近反革命。柳亚子则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李济深、谭延闿等对于蒋介石的扩军独裁、排除异己的行为是反感的，亦表示反对蒋介石的所为。汪精卫对蒋介石也深为不满。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独断专行，不把汪精卫放在眼里，使汪精卫大为愤慨。

在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下，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被拘捕的50多名共产党员，发还缴去的枪支，并表示中山舰事件只是一场“误会”。在当时形势下，如果给蒋介石予以坚决回击，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蒋介石的突然袭击面前，却采取了软弱无能的退让态度。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陈独秀派张国焘来广州，代表中共中央处理中山舰事件一案。张国焘积极贯彻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在和蒋介石大开谈判时，张国焘对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

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地合作。”

苏联顾问团当时在中国推行的也是陈独秀的这种妥协政策。中山舰事变发生时，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在广州考察，对于蒋介石的反苏反共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3 月 24 日，在广州苏联顾问团举行的会议上，布勃诺夫指出“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但是会议仍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顾问。

由于陈独秀等对中山舰事件采取右倾退让政策，使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在对革命力量进行打击上初步得逞。从此，蒋介石等新右派更加猖狂起来，准备向我党和革命人民发动新的挑衅和进攻。

中山舰事件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他的统治地位，夺得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蒋介石在 1926 年 5 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从党务方面向共产党发动新的进攻。

1926 年 4 月 3 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建议，并要求“应即于一月内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整肃纪律，检查分子”。4 月 6 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正式提出了“从速预备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提案。会议接受蒋介石的提议，决定于 5 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1926 年 5 月 15 日 ~25 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选举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组成大会主席团，并由蒋介石担任首次会议的执行主席。会上，蒋介石以“消释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抛出了四个所谓“整理党务”的提案，企图压制共产党，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蒋介石的第一个提案名为“整理党事务”，第二个提案名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第三个提案名为“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第四个提案是他在大会上的临时提议，他主张：一、本党全部党员重新登记；二、各处党部须统一，无中央命令之党部应一律取消。蒋介石及其一伙制造的“整理党务案”，其目的完全在于压制共产党，进一步打击削弱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就其核心内容来说，就是要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不得占委员总数的 1/3 以上，共产党员不得当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党员的指示须提交国共两党联系会议通过才能下达，等等。

为了寻找和确定自己在这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的对策，中共中央派张国



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用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又作了党务上的大让步。

对蒋介石等右派制造的这一新的反共事件，毛泽东、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和其时出席会议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都竭力反对。何香凝"义愤填膺"，怒斥右派，含泪指出"《整理党务案》违背中山先生的真意，……这实际上是反共、反对联俄，给工人农民带来不利"。柳亚子对何香凝的"激昂发言，不停地点头，鼓掌助威，表示赞同"。后来，蒋介石纠集右派多数，在陈独秀、张国焘采取妥协退让之下，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事后，彭泽民跑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痛哭不止，表示愤慨之情。

《整理党务案》的通过，是蒋介石的一个很大胜利。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根据《整理党务案》的有关规定，对国民党中央的人事作了重新调整。原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一批共产党人谭平山、林伯渠等被解职，让老政客顾孟余当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当了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推选半身不遂的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则当了组织部长（不久即由蒋的亲信陈果夫接任）兼军人部长。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就占了极大的优势。随后，蒋介石于 6 月 5 日又通过国民政府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时正是国民革命军即将出师北伐的紧要关头。按照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就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拥有了作为一个新军阀头子所必须具备的权利基础。勃勃不止的反革命野心，和反动的军事实力相结合，使蒋介石的反革命胆量一天天大起来。

国共两党关于北伐的态度

国民党十分重视北伐，在组织和指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孙中山在世时，就曾在1921年和1924年两次举行过北伐，希望通过北伐统一中国，建立自由、独立的新国家。但是，由于内外环境的制约，孙中山的愿望未能实现。1925年下半年，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在陆海军大元帅府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各自为政的驻粤各军也统一组编成国民革命军；唇齿相依的广西也推翻了旧桂系的统治，兴师北伐问鼎中原的物质条件基本具备。北伐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依靠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在“反赤”的旗帜之下，进攻南北革命势力。为了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就成为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就提出了北伐问题。1月4日，蒋介石宴请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席间说道：“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观察，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6日，他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中指出“我现在敢说一句，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会议期间，他提出一项提案，其中说到：“现革命根据地之广东将近统一，革命基础遂渐巩固，行将秣马厉兵，出定中原。”1月19日，汪精卫在大会上致闭幕词，他说：“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统一全国。”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新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蒋介石又提出了“早定北伐大计，应援西北国民军案”。3月24日，蒋介石与来华考察的苏联使团团长布勃诺夫话别，也谈到“中国革命之现势非速定出兵北伐大计不可。”3月上旬，湖南人民反吴（佩孚）驱赵（恒惕）的怒潮达到高峰，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相机出动武力，赵恒惕被迫下台，唐生智控制



了湖南省政权。唐的革命倾向为吴佩孚所不容，随后派叶开鑫进攻唐生智。唐军被迫放弃长沙，向两广求援。国民革命军援湘作战，揭开了北伐的序幕。

国民党在发动北伐中也存在着问题。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国民党中其他人，积极主张和组织北伐都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主张通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消除内乱，统一全国，这是应乎时势、合乎国情、顺乎民心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掺杂着私利在其中。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被推上了中央委员、中央常委的高位，随着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但其实力并无太大的增长，所能指挥自如的仍然只有第一军。出师北伐，实行战时体制，他可以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利。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等广西军人热心北伐，除了作为一派年轻军人立志干一番大事业以外，也有扩张地盘的实际需要。广西统一以后，李宗仁与黄绍竑两支军队合而为一，但渊源各自，和合为难，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内部权力分配问题。驻粤客籍将领局促广东一隅，困难重重，深感只有打出广东去才能天高任鸟飞。而粤籍将领则认为一旦北伐，客籍各军纷纷开拔，这等于不驱自走，从而轻而易举地把广东完全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这种寻求个人地盘、权益的意见和想法，在5月制订的北伐作战计划中充分反映了出来。这个计划以攻占湖北为第一作战目标，拟派3个军取道江西，以4个军攻打湖南，最后会师武汉。根据这一计划，北伐军必须同时向吴佩孚和孙传芳开战，这是北伐军力所不及的。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唐生智不愿曾被他打败的谭延闿和程潜所属第二军和第六军回到湖南。白崇禧、陈铭枢在长沙已向唐生智作出了二、六军不调湖南的许诺。而谭延闿丢失了湖南则力求占领江西作补偿。朱培德和程潜也只有向长江下游发展才有指望。而蒋介石也是打算尽快把宁、沪、杭一带最富庶的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准备北伐期间，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接着，通过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一揽党、政、军大权。他试图建立个人独裁，但羽翼未满，故又必须加以掩饰，多方应付，并没有集中精力筹划北伐。当北伐先遣队同第八军在湖南与叶开鑫打得炮火连天时，广州并没有一丝战时气氛。李宗仁风尘仆仆赶到广州与蒋介石商讨北伐大计，蒋介石当头浇了一瓢冷水，说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其后，李宗仁又多次面促，蒋介石以李宗仁等“不识内情”，“深致惋慨”，颇有不胜其烦之态。当援助唐生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时，驻粤各军多徘徊观望，不肯率先出动。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自然不会派出去打前站，谭延闿、

程潜对唐生智余恨未消，说什么也不肯先期救援。结果，李济深同意先派两个师及独立团，并令独立团先行入湘。根据这种情形，周恩来在给独立团作指示时，就要求独立团一定要打胜仗，以便把那些不愿意派人打头阵的部队引上来。7月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北伐誓师典礼，发表了许多文告，阐明了北伐的性质和意义，但没有涉及削弱和反对农村封建制度的问题。苏联顾问鲍罗廷主张在北伐宣言中提出土地政纲或减租政策，蒋介石不赞同，鲍罗廷提议待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再宣布，而蒋介石仍认为太早。只是到了10月，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紧密合作，排除干扰，才在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减租政策。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1925年底以后的全国革命形势，认真总结了五卅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积极主张北伐。1925年12月20日，中共广东区党、团委员会联合发出《告广东民众》，明确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应“与全国革命民众携手”，打倒北洋军阀势力，“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1926年1月1日，中共广东区委又在《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强调，国民党应深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将“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在这里，广东区委虽然没有提“北伐”一词，但实际上已提出了北伐的主张，即广东革命势力的向北发展。接着，中共中央也从1926年1月中旬起转而积极主张北伐。1月14日出版的《向导》发表了彭述之《所谓反奉战争之结束与民众目前之责任》一文，指出广州政府因为要肃清内部反革命势力不能参加反奉战争，是1925年底反奉战争“流产”的重要原因。由于反奉战争的失败，“中国政局已快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快到了奉直两系军阀和其他一切反动势力联合，向革命的势力进攻的时期了。希望广州政府赶快起来“问鼎中原”，号召全国民众“真正有力组织起来，敦促广州政府和国民军一致地继续向奉系军阀进攻”。2月7日，中共中央联合共青团中央发出《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援助国民军，“并集合在一种行动的组织之中，表现自己的势力，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2月21日~24日，中共中央召开北京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北伐问题，指出“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因病势沉重没有出席会议，但当时他是主张北伐的。3月2日，他在上海会见联共布勃诺夫及其代表团时，非常热心地谈到，国民革命军必须立即出师北伐。1926年3月14日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



专门对北京特别会议的决议作出解释，更加明确了党对北伐的态度。通告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

1926 年 3 月 20 日发生中山舰事件之前，中共党内对北伐的态度还是基本一致的，事件之后产生了分歧。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及中共广东区委、湖南区委等地区党组仍积极主张并切实支持北伐。3 月 30 日，广东区委发出《宣传大纲》，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北伐。4 月，共产党员刘尔崧领导的广州工代会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并积极做好支前准备。5 月 1 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分别在中华全国总会和中共广东区委的组织领导下，同时在广州召开，两个大会都发表了敦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和组织群众支持北伐的宣言，通过了有关决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还发表了《为敦促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并联合广东第二次农民大会代表组织请愿队伍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迅速出师北伐。5 月 26 日，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在《人民周刊》呼吁民众"赞助北伐"。在穗中共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还联合中华全国总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省教育会及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等 7 大团体于 5 月 17 日成立"农工商学联合会"，并于 6 月 3 日发表支持北伐的宣言，指出"此次北伐关系中国生死存亡，人民更宜与国民政府合作到底，完成国民革命"。中共湘区区委则积极协助广州国民政府做争取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的工作，共产党人郭亮、夏曦、易礼容、李维汉等多次与唐的代表邓寿荃联系和会谈，劝唐率部早日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同时，积极组织工人农民支持北伐。

但远离广州革命中心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对北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5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一百零一号》，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北伐的军力与财政固须设法充实"，但广州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若不能很好的消弭，则前途危险正多"，"现在大局的情形，自然不是一个革命势力积极进攻的时期"，广州政府及北方国民军只要能守住现有实力，已是很大的胜利。1926 年 7 月底，在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压力下，同时也出于对北方形势恶化后的中国政局的担

忧，陈独秀的思想开始转变。陈独秀接受了维经斯基等人的观点，改变了立即支持北伐的态度，于1926年7月9日在《向导》第161期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其本意是在强调时下要注意吴佩孚的南伐，强调进行“防御战争”，并非从根本上反对北伐。同时，文章提出在北伐中应防止和反对的几个错误观念和行动，如搜刮平民以充战费、剥夺人民自由以维治安等，也是针对实际情形而言的。陈独秀认为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经右倾，此时北伐弊多利少。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不能立即北伐，因为北伐只能增长蒋介石的实力；应等到革命的军事力量增强，广大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再进行北伐。即是不反对北伐，但反对立即北伐。

陈独秀此文一发表，立即在国共两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国民党中，顾孟余指责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的感情。张静江不仅给陈独秀写信大加谴责，而且亲自找到鲍罗廷，要求他告诉陈独秀今后不要再做这类文章。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特区党部则向中央党部提出对陈独秀的控告，并禁止学生购阅《向导》周报。1926年8月24日，蒋介石在督师北伐的过程中看到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当天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现阅《向导》周报第一百六十一期陈独秀君《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查陈独秀君乃中国共产党领袖，《向导》周报为中国共产党言论机关，此种言论，中国共产党当负其责任。值此严谨时期，发此言论，显然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不敢缄默。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

在共产党内，有人支持陈独秀，也有人对他的观点提出疑问和指责。为了澄清党内认识，192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反对吴佩孚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明确指出：“我们并不是反对北伐，是赞成北伐，尤其在现时广东北伐更为必要。”“不过我们虽极力赞助广东政府之出兵，同时须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一、令民众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工作；二、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三、为北伐而先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所以当具体指出现时广东政府出兵的性质，提出我们独立的政治主张，而不可笼统的宣传北伐。”

尽管如此，陈独秀很快就注意到，当北伐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共产党的被动。于是顺应可这一趋势，开始采取积极行动，号召民众支持北伐，并在支持北伐的过程中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以使“单纯军事行



动”的北伐转变为“革命的北伐”。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是“一、北伐的意义是南方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这种军事行动只是促进军阀政治之破坏，开展民众运动之局面，我们不能引导民众对于北伐存过高的希望，有坐待北伐军来解放的幻想。二、北伐当中须防投机的军人政客权位欲的活动，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与利益。”并向全党传达意图，“我们不梦想此次北伐军事胜利就是一种革命，就能实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只是在从这个运动中引导当地民众起来参加地方政治斗争，把民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逐渐形成民众在政治上的势力。”

在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号召和领导下，北伐沿途各地的党组织将支持北伐作为中心工作。在北伐军所到之处，人民纷纷动员起来，为北伐军送信、带路、运送物资，破坏敌人交通等，为北伐胜利进军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北伐军所到地区迅速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农村革命。各地建立了许多农会组织，在农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展开了斗争。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是反对北伐，而是不主张立即北伐。反对北伐的而是联共中央局。陈独秀虽然在文章中对立即北伐持消极态度，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积极支持并领导北伐的。而且他的文章是揭露了蒋介石新右派和新军阀的真面目，无疑助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野心。后来蒋介石利用北伐战争壮大自己的实力，背叛革命证明了陈独秀所言。国民党在发动北伐中做了大量组织准备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国民党对北伐的主张和组织具有两重性，掺杂了扩张地盘的私心杂念，缺乏发动农民的正确政纲。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6年开始，国民大革命进入了武装斗争和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的阶段。为了总结“五卅”运动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组织工农群众特别是组织农民群众，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迎接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的有关规定，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的决定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接受了孙中山的遗嘱，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必要的斗争。1月7日，刘尔松向与会代表报告了两年来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人运动决议案》。指出对于目前工人运动的进行，应当利用五卅运动对工人阶级的洗礼和锻炼，加强教育和宣传，养成政治斗争的持久性；在组织建设方面，应努力使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产业、各地方的工会组织健全、独立、有系统；极力扶助工人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1月25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就各省区党务报告作出决议，指出“坐视工人团体受帝国主义、军阀的摧残，不加过问，殊非本党拥护农工利益之意思。”强调各地党部，应加强对本地工人运动的参与和指导。

国民党“二大”继承了“一大”宣言的基本精神，结合国共合作两年来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使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进一步具体化，有利于工农运动的发展，是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但是国民党“二大”在同西山会议派进行斗争的同时，对于正在逐步膨胀的新右派势力缺乏必要的警惕。蒋介石在“二大”召开后，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从国民党二大开始，连续取得了政治、军事和党务上的胜利，成为革命阵营中的最大隐患。



1926年1月，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下，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倾向革命的国民革命军。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2月21～24日，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政局，认为五卅以后工人阶级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指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更证明农民的接应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会议还决定，于本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6年2月19日，刘少奇到达广州。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患病，由刘少奇代理全国总工会委员长。4月8日，刘少奇主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议，决定于本年五一劳动节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刘少奇、戴卓民、陆沉、孙良惠、刘尔松为筹备委员。会议电告各工会准备派代表出席，并邀请赤色职工国际以及苏联、英、法、德、日、印度、爪哇、菲律宾等国工会届时派员参加。刘少奇还亲自同广东总工会的负责人商谈该会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事宜，取得圆满结果。

在革命斗争暂时处于积蓄力量的时期，4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我们今后怎样工作》的小册子，及时规定了领导群众前进的策略方针。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宣传工作要深入群众，必须把全国的政治运动和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结合起来。这些策略方针、原则，对于各地整顿工会，建立多种形式的工人组织及为迎接北伐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为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明确了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号召工人阶级，不仅加强产业工人的组织，而且要普及于一般工人群众；不仅组织一般的工人群众，而且要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提出：“我们必须努力扩大及巩固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才能抵抗一切特权阶级的压迫，以致获得我们政治斗争的初步胜利—民族革命的胜利。”这个精神与《我们今后怎样工作》所规定的策略方针是一致的。

4月29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预备会议，确定了大会3项议程：一、总结一年来的工人运动；二、确定工人运动的方针；三、改选全总执行委员会。次日，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大会临时主席兼秘书长，苏兆征、邓中

夏、李立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26年5月1日~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开幕式。出席这次劳动大会的代表共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和124万余名会员。英、俄、法、德、美、日等国的工会代表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邓中夏致开幕词。他提出要继承先烈精神，集中力量，与各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分别向大会致了祝词。大会发表了开幕通电、告工友书、告农友书和致全世界工人书。次日，两个大会的代表又出席了廖仲恺先生纪念碑奠基典礼，隆重纪念这位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农民部长等职，为民族民主革命而献身的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

会议期间，刘少奇先后报告了一年来全国工运的发展状况和全国总工会执委会的工作；李立三先后报告了上海总工会的工作和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的情况；苏兆征报告了省港大罢工的情况；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报告了世界革命状况。与会代表还分别听取了全国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国民政府现状、世界职工运动、苏联状况以及关于工农兵大联合等报告。全国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和武汉工人代表团的代表介绍了各自或本地的工作及其现状；汉冶萍总工会代表介绍了1925年9月安源事件及其后的情况。大会就上述主要报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刘少奇在《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中，阐述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状况及其趋势。他指出：一年来中国工人运动有极大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各种奋斗事实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均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及军阀进攻”，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斗争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是人民的敌人，也是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但不能彻底，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时，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应当与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促进小资产阶级之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应切实提携农民，援助农民的斗争，照顾农民的利益。



大会对刘少奇报告中的上述结论表示完全赞同，其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应切实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进行革命”，“切实提携农民，联合小商人、学生及社会上一切革命民众，建立联合战线，进行中国的革命。”这就以大会决议的形式在工人运动中进一步贯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

大会总结了“五卅”以来工人运动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支援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大会通过的《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政府之下，已获得相当之自由。工人阶级为保持他们已获得的自由，就必须巩固国民政府，而且全国工人都必须赞助国民政府北伐。”《关于全国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报告的决议》中指出：“目前我们工农阶级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以全力拥护广州政府，扶助广州政府北伐。”

为了实现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动员和组织全国工人准备和迎接北伐战争，并在新形势下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大会根据五卅以来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和各地的不同条件，对如何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巩固和扩大工会组织，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和方针。

大会的决议指出，工人运动目前的总策略是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第一个组织形式，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政党在于团结目的一致和最能奋斗之工人为全国工人阶级之利益而奋斗”，“工人群众尤须拥护和运用工人政党以与压迫阶级相抗”。即公开宣布了中国工人阶级立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工人阶级其他两个组织形式：一是工会；二是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如合作社、工人学校、俱乐部、图书室、饭堂、寄宿舍等。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中坚力量。工人运动的发展，必须以产业工人为中心，联络手工业工人、小工厂工人和店员。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团结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国民革命的阵线上奋斗，这是打到帝国主义与军阀、解放自己的唯一法门。

在工会组织建设方面，提出必须以严密、集中为原则，搞好产业工会与职业工会的建设，加强各级各类工会的统一。工厂支部是工会的基本组织，全国性的产业总工会是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在工会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应厉行秘密工会的组织和活动。

刘少奇在《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的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因此，“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之发展，

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大会通过了《经济斗争最近目标与其步骤决议案》，确认经济斗争是工会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政治性，是工会的日常工作。当前经济斗争的目标，一是必须有共同的普遍的要求。二是必须认定这种目标包含有改善生活、促进组织发展、不脱离政治斗争的作用。具体要求应包括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提高待遇、取消包工制、改善女工和童工生活等内容。至于经济斗争如何开展，则须考虑当时当地的组织状况、行动步骤、行动时机等因素。此外，大会还决定在全国一些重要城市、交通要道和工业区设立全国总工会办事处，领导全国各地的工运工作。

工人阶级有力的斗争武器是罢工。五卅运动，特别是省港大罢工的进行，促使这次大会提出罢工战术问题。只有正确掌握了罢工战术，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斗争无往不胜。《罢工战术决议案》从指导思想上规定，“在每一个经济罢工的时候，一定要引导向政治的路上走，在每一个罢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工人的经济要求。”只有把政治和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满足中国工人运动的要求。决议提出，没有组织过工人罢工的，不要畏惧罢工；罢工胜利过的，不要贸然罢工。决定罢工时，务必对这个时期的总策略、总现象与趋势、经济状况、群众心理与要求、敌我力量和社会力量，都有正确的了解和估量，切忌轻举妄动、这项决议还十分周密细致地提出了 21 条进攻和自卫的策略，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指导作用。与会代表对于这个新问题，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大会还通过了《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工会运动中之女工及童工问题决议案》、《劳动法大纲决议案》、《失业问题决议案》、《合作社问题决议案》等其他决议。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全国 699 个工会积极行动起来，为迎接和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做好准备。

大会最后发表了《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表示“现我中国工人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唯一出路，即在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以与军阀、帝国主义者作殊死之争斗，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打倒一切军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敝大会全体代表当领率全国工人一致参加，以为钧府后盾。”

5 月 12 日，大会选举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执行委员 35 人，他们是：林伟民、苏兆征、戴卓民、李立三、项英、王亚璋、王功、张佐臣、邓培、王荷波、朱少连、刘文松、刘尔松、申耀、陆枝、原顺鸿、冯敬、沈润生、何耀全、袁荣、张春奇、李森、许世先、袁



祜青、卢兴三、钟山、陶卓然、袁大石、丁志华、王文石、邓中夏、黄平、陆沉、刘少奇、（缺1人）。候补执行委员17人，他们是：魏锡珍、王昌教、李光才、黄金源、冯才、罗珠、郭华俊、叶樟、孙云鹏、周振生。当晚举行闭幕典礼，李立三致闭幕词，宣告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闭幕。

5月14日，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朱少连、何耀全、刘文松、项英、陆枝为常务委员。鉴于前委员长林伟民积劳成疾，身患骨结核病，会议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5月16日，第一次常委会推选刘少奇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部长，李立三为组织部长，邓中夏为宣传部长。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总结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北伐战争形势下发展工人运动的策略方针和原则，为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作了战前动员。会后，党的大批工运干部根据大会决议的精神，纷纷返回各个地区，到工人群众中紧张地开展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动员工人群众起来迎接并支援北伐进军具有重大意义。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也正在会后不久就誓师紧张地开展工作。

北伐前的政治军事力量对比

北伐前夕，中国的国内政局错综复杂。在北方，各派军阀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全国主要的三支军阀集团在全国分布态势如下：

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三省、津浦路北段及京津一带，拥兵约35万人，在各军阀集团中实力最强。不但有一支久经沙场和训练有素的陆军，而且有一支力量可观的空军与海军，拥有飞机260架，军舰数十艘。奉天兵工厂日造子弹40万发，年产大炮200余门。

直系军阀吴佩孚，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及陕西东部、河北南部等地，控制长江中游，并拥有湖北汉阳、河南巩县两大兵工厂，有军队约25万人。北伐前，为了同奉系军阀争夺中央政权和北方地盘，吴佩孚把主要军事力量调往河北、津、保一带，留在南方两湖地区的多属湘鄂地区部队。他在联合“反赤”口号下，北联奉张，围攻国民军；南结闽、赣、粤、桂各省军阀，阴谋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敌人。

原属直系、后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有东南地区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及上海市，控制长江下游和津浦路南段，有军队约25万人。东南五省多为膏腴富饶之地，其经济力量比吴、张都占优势。孙传芳以“保境安民”、“和平中立”相标榜，秣兵厉马，养精蓄锐，在赣、粤边境弯弓盘马，布阵陈兵，时刻准备进攻湖南、广东，侵袭北伐革命军的后方基地。

除以上三大军阀以外，还存在一些地方军阀，如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袁祖铭，四川的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湖南的赵恒惕等。这些地方军阀一般据守一省，为确保自己地位，对中原逐鹿往往采取见风使舵的策略。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北京政权名义上是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实际上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段、张勾结，排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把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的苏、皖等地。奉系的南下，加剧了同直系军阀的利害冲突。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从1925年冬~1926年初，北京、上海、汉口等地相继爆发反对奉系军阀的群众示威。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促使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奉军新派将领郭松龄因受旧派排斥，于1925年11月22日公开与奉军决裂，次日发兵由滦州出关反奉。郭军得国民军宋哲元部援助，迅速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正当奉军岌岌可危之时，日本帝国主义以取得在东北更多特权为条件，悍然出兵帮助张作霖进攻郭松龄部。24日，郭败，潜逃被捕杀。残部由魏益三率领，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时奉军张宗昌之师长方振武也脱离奉军，改称国民军第五军。

这时的国民军据有热、察、绥、豫、甘、陕等省，军队40多万人，控制着京汉、京奉、津浦等交通干线。辖区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了引起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仇视。直奉在争夺北京中央政权问题上虽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但在反对革命方面则是一致的。他们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暂时结成反革命联盟，共同对付广东革命政府。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他们依据讨伐"南北二赤"的反革命协定，加紧了进攻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军事部署。在北方，直奉合力，以奉系为主，率军10万人，兵分几路，向南口、晋北、西安、甘肃等国民军驻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军事围攻。在南方，吴佩孚在湖北组织援湘军，与东南军阀孙传芳、滇军唐继尧、川军刘湘、杨森等联络配合，发动了援赵（恒惕）驱唐（生智）的战争。企图先占湖南，后取广东。孙传芳虽和吴、张有矛盾，暂挂"保境安民"招牌，以抵挡吴、张势力的压迫；但同时，也积极备战。在这些军阀中，吴佩孚约10万兵力集中在两湖地区，是围攻广东的主力军。1926年4月，吴令叶开鑫在湖南攻打倾向革命的唐生智，开始了反革命的"南伐"。孙传芳部下邓如琢部队2万余人集中于江西，准备袭击国民革命军的侧面。另外，在福建有孙传芳的部下周荫人部队3万人，准备伺机袭击广东革命根据地，妄图将广州国民政府扼杀在摇篮中。

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人民群众毫无政治权利，群众领袖被通缉，进步报刊被封闭，进步记者被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遭镇压。1926年4月~8月，北洋军阀先后枪杀了《京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逮捕了《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逼走了《民主晚报》主笔成济安等。

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而进行无休无止的混战，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京政府的军费占财政总支出的70%以上。1926年的军费开支

达6亿多元，相当于1911年的6倍。为了筹措军费，各地军阀横征暴敛，增加苛捐杂税，发行公债、票券，榨取人民血汗。曹锟为了搜刮战费，曾经规定：大县派款五万元，小米、高粱四千石；中等县派款四万元，小米、高粱三千石；小县派款三万元，小米、高粱二千石。1926年4月，张宗昌在山东加征捐税达6次之多，同时强征捐税几十种，连农民种白菜、大蒜都得纳税。有的地方甚至预征田赋几年甚至几十年。

1925年到1926年春，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出现了革命高潮。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北洋军阀十多年的残暴统治。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府，是孙中山先生的夙愿。他曾于1922年5月和1924年9月，两次举兵北伐，因种种牵制而半途而废。1926年初，经过五卅运动和广东战争，进行北伐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为推动和发动北伐，1926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此时正处在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决战的时机，若不急起向吴佩孚行总攻击，则任这局面发展下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所受的打击将不堪设想了。""我们应该积极的行动，向吴佩孚进行总攻击"，"打倒吴佩孚，援助国民军"。因此，"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不犹豫的、不妥协的对付吴佩孚并肃清吴系在长江的势力。"①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北京召了特别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郑重讨论了北伐问题。会议明确指出："现在的政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②。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北伐。这不仅要在广东作军事上的准备，而且要在北伐军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发动群众起来接应北伐，特别是要组织农民。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会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工农运动的领导和推动，并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和青年团到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为北伐战争作了重要的准备。不久，中共中央又在3月14日发出的第七十九号通告中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③1926年4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提出坚决拥护北伐的号召。1926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

会，大会宣言号召："在政治上要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肃清北方的反动势力"[④]。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目前我们工农阶级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以全力拥护广州政府，扶助广州政府北伐。"[⑤]6月3日，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组织和发动下，广东农工商联合会发表宣言，表示热烈赞成北伐。与此同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各界群众组织和海外华侨团体，纷纷集会和通电，"敦请国民政府迅速北伐"，表示"誓作国民革命后盾"。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推动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据1926年6月统计，全国乡以上的农民协会达5 353个，会员98万之多，遍及12个省；工会组织近700个，会员达120多万。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正当各革命阶层和革命派别在积极酝酿北伐的时候，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通过制造这一事件一箭三雕，既打击了汪精卫和苏联顾问，也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对在此时进行北伐产生了疑虑，担心北伐的胜利将会成为蒋介石个人独裁的胜利。陈独秀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清楚地说出了这种疑虑："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办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它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⑥]4月下旬刚返回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也持相似观点。他们认为事先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陈独秀等人对如何防止野心家利用北伐壮大右派军事势力，在将来篡夺北伐的胜利果实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不懂得中国共产党人只有积极参加北伐战争的领导，奋力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增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才能有效地遏制右派势力的膨胀，防止和对付资产阶级可能的背叛。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北伐，贬低北伐的意义，放弃对北伐领导权的争夺，放弃同蒋介石的斗争，只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此外，广州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支持下，也加紧了进行北伐的组织实施工作，首先，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各系统都建立了领导机构，大元帅府已

改组为国民政府，便于发号施令，组织行动。其次，经过广东的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梧州会议后，又实现了两广的统一，两广成为北伐军的稳固后方基地。以李宗仁为首的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从而增强了革命的力量。

从全局看，当时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也是有利于革命方面的。北洋军阀长期混战，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张作霖、吴佩孚两大派由于政治、军事利益的冲突，其联合也只是暂时的；吴佩孚、孙传芳在对奉系问题上也存在诸多分歧。另外，北洋军阀军队虽比国民革命军要多，但他们根本无法统一和集中，更谈不上一致团结。况且吴佩孚的势力，还受着冯玉祥国民军的牵制，吴实际上处于南北受敌的状态。因此，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但有必要性，而且具有迅速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北伐战争是一个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的战争，参加北伐的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势力，对战争有着不同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工农大众和国民党左派参加战争的目的是反帝反封。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参加北伐的目的，在于控制革命发展的进程，乘机抢夺地盘，扩大势力，最后夺取全部的领导权。1926 年 6 月 5 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把总司令的权力无限地扩大，使国民政府属下的军事、民政、财政等所有机构都由他一人指挥和调度，蒋介石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独裁。因此，在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潜伏着蒋介石出卖革命的严重危机。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 40、41 页。

②《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1926 年 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56 页。

③《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1926 年 3 月 14 日)，同上书，第 81 页。

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226 页。

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20 页。

⑥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 161 期 (1926 年 7 月 7 日)。

李宗仁出兵援湘策动国民党北伐

北伐战争的前奏是援湘作战。北伐前夕，湖南地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已经十分尖锐，爆发了所谓唐（生智）赵（恒惕）之间争夺湖南的战争。

湖南自1920年以来即为地方军阀赵恒惕所盘踞。赵在很长时期内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作为他南抗北拒的护符。但实际上，他只是吴佩孚的一个附庸，一直充当着吴控制湖南人民的工具，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北伐的巨大障碍。

赵恒惕在其所谓“省宪法”的掩盖下，对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实行残酷镇压。1926年3月初，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反英讨吴驱赵运动。此时，赵恒惕军阀集团内部开始分化，其所属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在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王基永等的策动下，开始倾向广东革命政府。唐生智这种新的政治动向，使湖南局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重要变化。

当湖南人民的反吴驱赵斗争达到高潮时，唐见倒赵时机成熟，于3月8日，令所部第十五团兵分三路由湘南向长沙逼近。9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为配合唐氏倒赵，在长沙召开了3万余民众的市民大会，通过了“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等主张，成立了包括工、商、教育各界代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湖南各县人民也纷纷起来响应。

1926年3月12日，赵恒惕在人民压力下，被迫通电去职，随即逃往汉口。3月25日，唐生智宣布就任代省长职。当晚，唐借召开军事会议之机逮捕了参加会议的第二师师长刘铏、旅长唐希忭、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代理师长张雄舆、旅长刘重威等5人，同时下令解除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等人职务，取消第二、三两师番号，所辖各旅改由省长指挥。唐部何键旅也开始向驻岳阳的叶开鑫进攻，于3月27日占领岳阳。

赵恒惕失败后逃往汉口投靠吴佩孚。吴佩孚便乘机以援赵为借口进兵湖南。3月30日，吴佩孚召开军事会议，调五师、两旅，在鄂南沙市、沔阳、蒲圻、通城、阳新一带布防。同时，组织鄂、湘、赣三省兵力援赵驱唐。

1926年4月初，吴佩孚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4月21日，叶开鑫通电任职，率湘军贺耀祖师、蒋锄欧旅、鄂军王都庆师、余祖森旅、粤军谢文炳师、岳州镇守使邹序彬部沿武长路、平浏大道两路进攻长沙。23日，唐生智下令讨伐叶开鑫，叶唐战争爆发。叶氏倚吴佩孚作靠山，唐氏以广东为后盾。从双方实力而言，唐生智的兵力不敌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战争打响后，湘军第一师和第二师见叶开鑫一方实力强大，亦参与讨唐。30日，叶军先后占领岳阳、汨罗、平江、醴陵、湘潭。唐军寡不敌众，下令放弃长沙，撤退至衡山、攸县、安仁一线。5月上旬，叶开鑫受吴佩孚命令，指挥三路北军进攻唐生智部。唐军三面受敌，衡阳告急。唐急电向李宗仁求援。

李宗仁经过深思熟虑后，随即命令钟祖培旅兼程前往，增援衡阳的唐军，同时调其他援军向湖南边境进发。钟祖培旅很快到达衡阳，这给正准备继续后撤的唐军增添了力量。于是，钟、唐军立即与吴军发生激战。钟祖培旅士气旺盛，官兵骁勇，很快阻止了吴军的进攻，使衡阳转危为安。双方相持于衡山、衡阳间和涟水一带。

李宗仁在下令桂军入湘作战的同时，还致电广东革命政府，希望速定北伐大计，并表示将赴粤妥商有关事宜。

5月10日，李宗仁抵广州游说，策动北伐。当晚，在出席李济深为其专设的晚宴后，他就先同李济深谈及北伐大计。李济深对其北伐主张甚表同情，并告知，其时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尚未完全平息，北伐恐怕一时难于实现。李宗仁深感专程赴粤策动北伐非其时，不免产生失望之情。但他深知，北伐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是国民革命的大事。因此，他准备迎难而上，尽最大努力促成北伐。当时，蒋介石是广州的中心人物，李宗仁明白要促成北伐，关键是说服蒋介石。于是，他首先选定蒋介石着手策动。

5月11日，李宗仁到黄埔军校访蒋，受到了蒋介石的隆重接待。在共进晚餐时，李乘机向蒋详谈了自己对北伐的看法。主要有三点：第一，分析北方各军阀的形势。李宗仁提出，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已一蹶不振，且长江下游的孙传芳企图自树旗帜，与吴佩孚貌合神离，因而直系已有解体之势；奉系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互战于天津一带，一时尚无暇南顾。但吴佩孚虎踞武汉，正联络奉张共同进击冯玉祥，国民军一旦瓦解，吴佩孚势力必将增兵入湘，南窥两粤，而孙传芳则不敢不与吴氏一致行动。国民政府北伐的时机将不复返，只有坐困两粤，待吴、孙南征了。第二，分析



了两粤政情。李宗仁认为，两广统一正是北伐的好时机，如不乘时北伐，难免师老兵疲，不堪再用。尤其广东是纸醉金迷的富庶之区，以往军队驻粤，多有堕落腐化，兵骄将惰而自行瓦解者。如不乘两广统一之后民心士气极盛时期另找目标发展，则前车不远，足为殷鉴。第三，分析湘局。李宗仁坦言告蒋，第七军入湘已成骑虎难下形势。另外，如不给唐生智以有力支援，唐则易生动摇，转而祈求吴氏谅解，吴或容纳唐氏为己所用，或一举败唐，湘局必为吴氏所握，那时国民革命军欲取道湖南而问鼎中原，实非易事。

李宗仁可谓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时只有蒋介石待李讲完之后，指出李初到广州，并不了解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还根本不能谈及北伐。蒋如此答复，完全出乎李的意料，这无异于向李泼了一头冷水。李不死心，继续向蒋辩白，指出，正是由于广州内部问题复杂，大家情绪不稳，才更应该北伐。这样好让大家有一个新目标，一致去奋斗，以减少内部摩擦。李、蒋反复辩论，最后，蒋让李去和其他人说说看。

策动蒋氏失败后，李宗仁又连日拜访其他中央要员。李每与人言，必说北伐之事，以致当时舆论报道："自李抵粤后，广州一时出师北伐，及由桂移师入湘，援助唐生智讨吴之声浪骤形紧张。"①但是，出于各种原因，那些高官要员，对北伐的热情始终高涨不起来。如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代理主席的张人杰向李表示，汪先生已出国，中枢政情极为复杂，出师北伐问题，宜从长考虑。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的谭延闿和第六军军长的程潜，原来都是湘军将领，与唐生智有过节，因而对北伐入湘援唐很不以为然。谭向李指出，要唐生智加入革命是靠不住的。程则指出，唐生智以前依靠北洋军阀攻打我国民军，现在吴佩孚打他，他反过来求助于我们。我们现在的策略应该是，按兵不动，待吴佩孚打败唐生智之后，我们再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再定北伐不迟。

其后，李宗仁还拜会俄顾问鲍罗廷，向其陈述北伐时机的极其重要性，并一再申述进行北伐的三大理由，而鲍氏闻言默然，态度冷淡。

这样，尽管李宗仁不辞辛劳，不远千里由桂赴粤，又马不停蹄，四处奔走，苦口婆心地游说策动，但广东国民政府诸政要对其北伐主张不感兴趣，不予支持。然而，李济深对其北伐主张十分赞成和热心，并一再给予鼓励。

游说策动诸政要失败后的某一晚，李宗仁和李济深开诚布公长谈。期间，考虑种种后，他建议李济深的第四军自告奋勇，抽调两师先行北上，稳定湘南、湘东防线，再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这一建议得到李济深的赞

同。接着，他又提议，在次日中央政治会议上，两人合力促请会议决定派第四军的两个师北上入湘，并以叶挺独立团先行，以壮前方士气。这一意见也为李济深接受。至此，两人共同促成北伐的计划便确定了下来。

第二天，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北伐事宜，李宗仁列席了会议。在会上，他不厌其烦地反复陈述北伐的重要性及早日北伐的理由，并强烈呼吁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随之，李济深即起身发言。称道李宗仁分析中肯，并提出，现如今北伐已势成骑虎，中央断不可坐视我第七军和唐军孤军作战而犹豫不决。他表示：为避免第七军和唐军孤立无援，他愿将驻琼州、高州第四军的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北调赴湘增援，第四军所属叶挺独立团可立即出发。最后大声疾呼，第七军已在浴血奋战，第四军也已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中枢更宜速定北伐大计，以解中原人民的倒悬，以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喁喁之望。这慷慨激昂的陈词，使全场的军政首脑为之动容，其他驻粤“客军”首脑，则无反对北伐的理由。于是，这次会议正式通过成立北伐总司令部组织北伐的决议。

1926 年 6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鲍罗廷、加伦分任政治、军事顾问；总参谋长李济深，总次参谋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郭沫若为副主任。下属各军序列：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副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廖乾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第六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

6 月 5 日，国民政府依据 6 月 4 日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任命，改变了 5 月 8 日所定张之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决定，颁布了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命令，并开始组织总司令部，专为北伐。7 月 1 日，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宣布其北伐战略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

7 月 4 日至 6 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专为讨论一切关于出师事宜。会议讨论通过了出师宣言和对全体党员的训令。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中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



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铲除卖国军阀之势力。”[②]在《关于革命军出师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训令》中指出：“此次出师，首在占领武汉，讨伐吴佩孚，继续前进，以谋建设统一之国民政府”。“今当出师之日，正当本党党员努力牺牲之时。”[③]7月7日，广州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总司令统率陆、海、空军；在军事上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负责；参谋部、政治部、军事部、海军部、航空局、兵工厂等各军事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接受总司令指挥。这个大纲把党、政、军大权集于总司令一身，为蒋介石以后实行军事独裁制造了法律依据。

7月9日，军民5万余人在广州东较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给印，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授旗，总司令分别发布了告广东全省人民、告北伐士兵和告海外同胞书，重申北伐的目标是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完成国民革命，使中国不再遭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富强和统一的中国。大会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随即奔赴前线。中共认为，北伐出师的政治主张仅揭举“统一中国”四字，不够明确具体。鲍罗廷在北伐宣言中提出土地政纲，如土地清丈、减租等，但蒋介石不赞成。鲍罗廷对北伐的前景提出四种假定：一、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国民军及其他分子组成联合政府；二、一直往北打，最后定都北京；三、打到武汉后，经营云、贵、川；四、打到武汉后，只整顿内部。至于哪种前景最具有可能性，鲍罗廷亦不敢预测。[④]李宗仁不遗余力策动北伐，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得以早日进行，可以说，李宗仁对北伐战争的发动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②《革命文献》第12辑，总1827、1828页。

③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55—258页。

④《中局致北方区信》（1926年8月11日），见《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54页。

北伐军作战部署和叶挺独立团作北伐先锋

革命阵营能否制定出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是关系北伐战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1926年4月，蒋介石就会同李济深等人开始制定北伐进军的战略计划。5月，这个计划完成。计划规定：国民革命军分两路向湖南和江西进军，西路军占领长沙，东路军攻占南昌，然后会攻武汉。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研究后认为这是一个用两个拳头打人的计划，即北伐军平均分配兵力，与吴佩孚、孙传芳两个军阀势力同时作战，这样，国民革命军兵力必将严重不足，势必陷入困境,。同时，广东和福建边界还有面临孙传芳入侵的危险。因此，他认为应该首先考虑在两湖境内作战，集中兵力解决两湖之敌。

当时，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的部队共8个军，10余万兵力，以第四、七、八三个军所属师、旅的战斗力最强，是北伐的主力部队。而北洋军阀的总兵力达85万。大大超过国民革命军的数量。当时，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直接造成严重威胁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孚。他除派遣一部分军队北上围攻国民军外，又在湘、鄂两省组织了号称20万人的所谓“讨贼湘军”和“援湘军”，并且做好了进攻湖南、广东的军事部署。但北伐开始时，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采取观望的态度，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豢养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也心怀鬼胎，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暂时保持“中立”。

1926年6月30日，加伦在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北伐进军的目的是攻下武汉，占领吴佩孚的巢穴，然后与国民军会合。为了保障北伐军右翼不受孙传芳部队攻击，北伐军必须有一路部队留作主力充当预备队。根据敌众我寡、敌人力量分散和指挥不统一的特点及弱点，国民革命军在加伦的帮助下修改了北伐作战计划，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



针。即首先集中主力进攻两湖战场，消灭最凶恶的敌人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势力，解广东革命根据地之围，援助北方国民军；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警戒敌人从江西、福建袭击北伐的后方。等到两湖战场胜利后，再出兵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最后，选择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

7月1日，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先肃清湖南，然后再会师武汉，进而与我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军之使命”的命令。[①]根据这个作战方针，北伐军组成三路大军：西路军由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三个军的主力8.4万余人组成，任命唐生智为前敌指挥，担负两湖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中路军由第二、三、六军组成，蒋介石兼总指挥，其任务是分驻广东的南雄、始兴和湖南的桂阳、茶陵、安仁一线，防止孙传芳从江西南下广东、西进湖南；东路军由第一军的第三、十四师及张贞独立团组成，何应钦任总指挥，防守粤东汕头、潮安、大埔、三河坝、梅县等地，防御福建之敌侧袭广州。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参谋总长名义辖四个师留守广州，第七军一部留守广西。计划在打垮直系军阀吴佩孚之后，再与东路、中路的北伐军会合，进军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等东南五省，消灭孙传芳的军阀部队，然后挥师北上，消灭奉系军阀张作霖。即“先打吴，再打孙，最后灭张”。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部署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于1926年7月12日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及其本国军阀所加于我们的痛苦，已经使我们再不能忍受下去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世界革命联合战线之一员，我们已经不是孤立的了！”“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号召全国各阶级革命民众团体团结起来，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②]。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7月25日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工人“一致努力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进行自己的解放运动”。广东广大群众和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北伐战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

为了开展北伐的有利局势，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广州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军尚未誓师北伐之前，命令叶挺第四军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一部首先由粤入湘，担任北伐先锋，援助被直系击败的唐生智。北伐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

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于1925年11月21在广州肇庆市成立，团部设在肇庆阅江楼。北伐前扩编为第四军独立团，它是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的基础上，“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以叶挺同志为团长，以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作骨干”[3]，以广东、广西、湖南招募的贫苦农民为士兵而组成。全团有三个步兵营，一个直属勤务队，共2 100多人。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成立于1924年10月，这支部队一开始就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我党直接控制的第一支部队，队长为共产党员徐成章，副队长是共产党员周士弟，党代表是共产党员廖乾吾。铁甲车队除了担任警卫任务外，还多次参加革命的军事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5年10月，铁甲车队奉命全体人员编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成为叶挺独立团的基层骨干。叶挺独立团建立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部队初步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对广大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整个部队出现了与旧军队不同的新面貌。

1926年1月，叶挺独立团正式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独立团名义上虽然仍属国民军第四军，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第、参谋董朗、第一营营长周士第（后为曹渊）、第二营营长许继慎、第三营营长杨宁，各连连长及侦察队队长等干部大都是共产党员。团内设中共党支部，是团队领导核心。党支部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干部任免、调动和人员扩充，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不受第四军的约束。

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叶挺独立团的建设，亲自从黄埔军校调去许多共产党员到独立团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独立团党支部之下，各连成立了党小组，支部直接由两广区委军委部领导，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工作。周恩来同志强调要把独立团培养成为一支可靠的有坚强战斗力的军队。叶挺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制定了新兵训练和干部训练计划，对部队实行严格的“四操”[4]“三讲”[5]制度。通过政治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部队官兵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有不少官兵加入共产党，这就从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基础。

就在叶挺独立团加紧编练之际，中央湘区党委积极协助广州国民政府做争取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的工作。郭亮、夏曦、易礼容、李维汉等多次与唐的代表邓寿荃联系和会谈，劝唐率部“早日参加国民革命行列”[6]。1926



年夏间，唐生智表示接受广州国民政府领导，愿将所部编为国民革命第八军。这样，唐部控制的湘中南地区就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前哨阵地。5月10日，国民政府举行军事会议，“议决出兵入湘援唐，讨伐吴佩孚、叶开鑫”[⑦]。随即，国民政府派叶挺独立团等为北伐先遣队，挥师入湘作战。

1926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奉命由肇庆、新会到达广州，准备作为北伐先锋开赴湖南前线。当晚，周恩来专程亲临独立团驻地叶家祠，召开了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进行了战前政治动员。他分析了北伐先锋的重要性和注意问题，指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是光荣的，任务是艰巨的。他告诫部队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注意发动群众，做好团结友军工作。他还着重指出独立团是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同任何别的军队有原则区别。最后他用“饮马长江”的诗句鼓励大家，一定要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起模范先锋作用。周恩来在讲话后，与连以上干部一一握手，并十分亲切地鼓励大家并充满信心地说：“武汉见面”。独立团党支部立即在部队进行了传达并组织了认真讨论，提高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北伐意义的认识和必胜信心。这是独立团英勇善战、锐不可当的重要思想准备。

5月20日，叶挺独立团开赴湖南前线。当独立团到达汝城县境时，遭遇谢文炳部1 000余人。独立团在共产党组织的侦探队和向导队的协助下，迅速夺取汝城西南高地，经过一夜激战，将敌人击溃，残敌向东北方向逃窜，顺利占领汝城，旗开得胜。此役毙敌100多人，缴枪200余支。

独立团乘胜追击，经过渡头司、资兴，于5月31日晚到达湖南永兴县时，接到唐生智经广州转来的告急电报：“吴佩孚派赣军唐福山和谢文炳4个团，集结于攸县长岭之线，一部进至碌田附近，企图进犯安仁。我军张团兵力单薄，望速赴援。”要求火速增援。这时，如果安仁失守，敌人就可以直扑耒阳或郴州，切断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同广东的联系，第八军就有可能陷于孤立或失败，广东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叶挺立即率部冒雨急行，于6月2日到达安仁。当地驻军向独立团介绍了敌军动向，叶挺命令独立团全体指战员严阵以待，准备随时出击。3日晚上，独立团接到三营报告：三营阵地已接触敌人，当地驻军已溃退。叶挺立即率部冒雨出发，飞速前进。途中又接到关于敌军向碌田、黄茅铺阵地进攻的报告。叶挺认为碌田、黄茅铺两阵地是敌军结合地带，可以从这个薄弱环节突破。于是，4日凌晨4点，叶挺下达攻击令，独立团官兵同敌军展开猛烈的战斗，之后，他又带领部分部队从黄茅铺西边绕到敌人侧后攻击。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

"至（4日）上午七时，敌不支，纷向攸县退却"[8]。碌田、黄茅铺之敌全线溃败，独立团夺回了碌田、黄茅铺阵地。叶挺命令乘胜追击，5日晨攻占了攸县县城，粉碎了敌人的南犯计划。安仁、攸县战役，北伐军以不足两个团的兵力，打败敌军六个团的进攻，毙俘敌约400人，独立团伤亡63人，缴获迫击炮数门，机枪数挺，长短枪300余支。独立团用缴获的武器，装备了自己的队伍，使官兵们非常振奋。

先期入湘作战的李宗仁第七军第八旅，第七军第八旅第十五团于5月5日抵达湘南永州。12日，当第十五团到达衡阳时，正值叶开鑫部向衡山方面发动猛攻之际。唐部得援助后，很快击溃了敌军。正准备乘胜追击，得悉敌唐福山部有由莲花进袭攸县的企图，于是唐令第八军固守涟水南岸，而以第七军第十五团急赴攸县增防。敌军听闻革命军有所准备，停止了前进。不久第八旅全旅到达衡阳，第十五团便归还建制。

5月下旬，敌军又从涟水方面全面反攻，29日，贺耀祖部猛攻第八军何键师，形势十分危急。唐生智又令第七军第八旅由左翼金兰寺向洪罗庙方面增援。第八旅于6月1日到达洪罗庙，当晚乘夜出击，即将敌攻势阻截。第八军官兵在第八旅的鼓舞下，增强了作战信心。于是两军协力反击，终于将敌军攻击部队一举攻破，残敌急退涟水北岸据守，第八军左路威胁得以解除。

衡山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唐生智被动作战的局面。6月2日，唐在衡阳召开大会，加入到北伐的行列。6月4日，在衡阳成立湖南省临时政府，唐任省长。唐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为军长。唐把所部的四个旅扩编为四个师：何健为第一师师长，李品仙为第二师师长，刘兴为第三师师长，周斓为教导师师长。

叶挺独立团首战告捷和第七军钟祖培旅的胜利，扩大了国民革命军的影响，挽救和稳定了湖南的战局，增强了北伐各军的胜利信心，为北伐军进入湖南扫清了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注释：

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北伐阵中日记》，转引自谈方：《加伦与北伐的胜利进军》，《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89页。

②《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向导》第163期（1926年7月14日），第1621页。



③周士第．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④“四操”即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训练，黄昏一次体操。

⑤“三讲”即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课和政治课，晚上列队点名训话，总结一天来的训练情况。

⑥《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63年12月版，第102页。

⑦《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件：大事记》第12辑（1926），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页。

⑧《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关于叶挺独立团渌田龙家湾之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档案。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21页。

北伐西路军胜利进军湖南

继叶挺独立团之后，6 月 17 日，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相继进入湖南。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下属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二十九团团长范汉杰、三十团团长戴戟，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下属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三十四团团长许志锐。这些将领是北伐军主力，他们个个英勇善战，战果辉煌，在北伐军中亦享有盛名。

湖南战场是北伐军的第一个正面主攻战场，该战场的成败，不仅关系着北伐全局的发展，而且为当时整个革命的前途命运和安危所系。

攸县战斗后，敌我双方在湖南中部对峙。叶开鑫、李倬章集中 10 余万兵力，在涟水、渌水以北的醴陵、株洲、湘潭、湘乡、长沙等地布防。湘军邹振鹏、刘雪轩、林拔萃各旅及贺耀祖师，布防湘江以西的易俗河、湘潭、湘乡、潭市一带，固守涟水防线；鄂军余荫森部、赣军唐福山部、粤军谢文炳部，在湘江以东的易家湾、株洲、醴陵、板沙铺地区结集，以渌水为屏障。吴佩孚命李倬章等援湘军，分四路援助叶开鑫。而北伐军则以第四、七、八军约 5 万人担任湖南正面战场的进攻，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第二、三、六军约 3 万人则进入湘南、湘东一带，警戒江西之敌。

国民革命军方面，为摧毁涟水、渌水防线，攻占醴陵、湘潭、长沙，6 月下旬，第四、七、八军集结在湖南，由唐生智、李宗仁和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唐担任前敌总指挥。入湘北伐军分成左、中、右三路，于 7 月上旬向敌发动攻势。三路大军不顾连日暴雨、河水猛涨和敌军封锁江防所带来的种种困难，渡河强攻，突破了敌人构筑的涟水、渌水防线。左路军于 7 月 6 日占领敌人重点防守的娄底市，7 日攻下谷水，9 日占领潭市，敌涟水防线瓦解。中路军 7 月上旬占领易俗河、湘潭、湘乡。右路军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在同一时间内，拔掉了易家湾、株洲、板沙铺、豆田、泗汾、沈谭之敌。10 日，独立团和第四军其他 3 个团一道进攻醴陵。



在当地群众和工农武装的配合下，独立团在泗汾一带强渡渌水，当天下午攻克醴陵，切断了长沙守敌与江西萍乡之敌的联系，打开了进攻长沙的大门。敌之渌水防线彻底崩溃。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于7月10日占领湘潭，长沙防务空虚，省城无坚可守，叶开鑫十分惊恐。7月11日，中路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进入长沙，叶开鑫弃城北逃。长沙工人在湖南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收缴溃敌枪械，建立工人保安队，负责维持城内外秩序，有力地支持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至12日，左路军何键、刘兴、周斓三个师，总预备队胡宗铎、钟祖培两旅，分途追击敌军，先后克服了浏阳、宁乡、湘阴、益阳等地。

北伐军进入长沙后的第三天，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结束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伪自治局面。湖南人民革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长沙为湖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伐军光复长沙，加速了北洋军阀在湖南反动统治的崩溃。

一开始，吴并不重视湖南战场，以为国民革命军入湘作战部队不会很多，叶部湘军虽退至湖北，然其主力并未损失多少，得到鄂军援助后，兵力扩大到20万。湖南战事，可操胜券。北伐军进攻长沙时，张作霖、吴佩孚的军队正同国民军在北京南口进行紧张的争夺战。然而，叶军在涟水、渌水溃败，醴陵、株洲、湘潭相继失守，使吴佩孚大为惊愕。这时，吴佩孚陷入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境地。吴欲率兵南下，将进攻南口的任务交给奉系。他又考虑，如放弃进攻南口的指挥权，南下主持对湘战事，就无法控制北京政权，京汉线北段地盘就要被奉系夺取。于是他就采取损人利己的办法，命令他的前线部队，宜守勿攻，即令陈嘉谟、李倬章、叶开鑫调整作战计划，退守平江、汨罗一线。集结重兵于平江、汨罗、岳阳，以汨罗江为第一道防线，羊楼司、五里碑、云溪为第二道防线，待他结束南口战争后，再率直系主力南下，与北伐军在湘北决战。并督促孙传芳调闽、赣两省驻军，分兵进攻广东的西江、北江，派重兵由赣入湘攻打长沙，要唐继尧出兵广西，配合作战。他幻想这样做就可以夺回长沙；打败北伐军，坐收渔人之利。可是孙传芳早已看透吴的诡计，一面应付吴佩孚，电告说：“目前赣闽吃紧，对湘事不能统筹兼顾，只能为湘当之援助，仍请我帅自行主持。”同时命令东南五省军阀，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并授意“江浙协会”向北伐军声明：“孙帅为使五省不睹锋镝，决不与任何方面为敌。”表示不会

配合吴佩孚进攻北伐军，对湖南战争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攻占醴陵、进驻长沙后，国民革命军基本上完成了北伐第一期作战计划。第四军在醴陵整顿、补充，待命前进。

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各军将领有：第一军副军长王伯龄、第二军参谋长岳森、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六军参谋长唐蟒、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此外，还有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袁祖铭的代表吕超，彭汉章的代表简仲芬，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等10余人。

长沙军事会议是北伐途中在前方召集的第一个战略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北伐军占领醴陵、长沙之后的战略问题，制定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仍以两湖为主要战场，前进目标是占领武汉，夺取武胜关，消灭吴佩孚；接着进兵江西，消灭孙传芳。在攻下武汉之前，对江西采取守势。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会议制定了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以袁祖铭为军长的第九军，王天培为军长的第十军，为左路军，主要在洞庭湖以西作战，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封锁长江上游；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为中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以夺取武汉、武胜关为目标。中路军又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和鄂军第一师组成，唐生智兼任指挥。右纵队由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组成，李宗仁任指挥。右路军由国民革命军第二、三、五军和独立一师组成，朱培德任总指挥，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暂时采取守势。此外，由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教导师、第六军和航空队、炮兵团组成总预备队。

北伐军根据长沙军事会议部署，决定在吴佩孚主力南下之前，摧毁汨水防线，拿下平江、岳阳。国民革命军将汨罗江防线截成三段，分兵三路纵队进攻。

平江城位于汨水北岸，是进入湘中的门户，其地势险要。自古即有所谓"平江失，则岳阳不保，武汉亦危"。平江既为湘东北军事重镇，亦是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敌方集中2万余人守平江，由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蒲平镇守使和平通防御司令陆澐指挥，在平江附近的所有大小山地都构筑强固工事，各路通道，遍布地雷。并将汨罗江中一切渡河船只全部予以破坏，以此自夸平江为"金城汤池"，坚不可破。

局势要求第四军迅速占领平江，并在吴佩孚援军到达之前越过湘鄂边界



的山口，直趋湖北通城。右纵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于 8 月 16 日从长沙赶回醴陵，17 日晨即召集团以上人员开会，传达总部部署，并策定第四军第二期具体作战计划。第四军苏联军事顾问戈列夫对战役事先进行了详细研究，并提出了重要建议。四军第十、十二两师共六个团，约 8 000 余人，而平江守敌为 2 万余人。敌众我寡，所以作战计划为：以一个团任正面攻击牵制敌人；另五个团则绕到敌人侧后，从敌人最薄弱处进行攻击。各部军队均于 18 日晚到达攻击地点，19 日拂晓开始总攻。

8 月 19 日凌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七军向平江城发起总攻。第四军左翼第十二师三十五团，以第一营攻击鲁肃山，第二营攻击审恩岭，正面佯攻，吸引敌人主力。独立团和 36 团任中路。独立团进攻童子岭、草山寺正面之敌，攻占平江城东地区，相机策应 36 团作战；36 团从上游跨过汨罗江，进占山西坑、古城岭的平江城东北地区，攻击敌后。36 团由当地农民引路，通过崎岖小道，出敌不意，突入平江县城北门，将敌军司令部团团包围，敌旅长陆潭被迫仓促应战，短兵相接，战斗达数小时。敌军支持不住，举白旗投降，陆潭自杀。第十师以二十八团向平江城以东的淡江、钟洞大山之敌进攻，二十九团紧密配合，战斗激烈，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负伤，继续指挥作战。战斗至午后，第十师全线发起总攻，敌势动摇，全线崩溃，北伐军占领平江城。此役俘敌官兵 1 600 余人，缴获大炮 11 门，长短枪 2 000 多支。北伐军伤亡官兵 173 人，平江城破，汨水防线失去了重要支撑点，汨罗江防线亦随之动摇。

在平江战役的同时，国民革命军第七、八两军在李宗仁、唐生智指挥下，渡过汨罗江。第七军攻占长乐，第八军夺取新市、南渡等地，前锋直逼湘鄂边境。汨水防线被摧毁，北洋军阀向岳阳、五里牌、羊楼司、通城收缩。

岳阳位于长江、洞庭湖及粤汉路的会合处，是湘北（岳阳、常德、张家界、益阳）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亦是攻武汉、守长沙的战略要地，为敌我双方重点争夺目标之一。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担任攻取岳阳的任务。北军叶开鑫、宋大霈、董政国等自汨水防线溃败后，在岳阳以南的新墙河与粤汉线上的新墙、麻塘、北港等地赶修防御工事，固守岳州待援。8 月 21 日傍晚，何键第一师向新墙之敌进攻。22 日拂晓，何师渡过新墙河（微水），向粤汉线上重要据点麻塘进击。敌恃险顽固抵抗，北伐军三次冲锋，破其防御阵地，敌向岳阳溃退。何师两个团围追不舍。22 日，八军何

键第一师、李品仙第二师向岳阳进攻。城郊、梅溪等地农民拿起锄头、扁担，配合北伐军围剿叶开鑫、宋大霈部。敌军见湖南战场大势已去，难挽败局，决定撤离岳阳。宋大霈等鄂军大部撤往湖北，叶部湘军200余人向北伐军投降，一部分向华荣、安乡逃命。22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占领岳阳。随后，革命军占领了岳阳以北的城陵矶、梅溪、云溪、五里牌、羊楼司等敌军据点。至此，北伐军的前锋部队已进入鄂南通城，吴佩孚的北洋军阀势力被逐出湖南。

北伐军自8月19日向敌汨水防线发动总攻以来，在汨水两岸人民的密切配合下与支援下，短短五天内，拔掉了汨水以北20多个军事据点，捣毁了敌人精心构造的汨罗江防线。此役俘敌官兵7 100余人，缴获步枪5 000余支，机枪30多挺。

湖南战场所经历的几次战役，如涟水、渌水、汨罗江、平江、岳阳之役，结束了北洋军阀在湖南的统治，巩固和壮大了南方的革命力量，促进了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为消灭吴佩孚直系军阀、夺取武汉和开辟江西战场奠定了基础。

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声势日见浩大，一些地方军阀如黔军袁祖铭、湘军贺耀祖、赣军赖世璜顺应形势的变化，纷纷要求归附国民政府，加入国民革命军，讨伐吴佩孚。8月底，这些军阀武装接受改编，袁祖铭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军，彭汉章、王天培分任军长。赖世璜部、贺耀祖部分别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后改编为第十四军）、第二师（后改编为第四十军），直属国民革命军总部统辖。



汀泗桥、贺胜桥战役

汨罗江会战结束后，北伐军不顾连日作战疲劳，继续向北进发，有直捣武汉之势。1926年8月21日，在北方指挥直系军队同国民军作战的吴佩孚，得知湘中败报，急忙率部分主力，离开长辛店南下，于8月25日赶到武汉，决定死守汀泗桥。

北伐军在湖北战场作战，主要经历了汀泗桥、贺胜桥、武昌3个著名战役。

汀泗桥是鄂南第一门户，粤汉路上的天险。它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高山矗立，只有西南端有一条铁路通行。桥北山陵起伏，处处可设防；桥南地势平坦，只有猪姆岗小高地，为湘入鄂的要冲。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8月22日，吴佩孚召开会议，决定调集兵力20 000余人，其中包括从湖南汨罗、岳阳一线溃逃下来的残部，也有从平江、通城一线溃逃下来的敌军，亦有从武汉增援过来的敌人，“由宋大霈指挥，在汀泗桥凭河固守，其迤东高地筑有坚固工事。”[①]企图凭借汀泗桥天险，求得喘息机会，等待后援部队，再行反攻。他派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率领大刀队，随军出发督战，下令所部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军官畏缩者，一律处以极刑。并策动孙传芳从江西出兵袭击平江、长沙，以切断国民革命军的后路。因此，国民革命军必须迅速拿下汀泗桥，以打破敌人死守待援的计划，打通直捣武汉的门户。因此，夺取汀泗桥就成了北伐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也是战斗最激烈的一仗。

8月23日，蒋介石与唐生智、李宗仁等在羊楼司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4路攻打汀泗桥：以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崇阳、通山进攻，抄袭汀泗桥；以李宗仁第七军取蒲圻，会攻汀泗桥；以第八军一协助第七军进攻汀泗桥；第八军何健、刘兴两师渡江下嘉鱼，抄汀泗桥后路。蒋介石则率王伯龄第一师为预备队，亲自指挥战斗。各路分头向汀泗桥方面前进。

8月25日，叶挺独立团攻占中伙铺，第四军各部也相继赶到中伙铺、山峡冲和石坑渡一带。当天晚上，第四军军部下令，26日进攻汀泗桥。张发奎第三十五团由中伙铺出发，沿铁路两侧前进，从正面向汀泗桥进攻。第三十六团从石坑渡出发，向汀泗桥东南进攻。陈铭枢师从山峡出发，经过饶家湾、赤岗亭，从右翼包抄进攻敌人。叶挺独立团为军预备队。

北伐军第四军担负攻占汀泗桥的主要任务。8月23日下午，军长陈可钰召开团以上军事会议，决定抢在吴军大举南下前攻占汀泗桥。

8月26日上午10时，第三十五团第一营到达汀泗桥附近，双方交火，驱逐了敌人警戒部队，占领汀泗桥南端的猪姆岗高地。此时敌军欲退至铁路桥以东，第三十五团因受敌人机关枪封锁，无法越过铁路，与敌军隔江对峙。正午，三十六团急行军赶到汀泗桥。因敌军居高临下，集中火力射击，不易前进，于是疏散队形，侦察敌人阵地配备情况，待增援部队到来，再作齐头并进。下午，敌军集中炮火掩护步兵1 000多人出击，一直打到第四军军部附近。当第十师行至骆家湾附近时，听到汀泗桥方向枪炮声甚密，知第十二师已与敌军接战，部队迅速前进，并以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向三十六团右翼延伸，到达丝茅窝一带，三十团向三十六团左翼布阵。独立团一营同时在三十六团后方张兴国布阵，以便策应各方。北伐军在形成对敌军阵地半月形的包围之后，开始反击。敌军因后方大刀队督战，所以拼命反击，企图夺回被占领的阵地。正面进攻汀泗桥的部队，连续发起冲锋十几次，桥下死尸累累，仍未能攻下汀泗桥。叶挺亲自到附近村庄里找到几个农民，了解当地的地理条件，得知东面大山上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从敌后攻击，打垮敌人。27日凌晨2时，左翼的北伐军十二师隔铁路桥与敌相峙，实施抄攻敌人后背之计划。叶挺独立团由农民带路，很快通过了东面高山和崎岖小道，绕到古塘角，从敌方右翼突然向敌人发起猛攻。正值敌军有秩序地撤退，经独立团突然攻击，顿时变为溃逃，一部分敌军被缴械。与此同时，陈铭枢师和张发奎师也从正面向敌人发起猛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随即占领了汀泗桥。吴佩孚见状气急败坏，将失守汀泗桥之旅、团、营长9人正法，并以大刀队督战，威逼敌军死守阵地，又在当天夺回。28日晨，国民革命军重新攻占汀泗桥。吴佩孚急调后备队万人以上全力反扑，再度夺回。29日，在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北伐军几经反复争夺，终于攻下"鄂南第一门户"汀泗桥。

汀泗桥战役毙敌1 000余人，俘敌军官157人，士兵2 296人，缴获大



炮4门，机枪9挺，长短枪3 000余支，革命军第四军伤亡官兵379人。[②]汀泗桥的攻克，挫败了吴佩孚的嚣张气焰，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威。为革命军占领鄂南，进军武汉打开了门户，有效地巩固了广东、湖南等北伐后方根据地。

攻下汀泗桥，叶挺独立团与第三十五团继续猛追向咸宁溃逃之敌。途中接到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的通知：进击部队追击不得超过十五里。第三十五团在距咸宁数里处停留下来。叶挺认为逃敌溃不成军，正是追歼残敌的有利时机，便决定单独率领独立团继续追击。部队到达咸宁城南，时值盛夏水涨，仅有一座铁路桥可以通过。咸宁铁桥北面有敌防守，桥前一千多米铁路线完全暴露于敌人火力之下，给攻击造成困难。叶挺当机立断，指挥第二营冲锋，并以两挺重机枪掩护，几百名战士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勇往直前，虽有死伤者纷纷掉落河里，但仍前仆后继，同敌人展开肉搏战，于当天上午11时终于占领咸宁城这一军事重镇。一部分残敌被缴械，其余向贺胜桥方向逃窜。独立团一方面在咸宁城东门外文笔山等制高点布防，一方面把攻占咸宁的消息通知张发奎。张乃派第三十五团到咸宁协同独立团防守。随后第四军其余各部也相继移师咸宁一带。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得到报告后，大不以为然，认为叶挺“好胜鲁莽，过于急进”。随后他沿粤汉铁路前进到咸宁桥，看到铁路两旁水浸约三十华里，一片汪洋，仅一条铁路桥可以通行；如果在狭长道路上遇敌阻击，前进不易，展开兵力作战也很困难。陈见地形如此险要，才赞叹叶挺“具有军事天才，能见机进攻”。

与第四军攻占汀泗桥的同时，北伐军第七军占领了崇阳、蒲圻，在咸宁与第四军会师。第八军收复嘉鱼、金口、新堤、宝塔洲，掩护与配合了第四军攻打汀泗桥。

为了挽救直系军阀败亡的厄运，吴军在汀泗桥失败后，慌忙退守贺胜桥。贺胜桥号称“鄂南第二门户”，其地形十分险要，西、东两面分别以黄塘湖和梁子湖为依托，当时水涨，两湖之间的陆地十分狭小。吴佩孚视此战为其生死存亡之关键，亲自指挥督阵，投入兵力之众可称自湘战以来之空前，其中除汀泗桥、咸宁一线的溃兵之外，还有刘玉春的第八师第十五旅及补充团，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一部、吴佩孚之卫队一旅总计两万余人。吴佩孚在桃林铺、印斗山和贺胜桥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防御阵地在杨林塘至王本立一线；第二道在桃林铺至孟家山一线；第三道在贺胜桥至烟斗山余花坪一线。从而构筑了纵深10多里的防御体系。并配置铁甲车几十辆，大炮60

多门，重机枪200余挺，军队数量高出北伐军好几倍。吴佩孚叫嚣："限三日夺回汀泗桥"[3]。

8月29日下午，前敌总指挥部在咸宁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陈铭枢、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与会。会议决定乘敌立足未稳，阵地未固，增援部队没有完全到齐之前，立即发动进攻，迅速攻下贺胜桥。其作战部署是：以第七军为右翼，出咸宁东，进攻铁路以东地区之敌；七军夏威指挥的第一队向徐家铺前进，准备占领鄂城；胡宗铎指挥的第二队向贺胜桥、王本立及其以东地区之敌进攻；第四军沿铁路线及其以西地区前进，正面攻击贺胜桥之敌，随后进攻武昌；第八军一部及第一军之刘峙第二师为总预备队，随第四军沿铁路推进，定于8月30日凌晨开始进攻，要求部队29日晚全部进入阵地。

29日晚，蒋介石返回汀泗桥，对其他方面事宜做统筹规划。根据咸宁会议确定的作战计划，第四军以独立团和第十二师为攻击队，第十师为预备队，集中全军炮兵，由军参谋长邓演达统一指挥。

30日凌晨，官兵闻号全线冲锋，冒着敌人的炮火，直冲敌阵。有的全连连排长伤亡殆尽，士兵在政治工作人员率领下，继续前进，无一后退；有的连仅剩十余人，仍奋勇冲击，夺取敌人枪弹。在激烈的战斗中，第四军独立团和十二师等攻击部队，向铁路左右两侧敌之重要据点吴家湾、黄石桥、北路学校进击，并占领了这些地方。得到胡宗铎、钟祖培各旅的配合后，即向北军第一道防线重要阵地桃林铺、王本立进攻。吴军精锐第十三混成旅、刘玉春第八师、陈嘉谟第二十五师，以优势兵力和密集炮火，向北伐军疯狂反扑，并出动铁甲车助战。北伐军第四、七两军协同进攻，直冲敌阵，白刃肉搏，以一当十，前仆后继，奋力拼杀，终于攻破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迅速向纵深推进。

30日上午10时许，北伐军各路向敌军第二道防线进攻，独立团攻敌主要阵地印斗山。随后，第四军第十、十二师向敌防线全面进击。火力之猛，前所未有，敌军抵挡不住，纷纷向后退却。吴佩孚亲自手刃退却之旅、团长10余人，以惩戒作战不力之军官，并令督战的大刀队扼守各主要路口，大量杀戮后退士兵，引起溃兵向督战队开火，敌军混乱，互相厮杀，混作一团。有的士兵还向吴佩孚的指挥车射击，打死吴的副官一人，打伤卫兵二人。任何办法已不能阻止北伐军前进，吴佩孚不得不允许他的败兵后退。北伐军第四军乘胜攻占了贺胜桥。吴知难以扭转贺胜桥战役的败局，仓惶回车



北逃武昌。吴佩孚专列过处，“败兵攀援欲上，卫士呵禁弗能止，急挥刀砍其臂，人纷纷随臂堕，宛转呼号，惨不忍闻”④。(从桃林铺至贺胜桥，吴军士兵断头缺臂，露肠破肚，呻吟哀叫声，比比皆是。⑤在第四军向贺胜桥胜利进击的同时，8 月 30 日晨 6 时，第七军第一路按照既定作战方针，出征进发。配合第四军攻击贺胜桥敌之侧背。8 月 31 日晨，北伐军对贺胜桥溃败之敌展开全面追击。第四军十二师和独立团伤亡过重，暂留贺胜桥休整补充，第十师沿铁路向前追击。当晚，前锋第十师第十九团追至武昌城外洪山，主力进抵李家桥。第七军第一路至 31 日下午攻克金牛镇；第二路沿武长路以东前进，傍晚占领岳公山、和尚桥、保福祠等地。第一军第二师进至五里界、文家。在北伐军追击下，敌军一部渡江，一部进入了武昌城内。至此，贺胜桥战役结束。

贺胜桥战役，毙敌近 2 000 人，俘敌军官 201 人、士兵 3 334 人，缴获大炮 24 门、步枪 2 900 余支，机枪 30 余挺。此役为北伐出师以来的空前激战。

短短 5 天内，号称“常胜将军”的“吴大帅”，一败于汀泗桥，再挫于贺胜桥，损兵折将，精锐消耗过半。其战斗力最强的王牌师刘玉春第八师，在贺胜桥一役中，士兵损失一半，三个团长全部阵亡，30 多个连长中只有 5 个活着。⑥贺胜桥之战，成为吴佩孚在两湖战场军事走向溃败的重要转折点。

在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役中，叶挺独立团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百战百胜的先锋队，为它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而第七军也因贺胜桥战役，赢得了“钢七军”的美名。

注释：

①《国民革命军关于陈铭枢等师汀泗桥之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档案。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4 辑（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65 页。

②中央档案馆：《北伐战争》（资料选辑）第 100～101 页。

③上海《民国日报》（1926 年 9 月 3 日）。

④《民国政史拾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8 期。

⑤中央档案馆：《北伐战争》（资料选辑）第 108 页。

⑥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 10 月 28 日）。

武昌战役

汀泗桥、贺胜桥失败后，吴佩孚退守武昌城。武昌在长江南岸，是湖北的政治中心、地理要冲和华中交通枢纽。武昌城墙坚固，周围长达60华里，城墙高达2丈余。城外护城河，水深2米多。护城河以外，地势平坦，易守难攻。

8月31日黄昏，第四军、第七军主力抵达武昌城下，时武昌城军队不足12 000人，“皆从汀泗桥、贺胜桥苦战脱归者，服装不全，器械不足”[①]，为了保住在华中的统治，吴佩孚在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武汉防务。会议决定放弃保定，调田维勤、王为蔚、魏益三各部南下；起用靳云鹏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负责武汉防务；提升鄂军将领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任命湖北督理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陆军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靳部师长高汝桐为汉阳、汉口守备军总司令。南下各师驻防广水、花园一线，蛇山、龟山、汉江水面重点防守。

9月2日中午，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以及各部队的高级军官在余家湾车站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军事形势，认为攻取武汉“贵在速决”，不宜拖延。会议决定：以第一军第二师攻击忠孝门至东北城角；第四军第十师攻击通湘门至宾阳门；第七军第二路攻击中和门至望山门；第四军第十二师为预备队，驻洪山附近；炮兵驻扎洪山阵地。是日黄昏开始行动。

9月3日凌晨3时许，进攻武昌的战役打响，第一、四、七军各一部分三路攻城。第一军第二师炮兵自小龟山向武昌城轰击，步兵向攻击目标前进。第四军第十师各团攻抵通湘门至宾阳门城脚时，天色已明。第七军第二路动作迟缓，黎明时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还未接近城垣。吴佩孚军在城垣及蛇山、凤凰山以重炮、机枪猛烈射击，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也发炮猛轰。各部队因伤亡较大，至早晨6时许，全线停止攻击。攻城部队只得退回原来



阵地，第一次攻城失利。

9月5日凌晨3时许，第四军第十、十二师、独立团，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组织奋勇队（敢死队）再次攻城，李宗仁为攻城司令。蒋介石命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②]。攻城部队编为左右两翼：左翼炮兵于武建营附近阵地向武昌城南部炮击；右翼炮兵于洪山阵地也向武昌东面城墙吴军炮击。并以奋勇队为前锋，环城发动进攻。各师的奋勇队配备云梯、手枪、斧头、炸弹、绳索和爆破器材，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冲过护城壕沟，直迫城脚，将竹梯架起，官兵攀援而上，遭到敌军炮火射击，伤亡极重。但是伤者无人呻吟，无一后退。如，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奋勇队从刘湾西端涉过护城河，冒守军猛烈火力，架梯登城，与守军展开肉搏，战况极为惨烈。该师奋勇队，除队长欧震（第三十六团第三营营长）等2人外，其余全部伤亡。第四军各奋勇队攻城血战至上午，暂时依护壕沟掩蔽，与敌对峙。第七军各奋勇队在中和门、保安门、望山门的攻城战斗中，均未达到目的。这时，为夺取首功，第二师师长刘峙捏造谎言，电称在鸡叫前进了城，致使第四军部队从洪山进至长春观附近时，遭遇敌人炮兵轰击，第三十五团伤亡惨重。叶挺气愤地指出："他们这一行为，不仅有假报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必须严加处罚。"[③]独立团奋勇队在队长、第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的带领下，有进无退，一度攻上城头与敌展短兵肉搏，表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与高度的牺牲精神。由于敌人严密的火力封锁，城墙过高且有重兵把守，致使奋勇队"竹梯甫架，伤亡随之"，独立团阵亡营长一员，排长二员，士兵80余人。[④]当日午后，蒋介石偕李宗仁、陈可钰等，到南湖、洪山一带视察，见到武昌"城垛坚固，居高临下"，攻城部队，"牺牲过大"，感到硬攻无效，才下令暂停攻城。第四、七军除一部分留下警戒外，大部分退到邓家湾附近整顿。自9月3日以来，北伐军"两次强迫登城，均未凑功，伤亡两千余人"[⑤]。当晚，第十师各团又竭力接近城垣。守军遂将手榴弹、火药包同时掷下。奋勇队虽将梯子靠近城垣，但已死伤大半。第七军第十四团将梯子架在民房上准备登城。吴军遂扔火药包、爆发罐烧房。第十四团为烈火所阻，也无法登城。第二师进至距武胜门三四十米处，因炮火压制不住吴军，而无法前进。天明时，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奋勇队亦死伤过半。正午，北伐军决定暂停攻击。

两次攻城失败后，为了孤立围困武昌之敌，断绝武昌与汉口、汉阳的联系，蒋介石于6日下午在洪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武昌暂取包围封锁，由

第四军、第八军一部担任围攻任务，令第七军主力开赴鄂东作战。为了断绝武昌与汉阳、汉口的联系，孤立围困武昌之敌，北伐军发动了攻取阳（汉阳）、夏（汉口）的作战。守阳、夏的敌军有吴佩孚嫡系高汝桐、鄂军刘佐龙师以及杜锡钧的水上游兵，共计4万余人。担任攻取阳、夏的北伐军是唐生智的第八军的三个师和鄂军夏斗寅师。

阳夏战役前，为了分化瓦解敌军，董必武、陈潭秋领导的中共湖北省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汉特别市党部，争取了刘佐龙起义，并对汉阳兵工厂、武昌第一纱厂等工人，作了组织发动工作，有效地配合了北伐军。

9月5日，北伐军何键和夏斗寅两师1万余人分水陆两路攻取汉阳，遭到敌防军高汝桐师和敌援军阎日仁、宋大霈等部的顽抗。进攻龟山的北伐军也“三攻三挫”，后得到刘佐龙部的起义和汉阳兵工厂工人武装的配合，集中火力猛击龟山阵地，同时炮击汉口查家墩吴军司令部，才使汉阳守敌动摇。经过通宵激战，汉阳吴军阵线崩溃。吴佩孚由江岸站乘车出逃，高汝桐向汉口、刘家亩方向逃窜，一部分敌军缴械投降。9月6日，第八军攻占了汉阳。当晚，第八军第二师及刘佐龙师一部，强渡汉水，进攻汉口，与敌守备军靳云鹏部展开肉搏，苦战多时，将靳部防军击溃。7日凌晨北伐军占领了汉口。第八军乘胜追击，敌军退到河南信阳，吴佩孚逃至郑州。阳、夏之战，毙敌2 000余人，俘敌官兵900余人。北伐军占领阳、夏，任命刘佐龙为阳、夏临时公安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

阳、夏光复后，革命势如破竹，旬日之内，连克横店、孝感、广水、东篁店、九里关、武胜关、平清关，敌军退守信阳。北伐军夺得武胜关之后，锁住了敌军南援的通道。至此，武昌守敌彻底陷入孤立。

9月10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令第八军第三师师长李品仙率第三、第四两师及鄂军第一师向孝感追击溃退的吴军，于16日进占武胜关，切断了吴军退路。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军阀孙传芳于八九月间将其5省军队组成5个方面军，陆续调入江西。根据这一形势，北伐军总司令部决定于9月上旬，乘孙军尚未集结完毕之时，对江西孙军发起攻击，对武昌城则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武昌城内守军经封锁后，粮、弹奇缺，军心涣散。

这样，围攻武昌的任务主要由第四军承担。邓演达任攻城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为解救武昌几十万民众于倒悬，9月17日，陈可钰在南湖军部召开团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决定趁敌粮尽、弹缺和兵疲之机，攻城武昌。18



日，北伐军总部向守敌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投降。陈嘉谟、刘玉春并无投降诚意，并发炮轰击北伐军紫金山阵地。21日北伐军第四军再次攻城，拂晓进攻开始。城内敌军居高临下，以守待攻，北伐军三次攻城未克。

9月底，邓、陈召开军事会议，认为两次爬城损失较重，决定改用挖地道的办法。于是，粤汉铁路工人开来一辆铁甲列车，并送来100余名矿工，配合作战。攻城司令部决定由叶挺独立团派兵一连，机枪一挺，在铁甲车上装备大炮六门，开往通湘门车站附近，掩护部队，协同矿工，日夜轮流挖地道。与此同时，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和第十师在宾阳门与武胜门附近亦展开挖地道工程。三条地道将接近城脚时，因从地道挖出来的新土堆积较多，被城上敌人发觉，极为惊恐，于10月1日，出动2 000余人，借炮火掩护，由通湘门、中和门、保安门冲出，企图破坏地道。其中一部分被叶挺独立团的第一营立即击退；另一部分约千余人，冲至通湘门车站一带，抢走了铁甲列车。叶挺闻讯，急令部队追至车站，夺回铁甲车，杀退了敌人。

10月6、7日两天，城内守军第三师师长李俊卿，多次派参谋长带信出城，接洽向北伐军投诚。为了不让古城毁于战火，同时给敌人一条活命自新的生路，北伐军同意谈判。双方约定10月10日由该师防守的保安门、中和门、通湘门接应北伐军入城。但因刘玉春拒绝交出武器，谈判再度破裂。守城豫军第三师师长李俊卿、团长贺对庭，知其顽固困守，无异于自寻绝路，遂单独与北伐军议降。约定10月9日晚开城迎北伐军入城。10日拂晓以后，李俊卿打开通湘门、中和门和保安门，叶挺独立团首先由中和门进入城内，第十师由通湘门入城，第十二师由保安门入城，围歼顽敌。在督军署、学兵营、省长公署等地展开了激烈巷战。陈嘉谟、孙建业、宋大霈、余荫森等部敌军，因饥饿疲惫，无力抵抗，未经激战，即行投降。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参谋长邓龙光，在文华学校主办美国人孟良佐家里搜捕到敌守城司令刘玉春。陈嘉谟割须易服，落荒而逃，被第八军巡逻兵捕获，10月10日中午，独立团占领蛇山。围攻40天之久的武昌城宣告攻克，江城武汉完全收复。至此，湖北战事结束，基本上实现了消灭吴佩孚，占领湖南、湖北的战略目标。

武昌战役俘敌官兵12 000余人，缴获大炮18门，各种枪支7 000余支。革命军在攻克武昌的作战中，伤亡官兵1 157人，其中军官伤亡97人。

攻克武昌后，第四军出兵江西，参加了德安马回岭战役，1926年11月回师武汉。由于第四军出师北伐以来，驱逐赵恒惕于湘北，创吴佩孚于鄂

南，败孙传芳于赣北，使反革命军阀遁逃，帝国主义者惶恐畏惧，因而受到武汉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会攻武昌战役中，第四军第十、十二两师，尤其是叶挺独立团，作战英勇，所向披靡，屡建战功。独立团长叶挺，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指挥作战，更是身先士卒，骁勇善战，杀敌果敢，立下奇功，为全军将官的表率。为此，国民政府军委会破格授予叶、黄两团长以少将军衔。独立团伤亡官兵400余名，为表彰烈士们的英雄业绩，在洪山修建了巍峨的烈士陵园。

长期以来，吴佩孚一直视武汉为其称雄中原、争夺北京政权、策划进攻广东和兼并西南的战略基地。北伐军光复武汉捣毁了直系军阀在华中的巢穴，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侵略势力，巩固了国民革命的基础，推动了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发展，鼓舞了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至此，吴佩孚败走河南，一蹶不振。

注释：

①刘玉春：《百战归田录》，《近代史资料》第82页。

②《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第383页。

③周士第：《回忆叶挺将军》。

④《叶挺同志参战报告》，1926年9月9日。

⑤《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18页。



国民军五原誓师策应北伐

正当北伐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节节进展、不断取得胜利之时，北方的形势也逐渐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1926 年 9 月 17 日，冯玉祥国民军在绥远的五原誓师，向甘肃、陕西、河南进军，同国民革命军南北遥相呼应。

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了北京政变，宣布成立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表示倾向革命。当时，北方的反动势力很强大，革命力量却很薄弱，革命的准备工作也很不充分，而这些，是冯玉祥没有认识到的。因而，冯在取得推翻曹锟反动政府和打败吴佩孚军事反扑的胜利之后，便一步步走向了退却和失败的道路。在奉系张作霖入关军队和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不断排挤之下，冯玉祥陷入了被夹击的困境，为保存实力，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 1926 年元旦通电下野，并把国民军撤出了北京，退守南口，等待时机，以寻求新的出路。

1926 年 7 月，当北伐战争开始后，由于吴佩孚主力南下，奉系军阀也因受到南方形势的牵制而不得不放松对于国民军的监视，北方的革命力量又逐渐开始活跃起来。

1926 年 3 月 20 日，为了寻求支持和找到新的出路，经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引介，冯玉祥取道库伦去往莫斯科。23 日，在库伦，与鲍罗廷、徐谦、顾孟余等人研讨中国的前途问题，冯表示了对孙中山倾慕之心，并决定加入国民党。5 月 9 日，冯玉祥一行抵达莫斯科。根据斯大林的旨意，苏共与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诺维也夫邀请冯玉祥到克里姆林宫会谈。斯大林决定增加给国民军军事援助，答应将原确定提供 5 万人军事装备的计划扩大到 8 倍，装备 40 万人①。在苏联考察期间，冯玉祥参观了机关、工厂、学校和军事设施，访问了工人和士兵，同时还注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蔡和森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身份拜访了冯玉祥及其随行将领，同他进行了整整三天的长谈。向

他介绍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迅速提高。他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意见，接受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加国民革命。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委派在莫斯科的刘伯坚、曾涌泉、武胡景等以记者身份拜访了冯玉祥，同他谈了国际国内局势。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冯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戒心，决定改组军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经常通过写信、派人探望同冯玉祥保持密切联系。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元老马文彦，奉命赴莫斯科劝说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李大钊约请于右任去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及早回国，重整旗鼓，并提出了“进军西北，解围南北，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冯于是着手准备回国。苏联政府对冯玉祥参加北伐战争给予大力支持。除调拨大量军械弹药外，还应冯的请求派来乌斯曼诺夫等军事顾问。

8 月 17 日，冯玉祥离莫斯科回国。乌斯曼诺夫、刘伯坚等同行。刘向冯提出了一些建议，冯表示同意。冯还致函陈独秀要求“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②苏联革命成就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加之其积极追求革命真理，使得仅在苏联停留了 3 个月的冯玉祥有了较大的进步。

冯玉祥回国时，正值国民军在南口战败之后，西撤的部队军心涣散，纪律废弛，“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③。陕西方面，西安被围已 5 月，亟待解救。冯玉祥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没有丧失信心。

9 月 15 日，冯玉祥到达五原县（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内盟），经与于右任、孙岳、邓宝珊、方振武等会商后，决定组织国民联军，冯被推为总司令。冯玉祥派警卫团长专程到北京向李大钊报告他将要在五原誓师的计划，要求给予协助。李大钊当即派方仲如前往五原带去他给冯玉祥、刘伯坚的有关文件。9 月 16 日，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五原誓师宣言。他宣告：“我现在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面，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④这个宣言是国民军发生革命变革的重要标志，是国民军进入国民革命新阶段的行动纲领。

9 月 17 日，国民军在五原县大校场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号召国民军全体官兵进行国民革命，实行孙中山倡导



的三民主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大会发出通电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并通告全国同胞。于右任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授旗并监誓。

誓师会上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将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冯玉祥当场宣誓：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联军，联军下辖五个军。第一军由冯玉祥兼军长，第二、第三联合军军长于右任，第五军军长方振武，第六军军长弓富魁。鹿钟麟为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刘伯坚任总政治部副部长、副主任，魏野畴、宣侠父、刘志丹、方仲如、邓小平等分任各路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会之后，冯玉祥和于右任率誓师队伍举行了游行。

9 月 27 ~ 29 日，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代表大会在五原召开，宣布国民军联军全体将士集体加入国民党，成立最高特别党部。刘伯坚讲述了国民党的主张、政纲，冯玉祥报告了形势。选举方振武、刘伯坚等 11 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等监察委员。

誓师后，国民军总部颁布了戒烟酒、禁嫖赌的治军新戒律，名为“九一七新生命”。冯玉祥还三次发出电令，强调开展政治工作。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请求派人到国民军中办报。通令规定每师设宣传员 20 人，以加强对部队的宣传工作。之后，部队集中，进行整顿。

五原誓师标志着国民军最终摆脱了北洋军阀的控制，开始踏上了革命的新里程。

10 月，冯玉祥、刘伯坚等去包头，召回驻该地区的原国民军旧部，该地区驻军韩复榘、石友兰、陈希圣、张万庆等，在南口失败后投归阎锡山，驻包头。经说服，宣布脱离太原，归属冯玉祥，参加北伐。

国民军联军成立后，采取何种战略方针，是全军上下所关心的问题。一开始冯玉祥设想，一路由甘入陕，由陕入汉中或潼关；一路入晋攻太原，出娘子关或紫荆关；一路由京绥路出南口。誓师后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由五原会师南口，进攻北京；另一种是取道宁夏入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正当国民军议论未定之时，李大钊派方仲如送来了进军陕西、出师潼关、会师中原的密件计划。冯玉祥及其将领认为，按照此计划既可解西安之围，又可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于是“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⑤。而实行这个计划还需要采取巩固甘肃这个后方基地和争取阎锡山合作或保持中立的措施。国民军联军最后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方针。

这个战略方针确定后，冯玉祥即作了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的部署。西

安国民军自4月中旬即遭到号称10万之众刘镇华镇嵩军的进攻。5月15日，刘军实现了对西安的四面包围。守城军在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李虎臣、杨虎城率领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26年10月初，甘肃东部平定。冯在派兵巩固甘肃的同时，又于9月下旬编定七路援陕军，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第二路弓富魁，第三路孙良诚，第四路马鸿逵，第五路石友兰，第六路韩复榘，第七路陈希圣、刘汝明等。冯玉祥留五、六、七路留守包头、五原及宁夏，以牵制和防备京绥线奉军进袭。10月上旬，孙良诚部到达兴平。刘镇华为缩短路线，撤去围困三原的军队。10月20日，由榆林南下的于右任、史可轩部进占三原，因兵力少，与敌相持没有进展。冯玉祥在五原得到孙良诚求援报告后，即令方振武、马鸿逵等部火速增援。11月上旬，方振武由五原，孙连仲由宁夏，马鸿逵由固原分途出发，投入援陕之役。11月下旬，孙良诚围攻咸阳，方振武经固原、平凉、乾州包抄进至咸阳。在大军压境下，直系刘镇华第二师贾济川部西撤，国民军于23日攻克咸阳城。随后，国民军联军分兵三路进攻西安：左路方振武部向泾阳东南推进，攻西安城北之敌；中路孙良诚部由咸阳进攻；右路马鸿逵部向户县东北推进，攻西安城南之敌。刘镇华集中兵力阻击孙良诚中路，战争甚激。此时，刘汝明、孙连仲两师赶至增援。援陕国民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打迂回战，袭击敌之后路，即由刘长明从左翼绕到西安之东，攻击敌后方十里铺；由孙连仲从右翼向兰田方面迂回攻击。11月26日拂晓，国民军联军全线开始总攻，同时城内守军也配合作战。经一昼夜激战，27日被围困8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围。刘镇华部向潼关等地溃退，国民军乘胜追击，12月2日占领潼关。至此，国民军联军援陕之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刘伯坚和苏政治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自平凉到达西安，联军总司令部移至西安红城（旧称皇城，后改称新城）。这时，北伐军已攻克武汉，建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冯随即与武汉国民政府联系了会师中原的计划。时国民军已发展到20万人。冯玉祥以于右任、邓宝珊为驻陕司令部正副总司令，率部驻陕以巩固后方。由于得到国民军的保护和支持，中共领导的革命势力在国民军中和西北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时国民军一军中有共产党员180多名，二、三军中有30～40名。1927年1月，在西安成立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它是中共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全队1 000多人。



这时，奉军势力已乘宁汉对立、冯玉祥入陕之机，沿京汉路南下，到达许昌、郾城。吴佩孚的湖北督办于学忠与四川督办杨森勾结，联合鄂北驻军张联升部共数万人，正企图进攻武汉。直鲁军及孙传芳正在苏皖激战。吴佩孚总部先驻巩县，后移郑州。为会师中原，冯玉祥多次联络山西阎锡山和败退洛阳、豫西地区的叛军刘镇华，最后阎表示中立，刘表示愿归降国民军。据此之情，李大钊密函冯玉祥，详告奉、鲁、孙三方兵力情况，提出速出西安、会师郑州、完成北伐的建议，冯玉祥确定援鄂攻豫。

1927 年 4 月 26 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双方商定联合北伐，分路出兵。5 月 1 日，冯玉祥在西安数万人的军民会上宣誓就职，并改组编制，以石敬亭为总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5 月 6 日移驻潼关，督师东进。

国民军东进计划兵分七路。“一、左路军，徐永昌任总司令，由第十五路及第九路之一部组成，由陕北碛口过黄河，经娘子关直趋石家庄。二、中路军，由冯玉祥统率，以孙良诚为总指挥，由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三等路组成，约 8 万人，集中潼关、华阴，沿陇海路东进。三、右路军，以孙连仲为总司令，由第十四路及马克齐等三个旅，张耀枢一师组成，约 4 万人，经南阳向郑州前进。四、南路军，岳维峻为总司令，由第八、第十二两路，田春生等两个师，何全升等五个旅组成，约 5 万人，经洛宁向洛阳前进。五、东路军，刘镇华为总司令，由第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路军组成，均属刘原部，由孟津渡黄河，向河北京汉路方面活动。六、北路军，宋哲元为总司令，由第七路及独立第一、第八、第二十二等三个师组成，集中后方部队于宁夏。七、其余各部均驻原地待命。主力为中路军和右路军。”

这时，奉军处于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即南有武汉北伐军，西有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联军。其战略计划是在最短时间内，集中大部兵力沿京汉路打败武汉北伐军，然后回师陇海路进攻国民军联军，而对西面采取守势。

5 月 5 日，冯玉祥下达总攻击令。中路军孙良诚、方振武两部东进，于 5 月 6 日克灵宝，7 日下陕州（今河南陕县）。后分路东进，先后占卢氏、洛宁、渑池，22 日克新安。26 日，国民军联军大败奉军，攻占洛阳。27 日，第五路占孟津，28 日攻占郾师。29 日打退奉军来援，经激战，奉军分途向东、北溃退。5 月 30 日，国民军联军占领郑州，并于第二天进驻开封。6 月 1 日，北伐军唐生智部也进抵郑州。至此，全豫直奉军已被肃清，国民

军联军和武汉北伐军终于会师中原。

国民军五原誓师，解西安之围，东出潼关，进军郑州等，不到一年时间，便击溃了直、奉两军防线，解放全豫。这对北伐军集中兵力东进并取得江西、福建、浙江等战场的胜利起了战略配合作用。

注释：

①毛以亨：《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 1954 年 7 月出版。

②《冯玉祥给仲甫同志的信》，《中央政治通讯》第 10 期。

③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 486 页。

④《向导》第 177 期。

⑤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 495 页。



党在国民军军中的政治工作

1926年初，广东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重新组建后的国民革命军，先后推行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政治部。因为国民革命军大都是由一些地方军阀武装改编的，他们仍保留着旧军队的一些恶习。可以说，国民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将对北伐起着决定的意义。因此，要使国民军成为一支新式军队，就要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不断灌输革命思想，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而这些工作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才取得成效的。

北伐战争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军（包括冯玉祥领导下的国民军）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改造工作。

1924年5月黄埔军校的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调配了大批的优秀共产党员主持政治教育工作”[①]，以推动军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党先后派周恩来、熊雄等到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肖楚女、聂荣臻任政治教官。黄埔军校中的许多学员，是党从各地选送出来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重新制定了政治教育计划。在之前所设课程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发展史”等科目。他还在军校发表了《军校的政治工作》等演讲，精辟地分析了军队的来源及其阶级性、革命军队与反动军阀的根本区别等。北伐军中的多数军官、干部是从这里毕业的，如李富春、林伯渠同志担任了第二和第六军的党代表，他们加强了官兵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思想工作。“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军队里的全部政治工作。第一、二、三、四、六军里的政治部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政治机关工作人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②]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使国民革命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国民军建立后，中共开始了对这支革命武装的政治改造工作。党先后派

刘伯坚、邓小平、李林、刘志丹等40多人到国民军中指导工作，各军中的政治工作多为共产党员担任。党还为其培养政工干部。1926年6月，在中共的参与、组织和领导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成立了一个特别政治训练班，聘请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担任主要教员。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学员，绝大部分被派到北伐各军中担任党务和政治教育工作。共产党人来到各军以后，“千方百计把党的主义（即三民主义）、政策传到士兵中去”，使每个官兵明了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③]当时，北伐军中若没有共产党员担当政治教育工作，是很危险的。如唐生智的第八军在北伐之初，就没有共产党人在军中工作，所以军纪相当差。后来，唐生智邀请共产党人彭泽湘等到该军工作，军、师政治部相继发布《严申军纪》的布告和命令，宣布“此后再有发生上项军风放荡，侵入民家之事，一经查出，就地枪决”；“责令各级长官严饬所部，勤加训督，以维军声而慰民望”[④]。为进一步加强第八军的政治改造工作，以共产党员包惠僧为班主任的“战时政治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被选派到第八军中工作，“成为改造第八军的骨干”[⑤]。党对国民军政治工作的指导，使其有为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除了加强南方革命军各军的政治工作外，中共党组织及其党员还在调和北伐军各军首长与蒋介石的矛盾，并北方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帮助和改造。

广州国民政府所辖的八个军，来自不同的地域和山头，派别与门户之见甚深。各军军长与蒋介石也存在矛盾，当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各军长均无拥蒋表示”，后经何应钦劝说疏通，谭延闿、朱培德、李宗仁等仍然“对之冷淡”[⑥]。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攻占长沙后，兵强马壮，加之第四军、第七军又“均亲近唐”，他便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故蒋抵长沙后就派人向中共方面疏通，“请维持一军，维持黄埔，维持蒋之总司令威信”，还表示欢迎中共党员回第一军做政治工作[⑦]。之后，蒋介石指挥的西江战事犯了一系列战略错误，官兵均不满蒋的领导。北伐军在赣面临着被孙传芳消灭的危机。共产党人审时度势，认识到江西战场的胜败关系重大，革命力量分散将危害北伐大局。因此：“极力向各方面陈说利害，希望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一方面劝唐出兵，一方面劝蒋要四、八军东下参加赣战”。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疏导，解决了各军首长与蒋之冲突，各军协同作战，“孙传芳遂不免在江西失败”[⑧]。



1925年5月，李大钊专程前往张家口，以帮助冯玉祥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李亲自拟定了一个政治工作计划，即在国民军中建立10个俱乐部，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孙文主义，并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文化教育组织。冯玉祥批准了这个计划，同意先成立2个俱乐部，并委托李大钊、徐谦负责领导俱乐部的政治工作。李、冯还就派宣传员一事达成共识。

为了建好俱乐部，李大钊派宣侠父率领一批共产党员，前往张家口。宣侠父等到国民军后，一方面同冯玉祥及其上层军官来往，宣传国民革命；一方面利用办俱乐部、图书馆、训练班等形式，广泛接触士兵，向他们宣传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义。另外，宣侠父还在国民军总部设立宣传部，派出宣传员，对各军军官讲解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的内容。

李大钊还亲自选派共产党员为革命军办起了两家机关报：张家口的《察哈尔国民新报》和包头的《西北日报》，以扩大国民革命的宣传教育。

五原誓师前，已有近200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政治工作。五原誓师后，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冯玉祥感到政治工作人员不够用，于是，冯写信请求在北京的李大钊派遣干部帮助其开展政治工作。李大钊接信后，立即派党员方仲如赴包头接洽，并将冯玉祥的信件转交给中共中央。不久，中共中央又派出20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前往国民军联军。

中共中央欢迎冯玉祥国民军的再起，认为这支部队的存在，无论在现时，还是在未来，都是对付奉系军阀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国民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将占着极重要的地位。”[9]中共中央对国民军寄予厚望，希望它“善于保持其有纪律、不扰民之荣誉”；“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不可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要“成为保护农民之军队，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注意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使每个将领每个士兵都晓得为什么而战”；“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利益，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0]。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国民军联军的政治工作有了很大提高。1926年10月，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39条。《大纲》规定：国民军联军的宗旨是“与国民党联合一致，誓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买过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自由平等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大纲指出：“全军官

佐应特别提高政治工作，应以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作中心”，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重要的事上”。“军队中的政治部，就是党在军队中的分部”，“每个政治指导员就是他的官长在政治方面的助手”。并强调指出：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为的要使每个兵士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⑪。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是国民军联军加强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颁布，使国民军联军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很快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随着中共党员在国民军联军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加，政工队伍的扩大和政治工作的开展，中共北方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9月间蔡和森提出的在国民军中工作的三原则，即：一、“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二、“党（指国民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指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的职权”⑫。

同时，对国民军联军中不符合以上3项原则的地方进行了纠正，提出各级政治部（处）主任由冯玉祥自己委任。《决议》对国民军中的工作原则、方针、内容和工作方法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是：“军中的政治宣传，宜注重中国近代外交痛史，军阀官僚的政治之腐败，工人农民之痛苦，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壮史，军人和工农群众之关系等等”；“国民军此时重在与甘肃绥远的民众合作，以巩固甘绥的政权，以从容恢复其战斗力及实行普遍的下层政治教育，不可怂恿其急于向外发展”；“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个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乐意帮助冯军”；“对陕甘绥的农民运动，要看做与军事工作同等重要”。这都是国民军发展和陕甘绥地区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筹办了《新国民军报》、《中山画报》等刊物，还发行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向导》、《中国青年》等几十种书刊。中国共产党还在国民军联军中组织学习班、俱乐部、士兵自治会等群众性组织，通过举办时事报告会、讲演会、创办连队小报等形式，给国民军输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国民军思想上的改造。

1927年2月，共产党人史可轩、邓小平等筹办了国民军中山军事学校，专门培养军事、政治干部。该校完全由共产党领导，共有学员500余人，大多数是党团和进步青年。该校按照黄埔军校的做法，上军事课、政治课，革命空气浓厚，有“第二黄埔”之称。它为党在西北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



由于在国民革命军中实行了党代表制度，建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从而，推动了这支军队的改造和进步。国民革命中的多数官兵，尤其是中、下层军官和士兵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过去充斥于旧军队赌博、吸毒、殴打士兵等行为，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军队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相当多的士兵群众认识了革命目标，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北伐战争造就了又一支革命军队。

纵观北伐战争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军在政治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叶挺独立团的建立以及北伐的胜利推进，都说明了中共政治上领导的正确性。忽略或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就难以理解北伐战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也就不能把握北伐战争由准备到发展的内在规律。

注释：

①包惠僧：《大革命时期的回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合订本，第 242 页。

②（前苏）《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 388 页。

③恽代英：《党纪与军纪》（1926 年 2 月），见《恽代英文集》（下）。

④参见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08 页。

⑤见《包惠僧回忆录》第 217 页。

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 12 辑（1926），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2 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0 页。

⑧同上书，第 372～373 页。

⑨《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 年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 369 页。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 370 页。

⑪《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1926 年 10 月），《中央政治通讯》第 14 期。

⑫《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 68 页。

北伐军挺进江西

1926年9月初，北伐军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直系军阀的主力，两湖战场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实现北伐第二期战略目标，即消灭孙传芳的军阀势力。国民革命军将军事中心由两湖转移江西，同孙传芳的军队展开了激战。

江西是孙传芳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当时孙传芳虽掌握苏、皖、浙、闽、赣五省地盘和20余万军队，但形成这一集团，为时不过一年，孙的地位并不巩固，各省的军阀头目并不完全听命于他。因而在北伐开始时，他并不想过早投入战斗，对吴佩孚的失败采取旁观的态度，甚至吴几次电促孙出兵湖南，孙都婉言拒绝。实际上，孙一方面想坐看吴佩孚与北伐军决战，待他们两败俱伤时，好坐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孙担心自己一旦出兵两湖，奉军会乘机夺取他在江浙的地盘。但是，北伐军的迅速推进，威胁到了孙传芳和张作霖的利益。张作霖害怕北伐军与孙传芳联合起来，挥戈北指，夺取他的地盘；而孙传芳则认为北伐军已拉成一条长线，用剪刀剪断它的时机已到。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孙传芳和张作霖调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互相致电，表示要以"大局"为重，"合作伐赤"。鲁军头目张宗昌也发电表示他行事"光明磊落"，决不会暗箭伤人，不会借机夺取孙的地盘。这样一来，孙传芳对奉系军阀无后顾之忧。

吴佩孚的主力在汀泗桥、贺胜桥被打垮后，孙传芳即调兵遣将，部署同北伐军作战。1926年8月下旬，孙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从苏、浙、皖抽调10万兵力，组织援赣军，任命卢香亭为总司令，率兵入江西，并命邓如琢，周荫人等部从福建袭扰广东。9月又派马登瀛旅乘船出援困守武汉的直军。9月3日，北伐军第二、三、六军进入江西，何应钦率第一军一部进攻福建，北伐军与孙传芳的战争拉开序幕。

9月7日，孙传芳狂妄地发出通电，限令北伐军于24小时内撤出江西、两湖地区，全部退回广东。



孙传芳把赣军和援赣军合编为五个方面军，分别以赣军邓如琢、苏军郑俊彦、浙军卢香亭、闽军周荫人、皖军陈调元为各个方面军的总司令，合计20余万人。郑俊彦部为总预备队，孙设司令部于九江江面的军舰之上；卢香亭部由修水、铜鼓出湘鄂边，抄北伐军后路；陈调元部从安徽沿长江向西进攻武汉三镇，以解武昌之围；邓如琢部在樟树以西、以南布防，作为策应正面战场的两翼。另外，孙传芳还命令周荫人部自福建进攻广东潮汕，威胁北伐军后方。南浔线上，战将云集，大兵如潮。

根据敌情，北伐军也作了相应部署，决定分三路进攻：以第四、第八军留守湖北和围攻武昌；以第七军沿长江东进，对付陈调元之西进；以第三、第六军及第一、第二军各一部，对付敌人向湘鄂边境作正面进攻，并伺机攻占南昌；以第二军一部及新编第十四军攻打赣州，然后沿赣江北上，威胁南昌，从南、北两翼配合赣西北正面战场的作战。对于福建方面，则由广州留守部队对付周荫人部的进攻。

9月初，北伐军总司令部下达攻击令，各部队从驻地出发，到达指定地点。北伐军计划分三路作战：以第二军和第五军各一部为一路，会同独立第一师，由湘粤边境的汝城、南雄进攻赣南，攻克赣州后，沿赣江北上；以第三军和第二军主力从湖南醴陵进攻赣西，朱培德任总指挥；以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为一路，由湖北咸宁向赣西北进击，程潜任总指挥。三路合计4.6万人，计划从赣南、赣西、赣西北分进合击，会攻江西。由于敌军经过长期准备，力量集中，战斗力也比较强；而北伐军则久经战场，力量不能完全集中，因而这里的战斗异常艰苦。

北伐军攻取江西的作战，主要集中在赣西北，特别是南昌和九江之间。

9月5日，朱培德指挥第二、三两军5个师，从醴陵入赣，在安源工人和附近农民的支援下，大破赣军邓如琢、唐福山、张凤岐各部，先后占领赣西的萍乡、安源、宜春（袁州）、分宜、新喻、清江等重要城镇。与此同时，程潜指挥的3个师从湖北通城向赣西北进军。在修水、铜鼓与孙传芳嫡系劲旅苏军谢鸿勋师激战多日，重创强敌，占领修水、铜鼓、奉新、万载、高安等城市。为配合赣西、赣西北的作战，赖世璜指挥的原驻粤、赣边境的北伐军，在赣南打垮了赣敌杨如轩、杨池生部，占领安远、信丰及赣南军事重镇赣州。9月中旬，三路北伐军已对省城南昌形成包围之势。

9月19日晚，第六军军长程潜见南昌防务空虚，即令十九师乘虚进攻，在南昌工人、学生的支持下，并得到敌方起义的警备队的配合，一举攻占了

南昌城。

革命军占领南昌后，孙传芳极为惊愕，随即令郑俊彦第十师等主力迅速从九江运往南昌，同时命令邓如琢回师北攻，克期夺回南昌，孙本人也从济南赶赴江西亲自督战。在其指挥下，邓如琢自樟树分兵向南昌进攻，郑俊彦部也从九江进至乐化，对南昌成南北夹击之势。由于程潜第六军孤军深入，友邻部队未能迅速跟进，而孙军主力并未被消灭，且南浔铁路也未能被切断，位于南昌的第六军腹背受敌，形势告急。乐化一战，孙兵力雄厚，炮火猛烈，同时又有背水一战之决心，而第一军王柏龄之第一师战斗力弱，王临阵脱逃，致使作战失利，北伐军又弃守中行车站，南昌以西赣江北岸尽为孙军所占领，城郊也被邓如琢部包围，第六军十九师在米生街与孙军发生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北伐军伤亡惨重，战线开始崩溃。情急之下，第六军急请第三军增援，而第三军未至，第六军兵疲弹尽，寡不敌众，被迫于 23 日退出南昌，撤往奉新。北伐军首战南昌，克而复失。

南昌重为孙传芳占领后，孙军与北伐军处于对峙胶着状态，集结于南浔线上的孙军约 5 万人，与北伐军第一、二、六军对垒；集结于赣江东岸的邓如琢、蒋镇臣等部 3 万多人与北伐军第二、十四军对垒。9 月 23 日，孙传芳从南京赶到九江，并在九江设立司令部，亲自督战，并制定了一个兵分 3 路进攻计划：南路由郑俊彦率领由南昌进攻高安，目标直指长沙；中路由谢鸿勋率领由武宁、修水进攻湖北通山；北路由陈调元、王普率领由武穴渡江攻取新阳，于咸宁、蒲圻间截断武长路，然后与中路会师，解武昌之围，并约吴佩孚在武胜关反攻。10 月初，孙军占领阳新、大冶、黄石、鄂城等地，向武汉进逼。

此时北伐军也制定了再夺南昌的作战计划：即北守南攻。北线以第六军在奉新一带防守，调战斗力较强的第七军至南浔路参加作战，第三军在西山万寿宫一带作战，第二军主力横渡赣江，由清江北上丰城，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一部向吉水、永丰、抚州方面进攻，最终形成对南昌的包围，切断南浔路，与孙军决战。至 9 月下旬，北伐军在江西战事发生转机，很快进至南昌外围。

这时，蒋介石率北伐军总司令部人员赴前线督战，设总部于高安。从阳新退出的北伐军劲旅李宗仁第七军主力 2 万余人奉命入赣，于 9 月底经过激战，取得箬溪战役的胜利，消灭孙军主力谢鸿勋 1 个师。与此同时，朱培德第三军在南昌以西万寿宫与敌苏军郑俊彦四个旅激战，歼敌 2 000 余人，占



领了万寿宫。北伐军第三军两个师和第十四军，9 月 24 日，打垮了赣军蒋镇臣部 6 000 余人。占领赣江中游的重要城市吉安，随即挥师东进，占领了吉水、永丰、乐化、宜黄、广昌、新干等城市，继而乘胜北上，10 月初，连克赣江中游战略要地樟树和丰城。因此，蒋介石于 10 月 6 日再度强攻南昌，蒋亲自到南门口督战。以朱培德第三军进攻中行，程潜第六军及薛岳第十一师进攻建昌，李宗仁等七军进攻德安，鲁涤平率第二军及刘峙第二师进攻南昌。但北伐军各军未能协调行动，第六军进攻修水失利，朱培德军猛攻中行未果。10 月 11 日，鲁涤平、刘峙率部冒敌人炮火搭云梯攻城，与守军展开白刃战，守军纵火驱敌，大火延烧数日，繁华之南昌城尽成灰烬，双方血战 5 日，北伐军伤亡惨重。10 月 14 日，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围，第二次攻打南昌失败。

孙传芳在南昌解围之后，集中兵力向鄂东南进攻，在江西战场采取守势，避开北伐军的主力，企图先攻下武汉，占领长岳，然后把北伐军赶出湘、鄂、赣三省。但是，很快孙传芳的后方就出现了不稳的局势。10 月 10 日武昌克复之后，浙江省长夏超于 10 月 16 日宣布独立，归顺国民政府，并准备进攻上海。这时，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工人起义虽然遭到孙传芳的镇压，夏超也兵败被杀，但动摇了孙传芳的后方和孙军的军心。另外，进攻福建的北伐军入闽后，孙军周荫人部迅速崩溃。北伐军未经大的战斗便占领了长汀、漳州一线以南广大地区，从而瓦解了江西战场上孙部的士气，并使北伐军解除了后顾之忧。

北伐军受挫后，进行休整，并由湖北调来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两个师及新编的贺耀祖师，实力大增。10 月下旬，北伐军组织第三次会攻南昌，同时总结了前两次进攻南昌失利的经验教训，即应全力切断南浔铁路。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重新制订作战计划，将入赣北伐军编为左、中、右三路，左翼军由李宗仁任指挥官，下辖第四、第七两军及独立二师，计划攻占南浔路上的德安、永修，并以一部警戒九江之敌，阻敌援兵。中央军以程潜为指挥官，下辖第六军，以占领乐化车站为攻击目标，得手后与右翼军夹攻徐家埠。右翼军又分左、右两纵队，由朱培德任指挥官，下辖第二、三和第十四军，以及第五军第四十六团，计划以左纵队之一部牵制牛行车站之敌，以主力进攻蛟桥，然后占领中行车站。同时以右纵队之一部牵制南昌之敌，以主力协同第十四军攻占抚州。上述目的达到后，以全力包围南昌。蒋介石为总指挥，统一部署，协同作战，将主力集中于南浔路沿线，在赣北消灭敌

军主力，并切断孙军与南昌守敌联络的南浔线，进而夺取南昌。

10月18日～20日，北伐军发动抚州战役，歼敌刘宝题、杨如轩等部官兵1 000余人，占领抚州，截断了孙军南窜入闽的通道，从东南方向形成对南昌的合围，为决战南浔路创造了条件。

11月1日，国民革命军左、中、右三路大军向南浔路各据点发起总攻，加伦将军和蒋介石都到前线指挥。2日，第七军、第四军张发奎师，首先攻占了南浔线交通枢纽德安。11月3日，张发奎第十二师及贺耀祖独立第二师及第七军一个旅，合攻马回岭，孙军嫡系颜景崇、马登瀛、上官云相等部发生激战，占领军事要地马回岭。11月4日，独立二师3个旅进攻九江，围歼颜景崇、马登瀛、上官云相残部3 000余人，九江攻克。11月5日至7日，北伐军连克赣北军事要地瑞昌、湖口和武宁，敌向南京逃跑。

与此同时，程潜第六军沿南浔路南下追击浙军卢香亭部。11月5日，而挥师北上，11月6日占领徐家埠，与李宗仁部会合，逐个歼灭孙联军在南浔线上的各个据点。至此，南浔路已完全被北伐军控制。南浔线上各次激战，消灭了孙联军的主力，南昌敌军1万余人孤立无援。11月7日，孙传芳乘快舰逃往南京。8日，北伐军攀墙攻城，敌守城军司令官唐福山、岳思寅等无力抵抗，缴械被俘，南昌回到北伐军手中。9日，北伐军将沿铁路撤退的孙残部全部缴械。至此，孙传芳在江西战场投入的10万兵力，绝大部分被歼。

南昌、九江地区决战，为时不过旬日，北伐军以破竹之势，摧毁了孙传芳在江西的十万精锐之师。这次战役，革命军俘敌5万余人，缴枪5万余支，大炮80余门、机枪480余挺。11月14日，北伐军进占彭泽、马当和景德镇，江西全境敌人被肃清。

江西战场的胜利是北伐军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壮大了国民革命军的力量，扩大了国民政府管辖的范围，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创造了条件。同时，北伐军粉碎了孙传芳夺取两湖，进窥两广的企图，从根本上动摇了孙在东南五省的统治。北伐军从此掌握了进军闽、浙、皖、苏的主动权，这对北伐军平定东南、西进川黔，乃至北伐奉军，都具有战略意义。



北伐军席卷福建、浙江、江苏等省

北伐前，统治福建的是闽省督理兼第二师师长周荫人。孙传芳成立五省联军后，周荫人部被编为第四方面军，周任总司令，并将所部3万余人编为四个军：第一、二、三军军长分别由张毅、李凤翔、刘俊担任，周自兼任第四军军长。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的胜利，引起了盘踞在长江下游的反动军阀孙传芳的极大恐慌。孙即令周荫人率所部4个军进攻北伐军的后方广东，企图打乱北伐军的阵脚。9月初，周荫人将闽军指挥部从龙岩迁往永定，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分兵向闽粤边界进攻。9月底10月初，闽军各方面军分别到达闽粤边界。周将所部兵分三路进攻：张毅第一军两个旅出潭州，攻诏安、饶平；李凤翔第二军曹万顺、杜起云两旅由岩前、大坝进袭蕉岭；刘俊第三军两个旅出永定、峰市，向松口、大埔、梅县推进；第四军作预备队，集结于长汀、上杭。共计2.5万人。

当时，担任闽、粤边境防务的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军三个师，即谭曙卿第三师，冯轶裴第十师、钱大钧第十二师的一个团以及张贞的独立第四师，共计7 000余人，不及闽军的1/3。

面对闽军的进攻，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驻防粤东的何应钦第一军，由驻防转为攻击，率所部迅速进军福建，对周荫人展开攻势，以排除对广东的威胁，以利于北伐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于是，何部于1926年10月从闽粤边界入闽，开辟了福建战场。

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对闽军的策反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北伐的胜利进军。国共两党分别派员作曹万顺及其官兵的争取工作。1926年10月8日，闽军第二军曹、杜两旅在蕉岭通电起义，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曹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杜任第二师师长。这就削弱了敌军的实力，为北伐进军福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10月8日，何应钦令谭曙卿部由大埔进攻永定。并令冯轶裴部

攻占峰市，以切断闽军永定至松口的交通，使永、松之敌首尾不顾。9 日，谭师两个团进击永定。10 日，在城内民众和城外民军的积极配合下，守敌城军大部挂起白旗投降。周荫人化装逃走。永定战役，俘敌 2 000 余人，缴获枪支 1 800 余支，守敌几乎全军覆灭。

1926 年 10 月 11 日，冯铁裴师占领峰市后，与第三师分左右两个纵队向松口进击。12 日克观音凹、大金坑等高地。13 日凌晨，合力猛攻，经激烈战斗，至下午 2 时，敌刘俊放弃抵抗，向隆文、松源突围逃跑，后遭国民军第十七军的截击。松口战役，俘敌官兵近 6 000 人，缴枪 5 700 余支。10 月 15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入闽作战的北伐军合编为东路军，任命何应钦为总指挥。

永定、松口被克，败军孙云峰第四军与驻守上杭的李凤翔第二军，慌忙退到汀州（长汀），妄图凭险固守，以牵制北伐东路军。此时，曹万顺第十七军向汀州进击，赖世璜第十四军亦奉命从江西入闽加入作战。29 日，赖部占领长汀城西北高地。随后，北伐军第十四、十七军分别从东南、西北两面夹击李凤翔、孙云峰残部，随即占领长汀城。

北伐东路军奉命追缴闽南之敌。11 月 7 日占领南靖，8 日，攻占漳州，22 日，北伐军占领泉州。12 月 2 日，北伐军渡过涵江，迫近福州，福州各界推举萨镇冰为福建保安司令，原省保安司令李春生为省防司令；3 日，福州市民暴动，响应北伐军；4 日，萨弃职逃走，李春生表示归顺。周荫人率残部，从松溪等地逃入浙江境内。何应钦几乎兵不血刃，即于 12 月 18 日占领了福州

北伐军在福建战场的胜利，消灭了孙联军的第四方面军，粉碎了孙传芳企图利用福建进攻广东的阴谋，有效地配合了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作战，并打通了北伐军由闽入浙的通道，为进军苏、浙、皖创造了条件。

福建战争前后持续了 2 个多月，北伐军几乎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就取得了胜利。这主要是因为闽军内部矛盾重重，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和领导核心；国共合作开展对闽军的争取和瓦解；福建人民群众和民军的配合。所以，周荫人一出马，就非常孤立，陷入草木皆兵的境地。

江西、福建战场的胜利，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北伐军势力向长江下游发展。

孙传芳连吃败仗后，深感力量孤单，于是改变了他原来的策略，由反奉变成联奉。在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撮合下，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于 1926



年11月14日在天津召开的会议，力求弥合彼此之间的矛盾，合力“南伐”，共同对付国民革命军。会议名为联合北洋系统力量，其实是张作霖乘吴、孙失败之机，想当北方的太上皇。张作霖做贼心虚，首先表白他并无做总统的“野心”，讲了应当团结北洋派，决心与孙、吴两帅合作，决心与阎帅合作，先军事而后政治等一大堆笼络人心的空话。孙传芳在会上发言，检查了他的错误，发表了所谓“讨赤”声明，博得张作霖、张宗昌的赏识。

这次会议经过一番调和和折衷后，在地盘分配和进兵计划上达成了如下方案：一、奉鲁之间，由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张宗昌和李景林的联军）进兵东南援助孙传芳，让出河北给奉军。二、奉军张学良部即由河北出兵河南，督促吴佩孚反攻湖北。三、鲁孙之间，由直鲁军担任江北防务，由苏皖北部分两路攻湖北、江西（直鲁军的进兵以江北为限）。四、在江南方面，则仍是孙传芳的地盘，由孙军从浙江进攻北伐军。五、由奉军、直鲁联军和孙传芳的部队组成了“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任副司令。

张作霖虽不敢僭号总统或陆海军大元帅，但事实上，安国军总部就是一个变相的政府组织形式，只不过是没有正式招牌悬挂出来。看起来，他们之间的矛盾似乎是解决了，但实际上，孙传芳想利用鲁、奉军抵抗北伐军，张作霖、张宗昌则是想借南下之机，夺取孙的地盘。张宗昌要孙传芳的部队打头阵，保存自己的实力，不为北伐军所消灭；而孙传芳也看透了他的目的，不甘愿为张部作前锋。另外，吴佩孚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不同意其决定。尤其是奉军和直鲁军的南下，使孙、吴部下都深感有被吞并的危险。

北洋军阀内部的尖锐矛盾，使得他们间的力量不能真正统一起来，这大大有利于北伐军的进攻。

孙传芳为执行协议，于12月21日，同张宗昌、陈调元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直鲁联军由皖北进驻安庆、芜湖；陈调元部集中于皖南，截断北伐军在江西、浙江两省的联络线；孙传芳部在浙江全力对付北伐军的东进与北上。为此，孙传芳将所部划分为5个方面军。其作战计划是：先集中主力于沪杭线，然后分3路向前推进，不仅要守住浙江，而且还要进行反攻。

1927年1月6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调整了作战部署，制定了进军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确定先期攻取沪、杭，然后会师南京；将北伐军作战部队编为西、中、东三路。西路军以驻在两湖地区的第四、八军为主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集结于湖北的黄陂、孝感一带，沿京

汉路向河南敌军进攻；中路军以第二、六、七军为主力，由江西沿长江向安徽进军，由蒋介石兼任总指挥。中路军又分江左、江右两支部队，其中江左军由李宗仁任总指挥，率第七、十、三十三军，由宿松、望江进攻安庆、蚌埠；江右军由程潜任总指挥，率领第六、第四十两个军，由休宁、进攻芜湖，以打通苏浙边境北伐军的联络线，进而攻占南京。东路以第一、三两军为主力，何应钦任总指挥。它由两支部队组成：一支由何应钦率领的第一军的一部分组成，由福建向浙江进攻；另一支由白崇禧率领的第一军和第三军各一部分组成，由江西东部向浙江进攻。此次计划的中心在夺取南京、上海，粉碎孙传芳在长江下游的统治。朱培德为预备队总指挥。

1927 年初，北伐军分三路向长江下游的浙江、安徽、江苏挺进。

1927 年 2 月，以何应钦任总指挥的东路军，由福建、江西进攻浙江。此时，正值浙江军阀部队发生分化之时。由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南下和孙传芳嫡系孟昭月部的入浙，原直系头目、孙传芳部周凤岐、陈仪两部于 1926 年底在杭州倒戈。不久，孟昭月部与周荫人残部又为争夺杭州地盘而相互攻击。孙传芳派往江浙边境宜兴、长兴、吴兴一带的白宝山、冯绍闵等师为保存实力，又都按兵不动，所以，北伐军未经激烈战斗，长驱直入。2 月 8 日，东路军与敌军在桐庐激战，并于当晚攻占桐庐，俘敌官兵 8 000 多人，缴获枪支 6 000 余支。18 日，东路军攻占杭州。与此同时，东路军之第四、五、六纵队于 1 月中旬由闽入浙，2 月下旬占领浙东。到 2 月底，浙江全省为北伐军占领。

东路军在占领杭州后，又分两路向沪宁路前进，一路沿沪杭线攻上海，一路自太湖沿岸攻苏州、常州等地。这时，孙传芳收其余部集结于松江、青浦、上海和苏州。并在苏、浙边境的嘉善、枫泾设置防线，与直鲁军张宗昌合作，妄图卷土重来，与东路军决一死战。

1927 年春，由蒋介石兼总指挥的北伐中路军，从江西沿长江向安徽进军。敌人内部也发生了重大的分化。直鲁军南下后，夺取了皖北地盘，而令皖军为其打头阵，于是皖军王普、陈调元部在 3 月 5 日倒戈，并分别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和三十七军。因而，中路军不战而取安庆、芜湖。至此，安徽军事问题以军阀将领的降顺而解决。不久，中路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长江北岸指向津浦路南段的临淮、蚌埠；一路在芜湖以东分三路攻南京。

3 月 21 日，东路军各纵队分途出击，分别占领了松江、青浦、苏州、昆山，俘敌 2 000 余人，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而敌海军也在 3 月 14 日宣



布归顺北伐军。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上海工人阶级继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后，于3月21日爆发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所组之民兵，向上海北车站之直鲁军赤手猛攻，死亡枕藉，未肯稍却，率将直鲁军击溃”①。22日下午，工人起义队伍攻下直鲁联军毕庶澄驻守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站，上海全部解放。同日，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开到上海。

3月15日，北伐军的江右军程潜部由芜湖分路东进，围攻南京。16日，突破了孙传芳和直鲁联军的防线。17、18两日，由浙江北上的北伐军占领了宜兴、吴江，原驻该地的孙传芳军白宝山、冯绍闵、郑俊彦各师退往常州，闭城自守。18日，铁路工人拆毁了无锡路轨，直鲁军乘坐的由苏州西开的“长江号”铁甲列车不能通过。孙传芳看到形势不妙，偷偷地离开南京，逃往扬州。20日凌晨，程潜命令各纵队，向南京外围敌军各据点发动总攻，经三天激战，摧毁了南京敌外围据点。23日，紫金山下炮火连天，程潜率江右军攻取南京。经浴血奋战，于24日上午，占领历史名城南京。

至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部为北伐军占领，孙传芳的反革命势力基本上被消灭。

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依附北洋军阀的贵州袁祖铭、四川杨森和山西阎锡山等地方军阀先后宣布归附国民政府。北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注释：

①陈训正：《克复浙沪》，载《革命文献》第14辑，总2290页。

北伐军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

北伐军自1926年7月从广州大举北伐以来，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歼灭了数倍于自己的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部队，锋芒所向，势如破竹，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基本上陷于崩溃。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和大部，从而将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此，统治中国10余年的北洋军阀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北伐战争是在中国拥有1.5亿人口、1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上，开展起来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空前伟大的胜利。它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唤起了人民的觉醒，使民主革命思想空前广泛地传播开来，为国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伐军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其主要条件是：

第一，北伐战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正义战争。北伐战争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顺应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要求。1840年西方列强运用武力扣开中国大门，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使中国逐步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清政府、北洋军阀无力抵挡列强的侵略，转而日渐接近，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并最终成为列强侵华的工具。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欺压中国人民，导致中国日益贫穷落后。因而，打倒列强、除军阀、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就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孙中山生前提出的口号和确定的革命目标。国共合作后，为适应这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决定出师北伐，并在誓师宣言中指出：“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唯一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这个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表明北伐战争的正义性质，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符合他们的共同心愿；而且也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代表了前进与进步的方向。



第二，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北伐战争是在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共两党从时代特点、人民要求和自身实际出发，确定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并以党内合作为组织形式，以政治工作为灵魂，组成国民革命军，把武装力量和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在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目标指引下，率领各革命阶级、阶层团结战斗，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还在北伐军中进行了革命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北伐军各军、师都设党代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师还有宣传队，宣传员多由青年学生担任。团、营、连各级都设政治指导员。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在部队内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进行新三民主义教育，改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激励士气，动员群众支援和参加革命，对敌军作攻心工作。北伐军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一方面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如第六军第十九师在南昌陷于敌军重围，“虽勇猛异常，然寡不敌众，……除死以外，绝无有弃枪投降之事，可为革命政治工作之效”①；另一方面有效地瓦解了敌人，几乎各主要战场都有敌军投诚起义，从而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加快了北伐军进军速度。这方面，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起了决定作用。他们不仅为北伐军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而且有许多共产党人直接担负北伐军中政治工作的主要责任。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尤其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所向披靡，屡建奇勋，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如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就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革命武装，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奉命开拔，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略要地时屡战屡捷，所向无敌。由于战果辉煌，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它对开拓北伐战争的胜利局面起了重要作用。没有国共合作的实现，没有共产党人作骨干，没有政治思想工作作灵魂，这些军队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经指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持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1924年至1927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②这是对北伐战争胜利原因的一个科学总结。

第三，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北伐的对象，一、控制豫、鄂、湘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兵力总数为25万；二、盘踞苏、浙、皖、赣、闽的孙传芳，拥有军队25万；三、占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并控制北京政权的张作霖，拥兵35万。而当时国民政府只有8个军、共10万人。根据当时敌众我寡和各派军阀既相互勾结

又貌合神离的情况，国民革命军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和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原则：首先集中主力进攻湖南、湖北，同时部署部分兵力警戒江西、福建，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的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进，消灭孙传芳部；最后进军江北，适机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统一全国。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1926 年 7 月北伐军正式出师。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历经醴陵、平江，于 8 月占领岳阳，10 月占领武昌，基本打垮了吴佩孚了主力；随着两湖战场的胜利发展，江西成为北伐军的主攻方向。自 9 月 ~ 11 月初，北伐军三路出击，很快占领了赣南、赣西、九江及南昌，孙传芳逃回南京，其主力十万多人大部被歼灭；北伐军在消灭了吴、孙主力之后，于 1927 年继续分三路进军。并于 1927 年 3 月夺取了南京和上海，从而将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

第四，北伐战争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援。革命武力和民众相结合，才使北伐军得以在 10 个月中消灭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人，遵照中央特别会议精神，团结国民党左派，在两湖和江西等省先后组织省总工会，领导工人为争取政治权利、改善经济条件，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进行坚决斗争，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罢工高潮，有的地方还从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直接配合北伐战斗。北伐军出师时，广东革命工农群众掀起了一个支援前线的运动。例如，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 3 000 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冒暑随军出征；曲江等地数万农民赶来协助北伐军运输；沿途群众送茶送饭，表示欢迎。在战争进程中，各地中共组织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援北伐军作战，为北伐军担任侦察、向导、送信、运输、救护……直到拿起武器直接参战和组织武装起义。北伐军进入湖南后，长沙、醴陵、湘潭、衡山、衡阳、宝庆等地纷纷成立了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破坏队、交通队、向导队、暗探队、长矛队、敢死队等，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援前线的活动。北伐军在湖南战场上的各次重大战役，都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援助，才能以极少的伤亡取得很大的胜利。北伐军进逼武汉时，武汉工人帮助北伐军搭桥，运送给养。两湖粤汉铁路工人和平江、岳州一带的农民则以带路、救护伤员等多种方式支援北伐军作战，有的农民还以鸟枪、梭镖、锄头、扁担等为武器直接参加战斗，俘虏和杀伤了许多敌军。尤其是工人所组织的破坏队，节节破坏铁路，瘫痪了敌人的军事运输；汉阳兵工厂工人从 9 月 1 日起举行的



总罢工，断绝了敌人的军火来源；这些都给吴佩孚以致命的打击。在江西战场上，北伐军能以久战之师抵挡敌人的精锐，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当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进发时，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6年10月~1927年3月，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取得了完全胜利，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工农群众这种革命积极性的表现，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成为北伐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工人武装与北伐军并肩战斗夺取胜利的光辉一页。北伐军有人民作靠山，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北伐军在各省都得到了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事实证明，北伐战争各战场取得的每个胜利，都离不开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援助。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大力发动与组织工农群众奋起投身北伐的结果，是孙中山唤起民众，实行扶助农工政策的胜利，也可以说是革命武装与工农群众力量结合的胜利。工农运动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又促进了全国工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第五，前苏联的无私帮助。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同前苏联顾问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北伐时，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部中，在各兵种和各军中都有大批前苏联顾问。如葛尔培伯特任第一军顾问，杰卜罗斯基任第二军顾问，马赤利克任第三军顾问，帕罗任第四军顾问，华林任第五军顾问，波列盛科任第六军顾问，兹金任第七军顾问，粤尼依奇任第八军顾问。他们大多数是苏共党员，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的经验，其中约有一半是工农红军军事学校第四、五期毕业生，有些还是享有盛名的军事首长，如加伦、季山嘉、薛福林等。苏联军事顾问在极其复杂的环境和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向北伐军传授作战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建议，协助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并随军出征，参与战役指挥，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创造精神。他们对北伐战争作了极大地贡献。北伐军的正确的战略计划是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制订的，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也是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建立的。此外，前苏联政府还提供大批军事装备支援北伐。如1926年运来的飞机、大炮、机枪、步枪等各种物资，仅步枪就有2万余支。可以说，没有大批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大量苏联物资的援助，国民军是无法重整旗鼓的。

除上述原因外，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国民军与奉、直、晋三系军阀的“南口大战”，牵制了北洋军阀的一部分力量。反动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派互不统属，一些省级小军阀和大军阀亦有矛

盾。在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张作霖和孙传芳对北伐军进攻吴佩孚一度采取观望的态度，这为北伐迅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各军阀内部也发生分化。与此同时，北伐军进行了敌军的争取工作，例如，驻浙军曹万顺、杜云起，驻皖军陈调元、王普，海军杨树庄等一大批北军将领起义，参加北伐革命。各派军阀间内部不同一，导致军心涣散，不能协同作战、通力合作，以致孤军作战，多次倒戈，从而加速了自身的失败。革命战争愈是胜利发展，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分化，也就愈尖锐和剧烈。战争后期，北伐军没有遭遇到敌人严重的抵抗，即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这种情况，也使得蒋介石、何应钦收编了大量的军阀部队。这些没有改造的军阀部队，混入了革命阵营，增强了反革命的实力，种下了后来的祸根。

从根本上讲，北伐军方针正确、广大将士英勇作战以及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从而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注释：

①陈训正：《对赣军转进情况》，《革命文献》第13辑，第203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各地工人大力支援北伐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6年7月25日，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为了使全国工人进一步认识北伐战争的必要性，该《宣言》对民众从各方面积极准备北伐作了明确的阐述。

《宣言》首先指出，国民政府的这次北伐不是普通的国内战争，它与我们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我们应该牢记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责任，支援和参加北伐战争，而不能坐等国民革命军的到来，代我们解除一切痛苦。

《宣言》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中国的纷乱和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都是帝国主义勾结军阀侵略中国的结果，中国人民要求得生存，解放痛苦，唯有团结起来，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建设人民的统一的政府，才能达到目的。目前，在北方，英、日帝国主义支持和操纵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致使国民军退出京、津地区，在南口与军阀部队相持苦战。直、奉军阀还与其他军阀势力勾结，图谋扰乱广东。对于这个严重局面，全国民众与广东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忽视，所以，这次北伐是抢在敌人图谋的计划成熟之前开始行动，攻打敌人。广东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如果广东失败，中国革命将要遭受极大的损失，即中国民众的痛苦还将继续，全国还将在黑暗中挣扎。反之，如果各民众配合国民革命军，取得北伐胜利，则中国革命势力将会得到极大的发展，所以这次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和失败，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与中国民众痛苦的解除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中国民众应该认识国民政府这次北伐的意义，一方面是防御帝国主义、军阀侵占中国革命根据地广东的防御战争，同时又是发展国民革命势力很重要的军事行动；他的成功与失败，与我们有极大的关系。”[①]《宣言》列举了直奉军阀的反动行径、工农民众惨遭蹂躏以及一切组织、团体被破坏等种种事实，并号召：“广东的民众应一致努力援助国民革命北伐，以防御帝国主义者反赤军的势力侵入广东，蹂躏各界民众。北方的民众尤应

联合一致，集中各界民众的力量赞助革命国民军，努力奋斗，扰乱反赤军后防，使国民革命军得到胜利，拥护中国革命根据地广东，发展中国的革命的势力，进行自己的解放运动。”②

北伐战争是革命的战争。革命战争与一般国内战争的区别，在于它是否拥护人民的利益和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赞助人民和各种的自由，并应帮助工农阶级的组织，扶助一切民众运动的发展。因此必须如此，才得到全国民众的帮助，扶助一切民众运动的发展。因为必须如此，才得到全国民众的帮助，才能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巩固及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北伐才更有意义。若只为求得军事上的便利，不惜限制民众的自由，牺牲民众的利益，禁止民众争取自由和利益的运动，那北伐所得结果，恐仍不能达到预定的期望。”③《宣言》的这个立场是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为保证北伐的顺利进行，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虽然不能不作出一定的牺牲，但这决不应成为某些人压制工人运动的借口。《宣言》并指出：“国民革命是要全国民众自己实际来干的”。如果只是坐等革命军的到来而解除自己的痛苦，只是消极的赞助，这根本无益于革命。历史告诫我们：北伐战争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实际参加，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并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进而建筑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打倒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真正得到自由解放。

北伐战争的胜利，将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工会的建设，工人的解放归根到底还依靠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为此，《宣言》对战区工人运动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在北伐军占领区，应当启封工会，释放被捕工运领袖，恢复被通缉、被开除及失业工人的工作，履行以前罢工胜利的条件，抚恤和救济死伤工友，改良过低的经济生活和恶劣待遇。在政治上，应当要求颁布保护劳工的劳动法，发展工人运动的工会条例，工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绝对自由等等。

《宣言》代表工人阶级宣示了立场。它指示各级工会、各地工人应以全力支援北伐战争；明确了北伐与民众运动的关系，抵制了企图借北伐而牺牲工人利益的论调，鼓舞了工人的意志；它明确了对战区发展工人运动的具体原则和要求，有利于促进工运的蓬勃发展。因此，它发表后，“各方面的舆论为之一变，工人全力支持这个宣言的主张。”④

《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发表之后，各地工人阶级积极



行动，全力支援北伐战争。

广东工人群众全力支援北伐军。北伐开始后，第四军独立团从广东先行北上。在中共广东区委和全总领导下，掀起了支前热潮。苏兆征、邓中夏等深入各工会，宣传北伐的意义和工人的责任。香港产业工人联合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分别发出告工友书，号召罢工工友积极应募，参加运输队。7月5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执委会议，专门讨论了北伐运输问题。广东总工会也组织了宣传队，向所属工会宣传参加运输队的重要性。

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 000人的运输队、卫生队和宣传队，广九、广三和粤汉三铁路总工会组织了工程队、电话队、运输队和铁路交通队，一齐随军出征。他们冒着盛夏酷暑，滂沱大雨，肩负重担，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克服疲劳，战胜疾病，保证部队作战供应。卫生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救治伤病员。宣传队沿途热情向群众宣传。交通队及时修复铁路，保证军需。北伐军在工人群众的援助下，行军顺利，受到极大鼓舞，很快进入湖南。

湖南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北伐战争。北伐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就拥有11万会员，并多次开展斗争。1926年4月下旬，长沙工人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吴讨叶斗争。4月29日，省工团联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出版的《反吴战报》上发表告全省同胞书，揭露了吴佩孚、叶开鑫祸国祸湘的罪恶，号召全省“工农为讨吴而组织运输队与工农救国军”⑤。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工人、农民、学生支援北伐军。湖南工团联合会召集各工团讨论开展工人运动和支援北伐等问题。各地工团组织大批运输队“以备军需”，并组建破坏队、侦察队、救护队、慰劳队等，密切配合北伐军开展各种军事行动。在湖南境内进行的醴陵战役、平江和汀泗桥等战役中，由于得到工人、学生组织的“平民救国团”、农民“自卫军”的参战，北伐军才能迅速歼灭敌人主力而取得胜利。如7月11日，北伐军受到敌军的据江阻击。这时，“平民救国团”和农民“自卫军”绕到敌人后方袭击敌人。他们用鸟枪、梭镖直搏敌军，同时挥舞革命大旗于敌军四周，以分散敌军注意力，使北伐军乘机渡江，进行前后夹击，大败敌军。战后《民国日报》评论说：“醴陵一役，得民众的援助甚多。”⑥7月上旬，北伐军向长沙挺进，叶开鑫闻风而逃，长沙一片混乱。湖南工团联合会领导工人打开军械库，并收缴敌军两个连的武器，组织了有1 000多人的工人保安队，分守8座城门和城中各条要道，与革命军游击队共同维护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肃清残余敌人，迎接北伐

军进城。由湘潭败退入城的敌军，多被保安队缴械遣散，数名工人在战斗中挂彩负伤。这次，长沙未经蹂躏而安然度过，“全赖长沙工人之力。”⑦

粤汉、株萍铁路总工会也积极支援入湘的北伐军。它们成立联合援助北伐临时执委会，下设运输队、破坏队、宣传队、侦察队、向导队和冲锋队等，粤汉铁路五里牌车站分工会的工人，拆毁铁轨，割断电线，致敌军消息失灵，敌宋大霈部火车3列被截。在路口与五里牌之间，株萍铁路工人拆毁路轨两处，致3列军车受阻。航运工人也全力支援北伐军，拒绝为军阀部队运输军需物资。当北伐军到来时，广大铁路工人废寝忘食，连夜修复铁路桥梁，亲自驾驶机车，在枪林弹雨中，为北伐军运送军队和武器。北伐军将领激动地说：“株萍铁路工人，早已为我们准备了一切。”

为支援以攻克武汉为目标的第二期北伐作战，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了以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工人为主的运输队，为北伐军运送物资弹药。

湖北工人在北伐中也进行了不少工作。汉口、汉阳工人秘密组成了运输队、担架队，准备迎接北伐军，侦察向导队熟悉地形和线路，以便引导北伐军进入汉阳、汉口。汉阳兵工厂工人更是做出了特殊贡献。该厂工人早在1926年8月即开始罢工，使吴佩孚部队的军火供给遭到严重困难。北伐军到来后，兵工厂工人立即加班加点，通宵达旦，赶造枪炮，支援北伐军。湖北革命工会也大力组织各业工人，运用各种形式，支援北伐军。

在江西，为配合北伐军攻萍乡，安源工人及时破坏了由萍乡至宜春的电话、电报等通讯设备，并主动组织起来，赶走了驻守县城军阀部队，使北伐军未放一枪就占领了萍乡城。在攻打南昌时，敌人封锁了革命军的运输线，安源工人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军运送弹药，保证前沿阵地的弹药供应，一举歼敌一个精锐师。当时的《革命军日报》发表评论指出，革命军所以得到许多特殊利益，全靠了民众的热心帮助。所以我们这次的胜利，完全是军人与民众合作的来的。

在江西北战场，九江码头工人、南浔铁路工人行动起来。10月16日，孙传芳征调军用的商轮江永号在九江进港抛锚之际，码头工人帮助地下工作者实施引火爆炸，2 000余箱子弹，8门大炮，30万银元，3 000余床棉被，4 000余套棉衣及其他军用物资，或被炸毁、或沉江底，1 500名士兵、500余名夫役，只有三四百人生还。孙传芳目睹此情，至为沮丧，军心大挫。⑧

1926年12月，先期由赣入浙的东路军到达浙江衢州，杭州总工会派出代表专程前往慰问。北伐军入浙后，处于秘密状态的杭州总工会工人纠察队



抽调40名骨干，进行军事训练，拟届时充任分队长，领导工人发动起义。1927年2月，北伐军进逼杭州，沪杭铁路工人拆毁了览桥至临平间的第159号桥和临平至许村间的157号桥，拆毁了嘉兴到石湖荡一带的铁轨。闸口铁路机厂工人卸下机车零件，防止孙军败退时抢走火车。北伐军抵杭州六和塔时，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沈干城组织和指挥群众，对孙军残部设在玉皇山天龙寺的军用仓库进行了扰乱和破坏。2月16日，工人纠察队600余人奉总工会令发动起义，和500余名反正的孙军士兵协同动作，将溃退之孙军从火车站追到艮山门外。18日，铁路工人迎接北伐军从闸口入杭州。

北伐军在向嘉兴进军途中，受阻于张宗昌的铁甲车队。闸口铁路机厂工人在缺少图纸设备的条件下，奋战三昼夜，改装成功六辆装甲列车，投入作战。铁路工人还驾驶火车星夜运送部队和军火，修桥开路，支援北伐军进军上海。⑨

浙江之战，从根本上摧毁了东南5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嫡系军事力量。浙江各地工人都积极行动，配合作战。宁波工人到军阀部队驻地贴标语、散传单，吓得敌人连夜逃到上海，工人立即派代表到萧山，迎接北伐军。绍兴工人纠察队与北伐军同围弥陀寺溃兵，使绍兴免于洗劫。

北伐军军行所至，福建、安徽、江苏等省的工人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如游行、罢工等，积极支援北伐军。从1926年5月～1927年3月，北伐军一战而下长岳、再战而收复武汉，东南连克赣、闽、浙、苏、皖，北伐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多赖工人阶级的无私支援和全力保障。可以说，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大力配合，北伐军才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巨大胜利。

注释：

①《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见《中共工会历史文献》，第1册，第266页。

②《中共工会历史文献》，第1册，第267页。

③《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见《中共工会历史文献》，第1册，第267页。

④刘少奇：《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摘要）》，见《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第1卷，第182页。

⑤参见《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为吴佩孚援助叶开鑫大举攻湘告同胞书》，《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第184页。

⑥协夫：《湖南工农直接参加北伐战争之事实》，载《湖南工人运动史料选编》第2册，第218页。

⑦协夫：《湖南工农直接参加北伐战争之一些事实》，《战士》，第19期（1926年9月19日）。

⑧参见江西省总工会编：《江西工人运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5页。

⑨参见《浙江工人运动史》，第85～87页。



湖南工人运动的发展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为国民革命军所攻克的南方各省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并迅速走向高潮。其中，湖南工人运动是首先走向高潮的一个省份。

自1920年湖南工会组织就开始发展。但是，湖南工人运动在军阀赵恒惕的摧残下，几经波折。1922年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被惨杀，1925年6月17日，水口山铅矿罢工支援上海工人，又遭赵恒惕残酷镇压。工人群众百折不挠，工会组织仍在秘密活动。1926年，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到北伐军入湘前，工会组织仍有76个，会员6万人。北伐军入湘后，工会活动处于合法地位，工会有了革命武装作后盾，湖南工人运动更为迅速开展起来。1926年9月1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依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按照产业和职业的类别统一工会组织，加强了对工会的集中领导。“湖南全省总工会成立之后，打出统一工人组织的口号，实际上取得了全省工会的领袖资格。”[①]据不完全统计，“自北伐军占据湖南以来，湖南工会之组织，人数由六万人增至十四万人，由十二县增至四十县。就长沙市而言，由十八个工会增至七十二个，从两万余人增至八万余人，确算是有广大的发展了。”[②]省总工会派出60多位工运特派员，赴省内50多个县市指导工会的组建。在总工会的领导下，长沙、衡阳、常德等20个县成立了总工会。

1926年10月12日，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提出了工人的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17条。如工人有言论、集会、出版、罢工之自由；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取消假工会，铲除工贼；制定劳动保护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额；实行劳动保险，保护童工、女工；救济失业工人等。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会还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确定了三项原则：“1. 本党公开的领导工人运动，使工人自然立于本党指导之下来活动；2. 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取得领导

地位；3. 工人阶级应仍随时随地作经济斗争，以逐渐改善其生活状况。”[③]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湖南工人积极投入了政治和经济斗争。

湖南工人的政治斗争锋芒主要集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为此，湖南工、商、学界联合组成了“湖南工商学大联合”9月7日，长沙举行了“九七”国耻纪念反帝示威游行，发表了反帝宣言。万县惨案发生后，湖南工商学联合在长沙举行了有3万余人参加的反英大会，并向英领事馆送交了通牒。长沙、衡阳、宝庆、常德、湘潭、安庆等县开展了对英经济绝交和各种打击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英货经理处和行栈被封闭，英货被查封或焚毁，英人在湖南的经济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在经济斗争方面，株萍铁路、粤汉铁路工会促使路局发清了所欠工人的工资。锡矿山工会于10月6日召开3万人的加薪大会，迫使矿主承认工会提出的工人权力和改善待遇的12项条件。长沙邮务、人力车、靴鞋业、染业、织袜、石印等行业，平江纸业、烛业，宝庆水泥，醴陵瓷业等行业工人也进行了改善经济待遇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省总工会为保证工人阶级政治、经济斗争的开展，提出了统一全省工运的口号，强调建立严密的组织系统，以集中力量。为此，1926年10月，省总工会特拟定《湖南各地工会组织程序》11条，函请国民党省党部工人部批准颁布施行。同年11月，湖南省总工会秘书长蒯去病发表《近数月来湖南的工人运动》一文，指出：“湖南的工会组织，近来比较有了一个好的系统……工人自知应该密切地团结，打出统一工会组织的口号，使工贼、反动派以及土豪劣绅、流氓等皆不能趁机活动，而得一致的立于全省总工会旗帜之下。”[④]截止1926年11月15日，全省总工会下辖的各地及产业工会52处，其中工会533个，支部116个，会员32.6万余人。[⑤]全省工会组织空前发展。

为了检阅全省工运发展成就，总结经验教训，扩大并加强工会组织，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长沙开幕。与会工人代表175人，代表全省32万余工会会员。会上，蒯去病作了中国职工运动报告，郭亮报告了世界职工运动情况和湖南全省总工会的工作，各地方、各产业工会代表报告了所在地方或产业的工运情况。中共湖南区委致函大会，提出了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17条，大会通过了《工会组织大纲》、《统一工人运动决议案》、《关于工人武装自卫决议案》等18个决议案，并颁布了《纠察队组织大纲》。

关于组织建设，大会通过的《统一工人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全省



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一律统一于省总工会的指导下，各工会对于政治有所主张时，须提交全省总工会，取消假工会、统一工会组织，铲除工贼，开展经济斗争等。在统一工会组织方面，实施《工会组织大纲》，该大纲对各县、市职业及产业工会的组织办法，机构设置，隶属关系，以及工会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和支部干事会的职责，均作了明确的规定。

关于保障工人权益，大会通过了《对于“劳工保护法草案”之决议》、《青年工人运动决议案》、《关于劳动妇女之决议案》。规定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权，实行8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12岁以内的童工等。在保护青工方面，规定改良学徒、艺徒制度，青工与成年工人同工同酬，工作时间限于7小时等。在保护女工权益方面，规定男女工资平等，经期、孕期、生育期、哺乳期给予相应的劳动保护等。

《关于工人武装自卫决议案》指出，当前武装工人的纠察队组织是刻不容缓的事业。要求政府发给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枪弹等武器，一年内发枪1 000支，子弹10万发。纠察队实行军队编制，各级纠察队直辖于总队部，纠察队执行上级队部的命令，负责侦查工贼及一切反动派的活动，维护工会集会或参加群众运动的秩序，保护工会。

大会通过了《湖南全省总工会章程》，选举郭亮等21人为执行委员，金常等9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大会于12月26日闭幕，在27日召开的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上，郭亮被推选为委员长。

这次大会把湖南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湖南工会组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27年2月下旬，湖南全省总工会根据湖南区委的指示精神，颁布了《市乡工人组织法》，规定乡间手工工场集中的地方，凡同行业工人满50者应组织工会，有3个工会而会员不超过2 000者，设县总工会所辖之市（镇）办事处，会员过2 000者成立总工会[⑥]。至5月，全省75县中60余县成立县总工会或筹备处，拥有会员40万人。[⑦]

工人组织起来以后，集中开展了反帝运动。为声援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1月11日，湖南各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发表通电，指出“我民众，应即厉行对英经济绝交，以伸民气而维国权”[⑧]。湖南省民议会外交专门会也于2月11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撤退驻湘英领事，撤销英舰在内港航行及停泊权、航行权、贸易权等6项要求。1927年2月9日，英国军舰水兵在长沙登陆行凶，打伤工人纠察队多人。事后，湖南总工会联合各界人民举行10万人的反英示威大会，并组织了湖南人民对英罢工

委员会，号召海员和洋务工人罢工，同时扩大对英经济绝交。13 日，该罢工委员会为反对英兵来华，发出紧急通电：表明“坚持奋斗，誓达打倒英帝国主义的目的”⑨。28 日上午，长沙全城 10 万工人举行罢工，所有工厂、轮船、火车鸣放汽笛 1 小时。

湖南工人并联合各界人民为废除各帝国主义在湖南的种种特权而进行斗争。3 月 17 日，湖南邮务工人赶走了美籍湖南邮务管理局长，收回了邮政管理权。3 月 20 日，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支持湘雅医院工人罢工，并断然宣布收回湘雅医院。4 月 3 日，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联合各人民团体收回了帝国主义在湘进行文化侵略和窝藏反革命分子的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并将其改名为湖南人民俱乐部。4 月 6 日，长沙总工会收回了长沙海关。10 日，岳州总工会收回了岳州海关。18 日，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扩大为“湖南人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大联盟”，继续领导湖南人民深入开展反帝斗争。

在进行反帝斗争的同时，湖南工人还开展了镇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运动。当时，在湖南，赵恒惕军阀势力残余、贪官污吏以及受农民打击的地主豪绅与城市工贼流氓相勾结，结成反革命战线，对抗和破坏工人运动。如醴陵团防局局长率暴徒抢劫株萍铁路总工会枪支，并打伤工人；新化污吏与土豪，则非法组织假工会，并收买流氓数百人围攻省总工会特派员；桂阳土豪容巨勾结团防等捣毁工会，枪杀党员工人等等。为了保障工会利益，根据湖南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期间通过的《惩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决议案》，省总工会与省政府、省党部、省农协等单位，共同组织了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1927 年 1 月中旬，又颁布了惩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暂行条例。之后，各地总工会又参与了本地特别法庭的工作。到 1927 年 5 月初，全省已有 44 县建立了这类革命法庭。

中共湖南区委注意对工人的经济斗争加强引导和管理，规定工人的经济要求，不能超过商人、厂主目前的经济能力所能担负的范围，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以物价为标准，以免要求过高达不到反导致失业。工人的经济要求提出后，要进行充实而有力的宣传，以获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根据这个指示，湖南工人在 1927 年春进行的经济斗争，向雇主提出要求，改良最低生活条件。而是整理并发展生产，通过增进生产改善工人生活。全省向雇主提出改善经济条件的工人约 21 万，平均得到增加工资 20% ~50% 。株萍铁路工会支持路局整理收入，结果增加 50% 以上。锡矿山工会支持矿局收回矿



地，增加收入，反对洋商操纵锑业贸易。1927年3月，省总工会提出各地产业工会派员参加该项产业管理，要求政府采纳施行。

这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些斗争过火、打击面过宽的情况；也有不依法处决人犯的过"左"行为，这给了反革命钻空子的机会，影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湖南工人阶级还积极参与巩固革命阵线的反蒋斗争。1927年初，蒋介石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引起湖南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怒。3月14日，长沙举行了10万市民的反蒋大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大屠杀后，4月14日，长沙农工商学600余团体10万余人举行示威讨蒋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大会。不久，醴陵、湘潭等县也开展了镇反斗争。

湖南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与仇视。湖南各地时常发生工会干部被杀的事件。马日事变后，轰轰烈烈的湖南工农运动转入低潮。

注释：

①②③《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年12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第165页、第163～164页。

④霍然：（翦去病的笔名），载《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2册，第257页。

⑤郭亮：《湖南全省总工会报告》，见《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4期。

⑥参见《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第27～33页；长沙《大公报》（1927年2月24日）。

⑦参见《湖南工人运动史》，第232页。

⑧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1982年8月版，第55～56页。

⑨《湘潭民报》（1927年2月14日）。

湖北工人运动的发展

北伐时期，湖北工人运动也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二七”大屠杀后，工人运动曾一度低落。五卅惨案后，湖北工潮又起，1925 年 6 月 11 日，英帝国主义勾结军阀肖耀南，对租界码头工人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使工人群众遭受惨重损失。北伐军打进湖北后，工人运动重新高涨。

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后，工会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许多新的工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1926 年 9 月上旬，汉阳兵工厂、汉口英美烟厂、汉阳铁厂等工厂和洗衣、轮驳、织袜、水泥等行业的工会先后恢复。同时还新建了火柴厂、五金、邮务等工会。

9 月 14 日，武汉工人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各行业工人代表恳亲会，100 多个工会团体的 400 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将武汉工人代表会改组为武汉总工会，并通过了惩办工贼、各停工工厂定期开工等提案。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9 月 17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负责指导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等省的工运工作。由李立三、刘少奇分别担任主任和秘书长。9 月 20 日，全总汉口办事处召集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湖北全省总工会。同时，规定一种产业或职业只能成立一个会，统一各工会章程及组织法，反对工会分别帮口。

在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的指导下，武汉和湖北工人运动突飞猛进地发展。10 月 10 日，即北伐军攻克武昌的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向忠发担任委员长。加入省总工会的工会达 80 个以上，会员 10 万余人。湖北全省总工会的成立，促进了工会组织的进一步扩大。这期间，湖北工会发展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以武汉三镇为工作中心，逐步向省内各地发展。汉口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工商业都会，武汉三镇聚集着庞大的工人队伍，工会的建立由省总工会直接领导，发展速度特别快。第二，是在发展中整顿，以整顿促发展。武汉三镇以码头工人和店员居多，帮口作用大，自发性强。工会发展与工潮勃兴交互影响。此时，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力量还十分弱。鉴于此，



在酝酿成立省总工会时，即制定了整顿工会方案。省总工会成立后，分设汉口、武昌两个办事处，以加强对各工会的整顿和训练。通过成立产业总工会，将之前互不统属的工会改为产业总工会属下支部，初步改变了混杂局面。这样，北伐军未到之前，武汉仅有工会 13 个，至 1926 年 10 月中旬，恢复和新成立的工会有 34 个，到年底，武汉工会组织激增到 200 个以上，有组织的会员达 20 万人，湖北全省的工会组织发展到 300 个以上，工会会员达 30 万人之多。

随着工会组织的大发展，武汉地区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为改善生活待遇、改良工作条件和提高政治地位，开展了空前的连续罢工事件。11 月 13 日，武汉邮务职工为改善待遇实行总罢工。11 月 15 日以后，武汉电话职工、粤汉铁路武长段职工、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职工、染织业工人相继罢工。到 11 月 29 日，武汉各厂商的工人为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继续发展。租界外商厂栈工人也酝酿罢工。12 月 18 日，汉口市政工人、钱业店员相继罢工。这些罢工多属经济斗争，都在工会领导下进行，所提要求大都得到解决。如人力车工人减少了车组，码头工人废除了包工制，船员、店员增加了工资，印刷工人实行了 8 小时工作制等。

外资企业的罢工，经济性与政治性兼具。1926 年 11 月 3 日，汉口英美烟厂无理开除工人，工会提出要求 16 条。11 月 20 日，汉口洋务工人向资方提出 10 项条件，日商表示让步，同意分三等加薪。

对于武汉工潮，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 4 点指导意见：一、武汉商业正当衰颓时期，此时罢工工人未见得能多得利；二、工潮的过于扩大，易引起社会认为工人过激；三、应避免因工潮而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四、不过于遏抑工人要求，亦不可肆意煽动工人起来。[①]

武汉工人的连续罢工斗争震动了社会各界。1926 年 11 月 19 日，湖北省劳资仲裁临时委员会成立，通过规章 10 条。规定："凡劳资两界发生争议，调停无效者，须提出该争议事件于本会，请求仲裁"，"一经本会判定，双方均须遵守。" 12 月 1 日，仲裁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对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及学徒等都有讨论。12 月 21 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通过了《湖北临时工厂条例》，作为解决劳资纠纷的准则。《条例》规定厂主必须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权，进退工人须得工会同意，对劳资纠纷不能协商解决的，实行限期仲裁，仲裁有法定效力，厂主违反本规定得处以罚金。

武汉工人罢工，震动了武汉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的上层人物。如有的资本

家到党部告状、控诉；有的则干脆关厂歇业。也有的地方勾结反动当局屠杀工会人员。

应该指出的是，这时的工人运动也开始出现“左”的错误倾向。如：在武汉，有的工会游行集会和政治罢工过多，有些工人对改善生活要求过高过急，有的工会过多缩短工时，有些工人纠察队“还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②。以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敌友，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团结中间势力，为狡诈的敌人攻击工人运动提供了口实，也使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

为了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健全和巩固各级工会组织，提高工人的思想和政策水平，纠正“左”的偏差，1926 年 12 月，刘少奇撰写了《工会基本组织》、《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三篇重要文章，由湖北总工会宣传部印行，向会员进行教育。这三篇著作，着重论述了工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问题是工会的大问题以及工会必须有严密组织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文章阐明的原则和方法，具体明确，是巩固工会，指导工人运动，纠正“左”的偏差的正确方针。同时，也为即将召开的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1927 年 1 月 1 日，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幕。与会代表 588 人，他们按各行业工会，组成车工、纺织、铁路、海员、五金、店员等 15 个代表团，代表 341 个工会，代表工会会员 29.3 万余人。

大会在李立三、刘少奇等 21 人组成的主席团领导下进行，着重讨论了继承“二七”以来湖北工人的奋斗精神；接受过去的斗争经验；审查工人阶级的力量；巩固总工会的群众基础等问题。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湖北省总工会章程》、《组织问题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等 27 个文件和决议案，认真地总结了几个月来湖北工人运动所进行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今后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奋斗道路。其中强调要整顿和巩固工会纯洁队伍，排除反动分子投机分子；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和战斗力；纠正工人运动中曾经出现的“左”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提高政策水平；使工人群众真正了解工会和政治的关系，以及工人的地位和责任，尤其是工农联盟及农工商学联合战线的意义。大会最后选举新一届执行委员 35 人，候补执行委员 9 人。1 月 10 日下午，大会胜利闭幕。会后，执行委



员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委员长，李立三为外交主任，林育南为宣传主任，项英为组织主任，刘少奇为秘书长，朱菊和为纠察队长，许白昊为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长。

关于组织建设，《执行委员会会务报告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总工会要加强对各工会的指导，加强工会在群众中的基础，作好武汉地区工会的统一工作等。

关于工人武装，《对于纠察队决议案》提出今后的中心工作是从组织、纪律、训练上加以整顿，规定纠察队的组织、调遣、命令，完全统一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部之下。纠察队的职责是纠察工贼，防止反革命分子等。

关于保障工人权益，《经济斗争决议案》、《女工童工问题决议案》等规定工会应为工人争得最低工资 13 元，工作时间不超过 10 小时，改良待遇，禁止使用 12 岁以下童工等。

关于经济问题，《工会经济问题决议案》对会费标准、征收办法、会费支配、财务手续等均有明确规定。

这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湖北全省的工会建设、工人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宣传教育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工会建设方面，把建立产业总工会与发展地方总工会结合起来。据 1927 年 6 月 20 日统计，湖北全省有产业工会 11 个，职业工会 4 个，县总工会 49 个，占全省应建县工会的 71%，另有县以下市总工会 13 个，共内辖工会 229 个，分会 71 个，分部 67 个，支部 2 793 个，拥有会员 513 408 人。[③]

工会有了纪律，才能富有战斗力。1927 年 2 月 8 日，武汉店员工会根据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精神，发表了《整顿工会纪律宣言》，提出了严肃纪律的 6 条规定，对工资与工时、改良待遇、红利奖金、工资辞就等都作了规范。3 月 9 日，湖北全省总工会提出了纠正少数工人的越轨行为的 21 条规定，其主要内容有："工人与厂主店主之间如发生争执，非经两次之和平交涉，不可有罢工等行为"；"工人之行动应绝对服从工会，没有工会命令，工人绝对不许可自由行动"；"纠察队应绝对服从纠察总队规定之纪律，不得有任意打人抓人，绑人游街，及其他违反纪律之行动"[④]。

宣传和教育，是提高工人素质的必由之路。对工人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化装演讲。湖北省总工会在宣传部之下，还设立了工人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工人

教育的兴办与管理工作。3 月初，武汉各工会已开办工人学校 30 余所，学生 3 000 余人。⑤

为打击敌对势力，维护罢工秩序，工会成立了纠察队，队员达 3 000 余人。4 月 20 日，开办了总工会纠察队训练班，300 余人入学。武汉地区的纠察队编成 3 个大队和 1 个干部队。

工人在经济罢工中的政治性明显加强，如过去本无工人运动的蒲圻，在 1927 年 1 月中旬，提出了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并取得了胜利。通过斗争，工资增加了一倍，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也大大加强。蒲圻工人不仅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中，站在前列，而且在迁都之争和提高党权运动中起到了先锋和骨干作用。

1927 年 5 月，夏斗寅叛变后，武汉市面谣言四起，米店停业，银行纸票，无人愿要。5 月 19 日，湖北总工会发出紧急通告，提出稳定社会秩序的办法。22 日，汉口《民国日报》又公开向市民发表了湖北省总工会工作报告，以稳定社会秩序。另外，召集武汉粮食业总工会全体执行委员等 17 人会议，讨论粮食救济办法。

当时，武汉工人的失业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据汉口民国日报赴救济局统计，失业工人在 14 万以上，经失业工人救济局救济及工人热心充当前方输送队外，其不易谋生者尚有六七万。湖北省总工会极力设法解决失业问题，制定了救济与安插失业工人计划。

湖北全省总工会率领全省工人积极投入政治斗争，拥护国民党左派发起的“提高党权”运动，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反对新军阀制造“赣州惨案”，声援上海工人为推翻军阀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和武装起义。然而，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之后，轰轰烈烈的湖北工人运动，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转入低潮。

注释：

①《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 年），第 159 页。

②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 年 2 月 26 日，见《党史研究资料》第 5 期，1980 年 3 月 5 日。

③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6 月 20 日）。

④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9 日）。

⑤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4 日）。



江西工人运动的发展

北伐时期，江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总工会组织之一。江西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好发展。

“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时期，而安源工会“巍然独存”，是广东以外全国唯一公开存在的堡垒。1926 年 9 月上旬，北伐军收复萍乡、安源，之后，9 月 10 日，一度被封闭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即行恢复，并改组为萍矿总工会。在萍矿总工会的帮助下，萍乡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27 年 2 月，正式成立了县工会，会员达 5 000 人。

在赣西，1926 年 9 月间，先后成立铜鼓县总工会筹委会、清江县总工会；10 月，先后成立樟树市、万载县、宜春县总工会；12 月，成立丰城县总工会。大多数县总工会还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开办了工人夜校、职业学校、民众运动训练所，工人运动迅猛兴起。

在赣南，北伐军初入江西，同时担任着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赣南党务及 17 县工农运动指导员职务的陈赞贤就在南康县建立了总工会。之后，陈奉全国总工会令秘密回到赣州。赣州是江西第二大城市，是赣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伐军占领赣州后，陈与总政治部宣传员肖韶、钟友千发动各业工人组织工会，前后成立工会 29 个，有会员约 1 万人。11 月 3 日，召开了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赣州总工会，其基层会员组织有 56 个，会员达 18 000 人，陈赞贤任委员长，肖韶、钟友千任副委员长。到年底，已经组织起来的赣州工人已达 8 万多人，其成分以手工业工人居多[①]。同时，在整个赣南地区，信丰、于都、大余、龙南、南康等县，也先后建立木业、缝业、理发、店员等各工会，其余各县在筹备中。赣州总工会成立后，陈赞贤等深入基层工会，指导草拟劳资合同，从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了工资增长幅度、工作时间、职业保障、工人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江西全省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26 年 11 月

24日，南昌市总工会筹备处成立，季恨秋等5人为筹备委员。江西工人运动从此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12月16日，中共江西地委发表《对时局宣言》，号召江西人民“必须抓住机会尽量开展巩固各种民众的组织，如工会等，以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工具”②。至1926年底，仅南昌市区即先后成立了店员、瓷业、书画、电话、轮船、铅印等73个行业工会，工会会员达4万人。1927年元旦，南昌市总工会正式成立。

吉安、九江、景德镇、抚州等地的总工会筹备处，也在北伐战争的胜利声中相继建立起来。1926年秋，中共江西地委派曾延生任中共九江特支书记，筹建工会。北伐军攻克九江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周一光筹备九江市总工会。1926年12月26日，九江总工会正式成立，统一领导九江纱厂、码头、人力车夫、火柴工人、机器工人和其他手工业者开展政治经济斗争。吉安工会的会员除少数是电灯、电报等新式产业工人外，大都是缝纫、理发、染布、码头、米业。泥木等业劳动者，人数达3万余，组织比较好。

1927年1月1日～16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召开了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张朝燮代表省党部工人部作了全省工人运动的报告，要求各地工人部“力行帮助各县总工会及下层工人”加强各工会组织建设，开展政治训练和宣传教育，加强团结，“使各工友都能变成战斗员”③。

继各行业基层工会和各工矿产业工会普遍建立后，出现了联合工会形式的二级工会。与此同时，区、乡、镇各级工会也纷纷建立，在农村还建立了雇农工会。江西各地工人在组织起来的同时，迅速开展了为争取自身利益和提高自身地位斗争。

工会领导工人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废除包工制，实行8小时工作制，不得无故解雇工人，对病残伤亡工人要给予救济抚恤等要求。一些雇农工会还硬性规定，长工每年工资，不得少于16担谷，短工每日不得少于1 000文。为实现上述要求，各地工人在工会领导下普遍开展了经济罢工，罢工风潮此起彼伏。

1926年10月，吉安总工会为改善童工待遇举行游行示威，开展总罢工。11月，吉安染布工会罢工10天，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加薪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1926年底～1927年初，赣州总工会领导工人开展了以“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8小时工作制”为中心内容经济斗争。中共赣州特支选择钱业店员工会罢工为突破口，发动全市性的工人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此后，赣州总工会又领导了



中药业、洋货业工人大罢工，并率领全市各行业工人为签订劳资集体合同而斗争。1927年2月，吉安爆发了全城18家工会联合罢工，结果，工人工薪增加了一倍，遂川工人通过罢工争得了工人离职增发解雇金，工伤增发药费和工资待遇。

在争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工会还领导工人开展了废除封建虐待制度和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反对雇主歧视和虐待工人。吉安县总工会因商店学徒遭老板毒打一事发动工人罢工，迫使老板向工人赔礼道歉，并赔偿医药费。通过斗争，工人还获得了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慑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威力，工人开会、学习、参加其他活动，资本家、工头再也不敢阻拦，工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

1926年12月初，南昌市总工会筹备处联合南昌市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解放协会，商讨反英反奉对策，并组织演讲队，到群众中揭露英帝国主义支持奉军南下的行径。12月11日，包括南昌市各工会在内，各界团体决定成立南昌各团体反帝国主义大同盟。16日，全市工、农、商、学各界300个团体7万多人举行了空前的反英反奉集会，并通电全国，反对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声援苏、浙、皖三省民众驱逐孙传芳、阻止奉鲁军南下的自治运动。25日，南昌市铅印业工人举行总罢工，迫使资本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保障工人待遇、不得任意辞退工人和使用童工徒工、实行8小时工作制、维护工人政治权利等19条要求。至1926年底，九江市总工会也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并在斗争中组织了2 000多工人参加的纠察队。1927年3月18日，万安县的工人和农民、学生群众，依法逮捕了杀害革命者的神甫，并举行了4万余人的公审大会，处决了凶犯。于都县工人也在这里赶走了威吓和破坏工人运动的帝国主义神甫。临川县工人则在县工会领导下，将反动县长和反动的县党部委员驱逐出境。南昌市《民国日报》的印刷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民国日报》在反动派指使下，进行反苏、反共、反对农工的反革命宣传，终于取得胜利。

但是，各地工人在斗争中也出现了一些要求过高、斗争过火的情况。如，1926年12月8日，南昌洋货店员向店主提出店员三级加薪，甲级每月加现洋20元，乙级加15元，丙级加10元，店主难于承受。南昌罢工，"所有要求大抵强迫承认，甚有将业主捆绑游街者，一种嚣张混乱情形，令人可畏。"[④]赣州等地出现了将老板游街的现象。这种情形，因"久被压迫之工人，突被解放，自属难免"[⑤]，但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不

仅损害了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而且影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1927 年 2 月 23 日，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140 人，代表全省有组织的工人 30 万人。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出席大会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说。他希望工人阶级要明确自己的使命，准备做新中国新社会的创造者，而各工会要铲除封建思想，团结工人阶级，结成联合战线，并要同全世界无产阶级严密的联合起来。

大会听取了总政治部干部李合林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国民革命底军事胜利，不是国民革命全部成功，因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各种封建势力尚未铲除"，因此"我们要特别努力将民众唤醒起来，组织起来，巩固革命底基础"⑥。大会通过了《江西省总工会组织章程》、《改善工人待遇》、《工人纠察队》等 11 个决议案，大会发出了告工友及各界同胞书、大会宣言和通电，宣布正式成立江西省总工会，并选举产生了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曾延生、张国、陈赞贤等 9 人为执行委员，曾任委员长，陈赞贤任副委员长。

大会通过的《宣言》自豪地宣告，"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新兴的中国工人勇敢奋斗精神，使我们工人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⑦它号召"全江西的工友，都统一在全省总工会的指导之下，此更加严密组织，加紧训练"⑧，一方面为工人本身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与农、商、学、兵一致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完成国民革命，并进一步达到自身的完全解放。

大会宣言肯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指出："哪一次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的争斗，不是工人阶级当先锋，打头阵？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勇敢奋斗的精神，使我们工人，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驳斥了工人"太嚣张了"的论调，指出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也是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宣言要求打破轻视工人的成见，加强革命统一战线，说明"工人阶级改善生活的要求，并不会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只有增加革命的势力，正是革命的利益"⑨。

大会在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中表示，省总工会"誓率领江西三十万有组织的工人"，"打倒一切危害中华民族解放的万恶势力，求得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更进而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求得全世界被压迫人类的完



全解放”[10]。这些政治声明，表达了江西工人的决心和江西工运发展的方向。

大会还就江西工人运动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大会决定统一工会组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如，在经济斗争方面，以各县、镇为单位，规定最低工资、最长工时，改良工人、学徒、女工的待遇，并规定了工人纠察队的性质、任务、组织和指挥系统，要求政府制定《劳工保护法》，主张召开省民会议决定全省大政方针。这些规定，为江西工人的政治、经济斗争指明了方向。

江西省总工会成立后，为江西全省的工人运动和支持北伐战争作出了贡献。但总工会成立不久的3月6日，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就根据蒋介石“解散总工会，严惩委员长”的手令，在赣州枪杀了陈赞贤，制造了“赣州惨案”。6月5日，朱培德在江西“分共”，下令江西省总工会和省农会“停止活动”，并派军警武装查封了省总工会和省农协。7月8日，南昌百余工人代表举行会议，要求恢复江西省总工会。在8月1日的南昌起义中，总工会号召工人投军参战，参加起义。起义军撤离南昌后，江西省总工会再次被摧残。

注释：

①参见《全省工人运动报告书纲要》，《中国国民党江西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日刊》，1927年1月。

②转引自《江西工人运动史》，第97页。

③参见《全省工人运动报告书纲要》，《中国国民党江西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日刊》，1927年1月。

④《张雄飞致总务处函》，见《商务印书馆分馆工潮专卷（3）》第1页。

⑤参见天津《大公报》（1927年2月14日）。

⑥《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第7～8页。

⑦《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

⑧《孔原回忆》，1988年10月26日。

⑨《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宣言》，见《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工人运动》，第20～22页。

⑩《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第6页。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

北伐时期，英帝国主义是我国长江流域财富的最大劫掠者。它凭借船坚炮利，横行霸道，无视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多次制造屠杀中国人民、撞沉中国民船的严重事件。并千方百计地干涉中国革命，除继续在军火和财产上援助反动军阀镇压革命外，还多次直接对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挑衅。英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早在1925年5月17日，武汉学界就致电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主张。1926年12月26日，武汉市民30万人举行了反英大会，对英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和干涉中国革命的种种暴行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号召全国"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①。

北伐军攻克湘鄂赣以后，1927年1月1日~3日，武汉人民连续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大会。3日，宣传员在英租界附近演讲，英帝国主义即调集大批水兵登陆，架起机枪16挺，威吓宣传队和听讲群众，并用刺刀在人群中乱刺乱戳，当场杀害海员1人，重伤码头工人4人，轻伤30余人，几天后伤者又有数人相继殉难。②这就是英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汉口"一三"惨案。惨案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当晚即向英领事馆提出口头抗议，限其24小时内撤退水兵和义勇队，允许中国军警入驻英租界。

3日当晚，中共湖北省委、全总办事处和湖北省总工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领导各界人民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4日，正在进行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出《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六条要求："（一）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二）在英租界未收回之前，要求英租界当局应即撤销电网、沙包及各军事上之准备，并绝对不得在租界内干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演讲等自由；（三）要求立即撤退在华军舰，以后租界内永远不得有外国武装军警驻扎，由公安局派警驻扎租界；（四）要求赔偿死伤损失；（五）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



歉，并担保以后不得有此等事件发生；（六）要求凶手即移送我政府惩办。”《通电》还指出：“英帝国主义如此肆意横行，实属穷凶极恶！……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③

4日上午，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全总武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前往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政府立即与英交涉，通过外交途径收回英租界。

同日，武汉工农商学界200多个团体的代表500多人，在汉口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以省总工会的六条要求为基础，要求政府：“1. 立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2. 英政府须负责赔偿此次同胞之损失；3. 英政府须立即将肇祸凶手交中国政府依法惩办；4. 英政府须立即撤退驻武汉英舰及英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5. 英政府须向中国政府道歉；6. 英租界内华人须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的绝对自由；7. 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8. 英租界须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④。并决定如72小时内英领事无圆满答复，即行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英国的内河航行权和领事裁判权。会议还决定，由省总工会等10个团体的代表，组成武汉对英委员会，对英实行经济绝交，严禁买卖英货；定于5日举行全市人民反英示威大会。4日下午7时，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新市场召集人民群众代表会，宣布政府接受武汉工商学各界提出的八项条件，以此作为政府对英交涉条件。由于武汉军民的强大威力，英国领事被迫于当天下午将水兵、义勇队撤退；午后，又将巡捕撤退。

1月5日，斗争进入高潮，武汉工人阶级带领全市人民，发动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罢工、罢市、罢课运动。下午，在李立三的指挥下，武汉30多万市民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群众在滂沱大雨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群众不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武汉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江汉关，冲进英租界，赶走了英国巡捕，扯下了英国国旗，在巡捕房屋顶上升起了中国国旗，英租界回到中国人民手中。接着，武汉国民政府在英巡捕房设立了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的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接管了汉口英租界。

6日晚，外交部长陈友仁拜访英领事，指出：“我国民众运动，是反对英水兵暴行屠杀我革命民众，对英国侨民绝无仇视之意，不必自相惊扰。总

工会前虽有对英总罢工之警告，但总工会现在一切行动，确已具有模范之资格，不至任便实行总罢工。现在英租界既由国民政府接管，关于惨案交涉，政府已根据人民之请求，正在进行。在本案未得圆满解决以前，英侨之生命财产，由国民政府完全负保护安全之责”⑤。

在汉口人民胜利收回英租界的鼓励下，九江人民也进行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1月6日，九江也发生了英国水兵枪杀中国工人和英舰开炮挑衅事件，是时，一外侨要求搬运工人为其挑送行李上船，工人纠察队队员伍宜山上前阻止，被英国水兵枪击，当场昏倒在地，经抢救无效而死，另有几名工人被打致重伤。更有甚者，英舰发炮两响，威吓群众。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愤慨，他们在市总工会主席彭江的指挥下，不顾英舰的炮火轰击，手持扁担棍棒，动手撤去沙包、木桩、铁丝网，撬开了大铁门，潮水般地涌进了英租界，在江海关和工务司门前遍贴“打倒帝国主义”，“驱逐英兵登陆”，“反对英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为被难同志伍宜山报仇”等标语。当时，北伐驻军坚决支持九江工人的要求，派员去同领事交涉撤去水兵、巡捕，由中国军队进驻租界维持秩序。当晚，英国领事被迫同意中国工人的要求，并撤走英侨。7日上午11时，英领事派人请贺耀祖派兵入界，遂由独立第二师第三团人驻英租界，维持一切。下午4时半，贺耀祖派其三团团长接管英租界，担任警卫职务。同日下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赶到九江。8日，邓演达召集独立二师长官、九江关监督、各群众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善后事宜，决议由九江交涉员周雍能及外交部特派员赵畸及各团体组织对英行动委员会专司对英一切问题。10日，正式成立了以赵畸、周雍能等为委员的“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管理英租界事宜。

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向全国人民陈述收回英租界的原委，揭露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强调指出：“这次九江惨案实与汉口惨案有连带关系，也可以说是九江英帝国主义者对汉口英帝国主义者的一种声援和响应，其故设圈套，有意挑衅，于此可见”。宣言还提出了解决此案的根本方法：“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兵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收回租界。”⑥

11日，管理委员会赵畸、周雍能致函英领宣称：“本月十日在租界旧巡捕房，将委员会组织成立。召集原有巡捕，照常办理租界内应办各事，并商



同就地军警，保护界内中外人民安全。现秩序如常，所有原住外侨，大可返其故居"⑦。

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中国共产党对此次汉口英兵惨杀华人事件的态度》的指示，明确提出"收回英租界"等口号，并指出对英斗争的四点注意事项："所提条件应低而能坚持为原则"；"外交上应引导群众与政府一致（因为现时的政府实质是能为我们影响的）"；"绝对制止对外国个人的暴行……"；"政府派往租界的军队必须选择纪律最严的军队"等等。⑧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1月7日，武汉市民20多万人，在汉口阅马场举行反英大示威。董必武在会上强调，现在虽然英租界收回，我政府派军警管理，而束缚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尚多，英帝国主义者，仇视我民族益甚。我们要集中力量与它斗争到底。⑨1月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汉口事件发表宣言，指出汉口事件"是革命势力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崩溃当中，必然产生的现象。我们只有加紧整顿我们的军容，预备把帝国主义的寿命登诸鬼录"；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打倒这个一息仅存的英帝国主义，洗雪我们百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我们对于此案要向英帝国主义提出严重的抗议，赔偿死伤，交出这次屠杀我们同胞的凶手由我们政府惩办，要收回我们的租界，还要打倒英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霸权"⑩。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各地群众纷纷举行反英大会。1月14日，南昌召开了10万人的大会，决议："（甲）通电全国，维护武汉民众对汉案的八条，主张作最低限度的要求，并请国民政府与民众一致坚持斗争，（乙）通电全国，主张根本废除中英间的不平等条约，收回英租界，撤销英人来华领事裁判权，撤退英人驻华军警，使以后不致有此种惨案发生，（丙）通电全国，抵制英货，厉行对英经济绝交，（丁）通电全国，一致反对英公使最近提案以二五加税帮助张作霖、孙传芳。"⑪16日，长沙也召开了20万人的大会；上海工人虽然处在孙传芳的残酷统治下，也联合学、商各界，广泛地进行了反英宣传。28日，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致电英国工党、工联会，指出保守党政府在中国的屠杀行径，"不独将使中国民众受巨大牺牲"，而且使英国工人阶级"将蒙更大之剥削与负担"，呼吁他们"速起反对"⑫。全国各地工、农、商、学、军、青、妇各界，都纷纷声援汉口、九江工人的反帝斗争。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西安国民军司令部、中央军校学生、国民革命军第

七军政治部、独立二师政治部等也发表反英的宣言或通电，表示要“一致努力，共倒此凶”[13]。南北美洲及欧洲南洋等地的国民党党部“闻英人在汉口九江枪杀同胞，异常愤激，纷纷致电中央海外部讯问详情，并请指示办法”[14]。留日工商学界还于1月23日，在东京神田召开了反英运动宣传大会。

国际无产阶级也作了积极声援。1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呼吁书，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保卫和支援中国革命”！“要动员一切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制止派遣军队去反对中国人民！要尽力争取承认革命政府和从中国撤军！要建立一切工人组织的统一战线，以制止这次重大危机！”[15]国际运输工人委员会通电全世界海员，提议“一致拒绝运输军队、军械至中国，并特别责成英国海员坚决反对出兵”[16]。英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抨击其政府的炮舰政策，号召“全英劳工团体，与英国中国解放理事会，彼此联合一致，组织‘勿侵略中国’委员会，要求撤回军队战舰，及承认国民政府”[17]。

这样，在国内外各界压力下，英帝国主义不得不坐到谈判桌边来。2月19日，英驻华公使代表、参赞阿马利与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长陈友仁在汉口外交部会议室正式签订了《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次日，签订了《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根据协议，1927年3月15日起，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管理权从法律上由中国收回。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是自《南京条约》等屈辱条约签订后，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空前壮举。在这次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充当了先锋和主力军，显示了伟大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

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③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

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6页。

⑤《国闻周报》，第4卷，第3期。

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⑦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⑧《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8日)。

⑩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

⑪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⑫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7日)。

⑬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8日)。

⑭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7日)。

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干涉危机的呼吁书》，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⑯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0日)。

⑰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4日)。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从1926年10月～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由于江西前线吃紧，统治上海的孙传芳，把大部军队调到江西，驻上海只有步兵1 000人，警察2 000人。浙江省长夏超在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钮永建策动下，于16日宣布独立，倒戈反孙，而钮永建奉蒋介石之命，在上海也结合了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帮会成员，准备武装暴动，企图在国民革命军未到上海时占领上海。在这种形势下，中共认为这是有利于革命起义的大好时机，遂决定在上海举行暴动。

17日，夏超率部进军嘉兴。为了配合夏部的进攻，上海的中共领导机关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由罗亦农、赵世炎担任总指挥。计划把上海的海员、五金工人、市政工人、纺织工人动员起来，然后进行起义。不料，夏部被孙军打败，孙军占领杭州。钮永建本与夏超商定，于10月24日5时暴动起义，但当夏部失败时，他竟说夏军胜利了。当罗亦农、赵世炎等于23日深夜，得知夏部失败的消息时，由于时间紧迫，除离区委较近的闸北得到通知，停止行动外，其余如浦东、南市地区则已经行动起来，与警察发生冲突。当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于24日停止了。在这次起义中，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10余人被杀，百余人被捕。

第一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工人阶级本身独立的战斗力很弱，起义时又缺乏统一的行动计划；没有组织总同盟罢工，来发动广大的工人和其他革命阶级的广大群众；当时，孙传芳还没有到最后崩溃的时候；国民革命军还没有打到上海附近；

第一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形势继续向前发展。11月14日，孙传芳在江西九江战败，逃往南京，他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这时，正值孙传芳准备从上海撤退、张宗昌的直鲁军前来接防之际，上海形势异常混乱。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准备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

上海总工会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决定，在总结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经验



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争取各方面革命力量的支持，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倒孙运动”。

中共上海区委也举行了两次会议，检讨了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讨论了第二次起义问题。决定恢复工会，发动全市工人实行同盟总罢工，待北伐军进入淞江一带就转入武装起义。

1927年2月，北伐军向浙江进兵，17日占领杭州，18日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为配合北伐军的进攻，18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知，决定上海全体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

19日，总同盟罢工开始，参加罢工人数约15万人，至第4天，增至36万余人。罢工的范围，遍及上海各个区域和各个行业，各大工厂的工人、市政工人、海员，一直到大公司、各商店店员以及手工业工人。这充分表现了上海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进步与组织发展的迅速。

这时，处于死亡前夕的反动统治者，更加疯狂起来了。敌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在得到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鼓励和支持后，立即联合租界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开始施行白色恐怖。李宝章并发出“格杀勿论”的命令，组织大刀队，追捕群众。罢工前两日，死伤和被捕者总计达百人以上。赵世炎指出：“白色恐怖的屠杀，只有激起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恐怖答复恐怖，这便是革命的状态”。“武装在军阀手里便是白色恐怖；夺取武装到群众自己手里来时，即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爆发”[①]。“上海工人自己没有武装，有之，唯有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②]。

从21日晚开始，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同敌人展开局部战斗。22日上海区委决定，把总同盟转入武装起义，并和钮永建联系，制定了起义计划。下午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动员工人于6时暴动。届时，停泊在黄浦江高昌庙码头附近的驱逐舰建威、建康号向敌人的兵工厂发炮轰击，军栈火起，全市震动。于是，各纠察队随即开始袭击军警，夺取武装。闸北和南市有些地方的工人纠察队并与军警发生巷战。起义达到高潮。正在这时，蒋介石却命令已到嘉兴的白崇禧部停止进入上海，钮永建方面也按兵不动，致使工人纠察队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海军方面也因外无接应，内有帝国主义军舰监视，而未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这样，第二次起义又被迫中止。在这次起义中，工人学生40余人牺牲，300余人被捕。为避免更大的牺牲，24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复工令，“鉴于奋斗之时方长，不宜孤立作战，致损失过重”；命令全体工友，一律复工，“养精蓄锐，准备更大的奋斗。”[③]

第二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白崇禧、钮永建等的消极抵抗之外，主要因为：第一，工人武装力量弱小，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充分。第二，动员中间阶层和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做得不够。除工人外，其他市民只是消极地参加。至于上海的资产阶级则对工人阶级的起义一贯恐惧、对抗。总罢工开始前，总工会曾要求总商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举行罢市响应，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加以拒绝。资产阶级只是对上海“自治”——参加政权、窃取胜利果实表现了相当的热心。

第二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工人阶级从实际经验中懂得了：夺取武装是总同盟罢工行动的继续和发展，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工人阶级掌握了武装起义的艺术，就为下一次更大的斗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上海工人阶级虽然在两次起义中受到残酷的迫害和白色恐怖的威胁，但他们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凶狠所吓倒，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他们英勇顽强，团结一心，以更大的毅力和勇气，准备着更大规模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在决定停止武装暴动的同时，还确定了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的方针。为加强领导，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 8 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下设特别军事委员会和特别宣传委员会。特别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顾顺章、赵世炎、钟尔梅、颜昌颐 5 人组成，特别宣传委员会由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徐伟 5 人组成。

特别委员会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它成立后立即担负起准备武装起义的重任，在 1 月中先后开会 31 次。有时甚至一天二三次。为了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特别委员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整顿和加强了起义的战斗队伍，在先进工人中，组织了 5 000 名武装纠察队，并对工人纠察队进行了秘密的军事训练；其次，对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3 月 12 日，召开了市民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执行上海市民的意志，接收上海政权，建设民选市政府，并颁布了上海市的施政纲领。总工会的汪寿华等 3 人被选为市政府委员。再次，对敌人的军警部署进行了详细侦察，制定了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详细的武装起义计划：将起义时的作战区域划分为：闸北、沪西、沪东、南市、



虹口、浦东、吴淞等7个区；组织了起义的各级指挥部并选拔了领导人员，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都被指派为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员。起义前10天，党又发动了铁路工人的大罢工，破坏了敌人增援上海的计划。这样，党对这次起义作了充分的准备，发动了群众，确定了党的领导权。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革命力量相结合，就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力量。

3月20日，北伐东路军白崇禧部占领了上海近郊新龙华，并继续向浦南前进，上海守敌惊惶失措，市内一片混乱，人民斗争情绪沸腾到极点。这时，中共中央、中共江浙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经过分析，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决定实行总同盟罢工，并迅速转入武装起义。

3月21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了。晨7时许，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了起义令。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党的指令的主要内容是：第一，3月21日正午12时在各业各厂内宣布第二次总罢工，开始第三次武装起义；第二，应在罢工后1小时内将工人纠察队与罢工群众由租界调集闸北，在预定地点集合；第三，集合后立即按照计划向敌人的警署、兵营开始行动；第四，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区的市民代表会议。

指令下达后，各区立即行动起来，21日正午12时，全市80万工人总罢工。他们纷纷走向街头，向预定地点集合，旋即转入武装起义。工人武装纠察队为先锋，广大群众为后援，按照预定计划攻打各警署、兵营和军队驻地。起义领导者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一时在指挥所听取报告，一时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上海工人阶级在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援下，很快便攻下了电话局和电报局，切断了敌人的电源和水源，攻占了敌人警署和兵营。到21日傍晚，起义队伍迅速打垮了盘踞在上海的直奉联军。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等6个区相继解放，只有闸北敌人仍在顽抗。

闸北区是直鲁军重点防区，设有军事据点20余处，并配有机枪、重炮、和装甲车。周恩来、赵世炎坐镇该区，指挥战斗。21日下午，一股反动军队500多人从吴淞区乘火车往闸北增援，周恩来当即调集了几百名纠察队员到天通庵车站附近抢卸铁轨，致使增援之敌兵车一部出轨倒翻，敌人一部被打死，300多人被活捉。22日正午，当消灭了天通庵车站敌人后，纠察队集中力量攻击龟缩在商务印书馆内的敌人。下午4时许，馆内敌人一部分投降，一部分被活捉。这时敌人据点只有北火车站了。下午5时，总指挥部调集各路工人纠察队一齐向北火车站发起攻击。直鲁军困兽犹斗，发炮向市镇

狂轰滥炸，焚烧民房一片，以阻止起义者前进。愤怒的群众前赴后继，拼死前进。6 时，敌兵土崩瓦解，起义队伍占领北站。至此，经过近 30 小时的血战，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在这次起义中，起义军歼敌 3 000 余名，武装警察 2 000 余名，缴获枪支 5 000 余支。在战斗中，工人英勇牺牲的有 200 余人，负伤的有 1 000 余人。

必须指出的是：当这次起义开始后，上海总工会曾派汪寿华到龙华请求白崇禧立即进兵上海，支援起义。但是白崇禧奉蒋介石密令，按兵不动，拒绝工人的要求，以便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伤后，从中渔利。当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获得胜利后，白崇禧就立即率部耀武扬威地开进上海来，准备对工人阶级开始屠杀，夺取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

第三次起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第一，中共特别委员会把工人阶级作为武装起义和建立政权的主体，并充分调动了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和积极性。第二，中共特别区委加强了对起义的组织领导，组建了一支战斗力强的武装纠察队。第三，起义中工农商学兵组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敌人发起了猛烈地攻击。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之后，22 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了市民代表大会，与会者 4 000 余人，议决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选举白崇禧、钮永建、汪寿华、罗亦农等 19 人为市政府委员，建立了上海市革命政权。23 日 10 时，市政府开始办公。24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上海特别市政府委员会为上海市民最高权力机关。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强战斗性和伟大的组织力量，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武装起义的艺术。它再一次证明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是有能力领导人民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它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范例之一。

注释：

①施英：《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460 页。

②同上。

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版，第 464 页。



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对农民运动的方针

北伐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在促进农民运动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就明确指出农民是天然的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世界革命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同盟者，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

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指出，"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因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当前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是为了"使农民革命化"，把"农民组织起来"。决议还指出：在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中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①]同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根据上述精神发表了《告农民书》，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东缴纳租课"。而实现这一政策的前提是：打倒军阀政府，使革命的平民得到政权。同时，"为农民目前自救起见"，提出了几项最低限度的要求，包括："政府需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

农民的劣绅包办的农会"；"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通选举法直接选举之，不得由绅士包办"；"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等等。文告还号召农民群众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奋斗，来解除自己所遭受的压迫和痛苦。②

1926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着重研究了即将开始的北伐与农民运动的关系以及党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方针。指出，北伐与农民运动"这两点非常重要"。不举行向外发展的北伐，"广州政府将陷于孤立"；"不努力取得农民，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则工人亦将陷于孤立"③。会议根据北伐前的国内形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中，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为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④。会议强调，"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放农民问题作主干"。"我们说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⑤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非常重视中国的农民运动。1926 年 2 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向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以布勃诺夫（季山嘉）为团长的高级使团所作的报告中也曾经指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扫除帝国主义"。农民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北伐军应当在行军途中解决这个问题，至少要开始动手解决这个问题"⑥。1926 年 10 月 1 日，鲍罗廷在广州作农民土地问题的讲演时进一步指出：农民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国民革命是要首先解决土地的问题，若不解决土地问题，是不能够成功的"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在 1926 年 3 月 2 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命运攸关的基本问题"。"农民为反对不同帝国主义者的政权和反对旧官僚残余势力而掀起的有组织的起义和遍布各地的游击战争将是推翻中国军事封建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加强工业无产阶级和亿万农民的革命同盟，乃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基本条件。"⑧这次扩大全会还在 3 月 13 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决议》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农民问



题首先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千千万万农民没有土地，一贫如洗”，地主富户的“租赁条件又十分苛刻”，“弄得民不聊生”。“只有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革命民主政权，才能彻底改善农民的物质状况和政治地位”。因此，“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想方设法帮助扩大和深化广州政府所实行的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应当在各地组织地方的民主机构，实行土地改革”等等。[9]决议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共产党人提出的斗争口号必须能把农民所理解的切身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同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一般政治任务结合起来。

1926 年 11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即指出：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渡阶段中，“土地问题尖锐起来，这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也“是胜利结束反帝斗争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前提”。谁对于这个问题持坚决态度并给予彻底回答，谁就“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分别制定土地革命的策略。如减少地租，没收地主、土豪等的土地，建立农民武装等。决议认为，担心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会削弱反帝统一战线，这是没有根据的。惧怕资产阶级中某一部分势力会不坚决、不真诚地合作，而拒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里把土地革命问题提到显著地位，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策略。

有必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七次扩大全会在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指示中，虽提出了上述正确的主张，但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不仅未提出明确具体的土地革命纲领和无产阶级直接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且由于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估价过高，因而把解决农民土地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希望广州国民政府自上而下没收地主土地，减免农民的捐税，实行土地改革。广州国民政府执掌军政大权的要员，“大部分出身于中、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对土地改革怀有反感”[10]。因此，依靠广州国民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不可能实现的。

另外，由于陈独秀右倾情绪的滋长，中共在农民运动的方针上不免出现某些错误。1926 年 7 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这个决议一致肯定了农民在民主国民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提出了共产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进行，就必须“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规定了保障农民最低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与此同时，决议也受到陈独秀右倾思想的明显影

响，借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而对农民运动提出了种种不适当的限制；“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农会居调停地位”；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能用“自卫军名目”，“以免引起误会”；规定对“乡村中迷信及宗教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反对”，为了更容易接近农民，“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形式之必要”[11]；等等。这显然是害怕农民运动，而企图将之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以免除右派对农民运动的“嫉视”。

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拟定了农民运动政纲9条：“（一）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并要由革命的农民建立平民的政权。（二）革命的农民参加县政府组织。（三）武装农民，乡村中一切武装势力受乡村的革命民众政权所指挥。（四）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收归农民。（五）保证佃户在其所耕种地上有无限期租佃的权利，并由农会会同革命政权的代表规定佃课额。（六）禁止一切欺（负）压迫的契约，包农转租契约亦包含在内。（七）取消以前关于租佃的欺压的契约和欠账，禁止重利盘剥。（八）规定整个一定的农业税，取消苛捐杂税，废除陋规。（九）国家经过农村革命政权之手以帮助农民和农村经济。”[12]这一政纲，在农民政权、农民武装以及土地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为了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探索和思考，为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5年12月30日，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是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重要力量。他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由于农村中的贫农、佃农、雇工和自耕农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生活十分贫困痛苦，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有很大的革命积极性，并且已经觉醒起来；由于“农民约占总人口70%以上，在全国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因此，我们“在估量革命动力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因此，“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同时还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应该实行“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以彻底解决这个



“历史上久待解决的农民问题”，使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得以完成。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他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方针：首先，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农民利益，因此，这是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其次，要建立武装农民，因为随着军阀土匪对农村的扰乱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一般农民感到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这种自卫也是反帝反封建的必然要求，同时，必须严格防止军阀、土豪、土匪加以利用；最后，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随着全国农民破产潮流的发展，“‘耕地农有’便成了广大的贫农急切要求的口号”，因此，革命当局应当“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他号召革命者结合起来，到农村中去进行工作，以帮助广大农民“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13]。

1926年9月，瞿秋白也在题为《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中指出：“国民政府能够得到农民，则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真实拥护工农的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14]同时，他还提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领导的4条办法：“（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明定‘耕地农有’的标语。（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四）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行动，剥夺其政权。”[15]

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6]

与此同时，中共共产党人如刘少奇、李维汉、谢觉哉、易礼容等也积极发文探讨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这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62～463页。

②同上书，第512～513页，第515页。

③《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1926 年 3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83 页。

④《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1926 年 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57 页。

⑤《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1926 年 3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81 ~ 82 页。

⑥P. A. 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依尔·鲍罗廷——支配广东的人》，《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2 页。

⑦《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109、110 页。

⑧王进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政纲》（1926 年 3 月 2 日），《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7 年第 6 期，第 24 页。

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第 139、136 页。

⑩《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电报》，1927 年 6 月 15 日。

⑪《农民运动议决案》（1926 年 7 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 142 ~ 149 页。

⑫《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436 ~ 437 页。

⑬《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34、833、831、877 页。

⑭瞿秋白：《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07 ~ 308 页。

⑮瞿秋白：《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07 ~ 308 页。

⑯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 9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4 册，第 145 页。



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议急速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农字第一号通告》，要求各地“急速成立农委”，“努力农运工作”，“尤其在河南与湖南，此项工作更是中心”。同年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①]他号召革命同志下定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10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1月中旬，毛泽东由广东到上海，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集中力量领导农民运动。15日，农运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计划》指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关于组织，指出：“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为了便于集中指导湘、鄂、赣、豫等省的农民运动，还应在汉口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办事处，“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②]。

北伐期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无论是在会员人数、协会组织，还是在运动发展之深入上，均居全国首位。在革命高潮时期，它成为左右时局发展的关键。1926年7月，北伐军大举进入湖南，扫除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反革命势力，组织农民协会的活动，立即从秘密转人公开，各地农协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从10月开始，湖南农民运动由与北伐军合作进攻军阀的时期，进入进攻农村封建阶级的时期。

1926年10月上旬，中共湖南区委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北伐军占领湖南以后的新形势，制定了农民运动政纲，提出了关于农民的最低

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政治方面：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剥夺乡村反动政权机构和地主武装团防局、警察的司法行政职权；农民有集会、结社、出版、抗租之自由权；有武装自卫权；制订农民保护法；乡村自治权交乡民会议；县政府由人民选举；地方财政公开等等。经济方面：减轻租税，佃农所获不少于50%；禁止重利盘剥，借贷年息不得超过2分；不得预征钱粮；限制粮食出境；废除苛捐杂税、扫除厘金积弊；清丈土地、清丈湖田、统一度量衡；没收逆产账目；整顿农田水利，举办农村合作救济事业等。在教育上，要求普及义务教育，由县政府拨款办理农民补习学校。这些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至11月，全省75县中成立县农会57个，区农会462个，乡农会6 967个，农会会员由北伐前的20万猛增到100多万。

为了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击退反对农民运动的逆流、扩大和巩固农民的组织、确定今后与一切反革命势力斗争的方针，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农代会和工代会同时在长沙揭幕。参加大会的有52个县、两个特别区的农民协会代表170人，代表有统计的会员有130多万人。大会共开了26天。大会主席郭亮致开幕词，指出："此次代表大会是表现我们工农阶级的力量与组织"，"是谋我们工人农人以后势力要集中，步骤要统一，这是我们此次大会主要意义。"③

毛泽东应邀回湘出席大会。他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李维汉、谢觉哉等分别就中国共产党与农工阶级，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国民革命与工农运动作了发言。28日，毛泽东又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话。指出，反革命方面已经有了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它。毛泽东特别严厉斥责了"惰农运动"之类的诬蔑，和所谓"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理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他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作斗争，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他还提醒大家注意，现时湖南虽说是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这就使代表们更加认识到湖南革命斗争的艰巨性。



大会期间，各位来宾和代表也发表了重要演说：李维汉作了《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农工阶级》的报告；谢觉哉作了《关于国民革命与工农阶级的关系》的报告；易礼容作了《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以及各县代表所作的关于各县农民运动的报告等。

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经过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制订了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和农民自卫军武装等40个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宣言和决议指出：土豪劣绅是封建军阀政治的基础，“现在的农民运动，就是民主革命势力向这种封建势力攻击之一种运动”。目前“发生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这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过程，若不经过目前的斗争，则决不能破坏旧的封建秩序，而达到民主秩序之目的”，“农村经济亦将长期陷于封建经济状态，而不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④]。大会号召全省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为击退反革命逆流、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统治，实现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所以，必须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由，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必须完成支持农民用革命手段作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大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易礼容当选为委员长。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大会召开的本身就是农民运动高涨的标志。1927年1月，农会会员激增到200万，受农会直接领导的群众约1 000万以上，几乎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到1927年4月为止，湖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518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一半。到5月中旬，湖南省农会会员进一步发展到600万人。随后，长沙各界为庆祝大会的开幕一律停工、停市、停公、停课，并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提灯会。大会以后，湖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思想三条战线上，对封建地主阶级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掀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第一，从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农民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农民组织清算委员会和地主算账，公布罪状，处以罚款；对敢于破坏农会的地主，用小质问或大示威的方式和他们进行群众性的说理斗争；用戴高帽子游乡的方法使地主颜面扫地；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农民就自己动手或者送交政府依法审判，处以死刑，以一儆百。通过这种斗争，从政

治上和社会地位上彻底否定地主阶级的权力，从而树立起农民的权威。农会势盛的地方都建立了人民的革命秩序，原来的所谓都团总躲起来不敢出面，农会实际上成了乡村的政权机关，有些地方，农民经过斗争打倒土豪劣绅后，民主改选了乡村的政权。在农协权力很大县份里，凡事取决于县长和以农会为主体的群众团体代表共同举行的联席会议，县长只有唯农会之命是听，不敢说半个“不”字。农民协会成了农民革命专政的形式，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第二，经济上打击地主，改善农民生活。湖南农村普遍地开展了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平粜阻禁、反对加押退佃等斗争，并不许地主以退耕来威胁农民。根据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规定：租额一般减轻了5%~30%。衡阳县农民将田租由原来的5成以上减为5成以下。在斗争中，衡阳农民加入农协者，约7万人。醴陵、永兴等县实行三七减租，东三佃七。浏阳还实行了二五减租。在安化、岳阳、湘阴等地，发动了减息运动，安化由月息七八分减为四五分。攸县等地农会清算了地主对农民的高利盘剥，根据情况废除了一些陈年旧账。此外，各地农会根据不法地主囤积米粮，勾结奸商，偷运外地，高价出售，牟取暴利，造成农村粮荒的行为，建立了平粜局或平粜委员会，勒令地主、富农按一般价格将粮食卖给农民，严禁谷米出境，高抬谷价，牟取暴利。

第三，建立农民自卫武装。湖南地主武装力量雄厚，县、区、乡都有团防局武装，平均大县有枪700余支，小县有枪300余支，全省75县共有步枪4.5万多支。这些是地主阶级政权的支柱，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行凶作恶的工具。为了铲除这些反动武装，湖南各县普遍建立了农民梭镖队或农民自卫军。长沙县19个区都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各乡组织了纠察队，每户农民都有一柄梭镖。湘阴县有农民梭镖队10万余人。宁乡县有农民纠察队员8万多人，枪支500多支。衡山县到1926年底有农民纠察队5 000余人，枪300余支，到1927年春，猛增到2万余人，500多支枪。浏阳县农民武装趁开大会之机，一次就夺取了警备队枪支700余杆，成立了浏阳工农义勇大队。地主的团防局、保卫团、民团等不是向农民投降，就是站在中立地位倾向农会。一小部分继续顽抗的，农民便给以打击。根据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实现真正人民之自卫组织起见，所有团防局或保卫团应一律取消，另外成立挨户团”[5]，湖南农民把反动武装改造为革命武装——挨户团，置于农民政权的领导之下。农民武装成了巩固农村革命政权、维持社会治安



的强有力工具。地主武装的瓦解和农民武装的建立。使农村的革命秩序得以建立起来。

第四，猛烈攻击压制农民的宗法思想和宗法制度。湘潭、湘乡、衡山等地的土豪劣绅，利用开堂祭祖，搬出宗法族规，玩弄族权神权，压迫妇女，对抗农民运动。醴陵、株洲一带的地主，修祠建庙，尊神信鬼，愚弄群众。农民手持梭镖、木棒，结队成群涌进祠堂，打破族长的族权。砸烂泥塑木雕神像，打破神权。妇女们放足、剪发、争取婚姻自由，和男人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打破夫权。农民打破旧农村之后，随即着手建设新农村。他们修筑铁路，兴修农田水利，建立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严禁赌博、吸鸦片等。另外，他们还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大办教育，普及文化，移风易俗。革命文化取代了封建文化，农村面貌开始焕然一新。

湖南发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猛烈地冲击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 9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4 册，第 145 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 461、462 页。

③《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23 页。

④《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78 页。

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08 页。

各地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其他各省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湖北省。北伐军攻入湖北前，在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的高压之下，湖北农会不能公开活动，发展异常缓慢，农民运动的发展也极为艰难，只能停留在一般宣传阶段。1924 年秋，在共产党人董必武等的领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秘密成立。于是，共产党人便通过国民党的组织机构来开展农民运动。1925 年 7 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通过大量具体事例揭露了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的罪恶，要求各级党部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农民作实际的反抗运动。1925 年 12 月，成立了省农民协会，但有农会组织的不过黄梅、黄冈、黄安、汉川、枣阳数县，会员不过 3 000 人。省农会成立不到 3 个月，即被直系军阀封闭。至 1926 年 7 月，农会会员也只有 3 万余人。北伐军进占武汉后，湖北的农民运动由秘密转向公开，农民协会组织也迅速发展，会员猛增。1926 年 12 月底，湖北全省 69 县中有 22 个县成立了农会，12 个县成立了农会筹备处，会员达到 287 000 人。1927 年 1 月，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大力发展农民运动。3 月，湖北省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通过重要议案 30 条。这次大会是湖北农民运动大发展的起点。在董必武、陈潭秋、陈卫东、吴德峰等共产党人主持下的国民党部领导下，各地农会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惩罚不法地主、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4 月 24 日，成立了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实施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逮捕、监禁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5 月 27 日，仅咸宁县一次就枪决了勾结夏斗寅匪军残杀农民的土豪劣绅周爱惠、王德真等 7 人。在农运发达的县份，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取消地主苛例，并禁止抽佃。夏口、天门、广济、咸宁等地的农民协会宣布租税减少四分之一。罗田、黄梅、黄安等县开始没收不法地主土地。农运发展的县份还建立了农民



武装。至1927年4月初，农会会员增加到100万人，黄冈、咸阳、武昌、夏口、汉阳、黄梅、汉川、天门、阳新、应山、黄安等30余县农民普遍建立了“自卫军”。5月，全省69个县中，组织农民协会的已有54县，会员总数为250万余人。6月，会员达284万余人。

江西省。1925年7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秘密召开，选举产生了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绝对优势的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方志敏任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这样，中国共产党便通过国民党的组织机构，领导农民运动。1926年2月，为迎接北伐军，中共江西地委和共青团南昌地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将南昌地区的党团员派回本县从事革命活动。在中共领导下，江西各地农民协会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1926年8月，江西省成立了6个县农协、28个区农协、128个乡农协，有会员6 276人。北伐军入赣后，为配合革命军行动，农民运动有了较大发展，在赣东、赣西、赣南设立办事处。1926年11月19日，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会员已发展到5万人。省农协筹备处的成立和大批干部到农村工作，加快了江西农民运动的发展。为了检阅农民的力量，巩固和扩大农民组织，总结和交流经验，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针，1927年2月20日~28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省54县的141名代表。大会吸收了湘鄂两省的经验，并注意认真纠正本地过去农运的缺点。在郭沫若和方志敏分别做的政治报告和会务报告中，就列出了15项，如宣传工作不充分，出版物少；发展农会会员重数量，忽视质量；纪律不严格，组织不严密；所提口号策略有的不适当；等等，要求各地重视。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工农大联合、惩治土豪劣绅、减轻田租、废除苛捐杂税、改良雇农生活、统一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组织法以及会务总报告等28项决议案。大会还发表了宣言，通过了江西农民协会章程。这些决议和宣言，从政治、经济上及会务方面，都为全省农民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大会正式成立了省农民协会，选举方志敏等为省农协负责人。大会以后，江西的农民运动有了长足发展。至1927年5月，农会会员已发展到8万之多。到6月，会员达38万人。可以说，北伐军入赣后，江西的农民运动既广泛又深入，

安徽省。北伐军进入安徽之前，安徽各地青年团对发动农民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如1925年夏，安庆团组织要求每个家在农村的学生团员返乡时，都要把“调查农民生活情况”作为“应有的工作”，努力去完成。1926年初，团宿州特支制定了农民宣传大纲，要求团员必须每周汇

报农村宣传工作情况。在宣传和发动的基础上，各地农民群众开始组织起来。在宿县，1925 年 7 月，成立了南关集区农民协会，会员 80 多人，至 1926 年 5 月，宿县已有村农民协会 50 处，区农民协会 10 余处，农协会员共 3 000 余人。由于农运基础好，1927 年初，奉化、宁海、永嘉、杭山、肖山等 17 县建立了农会，仅宁波地区就有会员 20 余万人。农协组织的发展引起军阀的不满，他们加紧镇压群众运动。安徽大部分农民骨干分别转移或隐藏起来。2 月下旬，北伐军进占安徽，农民运动由秘密转向公开。为了统一指挥全省农民运动，3 月 8 日，薛卓汉在安庆召集各县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安徽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薛卓汉为委员长。省农协筹委会成立后，加强了各地的领导，先后向芜湖、怀宁、太湖、桐城、合肥、青阳等地派出农运特派员数十人，促进这些地区农民协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据 1927 年 6 月的调查，安徽全省已正式成立县级农协 2 个，区级农协 30 个，乡级农协 130 个，共拥有正式会员 6 600 人。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下，安徽各地农民群众积极支援北伐战争。在芜湖，县农民协会组织向导队，随军出发。在广德，成立了“军需供应委员会”和向导队、担架队、运输队、粮草队等，为北伐军提供后勤保障。在郎溪，当北伐军第二军抵达县城时，县农协组织农民 2 000 余人，举行提灯游行，欢庆胜利。与此同时，农民群众还向土豪劣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4 月上旬，芜湖农民向北伐军第六军控告大劣绅潘伯和。林伯渠根据控告，发布布告，缉捕潘伯和，查封其房屋家产。在宿松县，100 多农民集会，斗争了恶霸高保奇父子。在农民的强烈要求下，北伐军当场枪毙高氏父子。安徽农民运动的发展，遭到国民党右派的镇压。3 月 ~4 月，国民党右派两次捣毁省农协筹委会，省农协筹委会被迫停止活动。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安徽农协组织和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宿松、太湖两县农民协会召开有数千农民参加的反蒋大会，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镇压人民的罪行。太湖等地还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但这些斗争，终因国民党右派的背叛和破坏暂告失败。

河南省。1925 年，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的农民运动由秘密转向公开。1926 年 4 月，由杞县、信阳、许昌的县农协负责人发起，举行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与会者有 19 县的 57 名农会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省农民协会组织大纲、农民自卫团组织大纲和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最后，大会选举了执行委员 7 人，候补委员 4 人，正式成立了河南省农民协会。为迎接和支援北伐军，中共河南省党组织作了大量工

作。1926年5月，从各地挑选农运积极分子29人，推荐到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习。1927年3月，又选派36人到武汉农讲所学习。为了动员河南各地农民武装支援北伐战争，3月中旬，在武昌中央农讲所召开了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9人，代表45县的40万武装农民。于树德、邓演达等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邓演达、李立三、周以栗等分别向大会作了讲话。5月上旬，在信阳开办了河南省农民自卫军政治军事特别讲习所，仿效广州农讲所和黄埔军校，培训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的政治军事骨干，第一期学员98人。到5月底，全省已有4个县、32个区、230余乡正式成立了农会，会员27万人，其中农民自卫军约10万人，并且还在30多个县开始了农运的组建工作。1927年春，全省农民直接参加北伐战争的，不下15万。1927年3月起，河南农民运动便进入直接配合北伐军同奉军作战时期。3月初，北伐军入豫前夕，确山、信阳、汝南、遂平等9县农民，一致奋起向奉军示威。4月4日，确山农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经数日激战，起义农民攻克县城，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县政权。4月下旬，北伐军由武汉陆续开到信阳、确山、驻马店一带，河南各地中共党组织领导农民举行各种活动，欢迎北伐军。5月，当北伐军在上蔡、西平、临颍与奉军大战之时，豫东、豫西、豫北数十万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威胁后方。豫东杞县、永城等县，为配合北伐军东进收复开封，举行武装暴动。豫西5万余农民义勇队，与敌展开搏斗。豫北天门会的武装农民，先后攻占林县、辉县、滑县，声势浩大，策应了北伐军。

除上述地区外，福建、浙江、江苏、陕西、广东、广西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都得到相当发展。例如：在江苏，广州农讲所第六届毕业学员10人返省后，在泰兴、如皋、崇明、丹阳等县进行农运，建立了农民协会及劝农会、农民夜校等组织。在陕西，由于冯玉祥支持和共产党人的发动，北伐军攻占西安后，农运由秘密转为公开。在中共陕西区委领导下，于1927年3月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处，5月底成立省农协。不久，全省有40多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50余万人。其中长安、周至、户县、渭南、华县、绥德、三原等县农运发展最快，斗争规模较大。为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统一领导，1927年3月30日，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省农民自卫军代表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推选邓演达、毛泽东、徐谦、谭延闿、谭平山、孙科、唐生智、张发奎、彭湃、陆沉、方志敏等13人为执行委员，毛泽东、谭延

闾、谭平山等5人为常务委员。临时执行委员会制定了《今后农运规划》，对于发展各地农民协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政权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了新的具体部署。此时，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闽、浙、苏、直、鲁、桂、热河、察哈尔、绥远等17省，会员已达900余万人。6月，全国已有230多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1 000余万人。

北伐的胜利进军有效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农会活动不仅由秘密转向公开，而且由发展组织进入到开展政治、经济的斗争。它坚决打击了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建立了农民武装，初步进行减租减息，掌握了乡村政权。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这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中国统治的基础。



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

农村大革命的开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农村的统治，使一切革命的人们感到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快感，然而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惊慌和仇恨。于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国民党右派以及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的势力迅速联合起来，进行疯狂反扑。他们为镇压农民运动制造了一个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掀起了一股破坏、攻击农民运动的逆流。

反动派制造了大量诬蔑农民运动的“理论”和谣言。他们首先攻击的是农民运动的中坚——贫雇农，过去受尽压迫的贫雇农，现在起来“造反”，掌握了乡村农会的实权，把绅士老爷踏在脚下。这在绅士老爷们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他们诬蔑贫雇农是“痞子”，是“惰农”，造谣说“办农民协会是为了抽丁”，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农民要求减租减息是“惰性表现”，是“土匪行为”，叫嚣“农民运动不取缔，地方就永远不得安宁”。

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也与地主豪绅一起，诬蔑、攻击、破坏农民运动。蒋介石、张静江之流恶毒诬蔑农民运动是“流氓地痞运动”，是“过火行为”，是“矫枉过正”，叫嚣“农民简直赤化”，农会必须“换人”，“要限制”。有的还诬称搞农民运动“妨碍农业生产”，“妨碍税收”，“影响北伐”。国民党右派分子彭国钧就是典型的代表。当时，彭任岳州关税监督。他造谣说湖南税收减少是因为农民运动“过火”了，“有钱人都逃到城里，逃到上海、汉口去了，赋税收不到”，“税收不旺，军饷无着，不能为了农民断送北伐”。还说“某军官家里被抄，父亲被杀”，挑起北伐军对农民们的不满。叫嚷“农会虽然要办，但必需加以限制”。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队伍内的中间派害怕起来，对农民运动表现了极大的动摇。他们也跟在反动派后面，叫喊农民运动“过火”，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并指出农民运动是

"越轨"行动，是"胡闹"。说农民只应为革命出力，不应有本身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农民"无知识"，农民运动是受人利用；甚至诬蔑农民运动是"土匪行动"。要求取缔和限制农民运动，并以分裂统一战线相威胁，企图迫使无产阶级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在造谣、诬蔑农民运动的同时，反动势力还在农会力量薄弱的农村和小城镇进行残酷的屠杀和各种各样的阴谋破坏。

当时，反动派破坏农民运动最普遍采用的手段，就是利用旧团防力量，公开残杀农民。有的地方甚至组织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例如 1926 年 8、9 月间，广东花县民团总局局长江侠庵，纠集叛军陈炯明残部和流氓土匪 1 000 余人，围攻田美、李溪、象山等 10 多个乡农会，枪杀农会干部，抢走财物，焚烧民房，强奸妇女。11 月，湖南桂阳县土豪劣绅雷某，勾结团防局副局长彭仁寿、工贼李容巨、刘东圃等，派遣团丁，殴打省党部特派员河汉、农民协会秘书刘基岳及其他党员、工人数十人，密捕党员 20 余人，捣毁县党部、农民协会、县工会，另组织非法党部、农民协会、工会。[①]1927 年初，湖南湘阴县土豪陈伯纯，指使团防武装，摧残农民协会；安化县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戮农民 300 余人；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无故枪毙了攸县东区农协委员长罗震；[②]攸县东区农会会员王日德因该区团防局长王泽民借演戏卖赌，便约一些农友质问王泽民。王泽民因卖赌未成，遂带领团防局数十人将县党部农工委员主任围住劫杀，所有家物摧毁净尽，王日德惨遭枪杀。[③]湖北阳新的地主恶霸，纠合流氓和土匪数百，捆绑县农协、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 6 人，用煤油将他们活活烧死；次日，复集土匪流氓 4 000 余人，组织反革命暴乱，在全县农村大肆焚烧抢劫。在河南、江西、广西等地，地主阶级反扑农民运动的事情也不断发生。

在边远城镇，地主豪绅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公开叛乱活动。如宜章反动分子于 1926 年 12 月 1 日，乘庆祝全省农工代表大会开幕之际，私造农会图章，煽动一部分落后农民游街。该县团防局领头捣毁第一区农会，拷打农会干部。汝城保商队长、团防队长于 12 月 3 日率武装大队，围攻县党部，查封邮电局，满城戒严。耒阳县反动分子于 1926 年 10 月革命纪念日收买地痞，假充群众，捣毁杂税局和榷运局。此外，他们还利用家族同宗关系组织假农会、假进步团体，或贿赂歹徒混入农会，挑动农民内部纠纷，或打入和控制国民党下级党部，勾结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利用一切残存的旧政权机构等等进行破坏农会。



另外，许多地方的地主还组织了名称不一的反动组织，如衡阳的“白化党”，湘乡、湘潭、宁乡、益阳的“保产党”，醴陵的“三爱党”等，与农民运动对抗。当时，窃据省党部农民部长的刘岳峙，于1927年初纠合省、市党部中的右派分子，组织了“左社”，大肆攻击湖南农民运动“遭得很”，并要求改组湖南省党部，由省党部直接管理农民协会。在他们炮制的所谓《农运计划》中，主张农民只致力于增加生产，反对农村革命运动。

上述情况表明，农民问题成为当时形势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当时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最尖锐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严重关头，需要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领导，需要党以满腔热情去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对反动势力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以促进湖南以及全国的农村大革命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在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恶毒进攻面前，中共湖南区委各地组织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湖南民报》、《湖南通俗报》、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发表了许多战斗论文，公布反动派的罪恶活动，并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文集》小册子，对其反革命宣传做了彻底清算。

面对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和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共中央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指导方针却继续发展，并逐步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因严格奉行共产国际所指令的“国共合作”方针而坚持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力主回避农民运动所带来的矛盾以迁就国民党。他们屈服于地主势力和国民党右派的压力，故而也对土地革命及农民运动产生了极大的质疑与责难。

如前所述，陈独秀在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就制定了种种束缚农民武装的清规戒律，妄图取消农民武装。但当农民运动冲破这些条条框框，开展了大规模的激烈斗争时，陈独秀等却被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而是跟在地主、资产阶级后面，也从右的方面指责农民运动“过火了”，“搞糟了”，要求解散农民武装，取消农民革命政权，压制农村的大革命。他点名攻击湖南农民运动“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动”，使湖南出身的军官“咸抱不安”。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把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归罪于共产党、归罪于工农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他说：“国民党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的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即国民党右派的右倾，并不是他们的阶级本质

决定的，而是工农运动的“左”倾造成的。并指责共产党内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志犯了急性病，指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农民群众）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争斗。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即反对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反对提出土地问题的主张。陈独秀还提出了防止党内“左”倾的办法，即应当“改善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为此，“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要“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势力，使左派领袖获得群众”。应制止农民运动的“过火”，不要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等。

这种不适当的批评，实质上是让共产党不要去放手发动工农群众，企图以牺牲工农的根本利益来与搞军事独裁，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的蒋介石妥协。这些显然是不正确的。更严重的是，这次会议竟然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了压制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为基本内容的决议。尤其是在通过的《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提出把“耕地农有”的主张叫做“危险的左稚病”。决议还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 C. P. 因包办而孤立”。

应当指出的是，陈独秀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不免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农民运动问题上，也确实存在有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因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在研究如何具体实现土地革命的问题上，进行了争论。鲍罗廷认为武汉国民党是好的，“一切都是工农运动过火”，而罗易看到武汉政权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主张推翻武汉国民党政权，土地实行分配原则，就这样，农民土地问题便在这种矛盾和争论中给搁置了。而在这两个争论不休的国际代表之间，陈独秀显然是倾向于右的一方，即鲍罗廷的。因此，在农民运动高涨的形势下，这种无休止的争论废弃了土地革命的错误，自然导致了严重后果，农民运动不但不能深入，反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从根本上说，陈独秀在对待农民运动上存在的矛盾和错误是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而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农民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放弃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实际也就放弃了对中



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陈独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农民运动政策，给正在兴起的农村大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他不了解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因而不敢领导农民斗争，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相反，在革命高涨时，他极力压制和破坏农民运动。其结果，不仅使无产阶级失去了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使革命事业遭到惨重损失。而且，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陈在会议期间，找湖南省委书记个别谈话，指令一定要对农民的“幼稚”、“过火”行动加以制止。湖南省委随即开展了一个多月的清洗运动。在一周之内就逮捕了1 0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汉口特别会议之后，在东南一些省份，也出现了非难农民运动的情况。

注释：

①《湖南民报》（1926年11月10日）。

②《战士》（1927年1月14日）。

③《湖南民报》（1926年12月31日）。

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为了解释与回击来自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质疑、不满与责难，反击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澄清中共党内对农民运动的偏见，并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村革命斗争，毛泽东同志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2月5日，用了32天的时间，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个县的农民运动情况，获得了大批第一手资料。他在考察所到之处，都热烈赞颂农民的革命举动“好得很”。他会同当地党组织纠正了压制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并释放了那些在农民运动中被当作所谓“痞子”关进监狱的贫农骨干，同时，指责了地方当局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2月16日，他把考察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他说，这次“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他明确指出：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采取的一切革命的行动都是对的，不过分，因为不用大的力量决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并提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办法。报告还指出“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2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昌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深刻地总结了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成绩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并对此作了透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毛泽东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



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农民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只有打烂这个基础，挖掉这个墙脚，才能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湖南农民几个月的斗争，"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所以，"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这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那种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叫嚷完全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反革命理论。毛泽东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人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毛泽东阐明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是农村大革命的"中心斗争"，所以，在革命时期，"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报告认为这是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不如此，旧的就压不下去，新的就抬不起头来；不如此，"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因此，必须"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只有建立了农会的无上权威，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会投降，才能建立革命的社会秩序，彻底扫除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真正的翻身，"不这样就不能终结旧的封建秩序。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而建立农民武装，一方面要把地主手里的武装夺过来，放在农民政权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要建立农民的梭镖队，"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主张"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他批评那些不敢放手武装农民的人说："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他并且指出，在彻底战胜了地主权力之后，应该"随即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问题"。这样也就为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出了党在领导农村斗争中，应遵循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他们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有所不同。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革命决不可依靠他们；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能够参加革命，因此，党应该注意团结中农，对他们多做解释工作。而贫农则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

贫农，在乡村中占绝大多数。据长沙的调查：贫农占乡村人口的70%，中农占20%，地主和富农占10%。贫农终年过着劳碌愁苦的生活，他们中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因此他们在农村革命中一向是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假如没有贫农的领导，“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他斥责诬蔑贫农是“痞子”、“惰农”的反动言论，强调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党只有依靠贫农，才能领导农村革命取得胜利。

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毛泽东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礼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要摧毁农村中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就必须在农村中掀起一个大的革命热潮，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就是说要放手发动群众。群众一发动必然会有“反常”的举动，这个“反常”也就是革命，并不是什么“过分”。并强调，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应站在他们后头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对面去反对他们。毛泽东还指出，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使农会会员迅速发展，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开展实际的斗争。他批评了统一战线内部地方官员迁就地主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错误做法，认为“这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损害了贫农阶级的威信”，实际上压制了群众运动。他要求全党同志置身于群众之中，先当群众的学生，集中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反转过来，再当群众的先生，站在群众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为此，对群众要多做宣传工作，对农会中少数有些不良习惯的贫农领袖



必须进行训练，在整顿农会纪律的口号下纠正他们的缺点，纯洁农会组织，提高农会威信。文章还认为，对群众要充分相信、坚决依靠，指出“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这篇著作于1927年3月5日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35、36期合刊发表。4月初，武汉的《中央日报》副刊和《湖南农民报》也曾先后全文刊登了这一报告。这篇文章受到了共产党员和做农运工作的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反对。3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第191期，却只刊登了《报告》的前七部分，后八部分由于受到主管宣传工作的彭述之的阻拦，没有能够继续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一《报告》，4月，他指示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发行了单行本，瞿秋白亲自为此书作序，热情赞扬了这篇报告，指出：“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上去奋斗”。毛泽东还亲自对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讲授了《报告》的内容。但是，“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于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1927年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彻底批判了陈独秀极力否认农民的革命性、抹煞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千方百计限制和反对农民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等反革命势力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诬蔑和攻击。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科学总结。在报告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而又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以及工农联盟理论的伟大学说。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当时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做农运工作的同志的热烈欢迎。它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为革命的胜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这篇报告的鼓舞下，湖南农村大革命

继续发展。湖南农民冲破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束缚，坚决回击了反动势力的进攻。农会组织得到了迅速壮大，全省农民协会的会员由2月间的200万人猛增到500多万人；农民的政权形式也逐步由农协专政向乡村自治过渡。在斗争内容方面，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进一步发展为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进一步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并开始部分地分配土地。不仅如此，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实际上，这就为将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自己的政权作了准备。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2月，毛泽东从上海到武汉，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集经费、选派学员等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三省党部的赞同。1927年1月16日，湘、鄂、赣三省党部推选出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陈荫林、龚式农、张眉宣、李汉俊、王礼锡等8人为筹备员，招收湘、鄂、赣三省学生，在武昌成立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至2月12日，筹备处共举行了4次会议，对农讲所的章程、所址、招生名额、教学计划、成立招考委员会等事项均作了规定。

1927年3月，毛泽东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并征得国民党中央的支持，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全国学生。并在湘鄂赣农讲所章程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章程》规定："本所由中央党部创设，定名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本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为宗旨。"《章程》还对农讲所的经费来源、招生名额、学科设置、学习期限、行政组织等等事项，均作了原则规定。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设在武昌北城雄楚街原高级商业学校旧址内。1927年3月7日开始正式上课，4月4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斗争的风浪中胜利诞生了。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设常务委员会（农讲所最高领导机关），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等组成。由于邓身兼多职，所以工作主要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亲自为农讲所制定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和聘请教员。常委会下设教务、训练、事务三个处。周以栗任教务主任，陈克文任训练主任，季刚任事务主任。

中央农讲所在《开学宣言》中明确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

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因此，中央农讲所，规定了如下的招生条件：来自乡间者最好；毕业后决心回乡村，从事做农民运动，无他异想者；在政治上，革命观点确定；在文化上，达到中学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在身体方面，要强健耐劳，能在农所服从严厉之军操，到乡间能走远路；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入所学员，必须经过笔试、口试。第一期共招收学员800名，其中湖北省200名，湖南、江西两省各150名，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共300名。

根据《开学宣言》所规定的招生条件，决定采取选送、全面审查，坚持文化考试和口试，保证质量、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第一步先由各地选送，介绍有关情况，然后由农讲所对招生对象的政治思想和身体等各方面进行审查，合格以后，才能参加文化考试和口试，最后决定是否录取。这种招生办法保证了学生的质量。当时经过严格考查录取的800多名学员中，有武装农民的领袖，农民革命的骨干分子，积极要求参加革命的贫苦知识分子，农运经验丰富的干部，还有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约400余人。农讲所是革命青年的总汇，充满着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农讲所的课程很多，有：“1. 三民主义；2. 国民党史；3. 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4. 帝国主义与中国；5. 社会进化史；6.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7. 各国革命史略；8. 中国政治经济状况；9. 世界政治经济状况；10. 经济学常识；11. 政治常识；12. 法律常识；13. 中国职工运动；14. 农民运动；15. 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16. 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17. 各国农民运动状况；18. 乡村自治；19. 农村教育；20. 农村合作；21. 粤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22. 湘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23. 农业常识；24. 农民组织及宣传；25. 农民自卫；26. 农村调查统计及报告；27. 革命歌；28. 革命画；29. 军事训练（教授操练）。”[①]课程重点很突出，农民问题及与农民运动直接相关的课程占整个授课时间的70%以上。这样，既照顾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又体现了学用一致的原则，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

农讲所的授课人员基本上都是当时我党的优秀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张太雷、彭湃、方志敏、李达、李汉俊、郭沫若、邓初民、于树德、李立三、夏明翰、谭平山、彭泽民、陈克文、周以栗等。毛泽东讲授《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他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文印成小册子，发给学生学习、讨论。恽代英讲授《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课程，每周一次的时事讲话也由他担任。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周以栗讲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他对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讲得很透彻，学员印象深刻。彭湃讲课条理清楚，语言风趣，生动活泼，课堂气氛非常活跃。他向学员介绍了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经历，有关农民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以及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等，极受学员欢迎。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十分重视学员的思想工作。学员一入学，学校即组织大家认真讨论，如"怎样做一个农讲所的学生?""怎样才能消除从旧社会带来的多种毛病，改造成为一个有效的革命工具?"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规约》，要求大家自觉遵守。《规约》指出："我们现在虽然决心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在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带来了不少的毒菌，妨碍我们的工作。"这些病菌表现为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封建意识等。为了扫除这些病菌，所有学员必须反复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以及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武装自己的头脑，端正自己的思想路线，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还非常重视用武装斗争的思想教育学生。农讲所专门设有训练委员会，聘请军事教官，专门负责学员的军事训练。学员实行军事编制，全所设立总队，下辖 4 个大队和一个特别训练队。学员每人发 1 枝步枪和 150 发子弹，每天操练 2 个小时。训练内容，除基本操练外，有作战演习、实弹射击、野外露营和夜间紧急集合等。通过军事训练，学员很快掌握了武装斗争的本领，磨练出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在教学过程中，农讲所把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主持编辑的一套农民丛书再次出版，发给学员学习参考。这套丛书是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际结合得较好的学习材料。它内容很多，约 50 多种。有：《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土地与农民》、《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各省农民之分析》、《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中国农业生产问题》、《农业合作概论》、《列宁与农民》、《帝国主义讲授大纲》、《苏俄之农业政策》、《俄国革命与农民》、《日、法、意三国之农民运动》等。这些书籍，不仅是学员理论学习的参考书，而且是从事农民运动

的指导材料。它以丰富的材料说明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完整系统地介绍了从分析农村阶级状况，组织农民起来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到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经验。

为了使学生了解当时的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农讲所经常请农会干部和老农民作报告，还组织学生分小组深入农村，调查农民受地主剥削压迫的情况及地主、土豪劣绅的罪恶。并且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农民问题讨论会”，由教职员与学员共同组成，对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等等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学员结合当地的情况和自己的经验，认真研究和探讨如何进行农村革命问题。这些活动丰富了学生的感性认识，增强了他们领导革命的信心。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积极参加了现实的革命斗争。1927 年初，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逐渐暴露，在他的怂恿和指使下，各地反动势力向农民发起进攻。在湖北，发生了阳新惨案，在九江，制造了赣州惨案。面对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农讲所的学员异常愤慨。3 月 15 日，江西籍学员 150 余人结队到汉口，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中央政府致电质问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解散江西赣州商会、妇协”，“枪决惨案凶手”，“释放被逮工友”。3 月 26 日，中央农讲所举行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在这革命势力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工农的事实，完全证明反动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向那些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务期达到真正的目的。大会通过请愿书，要求“将蒋介石交付监察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按照党纪惩办”。会后，师生结队渡江，向中央党部请愿。在 4 月 4 日的开学典礼大会上，学生们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同时，对蒋介石秘密派进农讲所的“AB 团”分子实行坚决镇压。

5 月，湖北麻城县逃往外地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地主武装，组织“红枪会”，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围攻麻城县城。中共麻城县特别支部派王树声到武汉请求支援。毛泽东立即派出 300 名农讲所学生军，随王树声火速赶往麻城。在剿匪战斗中，农讲所学生军英勇作战，捣毁匪巢 10 余处，打死土豪和会匪头目 100 余人，救出了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经过十几天的奋战，平定了麻城反革命暴乱，保卫了麻城人民革命成果，使麻城农民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中央农讲所学员还参加了镇压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当夏斗寅



率部直逼武汉时，为了保卫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中央农讲所学生会同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工人纠察队组成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的指挥下，奔赴前线，打败了夏斗寅叛乱部队，解除了他们对武汉的威胁。

中央农讲所学员通过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增强了对反动派的认识，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提高了指挥作战的能力，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原计划学习4个月，由于革命发展的需要，提前毕业了。6月18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了毕业典礼。1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民协会、湖北省农民协会联合召开欢送会。第一期学员毕业后，毛泽东立即拟定了第二期招生计划，准备招收600人。这个计划公布不久，汪精卫集团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被迫结束了。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和战斗，农讲所学员迅速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坚强战士，他们信心满怀，斗志昂扬。毕业后，少数人留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作，多数被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返回各省，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投入农村大革命运动。他们不畏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的迫害，不怕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破坏与阻挠，把革命火种撒遍全国，点燃了全国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

注释：

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113页。

蒋介石军事独裁倾向和迎汪复职风潮

北伐的胜利进军，一方面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却也助长了蒋介石权力的日益膨胀。

蒋介石自国民党“二大”跻身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之后，权力欲日益膨胀。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出于对其地位现状的不满而制造借口，挑起了“中山舰事件”。蒋通过这一事件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打击了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排挤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把第一军控制在自己手中；打击了共产国际、苏联派遣在中国的代表、顾问，迫使他们作出了让步；打击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并清除了他最大的政敌，逼迫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出洋法国。4 月 16 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上，蒋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在 5 月 15 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又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党部活动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数额，不得超过总数的 1/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须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发给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这些规定的实施，严重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作用。7 月 5 日，蒋介石被推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拥有任命革命军和军事机关党代表的权力，7 月 6 日，接受张静江因足疾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推举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至此，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但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政治图谋缺乏警惕性，1926 年 7 月 7 日颁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战事状态下，不仅“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航空各军，均其（总司令）统辖”，而且“凡国民政府所属



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①]。之后又颁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大纲》，规定政治部属于司令部，受“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监督”[②]。

9月2日，总司令部行营颁布《国民革命军克复区域内战时处理地方行政条例》，规定每克一县，“即置县长一员，以执行全县之政务”，“县长由前方军事政治部主任选委之；……呈报总司令部政治部备核，转呈总司令查核加委或改委。”[③]这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便成了置于国民政府之上，超出国民政府的最高军政权力机关。至此，蒋介石在中山舰后短短不足4个月时间，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成了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党政军首脑，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为他对抗国民党中央积累了资本。

蒋介石在获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开始北伐后，反革命本质逐渐显露。北伐开始，他即以合法形式打击革命力量，压制工农运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引起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广大民众的不满，而且由于军队的扩大及成分的复杂化，尤其是蒋介石不断强化其军事独裁，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化也日益剧烈。

在军事上，蒋介石利用北伐之机，猛力装备，想方设法扩大其嫡系第一军的实力而抑制其他各军的发展，“其身为国民革命军的统帅，然其意念中，总是以第一军为主体。军中一切弹械补充、给养、调剂、编制扩充等等，第一军常比其他军优厚。”[④]除原党军第一、第二师，粤军第四师改称第三师外，又将新建教导师（改称第二十师）及粤军第十四师，拨归第一军。这样，北伐时一军共辖5个师19个团，而且兵员充足，装备优良、齐全。对其他各军，则任其兵员不足，装备低劣。如第二军号称3个师12个团，不过9 000人。第三军3个师8个团，约4 000兵员，第四军4个师13个团，特种兵严重短缺。在作战时，蒋又往往令其主力进攻弱旅，而把硬骨头甩给其他各军，如第一期北伐时，蒋有意将其主力放在侧翼次要方向福建，仅以一部即第一、二师参加主要方向两湖战场的作战，而其他各军则绝大部分都放在两湖第一线。尤其对唐生智第八军、李宗仁第七军、陈可钰第四军三个战斗力很强的军，不惜一切，连续调动，持久作战，拼命消耗。蒋如此安排，是想借北伐消耗其他各军的实力，到时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蒋的行为使其在北伐军各将领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就连北伐时期一直站在拥蒋阵

营的李宗仁也认为，蒋“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材，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5]

在这种情况下，各军将领为了保存和扩大自身实力，与蒋的明争暗斗也就逐渐展开，在这方面，最主要的人物是唐生智。

北伐之初，在北伐军中，以唐生智的第八军实力最雄厚，第八军兵力超过第一、二、三、六军之总和。攻下长沙后，湘省实权即为唐控制。对于迅速崛起的唐生智，蒋有如芒刺在背。于是，在湖北的争夺中，常常令唐军连续打硬仗，拼命消耗，在合围武汉时，故意令第八军攻打汉阳、汉口之强敌，而令第一军的第一、二师直驱自认为敌军薄弱的武昌，以便早下武昌而控制鄂省，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唐生智迅速顺利地攻下汉阳、汉口，而武昌却久攻不下，于是鄂省实权又落唐手，蒋被迫去江西另图发展。至此，唐对蒋的地位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控制唐，蒋首先提出以司令部支配湘中的民政、财政，继而又要陈公博、邓演达留汉口与唐争湖北政权，欲借总司令的权力压制唐。面对蒋的压制，唐也毫不示弱，一面要求扩充编制，将第八军扩充为四个军，与蒋较劲；一面竭力拥护国民党中央，并支持工农运动，以获取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支持。

蒋介石还把黄埔军校作为自己的“领地”，使黄埔毕业的军官自成体系。北伐期间，有些黄埔毕业生十分骄纵，实习时不受所属部队官长约束，自以为校长是最高统帅，他们便以天子门生自居而目空一切，不守纪律。

李宗仁力劝蒋介石不要再兼任黄埔军校校长：“必能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的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以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因与蒋介石追求的军队系统化以便造成他个人的军队目标相左，所以“蒋氏倾听之下，默不作声，态度也顿时变为严肃”[6]。

当邓演达知道此事时，对李宗仁说：“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需要创造的，他故意将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一个人的军队。你要他不当校长，不是与虎谋皮吗?”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出身、他认为忠于他个人的军官违纪犯法，只要报告他蒋介石，他不但不加处罚，反而认为诚实可信，给予嘉许。

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本来就是为了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群众力量，实现自己夺取地盘的目标，因此，在利用的同时，千方百计地限制和打击他们，以免危害他自己的私利。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蒋的军事实力的膨胀，他要独占胜利果实，就不能容忍共产党和工农势力强大起



来，就势必抛弃昔日的同盟者。工农运动越发展，革命越深入，蒋的反共、反工农的面目就越来越暴露，蒋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7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戒严条例，禁止工人、农民进行集会等政治活动，以防止农工“扰乱后方，阻挠北伐”⑦。9月28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工人运动方针案》，规定在帝国主义及军阀所在地要求当局给工人以所有应有的政治权利，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而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只“保证工人有为经济利益斗争之罢工自由”，不给集会结社等政治自由，“因一阶级或一部分之部分利益，必须在国民革命运动全部利益之下”。这些条例、决议，总的原则是，限制工农运动，禁止工人使用武力、建立武装，一切革命活动均受政府支配。蒋介石还支持反动团体，镇压工农运动。广大工农群众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对蒋介石极其不满。7月13日，广州工贼陈森收罗凶手，杀害广州革命工会会员2人，打伤十几人。事后，广州172个工会派出代表2 000多人，向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凶手，解散一切东家工会，并把陈森扭送公安局，但蒋介石密令将陈释放。1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颁布了关于限制罢工及处置工会纠纷的布告。宣布禁止工人罢工、持械游行，并污蔑这种举动“危害公安”。这样，就使广东局势不但没有像湘鄂赣那样因北伐胜利而出现高潮，相反走向反动。

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以致形成“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大元帅时”⑧这就不能不引起国民党中央的强烈不满，再加上蒋在北伐中那种培植嫡系，压制异己的行为，这种不满就逐渐转化成了一种担忧。人们开始怀念“淡泊从容”、“作风民主”的“汪主席”了。汪是孙中山麾下的“三杰”之一，在国民党内很有影响，孙中山逝世后一直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汪精卫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1910年，汪精卫策划了对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计划，但未获成功，汪精卫被捕并被满清政府判处永远监禁在狱中，汪精卫两次自杀未遂。加之汪精卫不嗜烟酒、不近女色，其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无人可比的，汪精卫因此容易被各方认同。早在1926年7、8月间，北伐战争伊始，黄埔军校内部首先喊出了“迎汪复职”的口号，希冀抑制蒋介石的独裁活动。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地方党部也“电请中央函催汪精卫同志销假视事，俾中枢有主，成就北伐大业。”⑨以抑制蒋介石的权欲，使其反革命气焰有所收

敛，并在实际上削除蒋的部分权力，以约束和限制蒋介石的个人专制和军事独裁活动，恢复和提高国民党的权威。

8月下旬，汪精卫自请复职的信寄往广州。随后，何香凝等主张将此信公开，“借此请汪复职”[10]。“迎汪”问题遂正式提出。首先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多数左倾化，并形成一股与蒋介石强烈对立的情绪。这种对立情绪表现在8月21日该校3 000名学生召开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要求汪精卫回来。以唐生智、李济深为代表的北伐前线将领亦想限制总司令蒋介石的权力，甚至想把他推翻。此外，自“中山舰事件”之后，国民党内不少人怀有一种崇汪惧蒋心理。

1926年9月，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会攻南昌战役大败，其嫡系部队第一师全军覆没之后形成拉锯之势。以此为导火线，前方将领对蒋介石的独揽大权、排除异己、指挥不力的不满情绪，后方工农群众对蒋介石压制工农运动的反抗情绪，一齐爆发，形成强烈的反蒋迎汪复职运动。要求国民政府有新改变，恢复左派的指导权，迎接汪精卫复职。

注释：

①郭廷一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4页。

②《革命文献》第9辑，总3900、3901页。

③《革命文献》第12辑，总1962页。

④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⑤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⑥同上书，第311页。

⑦郭廷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41页。

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6、635页。

⑩《瞿秋白由粤回来报告》。广东省党史委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15页。



中共中央迎汪、抑蒋的政治方针

在北伐出师初期，中共中央力图使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之前的局面，争取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对待蒋介石，主张暂时保留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寻找办法消除他军事独裁的威胁，最终改变国民党左派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1926 年 7 月 12 日～18 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关系；一是认为共产党应当包办国民党机关，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工作。会议提出对待国民党仍坚持扩大和联合左派，共同应付中派和反对右派的方针。[①]陈独秀指出：“‘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②]。当时，苏联军事顾问加伦间接请示在北伐中对蒋的方针，陈独秀的回答居然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③]当国民党左派首先提出迎汪复职问题后，陈独秀感到这不失为制约、牵制蒋介石的一个良方，因此表示赞同“迎汪复职”，“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将党权交与汪精卫”，同时“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④]，借以缓和蒋介石与各派小军阀的冲突，增强国民政府力量。

中共中央为实现汪蒋合作、迎汪复职，积极支持，除电请广州会议延期至双十节开会外，同时发出通知，令各地党组织尽可能全选左派代表前往参加。[⑤]

1926 年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讨论迎汪问题。会上，维经斯基认为，要向国民党左派表明，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下心来，不能急于召回汪精卫，我们不应当挑头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也不会来进攻，因为他在前线的处境迫使他寻求支持。会议决定：“我们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

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因此，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表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⑥]会议还对汪回来后同蒋的关系作了几种设想：一是迎汪倒蒋，二是汪蒋合作；三是促蒋左倾。中央分析第一个办法太危险，在现时北伐的非常时期，一旦去蒋，将对国民政府发生极坏的影响，将会动摇北伐的局面；继蒋而起的军事领袖如唐生智、李济深等也并不可靠，他们因现时反蒋，故行动较蒋左，恐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个办法实行起来也很困难，因为张静江，叶楚伧等人控制的广东政权，根本不可能执行左派政策。“比较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汪蒋合作）”[⑦]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认为，请汪回国复职有三大好处：第一，使国民党增加得力负责人以扩大局面；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⑧]。为此，中共中央在9～10月间多次指示各地党部特别是中共广东区委要做好迎汪复职的宣传、组织工作，要求各省尽量选派可靠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去出席国民党十月联席会议，以制订左派政纲，通过迎汪复职的决议案。同时，中共中央又一再强调迎汪复职“绝不是倒蒋，我们的口号是‘汪蒋合作’”，告诫各地党部在进行迎汪复职的宣传工作时，要注意内外环境的形势，勿授蒋以隙，被蒋借口打击左派，“以免再出现一个‘三二〇’事件”[⑨]。

在9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联席会议上，维经斯基又提出，在蒋、汪谈判中，我们不应充当汪的代表，而应当作为独立的一方，既不反对蒋，也不反对汪。张国焘提出，为了防止国民党中央过早发生分裂，应当将权力按地区来划分：江西和福建归蒋介石，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归唐生智，广州和全党归汪精卫。维经斯基、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均认为应当迫使蒋介石同汪精卫在分配权力问题上达成协议，但对于蒋汪之间能否达成一致表示怀疑。[⑩]

对于后方的迎汪运动，蒋介石的第一反应是共产党人在幕后操纵，意在“借此以倒蒋”[⑪]。对此，他恨之“切齿”。8月20日，蒋介石得知反蒋气氛甚浓，自感自己的地位危险，怕汪出后为实力派拥护以倒己，非常恐慌不安，乃派胡公冕到上海见陈独秀，请共产党不要赞成迎汪回国，其理由是汪精卫回国后将为一些小军阀所利用而反蒋，这样就会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同时，蒋对身边人散布，“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



回来。”[12]陈独秀向胡公冕说明了迎汪的目的，同时提出了赞同汪出的三个条件：“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预计扩充蒋之实力在十师以上，在武汉作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黄埔式的练兵，加强蒋的军事力量，“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并再三向蒋诚恳表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汪回后我们绝无报复行为。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13]蒋介石坚持己见，又请维经斯基赴鄂，仍望中共能帮助他。9 月底，维经斯基和徐特立赴汉口。根据蒋介石的要求，中共中央作出了新的让步。1926 年 10 月 3 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区委，对汪蒋问题又作出新的规定：“汪精卫回粤固然重要，而实现时期必须万分谨慎”，若“不顾蒋之意硬迎汪殊太危险。”特别告诫中共广东区委：“迎汪决定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14]中共中央最初的设想是请汪回国后留在广州，不去武汉，意在“改造广东省政府，可以组一个汪、李（济深）、孙（科）合作的政府，去掉古应芬，肃清贪官污吏派。此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所以赞成汪回，就是为要救广东这块革命的基础，汪除任国民政府职外，事实上须拿到广东政府实权”[15]。

支持左派和迎汪复职等政策，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它立足于同新右派的斗争。但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于迎汪复职运动表现出非常矛盾的心理：既赞成汪回国复职，又担心蒋不赞成。赞成的主要目的，是想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将党、政、军权分开，即蒋做军事首领，汪做党和政府首领，以缓和蒋与各派军阀的冲突，维持军阀间的均势，保持广东政府的革命性质。担心的是怕蒋误会迎汪即是为了倒蒋招致蒋再制造一个“三二〇”事件，动摇北伐的局面。因此，把蒋介石是否愿意与汪精卫合作，作为迎汪复职的前提。

1926 年 10 月 3 日，在内外一片迎汪复职的呼声中，蒋介石发表“迎汪”通电，表示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还表示要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去法国劝驾，并希望汪“与之偕来，共荷艰巨。”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应付各方舆论和争取主动。

10 月 15 日至 2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迎汪案》，并拟派何香凝、张曙时等为代表，赴法劝汪回国。

以蒋介石“迎汪”通电的发表和国民党十月联席会议《迎汪案》的通过为起点，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迎汪复职的前景乐观起来，态度也由促成汪

蒋合作转为“迎汪抑蒋”。11 月初，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席会议认为汪精卫回国复职之事“蒋、张诚意迎汪与否，愿汪得权与否，都不必顾及”，因为“汪回左派始有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蒋此时在全国迎汪高潮中，对汪亦只能暗斗，而不可能有明争，更不至有武装的冲突[16]。根据这一判断，陈独秀批评广东共产党人只注意国民党左派群众而忽视联系左派领袖的做法，指出粤区同志认为没有左派领袖，左派领袖很少靠得住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17]。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再次批评广东共产党人不积极进行迎汪工作而采取听其自然的作法，指出广东共产党人对待汪在此刻回来，一方面表现太左，一方面表现太右。从恐惧“三二〇事件”余威，不敢积极主张汪在此刻回来，是表现太右；从一定要取消蒋之主席，又似表现太左。并反复说明汪回来并不是无职可复，也并非一定要与蒋争党主席职位；现时不怕蒋生什么问题，顶多不过是蒋消极一点，然而从革命的全部利益来讲，汪回只有更多好处[18]

除迎汪外，中共中央认为对唐生智应采取“包围”的办法而不是抑制的办法，通过个人间的亲密接触、民众的组织力量和我国同志的影响等手段，促使唐生智左倾，打破革命只有一个独裁者的幻想。中共中央批评粤区同志存有“扶蒋抑唐”的观念和以蒋为独尊者的观念。在广东，无论国、共，均认为唐生智是将来最不可靠、最危险的人物，处处防范唐，疏远唐，抑制唐。鲍罗廷在致加拉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电报中明确说：在广州，他宁要汪而不要蒋；在汉口，则宁要蒋而不要唐。[19]中共中央认为这种观念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从眼前的事实看，唐比蒋表现得要好一些，蒋比唐更阴险狠毒。“蒋何尝尊重国民政府?”“蒋介石目中何尝有一个党、一个政府?”“倘使为革命的利益不容许蒋个人再这样专制下去，必须改变现在的局面。”[20]中共中央对蒋的不满与日俱增。

虽然在国民党十月联席会议以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认识到蒋介石“阴怀嫉刻，孤行己意，毫不觉悟”；对迎汪复职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希望通过迎汪复职以“抑蒋”，限制蒋介石权力的进一步膨胀，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仍然对蒋介石一味迁就。这反映出中共中央一方面想通过“迎汪”以“抑蒋”，巩固壮大左派力量，限制蒋介石新右派势力的膨胀；另一方面支持迎汪复职，以蒋介石不离开北伐革命战线为条件，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只能贻误时机，助长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迎汪复职”运动是在北伐时期蒋介石新右派面目开始暴露、军事独裁



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以抑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局面为目的的一场民主运动。这一运动对于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革命势力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打击他的反动气焰和削弱他的权力，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过分看重迎汪复职运动的作用，过分重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力量，把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的胜利，完全寄托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身上，完全忽视了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新形势下，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创建工农武装，壮大我党力量的重要性，而始终把汪精卫视作限制蒋介石新右派势力膨胀的最主要的因素，究其实质是对蒋介石反动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对汪精卫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信任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犯了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即使在蒋处于不利的境地而求救于中共时，不仅没有利用这一时机，联合国民党左派，削弱蒋之军事实力，发展革命的军事力量；而是采取维持蒋不倒和助蒋发展的方针，完全放弃争夺军权的机会。中共中央负责人以为，这样做，蒋会接受中共的忠告和主张，平衡和调和各军及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维护北伐的大局。其实，蒋在利用中共的同时，仍然放任右派分子在民众中向共产党进攻，并加紧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巩固和发展军事独裁的局面。

中共中央所以对蒋介石的压迫工农和培植私人势力、实行军事独裁、反对迎汪等反动行为采取让步政策，还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关。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同陈独秀一致，主张与蒋合作，绝不倒蒋。作为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鲍罗廷，此时、已认清蒋的真面目，对其不存在幻想。但因蒋是实力派，为了北伐，仍取容忍态度，曾说："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的愈迟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23]。1926 年 10 月，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一份电报，要中央制止农民运动的发展，以免引起北伐军官的反对。虽然这一错误在 11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中予以否定，但它对中共中央指挥疾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是有深刻影响的。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9 页。

②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的情况报告》（1926年7月21日），同上书，第176页。

③《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26页。

⑤《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319页。

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00～503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15～316页。

⑧同上书，第325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17页。

⑩《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20日），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25～526页。

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55页。

⑫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第50页。

⑬《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325、326页

⑭《中央给粤区的信》（1926年10月3日），见《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70页。

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卷，第229页。

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43～444页。



⑰同上书，第422～427页。

⑱同上书，第447～448页。

⑲《鲍罗廷给加拉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电报》（1926年9月15日），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96页。

⑳《中央给粤区信》（1926年11月9日），见《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06～308页。

㉑张国焘：《我的回忆》（内部本）第2册，第124页。

国民党中央与各省联席会议左派政纲的提出

蒋介石想始终维持右派政权，实行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因而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这一态度使左派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野心。

1926 年 7 月，国民党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江苏 5 个省党部及汉口、上海两个特别市党部，联衔电请“汪主席销假视事”。在各省党部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经酝酿计划，准备发起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或于最近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来实现迎汪复职计划，恢复左派政权。不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见形势不妙，忽然在 9 月 4 日中央政治会议上匆忙宣布于 10 月 1 日召开中央委员与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时局方针及请汪复职，政府迁移问题。[①]企图通过右派占优势的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决议，迁府武汉，以控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等将领，并杜绝汪精卫回广州取代国民政府领袖地位，扩大与蒋介石等人的统治权威。[②]国民党左派顾孟余、何香凝等人对于此次大会十分注意，当他们获悉蒋介石召集大会的消息后，亦积极运动。他们派代表分赴各地，动员各省市党部选派左派代表参加中央会议，争取使左派控制会议，通过有利于左派的决议。顾孟余自任去北方代表，派吴玉章抵沪，运动长江一带左派代表出席。他们决定两项应对方针：一是在大会上揭露“三二〇”事件真相；二是口号为巩固本党左派与共产党的谅解合作，恢复党权，拥汪复职。[③]

1926 年 10 月 15 日～2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各省区及海外总支部代表（每省 2 人）联席会议在广州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员（含候补委员）34 人，各省区及海外代表 52 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时再派我们同志去”，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 1/4，左派占 1/4，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



占1/4。会议虽由蒋介石发起召开，却被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操纵。谭延闿、徐谦、张人杰（张静江）、宋庆龄、吴玉章为主席团成员。联席会议由谭延闿致开幕词，经讨论，通过了《请汪精卫销假案》、《国民政府发展决议案》、《国民会议召集问题决议案》、《省政府、地方政府及省民会议、县民会议议决案》、《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党代表任免条例》、《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最近外交政策决议案》、《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动民众、抑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决议，还发表了《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宣言》。这些决议，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最近政纲。陈独秀在一次报告中指出：当时国民党左派有三个缺点：没有具体的政纲；没有中心人物；下边没有群众。陈独秀说："我们要帮助左派的就是这三件事"。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④]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105条，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⑤]。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此外，在其他决议中，主要议决了以下这些问题："一、请汪精卫销假复职；二、省、县政府实行委员制，省府委员7人至11人，由国民政府指定主席一人，打破由总司令委任制；三、开除西山会议派覃振、沈定一、林森、张继等8人党籍；四、发起组织包含工、农、商、教职员、学生、自由职业者、军人、妇女等各人民团体的联合会，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五、国民党员有服兵役的义务；六、师以上之军队党代表由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署名任命；七、解散摧残农民之民团团防局。"

与会的共产党党团亦规定：共产党员均持妥协态度，"凡事均让左派上前"，尤其是对国民党内部事务，"比较取不参与态度，听左派自决进攻中、右派与否"。但即使如此，以张静江为代表的中派或新右派，在会上仍旧受

到相当压制。比如，张要指派人代表未能来人的各省出席大会，遭到否决；张内定大会秘书长由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兼任，与会者3/4通过另组大会秘书处；张极力淡化迎汪案，并以不知汪精卫所在何处为由，反对派代表迎汪，更是遭到与会者的嗤笑和否定。[6]

"迎汪"案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4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7]该案有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何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5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8]这次联席会议通过的"迎汪"案，基本调子是促成蒋汪之间的合作。会议发给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通告指出："蒋介石誓师前方，党务、政治任务繁重，汪同志亟宜销假，共同负责。"[9]在通过"迎汪"案的同时，会议还通过了《电慰蒋总司令决议案》，向蒋介石说明，"因工作之扩大，筹划之需人，特决议促汪精卫同志销假，与执事共负党政重责。"[10]联席会议同样充满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或论辩。议开到最后一天时，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绝对不等于全国代表大会，其地位仅与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相同，因此，它无权变更或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即是无效的"。丁惟汾的发言受到了张曙时、江浩、范予遂、李毓尧、陈其瑗等人的反对，但朱季恂、徐谦则部分同意丁惟汾的意见。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辨。当天会议的主席是吴玉章，他综合双方意见说：联席会议的决议，现在既以丁同志提出之地位与权能问题，发生了有无效力的问题，自应有一解决的方法，本席主张，以"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实行，只有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吴玉章的意见既维护了会议的决议，又完全符合组织原则，因此获得通过。

从9月15日~26日止，共开过6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会、中政会合并，另选13人组织政治委员会，它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左派的意图很清楚，即罢



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代理主席职务。对此，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作主席，声言“请汪复职”，“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11]。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12]在张静江的逼人气势面前，左派决定退让，结果，提案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的基本态度是既要迎汪，又要拉蒋，企图使迎汪不干涉蒋介石的利益，不引起他的反对，以达到促成蒋汪合作的目的。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山舰事件以来的沉闷空气，削弱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但由于对蒋介石的迁就让步过多，未能就改组领导机关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国民党中央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张静江手中，结果使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和军事实力日益膨胀，使斗争形势更加尖锐复杂。因而，左派的胜利只是局部的，并且只是书面上的胜利。

中共中央也承认，国民党联席会议上虽然左派空气极浓厚，形成的一切决议也都好，但实际的结果并没有得到，仍然是国民党中派的胜利，并为中派造成一个有利以后反攻的基础。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的结果，清楚地反映出共产国际的策略主张是成功的。共产党人在会议期间始终保持低调，并不出面，只“帮助使一部分左派能有一比较固定的联合，每日会商一切”，形成统一意见，然后便由他们去冲锋，就能贯彻自己的意志。10月联席会议之后，国民党内拥护三大政策和拥护汪精卫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正如陈独秀所言：“联席会议的结果，表面是左派胜利，实际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维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顾忌。”[13]

注释：

①《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319页。

②《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348、349页。

③《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319页。

④《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事录》第3号。

⑤《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

⑥《K. M. 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1926年11月)，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第419页。

⑦《K. M. 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页。

⑧同上书，第466页。

⑨《请汪精卫销假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78页。

⑩《电慰蒋总司令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

⑪《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5页。

⑫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00页。

⑬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61页。



国民政府迁都之争

迁都武汉本是蒋介石的主张。1926 年 9 月 6 日 ~7 日，国民革命军相继克复汉阳、汉口，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势力正向长江流域发展，武汉因其地理位置优越，有望继广州之后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但它即将落入唐生智之手，蒋介石深为忧虑。9 月 9 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与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电称：“汉阳汉口既克，而武昌城敌因无退路，故尚负隅，现在正在设法劝降中，城虽未下，而军事实无问题。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①蒋介石生怕武汉落入唐生智之手。

在 1926 年 10 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也讨论了迁都武汉的问题。孙科等人在会上提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但偏于中国南部，如迁至中部，指挥上比较可以便利”②。当时，蒋介石为了有利于控制国民政府，主张立即迁都武汉。国民党内邓演达、徐谦、唐生智、张发奎等从军事指挥上考虑，也主张立即迁都武汉。吴玉章等根据中共中央防止抬高蒋之权威的指示精神，反对立即迁都武汉，指出：“现尚未届国民政府迁移之适当时期”，“政治根据地，此时仍在广东，并不因军事之发展而骤变。”③经过讨论，会议决议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决议指出：“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④从而否定了蒋介石的意见。

当远在江西总司令部行营的蒋介石得知联席会议的决议后，仍不甘心，坚持要求迁都武汉。10 月 22 日，蒋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正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扩展。”⑤11 月 9 日，他再次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

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也必难巩固。”[⑥]当时除蒋介石外，李济深、张发奎、邓演达、陈铭枢等也都力主迁都。前苏联顾问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也改变了主意，不仅不顾中共中央的反对，主张国民政府应马上迁往武汉，而且“还发出一篇必须迁移的大议论”[⑦]。于是，主张迁都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时期，日本同张作霖的关系一度紧张。日本政府派清浦子爵与李石曾、易培基谈判，探询国民政府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国民政府要员认为由于日奉关系紧张，张作霖自顾不暇，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

11 月 12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了原则上迁都的决定。11 月 16 日，国民政府为迁都作准备，派国民政府委员陈友仁、宋子文、徐谦、宋庆龄和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等 60 多人，赴韶关经南昌到武汉考察。26 日，国民党中央作出正式迁都武汉的决定。

12 月 1 日，陈友仁、徐谦、宋庆龄等抵达南昌，并于 7 日在牯岭与蒋介石座谈，对迁都武汉问题取得共识，“皆认为甚为重要，必须从速准备”，蒋介石也表示“赞成”[⑧]。12 月 5 日，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通电宣布停止办公。12 月 13 日，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决议成立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总顾问，决定临时政府代行最高职权。12 月 19 日、20 日，蒋介石两电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对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决议案表示同意。1927 年 1 月 1 日，临时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四部开始行使职权。国民政府命令将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临时首都。

中共中央根据情况的发展，在党内发出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及湖北政府组织等问题的意见》，指出，从当时客观形势上看，有很大可能要迁都武汉，并为此提出应做好四项准备工作，如：划分国家与地方的军政、财政；迅速成立省政府；使此政府左倾，发布左的政纲；造成民众拥护左的政纲的浓厚空气等。以此，迫蒋与唐左倾，给右派一个下马威，使他们有所顾虑。

蒋介石对迁都武汉的决议可能带来的影响，最初并未十分警觉，故虽有所不满，却未曾公开反对。但当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蒋介石看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武汉地区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国民政府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掌握，表现出坚决地反帝反封建倾向，



不但不受他的控制，而且要他总司令听命于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就使他原来以军统党、以军统政的愿望落了空。因而一反常态，极力反对迁都武汉。因此，1926 年 12 月底，当第二批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北上途径南昌时，竟被蒋介石非法扣留，准备另立中央，分裂国民党。1927 年 1 月 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在会上，张静江、谭延闿反对迁都武汉，邓演达、宋子文、朱培德、陈公博主张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却强硬作出结论说：“多数都表示国府留赣，那么国府就不迁汉罢!”⑨并提出首都应该建在前线，设在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因而需改都南昌，并于 5 日通电武汉，谓“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⑩。至此，蒋介石挑起了“迁都之争”。蒋介石此时反对迁都武汉，是想“把革命政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便任意摆布，为所欲为地进行反革命活动。”⑪“实现其封建思想中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阴谋”⑫。1927 年 1 月 5 日，武汉方面收到蒋介石改都南昌的电报。6 日，徐谦、孙科致电蒋介石等，询问改都的理由，要求暂时保守秘密，认为如果宣布此事，“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将受影响”⑬。1 月 7 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召开第 11 次会议，专门就迁都问题作出决议。会议认为：“（一）关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应先发一电报，说明党部与政府地点，由在粤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迁鄂，先推一部分委员来鄂准备，牯岭谈话亦认此举为必要。初到鄂时，时局颇感困难，但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联席会议对于（政府）地点问题，议决应俟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时期，武汉当局有维持之必要。（二）发电后二三日，如南昌同志尚未了解，再派一二同志前往解释。”⑭同日，陈友仁、宋庆龄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不宜变更。⑮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完全符合革命发展的需要。政治上，两湖和武汉的革命运动已有很大发展，武汉已成为革命中心和新根据地；军事上，武汉建都后，北可沿京汉路直趋河南而取北京，东可顺长江直经赣而到浙江，西扼四川，南沿粤汉路连接湖南广东，可以控制西南，并且有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经济上，武汉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称，它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区域和经济中心。因此，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对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对付舆论，收罗党羽，蒋介石于 1927 年 1 月 11 日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和加伦等从南昌来到武汉侦察情势，并竭力劝说武汉临时联席会

议的成员同意他的意见，但遭到拒绝。在欢迎大会上，群众和代表们都强烈要求迁都武汉，并向他提出质问，使他狼狈不堪。鲍罗廷也当面递交给蒋介石一封信，坚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从速迁都武汉，并主张在武汉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蒋介石的答复是："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地点，须俟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至于中央政治会议仍应在南昌开会，不能即时到武汉来"[16]。

1 月 15 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召开第 13 次会议，讨论是否停开联席会议，设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的问题。经讨论，认为："政治分会为一省指导政治机关，此间应有代表中央之机关，武汉为革命中心地，若在南昌设立政府，便为两个中心，应付收回英租界亦复困难，政治分会暂时无庸成立。"[17]因此决定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1 月 17 日，蒋介石出席了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第 14 次会议。会上，他再次提出了迁都南昌的要求，遭到与会人员的一致拒绝。

蒋介石于 1 月 18 日返回到南昌。1 月 21 日、22 日，蒋与张静江、谭延闿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中央"的名义命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停止开会。同时派戴季陶自南昌来武汉，催约他们赴赣。对于蒋介石的电令，武汉方面经过讨论，回电拒绝："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18]。26 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派何香凝、顾孟余、邓演达随戴季陶赴南昌，再次敦促蒋介石让在江西的各委员启程来汉。这时，武汉各阶层人民、各机关团体和《民国日报》等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文章或社论，一致主张执行迁都武汉的决议。

此时，被蒋介石阻滞在南昌的委员中，有不少人反对蒋介石的做法，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 1 300 万元暂扣不发，使蒋介石一筹莫展。蒋介石为了缓和舆论，于 2 月 8 日，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表示：应民众及各团体要求，本日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但他又借口江西省政府在 20 日成立，拖延迁汉事件。但会议又作出决议，以党部名义派徐谦为赴美代表，"以剪除鲍罗廷的羽翼。"[19]蒋这样做的目的是对徐谦召集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力主迁都武汉的一种报复。

2 月 9 日，宋子文从南昌致电武汉，说谭延闿等人很快可以抵鄂，考虑到阻滞于南昌的委员即将来汉，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于 2 月 16 日召开了第 25 次会议，认为临时联席会议的任务已经完成，因此，会议决定："定下星期一（21 日）开扩大联席会议，由临时联席会议召集武汉之中央



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共同开会，结束联席会议。”[20]

2月21日，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对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过去的工作深表满意：“认为在革命进行之需要及利益上，临时联席会议有成立之必要，对于过去二月余之经过，尤足以证明此会议之成立有维持革命进行之力，并有提高国民政府在国际地位与威望之效。”[21]会议决定从即日起结束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在汉办公，并请南昌委员即日赴鄂。会议还决定，为统一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权威，指导国民革命的胜利进行，于3月1日前在汉口召开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在形势逼迫和邓演达等说理斗争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在3月3日表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于3月6日全部迁鄂，全体委员于是启程赴汉，12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至此，蒋介石改都南昌的阴谋宣告失败。

迁都之争，实质上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内部独裁与反独裁的斗争。迁都之争虽然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结束，但谭延闿等人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2月22日，针对武汉方面21日的决议，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电告武汉：“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22]这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

注释：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长编》，第677页。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6日。

③《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6日。

④《国民政府发展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⑤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1927年3月南京刊印本，第105页。

⑥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9册，1927年3月南京刊印本，第59页。

⑦《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后应付粤区的策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

⑧参看徐谦关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经过报告，1927年3月10日，见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记录》。

⑨陈公博：《寒风集》。

⑩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转移南昌”的通电。

⑪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⑫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 年 4 月）。

⑬《徐谦等为政府不迁汉消息暂宜秘密致蒋介石等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4 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4 页。

⑭《中华民国史事举要》（初稿）（1927 年 1 月至 2 月），第 51 页。

⑮《陈友仁等为不宜变更中执会迁鄂决定致蒋介石等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4 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5 页。

⑯《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 13 次会议记录》。

⑰同上书。

⑱《中华民国史事举要》（初稿）（1927 年 1 月至 2 月），第 102 页。

⑲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 1973 年影印版，第 539 页。

⑳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2 月 17 日）。

㉑《革命生活日刊》（1927 年 2 月 23 日）。

㉒《中华民国史事举要》（初稿）（1927 年 1 月至 2 月），第 234 页。



反对独裁、恢复党权运动的开展

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极度愤慨。他们有感于“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之集中于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受党的指导，而只受军事机关的支配”①。从1926年底开始，武汉国民政府发起了一场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恢复国民党党权的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恢复和提高党权，来抑制和反对蒋介石实行个人独裁。

1926年10月15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区及海外支部联席会议，就曾针对当时蒋介石进一步膨胀总司令职权，以军驭党，操纵党务、政务的情况，通过了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制定和实行左的政纲等重要决议案。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并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同时，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工农运动的开展。

1927年1月1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建议政府召集湖北省民会议，希图通过国民会议和省民会议，压抑为蒋介石等少数人控制的国民党的军权、党权。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10次会议提出“提高党权案”，进一步酝酿深入开展提高党权的运动。6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致电蒋介石，针对他改都南昌的通电，明确表示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应按照既定策略办。1月下旬，汉口反英运动委员会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在1月上旬提出的成立湖北政治分会、取消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反动主张。

1927年2月9日，国民党中央高级干部会议在武汉举行，会议决定：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拥护三大政策，扶助农工运动；召开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一下简称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推举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②。这次会议意义重大：第一，将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为中心的提高党权运动，提高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高度；第二，发动全体国民党党员

投入到反对军事独裁、提高党权的斗争；第三，组织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行动委员会，从而保证了各项决议的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正式将宣传口号“拥护蒋总司令”改为“拥护中央的领导”[③]，于是，提高党权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2 月 10 日以后，国民党中央在一系列会议及各种活动中都反复宣传巩固中央权威、迎汪复职、扩大民主、反对独裁等的主张。

2 月 11 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题为《时局进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的社论，论述了提高党权的重要性及如何提高党权等问题，号召：“我们为了革命利益，应该一致起来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能领导一切实际工作。”[④]2 月 13 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举行了联席会议。与会者指出，国民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不仅“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且具有一种独裁的趋势”[⑤]。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在会上着重说明了如何挽救国民党本身出现的独裁趋势和危机，即国民党左派人士动员武汉的国民党员和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提高党权运动，反击蒋介石。2 月 15 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 9 次会议。邓演达、顾孟余、叶楚伧、张太雷等 30 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的《党务宣传要点》明确提出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 6 项措施：第一，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第二，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实行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第四，催促汪精卫销假复职；第五，迅速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第六，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打倒昏庸老朽分子和官僚市侩。[⑥]

与此同时，国民党左派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呼吁提高党权运动。2 月中旬，邓演达发表了题为《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的社论，阐明了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性质和意义。他警告蒋介石，指出：“军事指挥者应该明白，自己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自己只有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判裁，才能增进党的权威，才能够用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军队……”否则，“那一定立刻失掉军事权威，立刻丧失政治的生命”。并号召忠于革命的同志，“认清目前的争斗，是恢复党权、增进党权，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从而团结起来，“为党的统一而争斗，为军事指挥、军事行政的统一而争斗”，“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⑦]。孙科也曾愤怒地指出：“蒋介



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8]。2月19日，孙科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的文章，指责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9]。2月底，徐谦也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怎样叫做个人独裁制》一文，驳斥了蒋介石对武汉联席会议的攻击，指出蒋的"个人独裁'是有种种事实证明的'"[10]。

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宣传，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27年2、3月间，迅速掀起了巨大的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拥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浪潮。

2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第七十五次常委会议，根据共产党人于树德的提议，会议决定接受武汉临时联席会议21日的决议，决定"即日用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如期来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11]

2月23日，《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发表。这个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批评了张静江以监察委员的资格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朕即国家"的反常状况。[12]

2月24日，国民党武汉各级党部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由董必武主持的党员大会，到会党员15 000人，到会群众20万人。董必武在开幕词中指出：开这个大会的目的是救党。现在国民党存在着"只看见军事上的力量，没有党的力量，只看见个人的意志，没有党的意志"等种种现象，这都是昏庸老朽分子操纵所致。因此，他号召到会国民党员和群众，"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13]。会上，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讲话，指出要打倒昏庸老朽分子，统一党的领导机关，要集中革命力量，让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中央及一切政治组织和民众组织；要恢复军事委员会，使军事领袖置于党的指挥之下。邓演达在发言中陈述了国民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谴责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并提出要打倒个人独裁和一切封建势力。指出："现在我们的中央完全为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所以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现在我们号称几十军，可能就有几十个意志，只有绝对服从党的指挥，才能统一。"[14]大会还发表通电和决议案，号召肃清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分子，拥护中央，加强中央权力，统一党的领导机

构，立即召开中央全会，欢迎汪精卫复职。这次大会虽然没有点名谴责蒋介石，但列举出来的问题都与蒋介石有关，矛头指向蒋介石及其同伙。会上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张静江”的口号。[15]当天下午，召开了庆祝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以及上海大罢工的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20万人之多。

与此同时，各地还有许多机关、团体纷纷响应武汉国民政府的号召，不断举行集会、发表通电，要求：“以党治国”，“本党应该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一切权利属于党”，“本党党员均应绝对服从和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等[16]，2月28日，武汉工人在响应全国总工会号召1小时反英罢工中，提出打倒张静江、谴责蒋介石的口号。

3月7日，国民党秘书长吴玉章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总理纪念会周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分析和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行为，并明确指出蒋介石是党政军权的篡夺者，是独裁者。[17]

3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总理逝世两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向蒋介石发出严厉的警告：“凡是独裁孤行，自私自利，不遵从总理遗训，不受党的最高机关指挥的党员，则无论他的历史如何长，资格如何老，地位如何高，我们都应该毫不客气地执行纪律，以维护党的权威，巩固党的基础，发挥党的作用。”[18]

但是，提高党权运动的深入开展，并没有能够震慑到蒋介石等的反动气焰。2月19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甚至说：“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者，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同时，他又蛮横的表示：“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19]随后，他更肆无忌惮地攻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他虚伪的表白：“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随即话锋一转，指出：“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20]2月21日，他在南昌总司令部举行的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会上发表演说，肆无忌惮的攻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这一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若要提高



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现在还有人说我们党里有独裁制的倾向……今日所谓独裁制，不知究竟是指什么东西？……我以为只有徐谦是实行独裁制的！"[21]这番话，无异是一个公开发出的反共、反革命的信号。但是，这时的蒋介石由于财政问题还未解决，还不敢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公然决裂。因此，他的态度不得不有所收敛。2月27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表示希望国民党人"一致接受"《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22]2月2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23]。同时，他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1星期召开。武汉方面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并随即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举行。

这场反对独裁、恢复党权运动，是在国民革命处于关键时刻发起的。它有效地揭露并抵制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分裂行为，拥护和捍卫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一场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同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场运动弄清了迁都之争的是非和实质，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由于武汉方面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还缺乏深刻认识，对蒋也只是限于口诛笔伐上的谴责，而没有从根本上限制或剥夺蒋的实权，致使这场本为反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运动最终转化成反共运动，中共成为了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注释：

①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Z］。

②《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的军政大事》，《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25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M］，第172页。

④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1日）。

⑤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

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6日）。

⑦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7日~26日）。

⑧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73页。

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

⑩《国闻周报》第4卷，第16期。

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75次会议记录》，1927年2月22日。

⑫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2 月 23 日)。

⑬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2 月 26 日)。

⑭邓演达:《在武昌国民党员大会上的讲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2 月 26 日)。

⑮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2 月 26 日)。

⑯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民国十六年)[Z]。

⑰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10 日)。

⑱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8 日)。

⑲上海《民国日报》(1927 年 4 月 16 日)。

⑳上海《民国日报》(1927 年 4 月 17 日)。

㉑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1927 年 2 月 21 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 ~33 页。

㉒上海《民国日报》(1927 年 4 月 23 日)。

㉓《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广州《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15 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国民党在国民革命战争高潮时期，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一次重要会议。

随着提高党权运动的开展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陆续来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也已迁至武汉，在汉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于是1927年1月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在鲍罗廷的建议下，作出了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①]，得到国民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热烈支持。

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这次会议，早在2月12日即向党内发出了通告，指示说："现在的武汉K. M. T. 中央政府联席会议诸人，以徐谦为领袖，坚决反对国民政府移南昌，反对蒋之个人独裁，他们预备在3月1日以前先在武汉召集一个中央会议，以免为蒋先发制人。自然这个汉口的会议，右派分子一定不肯来参加的，我们务须尽量帮助左派，使这个汉口会议能够开成。凡是我们同志之为K. M. T. 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或候补监察委员，均须前往出席。各地左派分子为中央执委及中央监委正式、候补委员而又反对政府迁南昌者，均须设法劝之赴汉，时机迫切，望各地接洽后立刻进行"。"我们当竭力帮助左派，宣传蒋之罪状，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惟各地宣传时须十分注意：A. 只能在口头上宣传；B. 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名字，而只是依据以上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反蒋"[②]。

会前，在南昌的大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先后来到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遂于3月7日下午在汉口南洋大楼开预备会。会上，谭延闿、陈公博要求等蒋介石来汉后再开，指出："蒋、朱（培德）同志本准备今日同来，因朱部出发在即，朱须到樟树亲自检阅部队，有一、二天耽搁，蒋等朱回到南昌，立即同来武汉参加大会"[③]，要大会延至12日开。这遭到与会的共产党人吴玉章、恽代英、于树德及国民党左派彭泽民、徐谦等

的反对。他们指出："人数既足，即可开会，不可以大会会期迁就个人，以损党之威仪"[④]，因为，原定3月1日开会，本是照南昌方面的意见，展至7日亦是顺南昌方面的要求，而且还在报上发表了通告，3月7日开会已是皆知，直至现在不来，是拒绝前来开会，不能再延。从而否决了延期开会的意见。结果，7日作为预备会，8日开提案审查委员会，9日开全体审查委员会，10日，正式于汉口南洋大楼三楼大厅举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在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上，徐谦首先报告了关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及其经过情况；接着，陈友仁介绍了联席会议期间的外交情况，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临时联席会议议决案认为继续有效案》，这些决议针对蒋介石等人对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攻击，肯定了它的合法性及其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并指出："对于去年12月中在武汉成立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认为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在该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以来之经过，为领导革命民众向帝国主义者努力进攻，而得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之结果，使国民政府对外威信得以提高，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解放运动得初步之成功，实足以证明临时联席会议为适合革命之要求。该临时联席会议现虽结束，但所有议决案，在全体会议认为继续有效。"[⑤]毛泽东和于树德针对当时蒋介石一手把持政治会议，并将它上升到"政治机关"地位的情况，建议在三中全会期间政治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赋予主席团全权办理[⑥]。完全堵死蒋介石可能对大会进行干扰和破坏的路。至此，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3月10日下午2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除蒋介石、张静江、李烈钧三人拒绝到会外，出席会议的委员有33人。其中有共产党人吴玉章、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恽代英、许甦魂、夏曦、董必武、江浩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徐谦、彭泽民等，左派力量占压倒优势。全会于17日胜利闭幕。可以说，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国民党左派会议。

3月11日大会根据10日通过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的有关规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改组结果如下：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9人：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5人，除常务委员9人兼政治委员外，



另有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林伯渠6人；并推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谭平山、宋子文7人组成政治委员会主席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6人：谭延闿、朱培德、唐生智、李宗仁、程潜、蒋介石、李济深、汪精卫、冯玉祥、张发奎、何应钦、孙科、邓演达、宋子文、徐谦、顾孟余。推举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介石、徐谦7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国民政府委员28人：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徐谦、冯玉祥、程潜、谭延闿、陈友仁、李宗仁、谭平山、钮永键、朱培德、唐生智、李济深、宋庆龄、顾孟余、蒋介石、柏文蔚、王法勤、吴玉章、何应钦、孔庚、彭泽民、经亨颐、黄绍竑、杨树庄、陈调元。以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中国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是：组织部长汪精卫（未到任前由吴玉章代）、宣传部长顾孟余、农民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长陈其瑗（陈不就，改选王法勤担任）、青年部长孙科、妇女部长何香凝、海外部长彭泽民。

3月12日因是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日，故大会休息一天。从13日～17日，大会继续进行。全会发表了《对人民宣言》、《对农民宣言》和《对全体党员训令》，通过的决议案有：《统一革命势力案》、《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统一财政案》、《统一外交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内蒙古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关于特别党部决议案》、《关于党员服兵役法征集委员会决议案》、《湖南省国民会议大纲及组织法》等20项。会议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特别是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予以极大的支持，批准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全会于3月17日闭幕。

3月13日，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在外交、财政、交通、司法4部之外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5部。

3月14日，会议通过了吴玉章提出的关于迅速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决定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抓紧筹备，从速决定召开日期。当晚举行的中央政治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苏兆征为劳工部长、谭平山为农政部长、顾孟余为教育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刘瑞恒为卫生部长。

3月15日，大会通过总政治部组织法，决定裁撤军人部，并推选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会上，丁超五所报告了“阳新惨案”详情，会议决议严厉镇压阳新县反动派。

3月16日，会议通过《对全体党员训令》、《对人民宣言》和《对农民问题决议案》等。在农民运动问题上，提出了十项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措施。全会还通过了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提出的《对农民宣言》，指出：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⑦。

3月17日，全会通过《统一外交案》、《湖南省国民组织法大纲案》等。当晚9点，会议胜利闭幕。

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等项决议，取得了以下重大成就。

第一，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恢复和提高了国民党党权。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决议案中：

《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明确规定不设主席，“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党的权力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⑧。这些规定，很明显针对的是蒋介石以军驭党、以军干政的独裁行为。会议剥夺了蒋介石的主席职务，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

《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的总内容是恢复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及职权，总精神是要把军权统一于军事委员会之下，完全受国民政府的指挥。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不受总司令指挥（军事委员会一切会议之表决，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行之）。此外，军事机关之组织，军饷之支配，军长之委任，由军事委员会负责。这样，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虽仍然保留，但其原先担任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等职均被裁撤，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这十分有助于防止军事独裁。

《对全体党员训令》中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之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指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不但使党内之昏庸老朽分子盘踞于内，官僚市侩及一切投机分子



乘机而人，因此纵成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谬误，妨害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治上之权威，形成党内投机腐化之倾向。”故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蒋介石军事权力进行限制，“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须集中于党”[⑨]，从而提高了国民党的党权权威.

第二，坚持和维护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分子，自“中山舰事件”以来，打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压制工农运动，严重地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全会明确指出；“我们继续并且巩固我们对于苏联的关系，苏联是诚意援助我们国民革命、民主革命的国家。”[⑩]全会表示要：“遵守总理决定之革命策略，诚意的与世界革命战线上先进之苏俄亲密联合”[⑪]。在《对全国人民宣言》中指出：“国民党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⑫]。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意义，即国民革命必须成功，我们的国家必须独立，我们的人民必须自由，帝国主义的宰割、封建军阀的压迫剥削必须打倒。它和共产党关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废止封建主义的压迫的最低纲领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时，全会谴责那些违背孙中山的主义和策略的人“实在就是帮助帝国主义与反革命。”[⑬]

应该指出的是，会上，不少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仍没有以武力作后盾，而只限于通过决议案去限制蒋介石。并且，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会议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使其保留着叛变革命的主要资本，得以继续进行反动活动。这为以后被动挨打埋下了隐患。

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虽然有种种缺陷，但其功绩是主要的。它有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和北伐的胜利进军。

注释：

①引自1927年1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

②转引自《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

③《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记录》（1927年3月7日）。

④《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训令及决议案》。

⑤《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

席会议决议案》。

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记录》(1927年3月7日)。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

⑧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

⑨参见《对全体党员训令》,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⑩《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2页。

⑪《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会通过对全体党员训令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96页。

⑫《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会通过统一革命势力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1~782页。

⑬同上书,第774页。



武汉、南京政府继续北伐

1927 年 4 月 18 日，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发表密令，通缉共产党人，东南地区全面“清党”，宁汉分裂。此时，已败退江北的张作霖、孙传芳及张宗昌及等北洋军阀，认为南军分裂，有机可乘，乃分路南犯。4 月上旬，张作霖指挥奉军入豫，4 月 3 日占领许昌，4 月中下旬连续占领临颍、郾城、西平、遂平。孙传芳率部袭击扬州，进占南通、靖江、如皋一带。张宗昌率部进犯滁州，围攻合肥，进袭六安，企图占据安庆，渡江进攻南京。这时的宁、汉政权，均面临着北洋军阀威逼的严重局势。

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极其困难。在军事上，处于奉系军阀与新军阀夹攻之中。东南，蒋介石在英美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以南京为中心，控制有苏、浙、皖、闽地区；西面，蒋介石收编并进行“清党”的刘湘、杨森、袁祖铭等川黔军，控制有鄂西、贵州、四川地区；南面，为李济深、黄绍竑粤桂军控制的两广地区；北面，奉系军阀张作霖于 1927 年 2 月，进兵河南，占领了开封、郑州，并集结重兵于豫南的许昌、郾城、汝南一带，准备对武汉发动进攻，妄图夺回吴佩孚丧失的地盘。在遂平、驻马店一带河南军阀的部队，以及吴佩孚的残余部队、湖北军和四川军阀杨森又拉上了关系，对武汉形成包围的局势。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各国支持蒋介石，对武汉地区采取了经济封锁的政策，他们除在江面麇集军舰，给武汉地区的对外贸易制造困难外，还关闭了他们在武汉开设的工矿企业。武汉的许多资本家也进行关厂罢业，停止贸易，抽逃资金，囤积粮食和制造金融混乱等破坏活动。造成武汉地区若干工厂、商业停闲，交通航运断绝，物价疯涨，工人大批失业，武汉政府和财政发生严重困难。武汉政府虽采取种种措施，如集中现金、禁止现银出口、救济失业等，进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但未能有效扭转日益严重的局势。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和从农村逃到城市的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大肆散布各种诬蔑工农运动的谣言，猖狂地进行破坏工农运动的活动。他们借湖南农民协会处置了几十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分子大

造谣言，诬蔑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拼命进攻农民。反映到军队和政府，引起武汉政府及国民革命主力唐生智湖南军内部，出现了强烈的不满甚至公开反对农民运动的情绪。武汉政权上层人物，除邓演达、宋庆龄等少数人坚定地执行国共合作政策外，多数离心离德，徘徊歧路，有的与南京密使往来，脚踏两只船。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各种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下，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严重危机。

当时，如何打破新旧军阀的军事包围，成了武汉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武汉政府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唐生智、张发奎等主张先东征讨蒋。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并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已成为南方反革命的中心，应乘其基础尚未巩固的时候，速袭南京，则长江下游问题也易于解决。[①]汪精卫、徐谦、顾孟余等主张先北伐，他们希望与蒋妥协，开辟西北走廊，联络、接应冯玉祥，摆脱困境。不久，唐生智的态度也有变化，如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我在武汉，主张除了声讨蒋介石外，还是坚定不移地进行第二期北伐。只要取得北伐的胜利，要收拾蒋介石也不难，我这时最主张努力的，还是第二期北伐。”[②]很明显，北伐的主张在武汉政府内部占了上风。

关于东征还是北伐，共产国际代表和前苏联顾问团内部，也出现了多种意见。斯大林认为武汉政府必须对奉军进攻，至少有两个原因：一、奉军已向武汉进发，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二、武汉派想和冯玉祥军队会师，借以向前推进和扩大根据地。夺取上海不像夺取郑州，要经过激烈战斗。因此，“首先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加紧瓦解蒋介石的后方和前线，然后将上海问题全部提出”，“这样做是比较适当的”[③]。加伦也认为，在中国现在存在北京张作霖、南京蒋介石、武汉革命军三个政权鼎立的形势下。如果东征，张作霖必会乘虚南下，中下级军官则认为这是自己打自己，士气不易振作，是冒险行为。如果北伐，可解除张作霖威胁，并可将潼关内冯玉祥的势力接应出来。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鲍罗廷主张东征，他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怎样谈到北伐。目前，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立足。刚由莫斯科经广州、长沙于4月3日到达武汉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鲁易主张：“不征不伐，在两湖深入革命”[④]。但4月14日，河南国民革命军靳云鹏部反击奉军失利，急电武汉求援。此情发生后，



鲍罗廷态度急转，主张立即北伐，他说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张侵袭危险。武汉军队先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奉军，然后决定第二步。

在中共中央内部，对军事上的战略决策，意见也很不一致。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赞同鲍罗廷的主张，即先北伐后东征，理由是：帝国主义在东南势力太大，东南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势力的中心，蒋介石正封锁武汉，帝国主义干涉也迫在眉睫，如不北伐没有出路。北伐可与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会师河南，然后同冯玉祥共同建立西北根据地，打通与蒙、苏的国际联系。土地革命可等到打到北京后实行。先扩大地区，再深入革命。陈独秀主张北伐到郑州后，再从陇海路东征。谭平山、张国焘主张先南伐广东，这样可以取得海港，打通国际联系，既有利于解决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又能在军事上摆脱被围困的境地，而且南伐士兵积极性高，敌人力量也比较薄弱，群众基础好，易于取胜。这是一种保守和退却的主张。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等同志，向党中央发出了一封紧急建议书，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建议书历数了蒋介石的“叛迹”，指出了蒋介石占有沪杭与帝国主义结合的严重危险性，分析了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困境，批判了对蒋介石妥协的机会主义立场，从而得出结论说：东征讨蒋是挽救革命唯一正确的主张，而继续北伐则“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而无疑”。这个建议的核心思想，是把战略打击的重点放在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政权上，把战略地区由向北转而向东。这是一个大胆的战略构思，但与当时党中央多数决策人的主张相反，因而被否决了。瞿秋白同意先打南京，但他主张占领南京后，就沿津浦路北上，而避免在上海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战。蔡和森的意见是有条件的北伐，即主张挥师南下，既不东征，也不北伐，而是恢复广东根据地，在两湖两广发展土地革命，控制粤赣后，再从内地包围宁沪。由于党中央多数人的意见不同意东下，所以出兵北伐的主张也逐渐占了上风。

4 月 16 日，汪精卫召集在汉的国共两党中央委员联席谈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顾孟余、孙科 5 人，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鲍罗廷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几次商量的结果都是关于应付现在时局的方法”，并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一是积极北伐，二是肃清东南的反革命派”[⑤]。武汉政府在东、南、西三方面采取守势，与国民军相配合对北面的张作霖发动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军事包围，扩大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然后再讨伐蒋介石。

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军事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在冯玉祥军队从西向东进攻的同时，武汉北伐军由南向北进攻，在郑州、开封会师；第二期计划是在会师后，能得到阎锡山的支持，由冯玉祥率领的军队再向北京挺进，彻底摧垮张作霖的部队，而武汉的北伐军则即时回师东征和南征，占领南京、上海和东南各省。

为执行第一期军事计划，武汉政府以唐生智和张发奎部队为北伐军的主力，由唐生智任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统率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官张发奎，指挥由他任军长的第四军、第十一军以及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共有22 000多人，任右翼，经汝南、上蔡进攻开封、归德。第二纵队司令官刘兴，指挥第三十五军（为总预备队）、第三十六军和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一部分，共约22 000人，任中路；第三纵队司令官魏益三，指挥豫南之贺国光、庞炳勋、任应岐等部，为左路军，沿京汉线西侧地区前进。

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同时，1927年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将西北所能统率的军队重新整编为六路军，由西向东进攻，准备与第四方面军会师中原。阎锡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率军从太原出娘子关，进击京汉铁路北段，切断奉军的后路。

北伐部署既定，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飞机场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典礼，宣布继续北伐。各军也于4月底完成了在信阳和驻马店附近集中。5月13日，北伐军下达总攻击令，开始与奉鲁军展开激战，其中以西平、上蔡、临颍三次战役最为激烈。

西平战役。5月1日，刘兴率领第三十六军由广水进抵驻马店，原拟会合豫军靳云鹏部，向郾城、漯河之敌攻击而北上，但敌方早有准备，奉军一面勾结豫南反动分子，利用土匪假冒红枪会，在平汉线破坏交通、扰乱后方，使北伐军集中受阻，一面自郾城南下，直薄西平、遂平，并包围靳云鹏部于驻马店以北地区，情势十分紧张。三十六军接到总攻击令之后，立即对当面之敌，施行反包围，与敌铁甲车及骑兵几次激战，于14日占领焦庄，肃清了西平附近铁路沿线之敌。15日，经过反复争夺，占领西平车站，敌退守西平城，闭城固守。16日，北伐军全力猛攻，于17日攻破西平城。敌溃走郾城，沿河岸固守。北伐军于5月20日克漯河，集三师之众，三路渡河，攻击郾城，敌退临颍。在西平战役中，破敌阵地10余处，毁敌精锐7



团以上，毙敌3 000，北伐军伤亡千余，取得了重大胜利。

上蔡战役。5月14日下午，北伐军第二十五师在蔡部口东北地区与奉军第十二旅接触，经激战后，敌退至上蔡城郊。15日晨，上蔡西门外之敌反攻，被击退。北伐军进占上蔡外围之西洪桥、水寨。16日至17日两军在东洪桥、西洪桥、水寨等地进行激战。由叶挺独立团改编的七十三团猛打猛攻，击溃了西洪桥方面之敌。随后，水寨、东洪桥方面的敌军也全线溃退。北伐军包围了上蔡城。守城之敌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二旅旅长富双英被迫投降，接受改编，北伐军遂和平进占上蔡城。上蔡战役“其牺牲之巨为素来所未有”[⑥]，但我军也获得巨大胜利，伤毙敌约3 000，俘敌数百人。这次战役“植二次北伐胜利之基”[⑦]。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嘉奖，指出经过此役“第一期会战胜利完全达到”。

临颍战役。奉军自失去漯河天险之后，调大批兵力集中于临颍，企图由漯河城长驱直下，直逼武汉。张学良亲赴前线督师，撤换军长赵思臻，枪决旅长一名，团长三名，企图以此振奋溃退之军队。奉军司令部急调开封、郑州第十军及由郾城方面退来之第十七军大部与第八军残部及飞行队，共计6万余人。调集所有坦克、轻重迫击炮于临颍的同时，修筑环城20余里坚固工事，作最后抵抗。

27日晨，北伐军第四军十二师，第十一军十师、二十六师，三十六军以及独立十五师分途向临颍前进。下午2时，十二师前进至十里头附近，与敌警戒部队接触，十二师借驱敌警戒部队之机侦察敌情。下午7时，北伐军向北里头攻击，步步逼近敌军，因敌有大部队驻扎在北里头附近，至9时许，两军相持于此。北伐军令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蒋先云所部开赴新庄，抄敌左翼，待拂晓一齐动作。28日拂晓，北伐军全线进击，因敌众我寡，加之敌器械精足，工事坚固，地势优越，双方交互冲锋，几成混战状态。虽正面之军奋勇拼杀，但仍不能破。此时抄敌左翼之蒋先云阵亡，官兵伤亡2/3。遂派七十六团增援，又先后急调七十一团和十师增援。下午2时，十师先头部队到达阵地，经北伐军猛攻，敌全线动摇。坚守北里头之北伐军亦乘机反攻，敌军大败，即弃临颍城而逃，是日晚，第十一军二十六师进驻临颍城。此役，歼灭了奉军在豫的主力，为占领郑州、开封铺平了道路。但北伐军也伤亡过半，仅十二师就死伤8 000以上。

奉军在临颍战败后，被迫向许昌退却。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北伐军乃选编精锐组成挺进队，以铁甲车为掩护，沿京汉路向前急追。北伐军飞

机队也进行侦察和轰炸。5 月 29 日，右路军第四军一部占许昌。中路军第三十五军、三十六军沿京汉路向郑州追击，30 日克新郑，6 月 1 日进郑州。张发奎部于6 月 1 日占开封。

冯玉祥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奉4 月 6 日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于4 月20 日出潼关，5 月26 日克洛阳，30 日进郑州。张作霖见前线作战失利，阎锡山已于4 月转变态度，支持北伐，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方受到威胁，乃于31 日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全线撤退，放弃郑州、开封、徐州，退守直隶山东。至此，黄河南岸全为革命军占领。

在武汉北伐军出师河南的同时，4 月底，南京国民政府为完成北伐，争取冯玉祥，也继续进行北伐，攻击直鲁军张宗昌部及孙传芳部。5 月 1 日，总司令部拟制三路北伐计划：第一路司令官何应钦，指挥第十四、十七两军及一、二十六两军之一部，由镇江、常熟渡江北进攻扬州，趋淮海。第二路蒋介石兼总指挥，白崇禧代理，陈调元任前敌总指挥，率一军之一部及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军，由浦口渡江北上，沿津浦路正面作战。第三路指挥官李宗仁，率第七、第十、第二十七、第四十四军及第十五军之一部，与原在皖北之马祥斌之三十三军，王金韬之独立师，分为五个纵队，由芜湖渡江北上，攻击浦口直鲁军侧背，北上解六安、合肥之围，联合进攻陇海路，截断孙传芳与河南奉军之联络。5 月 13 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第一路军于5 月20 日渡江，22 日克仪征，23 日克扬州。第二路军各纵队分别于11、13、15 日渡江，16 日攻克全椒，18 日克滁县。第三路军于5 月 11 日开始向敌追击，出芜湖、安庆、六安等地。19 日克定远、明光，20 日克临淮，21 日占蚌埠。5 月24 日，蒋介石下达追击作战计划：一路军追击孙传芳部，于5 月 5 日起，连克南通、如皋、泰县、邵伯、东台、高邮诸城，6 月 5 日克淮安、阜宁；二路军追击孙传芳部，6 月上旬收复泗阳、清江浦、新安镇、海州等地，敌退入鲁境郯城、台儿庄地区；三路军，于5 月 25 日克复六合。因武汉北伐军消灭了奉军主力，张作霖下令全线撤退，直鲁军张宗昌部不得已放弃徐州，李宗仁之王天培第十军不费一弹，进入徐州。至此，苏皖地区已无敌军。

这个时期既是继续北伐的过程，又是宁汉双方拼命争夺势力、积聚力量，待机消灭对方并准备决战的过程。无论东征，还是北伐，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瓦解南京政权等重大任务，无论如何应该成为武汉政府和中共中央迫在眉睫的大事。



注释：

①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123页。

②《唐生智回忆第一次大革命》，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二期。

③《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9～230页。

④李立三：《党史报告》，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52页。

⑤《中国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

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⑦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郑州、徐州会议

1927 年 6 月初，武汉国民政府的部队连续攻克河南重镇郑州、开封等地，第二次北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唐生智以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分别电请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请负责同志赴前方指导政治”。汪精卫接电后，立即召集政治委员会会议。经会议决定，由“政治委员会主席团赴前方指导”。当时，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在汉的共有 6 人：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谭平山。按决定精神，理应全体赴郑，但汪精卫却以谭平山需留汉处理湖南问题为借口，阻止谭平山参加。

从会议的地点和参加的人员来看，这次会议是避开了革命的政治中心，避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当时，宋庆龄已觉察到汪精卫别有企图，她严肃地指出：武汉是中央所在地，冯玉祥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到武汉去开会，哪有中央领导到郑州移樽就教之理。[①]汪精卫等不听劝告，于 6 月 6 日，连袂赴豫。同日，汪电令正在河南前线的邓演达，西去潼关迎接冯玉祥。8 日，汪精卫一行十余人等抵郑，9 日，冯玉祥由邓演达陪同抵郑。

汪精卫此行的目的，在于通过与冯玉祥会谈，争取冯玉祥支持其反共反蒋计划，企图以反共来稳住正转向反动的军官，并以反蒋来谋求武汉国民政府的出路。汪“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②]，指望在和国民军会师后，让国民军沿陇海路东进，武汉军队顺长江东下讨蒋；同时，把河南事务交给冯去处理，武汉部队全部撤回，以便全力对付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于是，郑州、开封的克复，第二期北伐的胜利竟成了汪精卫集团蓄谋分裂统一战线，“清党”反共、叛变革命的契机。

会址设在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内。武汉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顾孟余、孙科、徐谦、唐生智、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张发奎；国民军方面有冯玉祥、鹿钟麟、于右任、刘伯坚、刘骥；另外还有苏联顾问加伦等。



从10日到11日，双方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共开了六次，主要讨论了军事、政治、党务及农工运动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会上，汪精卫集团一面发泄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不满，攻击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他的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他们叫嚷要对共产党“严厉制裁”[③]。一面又指责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权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④]。冯玉祥对共同反蒋问题不作正面回答，只是一再表示：“希望今后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⑤]。至于国民军对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态度，冯玉祥声明：国民军完全为国民党化的军队；绝对拥护及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之一切议决与命令；并遵奉中央命令，讨伐奉鲁军阀。[⑥]在这个声明中，冯玉祥玩弄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花招。因为，他所指的中央和国民政府，既可以认为是武汉的，也可以认为是南京的。可见冯的态度十分暧昧。在所谓“清党”、分共问题上，冯玉祥则和武汉诸人的观点趋于一致。在会外，何键、孙科、顾孟余、徐谦等人总是围着冯玉祥，向他耳里灌输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的陈词滥调。何键为迎合冯玉祥的心理，专门捏造革命军人受害的谣言。徐谦也大放厥词，污蔑共产党“残暴”；鲍罗廷“专横”；武汉“秩序混乱”等等。他建议冯出面要求武汉政府驱逐鲍罗廷。他还表示自己再也不愿回武汉去。由于冯和徐私交甚厚，他俩曾以基督教结为同志，冯对徐一向是言听计从，所以，冯听了徐谦的一番指陈，“大为动容”，表示要立刻“清党”、分共。

汪精卫看到拉冯反蒋不成，很生气，有几次会就不参加。但他毕竟不敢公开得罪冯，所以在讨论河南省政府的党务、政治、军事等问题时，都满足了冯的要求。会议议决，党务方面：撤销北京、西安两个政治分会，另设开封分会，主要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以冯玉祥为主席，委员有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刘伯坚、薛笃弼、郭春涛、杨明轩等11人，并聘请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分会顾问。政治方面：决定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委员会，以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其后于不就任，由石敬亭代理），刘郁芬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军事方面：第一，裁撤原由靳云鹏等率领的河南地方武装—河南保卫军，交由冯玉祥改编，原北伐军樊钟秀、梁寿恺、任应岐，蒋世杰、王迫文、王耀所部归冯节制；第二，承认冯玉祥在北伐战争中扩编的七个方面军，并任命孙良诚、靳云鹏、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

别担任七个方面军的总指挥。第三，由冯玉祥负责肃清豫西匪军，第四方面军（包括第四、十一、三十六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

以上决定表明，汪精卫为了拉拢冯玉祥，慷慨地把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交冯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政府的支持。6 月 11 日中午，当会议甫告结束时，汪精卫忽然接到朱培德自汉口的紧急密电，说是冯已和蒋秘密联合，对汪等将有不利的举动，要他们速回武汉。于是，汪精卫一行于 11 日深夜，背着冯玉祥，匆匆南返。冯玉祥对此感到突然，事后专门派参谋长刘骥速去武汉，探询原因。会议就这样草草收场，不欢而散。

会后，唐生智班师回汉，执行镇压两湖工农运动和“制裁”共产党的反革命任务，这就为汪精卫集团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聚集了大量的武装力量。

郑州会议是一次反革命势力进行政治交易的会议，会议的双方各怀自己的政治目的。汪精卫拉拢冯玉祥，名义上是反蒋，实则是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便同蒋介石讲价钱，冯只是汪手中对付蒋介石的一张王牌。在郑州会议上，起主要作用的则是冯玉祥，如果冯玉祥坚持反蒋，则可以利用汪、蒋之间的矛盾，打击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但是冯玉祥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愿东征，怕失掉西北的地盘，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感到不安，怕影响军饷给养来源，因此竭力调停汪、蒋合流。这又反映了汪、冯之间仍互存戒心，只不过是貌合神离罢了。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已扩充为十个方面军，号称 50 万，是几个集团军中人数最多的部队。要维持如此庞大军队的给养，单靠武汉政府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南京政府。再从国民军所处的战略地位来看，国民军“虽得有豫省，然其身处四战之地，顽敌当前（奉鲁军阀），且心腹之患，处处皆是”深感“种种掣肘之苦”。在这种形势下，“如宁汉一旦开战，奉军必卷土重来，他首当其冲，孤立无援，力量不足，势非失败不可”[⑦]。有鉴于此，冯玉祥认为只有宁汉合作，一致北伐，才有可能打垮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国民军也就有可能在河南立足。郑州会议一结束，武汉部队撤走，部署东征战事，宁汉之战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冯玉祥更感到必须立即同蒋会谈，解决宁汉争端，共商北伐大计。

6 月 14 日，冯玉祥派李鸣钟面见蒋介石，报告郑州会议经过情况，同时转达了冯玉祥欲和蒋会见的愿望。蒋听后，当即决定在徐州和冯会晤。

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刻和冯玉祥会晤，主要是根据军事发展的需要。在武



汉部队攻克郑、汴的同时，南京部队也于6月2日占领了蚌埠、徐州。宁、汉双方的军事主力都在反奉的名义下集结于陇海线上。南京方面要想继续前进，直捣幽燕，必须克服来自奉系军阀和武汉方面的障碍。张作霖在失去郑、汴、徐三大战略要地后，亟谋作最后挣扎。为此，张作霖于6月18日匆忙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成所谓安国军政府，从而取得了调遣各路军阀部队的权力；加紧重整旗鼓，急调东三省部队入关，以全力对付国民革命军。这样，南京部队面临的对手，不再是各个分散的军阀队伍，而是联合起来，接受张作霖统一指挥的安国军，因此难于继续向北推进。加上郑州会议后，武汉部队加紧进行东征部署，对南京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推测武汉“以豫交冯，而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也”⑧。他担心一旦武汉部队顺江东下，南京必然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如何走出困境，蒋介石把目光投向了冯玉祥。因为冯的国民军在进入河南后，经过扩编，力量大增，在宁汉之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能争取冯的支持，实现蒋、冯合作，北可合力攻奉，继续北伐；南可牵制武汉，甚至吞并武汉。

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即联冯制汉，继续北伐。为此，他在会前，作了周密的安排，16日，蒋介石亲自偕李鸣钟、方本仁等到达徐州，进行会前准备工作。同日，蒋正式致电冯玉祥，邀请他来徐州会商大计。冯接受蒋的邀请，电告蒋，他将于19日赴会。蒋接电后，又急电南京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朱绍良，令他立刻“转告稚晖、石曾、惕生、协和、孑民、膺白、展堂、静江诸公来徐共商一切。”⑨在蒋提出的参加会议的人员中，黄郛曾在北京政变时期任摄政内阁总理，和冯的关系较深；张继、吴稚晖、李石曾等在北京政变后，和冯过从甚密；李烈钧曾担任过冯的高等顾问。蒋介石试图通过这些人拉拢冯玉祥。蒋介石还决定会议要以最高级会议的形式举行，以表示南京方面对冯玉祥的尊重。

19日，冯玉祥在卫队的护卫下，前往徐州。他的出行很诡秘，为了蒙蔽视听，他在准备出发时，先令陇海路局备车西行，等他们登车后，又发令火车东开。当天，冯抵徐州。蒋介石偕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迎于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是晚，蒋在徐州东门大街花园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为冯洗尘。宴会上，首先由蒋介石致欢迎词，他说：“今在徐州得与冯同志及各政委会晤，实为中国危而复安之一大转机，”表示对冯的到来，“竭诚欢迎。”接着由冯玉祥致答词，他吹捧蒋介石“不避劳苦，决心北伐，

故能得今日革命伟业，不但救军阀虐待下之民众，亦且救我西北军。”他表示：“吾辈当共同誓死牺牲，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10]。

为了拉拢冯玉祥，蒋介石对冯关怀备至。他了解到冯军给养困窘和冯本人力主调和宁汉纷争，以贯彻北伐初衷的迫切愿望，从而认定“大力接济”和“继续北伐”是争取冯玉祥的两个关键问题。冯在郑州时，曾向汪精卫提出，要求武汉政府每月给他军费三百万元。而汪只答应给一百五十万元，后来，实际上只凑了六十万元的纸币给冯，这使冯玉祥十分气恼。蒋介石则主动表示，对冯的困难，当竭尽全力“解囊相助”，还答应自7月份起，由南京政府按月拨给冯军军饷250万元。另外还馈赠50万元犒赏冯军。蒋介石的慷慨支援，使处于困境中的冯玉祥感激不已。冯当众表示：“本人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11]。

20日蒋介石和冯玉祥正式举行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胡汉民、蔡元培、张人杰（即张静江）、李煌流（即李石曾）、李鸣钟、何其巩、黄郭、钮永建、李烈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敬恒（即吴稚晖）等。会议由吴敬恒任主席，徐州会议议程共八项：（一）党之问题；（二）目前政治建设问题；（三）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四）继续北伐问题；（五）武汉政府问题；（六）政治部改良问题；（七）国民会议筹备问题；（八）军事问题[12]。除第六、七两项未及讨论外，其余六项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的中心是北伐和所谓“清党”。关于北伐，蒋介石希望冯玉祥与他合作，先对武汉用兵，清除内部之忧，再移师北伐。但冯玉祥认为当前国民革命的真正敌人是奉鲁军阀；宁汉之间的冲突是内部问题，不宜诉诸武力；况且武汉已经开始“分共”，宁汉之间也就不再存何分歧，如果此时“国民党自相残杀，殊无谓也”[13]，势必给敌人造成反攻的机会，北伐大业有功败垂成的危险。他表示自己愿对宁汉双方负调停之责。关于继续北伐，冯玉祥提出两项主张：（一）“联晋制奉”。他认为“晋阎实力不能敌奉，现闻奉方三路攻晋，晋必不支，宜援助百川，以牵制奉张”；（二）“消除内部隔阂”。他认为“目前军事胜利，宁汉双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14]。要求“武汉军队仍须回至河南，加入前线，共同一致完成国民革命”[15]。蒋介石同意冯的主张，并制定了联合作战的具体方略。关于“清党”，蒋、冯之间没有分歧。冯玉祥声称，党必须统一，“不许武汉党部存在，武汉方面的忠实同志，希望他们迅速来南京和我们合作奋斗，不要被人利用”[16]。会议作出决定，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由冯先发一电向武汉



提出警告。蒋介石要求冯玉祥在国民军中及其辖区实行“清党”；冯表示回去后即着手进行。

21日，蒋冯在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他们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宣称“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誓：为了“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决心做到“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17]。实际上，他们已经践踏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玷污了孙中山举起的国民革命旗帜。

徐州会议是一次带有决策性的反革命会议。事后，蒋介石曾说：“吾们党国最重要的就是徐州会议，吾党之存亡有关于此”[18]。他认为这次会议对其“党国”的存亡、成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1日，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一面重申，对于武汉诸要人在郑州会议上表现的反共态度表示赞许；一面指出，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说明宁汉双方在反共态度上已经趋于一致，因此，双方“应通力合作”，“对于个人有何意见，悉请完全化除。”他要求唐生智“立即调集所部于郑州，以与冯玉祥所部将士协力北伐，先定幽燕。”最后要求武汉汪精卫集团“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清党”“分共”[19]。当时《国闻周报》就评论说，这篇电文措辞强硬，无疑是“蒋冯的哀地美敦书”，限令武汉立即实行分共。冯玉祥在会后又单独发表了《敬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党书》，公然要共产党“暂时退出国民革命之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之阶级斗争，”并建议苏联为避免“被人误会为另有阴谋，不如及早将处事不善者退去。”[20]意思是要苏联召回在中国的顾问。

徐州会议是蒋介石策划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重大步骤。它表明，冯玉祥已经完全被蒋介石软化，走上了反苏、反共、反工农的反革命道路。冯玉祥在宁汉对立的问题上，由中立转变为倾向蒋介石，这就使武汉国民政府陷于空前的孤立。同时，由于蒋、冯的施压，汪精卫集团加快了反共清党的步伐。就这样，冯玉祥用共同“清党“这条线，把蒋介石汪精卫联在一起，进行宁汉合流的酝酿，从而加速了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的步伐。

注释：

①《光明日报》(1981年6月1日)。

②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页。

③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④同上书。

⑤同上书。

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5日)。

⑦简又文:《西北从军记》,《传记文学》第20卷第2期,第63~64页。

⑧《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1479页。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台北)译印。

⑨《蒋介石自徐州发往南京的电报》(1927年6月16日)。原件存湖北省博物馆。

⑩天津《益世报》(1927年6月26日);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24日。

⑪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24日)。

⑫吴稚晖:《徐州会议报告》,1927年6月24日。

⑬《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第477页。

⑭《冯玉祥日记》卷8,第55页。

⑮《蒋介石先生演说集》(5),第17页。

⑯《蒋介石先生演说集》(5),第171页。

⑰《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25期。

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办事处编:《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49页。

⑲《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25期。

⑳转引自高兴亚:《冯玉祥将军》,第104页~105页。

蒋介石被迫下野

蒋介石南京政权的建立，不仅没有结束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使得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当时，出现了宁、汉分裂对立的局面，并存在着蒋、冯、阎、桂四大新军阀集团，及其他各种派别。他们各霸一方，各自为政，互相争斗。其中，对蒋介石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汪精卫集团和桂系势力。

蒋汪纷争，历来已久，从中山舰事件就开始公开化。两大集团虽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达成一致，但为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却展开了激烈争斗。当时，依附于蒋的正规国民军只有何应钦第一军、李宗仁第七军和程潜第六军的一部分，其余都是收编的杂牌军队，总兵力只有 20 万人。而武汉政府拥有八个正规国民革命军（后程潜也离蒋率部归来）。因此，蒋政权在南京一建立，即被武汉政府视为叛逆。汪精卫集团以合法的国民党中央自居，并坚持要将南京统一于武汉中央之下，指责蒋介石"目中无党""军事独裁"，要"国民党与蒋介石誓不两立"，表示"非除蒋不可"[①]。而蒋氏南京政权则不肯与刚刚脱下左派伪装的汪精卫合作，更不承认"汪记"中央为正统。

与此同时，宁方蒋、桂冲突日益公开化。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自北伐以来，军事实力迅速扩大，军队人数已超过蒋介石的嫡系，在进军湖南、夺取武汉及蒋底定上海中都立下汗马功劳。1927 年，帮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血雨腥风中又建立起了南京政权。但新桂系不甘心对蒋称臣，尤其是对蒋搞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行为极为不满，遂有取而代之的意图。桂系军阀功高盖主，引起蒋介石的猜疑，于是，蒋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因与白崇禧私交甚厚，固拒不执行蒋的命令。蒋认为"何已经软化"，二人关系紧张起来。蒋的其他杂牌军也都是脚踏两支船，看风使舵，并不完全听蒋指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会晤时谈到："革命军成分复杂……如果大敌当前，可以团

结，一无敌人，就要分裂，驾驭这些队伍真是费尽心机。"[2]

为打破困局，蒋介石妄图以军事的胜利扭转政治的被动，决定继续北进。1927 年 6 月 19 日，蒋下达北进攻击令，23 日，宁军开始向鲁南一线发起攻击。但攻势刚一展开，27 日，蒋介石以汉方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准备东下为由，下令鲁南一线部队改攻为守，除留部分前线部队分道镇守鲁南各要隘外，其余各部均开始南撤。时第三路王天培部深入到鲁南津浦路沿线地区，由于阵线突出，极易招致攻击。王天培原属黔军将领，参加北伐后，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约 1 万余人。随第七军东下途中，势力迅速壮大。蒋介石为保卫南京，将一军主力部队全部调来防御，造成徐州空虚。7 月初，张宗昌、孙传芳策划乘宁军后撤之机，在鲁南发动反攻。王天培部首当其冲，受到强大压力。加之部队薪饷未照常发放，士兵闹饷，战斗力不集中，在张、孙联军进攻下，很快败退，其扼守的鲁南滕县、临城据点相继弃守。

此时，白崇禧在鲁东南全力进攻，当得知滕县、临城弃守后，于 7 月 7 日致电王天培等，要求其"仍向滕县前进，夹击此敌，以攻为守，以进为退"[3]。在白的压力下，王天培会同第四十军反攻临城，与孙、张联军在滕、临一线全力相拼。临城相当坚固，且有敌人重兵防守，故攻城战役打得十分艰苦。第一日，王部从晨至晚发动十余次攻击，均未奏效，部队伤亡较大。翌日，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城，枪炮之声震耳欲聋。激战中，敌人突然出动白俄铁甲车，以炽烈炮火向攻击部队射击，一度造成相当伤亡。以后王部集中炮火轰击敌铁甲车，迫使其狼狈缩回城内。战至午后，敌人力渐不支，而王部攻势则愈加猛烈。遂收复临城，但第十军元气大伤。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指出，此次"战争之烈，为渡河以来所未有"[4]。

18 日，孙、张联军全力向临城发动反扑，第十军久战疲乏，并受后方部队撤退影响，"前线将士多摇动"[5]。加之该路主力第七军已后撤，失去纵深保护，以致经敌军一攻击，鲁北防地随即全线告失，王氏被迫令"全部集中徐州一带"[6]。此时军心涣散，将无斗志，王本人也抱怨："当此前抗大敌，友军后退，实属万难"[7]，全军上下对守徐缺乏信心和决心。24 日，徐州不战而弃。

徐州乃苏北门户，徐城弃守，苏北、鲁南全线动摇，白崇禧也被迫从鲁东南地区后撤。7 月 22 日，孙传芳表示："倘在此时期，乘胜肃清江北，再与蒋言和，似亦不难就范。"[8]江北面临着全线崩溃的危险，使蒋介石不得不



重新移目于徐州的攻防战。

1927 年 7 月 25 日蒋介石专程北上，亲临徐州督战，并发誓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26 日，蒋下达作战命令，以第二路、第三路左、右两翼分由东、西、南三面“向徐州分进合击”[⑨]。第二路总指挥仍为白崇禧，第三路总指挥蒋自兼，王天培、贺耀祖分任所属左、右两翼总指挥，第二十一师为总预备队。

当时，各部均距徐州不过百里左右，蒋介石希望乘敌军新下徐州、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收复徐州。他致电王天培强调：“现敌人大部均集中于中路，左翼空虚，该军第三十师应迅速由阎村一带袭取徐州，攻敌人之虚而拊其背。”[⑩]。王天培率部随即迅速北进，8 月 1 日下午，进抵徐州城郊，是夜，前锋直抵徐州城下。

与左翼顺利进攻相反，自东向西沿陇海路前进的第二路却迟滞不前。第二路参战的第三十七、四十四两军均非该路主力，不仅战斗力不强，进攻决心也不够。

担任正面攻击徐州任务的是第三路右翼，蒋介石随该路行动，并调来预备队二十一师。该路战斗力较弱，行进也“颇行迟滞”[⑪]。经蒋一再督促，并以亲信部队第二十一师前顶后，始于 8 月 1 日由徐州南面进抵徐州城郊。2 日，左、右两翼分别从西、南两面向徐州郊外敌军据点发起强攻，前锋直逼徐城外围敌军最后据点，双方在此展开激烈拉锯战，宁军攻势甚猛，“徐城几被包围”[⑫]。下午，蒋介石亲抵距徐城仅 7 里的云龙山麓督战，并判断“敌人险要已失，必难久于支持”[⑬]，准备部署向徐州追击。然而就在此时，风云突变，敌军紧急自后方及战事较为平稳的陇海路东段抽调大批兵力增援。结果“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败之惨案前所未有”[⑭]。3 日凌晨，蒋介石忍痛下令各军全线后撤，

8 月 6 日，蒋介石仓皇逃回南京，据江而守。徐州战事，由于战术不当，结果败局更惨，遂战斗力下降，上海财团大为不满，社会舆论不好超过孙传芳。蒋介石败北南京后，恼羞成怒，遂把战败责任强加到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身上。8 月 10 日，以“饷糈经理无序”、“战事剧烈之际安处后方”、“先行潜返宁垣，置全军存亡于不顾”等三项罪名将王天培撤职拘押，随后被处以枪决。

王是黔军将领何应钦的同乡，已和蒋小有矛盾的何应钦对此颇有兔死狐悲之感。桂系李、白受到极大震动，生怕做了“王天培第二”。各路将领也人人自危。于是，李、何、白三人串通一气，联络武汉方面的反蒋力量，伺机发难，准备把蒋介石赶下台。桂系借西征讨汪之名，将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又联络浙江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将部队开到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得知宁方内部纷争，汉方更是积极倒蒋。8 月 9 日，唐生智发表“讨蒋通电”，严厉指责蒋介石“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15]，对蒋穷追猛打。随后，汪精卫等致电李宗仁，表示：“个人负责问题”、“机关改组问题”，均可召开四中全会解决。[16]唐、汪两人的中心意思是宁汉合作可以，但条件是蒋必须下野，婉转向桂系发出驱蒋合作的信号。

武汉政府誓师“东征”讨蒋。以唐生智和张发奎两部主力，兵分两路，沿江东下，进逼南京。这时大军压境，一触即发。这时的汪精卫自称“在夹攻中奋斗”，一面反共，一面反蒋。反共是为了得到国民党右派的支持，反蒋，是逼蒋下野，欲夺国民党第一把交椅。而唐生智则是对下游的江、浙财源十分垂涎，认为只有东下驱蒋，占据江浙，才能“找出一条财政上的出路”[17]。他向部将李品仙等透露其东征计划：“乘张、孙联军南下之际，以第三十五及第三十六两军东下相机攻取南京，以第八军留守武汉及肃清第二军残余部队，巩固两湖后方。将来以芸樵部驻守安徽、巩固江左，联络第三军任江右防守，翠微与铁夫两部随我到南京，建都后整理一个时期再行北伐。”[18]

正当中国政局激变之时，各帝国主义乘机利用军阀、政客和派系之争积极维护其在华的侵略利益。当时，日本竭力阻止国民党北伐，以保护其走卒张作霖在东北、华北的利益。英美则与江浙财阀相勾结，为保护其在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的利益，力促宁、汉合作反共，共同北伐奉张，意欲与日争夺。因此，蒋介石倒汪反汉的行动得不到英、美的支持，处于被动地位。

8 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上，孙科开炮说：“蒋先生是不是出国休息一下?”白崇禧也说，“总司令太辛苦了，是应当休息休息。”接着李宗仁、古应芬、邹鲁等人都附和同意。最后表决时，主张蒋介石出国者占多数。

蒋此时感到大失所望，他在 8 月 8 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须坚持，而汪某乃异矣，是诚非人类也。”[19]8 月 11 日，蒋在日记写：“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镇静谨守，持之以定，待机



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20]12 日晚，离宁赴沪。据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21]蒋介石“行退让贤”，其实是出于无奈。蒋介石自己曾同李宗仁讲，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那我下野就是了”[22]。13 日，发表《下野宣言》申述个人奋斗历史，诬称：“党国呈分裂之兆”“实共产党之阴谋所致”。“武汉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毫不踌躇，即刻下野”[23]。16 日发表铣电，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同年 12 月，蒋曾明言，当时若再恋栈，“即非党所任命之总司令，而将成为武力之傀儡”[24]。因此，蒋之下野，虽“酝酿非止一日”[25]。

综上可以看出，蒋介石下野是他反共倒汪政策失败的必然结果。蒋以反共为借口，擅立政府，从而造成了国民党的大分裂。蒋介石一心想用武力消灭武汉政府，无奈内忧外患，使得蒋介石心有余而力不足。蒋介石转而又用和平办法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这样，蒋就将自己推向不利地位。另外，从国民党党纪和党统而言，蒋另立的中央是非法的。他无法否认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和合法性。事实上，当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以后，国民党各大实力派大多倾向于承认武汉中央的正统地位。而武汉方面又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宁汉合流的先决条件。这样，为使宁汉合流得以告成，蒋介石势力非下野不可。

注释：

①《民国日报》第四卷第 29 期。

②《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纪录》，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 5 册，武汉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11 页。

③《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 115 页。

④《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27 年 7 月 9 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⑤《陈千致中央-训练部电》（1927 年 7 月 19 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⑥《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 1 辑第 3 卷，第 111 页。

⑦《王天培致蒋介石电》（1927 年 7 月 20 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⑧《孙传芳 7 月 22 日致杨宇霆函》，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

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2页。

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14页。

⑩《蒋介石致王天培电》（1927年7月29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⑪《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26页。

⑫《褚玉璞电告徐州作战计划》，北京《晨报》（1927年8月8日）。

⑬《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19页。

⑭《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5页。

⑮《唐总司令讨蒋讨共》，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10日）。

⑯《汪精卫为商谈宁汉合作致李宗仁电》，《革命文献》第17辑，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第147页。

⑰《唐生智在总指挥部总理纪念周演说》，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2日）。

⑱《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云樵、翠微、铁夫分别为何键、叶琪、刘兴的字）。

⑲《蒋总统秘录》第6册，中央日报社出版1976年4月版，第62页。

⑳引自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㉑《陈布雷回忆录》（二），第12页。

㉒王俯民：《蒋介石传》，第111页。

㉓《中国现代政治史汇编》第2辑，第6册

㉔《蒋介石1927年12月8日致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书》，《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第148页。

㉕《叶恭绰致杨宇霆函》，《奉系军阀密信》，第266页。



龙潭战役孙传芳的覆灭

徐州战败，北伐军南撤，江北广大地区，尽被孙军占领。孙传芳在张宗昌支持下，组成联军，自任总司令，准备渡江南下，企图攻占南京，重温旧梦，割据华东。

蒋介石下野后，军事之遣调均由军委会处理。1927 年 8 月 17 日，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为首的南京军委会发布命令，将长江以北所有部队撤至长江南岸，凭江扼守。孙军旋即跟踪追至长江北岸，在和州、浦口、江都（扬州）、泰兴等地集中了约 6 万余兵力，并搜集船只准备秘密渡江，

8 月 25 日夜，乘长江江面大雾弥漫，孙军主力第九师全部、第十四师两个团及第七师 1 个团，约 7 万多人，从兔耳矶和南京下游至镇江之间数百里的长江上，向笆斗山、乌龙山、栖霞山、龙潭等多处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偷渡。笆斗山等地为佯渡，为吸引北伐军注意，掩护在龙潭和乌龙山抢渡的主力。

26 日凌晨，孙军抢渡乌龙山成功，乌龙山守军猝不及防，7 座炮台丢了 4 座，二十二师阵地全部落入孙军之手。孙军主力陆续过江，北伐军根本无力抵抗。与此同时，从大河口和划子口抢渡的孙军也进展顺利，突击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龙潭车站，掩护后续部队陆续登岸，并向北伐军阵地发起潮水般攻势，先后占领龙潭与栖霞山一带的战略高地，截断了沪宁铁路，接着向两翼扩展，向西威逼南京，向东迫近镇江。孙传芳亲自过江指挥，在龙潭水泥厂设指挥所。孙传芳为示破釜沉舟，一举夺回江南之决心，下令“凡运兵完毕之船只一律调回长江北岸由大刀队看管，颇有济河楚舟背水一战之壮志。”①

孙传芳倾全力偷渡长江，截断沪宁线威逼南京、镇江，震动了南京政府。当时，南京政府所辖各军，以桂系李宗仁的第七军与蒋系何应钦的第一军为核心。8 月 26 日，李宗仁指挥其第七军在南京以西迅速展开，并向栖霞、龙潭方向攻击前进。何应钦指挥其第一军务部也自镇江从东向西开进。

当日，第一军第二十一师攻抵南象山西南一带。南京军委会还令海军除以主力任南京江阴间之警戒外，应各以一部游弋长江上下游严密警戒。航空队侦察长江以北之敌情为主。同时，电令驻防苏州、上海、杭州的各部队火速增援。

南京军委会调兵的电令到达杭州第一师师部时，由于第一师师长邓振铨久假未归，遂由胡宗南以副师长的身份率领全师从杭州紧急出发。8 月 29 日午后一时，胡宗南率该师第二、第三两个团先行赶到龙潭前线。

8 月 26 日晚，南京政府军第十四师的 1 个团夺回龙潭车站。27 日，孙军组织反击，第一军在打退孙军的反击后，攻占南北象山一带高地。南京政府军分三路进军：第七军两个师为左翼军；第十八军第一师为中央军；第一军一部为右翼军，向栖霞山全面围攻。孙军大部被歼，余部向江边溃退。南京政府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第二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和增援的第二师第五团，将攻入龙潭车站的孙军包围歼灭。此时，孙军后续部队、栖霞山等处败退部队及白俄敢死队，均聚集于龙潭附近，共有 10 个师和 4 个混成旅的兵力，并占领了黄龙山、青龙山、虎头山等险要阵地，企图以一部向东、南两面发展，以主力进逼南京。

28 日夜，孙军全线突击。南京政府方面中央军逐渐不支，被迫向西南撤退，后续部队亦纷纷退抵南京。29 日凌晨，龙潭主阵地再次被孙军攻占。南京政府军在镇江一翼的东线部队前敌总指挥、第二师师长刘峙负伤，“第二、第十四两师因众寡不敌，纷纷后撤，几至溃不成军。栖霞山也为敌三度攻占。我方溃散部队麇集南京城外麒麟门一带，混乱不堪。……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景象，人心惶惶，不可终日。”②何应钦、李宗仁急调第一、第七两军由东西两面会攻龙潭。

29 日，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与孙军激战山口村附近，情势万分危急。就在此刻，胡宗南率第一师两个团适时赶到了龙潭前线，这给南京政府军带来了很大的支持与鼓舞。负伤后但仍留在前线指挥的刘峙当即命令胡宗南率第一师两个团由下蜀出发，向汤山、铜山、羊山以南地区，以及虎头山、青龙山敌军阵地攻击前进，以威胁敌之右侧翼，并设法与西线南京方面国民政府军取得联络，协同作战。胡宗南指挥第二、三两团经短暂休整准备，于当晚向虎头山孙传芳军发动猛攻，占领了范家塘及其东北高地，与敌军相峙，从而稳住了国民政府军的阵地与战场形势。

在胡宗南率两团部队赶到龙潭前线的同时，陈诚部第二十一师的第六十



三团及顾祝同第三师一部等也从苏州、上海一线赶到龙潭前线投入战斗。东线南京政府军力量大增。与此同时，在西线的第七军等部也发动反攻，于29日重新夺回栖霞山阵地。至此，孙军渡江各部，包括从栖霞山等地溃败之部队，最后都“聚集在龙潭一隅。计其兵力，有孙传芳联军的第二、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师，及第十五、二十七、二十九、补充第一各混成旅，约达6万余人。依据龙潭以西的黄龙山、以南的青龙山、虎头山，和东西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编成坚固不拔的阵地，严阵以待，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孙传芳驻节水泥厂，亲自督战。其悍将李宝章、上官云相、梁鸿恩、崔锦桂、段承泽、郑俊彦等都在龙潭前线指挥。[3]

29日晚，留守南京的李宗仁、赶赴前线的何应钦以及在镇江指挥的白崇禧电商约定：在8月30日凌晨，分东、中、西三路同时发动攻击：西线第七军等自栖霞山向东进攻，沿铁路及江边前进；中线与东线的第一军各部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自东阳镇一线出发，会攻龙潭，“围歼”孙传芳军。

29日夜，胡宗南接到军委会电令：“第一师（缺第一团）击破虎头山、青龙山之敌，占领龙潭车站后，派一部兵力对东阳镇、西沟渡方面警戒，以主力转向头、二、三、四块扁担州之线攻击占领之。”[4]30日凌晨，胡宗南指挥所部按时向龙潭东南的制高点石幔山、虎头山、青龙山一线的孙军发动猛烈攻击。与此同时，其他各部的攻击也开始发动。

30日当天，南京政府军对孙军形成了三面围攻之势，遂向龙潭地区的孙军发起了总攻击。孙传芳军是北洋军阀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劲旅。此次孙传芳又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倾巢出动，破釜沉舟，孙传芳本人亲临前线指挥，因而孙军作战十分勇猛与顽强。此时，孙军已渡江作战5日多，虽死伤惨重，但仍顽强抵抗。南京国民政府军遭到了孙传芳军强大而顽强的抗击。孙军反攻为守，进行全线逆袭。“龙潭周围数十里地，炮火蔽天，血肉模糊。战斗的惨烈，实为笔墨所难形容。”[5]

与此同时，胡宗南指挥所部向石幔山、虎头山之敌的进攻，也遭到孙传芳军的顽强抵抗，拼杀多时却毫无进展，双方形成对峙局面。30日午后，南京政府军之海军截断孙传芳军的渡江航线，导致孙军后援部队无法跟进，遂渐渐不支，于是退山隘据守。胡宗南部与友军逐渐形成对敌三面合围之势。孙军居高临下，以百余挺机枪扼守山险。胡宗南师等部采取仰攻，虽死伤众多，但士气不减，至下午3时占领各重要山隘。孙军向江岸溃退。下午

5时，龙潭遂为南京政府军收复。

30晚，因连日奋战，双方均已疲累不堪，于是停战休整。此时，胡宗南接到上级命令，彻夜警戒，俾翌日拂晓再歼残敌。但31日凌晨，当南京政府军正在部署进攻时，残余的孙传芳军却抢先发动了最后一次的疯狂反扑，“来势极为猛烈。情势险恶，较前犹甚。”在何应钦、白崇禧的亲临指挥与督战下，胡宗南部与各友军奋勇抗击，并发动反攻。恰巧，胡宗南第一师第一团从杭州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其他援军也先后抵达。此时，南京政府军声势大振，遂发动全线反攻。孙军全部被赶出龙潭一线阵地，被迫向长江岸边收缩。上午10时多，胡宗南的第一团攻克了孙传芳的指挥所——龙潭水泥厂。孙传芳丢下部队，登上小汽艇逃向江北，仅以身免。午后2时，不及渡江北逃之残敌全部被俘。

南京国民政府军取得了震动一时的龙潭大捷，扭转了自8月初反攻徐州失败以来的战场颓势。1927年9月1日孙传芳率残部从长江北岸向北全线后撤，“望风披靡，已绝无卷土重来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⑥]

9月2日，南京政府军第一、第三两路军一部组成右翼军、中路和左翼军渡江追击。右翼军击溃孙军梁鸿恩部，于12日攻克淮阴，进至阜宁。中央军击溃孙军王乐善部，于14日占领滁州。左翼军原被孙军围困在合肥，29日，南京政府军发起攻击后，孙军不支，遂向店阜、梁园一线退去。国民革命军左翼第三十三军一部进至定远。

纵观龙潭之战，孙传芳利用最有利之时机：蒋介石下野，唐生智反宁，革命军徐州受挫。他选择大河口、划子口等地渡江也是最有利之地点。划子口对岸便是栖霞山、乌龙山炮台。占领该等山地，一则可以掩护登陆之部队，二则可以威胁南京。南京一旦被占，革命军之政治力量将被瓦解。而且京沪铁路以东之地区，田坎皆为南北方向，登陆部队即可用作天然进攻之掩体。但孙军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原因有三：一、参加龙潭之役之革命军以一、七两军为主。一、七两军都是国民革命军之主力，对三民主义有信仰，有信仰便有力量；二、革命军适时对孙军造成夹攻之形势；三、孙部渡江后，渡口被革命军所抄袭，后援不继，加以海军态度明朗，孙部之补给完全断绝。反之，沪宁之间补给方便。双方经六昼夜之苦战，有无补给自然成为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

龙潭战役是孙传芳与北伐军之间进行的一场著名战役，也是北伐战争中最激烈、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是役，参加战斗的孙军六万余人，战死和



淹死约四万人，被俘两万余人。北伐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也不计其数，仅仅黄埔5期学生，阵亡达500人之多，战况激烈程度，由此可见，这是一场恶战，血战。显赫一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主力几乎消耗殆尽，以北洋第二师为核心的孙传芳军事系统，基本已经宣告瓦解。变成光杆司令的孙传芳也由此走向没落，渐渐告别了政治舞台。龙潭战役奠定了国民政府的基业，巩固了国民政府的权威。是役任第二路总指挥的白崇禧也曾在其回忆录说过，龙潭之役在北伐大业中是最重要一仗，因为胜利了才能西征消灭唐生智之反动力量；迁都南京稳定国内之政治局面；促使徘徊观望之友军加入革命行列——如阎锡山之北方军在龙潭战役前便与革命军有联络，但畏于奉军迟迟不敢明白表示态度。龙潭战役之胜利对奉军是一大威胁，阎鉴于革命之趋势，很快便附和了革命军。如果龙潭之役失败，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唐生智之势力一定高涨，其他抱游离态度之友军，更远离革命军。如此，革命军能否再回广东重整旗鼓，便是一大问题。所以说龙潭之役是北伐大业成败极大之关键。

注释：

①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②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8页。

③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1页。

④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三）第206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786辑。

⑤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1页。

⑥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页。

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作用

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彻底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数十万兵力，并重创奉系军阀张作霖，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它的胜利是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国共合作，就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胜利。如果没有共产党，不仅根本谈不上国共合作，更谈不上能出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北伐战争及其胜利。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从而为北伐战争指明了斗争方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探求中国革命问题的最适宜解决方案。经过实践，党逐渐认识到：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压迫，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因此，只有努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民族独立和人民的真正解放。

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同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二大”上，制定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的任务，从而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革命对象的问题。从而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

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正确地制定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了民主力量，使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步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1925年，党领导了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它向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反帝反军阀的政治大动员。经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到北洋军阀的罪行和推翻军阀反动统治的必要性、紧迫性。

随之，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对国民党进行新的改组。1924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大”，通过了由共产党员瞿秋白等人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对内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中国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一个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国家。“一大”宣言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总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实行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主张逐步深入人心，不仅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接受，而且也为孙中山国民党所接受，成为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

第二，促请国民政府北伐的各种努力，使北伐战争有可能变为现实。

随着广东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与扩大，共产党人多次指出尽快举行北伐，以扫荡北洋军阀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并发动各民众团体促请国民政府迅速出师北伐。

早在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就向全国发出紧急呼吁，明确提出，当前主要斗争目标是吴佩孚，向吴佩孚进行总攻击，以援助国民军。斗争的具体途径是：在北方，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对吴佩孚的群众运动，在南方，吁请国民政府出兵北伐。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最早地举起了北伐的大旗，并且号召群众用实际行动支持北伐军的反吴战争：“全国的民众！我们再不能迟疑了，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向吴佩孚行总攻击！……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督促国民军不犹豫的不妥协的对付吴佩孚并肃清吴佩孚在长江的势力，在这种状况底下，尤其是武汉的民众和河南的民众，更应该特别努力实行驱逐吴佩孚并努力参加反吴的战争”[①]。12月，中共广东区党、团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明确地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应该“与全国革命民众携手”，打倒北洋军阀势力，以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②]。1926年1月，在对国民党“二大”的宣言中又强调国民党应深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将“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③]。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明确提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同时应加强对北方冯玉祥国民军的团结改造工作，使之能

"接应广州政府之北伐"。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4]。

各地的共产党人还发动组织工农大众再三促请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表示誓作北伐军后盾。3 月 9 日，共产党人郭亮、夏曦等主持的长沙万人市民大会通过"请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等决议。3 月 30 日，中共广东区委发出宣传大纲，提出了"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北伐"的口号。在中共广东区委指导下，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4 月 10 日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国民政府"须从速出师北伐，扫荡北方一切反动军阀之势力，以援助北方孤立无援之国民军，以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水深火热的民众"。"香港罢工工友与广东工友愿助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使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大而巩固"[5]。4 月间，共产党员刘尔崧领导的广州工代会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江西的革命同志会也电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早日出师北代，取道江西，把北洋军阀赶出江西省境"[6]。5 月 1 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开会的当天，就发表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我们政治上要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肃清北方的反动势力"，"拥护国民政府，肃清全国的军阀"。两会代表还在李立三等率领下，向广州国民政府请愿北伐，喊出了"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奉、直军阀"[7]的响亮口号。这两个代表大会，充分表达了中国工人和农民支持国民政府，支持并呼吁迅速出师北伐的决心。

中共党组织及其党员建议与促请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种种努力，不仅对发动广大民众迎接北伐、支援北伐、参加北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对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迅速出兵北伐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国民政府代表周鳌山 1926 年 5 月在长沙对唐生智谈及此事时曾说过："北伐本来还未到预定期限，湖南既然发动起来了，中共在广东方面的人也极力主张迅速北伐，所以可能提早北伐"[8]。显然，共产党人促成国民政府尽早出师北伐，功不可没。

第三，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政治工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

国民革命军组成后，公布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条例》规定设置党代表是为了向部队"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扬三民主义之教育"，使军队逐步"由私人工具"，"变为党的武力"[9]，



更进而使作为一种工具的军队，成为实现“理想的先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做军队政治工作，比做军事工作责任还重要。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选派出大批优秀党员到各军担任政治工作，加强各军的政治思想建设，以推动军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各部的政治领导的几乎都是中共党员：周恩来曾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李富春曾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和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六如、方维夏、萧劲光曾分任第四、五、六师的党代表，吴少默曾任第七师政治部主任，罗汉、廖乾吾曾先后担任第四军党代表、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张善铭曾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李笠农、王文明曾分任第十师党代表、第二十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曾任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陈雁声、李隆建曾分任第十七师、十八师的党代表，黄日葵曾任第七军政治部主任等等。各军师以下的各级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也多是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里，有孙炳文、朱代杰、郭冠杰等约“一百名共产党员”在积极地进行工作[10]。

为了加强在作战期间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北伐前夕成立了总政治部，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任主任，共产党人郭沫若任副主任，恽代英任秘书长，苏联顾问铁罗尼任总顾问。总政治部的机关干部大多数也是共产党员。

党在北伐进军过程中，紧紧围绕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这个革命任务，对广大军官和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之明确奋斗目标，认清军人职责，鼓起战斗勇气，培养牺牲精神。因而，北伐军队中，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这就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虽然曾遭到某些上层军官（如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等）的抵制和阻挠，但大多数军官都不同程度地对政治工作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看到政治工作帮助他们巩固了军队，鼓舞了士气，整顿了军纪，从而使军队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第四，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发动工农基本群众的责任担在了自己的肩上。1925 年 1 月，党在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北伐前夜，党更明确指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

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11]。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发动和组织各地工农大众积极踊跃支持北伐战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广大工农民众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有力地援助了北伐军去战胜敌人。

北伐军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北伐战争各战场所取得的每个胜利，都离不开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大工农的支持与援助，这是北伐军以弱胜强，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从两广出来，先到湖南、湖北，再到江西，没有一处不受人民欢迎，不得人民帮助”，“这次战事胜利的原因是很多的，最大的原因，是“唤起民众，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使得他们一同站在革命战线上”，援助了北伐。[12]当时北伐军的将领张发奎指出：“这一次战争（指湘省境内）我们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落后的装备战胜了优良的装备，我们的胜利的主要因素是民气。湖南的农民运动缩短了我们战争的时间，株萍铁路、粤汉铁路的工人及铁路工作队与我们联合作战，缩短了我们战场的空间”[13]。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积极支援，北伐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抗战期间也没有过”[14]。

第五，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北伐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据1926年12月统计，在北伐军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共有1 500人左右。他们是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在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鼓舞身边的官兵英勇奋战，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北伐参战的部队中，尤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最为杰出。这个团共2 100余人，连以上干部全部是共产党员，士兵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该军奉命为北伐先锋开赴前线之前，周恩来同志就鼓励他们一定要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起模范先锋作用。独立团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在北伐各次战斗中都所向披靡，攻酸陵，占平江，勇夺汀泗桥、贺胜桥，攻古武昌城，成为百战百胜的北伐先锋，为全军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独立团在北伐中共伤亡1 200余人，排以上干部伤亡60余人。他们那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主动进击的革命雄风，为整个国民革命军作出了表



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独立团，就没有如此迅速的重大胜利。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15]。一句话，北伐战争胜利，是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流血牺牲换来的。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②《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193页。

③《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件：大事记》第12辑（1926），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④《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2辑（1926），第32页；《党史研究资料》(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

⑤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1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200页。

⑥《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1年9月版，第123页。

⑦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5日)。

⑧《党史研究资料》(3)，第289页。

⑨《北伐战争史》(一)，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67年版，第111页。

⑩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5页。

⑪中共中央《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1926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7页。

⑫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十九)，1937年2月版，第34、39页。

⑬包惠僧：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8 页。

⑭《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9 页。

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年 4 月），见《毛泽东选集》，第 953 页。



蒋介石成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但是，帝国主义并不甘心放弃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为了破坏中国革命，它们一方面公然对中国人民实行武力威胁，另一方面更竭力分化革命堡垒，以便从中物色新的代理人。

1926年9月，当北伐军兵临汉口时，英帝国主义军舰公然援助吴佩孚，炮击北伐军。为牵制北伐军向武汉进攻，驻沙面的英舰于9月4日驶进广州西堤，并派水兵50余人带机枪上岸，占据码头，驱赶行人，拘捕工人纠察队员，扰乱北伐军的后方。与此同时，英帝国主义者还在四川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

1926年8月29日，英国商轮万流号故意撞沉川军士兵的木船10余只，淹死官兵58人、老百姓18人，沉没枪支56支、子弹5 600发、公款8.5万元，当肇事英轮万流号抵达万县时，川军士兵登轮查讯肇事情形。英舰水兵又将登轮的川军士兵一律缴械，并开枪打伤士兵2人；同时，英舰大炮也指向两岸民房，露出杀人的凶相。在这种情况下，川军遂扣留万流号和另一支英轮万县号，以便进一步交涉。英帝国主义不仅不赔礼道歉，反诬中国方面扣留英轮“显系作战行为”，对川军进行威胁。9月4日晚，英领事馆发出最后通牒，限定杨森在24小时内“将扣押两轮释放，否则实行轰击”。5日，英专调军舰炮轰万县县城，发炮300余响，历3小时之久，直到川军士兵自动起来抵抗，并击伤英舰一艘后，英舰方扬长而去。万县惨案，炸死中国军民604人，炸伤398人，商店及居民住房被毁数百家，损失财产940多万元。

1927年1月，当北伐军进逼上海时，英、美、日、法等国即借口保护侨民，大量增兵上海。英国海军大臣扬言，“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利

益，要这样做，就只有派遣陆海空军"，"派遣军队越多越好"。英国"国会的二月常会且批准了增拨 95 万镑作'远征'中国之用"[①]。1 月 11 日，英国亚洲舰队司令泰维德到达上海。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公然声称："中国时局日渐严重，英政府也派遣步兵、炮兵、飞机，决意使上海不再成为第二汉口。上海的防御，现在不限于租界，即一定要扩大到全上海。"[②]

美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它的武装干涉活动。1927 年 1 月 11 日，美国亚细亚舰队司令维廉率全部军舰队从马尼拉到上海。这时，美国陆军参谋长萨马莱制定了一项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计划：以菲律宾为基地，在菲律宾调集大批陆军和军舰，而从美国本土经檀香山以至菲律宾的中间基地都配置后备部队。萨马莱认为最少需要 5 万联军才能在中国建立根据地，掩护进攻，其中美国应提供 15 000 人。2 月 5 日，英帝国主义向美提出了"联合保卫上海"的请求。这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提出"淞沪中立"的要求，以便把淞沪划于"战争区域之外"，"以减少寄居上海中外人士生命财产之危害"[③]。他们企图以"淞沪中立"的办法，将北伐军组织在上海以外。这一要求，被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严词拒绝："划上海为中立区，无异割裂中国，共管上海，个人不敢苟同。"[④]

1927 年 1 月，日本帝国主义也从佐世保派遣驱逐舰 4 艘和巡洋舰 1 艘来华，与英美法合力"保护上海"。

1927 年 2 月 25 日，英、法、日、意军事当局，以"防华军侵入租界"为由采取行动，向租界以外地区扩张，英军占领梵王渡车站南面阵地，日军占领江湾区，意军占领杨树浦。据英泰晤士报供认，1927 年 3 月间，聚集在上海的英、美、日、法军队及所谓"万国商团"武装，共 3 万余人。同时，集结在上海、南京一带长江中的英、美、日、法、意等国的军舰达 90 多艘，并公然发出武装"保卫上海"的叫嚣，企图阻止上海工人起义和北伐军进入上海。

3 月 24 日，第六军和第二军击溃数十万直鲁联军，占领南京城。当天下午，他们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不受暴民侵害"，竟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的革命军队与和平居民开炮轰击，损毁房屋无数，打死打伤中国军民 2 000 余人。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南京惨案"。斯大林指出帝国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一则使中国南方的军队不能继续前进，使中国不能统一，二则使汉口的租界谈判所议定的那些条件不能实现"。"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看来是想以此说明；他们宁愿将来在压力下和在炮火伴奏下与国



民政府进行谈判。”[⑤]事件发生后，驻南京的英、美、日等国领事反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提出继续向中国增兵的无耻请求。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它说明了帝国主义政策上来了一个转变，以武装和平转变到反对中国人民的武装战争”[⑥]。

南京事件后，4 月 3 日，汉口又发生了日本水兵屠杀中国民众的“四三”事件。当天下午，日本水兵在汉口日租界制造事端，当场打死群众 7 人，打伤数十人。

帝国主义除了以武力进攻中国革命外，还采取了分化革命阵营的办法。特别是当第一次干涉中国革命的高潮遭到中国人民的有力抵抗后，使它感到单纯的武力是无法消灭中国革命力量的。于是，帝国主义加紧分化革命阵营，以便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力图从内部攻破革命阵营。它们认为“国民党内有温和派（他们主张维持秩序）与极端派（他们主张扰乱破坏）”，声称“国民党中究将何派占胜利，关系于外人对于国民党之态度，实不在小”[⑦]。他们看中了国民党新右派的首领蒋介石等人，认为这些人乃“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⑧]。他们以所谓“友好”的言词相麻痹，以所谓“关税自主”等为诱饵，引诱右派投入自己的怀抱。

早在 1926 年底，英帝国主义就宣布所谓对华新政策，撤换了驻华公使，虚伪地声明对国民政府持“体贴与谅解”的态度，并承认中国应有“关税自主之权”。其目的在于麻痹中国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警惕，引诱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阵营。1927 年 1 月 29 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讲，声称：英国方面愿意变更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中国对外货不能自订税额”和“外国租界的准独立地位”等条款。1927 年 2 月 10 日，当武汉国民政府为英国增兵事提出严重抗议时，英国外相张伯伦在下院发表虚伪声明，表示绝不干涉中国内政，并竭力鼓动所谓“温和派”（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同所谓“极端派”（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决裂。

美帝国主义因其在中国还没有固定的势力范围，故更着重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办法。它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企图用伪善的面孔来骗取中国人民的好感，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取英、日的地位而代之。1926 年初，美国间谍分子就到广州试探蒋介石的态度。1927 年 1 月 27 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在一项对华政策声明中，表示准备“以最宽大的精神”同中国谈判新条件，指出：“美国一向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它希望在我们对华条约中所规

定的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尽早放弃。"[9]企图以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上的虚伪让步来利诱中国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在利诱的同时，也不忘夹以威胁。它借口保障美国人生命财产，说什么"美国海军目下实有开入中国之必要"。

与此同时，日本也积极加紧分化革命阵营。1926 年底，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奔走于武汉、南昌、广州之间，日本的许多"要人"也纷纷来中国"考察"，故作接近国民政府的姿态，11 月 10 日，藤村义郎男爵和田长寿男爵表示："今后日本不应仅目北京政府为中心，当以平等之友谊，以对待南北两方面及各势力者为要"[10]。1927 年 1 月 16 日，日本外相币原在议会中正式发表对华政策的演说，高唱"中日亲善"的调子，表示要"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11]其目的在于拉拢蒋介石，力图把蒋介石变成侵略中国的新工具。日本帝国主义在进行欺骗的同时，仍然念念不忘地说："对日本的正当的重要的权利和利益，则以合理之手段尽力谋拥护之"。这里的所谓"合理手段"，无非是武力干涉的代名词。

日本帝国主义非常希望蒋介石能和它的走狗奉系军阀统一起来，以便于它独霸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奉系军阀也就高喊"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口号，声称"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张作霖本人也表示，"党军苟驱逐左派，予将抒诚与图统一"[12]。1927 年 1 月间，奉系军阀派郑洪年携日本顾问到到南昌与蒋密谈，蒋也派李石曾到北京和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协商"。1 月 27 日的电通社东京电中说：中国南北妥协的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的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向导》第 186 期，1985 页。这里所说的"稳健的孙文主义"，就是蒋介石所奉行的戴季陶主义；所说的"实现大同团结"，就是要蒋介石和日本豢养的奉系军阀合流，一齐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927 年 2 月，英国也派代表到南昌与蒋介石谈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成了帝国主义争取的对象。这充分证明："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不但用直接的和间接的武装势力硬的办法，而且还有软的办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13]

与此同时，一批亲英美、亲日及与北洋军阀有联系的政客如王正廷、黄郛、张群等则纷纷领命来到南昌，出入于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与之洽谈反革



命的交易。大资产阶级代表、江浙财阀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秉承英美帝国主义旨意，亲到南昌与蒋谈判，以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反动秩序为交换条件，答应蒋到南京、上海后给蒋6 000万元反革命经费。在中外反动势力攻诱兼施的情况下，对革命早怀二心的蒋介石，很快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蒋介石在主动投靠帝国主义的同时，开始改变对苏俄、共产国际的态度。1927年2月，他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函共产国际，请求撤回鲍罗廷。另外，他还积极实行联北计划，与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达成“反赤”协议。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利诱之下，蒋介石也就找到了他实行反革命政变的靠山了。当时形势，正如中国共产党1月28日对于时局的宣言中所指出：“帝国主义者此次联合进攻凶恶而且阴毒。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⑩]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日益公开地显示出了自己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1927年2月21日，在南昌总理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了攻击提高党权运动、攻击联席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演说。同日，他还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名义，决定设立由吴稚晖、钮永键等人组成的“上海临时政府委员会”，准备夺取上海的权力。他甚至还企图与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抗，而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之后，他便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注释：

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几件史实》，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8页。

②北京《导报》（1927年3月3日）。

③《国闻周报》第4卷，第5期。

④《申报》（1927年2月13日）。

⑤《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81页。

⑥斯大林：《论帝国主义者炮击南京事件》，《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2页。

⑦《字林西报》社论，1927年1月7日。

⑧《字林西报》社论，1927年3月28日。

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2

~475 页。

⑩上海《民国日报》（1926 年 11 月 21 日）。

⑪【英】怀德著：《中国外交关系略史》，商务印书馆 1928 年初版，第 149 ~ 151 页。

⑫转引自《向导》第 183、157、192 期；《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6 号。

⑬《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1927 年 1 月 28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 ~ 16 页。

⑭《向导》第 186 期，第 1977 页。



蒋介石镇压工农运动

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的支持后，羽翼即已丰满，反共反工农的面目也就公开暴露了出来。1927年2月21日，蒋在南昌总司令部公开发表讲演，说什么“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他狂妄地宣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①。接着，他果真利用他窃取的权力，接二连三地制造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工农的惨案。

从1927年3月起，蒋介石公开武力镇压工农群众运动和左派国民党，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惨案。

陈赞贤是杰出的工农运动领袖。自1926年10月陈调任为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赣南党务及17县工农运动指导员以来，在他的主持下，赣州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出版了《国民日报》、《青年之路》等宣传革命的报刊，而且创办了赣南工农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工农运动骨干，还组织了各业工会50多个，会员达16 000多人，并且成立了工人纠察总队，队员500多人，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进行了经济斗争。11月初，赣州总工会成立，陈赞贤被选举为委员长，发动全市工人开展以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中心内容的斗争。此时，蒋介石密令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前往赣州，负责组织赣州总工会，严办陈赞贤。倪弼一到赣州，即发表宣言通电，诬称工人和陈赞贤是反革命，同时扬言将以武力解决工潮。1月26日，倪弼派短枪队包围总工会搜捕陈赞贤未获，于是下令通缉。陈赞贤在群众帮助下，化装逃到南昌。2月下旬，陈赞贤在南昌参加了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省总工会副委员长。会后，他冒死回到赣州。3月6日，陈赞贤在总工会开会时，被倪弼逮捕，押往县公署。倪弼等限令陈赞贤在3分钟内签字解散总工会，停止工农运动，陈大义凛然，严词拒绝。倪弼等反动军官恼羞成怒，疯狂地向陈开枪。陈赞贤在身中18

弹的情况下，仍高呼："打倒新军阀！""工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这就是著名的"赣州惨案"。

惨案发生后，赣州工人曾组织请愿代表团赴南昌请愿。南昌全市工人为此举行了三天罢工。全国总工会也为抗议国民党右派的暴行发出通电。江西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总会、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等，组成了陈赞贤惨案委员会，发动请愿，通电声讨。此时，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贯彻日报》公开揭露了蒋介石代表国民党右派在江西进行非法选举和杀害陈赞贤的真相。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也通过决议："电南昌蒋中正同志令速将倪弼解归中央办理"[②]。蒋介石虽不得不将倪弼"免职查办"，但此项命令是公开登报的方式公布的，这无疑是公开告知倪弼及早潜逃。南昌市民闻情激愤，10余万人向江西省党部请愿，声讨右派。蒋介石总司令部派兵镇压，驱散请愿民众。

赣州惨案之后，又发生了南昌事件。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演说，攻击武汉方面"污蔑"他联合日本、放弃联俄政策，企图先打倒他，而后毁灭国民党，并声称"谁来反对我们革命的，就当他是反革命看待"[③]。12日，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左派）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会议，因开会口号不和蒋意，蒋大为不满。14日晚，蒋指使段锡朋勾结教育界反动分子、国家主义者、流氓地痞等，共500余人集会。作出非法解散南昌市党部、通缉市党部执监委员、夺取市党部权力的决定。15日又封闭了《贯彻日报》，逮捕了该报记者。16日，正式解散南昌市党部、江西学生联合会，并声明解散工会、农协。

3月16日，蒋介石赶到九江部署新的反革命屠杀。17日，蒋又唆使其走狗收买流氓地痞，持刀剑棍棒，在王若渊等率领下，捣毁了九江市党部、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及《国民新闻》报，打死市党部工作人员、工人纠察队长、农协干部共6人，制造了九江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九江市党组织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工人纠察队和全市工人包围了九江城，拿获了反革命分子王若渊等40人。此时，郭沫若、邓鹤鸣等均要求蒋介石派兵镇压反革命。而当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解除暴徒武装时，蒋即派卫队镇压，并以"保护"为名，令其卫队武装占领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同时强行将已被捕的反革命分子索去，并护送他们出九江。

蒋介石的反动，激起了江西人民的极大愤怒。3月18日，江西人民派代表邓鹤鸣等人到武汉同国民党中央提出控诉。19日，由吴玉章主持召开



的有林祖涵、于树德、彭泽民、徐谦等参加的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听取江西代表的控诉。与会者指出：南昌、九江“发生如此摧残运动，其侮辱中央为不可掩之事实，可由中央通缉南昌非法委员。至九江蒋派军队保护地痞流氓，而谓人民意思，残属费解……此事应严行处理。”④会议当即作出停止张静江、陈果夫、段锡朋等控制的江西省党部的职权；恢复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电九江蒋介石将此案情报告；由国民政府电令江西省政府即行取消对南昌市党部执监委员的通缉令，并释放被捕同志；电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军戒严司令唐蟒、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及总司令蒋介石保护党部及人民团体，严拿凶手及反革命叛徒；开除段锡朋、周利生二人党籍，并由政府通缉拿办等8项决议。⑤4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在省党部所在地百花洲举行反对AB团（蒋介石特务分子组织的反革命团体。“AB”系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的大会。非法的省党部竟进行破坏，开枪恐吓群众。接着，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和工人纠察队攻入AB团所把持的非法的省党部，逮捕了反革命分子程天放、罗时实、曾英华等7人，解散了非法纠察队。3日，南昌各界3万余人举行声讨反革命分子的大会，程等跪在台上求饶，会后群众押着程游行，人心大快。4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市总工会、农民协会率领工人纠察队和农会会员，包围了九江县党部，捉拿了反革命分子王若渊、翟飞墨、陈文豪等，并组织了九江人民裁判委员会，公审反革命分子。人民裁判委员会宣布了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判决书，判处王若渊等6名反革命分子死刑，执行枪决。5日，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改组，由方志敏主持省党部，朱德兼任公安局长。这一次斗争，给了反动派一个有力的打击，为后来的南昌起义打下了基础。

蒋介石在制造了九江惨案后，于3月20日抵达安庆、3月23日继续制造反革命惨案。23日，蒋介石授意总司令行营特务处长杨虎、副处长温建刚等，收买一批青红流氓打手，组成百人敢死队举行暴乱。他们狂呼“新军阀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反动口号，捣毁了安徽临时省党部、省工会筹备处、省农协筹备处、省市妇女协会等机关团体，将文件、什物一抢而空，并打伤职员和省代表大会代表等数十人，重伤多人，制造了安庆惨案。蒋介石在指使暴徒行凶后，又扣留了武汉中央关于组织安徽政务委员会的命令，自行委任28名安徽政务委员，其中大都是些残败的军阀和安福系、西山会议派的余孽以及流氓恶棍的头目。

蒋介石除在武汉之东的长江中下游之赣州、九江、南昌、安庆等地制造惨案外，还在武汉之西的长江上游之重庆，支持四川军阀刘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重庆“三·三一”大惨案。南京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发起，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暴行。刘湘闻讯，密报蒋介石。蒋复电严加镇压。于是刘湘放出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工人学生要打洋人”等，为进行镇压作舆论准备。30日，刘湘还派其师长罗议三向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委、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恫吓，妄图迫使杨取消群众大会，遭到杨的严词拒绝。

31日上午，全市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群众约2万多人按原计划在打枪坝举行群众大会。当杨闇公等省党部执行委员登上主席台时，预先埋伏在会场内外的反革命便衣冲锋队手持大刀、铁尺、木棒、手枪等，高喊“杀共产党”，冲向人群，大肆杀戮。顿时尸横遍地，血肉四溅。死难者四五百人，伤者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反动派还派人捣毁了四川省党部、省农协、县市党部、市总工会、市妇联、四川日报社等机关团体，四处搜捕杨闇公等省党部负责人。4月4日，杨闇公不幸被捕，6日被残害于浮图关，整个山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分子得意洋洋地说，“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⑥]。就这样，蒋介石从南昌杀起，一直杀向南京、上海。

蒋介石在赣州、九江、安庆、重庆等地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当时，在九江、安庆目睹蒋介石种种反革命罪行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3月底奋笔疾书，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猾的刽子手。他的罪，书不胜书。又说，“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⑦]此文于1927年4月9日发表。

实际上，与其说是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才公然制造一系列反革命惨案，不如说是蒋为了取信于帝国主义，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疯

狂进行残害工农及共产党员的活动。蒋介石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是“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的。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从未真正承认，也从未真正实行过”。而且，“群众起来，他便反共”。自中山舰事件起，他的立场就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⑧]

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运动，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蒋叛变革命的面目已经昭然若揭。此时，由于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已被消灭，张作霖也势单力孤，已不能构成对革命的威胁，而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同外国帝国主义两股反革命势力，构成了对中国革命的最大威胁，而蒋介石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统治的工具、代表。因此，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人民大众与北洋军阀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大众与蒋介石新右派的矛盾。

注释：

①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1927年2月21日。

②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68页。

③《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9月出版。

④《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二届常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3月19日。

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二届常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3月19日。

⑥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927年4月9日。

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

⑧《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165、208页。

蒋汪密谈与汪陈宣言的发表

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紧张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之时，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取道柏林、莫斯科，乘火车至海参崴回国。4月1日，汪精卫抵达上海，蒋亲往码头迎接。当天，蒋介石率吴稚晖、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柏文蔚、古应芬等到汪精卫下榻的孔祥熙公馆，连日带夜地与汪商讨分共事宜。

据吴稚晖4月2日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说，汪在商讨过程中开始暴露出反共思想，并原则上同意反共。汪对他说过："共产党素来不轻易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①。他也对李石曾、蔡元培说过，倘若武汉国民党中央要罢免蒋介石，"我亦与大家共同反对"②。蒋得悉这些情况之后，遂于4月3日发表"拥汪"通电。这个通电宣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在汪精卫复职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他本人则"当专心军旅"，"以明责任"③。

从4月3日~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上海莫利爱路孙中山故居举行秘密会谈。参加会议的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李石曾、邵元冲、黄绍竑、宋子文、蔡元培、古应芬等十余人。密谈一开始，蒋介石等即大肆诬蔑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推翻国民党；并攻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革命政府已经为共产党把持。蒋介石提出必须马上做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④，并主张用暴力手段"清党"，要汪赞成。他们还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反共，或者至少保持中立。他们许诺事成之后，再由汪精卫主持大计。对此，汪精卫没有反对，但他不同意马上就进行分共。他认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⑤。蒋说，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了，全为共产党所把持。汪说，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



议，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主张由他自己先去武汉，“向中央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建议于4月15日前后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蒋介石“所提议之事件”。蒋介石等人“很不赞成”汪精卫去武汉，汪精卫则“以为不得不行”⑥。会议最后同意按汪所提“再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的主张行事，并商定立即在上海召集会议讨论主要办法。这种分歧看起来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但反映了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权力之争。

在如何分共问题上，他们同意“迅速召集负责之人”来商定，议决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他们并通过频繁集会，提出所谓三条“暂时应急方法”，即：“一、共同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后因被共产党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来解决以前，不用接受上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共产分子阴谋捣乱，其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来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党部、各机关各由主管负责人暂时制止。”⑦可见，汪精卫同蒋介石只是在分共的时机和方式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在反共这个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当时，汪精卫之所以不赞成立即驱赶鲍罗廷和马上清党分共，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汪精卫这次回国，一心想要恢复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和地位，而武汉政府的主要成员，把他当成国民党左派领袖。如果在拥蒋势力雄厚的上海马上实行“暴力清党”，就会失去武汉政府的支持，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从而成为一名依附于蒋介石的空头政治领袖。第二，武汉辖区内的革命运动，还在继续高涨，汪精卫还想借助武汉革命力量拉起拥汪势力，来达到他做国民党的最高领袖的目的。第三，汪精卫不愿个人去承担“分共”责任，也担心马上开始分共不能稳操胜券，“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⑧。他对蒋介石说：“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的时候，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就要从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⑨第四，他对蒋有很深的戒备心，蒋发表《拥汪通电》，仅是想增强反共力量，拉他下水，应对蒋有防备一手。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本应对形势和敌情作出清醒的估计，并采

取强有力的对策。陈独秀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于 1927 年 4 月初在与汪精卫会谈了国共两党关系以后，在 4 月与汪精卫发表了一个在客观上起着粉饰太平、麻痹工人警觉作用的《联合宣言》。

4 月 1 日～3 日，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对汪精卫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使国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个不可解的纠纷，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汪听后十分惊讶，并为此质问陈独秀，试探陈独秀的态度。陈独秀力称绝无此事。汪又将陈的话转告给了吴、蔡、李等人。吴同志说，"这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汪又以之告诉陈独秀。"陈独秀遂亲笔作此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10]。他并说这是"一篇辟谣宣言"。

4 月 5 日，《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简称《汪陈宣言》）发表。宣言指出："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并号召："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11]。为此，宣言强调，中共不会打倒国民党，中共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宣言表示"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同时，宣言还声称，"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12]

汪陈宣言发表后的当天，蒋召集的最后一次谈话会上，汪受到几乎所有与会者的强烈反对和攻击。蒋介石等咄咄逼人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领袖共同发表联合宣言会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中国革命从现在起由两党共同领导；孙中山说过"联俄"，而"联俄"只意味着俄国帮助中国革命，但不等于俄国可以控制中国；孙中山只说过"容共"，从没有说过"联共"，而"容共"只是"容许共产党参加国民党"[13]。这时，汪精卫解释说："全



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14]，那只是两党首领外交上的友谊之谈，与两党的政策无关。吴稚晖表示，治理中国只要国民党，没有联合共产党共同治理国家的可能。在争辩时，吴稚晖则大骂汪精卫投降共产党，还斥骂他"狗不如"，要他"滚蛋"[15]。吴稚晖还挖苦汪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16]。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觉得如果再在上海呆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遂决定离沪去汉。4 月 5 日晚，汪精卫悄悄登上一艘海关差遣船，第二天早晨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在中共方面，4 月 6 日，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大家认为，由于汪精卫的到来，与蒋介石的矛盾确实"缓和"了，"汪陈宣言"的出笼更证明了这一点。区委书记罗亦农说："汪精卫的态度非常之好，政治观念很稳定，与 C. P. 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他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的训令。"因此他们完全拥护"汪陈宣言"，而对蒋介石的态度，从主动进攻变为"我们不避免冲突，但不取进攻的形势"[17]。

此后，中共江浙区委、中共上海市执委、中共江苏省委、沪西各工会联合会、浦东工会联合会等机关团体先后发表宣言，表示极力拥护《汪陈宣言》，不为谣言所惑，拥护两党对于目前的革命主张。6 月 7 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也发表宣言，表示将一致行动，共同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此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合作，开始期待已久的以汪制蒋的行动，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要毫不怀疑地与汪精卫合作。

在各方势力都对《汪陈宣言》的一片赞扬之声中，陈独秀以为国共关系从此开始好转，随即于宣言发表的第二天与汪精卫一起乘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亦由上海迁至武汉办公。

汪精卫、陈独秀签署联合宣言，各怀不同目的。汪精卫打算利用陈独秀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以实现他当国民党领袖的野心。于是，汪精卫当面使用激将法，致使陈独秀丧失了警惕性。但汪一转身，则在蒋介石等面前全部抛弃了自己的承诺"全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这样就把蒋介石时刻准备动手屠杀共产党人的真相全部掩盖起来了。而陈独秀企图以汪陈宣言作为缓兵之计，试图以汪精卫充当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从而制止蒋介

石进一步反动。在汪陈宣言发表之前，陈独秀曾多次表示，反蒋的军事准备不足，需要缓和局势，以争取时间。他在1927年3月25日召开的特委会上，一方面表示不管那支反动军队来都要“同他打”；令方面又说，“应尽可能避免冲突”⑱。正是根据尽量避免冲突的策略原则，陈独秀签署了汪陈联合宣言，企图以此来驳斥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污蔑。

汪陈宣言，是1926年12月汉口特别会议以退让求团结的右倾机会主义，在革命危急时期的继续发展。这一宣言的发表，一方面驳斥了国民党右派所散布的谣言，强调了国共应该保持合作关系，打击了国民党新、老右派；另一方面宣言所造成的缓和空气，也在相当程度上麻痹了革命人民，解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共产党员的思想武装，使共产党人对汪精卫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更加深信不疑，在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打了掩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个宣言一发，上海紧张的空气为之一变，以为国共没有问题了”⑲。诚然，《汪陈宣言》的发表确实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不利于中共的负面影响，就如后来周恩来在上海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召开的特委会议上所指出的：“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⑳从这个角度来讲，正如陈独秀日后所说的，这是一个“可耻的宣言”。但这又是在莫斯科高压政策下，陈独秀及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武力反蒋的情况下，采取的无奈之举。

其实，当时蒋介石要在上海举行反革命政变的决心已下，无论苏共中央、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如何延迟与蒋介石的决裂，势力渐强的蒋介石也是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行动了。试图采取不刺激蒋介石的办法来避免冲突，只是一厢情愿。对此，陈独秀事先显然没有估计到。而苏共无论是用“谨慎策略”还是用“坚决方针”来维持统一战线的退让政策都会在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下遭到彻底的破产。

注释：

①《中华民国史实纪要》（1927年4月），第509页。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1927年4月2日。

③蒋介石：《拥护汪精卫通电》（1927年4月3日），《申报》1927年4月4日。

④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册，第474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李济深等发给谭曙卿的电报》（1927年4月5日），见《党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79页。

⑧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册，第474页。

⑨《蒋中正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出席总司令部第五次纪念周讲词》，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南版，第616页。

⑩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册，第475页

⑪《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⑫《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册，第268页。

⑬《四月五日会议纪实》，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70页。

⑭转引自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87、580页。

⑮《寄李石曾书》（1927年4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第315页。

⑯《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第462页。

⑰《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4月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50页。

⑱《特委会记录》（1927年3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档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页。

⑲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45页。

⑳《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在江西、安徽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事件后，于1927年3月26日到达上海，随即和集中在这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大买办、大地主和帮会流氓头子会面，策划反革命政变。

首先，蒋以“战略需要”为由，将革命意志较强的第二军和第六军调出南京，另调嫡系何应钦部队到南京驻防，并把倾向武汉政府的三个团缴械，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捣毁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

3月29日，杭州右派工会组织了一批工贼流氓袭击了杭州市总工会，公开屠杀革命工人及其领袖，作为反革命政变的演习。共产党员宣布中华领导总工会还击，并游行示威，遭军警镇压。

与此同时，蒋还收罗孙传芳残部驻扬州之第五师师长白宝山和驻南通之第九师师长李宝章，分别任第三十五、第八军军长。这样，蒋介石就控制了上海及其外围的重要城市，使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陷于孤立。在上海，蒋介石与青红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勾结，组织一批流氓成立“中华共进会”，由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资助金钱枪械，阴谋捣毁工会，屠杀工人。并指派董福开、张伯岐等一批流氓兵痞，设立所谓“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准备奇袭上海总工会办事处，并解除居住在内人员武装。蒋介石不仅给他们提供经费、武器，而且派遣王伯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这帮流氓党徒则宣誓“投袂奋起”，“甘作前驱”[①]。4月5日，蒋介石又把受革命影响、同情工农的所谓“不可靠”的北伐军调离上海，另调新投诚过来的浙系军阀周凤岐部担任上海“防务”，并成立了上海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为司令官。从而为反革命政变作军事上的部署。

为了麻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政治警觉性，3月28日，蒋介石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②]。并在4月6日派军乐队给上海总工



会纠察队赠送了题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一面，以表示他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3月底，蒋介石命令南市，闸北、沪西、浦东等地驻军，自4月1日起“均特别戒严，遇有形迹可疑工人即加检查”。5日，更借口“目来形势严重”，由总司令部宣布正式戒严。

蒋介石为了破坏革命的上海市政府，先要市政府“暂缓办公”，接着又策动资产阶级代表退出市政府。之后，又进一步向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派驻上海的机构开刀，并下令取缔总政治部。接着，蒋介石又令其部下封锁和检查新闻，所有武汉发来的电报、函件等，一概禁止刊登。

4月初，武汉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驻沪办事处在上海各报连续刊登半版大的巨幅标语“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肃清奉系军阀”、“一切权力属于党，党权高于一切”，等等，反对蒋介石的勾结帝国主义、军阀及专权，并号召各军政治工作人员会议，布置宣传。4月6日，蒋介石手令白崇禧派兵一连，将办事处查封，并逮捕办事人员19人。

4月9日，蒋介石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严禁集会、罢工、游行。至此，一切准备工作已布置妥当。当日，蒋介石离沪赴宁，临行前布置其心腹杨虎留驻上海，直接监督执行其阴谋计划。据这一阴谋的主要执行者白崇禧后来供认：“第一师调离上海后，我着手部署清党之工作。……在开始行动前，我知道商务印书馆工友中有不少系地方帮会分子。所以我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荣等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采取行动之人员，化装成工人混入工厂，以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事前，我还派人与驻沪法国领事进行交涉，请其准许清党之部队经过法租界，因为由法租界至商务印书馆工厂是一条捷径”③。

在这紧急时期，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他不是更深入地发动群众，来支持和巩固这个政府，反而十分害怕，唯恐政府中没有资产阶级代表就不能进行工作。但当陈独秀右倾机会分子忙于拉拢资产阶级的时候，蒋介石却已指派其党徒吴稚晖、白崇禧、钮永建、陈果夫等于4月8日组织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④。

蒋介石的反动，博得了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奖励。上海的中外反革命分子送给蒋介石等1 500万元的屠杀经费，并预约在大屠杀后将以3 000万元的巨款作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王朝的资本。蒋介石用所收到的经

费收买各军及流氓，作为建立反革命王朝的基本力量。

帝国主义者不仅给予蒋介石以经费支持，而且直接用武装力量予以配合。4月11日深夜，帝国主义军队越过租界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 000多人，交给蒋介石的反革命司令部。

在帝国主义的指使督促下，反革命分子的大屠杀开始了。

4月11日，蒋介石下达“清党”命令。当天深夜，帝国主义军队越过租界，搜查、拘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1 000余人，转交给了蒋介石。12日凌晨4时左右，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按照预定的计划，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特务，佩带“工”字号袖章，冒充工人，从租界分别冲向闸北、南市、沪西、南京、吴淞、虹口等地袭击各区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这时，蒋介石布置的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械，并与青红帮流氓打手一起疯狂屠杀工人。当天，被收缴的纠察队共有14处，工人被打死120人，打伤180人。同时，由流氓党棍组织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占据了上海总工会会所，反动军队查封一切工会组织，捕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帝国主义侵略军也直接触动，参加了这场屠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也在11日晚自闸北去法租界赴杜月笙之约，陷入了反动派预先布置的圈套，即被秘密扣留并遭杀害。

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后，反动派知道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还没有完全被击溃。白崇禧、周凤岐即以淞沪戒严司令名义，发布通电和布告，诡称流氓袭击工人为“工人内讧”，所以缴械；同时颁布严禁罢工令，防止工人罢工援助。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支持蒋介石上述反革命行为。南北市商业联合会等给蒋介石发出电报，对于“共进会”流氓攻打上海总工会“成功”表示祝贺。上海商业联合会和银钱两业公会还分别发出拥蒋清党电，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5]。

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上海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当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市民代表会和市政府、市学联、市妇联等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文电或提出质问，一致声援上海总工会，指责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军队中的正义军官也反对蒋的倒行逆施，如第二十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赵舒十分愤慨，在反对无效时，即留书出党。赵出走后，该军政治部全体人员，亦自行宣布解散，并有数十名革命士兵携带枪械离开部队。

12日中午，数万名工人在闸北青云路举行集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



罪行，要求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惩办凶手。会后出发游行，由青云路、宝兴路、由中华新路抵达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时，一致要求占领会馆的军队撤退，交还总工会会所。军队起初拒绝撤退，工人群众悲愤填膺，一拥而入，驻军遂被迫退出。湖州会馆夺回后，总工会继续办公，并立即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决议自即日起宣告全市总罢工。总工会发布了紧急罢工命令、总同盟罢工宣言、对全国同胞的通电和责问蒋介石的电文。在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下，全市参加总同盟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以上。

13日上午10时，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虽然反动派沿途堵截，沪东、沪西和南市的工人，但闸北和各区群众到会者仍有6万余人。大会一致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下午1时，工人群众冒雨游行示威，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赴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和交还纠察队的枪械。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时，预先布置在附近的士兵即从里弄中分头冲出，向毫无准备的徒手群众开枪，将群众队伍冲散，接着用机关枪扫射，实行惨绝人寰的反革命大屠杀。当场被击毙者10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另有90余人被捕。时值大雨滂沱，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反动派为掩护其血腥罪行，于2时10分立刻实行特别戒严，禁绝行人，用大卡车把死者运往荒郊埋掉，尚有重伤未死者，亦被一起拖去活埋。

13日下午，反动军队重新占领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反动派组织的“上海工界联合总会”随即发表所谓《就职通电》，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上海总工会，封闭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及一切革命的机关、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

14日，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被封闭，执行委员十余人连同办事员工役等20余人被捕。接着，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也被强迫“改组”。

自14日起，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地各工会均被军警查抄封闭，到处是戒严、搜查、殴打、逮捕、公开的和秘密的屠杀。上海变成了“狼虎成群”[6]的恐怖世界。无数优秀党员和工人领袖遭残害，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张佐臣、杨培生、郭伯和等，均先后光荣牺牲，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上海总工会于14日下午召集全体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下令“着即命令已罢工各业各厂工友，自十五日起，于开追悼会后，一律忍痛复工”。并表示：“此后本会仍本初衷，领导全上海工友作政治与经济的奋斗”。号召“各工友仍当继续团结，勿为反动派权势所惑，勿因暂时挫折而气馁。死难烈士之精神不死，权上海工友团结在本会旗帜之下，继续死难烈士之精神以奋斗。”⑦从4月12日至15日，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 000多人失踪。随后，反动派为了缓和工人群众的反对，又将臭名昭著的“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

上海总工会于15日将“四一二”事变经过及蒋介石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呈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并派代表前往武汉当面作详细报告。呈文要求中央党部和政府“迅速将蒋介石免职查办，明正典刑，以平民众之愤怒”，彻底肃清“一切附和蒋逆之反动分子”。“对此上海80万忠实革命被压迫的工友和东南数省陷入水深火热的民众，迅速予以援助。”⑧

与此同时，蒋介石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4月18日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精心策划的，蒋介石已经公开地“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虽然他在表面上“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⑨。这次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生了巨大分化，国民革命遭到局部失败，革命进入紧急阶段。

注释：

①《时报》（1927年9月9日）。

②《申报》（1927年3月29日）。

③《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45页。

④《申报》（1927年3月29日）。

⑤《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61页。

⑥“狼虎成群”是当时上海人民咒骂杨虎、陈群等刽子手的双关语。

⑦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

⑧《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6页。



广州等地的“清党”运动

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即将“清党”运动在军事方面的部署委托给白崇禧。白“将驻沪之亲共部队分别调离或解决，密令第七军三日内赶到芜湖、江宁镇，以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之东下，将有亲共色彩之第二军渡浦口抵御直鲁军，将第六军附共之十九师全部缴械，同时令共党较多之薛岳、严重两师移驻苏州及南京附近整理，将各共党分子撤差或看管，又调刘峙、周凤岐两部接防上海”[①]。

蒋介石在军事上控制了南京、上海及江浙之后，便部署“清党”反共。为了使反革命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蒋介石邀请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和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到上海进行策划。

3 月 28 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在上海开会。会上，吴稚晖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②]。会议决定由吴稚晖拟具草案交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4 月 2 日，蒋介石召开秘密会议，同广西、广东来的黄绍竑、李济深，以及李宗仁，制定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同日，国民党中央部分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蔡元培、吴敬恒（吴稚晖），张静江（张人杰）、古应芬、陈果夫、李煜瀛、李宗仁、黄绍竑 8 人，由蔡元培主持，在上海举行“全体会议”。会上由吴稚晖提出《检举共产党呈文》，诬蔑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③]。会议通过吴案，按国民党忠实分子、可疑分子、共产党分子及附和共产党分子四个标准，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排了队，列出共产党分子和附和共产党分子名单，决定将此呈文送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决定，“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并附上包括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等在内的应先看管者 197 人的名单，要求作“非常紧急处置”，此文发出后，由蒋介石

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出布告，统治各军严加看管、监视共产党员的活动。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又在广州、浙江、四川等地陆续进行反共“清党”。

李济深由沪返粤后，于4月14日晚召集紧急会议，部署“清党”，并组成了所谓五人特别委员会，由钱大钧为戒严司令，充当屠杀的刽子手。同日，广州市党部发出通知，号召检举共产党。广州市公安局和戒严司令部发布告，声称奉总司令之训令：“迅将广州市附近所有共产分子，一律逮捕，……其工会之武装纠察队，亦应同时派队勒令缴械。”[④]15日，黄埔要塞司令吴思豫下令收缴黄埔军校学生枪弹，逮捕并枪决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16日，李济深、古应芬等组织“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特别委员会”，声称负广东省党、政、军的全责，并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接着，他们在广东全省进行“清党”。从15日至27日，反动派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逮捕和杀害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2 100多人，其中包括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刘尔崧等著名共产党人。同时驱逐了2 000多铁路工人，有些劳动童子团团员也被杀害。

1927年4月12日，广西省主席黄绍竑指令南宁守军黄旭初“清党”。黄将共产党员梁六度等13人逮捕，其余通缉。5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黄绍竑、黄旭初等7人为广西清党委员。他们不仅杀害共产党人，而且连倾向革命的人士也不放过。

4月4日，福州召开“拥护蒋总司令护党”大会，决议驱逐、逮捕共产党人。到4月7日，有黄素云等10余人被捕，马式材等逃离福州。4月9日，福建全省戒严。5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黄展云、林寿眉等9人为福建省清党委员，福建省清党运动全面展开。

1927年2月，张静江、蔡元培、褚成辅等在东路军克复杭州后进入杭州，组织了浙江临时政治会议，成立临时政务委员会，并由反动工人领袖杜震卿组织职工联合会，与共产党员宣中华主持的国民党省党部和浙江总工会对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波、温州防守司令王俊首先下令解散宁波总工会，接着嘉兴县党部被毁。浙江“清党”运动于4月下旬逐渐展开。6月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张静江、蔡元培、沈定一



等9人为浙江省清党委员。在清党中，著名共产党员宣中华、安体成、杨眉山等被捕遇害。

在安徽，安庆事件后，党的力量遭受损失。1927年4月18日，安庆反共团体举行庆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会，发表拥蒋清共宣言。同时，芜湖等县市也发生捣毁党部、解散工会等事件。5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柏文蔚等7人为安徽省清党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四川已发生“三·三一”惨案。3月31日，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趁“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市民大会之机，经刘湘同意，派兵包围会场，搜捕共产党；搜查吴玉章等开办的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封闭四川省党部、市党部、县党部、省农民协会、市总工会。逮捕了共产党和左派杨闇公、陈达三等，死者达400以上，工人纠察队全被解决。4月4日和6日，成都、重庆两地分别成立“登记委员会”，代行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职权，随后下令解散全川学联会、成都学联会等进步团体。4月9日，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等7军长联名通电，正式宣布反共清党。

各地区“清党”后，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被改组，工会和农民协会被解散，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的大屠杀，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武装被缴械，共产党员转入地下。蒋介石控制了宁、沪，建立了东南数省的反革命基地。

当蒋介石等在南方大肆进行反共清党之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加紧了对革命运动的破坏，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南北反动势力遥相呼应。

1927年4月6日，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驻华使团的允许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包围并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及其附属机构，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使馆中避难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60余人。

李大钊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当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时，李大钊否决了这一行动，因为在当时环境下没有实现这种计划的可能。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同志们为冒险而蒙受更大的牺牲。中共的当地组织接受了李大钊的这一指示。

4月18日，张作霖在天津杀害革命志士10多人。28日，他不顾人民群众的抗议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又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绞杀了李大钊等20余人。李大钊在绞刑架前，向在场的军警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演

说，指出："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李大钊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光辉业绩，永远值得人民缅怀，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和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永远是人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泊中，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等于4月18日上午，在南京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举行大典，宣布"定都"南京，即日起在南京办公，南京政权形成。同日，国民政府发出秘字第一号命令，通缉中央和各地的"共党及附共分子"。著名共产党人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夏曦、邓颖超、罗亦农、周恩来、林育南等，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徐谦、邓演达、彭泽民、詹大悲、柳亚子、章伯钧等，共197人，受到"通缉"。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布告《全体将士书》，蒋介石也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要求军队拥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消灭汉口国民政府。20日陆海军将领集合南京，决议拥护南京政府及中央党部，否认武汉联席会议。

蒋介石南京政府是一个十足的卖国政府。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都竭力拉拢蒋介石，以使之成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日本力促蒋介石同张作霖联合，但蒋介石一心想一统中国，而不愿与张作霖分享天下。这样，日帝国主义的蒋——张联盟失败，南北妥协最终并未实现。而蒋介石上台凭借的上海大资产阶级大多与美国垄断资本一伙，于是，蒋介石决心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来实现其独霸中国的企图。另外，蒋介石仍以"北伐"为旗帜，因为他深知，反革命只是在局部的胜利，而"北伐"是其与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的政治资本，一旦丢掉"北伐"就有被武汉击溃的危险。于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仍然抓住"继续北伐"的旗帜，在英美的支持下，与奉系相对立。这时，蒋介石的"北伐"已经毫无革命意义，只是蒋麻痹人民的口号而已。

这样，全国就形成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

蒋介石的叛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武汉国民政府都对蒋介石的大屠杀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和声讨。

4月16日，汪精卫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电达南京，斥责蒋介石"竟敢



使西山会议继续开演于南京，且竟于上海屠杀工人，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⑤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免除蒋介石本兼各职的命令：“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此令。”⑥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假使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一日不消灭，那么打倒一个蒋介石之后，难免不有更残忍更流血的蒋介石之继起。”最后，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为“推翻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⑦

4月22日，中国共产党员与中国国民党员代表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另立中央，蓄谋已久。号召广大民众、全体国民党员及全体官兵，“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为国民革命涤此厚辱”⑧。

这些宣言和通电，在某种程度上给蒋介石等新右派以有力的打击。但这仅仅是政治上的斗争根本无法遏制蒋介石的继续反动。

注释：

①白崇禧：《在广西各界举行清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4月）。

②《中国国民党举行清党前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1927年3月28日）。

③《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吴敬恒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1927年4月1日）。

④《黄埔日刊》（1927年4月20日），第305页。

⑤《汪精卫斥蒋介石违背中央命令反抗中央铣电》（1927年4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

⑥《武汉国民党中央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1927年4月17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页。

⑦《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4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页。

⑧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中共五大的召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使中国的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失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区又重新陷入了反革命的恐怖统治之下。但这还不是革命完全和最后的失败。在当时，武汉地区及其附近省区的工农运动仍在继续高涨。据 1927 年 6 月公布的材料，这时全国工会会员已发展到 290 万人；一些地区的工人还建立了武装，如武汉工人纠察队即有 5 000 人，3 000 支枪；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这时已发展到 915 万多人，其中湖南 451 万多人，湖北 250 万人。在湖南，雇农提出了“均佃”的口号，有些地方的贫雇农甚至开始自动起来丈量土地，并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加以分配。

不过，武汉国民政府的形势已经变得十分严峻。新旧军阀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京汉、粤汉铁路和长江的交通运输均被切断。地主阶级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相呼应，正集结各种反动势力，组成反对土地革命的联合战线，向革命进攻。帝国主义者关闭了它们在武汉的工厂、银行、企业，资本家也纷纷抽逃资金，实行关厂歇业。武汉地区货物缺乏，物价飞涨，财政收入锐减，军费无着，人心浮动。劳资关系也日益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地区的资产阶级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工农运动过火”的叫喊声一时甚嚣尘上。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一天一天地受到大资产阶级影响，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①。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等会谈时，就没有在原则上反对反革命“清党”计划，只是在分共程序等问题上与蒋有分歧。他口头上声称要继续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甚至高喊“革命的左边来，不革命滚开去”，但在骨子里，他“自始即不满马克思之学说”②。他认为，国共两党是不可能长期合作下去的，“容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当时分共的“时机未到，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③。“由 4 月下旬～5 月中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

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便是此意"[④]。与此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也陆续制定出来了。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1927 年 4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82 人，代表党员 57 967 人。另外，共产国际及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国民党的代表徐谦、孙科、谭延闿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大会进行了两个星期。

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指导下举行的。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因而表示完全接受，并要求全党“按照决议所指示的，努力工作”。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报告，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通过几项决议，选举中央委员会。

大会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过去策略问题。在报告中，陈独秀不仅没有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而还加以发展。他极力为他在处理“三二〇”事件上的右倾错误进行辩解，认为当时要“镇压蒋介石”，“我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是不够的”，因此，“中央便通过了退守和让步的策略”。肯定无产阶级只能够进行经济斗争，而根本不应该搞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因此，他认为上海工人的三次起义“有革命方法的错误”，“是冒险地举行胜利的暴动”等。[⑤]

第二，目前阶级斗争形势问题。陈独秀错误地认为“虽然革命队伍在数量上减少了，然而他在质量上提高了”，所以，“革命运动中的潜在危险大为减少。”[⑥]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认定“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将要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这样，这个决议案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由此而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这一方面，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从而可能导致在工人运动中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动。另一方面，由于不承认部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仍然留在统一战线之内，把已经在汪精卫、唐生智控制下的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



盟，从而可能在处理有关问题时采取右的迁就主义的政策。

第三，革命发展方向问题。在报告中，陈独秀附和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的“到西北去”的理论，并加以宣扬和发挥。认为在广州、上海、汉口、天津以及其他工业区，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力量，都不能发展革命，因此，“中国革命应向西北方向发展，因为：第一，那里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第二，那里可以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⑦]。为了辩护这一理论，他甚至还不伦不类地举出太平天国的失败为例证。大会批评了“西北学说”，认为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是一种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理论，指出：“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

第四，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公开主张放弃无产阶级对政权的领导权，他认为“无产阶级现在并不希望完全掌握政权而且目前手中也没有决定性的力量。共产党还没有能够统治政府的足够的军队”。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在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指责了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对于革命拥有“天然”领导权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是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背道而驰的，即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决议指出：“自五卅运动起，……我们的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三月二十日事变……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但是，却没有提出如何争夺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办法，所以，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五大’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⑧]。瞿秋白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批判彭述之、实即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原名《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但是大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够重视，正如李立三后来回忆说：瞿秋白的“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

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⑨]。

第五，土地革命问题。毛泽东向大会提出了“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并建议党在土地纲领中应规定“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⑩]。关于农民的土地问题，陈独秀指出：“尽管我觉得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但是，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是太激进了”。为了“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在相当时期内，或许在很短期间，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由于土地革命问题是“五大”的中心议题，所以大会专门作出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充分估计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指出：现阶段农民运动“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决议案》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主要是：“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不没收。”[⑪]此外，还规定没收一切共有田地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这些规定表明党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但是这个决议案只是个初步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它显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东南各省地少人多，大地主很少，中小地主很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就无法满足那些租种小地主土地的广大贫农群众的要求。当时中共中央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身上，而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次关于土地问题的规定，在会后提交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去讨论时，结果是只在原则上规定了要解决土地问题，但不要求立即解决，中共中央对此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这次大会的土地纲领成为空谈。

与会的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特别指出他在“三二〇”事件上的错误。大会把土地问题列为中心议题是正确的，问题是没有解决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的军队和政权问题。军队问题虽然是当时挽救革命的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大会却没有集中力量讨论这个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大会根本没有打算立即着手建立和扩大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忽视军队问题，这是大会的一个致命缺点。王若飞曾经指出：“‘五大’之错，不在于未没收土地，而是未直接去搞政权军队。………中心问题是没有注意搞



武装……有了武装就会有办法组织一切。”[12]

党的第五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大会宣言。选举了29个中央委员和11个候补中央委员，由于陈独秀在表面上承认了他的错误，因此大会仍然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大会之后，陈独秀以总书记的身份发号施令，继续贯彻执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而且变本加厉，这样，革命面临的危机就更加无法挽救。

中共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并且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但是没能够提出夺取领导权的有力对策，尤其是对共产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这一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同时，没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算和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也没能从组织上撤换犯错误的主要领导。可以说，整个大会的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恰当的方针和政策，这样，大会就未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职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统治全党，危害着中国革命事业。

注释：

①《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0页。

②吴稚晖：《书汪先生铣电后》。

③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④同上。

⑤米夫：《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

⑥陈独秀：《政治与组织报告》。

⑦《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⑧《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9页。

⑨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1930年1月。

⑩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篇四。

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54～55页。

⑫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国民革命在局部地区遭到失败。这时，武汉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广大地区，工农革命运动向纵深发展，引起了反动军官的仇视。他们同外部反动势力勾结，相继在湖北、湖南发动叛乱。首先发难的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

夏斗寅原系北洋军阀的旧部，在肖耀南手下任旅长，驻扎长沙。1926年，随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北伐，攻克武汉后，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兼湖北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初，该师移驻宜昌，其任务是防备四川军阀进犯武汉。但是，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乘国民革命军大部开赴前线时，与驻守在川东的四川军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杨森相互配合，直逼武汉。

5月初，四川军阀刘湘受蒋介石之命，在重庆召开反共会议，决定“讨伐武汉之用兵步骤，公推杨森任各路川军总指挥”①，开始大举向东进犯。而杨森早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清党”之时，就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率兵10万，“直捣武汉，实行武力清党”②。5月4日，杨森向其部队下达动员令。5日，该部自万县举兵东下，随后即通电“讨伐”武汉政府，公开拥蒋反共。此时，蒋介石又密令夏斗寅部“会同杨森之川军及李桑的黔军向武汉方面进逼，以资牵制”③。杨、夏等接到蒋介石的反共密令后，双方密定欺骗武汉国民政府的诡计。5月7日，夏斗寅一面佯装战败，率部自宜昌退往沙市，将宜昌拱手让与杨森；一面又召开营、团长会议，火速调派轮船20艘，协助杨森运兵东下。

5月9日，杨森率部进占宜昌后，立即下令捣毁各级党部，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大肆屠杀工农群众。

为了麻痹武汉政府，夏斗寅向武汉中央谎报战功，说已在荆沙击退杨森，并声称：“我们是宜昌的屏障，不让四川军阀杨森侵犯我们的防地—



步"[4]。当军事叛变准备就绪后，夏斗寅于5月13日（元日）发表反共通电，攻击共产党"盘踞要津"，"以暴民政治扰乱"两湖，并狂妄声称他要"为民请命"，要推翻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重建新政"[5]。

南京蒋介石政府致电夏斗寅，对其反共"元电"极表赞赏，并鼓动夏部"锐进救援，勿稍瞻顾"[6]。反共"元电"发出后，杨、夏两部齐头并进，直趋武汉。

这时，武汉十分空虚，夏斗寅叛军因有蒋介石为后盾，又有杨森相配合，并约集何键、刘佐龙等部为内应，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企图一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对于夏斗寅的这次叛乱行动，蒋介石于5月20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作了如下介绍：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均已进攻武汉。杨任江北岸，夏任江南岸。自本（五）月六日起由宜昌出发，北岸军已于十七日到岳口，杨军长抵沙市。南岸军已于十四日至沙市，十五日至嘉鱼，十六日至咸宁、汀泗桥一带，拆毁武长路轨八里余，十八日抵纸坊，将一鼓急冲武汉。"[7]22日，蒋介石公开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宣称："夏斗寅之起而宣言反对共产，与杨森、刘湘同受余之命令"[8]。

夏斗寅"一到咸宁，即将在押之土豪劣绅，一律放出，该土豪劣绅等，即引着夏逆军队，到处捉拿农会工作人员及农友，农友之被拿枪毙者，数以百计。"[9]

此次叛乱事件，引起了武汉地区局势的严重混乱，市面上谣言四起，米商关门停业，纸币的行使也因之停滞。中国共产党团结国民党左派，审时度势排除干扰，迅速动员组织广大革命群众投入反击夏斗寅、保卫武汉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去。

5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指出，"夏斗寅的叛变，是表现目下反动分子假充革命党事实依然存在，这些反动分子虽说站在革命战线里，他们却时时想利用机会，反对革命破坏革命。"并庄严宣布："无产阶级将武装起来枕戈以待，保障革命"[10]。《告民众书》重申了中国共产党联合"中等阶级"的政策，揭露了夏斗寅妄图破坏国民革命，分裂反帝联合战线的阴谋[11]。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宣布："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罪行昭著，应即褫职拿办"[12]。

5月19日，武汉三镇各界群众分别在武昌、汉口、汉阳举行讨夏大会，仅武昌会场就有50多万人参加大会。[13]大会发表了《讨夏告民众书》，号召各界群众"认清我们在严重局面的责任，要一律武装起来，帮助革命的军

队，打倒反动的夏斗寅，肃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巩固我们革命的后方，援助北伐胜利。”[34]董必武在武昌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夏逆打出拥蒋的旗帜，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讨夏便是“表示革命民众对反动派绝不宽容，与之誓不两立”。

为了讨伐夏斗寅的叛乱，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中央独立第一师（由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中央农讲所学员合编而成）所辖两个团及十一军教导营，于17日驰往纸坊。同时，急召在九江、武穴方面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军回援。

在这危急关头，受命平叛的叶挺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奔赴前线。5月18日，先头部队猛攻纸坊之敌，并收复该镇。19日，后续部队赶到，再度与叛军交火，击退叛军的反扑并乘胜追击。20日，叶挺部队追击叛军进入咸宁，叛军残部向崇阳、通城方向逃遁。这时，作为夏斗寅内应的何键已率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开赴河南前线，刘佐龙则惧怕叶挺独立团而未敢轻举妄动。

武汉革命军讨夏战斗首战告捷，使武汉得以转危为安。5月21日，宣布解除戒严。6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又派叶挺率领第二十四师前往鄂东一带追剿，夏斗寅率残部于6月底退出鄂境投靠蒋介石，被编为第十军第一师，驻守太湖以南地区。

在反击夏斗寅叛乱的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进行了反击杨森的斗争，5月25日，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令抽调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八军各一部，组成西征军，由程潜任总指挥，讨伐杨森。是日，西征军自武汉出发，开赴仙桃镇，与叛军展开了拉锯战。6月上旬，军事委员会西征部队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取得重大胜利。6月24日，西征军收复被叛军盘踞了一个半月的宜昌，杨森率部分水陆两路向巴东逃窜。西征军的胜利，使杨森暂时无力再进窥武汉，从而使武汉政府免去了西顾之忧。

至此，夏斗寅勾结杨森的叛乱被平息。夏斗寅叛乱的被平息，是对反动势力的一次重大打击。

夏斗寅叛乱虽被粉碎，但它触发了一系列叛乱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叛军所到之处土豪劣绅蜂起响应，叛乱波及湖北全省。夏斗寅的叛变表明武汉国民政府已发生动摇，成为汪精卫集团用反革命暴力手段公开叛变革命的先兆。

继夏斗寅叛变之后，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反共军事政变。因



该日的电报代日韵母为“马”字，故这一事变，史称“马日事变”。

许克祥原是土匪出身的军人，曾在军阀部队里当过连长、营长。1926年，贵州军阀袁祖铭进驻湘西，许投奔袁部，升任旅长，进驻常德。北伐开始时，唐生智电令袁祖铭部开赴北伐前线，主攻鄂西方向。袁祖铭却裹足不进，坐地为王，搜刮民财，联络土匪，招募溃兵，扩充实力，大有想占湘军地盘之意。唐生智大怒，数电促之，袁仍置之不理。1926年冬，唐生智命令第八军教导师代师长周斓瓦解袁部。周怕袁起疑心，乃联络许克祥作内应，并于1927年1月31日在常德摆下“鸿门宴”，许协同教导师当场捕杀了袁祖铭。袁部瓦解后，唐生智将许部改编为独立第三十三团，任许克祥为团长，驻扎湘乡、湘潭一带。许克祥虽接受唐生智改编，但对唐存极大戒心，担心唐终有一天要除掉他。许克祥率部进驻长沙后，在他住的房院天井架设一门大炮，对准省主席唐生智的公署（唐当时不在湖南时由张翼鹏代省主席）。许、唐关系实际上很紧张。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驱唐势力出湖南这一点上，与许克祥是一致的。

早在4月底，何键在汉口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密商发动军事政变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在湖南发难。会后何键将移驻长沙受训的三十五军学生扩充为教导团，由王东原任团长。又以增防省城为名，将独立第三十三团许克祥部从湘乡、湘潭调往长沙城。同时委派三十五军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作为他的代理人，具体负责发动叛乱的各项准备工作。

以许克祥为代表的一批混进国民革命中的反动军官，极端仇视湖南农民运动，肆意攻击农民运动“过火”和“遭得很”，处心积虑地策划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活动。夏斗寅叛变后，他们加快了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步伐。

何键在率所部主力去河南参加第二次北伐前，曾派参谋余湘三赴长沙，与许克祥、王东原、陶柳等人策划举行反共事变。5月17日，许克祥、余湘三、王东原、陶柳等在许的团部举行会议，推定许克祥担任军事叛乱行动的指挥官，决定于21日夜在长沙发动军事政变。

5月18日，反革命分子许克祥等乘机大肆造谣说“武汉的国民政府倒台了”，“鲍罗廷已被枪毙”，“邓演达被捕了”，“唐生智被部下软禁于信阳，何键在广水就任总指挥职务”，“各军政治工作人员皆被枪决”，“杨森的军队已进驻刘家庙，夏斗寅的军队已进驻武昌城”等等，使得长沙城内人心惶惶。19日晚，三十五军留守处部队开始在长沙公开挑衅，夺走电气工会工人纠察队枪支，许克祥还组织士兵打伤工人纠察队人员多人。20日，

许克祥派人把守邮电局。

5月21日晚11时，在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后，许克祥率领1 000余人以白袖章、白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封闭并劫掠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省党校及其他一切革命团体，解除了长沙市1 000余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队的武装；省特别法庭被捣毁，释放了所有被监押的土豪劣绅；撕毁了全部有关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铲除土豪劣绅的革命标语，而代之以各色各样的反动标语；枪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革命分子还组织了清党委员会并成立了反动的政权。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

22日晚，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叶琪从岳阳来到长沙，为许克祥打气，鼓励他继续“清党”反共，要他们造反革命舆论，嫁祸于共产党。根据何键的反共方针和叶琪的指示，许克祥等随即散布谣言，诬称“此次事变全系共产党发号施令”，“指使爪牙，围攻军队”，“阴谋暴动”所致。

23日，许克祥、王东原等公开成立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临时办公处”。24日，由许克祥、王东原等五个反动团长以“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临时主席团”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释放一切在押的土豪劣绅，发还没收他们的财产。并攻击共产党“锄诛异己”，“招纳亡命之徒”，“折断联合战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是“危害党国、残害人群之暴徒，早应彻底铲除”。

长沙大屠杀后，在常德、溆浦等地的反动军官相继叛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24日，常德有200余人惨遭叛军杀害。同日，溆浦县各机关团体代表100余人扛着酒肉前往陈汉章警备司令部进行慰问联欢，突遭陈部枪杀，当场被打死30余人。翌日，溆浦县属各区，均遭陈汉章叛军蹂躏。[15]

27日，许克祥出面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正式组建“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取代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权，会议推举许克祥、王东原、张敬兮、周荣光、李殿臣等为委员，“救党委员会”成立后，“即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改组”，并“通令各县一律拿办”国民党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的执行委员，“枪杀勿论”[16]。

与此同时，许克祥等仍继续大肆进行反共活动，野蛮屠杀革命群众。马日事变后，许克祥在长沙一连屠杀了七八天，白昼戒严，用砍手足、剜眼、



割耳、腰斩、剥皮等极其野蛮的手段残杀人民。许克祥又派人到各县去屠杀工农，摧残革命团体。在湘潭、衡阳、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安乡等地均发生反革命屠杀事件。从5月21日~6月10日前后，在湖南的二、三十个县中即有10 000多人被杀害。

马日事变是武汉“分共”的一个开端，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开始叛变，并准备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的信号。

注释：

①天津《益世报》(1927年5月14日)。

②杨森：《九十忆往》，《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5月)，第891页。

③陈训正：《蒋总司令下野北伐中挫》，见《革命文献》第15辑，第748页。

④时宣：《平定夏斗寅、杨森叛乱的经过》，《武汉文史资料》第15辑。

⑤《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

⑥《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四号。

⑦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府》，台北1972年，第313页。

⑧天津《益世报》(1927年5月25日)。

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3日)。

⑩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2日)。

⑪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2日)。

⑫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8日)。

⑬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⑭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9日)。

⑮童紫剑：《一九二七年五月溆浦反革命大屠杀始末》，《湖南文史资料》第5辑。

⑯《长沙事变经过情形》(二)，《向导》第199期(1927年6月22日)，第2187~2188页。

中共湖南省委、武汉国民党中央与中共中央的策略

马日事变的恶性发展，与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有重大关系。1926年冬，中共中央召开了12月特别会议。会议错误地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并要湖南省委代表回去制止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在农民运动问题上出现了右倾动摇。

马日事变前，中共湖南省委“知道事变之将到，原有一个反攻的计划”。由于“当时的党虽则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经验”，事到临头，手忙脚乱，这个计划未能实现。[①]湖南反动派已在各地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湖南省委是有警觉的。针对反动派的屠杀活动，省政府、省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各团体发布告，组织宣传队，镇压谣言；宣布戒严；准备全省武装工农，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义勇队，交省政府统一指挥，戒备一切；派人到中央和唐生智总指挥部报告湖南严重形势。

20日晚，湖南省委为了应付突然事变起见，召开会议，决定由薛世纶、王则鸣、林蔚组织秘密省委，以便发生事变时行使省委职权。原省委几个公开负责人如郭亮、夏曦等则分别转移至湘东、湘西、湘南指导工作；省委通知各县，要各县农民自卫军准备就地自卫，应付突然事变；王则鸣领导工农武装，必要时可拉到株洲、醴陵一带，靠近程潜第六军一个师。同时，还给省委发了隐蔽、疏散的路费。但是，决议大部尚未通知各地进行部署，事变就发生了。21日晨，敌人尚未行动，原省委书记夏曦不辞而别，自己逃走了。当日晚，省委又开会决定由郭亮代理书记。事变发生后，22日，郭亮离开长沙，跑到湘阴去了，秘密省委书记薛世纶躲进长沙一个饭店。自22日以后，省委无人负责。直到29日，中共中央才派易礼容为湖南省委代理书记。代理省农民协会委员长柳直荀等转到湘潭、湘乡一带，准备在那里集



结农民武装反击敌人，并成立总指挥部。

5 月 23 日～31 日之间，长沙附近数县奉命集结的工农武装达 118 000 人，他们准备分四路会攻长沙。浏阳农军并已抵达长沙城外，湘潭、易家湾等地农军也与反动派交上了火[②]。当时，长沙城内的反动军队仅 3 000 人，十万农军扑攻长沙的计划是有绝对把握的。但当农民军准备对长沙城发起总攻击的时候，以陈独秀代表的中共中央却训令农军撤退，害怕进攻将引起"政局的纠纷"，指出"应当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③]。中央并且责备"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惩罚土豪劣绅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是酿成反革命事变的重要原因。中央的训令由省委进行了传达。"因为在省方的负责人不知道武汉方面的实情，又听说国民党中央派人来湘调查和解释误会，以为不可盲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予收拾，中途改变计划"，叫农军"停止出发"[④]。当时由于发信太迟，浏阳的队伍已经出动，未及接获命令，因此才有 5 月 31 日浏阳农军单独向长沙进扑的壮举，但终因众寡不敌，被迫退却。退却的结果，反革命趾高气扬，大奏凯歌，使工农群众陷于血泊中。

6 月 4 日，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向各级组织转发了省委关于同许克祥妥协，防止游击战，不要发动任何群众性政治运动去反对长沙事变，秘密准备武装斗争等决定。之后，省委和省党部组织了湖南请愿代表团，于 6 月 10 日，22 日，三次向国民党中央呈交报告纲要，揭露了事件真相，争取了同情。[⑤]

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认为，马日事变是"长沙农工纠察队与驻在军队发生的冲突"，主张以"军队应维持治安"和"农工纠察队应严守秩序不得报复"的办法来解决[⑥]。遂采取了姑息、妥协的态度。

5 月 19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其发展的各项训令中，对工人运动规定许多条条框框加以限制，并宣布：各级党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训令各项规定；对于胆敢违反或不执行规定的党员，"应加严厉之制裁"，如各级党部执行不力，"中央必予相当惩戒"。[⑦]

5 月 20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又向各级党部发出"纠正农运"的训令，对抵制其训令者则指控为"借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既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于反革命"，责令"各地党部随时制裁"。[⑧]同日，还发布"制裁越轨行动"的训令，指责各种民众运动往往与中央决议有出入，甚至背道而驰，并宣布中央为矫正这种现象，决定在武汉政府所辖之湖南、湖

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亲赴各地切实执行中央决议，制裁越轨行动。

5月26日，由谭平山任部长的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发表布告，通知民众，对于农民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越出正轨者加以制裁，农民皆应安居乐业，至于反革命分子如何肃清，土豪劣绅如何惩办，概由政府机关办理，不得自由行动[9]。

5月2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就马日事变训令全体国民党员，声称“误会必须免除，错误必须纠正”。在这里，武汉国民党中央依然偏袒许克祥等反动军官，把他们对工农的屠杀说成是“误会”，并且坚定地表示要“免除”。而对工农运动则大加指责，并决心加以“纠正”。当湖南农民群众对反革命屠杀准备进行反攻时，又训令“不得各逞忿怒，轻启衅端”[10]。

5月31日，汪精卫、谭延闿在给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的电文中说：“湘省农工运动幼稚失当，中央早思制裁”，“故对于此次军队与农工纠察队冲突，亦能谅解”，并说“最近派周斓前来宣慰军队，即是此意”[11]。在这里，汪精卫等人偏袒、纵容许克祥的真面目已昭然若揭了。

6月1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公开声言：“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像这样逼得人无路可走，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

6月2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竟然训令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政府解散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卓有成效的国民党黄冈县党部、县农协，同时还发布对各级国民党党部训令，要各级党部慎重“党员之选择”，加强“党部之训练”，全力“宣传党义”，注意指导民众运动不要过火。[12]

6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省农民协会、省工会、均应改组；长沙、岳阳的一切部队，均归副军长周斓指挥；军队及工农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行动；其他一切事宜，均归特别委员会办理。

这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更加依赖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并给予厚望。6月4日，中共中央就马日事变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觉醒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并提出了解决马日事变的6条办法：“一、国



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13]从马日事变到6月4日，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中共中央不正面揭穿敌人的狰狞面目，不及时武装自己，对抗敌人，依赖武汉政府，坐视敌人势力蔓延，而形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6月1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派唐生智"查办长沙事件"。26日，唐生智刚到长沙就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身上。他认为许克祥叛变只是"激于义愤，实误触纪律"，要求对许"从轻记过一次，留营效力"[14]。当于右任提出对许克祥的处置太轻时，汪精卫回答说："可以照准"，"应该公布"[15]。

马日事变后，中共中央争论激烈，陈独秀束手无策，情绪急躁。他接受了国民党右派的宣传，认为反动派叛变是农民运动"过火"造成的。鲍罗廷也认为事情"弄糟"了，提议由他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在此议征得汪精卫同意后，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指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及唐生智的代表周鳌山、刘绍芬5人以及顾问鲍罗廷等组织查办代表团，奔赴长沙"查办"。行前，汪精卫等规定特派员的任务是："制止军队，制止农会，应同时进行"，即所谓"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16]。于是，特派委员会提出以下5点处理意见："（一）改组湖南省政府；（二）改组湘省党部及农会、工会（三）制裁越轨军人，由周斓调查；（四）命令停止军队与农工之军事行动，不听者严厉执行；（五）其余善后问题，听中央办理。"[17]这种用合法手段查办反革命，只能是为反革命涂脂抹粉，真正查办的则是所谓"过火"的农民运动，实则是压制农民运动，讨好国民党右派，使农民运动屈服于资产阶级。当查办团行至岳州时，许克祥等便密电岳阳驻军，将他们"就地拿获处决"[18]。谭等闻讯，慌忙逃回武汉。但他们竟无丝毫反抗、镇压之意。当时中共中央仍实行让步、和平政策，同国民政府一样，只作了一些压制农民运动、纠正农运过火行为的工作。

陈独秀还利用党的总书记地位，出来直接支持反动派。他命令新闻记者党团员做文章批判农民"幼稚"；命令中央宣传部出宣传大纲，纠正农民

"过火"行为；并且还下令禁止汉阳工人接管反动资本家所故意关闭的工厂。陈独秀对工人纠察队也十分不满。当夏斗寅叛变时，武汉工人纠察队要求国民政府从汉阳兵工厂发2 000支枪和几千元的月费，武汉政府迫于形势，已经答应了，可是，陈独秀却拒绝不要，以表示自己没有"阴谋"和对武汉政府的"忠心"。陈独秀所采取的软弱无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助长了汪精卫等人的反动气焰。当反动军官在湖北、湖南发动反动叛乱的时候，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上层的反动面目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马日事变沉重打击了中共湖南党组织。经过这次事件，湖南党组织几乎完全瓦解，再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这是因为：在事变前后，省委提不出正确的斗争策略，领导党员群众同敌人作坚决斗争，以致被动挨打，没有政治出路；"省委及一部分地方指导机关不能担当它应担负的责任，……负责人首先各自逃去了，有许多还是未闻风而先自溃"；"训练工作太差，负责同志多半是书生，没有战斗经验，一般同志亦多不能战斗"，因之省委失去指挥能力后，各地就不能独立地发挥其战斗作用。当时"党只有纵的系统而无横的联系，各地党部相互隔阂着，各自为战，不通声息；……"⑲

从汪精卫等人对马日事变所采取的态度看，武汉国民政府从一个执行三大政策、维护工农利益的革命政府，向着背离三民主义，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府蜕变。这是汪精卫等公开叛变革命的一个明显信号。

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只是一味地妥协、退让，致使反动派的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和推动了汪精卫等的反动。

注释：

①柳直荀：《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

②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马日事变后农军是否包围过长沙问题座谈会纪要》

③《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④柳直荀：《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

⑤柳直荀：《马日事变的回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

⑥《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⑦《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20期。

⑧《武汉政府褪色记》，《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

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437、438页。

⑩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8日)。

⑪《中央汪谭两主席世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马日事变专号》，1927年6月19日。

⑫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⑬《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的信》，《向导》第197期(1927年6月8日)，第2151、2152页。

⑭《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页。

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6月27日)。

⑯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扩大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6月23日)。

⑱《国闻周报》第4卷第23期。

⑲《湖南组织报告》，《中央通讯》第六期(1927年9月39日出版)。

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中国革命的紧急时期，1927 年 5 月 18 日 ~30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

会议的议程是中国问题和战争危险问题。斯大林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长篇演说，批评了托洛茨基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论著、提纲、书信。全面地阐述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策略。全会并通过了由布哈林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会议期间，为了及时指导中国革命，挽救革命危机，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会议精神，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来了两次紧急指示，史称“五月指示”，共产国际提醒中国党，“某些将领及其集团、国民党‘右翼’的某些政客或其集团，今后仍然可能、甚至必不可免地要叛变”，为此，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因为“群众的运动乃是未来胜利的保证”[①]。“指示”的要点是：

一、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认为，这是“在中国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的基础”。指出：“没收土地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

二、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



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三、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依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

四、组织革命军事法庭。“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②

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共产国际深深感到发动工农群众投入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清楚地看到“摆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严重困难，首先是帝国主义者联合力量的武装干涉和其他干涉所造成的困难，其次是一些动摇的社会集团的必然叛变和投向敌人阵营所造成的困难，产生了这样一种局面：要想使革命取得胜利的发展，就得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③。

这个指示，指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其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共产国际在上述指示中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比过去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也存在严重不足。

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是存在右倾错误的。最集中的表现在对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全会通过的文件，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汪精卫充满幻想。全会主张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并强调这种合作“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④。

任何具体政策必须在“国共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前提下进行。例如，全会在指示中共应自下而上的实行土地革命的同时，特别强调“共产党还应当在政府内部实行一种能由政府本身发动土地革命的政策”⑤。意思是自下而上地搞土地革命还是要征得武汉政府的同意，并且最好还是由武汉政府本身来发动。又如，“五月指示”要求中共迅速建立一支以工农和共产党员为主体的革命新军；但是全会却把这支军队看作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近卫军”⑥，是“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⑦。言下之意，这支军队仍然从属于武汉政府。

总之，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必须同中国国民党保持“紧密的党内合作”，在革命斗争中必须以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为最高原则。然而，当时的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的许多要人反动倾向十分明显，他们既不愿实行土地革命；也不可能听任共产党去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更不允许新的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企图通过他们推行其革命政策，只能是暴露自己，为他们扩大反共宣传、采取反共行动提供证据。

这样，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共产国际没有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做好与国民党反动派分裂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而且还幻想在国共合作下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惩办反动将领，改组自己的领导机关等。这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所以很难执行。

1927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指示。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政治局成员大多数表示，要实现这几点非由中共单独干起苏维埃不可，可是莫斯科又不让退出国民党。鲍罗廷也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与北伐并举，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并举的策略是“荒唐可笑的”，如果按照这个指示办，就意味着统一战线的破裂。陈独秀等认为这些任务并“不是即时都能实现的”，因而采取了消极态度；有的人并且认为这个指示“是太迟了，是在‘放马后炮’，为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预留余地”[⑧]。鲍罗廷和陈独秀本打算保密，不向党内同志传达“五月指示”。不料，罗易已把机密泄露给了汪精卫，鲍罗廷得知后，十分恐慌，预感导致国共分裂的一场大祸即将来临。他一面致电莫斯科，要求火速撤回罗易；一面提出了一份限制土地革命，依靠汪精卫和唐生智，纯粹“自上”的退却计划。陈独秀、维经斯基和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都支持鲍罗廷。

6 月 6 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紧急指示的发言时，以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为由，拒绝了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6 月 15 日，陈独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致电共产国际：“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⑨]。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准备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仍然把希望寄托于以无限制的让步来稳定汪精卫集团这种策略上面。

实际上，自北伐战争开始以来，陈独秀就在一系列原则性的问题上发展了右倾错误。例如，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所犯的诸多错误，最严重的是，继续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试图继续以退让来拉住资产阶级；自 1927 年 5 月以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跟在汪精卫集团后面，一味指责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幼稚”、“过火”、“过左”，规定了种种限制农民运动的措施，不准农民组织常备武装，不准农民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无视共产党直接掌握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使党在北伐过程中不能采取有力措施来发展革命武装。

陈独秀还强调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⑩]，要求各级党组织、农民协会立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些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不仅使农村的革命运动得不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支持，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从而压制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斗争意志；而且，还使土豪劣绅有恃无恐，放肆勾结土匪、叛军，对农民加紧进攻。

陈独秀等还忽视和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提出了组织中共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和中共应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当时离国共正式分裂还有一段时间，“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做，还不失时机”。以军队为例。“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⑪]。这样，一旦发生突然事变，党才有可能在戒备的状态中及时给以有效的反击，从而避免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等人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在 1927 年春，在武汉工作的共产党人“本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陈独秀到武汉后，“说什么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都好，怕引人妒嫉；他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等等。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这一师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⑫]。

6 月底，当汪精卫集团已经明目张胆地起来“分共”时，陈独秀不仅不

考虑如何来加强工人阶级的武装，准备应付突然的事变，反而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连劳动童子团的短棍也解除下来。

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错误地认为工农运动动摇了北伐军心，认为工农运动中的“幼稚病”和共产党的失策是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主要原因，从而提出了“防止党外的右倾”和“反对党内的‘左’倾”的策略方针，幻想靠维持国民党各派军事首领间的“势力均衡”和建立汪精卫为首的“文人政府”来防止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等。

就这样，陈独秀为了拉住汪精卫集团，不惜把领导权统统交给国民党，甘心充当国民党的附庸；忽视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不敢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不敢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不懂得无产阶级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忽视对国民革命军的争取，不去扩大工农革命武装，甚至解散工人武装；只想依靠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其结果，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以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发生着直接的严重的影响，最终导致了国民革命的失败。

注释：

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27年5月。

②《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32页。

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325页。

④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4页。

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325页。

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页。

⑦《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40页。

⑧张国焘：《我的回忆》。

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第508页。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105页。

⑪《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9页。

⑫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汪精卫反共升级中共中央一再妥协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是经长期精心策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汪精卫事后承认："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个月，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裁制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和共产党和平分共，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①。

从1927年4月底~5月底的一个月时间内，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摧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的法令。表明汪精卫集团已开始着手进行分共的准备工作了。

1927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争取国民党左派接受"五月指示"，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竟天真的将共产国际指示的机密电报，交给汪精卫看，并依汪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汪精卫没有把此看成是给自己的"再度保证"，相反借此大肆诬蔑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并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迈出了反共的决定性一步。

6月5日，武汉政府解除了鲍罗廷的国民政府最高顾问职务。鲍罗廷是孙中山先生亲自聘请的苏联高级顾问，鲍在促成国民党改组、实现国共合作和帮助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汪精卫对解除鲍罗廷这样一个对国民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的职务，表明他反共的决心已相当坚定。

郑州会议结束后，汪精卫等回到武汉，随即开始着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实际准备工作。他们"从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②他排除谭平山、吴玉章等共产党员，召集主席团会议，一连开了十几个晚上，密谋策划"驱逐共产党"的时间表。

汪精卫深知，要使"分共"能顺利进行，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他对朱培德在江西率先"清党"分共，公开予以鼓励和支持。

朱培德是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三军军长，他在宁汉对立中"有时靠近汪精卫，有时靠近蒋介石。"[③]马日事变后，朱培德立即响应，首先强迫南昌的《三民日报》停刊，接着又查封了这家报馆。5 月 29 日，朱培德以"现在江西军队中的武装同志和做政治工作的几位人员发生了一点意见，请诸位暂时离开江西，以免引起不好的结果。"[④]为理由，打着"欢送"的幌子，在一个团的武装押解下，强迫第三军全体政工人员 142 名遣返武汉。同日，武汉政府接到朱培德的致电后，随即决定指派朱培德、黄实、陈其瑗三人为中央特派员，组成江西特别委员会，由朱培德任主席，负责执行中央各项训令。这是汪精卫集团对朱培德"清党"的实际支持。

朱培德仰仗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支持，反革命活动更加肆无忌惮。6 月 4 日，朱培德下令停止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以及各县农民协会的活动。卫戍司令部派出武装宪兵在各处设哨岗，收缴农民自卫军的枪械。随后，吉水、南昌、新建、铜鼓、泰和等地土豪劣绅勾结反动军队，捣毁革命团体，捕杀农协委员，枪杀农民的耕牛等。

朱培德的反共行径，遭到武汉各界人民团体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向武汉政府请愿，要求惩办朱培德。湖北总工会原定于 6 月 15 日举行"欢迎铁军凯旋"大会，声讨朱培德的反共罪行，被汪精卫横加阻止了。6 月 13 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上，一再为朱培德开脱罪责。为表示对朱培德的支持，会议同意朱的请求，派陈公博赴江西"指导党务"。

6 月 29 日，陈公博、朱培德共同拟定了一份所谓"党员宣传大纲"。宣称"集中权力于党"，对"不守纪律的马上加以制裁"，为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提供依据。

当时，唐生智、何键等人的反共态度已很明朗。6 日，汪精卫等武汉方面的国民党要人前往郑州，与唐生智商议率北伐部队回师武汉，以便控制局势，为"分共"准备。6 月下旬，唐生智以武汉政府全权代表身份到达长沙，查处"马日事变"的有关问题。他公开站在反叛的军队一边，把这次反革命事变的起因归结为"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说什么留省军人"目睹恶化，身受压迫，乃作自决自卫之谋，宏救人救世之愿"（唐生智长沙查办电。）他的部下并举行十路清乡，积极向革命农民进攻。

为了挽救革命，6 月 25 日，蔡和森致书中共中央常委，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候人家来处置，直无异



鱼游釜底!”因而提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⑤]这一提议，也没有被采纳。当时，还有一些中央党员也建议中共中央要注意军事工作。但是，都被陈独秀一一拒绝，党内正确的意见受到相当的压制。

在武汉，何键、李品仙等反动军官，自恃实力雄厚，竟以“分共”为东征的先决条件，要挟共产党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6月28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指使下，派兵在湖南“清乡”，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意为C. P. 东征!”[⑥]并于6月29日发出反共训令，煽动武汉军民“共起急图”，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声称“此而不去，祸将不堪”[⑦]。同时，何键鼓励他的官兵做反共的急先锋，命令部下“应一致的联合起来，向共产党进攻”，“勿稍疏懈的向前猛冲”[⑧]，遂派遣部队查封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并在街头公然拘捕共产党员。南京的胡汉民为何键的反共训令拍手叫好，他说何键宣言“比其他任何反共产的理由材料。都要来得新颖切实”[⑨]。同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密令军警人员查封共产党的机关和总工会，搜捕共产党员。

中共中央于6月27夜即获悉何键要发动反共行动。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这时已出走，他临行前告谭平山希望中国共产党注意马日事变之重演。28日晨，陈独秀在鲍罗廷住宅紧急会议。会议以消除何键暴动，不给反动军官以反共的口实为理由，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根据会议决定，湖北省总工会立即发布《湖北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的布告》，企图以此换取汪精卫集团的信任。这更加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28日，何键派遣部队分别占据汉中各处工会，李品仙派一个机枪连占驻全国总工会。

这时，只有张发奎的第四军让汪精卫放不下心，因为第四军不仅战斗力极强，而且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党员。

武汉北伐军回到武汉后，在阅马场举行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汪精卫以大会宣传大纲没有拥护三民主义为由，对四军政治部大加指责：“这些C. P. 分子幼稚到忘了根本，只知道三大政策，不知道三民主义”；攻击共产党“简直闹得不像样子”；大骂工人纠察队“胡闹到天翻地覆”[⑩]。事后，汪精卫指示张发奎对政治部要加强控制，对其发表的宣传文件必须严加审查。

7月5日，在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就职典礼上，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词。他不仅一味地攻击共产党，还指责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阴谋”：共产国际“说国民党不能够领导革命，要由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怎样去领导呢？就是消灭国民党！”[11]但是，由于第二方面军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张发奎等在答辞时，对汪的蛊惑未表示响应，这使汪十分尴尬。可是汪精卫仍不死心，他找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在分共问题上犹豫不决。汪精卫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队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12]。在这种情况下，张发奎同意了“分共”计划。

与此同时，汪精卫、顾孟余、孙科等连续发表文章，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叛变革命作舆论准备。

这时，武汉地区的局势已经十分严重：“（一）冯玉祥来电驱鲍（罗廷），分共；（二）何键露布讨共檄文，并发讨共通电于全国；（三）叶琪、周斓（唐生智部下）名为回乡查办许克祥，实际举办十路清乡，积极向农民进攻”；（四）唐生智回乡之日公开反共，将马日事变责任完全推于共产党身上，公开枪决我们二同志；（五）何键等公开要求共党分子立即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及妇女团体；（六）何键之三十五军移驻汉口，其势汹汹，企图开刀，这是六月底的情形。”[13]可见，反革命政变已迫在眉睫，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仍不发动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工农作好应付突变的准备。陈独秀反对对汪精卫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因为这时的汪精卫在口头上依然是以东征讨蒋为号召。陈独秀认为，汪精卫在取得东南各省之前还不至于公开反共，国共两党的问题可等打到南京以后再说。

当陈独秀主张疏散干部时，毛泽东要求派他到斗争激烈的湖南去。由于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后，积极组织群众反击反动势力，遂即受到陈独秀的指责，仅10日，就被调回武汉。同时，陈独秀不仅拒绝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并且还扣留了不予传达。

6月23日，共青团书记任弼时要求中央公布共产国际第二次紧急指示，陈独秀以粗暴的态度予以拒绝，并当场撕毁了青年团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

7月3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



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图减少政局纠纷"，他们"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和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14]由此可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但放弃了革命领导权的争夺，而且把工农群众团体、工农自卫武装等一并交与汪精卫集团处置。他们企图以机会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这是一个彻底机会的政纲，它表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陈独秀的错误继续遭到党内不少同志的批评。

由于这个政纲受到了许多中央委员和青年团中央的坚决反对，而陈独秀又不改悔，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遂致毫无结果。

在中国革命十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继续被以陈独秀为代表机会分子所把持，大革命的失败最终不可避免。

注释：

①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党史参考资料》第 4 册，第 475 页。

②同上书，第 476 页。

③《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7 页。

④《中国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1927 年 6 月 13 日。

⑤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 年 9 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3～94 页，第 95 页。

⑥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⑦《武汉反共之重要文件》，《国闻周报》第 4 卷第 29 期。

⑧《何云樵先生讲演录》，长沙洞庭印书馆，1934 年版。

⑨《何键实行铲共》，《民国百人传》第 3 册。

⑩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

⑪同上。

⑫《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

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94页。

⑭《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256页。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的失败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的反革命行径一再妥协、退让，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等曾进行过斗争。1927 年 7 月 4 日，中共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问题，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自卫军可应征加人，我们可以不客气地将群众送给他们。对此，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①。

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原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陈独秀停止工作。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工作转变的序幕。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面对国民政府限制工农运动，屠杀革命群众的现实，发表了对政局宣言。《宣言》公开揭露了汪精卫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武汉政府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并“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宣告我们共产党人要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利益而奋斗，“继续作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继续反军阀的斗争”，愿意同一切“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的”革命知识分子合作，“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努力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②。担任武汉政府农政部长和工人部长的谭平山、苏征兆随即提出了辞职书。

汪精卫集团利用陈独秀投降式的让步，加紧其叛卖革命的阴谋活动。7 月 14 日晚，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议，策划“分共”。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被排除在会议之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拒绝出席会议，遂派陈友仁为代表到会发言，竭力反对分共，指出“有

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③]。当晚，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在汉口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强调“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指出“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中国人民谋求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并表示将“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④]。就这样，宋庆龄公开表示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们决裂，随即离开武汉经上海前往苏联。在此之前，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于6月30日化装成查电线工人离开武汉，后与苏联顾问一起到达莫斯科。他在国民党中央的告别信中斥责了汪精卫等人曲解三民主义，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共反人民行径，愤然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史称“七·一五”分共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谭延闿担任会议主席。会上，汪精卫首先宣读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对“五月指示”进行了全面攻击。其要点是：（一）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二）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三）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四）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五）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最后，汪精卫得出结论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当初容纳C. P. 同志加入本党，不想结果竟如此！……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毒害”。据此，他提交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派要员赴莫斯科说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其间



应订出种种关系，不要暧昧行事”，声称：“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对于武汉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⑤]即国共不能并存，必须清除共产党！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取缔共产党之三项办法”：第一，“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之意见，并解决之”；第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以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⑥]会上，汪精卫集团公开提出取缔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要进行反共清党。这样，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公开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会后，汪精卫集团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行公开的攻击和迫害。

7月16日，汪精卫向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作了题为《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的报告。在报告中，恶毒攻击中共中央7月13日发表的《对政局宣言》，认为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破坏本党容共之最大表示”，“国民政府是本党执行命令之最高机关，既然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且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都属于国民政府的系统，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⑦]这是汪精卫发出的“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

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15日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同时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布了两个训令，一是关于保护共产党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二是关于保护农工的训令。虚伪地声称：7月15日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这说明，武汉汪精卫集团还缺少勇气和条件来承受分共的恶名，以此掩人耳目。

但何键并不理会此项决议和训令，继续进行反共活动。在会议通过决议之日，何键下令所属部队举行反共游行，并冲进会场逮捕共产党员吴玉章，并抄了吴的住宅。

19 日，武汉国民政府训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对所属军队中的军事负责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对已经知名的共产党员应切实劝导，使之“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即行停止职务；对未知名的共产党员则应随时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同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全国劳动青年群众书，号召青年为打倒“屠杀民众”的武汉“左派”而奋斗。

21 日，陈公博取代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陈克文取代谭平山担任农政部代理部长。

24 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

25 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恶狠狠地说：“在国民党的权力之下，是由他们这样胡闹还是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⑧]之后，汪精卫集团连续发布公开取缔共产党的反动法令。

26 日，汪精卫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发表了《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⑨]这是正式把共产党当作敌对党进行取缔的反动法令。

27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指责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自布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本党的表现”，并宣称：“共产党应即自觉放弃其近日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⑩]。同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⑪]。

汪精卫集团的“和平分共”很快发展为“武力清党”。8 月 2 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



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12]。8 月 5 日，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枪杀了共产党员彭江等多人。同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咬牙切齿地说：对共产党“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

8 月 8 日，汪精卫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狂叫：“现在还要说是容共的，就算不得是人”[13]。同时，他还在会上提出了清党的各项办法，被会议所接受，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通缉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第二，厉行清查共产党员；第三，改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各群众团体。从此，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进行公开镇压，并喊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所有革命团体，如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总工会等都被反动派封闭。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这时，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只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友仁、于右任、彭泽民等极少数的真正的左派分子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其余一齐滚进了反革命的泥坑。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14]。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

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的宣言》（1927 年 7 月 13 日），载《向导》第 201 期。

③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④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 年 7 月 14 日。

⑤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02 页。

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 40 次会议速记录》（1927 年 7 月 25 日）。

⑦《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 年 7 月），第 102、103 页。

⑧《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 40 次会议速记录》（1927 年 7 月 25 日）。

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0日）。

⑩《武汉反共之重要文件》，《国闻周报》第4卷第21期。

⑪同上。

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5日）。

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8日）。

⑭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7页。